



昨天的记忆  
(上)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上)



北京地质学院



定价：HK\$260元(上中下三册)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 昨天的记忆

##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顾问：陶世龙 何蜀 吴迪

策划：蔡新平 田春林 伏庆是

编辑：张运鈞 李颖

特约拟稿人：本书所有文稿的作者

二〇一九年一月

#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责任编辑：许 阳

封面设计：铁 壁

ISBN 978-988-77056-1-1

2019 年 1 月第一版

开本：210mm X 285mm

字数：1200 千字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 l: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9 5333

定價： HK \$ 260 元

敬畏历史  
说出真话  
留下真相

——陶世龙



# 总 目 录

## 上 册

序一 陶世龙：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i
序二 闫长贵：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	v
序三 孙怒涛：我与地院文革	ix
序四 何蜀：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	xvi
阅读指南	xix
前言	1
第一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0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上）	50
目录明细	
【乱世的记忆】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53
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73
田春林：田春林的回忆录	141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176
李颖：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185
张华府：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194
张华府：无罪的囚徒——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	207

梅建明:	梅建明与朱、叶反党集团	272
陈永迪: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	280
陈永迪: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287
程关林:	被遗忘的群体	292
殷惟侯: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315
林天民:	文革回忆录	333
胡昌铭:	文革回忆录（节选）	343
何建勋:	文革回忆录（节选）	370
陶世龙:	我的 1978 年	396

### 【六二〇事件】

万天丰:	回忆“六二〇事件”	411
------	-----------	-----

### 【九四事件】

大批判联络站:	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423
聂树人:	“九四”事件：“二团”分裂阴谋的破产	429

## 中 册

###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中）

#### 目录明细

### 【神秘人物】

蔡新平: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5
------	---------------	---

王大宾： 我陪肖力去京西门头沟煤矿 27

王广宇： 寻找肖力 28

王大宾： 叶向真与朱成昭 30

### 【老师的昨日心迹】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1-6） 32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7-12） 129

唐振权：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279

钱佩娟： 文革回忆录（提纲） 291

### 【岁月的印迹】

古宝琳：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99

古宝琳： 古宝琳日记摘抄 336

梅 村： 工作组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 351

### 【外地串联】

丁育民：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二个事件 352

陈永迪：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365

张华府：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381

庄一龙：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407

### 【保护老干部】

王大宾： 地院东方红成了部分被冲击的老干部的  
避难所 414

### 【忆旧思亲】

石白河：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节选） 416

# 下 册

##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下）

### 【口述历史】

梅建明： 我的文革回忆

1

## 第三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

### 重要人物专题

#### 目录明细

一、 “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专题	120
二、 周永璋两次被抓专题	181
三、 王大宾专题——王大宾庭审记录	213
四、 揪彭德怀专题	226
五、 朱成昭专题——朱成昭八大观点	256
六、 杨雨忠跳楼自杀专题	274
七、 二进地质部专题	287

## 第四篇 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 目录明细

一、 北京地院因文革而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317
二、 工作队领导期间，因“反干扰”而遭受打击、 挨整的地院师生	320

三、地院革委会领导期间，因清理“阶级队伍”而 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326
四、军宣队进驻地院后，因文革、因清查“五一六” 分子而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335
<b>第五篇 涉及地院文革的回忆、讨论、反思和研究文章汇集</b>	
<b>目录明细</b>	
<b>【文革研究者专论】</b>	
一、陶世龙：不能压制不同意见——“620事件”中 应记取的最大教训	343
二、何 蜀：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肖李廖、罗广斌案	346
三、敖本立： 红楼座谈会王大宾没有参加	360
四、肖劲东 蔡新平：独立思想家——安静中	363
五、蔡新平：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 重大贡献	372
六、蔡新平： 从《东方红报》一篇文章看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险遭“覆灭”的命运	386
<b>【对地院文革的反思和研究】</b>	
一、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392
二、刘建业： 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	406
三、肖劲东： 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有感	408
四、王 锐： 谈丁育民对“安亭事件”的回忆	409

五、 晓 星： 谈伏庆是回忆录	410
<b>第六篇 本书编辑中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史料</b>	
一、 中央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对地院文革的指示、谈话	412
二、 地院文革期间重要文字史料	413
三、 地院师生已发表的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目录）	414
四、 其他参考文献史料	417
编辑后记	420
附 件	422
一、 蔡新平： 关于请张运钧、李颖着手整理编撰《地院文革史料汇编》致信各位校友	422
二、 蔡新平：《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 电子版代序	424
三、 蔡新平：《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 电子版导读	426

# 序一

##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陶世龙

运钧、李颖伉俪编辑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书稿杀青，紧接着，蔡新平编辑的信息量更多的同名电子版也编辑就绪。书稿搜集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史料比较宏富，得百余万字，包含个人记忆，原始文件以及各种记述，初具规模，编年有序，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

这也是众人之力。因为还原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本是众人出于良知的愿望。此前有关北京地院文革的记述研究，已有几种图书面世，自有其价值，不过多仅能见其一斑，此次有所扩展，更上层楼。

当然，距离编出一部信史的要求尚远。期待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更多有识之士积极参与，说出真话，留下真相。如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段历史，取得对文革的正确认识，善莫大焉！

盖文革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已由执政党通过煌煌决议，昭示天下，彻底否定。但观察社会实际，不难发现，朝野各方并未完全达到共识，争议仍多，乃至势如水火，此处不赘。

时至今日，文革的语言、形式，在公共场合仍不时可见，特别是文革遗留的思维方式，仍在支配人们的头脑，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凡此种种，多因文革真相公众至今缺乏了解，时间虽已过去五十余年，有关档案资料罕见公开，文革研究还成为禁区，成果发表，多在海外。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佛经自有其解释，而如从科学的角度来

理解，分析个体以认识整体的精神实质，是有可能的。对文革总体进行研究，得出完满结论，也许需要留待后世，但把北京地质学院在文革中这段历史查清楚，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到的。

文革是发动者布下的一盘大棋，虽还达不到“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的境界，也够一代中国人受了。在这场博弈中，最高司令部点火于北大，决斗于清华，北京地质学院本不在其位，是自己跳出来的；上千人反对工作队，北京市任何高校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于是成为一枚不能不被重视的卒子并过了河。卒子过河顶大车，一所本来一般，人数也不多的高校，竟然叱咤风云于一时。

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也是悲剧的开始，终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如秋扇之见捐。本书以及其他回忆录中留下的个人记忆，都是历史的见证。

北京地质学院异军突起于文革而为天下重，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窃以为偶然性主要有两点：

1， 地质部派出的工作队整人的手法直白，他们要整的老院长偏偏又是个高校领导层中的异数，群众真心拥护。加上北京地院师生多数刚参加过地质部野外队的“四清”，知道这些主要来自野外队的工作队员有多高水平，不存在敬畏之心。

2， 派出工作队的何长工先生，恰好是文革发动者预定要拿下的一枚棋子。

说有必然性，窃以为也有两点：

一、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和清华不仅将地质系教师，还有学生及其

他辅助人员，北大清华地下党转到地上的人际关系和行事作风也带了过来，名称换了，实际有似西南联大之合校。北京地质学院首任院长刘型是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老红军；接任的高元贵，是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投身抗日战争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文革中高元贵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动权威的总代表，并揪出一大批“漏网右派”，恰恰表明在两位不忘初心的老院长护持下，北大、清华两校原有的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存。因此能有上千的师生，在工作队的高压下，仍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主要来自平民阶层，大部来自农村，出身贫寒的多，所谓高干子女，从建院到 1966 年，十四年不到十四人，或级别勉强够上高干，像清华、北大拥有的那种举足轻重的高干子女，北京地院一个也没有。原因很简单，地质工作以吃苦闻名。志愿报考地质专业的多是习惯于艰苦生活的平民家庭，而地院学生反对工作队，无从得到来自高层的小道消息，只能根据所接触到的事实，凭自己的良知作出判断。

由于工作队是以党的名义来校的，容易被简单地以为他们就是党，听他们的话，但在问题明朗后，很快转变。地院没有让工作队的势力长期存在，也显示了自己的特点，与高层的纠纷没有牵连。

综合以上多种因素，北京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自有其特点，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再现。但无论有多少特点，都仍是在发动者布下的棋局之中。对待某一事件的对错，只能作为对个人的评价，无改于文革的大局。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或不免于留恋某个不可再得的辉煌，反思往事也容易致力于寻找自己曾有哪些正确，这都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学过地质学的学

生，我想更应该跳出已习惯的思维范畴，用地质学的时空观看文革。这时我们看到的文革，实不过人类历史之一瞬，终不过是短暂的逆流；文革中出现的纷争犹如过眼烟云，而重要的一点是，无论观点如何不同，甚至暴力冲突，但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形成当年的历史，因此应该互相尊重；历史又已经有了结论，无论当初观点如何不同，命运却是相同的，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的中国。

文革发生在中国，确有其独特的土壤，值得探讨，自身的反思也在其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把真话说出来，让真相留下作为最后的一种贡献。

2018年12月1日

**编者按：**

陶世龙 文革研究学者

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52年调入北京地质学院，曾任教务处副处长。

(此文在《昨天》的2018年11月30日第121期发表)

## 序 二

### 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

阎长贵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出版了！我表示诚挚的热烈的祝贺！

文革时期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地质学院的人接触较多，也了解得比较深，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地院东方红）的两代领导人朱成昭、王大宾我都交往较多，很熟。当朱成昭在位时，我曾奉中央文革小组某成员之命，去找朱成昭布置他们到四川去揪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但当朱成昭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有对立情绪时，我还几次登门劝他；当朱成昭认真地躺倒不干时，我几次到医院找王大宾动员他挑起地院东方红的担子，跟他说：“地院东方红是个有影响的群众组织，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直到现在，我和原地质学院的不少同志仍有交往，还有聚会畅叙。所以，听到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的编辑和出版非常高兴，恨不能很快读到——而我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关于地质学院的文革，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 第一，地质学院造反派保护院领导。

地院造反派无疑也做过错事，有不少“左”的东西，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 345 元降低到 31 元，287 元降低到 67 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

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造反派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保院的主要领导，从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时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 第二，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分裂出对立组织。

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

## 第三，地院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

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

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 40 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 第四，地院造反派对彭德怀的态度好。

中央文革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在历史上战功卓著，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严肃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接着戚本禹又给北航造反派打电话，要他们去揪彭德怀（这件事戚未通过我，我不知道）。后来按照总理的指示，还是地院的人护送彭总乘火车到京。彭总回京后，中央文革小组布置北航和地院联合批斗彭总，北航在批斗彭总时，地院为应付中央文革小组，革委会研

究派一些人参加——他们对彭总没有任何加害行为。总之，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这个说法，就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敬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是为序。

**编者按：**

闫长贵 196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曾任江青秘书，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员。

(此文在《昨天》的 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121 期发表)

# 序 三

## 我与地院文革

### 孙怒涛

#### (一)

尽管清华与地院近在咫尺，尽管清华四一四属于以地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我真想不起来，我与地院文革有多少瓜葛。文革中，甚至这一辈子，我都没进过地院的校门。这，似乎有点难以相信，但真是这样。

那么，我敢说我与地院文革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不敢。细想起来，有三件事是与地院文革有关的。

其一，批判、打击红教联。

红教联是一个以陶德坚为首、老教师为主体的清华教师组织，从成立一开始我就受到另一些教师战斗组的批判。四一四成立后，批判打击红教联是四一四上下的共识，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团派的社会基础。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四一四被蒯大富的团派严厉地打击压制，另一方面四一四又严厉地批判、打击比它更弱势的红教联。被迫害者同时又是迫害者，四一四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都演绎得认真、可悲又可怜。

四一四打击红教联，这件事与地院有什么关系呢？原来陶德坚的夫君陶世龙是地院的老师，红教联在建立之初与地院的一些老师有比较多的联系，甚至红教联这个名称也来自地院。1967年5月15日，四一四成立才一个月，就在主楼前批斗陶德坚，并把地院教师沈孝宇也拉来陪斗！

作为四一四主要头头的我，完全赞同并不遗余力地批判红教联。今天，我为此感到羞愧和内疚。在这里，我向受到四一四伤害的陶德坚、沈孝宇老师及红教联教工真诚地表示我迟到的道歉！

### 其二，揪刘火线。

这是在1967年7、8月间，北京市几百个红卫兵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安营扎寨要求揪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一次持续近一个月的大行动。当时，北京的造反派已经分了“天派”与“地派”。“天派”以搞航天的北航为首，“地派”以搞地质的地院为头。因为清华井冈山是北航红旗的坚定盟友，属于“天派”，与地院东方红本没有太大关系的清华四一四就不得不“被地派”了。在“揪刘火线”，“天派”、“地派”各有自己的联络站协调自己这一派的行动部署，四一四参加的是“地派”联络站。众多造反派组织一方面高调声讨刘少奇，另一方面天地两派互相攻讦。外战内战同时开打，成了“揪刘火线”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 其三，火烧英国代办处。

也是在1967年的8月下旬，“地派”联络站组织属下的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声讨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犯下的暴行。当四一四驻联络站人员向我请示四一四参不参加这次行动时，因一把手沈如槐当时正在外地，我拍板决定参加。于是，四一四成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涉外大事中的积极参与者。

与地院有点关系的事情，屈指算来，也就这三件，都很不光彩。与团派相比较，四一四是温和的造反派，我在四一四中又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翼。即便温和再温和，也还是很激进。为什么会这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革本

来就是错误的领导人以错误的路线为达到错误的目的而发动的一场祸国殃民的错误运动。卷入其中的每一枚卒子，犯错误是必然的，不犯错误倒是很稀罕的。

## (二)

地院文革是中国文革的一部分，它必然具有中国文革的共性。地院又是地处北京直属地质部的一所高校，它的文革有其自身的特色。

当年，我不关心地院文革。今天，我经常想着它与清华文革的异同。

地院，也有一位与清华蒯大富齐名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也分两派。蔡（新平）派是少数派，掌权的主流派（朱成昭王大宾派）对蔡派的压制和打击非常厉害，蔡派对主流派的反抗和抵制也十分顽强和激烈。但是，蔡派始终没有从东方红中分裂出来，地院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我对地院文革的这一现象特别感兴趣，曾与蔡新平等地院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

阅读这部地院文革史，可以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清华的造反派分成团、四两派，而且是彻底分裂了，最后还爆发了严重血腥的百日大武斗。这是历史事实，现在再假设如何如何，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从中引出历史教训，则是必须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毛的最高指示，有不少是互相矛盾的；每个指示都有不同的语境，适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对同一指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为我所用而曲解，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文革触及了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相同群体的人必然会抱团保卫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允许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的文革初期，以战斗组、战斗团、串联会等形式出现的派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譬如，1967年4月14日出现的四一四串联会，就是值得肯定的。团派强行要在5月30日成立清华革委会引发了团、四两派的尖锐矛盾。四一四选在4月29日成立四一四总部，宣告与团派在组织上彻底决裂，导致了革委会的流产。这一回合，表面上看团派遭遇了重大挫折，四一四取得了辉煌胜利。此后，两派争斗渐趋激烈。两派联合的机会一再丧失，极端思想膨胀，恶性事件频发，中间群众被彻底撕裂，分裂前的唇枪舌战已经不再，代之以真枪实弹的武斗，造成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物的严重破坏。分裂不一定必然导致武斗，但是分裂为武斗打开了一道闸门，最终为两派走上同归于尽的不归路埋下了伏笔。

我在2013年出版的《良知的拷问》一书中，把四一四的组织分裂认定为四一四所犯错误中最大的错误。这一观点受到老四朋友们的一致反对。五年过去了，我反复思考，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地院的文革史，为我的这一观点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实例。地院的两派斗争也很尖锐激烈，地院的蔡派也遭受了主流派的镇压和打击，但是蔡派始终不在组织上分裂，顽强坚持在东方红内部进行斗争。地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与此有极大关系。

在团四彻底分裂前的4月底，在谢富治主导下，两派曾达成“四项协议”。最关键的第三条是团、四学生代表在“革筹小组”中的名额分配是9:4。尽管两派都不甚满意，但是最后都同意了。第四条是“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四一四要求写上“正确”两个字，即“正确决议”才必须执行。团派不同意。在当时，加上“正确”两个字显然是属于“政治正确”的，于是据理力争。谢富治偏袒支持团派，一槌定音。四一四代表

在屈辱之下签订了城下之盟。回校后，四一四各战团、战斗组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的第四条。作为谈判首席代表的我，受到老四的猛烈“炮轰”。我公开检讨、反悔，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协议。团派执意筹备革委会，四一四决意闹“独立”，最终分道扬镳，不再回头。

四一四与团派的组织分裂，有深刻的根源，但是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正确”两个字，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四一四与团派，谁也不肯在这个虽然重要但并非是根本利益的枝节上再作妥协。

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人见到的是人与人的斗争，受到的是阶级斗争的教育，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中长大。对于阶级敌人，坚决斗争，不留情面。“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妥协？在无产阶级的字典里没有这一说。谁想妥协，谁就是机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出卖革命。文革中，尤其在两派争斗中，时时针锋相对，处处绝不让步。

是的，我们不能以现时的理念和觉悟水平来要求那时的我们妥协处理政治斗争。但是，我们在评判历史的时候，应该站在现时能认识到的人性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而不能还依旧在那时的话语系统中打转转。如果当年两派都能遵守四项协议，在此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虽然清华两派最终还是会被赶下历史舞台，文革最终还是要失败，但是清华文革的具体路径肯定会不一样，师生的伤亡也可能会少一点。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实行必要的妥协，这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这一经验教训，对于今后的政治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妥协，表示通过斗争所得的阶段成果落到实处。

妥协，表示对对手的尊重，对他们代表的另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尊重。

妥协，表示拒绝全胜的诱惑，因为在大获全胜之后必然导致失败方的疯狂报复，仇恨更深，矛盾更难解决。

妥协，是一步一步向着目标稳步前进，而不是大起大落最后还是在原地踏步。

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

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

### (三)

2013年，在文集（即2015年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编撰启动之时，我特地去了北京，也首次拜访了地院的陶世龙、蔡新平等朋友。今年，我见到地院文革史即将问世，十分高兴。有许多话想说，概括成三句话，六个字：感谢！祝贺！学习！

感谢！

我在主编《历史拒绝遗忘》、《真话与忏悔》这两本文集的过程中，得到地院众多校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陶世龙老师应我之邀，认真准备在2016年的4·22“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作特邀发言。后来又参加网上讨论会，为《真话与忏悔》贡献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没有地院（还有北大）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这两本文集的精彩。因此，特别感谢陶世龙老师、蔡新平、张运钧（及北大的李海文、张从）等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祝贺！

经过地院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昨天的记忆》一书终于出版了。我向地

院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这在地院文革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文革史的研究也是重大的贡献。

学习！

《昨天的记忆》，集回忆、思考、论文、史料、资料之大成，内容丰富，编排精当，工程浩大，价值非凡。北大这两年也出了不少书，如《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武斗纪实》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樊能廷先生凭一己之力编撰的《北大文革简史》，更让我十分惊叹！无论是地院汇编性的《昨天的记忆》，还是北大的文革简史，于清华都是空白。我们要向地院、北大的校友们虚心学习，奋起直追，共同为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和思考而努力！

2018年10月1日

编者按：

孙怒涛 文革研究学者

1960年考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现计算机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0年调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

（此文在《昨天》的2018年11月30日第121期发表）

# 序 四

## 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

### 何 蜀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首都北京的一些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不但对首都的文革形势，而且对全国的群众性造反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决定将大学红卫兵赶下文革舞台时，曾专门召见了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成为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五大领袖”的名字：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就从此“载入史册”并被人们广泛知晓。

然而，当时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五大领袖”中的王大宾，跟其他几位不一样：北京地质学院原来的学生领袖是朱成昭，因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走向了反面”，被中央文革下令罢免，另外物色“听话”的王大宾出来取代了朱成昭。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包括文革亲历者和完全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的青年人和外国人，都还在津津乐道文革中官方宣传的“毛主席的大民主”，以为那真是让群众享受了一次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其实，仅从北京地院学生领袖的换马及当年“奉旨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宣传材料中都讳言朱成昭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讳言地院学生领袖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强行更换的来龙去脉，即可以看出那所谓“大民主”的真相。这个“大民主”的一个大前提是：听话。如果不“听话”，那么，不但“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即使像王大宾那样“听话”的，一旦政治上不再需要了，仍然会被卸磨杀驴弃若敝屣，甚至成为文革发

动者和领导者的替罪羊。

我是在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兴起后才听说了北京地质学院及其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的，特别是在 1967 年 4 月我从做临时工的川南山沟筑路工地被解雇回到家乡重庆后，更多地听说了“北地东方红”，当时在重庆十分活跃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中就有北地东方红的人员。特别是在四川最早爆发的武斗流血冲突中，北地东方红的李全华在成都“五六事件”中被保守派开枪打死，震惊了全国，当时我买到一张北地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反复看过多遍，珍藏至今。以后又得知北地东方红在为重庆文革中自杀的著名作家罗广斌鸣冤翻案，为重庆文革前的一大冤案“萧李廖反党集团”翻案，就对北地东方红这个组织更加充满敬佩之情。不过，对这个学校、这个组织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只知道传单、小报上经常提到的“三进地质部”之类“战斗历程”，却一点不知道（那些材料上一点也没披露）领导那些“战斗历程”的风云人物朱成昭，自然更不会提到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

直到九十年代正式投入对文革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退休后相继编辑电子刊物《记忆》和《昨天》，建立了更多的作者、读者的联系，眼界更加开阔，才对北京地质学院及其东方红公社等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从 2015 年 6 月 30 日开始，我陆续为《昨天》编发了几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集中发表了一些原地院文革亲历者的回忆、研究及资料性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当年北京地院的文革亲历者们，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不管是造反派中的“朱派”还是“蔡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尽可能把自己所亲历的文革历史的真相回忆并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当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亲历者们难免受到当年一些情绪的影响——那毕竟

是他们的青春年华，难免会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只要不是个人意气之争，只要争论双方能够跳出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并且在文革中得到强化的那种非黑即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极端化、绝对化思维，即使对某一史实的叙述与认定各有不同，也无关紧要，完全可以按照文史资料整理中的“多说共存”原则，一齐保留下来，留待后人去研究。

总之，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为了不让文革一代人那段一生中最难忘的（不管是激情燃烧的还是灾难深重的）经历如烟而逝，让后代能从文革一代人的“战斗历程”或“苦难历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文革亲历者都不应保持沉默，而应该打消顾虑，站出来发声，说出、写出自己的亲历见闻，尽到自己“最后的责任”，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

2018年6月4日于重庆风江阁

**编者按：**

何蜀 文革研究学者，1989年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任杂志主编，  
现任《昨天》电子杂志主编。

（此文在《昨天》的2018年11月30日第121期发表）

# 阅读指南

本书共计六篇，分上中下三册，文字量高达 100 多万字；涉及面非常广，内容十分丰富，要全部阅读完，确实要费不少时间。而编辑本书的要求是：尽可能地还原地院文革的历史真相，因此本书事实上是地院文革史料的汇编。为了确保文革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本书没有选择将众多回忆录中叙述事件相同或相近的史料分拆组成专题，然后编辑归纳的编辑方式，只是对回忆录作了大致的分类。也许会给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带来某些不便。为了便于大家阅读，我们特编写了该书的阅读指南，方便读者按目录所指引，去寻找自己想了解和阅读的史料。

## 一、想要了解地院文革运动的全貌，请优先阅读本书的前言。

根据史料把地院的文革（1966——1973 年）划分为四个时间阶段，对每个时段的亮点和特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简单的归纳和介绍；同时对文革年代最突出、最重要的七个时代特征进行了叙述，并分析了这些时代特征的来源和产生的土壤基础，提出了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反思和再认识。

然后，请阅读第一篇“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这是根据已有的史料对地院文革中所发生的大事、要事，按年月日顺序进行简要的介绍，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全面的地院文革的回顾和基础信息资料，由此可追溯事件的详情。

## 二、每篇回忆录文章、每个专题、每件大事都附有目录明细。

鉴于很多同学和老师的回忆录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又广、文字量又大；再者地院文革中有些专题和大事的史料也十分的丰富，涉及到许多人提供史料，因此我们为第二、三、四、五篇中的每一篇回忆文章、每个专题、每件大事等，除了总目录之外，都附有目录明细，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其详细内容，适宜读者可选择性地阅读。

## 三、第二篇，全是地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录。

这部分文字量高达七十多万字，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写得十分生动、真实、可读性强。地院师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经历写出了对地院文革的回忆，并尽可能地还原当年的历史原貌和真相。以下向读者推荐优先阅读的回忆录文章有：

1，蔡新平、伏庆是、田春林、程关林、殷惟侯、林天民、胡昌铭、何建勋等同学写的回忆录，是按各自不同角色、位置对地院文革的综合性、较全面的回忆，具有较高

的史料价值。

2，宋翔雁、唐振权、钱佩娟、万天丰四位老师，以他们的自身文革经历，揭露了地院文革的真相。特别是宋翔雁老师写的近30万字的回忆，勇敢地把自己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江西干校，遭受军宣队的残酷政治迫害的经历全部记录下来，很真实、感人，也让人读后感到无比气愤。非常值得一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大家非常关心的神秘人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是如何走进地院文革的？这是地院文革的一个亮点和特色。在本篇（神秘人物）一节中，当事人蔡新平、王大宾、王广宇有专门的叙述；除此以外，在陈永迪的专题文章、田春林、宋翔雁、李颖、殷惟侯等人的回忆录中也都涉及到此事的回忆。他们基本上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历史真相。有关其他当时的高层人物是如何走进地院文革中的？在程关林、田春林等人的回忆录中都有叙述。这一现象是很值得反思和研究的。

4，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朱成昭、叶向真反革命集团”一事，这也是地院文革的又一个特色。当事人蒋良朴、张华府、梅建明、何建勋等人介绍、回顾了该事，尽可能地还原了此事的真相。但这是中央文革炮制的一起冤假错案，持续时间长达13年之久，涉及的人数多达150多人，这也是中国政坛的一颗巨大的震撼弹。至今为止，未见到此案的任何平反文件（只有口头），且朱成昭已去世，叶向真等人沉默，因此此事有部分真相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

5，古宝琳是王大宾的前妻，她以巨大的勇气，回忆了她所经历的文革，写下了“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一文，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和认识了中国的文革，了解和认识了王大宾其人。

6，地院东方红组织的对立面——地院斗批改兵团的负责人程关林为我们分享他的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详细地介绍地院文革的发展历史，以及当时高层人物如何走进地院文革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史料。

7，“九四事件”是地院东方红内部两派（朱派和蔡派）派性斗争激烈发生的一次武斗事件，也是地院派性斗争典型案例之一。本书引用当事双方当时记载此事的文章和对此事的回忆文章，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真相，为读者提供了研究分析反思地院派性斗争的史料。

**四、第三篇“北京地院文革中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专题”，一共有七个专题。本书坚持用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地院文革期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遭遇，尽可能地还**

原真实的历史，澄清各种似是而非的传言。而不是用编者的叙述（说）来还原历史真相的原则，以期提高其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也是本书的编辑特色——让史料说话。这七个专题，史料丰富、精彩、真实可靠，都很值得一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里推荐优先阅读的四个专题如下：

**1，“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专题”** 这是地院革委会在执政的后期炮制的一起最大的冤假错案，也是地院派性斗争的典型案例之一。

地院革委会在军宣队军管之前的时间（当然革委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被军管），将地院原院长、党委书记高元贵、原院团委书记安静中、原地质系岩石教研室主任郑伯让三人诬陷、定性为地院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并把大量的地院师生公开点名诬陷划分为组成这一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三股反革命势力。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地大校长的赵鹏大教授，以及马杏垣教授、刘普伦、吕禄生、沈孝宇、陶世龙等老师；同学中被点名的有周永璋和蔡新平等人。此案涉及人之多，涉及面之广是地院文革中所罕见的。

在这一专题中，全文刊登了地院《东方红报》1968年8月8日第148期上地院革委会常委任云堂代表革委会作的报告：“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用史料来还原这一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真实的、重要的研究史料。这一事件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和研究。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地院革委会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极左路线；同时充分证明了，当年的造反派在掌权之后，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等原因，会重犯其前执政者同样的错误——没有法治、为了权力、随意整人、制造冤假错案……。而这件事很可能与当时地院革委会中少数人迅速发展自己入党，并不设预备期（详见“大事记”）以及传说中某些人梦想做地院未来掌权人有关。

**2，“揪彭德怀专题”** 这是地院文革中直接接受中央文革指示做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校内外许多人关心的事件。

在本专题中，我们引用当事人、知情人的史料来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回答了，是谁下的决定和指示让地院东方红去揪彭德怀？具体揪回彭德怀回京的过程？这里引用的史料有：《戚本禹回忆录》、《王力反思录》、闫长贵的《问求史信集》三本书中有关此事的回忆部分。当事人陈永迪、谭保华对揪彭德怀具体行动的回忆，王大宾和闫长贵就此事联合写的回忆录。本书以史料来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不实的传闻，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文革运动很有价值的史料之一。

**3，“朱成昭专题”** 朱成昭是地院文革中曾经的学生领袖。多数人知道的朱成昭，是通过朱叶反革命集团一事了解其人的，但是更多人不了解朱成昭的另一面。他还是北京高校，乃至全国高校、文革造反派中最早倒下的学生领袖（在五大领袖倒下之前），同时也是第一个敢于在当年对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提出异议的学生领袖。

由于有关“朱叶反革命集团”一事，在本书中第二篇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叙述，此处不再重复。在本专题中提供了一份1967年8月15日朱成昭写的“我的检查与交代”一文，通过史料让读者了解朱成昭当年对文革的八大观点（在张华府。梅建明的回忆录中也有对朱成昭八大观点的回忆）。这也是研究中国文革运动很有价值的史料之一。

**4，“周永璋二次被抓专题”** 这也是地院文革中派性斗争的典型案例之一。本专题有周永璋被抓时狱中写的信件，事后写的自述；周永璋夫人王秀允对此事的回忆；知情人江祖如老师的爱人钱佩娟老师对此事的回忆；地院东方红“二团”当时就此事发表的“严正声明”；地院东方红“大批判联络站”当时就此事发表的“声明”。组织策划抓人者，对此事也有十分详细的叙述回忆。这些史料较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是研究地院文革东方红内部派性斗争（朱派和蔡派）的极为重要的史料依据。

“周永璋二次被抓专题”是在编辑本书过程中，引起激动和气愤的事件之一。史料充分证明：周永璋二次被抓明显是革委会中少数执政者利用“抓五一六”的借口，用手中的权力对不同意见派别的同学进行残酷打压和政治迫害的事件。史料充分证明：组织策划抓人者的具体行为已超越了法律红线，属于违法乱纪，无法无天的犯罪行为。这是为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的事发现象。

原计划本书还列有：“朱派和蔡派专题”、“首都三司专题”、“整五一六专题”、“驻外联络站专题”、“军宣队进驻地院专题”、“地院迁校专题”、“地院文革历史场景照片专题”，以及地院重要与知名人物：李贵、聂树人、蒋良朴、蔡新平、朱德瑜、孟繁华等专题，由于史料不足，加上历史局限性等原因，而未能实现。只能将此遗憾待以后大家补充完成了。

**五、第四篇“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之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这部分同样是以史料还原地院师生在工作队执政期间、革委会执政期间、军宣队掌权期间所遭受到的政治迫害状况。尽管本书使用了当年《东方红报》刊登的史料。其真实性、可靠性是不

容置疑的。但是由于缺乏官方有关文件的史证，使其历史真相还原的深度不够，有待今后有更多的史料解密而补充完善。

**六、第五篇“涉及地院文革的回忆、讨论、反思和研究文章汇集”，**这里本书引用了蔡新平、陶世龙、何蜀、敖本立、张运钧 李颖、刘建业、肖劲东、王锐、晓星等人已发表的或拟写的对地院文革的反思、研究文章。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比，无论在文章的数量上、参与人员的广度上、反思认识的深度上都远远不及。对地院而言，这方面仅仅是一个开始，期待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之后会有更多、更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文章问世。

**七、第六篇“本书编辑中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史料”，**这些大量的文献和史料是研究地院文革运动，乃至全国文革运动极为珍贵的资料，学术研究价值极高。在这里将这些文献史料的详细来源、出处全部注明，为读者研究、查询提供方便。

**八、“编辑后记”，**在本书后记中，衷心感谢对所有支持、帮助过本书编辑的人们。此外，我们编辑完此书后，最想要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在文革中犯错误？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 **九、“附件”**

1，蔡新平：关于请张运钧、李颖着手整理编撰《地院文革史料汇编》致信各位校友

2，蔡新平：《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代序

3，蔡新平：《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导读

本书编辑： 张运钧 李颖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 前　　言

张运钧 李颖

北京地质学院成立于 1952 年，它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有关院系、专业合并组成，成为当时北京新成立的八大学院之一。

北京地质学院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地学科学领域的高等学府，这显示了地学科学在新中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除了前苏联有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之外，这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在国外，地学科学一般都是大学中的一个系或专业。

1970 年北京地质学院奉命外迁，先安在江陵，改名“湖北地质学院”。后确定在武汉，改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87 年起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包括原北京地质学院，分处于两地。

北京地质学院是在国际知名地质学家、当时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先生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组建的。我们这一代地院的青年学生，有不少曾聆听过李四光先生在地院的地学理论讲课（学），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的地质部副部长、部党委书记、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领导何长工先生在北京地质学院的建院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何部长对地院有特殊的感情，经常来地院作报告，所以也就有他开玩笑的故事，他对地院学生说：你们都是“何家兵”。

北京地质学院从建院至今已有 66 年之多，培养各类人才 30 多万。这其中地院出过许多名人名事，包括许多院士和大量杰出贡献的地质工作者，其中最知名的有下面三件：

1, 1958 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加入国家登山队。与二名队友排除万难，于 1960 年 5 月 25 日凌晨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顶，成为中国人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三人之一。

2012 年 5 月 19 日，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的次仁旦达、德庆欧珠、董范、陈晨（女）四名登山队员又再次成功登上珠峰，还完成了珠峰地区的地质考察。中国地质大学学生创造了中国大学生登上珠峰的世界奇迹！

2,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

了文革运动，并自发成立了“东方红公社”。然后“东方红公社”受到了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肖力）（以中央文革小组观察员身份）的坚定支持，从此地院“东方红公社”在文革中名声大震，响誉全国。与此同时，地院“东方红公社”还出了大名鼎鼎的朱成昭、王大宾、蔡新平、孟繁华、周永璋、田春林、聂树人等人。这样，北京地质学院成为文革中被毛主席钦点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高校之一。

3, 1968 年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温家宝，在 1998 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003 年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我们期盼过去的北京地质学院，而今的中国地质大学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想通过本书把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当年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地院的文革运动的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出来，奉献给大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 1966 年开始发动，至今已是五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啊！当年朝气蓬勃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师生，都已是“古稀”老人了！“讲真话”是古稀人应有的品格，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把真实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奉献给世人。尽管年代太久远，尽管现存的、当年的、文字档案记载资料有限；再加上大部分同学毕业离校较早，能回忆的时间段很有限。但是我们这些当年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还是尽全力来回忆和记述当年的文革运动。尽管每个人的回忆会有错位、遗漏，我们则选用多人的回忆录，找更多人来回忆证实，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尽量重现当年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的真实场景、历史真相；充分揭示出文革时代的时代特征；尽可能地来展现当年红遍中国的“地院东方红”的兴起、发展、灭亡的兴衰沉浮和曲折过程；看看我们这些年青人如何从天真单纯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地信奉个人迷信，成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再到派性膨胀、再到……我们既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执行者，我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同样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曾在错误路线的执行中加害于他人，以至于为此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青春大好年华的代价。我们想：人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当年曾被毛主席、中央文革钦点的五大学生领袖单位之一——北京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史。而记住这段历史最正确的态度就是：敬畏历史、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十年文革，我们只是头两年在地院亲历，因而这里收集编写的主要是一段的史料，当然也有些后期的材料，但远远不足，有待补充。

地院的文化大革命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 1966年6月1日——1966年8月13日**

文革开始，工作队进驻地院至工作队撤离地院之日，大约二个多月的时间；

### **第二阶段： 1966年8月17日——1967年4月3日**

地院东方红公社成立并开始崛起，至地院革委会成立，大约7个多月；

### **第三阶段： 1967年4月3日——1968年8月25日**

院革委会掌权至军宣队进驻、接管了地院党政大权之前，大约一年又四个多月。

### **第四阶段： 1968年8月25日——1976年**

工军宣队掌权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特别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三种人”，持续了五年多时间，个别的到1980年结束。

这四个阶段，都很有“故事”，很有特色，风起云涌。

**第一阶段的特色是：**地院师生奉旨参加文革，在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而给工作队提意见后，工作队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大批师生无辜挨整，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地院东方红公社成立；地院东方红组织四进地质部；首都三司成立；地院东方红奉旨去揪彭德怀回京；多位神秘人物来到地院；**地院成为中央文革选中与支持的样板单位之一**；地院东方红内部出现“朱派”、“蔡派”；朱成昭被宣布“闭门思过”；地院革委会成立等。这是地院东方红从兴起、逐步发展壮大、疯狂的阶段。

**第三阶段的特色是：**地院东方红开始执政，既开始执行错误路线，同时也开始进入“轮到革命小将们犯错误的时期”。例如，院革委会炮制了地院文革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打倒“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中央文革炮制了“叶朱反革命集团”冤假错案。

**第四阶段的特色是：**奉旨参加文革的地院师生，其中的“造反派”遭受到全面的清算、挨整、隔离审查、“办学习班”、被关押、判刑的阶段，几乎无人能幸免。

王大宾，1971年被抓回北京，关押、隔离审查长达四年之久，证实“五一六”罪名不成立，后又于1978年被捕，最后不公正、不公平地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

聂树人，1970年起在青海地质局被隔离审查三年，证实其“五一六”罪行不成立，后又于1978年被捕，长达一年多，以不构成犯罪而释放。

除此以外，地院东方红总部的李贵、贾振远、田春林等人都受到了关押、审查，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叶朱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朱成昭等人，从1967年11月2日先后被捕，直到1980年才宣布平反，定为冤假错案。该案虽发生在地院东方红，但就其复杂性和神秘性，却给中国政坛投下了一颗巨大的震撼弹……。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完成此书的编辑任务时，当年我们走过的文革之路，始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强烈而突出的、影响我们终生的文革年代的时代特征，让我们挥之不去、终生难忘。不妨我们先来回顾、总结一下文革年代最突出的、最主要的几个时代特征：

### **一、对党忠诚的党化教育——“洗脑”：**

自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对全民开展了对党忠诚的党化教育。也就是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思想控制，即所谓的“洗脑”。“洗脑”成为最突出的时代特征。那时候，党化教育向我们灌输的是：人类历史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从而认定，并告诉我们：走苏联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天律。于是就特别要求青年学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要好好学习，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去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伟大理想！

执政者为了政治目标、权力，便对人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洗脑”，即采取愚民政策。目的是实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权力的垄断，几乎是垄断一切！

### **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权力服务**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于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奉旨停课，参加运动，去参加以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目标”的

政治运动。坦白说，我们当时只是初入世、迫切追求知识技能的青年学生，谁是北京地质学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根本不知道，知道的也就是开全院师生大会时听过他们坐在台上作的报告，我们看过几眼的院领导而已。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当时能知道的也就是政治课上老师讲给我们听的那点东西。若再问我们谁是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之类问题……，那就更不知道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当时对政治一窍不通，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因此当时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一切听毛主席、党中央召唤，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那里！奉旨参加政治运动！这种过渡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不计成本的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权力服务，一切为共产主义梦想（幻想）服务的奉献精神，成为文革年代又一最突出的时代特征。

执政党始终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政治思维的转变；始终以运动方式，以革命党政治思维、以意识形态作为纲领性治国理政的理念，这一中国特色在文革中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

当一个国家人人都去为权力服务，全民都从政时，这个国家就要出大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政治体制和执政模式的典型案例。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就是如此周期地循环。这也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极大悲哀！

### 三，狂热的、盲目的革命热情

文革在极端政治思维的指导下，整天高喊着：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等阶级斗争的口号，自觉不自觉地信仰、接受并走进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巅峰之中。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人手拿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表忠心、喊口号……；从当年的这一切，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天真、幼稚、盲目和狂热。整个社会浮躁、狂热、充满了浓厚的封建帝王专制、迷信的、疯狂的政治色彩。毛主席被神化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成为当时青年学生以至全民最最重要的政治历史使命！狂热、盲目的革命热情成为那个年代最最典型的时代特征之一。

### 四，神秘人物的出现

北京地院的文革，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好几位神秘人物走进地院。先是毛主席的女儿肖力（李讷）；接下来是关锋、戚本禹、吴德；还有当时的国务院秘

书长周荣鑫等部委领导人；再接下去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除此以外，地院学生中，当时跟周恩来总理有接触与联系，照过相的人不少。这些神秘人物走进地院，有的一开始是非公开的，然后逐步逐步地公开介入，支持某一派；有的则是暗中或幕后支持另一派……。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改变了当时地院文革运动的政治格局。**使得地院由中央文革选中与支持的样板单位，最后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

就全国而言，像北大、清华及各省市中类似走进地院的神秘人物的这种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江青、王光美、叶群、毛远新等人在文革中的出现和任职。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站在今天的政治高度来重新审视这一奇特又神秘的时代特征，毫无疑问：这是党内高层当时不同政治势力相互博弈的具体体现和需要。它客观上开启了：公私不分、把国事当成家事、官场的裙带之风等等。于是党内的权力之争也就浮出了水面。

## 五，派性斗争，从未终止

就全国而言，各地的派性斗争成为文革年代参与人数最多、斗争最激烈的又一最突出的时代特征。站在今天的政治高度来重新审视这一时代特征，应该看到：派性斗争是极端政治思维的必然产物；是党内不同政治势力博弈的表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党化教育下，自身历史局限性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私字作怪的一种表现。

文革中绝大多数单位都存在观点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于是派性斗争，从未终止，甚至在个别地方两派都动用了武器，进入互相残酷争斗的地步。唯有地院文革中，因毛主席女儿肖力支持地院东方红，地院的文革几乎一边倒，成了东方红的一统天下。但是在地院东方红内部的“朱派”和“蔡派”，从二进地质部产生意见分歧开始，派性斗争同样始终未断。他们一个在台上执政，另一个在台下在野，始终处于斗而不破、不分裂的状态，但很有特色。“周永璋二次被抓”、“九四事件”、“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等事件都是地院“朱派”（或革委会派）和“蔡派”派性斗争的延续，也是派性斗争的典型案例，值得我们深思和深入研究。

今天我们来反思当年的地院文革，不能只看到我们这一代青年当年被利用、受骗上当的一面；同时我们要从文革中走出来，站在新的高度上，反省我们自身

的历史局限性，在文革中自我的行为过错、得失，甚至是严重错误或违法行为。正因为如此，在地院文革中，既不能把“朱派”（含革委会派）说成什么都正确，也不能把“蔡派”说成全部都正确，必须实事求是分析。

## 六，根本没有法治

整个文革年代，无法无天，恶性循环地互斗、互害。昨天的革命同志，今天就是阶下之囚。彭陆罗杨、三家村、王关戚、杨余付，以及贺龙、陈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不管你功劳有多大，只要龙颜大怒，立马就会成为打倒的对象。全国上下，仅剩一言堂，根本就没有了法治。

## 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文化革命中，广大师生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浪，放下书本，离开课堂；研究单位停止工作；科学家、教授关进牛棚或送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把知识当成糟粕，把知识分子当做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中，公然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极左的政治口号，是文革年代影响深远的时代特征。从而把中国退回到愚昧的原始状态，让人民失去了思考批判的能力，任人所欲地被拿捏。

这种充满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政治可以取代一切的极端思维，从而从根本上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忽视社会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工农兵学商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相辅相成，是不可缺少的整体，为文明社会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很明显，以上这些最突出、最主要的时代特征，毫无疑问都是统治阶级执政的需要和体现，同时这也是产生文革运动的土壤基础。它们都来源于：

- 1，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错误的认识和理解！
- 2，错误地把“不惜一切代价，以权力为中心、以政治为目标”当成治国理政的纲领性理念。很显然，过度政治化，极端化。
- 3，错误地用“极端的政治思维和极左的意识形态”对广大人民进行洗脑的党化教育；
- 4，严重地缺乏民主和法治，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力，人民被权力争斗的政治操纵和利用。

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于：极端专制的政治体制。即权力不受制约、滥权的政治

体制。本质上来说这个体制是：皇权帝制的延续与继承。这恰是极权专制（皇权帝制）政治体制的弊端。这种“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权力服务；有权就有了一切”的政治体制，权力争斗势必自然就会成为常态，并呈现周期循环，建国六十多年已发生的政治斗争运动，已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基础客观存在；只要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存在；只要党内权力争斗矛盾激发到非常阶段；只要党内出现野心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有再次出现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弊端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政局乱象的总根源。所以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地进行否定！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必须改革！

文革就是极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发挥到极致的表现；文革既是巨大的历史灾难，同时又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总之，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失败的二个重大标志性政治事件！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政治体制上、指导思想上、组织路线上、经济体制上等诸多方面，并没有根本性、革命性的质的转变，依旧维持原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一场革命运动；本质上说，它是党内高层非正常、非法治的“权力争夺战”。文革最大特点是：群众被利用，被发动起来为“权力争夺战”服务。我们当年幼稚、无知的青年学生就赶上被利用成为“权力争夺战”的急先锋；最后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替罪羊。

于是，人们开始冷静地接受这些严酷的政治现实，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共产主义…。人们强烈渴望揭露谎言、还原历史真相，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文革参与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编辑本书，为的是决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受骗上当；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政治利用；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为的是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力；为的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为的是重新审视我们当年走过的文革的历程，认真地总结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瞭望我们前进的征途……。

近 100 年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激烈的争斗、博弈中，相互竞争、合作，此起彼伏、共同发展、共生共存。我们这一代人正好是这两种社会体制发展争斗、博弈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清醒地看到、并尝试

了这两种社会体制存在的各自的优势和弊端，而且各自的弊端都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因此都走进了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的困境。很显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只有敢于承认这个存在弊端的现实，而不是片面地、极端地强调自己的优势，忽视其弊端；并理智地、科学地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优势，修复并克服其弊端，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真实而丰富的史料，是客观、全面记述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础。尽可能地还原、重现当年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的真实场景、历史真相，为有心了解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历史的后来人，也为文革研究者提供真实的史料。这就是我们这次编辑《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的宗旨、一句话，就是一切让文革史料说话，永远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2017年底，我们接受陶世龙老师和蔡新平同学的盛情邀约，开始承担这部凝聚众多师生回忆写成的百万字的巨著的编辑工作。这对我们进入古稀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经过了近一年多时光的努力，在众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帮助和鼓励下，终于与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作。这是我们献给北京地质学院当年一起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体同学和老师的礼物吧！《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既是地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缩影，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浓缩的、代表性的案例，值得大家珍藏！

2018年12月8日

**编者按：**

张运钧 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1623班)，  
后转入探矿工程系(71621班)

李 颖 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61611班)

# 第一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 (1966年—1970年)

张运钧 李颖

**编者按：**本《大事记》编写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当年地院编印的《东方红报》、《首都红卫兵报》、《大字报选》、《中央领导人讲话》，及地院师生文革回忆、地院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专题中的文献史料等。

### 1966年5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处理。紧跟着，中央对北京市委进行了调整，当时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郭影秋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

### 1966年6月1日

#### 北大大学报引起震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名教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们纷纷放下课本，走出课堂，涌向北京大学。由此，开始了北京高校的停课闹革命。

6月1日晚上，针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地院党委开会，决定立即派地院党委书记王焕、党委委员聂克去北京新市委，迫切等待新市委对下一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和指示。直到晚上十二点，王焕书记回来向院党委传达了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指示，并讨论了地院下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详见参考文献1和33）

### 1966年6月2日

## **地院党委进行文革动员**

上午先召开了地院全体党员大会，然后召开全院师生大会。会上周守成副院长代表院党委做动员报告。首先对学院前一阶段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用“学习不够”、“跟得不紧”、“力度不大”之类的套话做了检查。然后对学院下阶段运动作出了安排，规定了“由上而下，由外到内”，“大字报要集体写，按单位写，不要个人写”等等。（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33）

地院最初的大字报内容大多是转抄北大的大字报和北大见闻，或是笼统地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重用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 2）

6月2日周守成副院长代表党委作了动员报告后，地院出现了一次大字报高潮，群众纷纷对院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矛头大多针对周守成副院长，其次是高元贵院长以及陶世龙老师等人。（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2）

此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是：11622 班聂树人、沙丁茂、孟繁华三位同学，以“聂沙华”名义写的题为“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的大字报，不足一千字。其主要内容是对周守成副院长宣布的“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不满，希望院党委紧跟革命形势，正确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23）

## **1966 年 6 月 3 日**

### **地院文革刚开始就出现至少两种不同观点**

早晨，地院突然出现一批新贴的大字报，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为周守成副院长昨日的检查唱赞歌，坚决拥护周副院长的讲话，坚决拥护院党委对下阶段运动的安排。并警告：防止“右派翻天”。号召：要听党的话，坚决按党的指示办，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同时一些系党支部开始把给院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内定为“右派学生”，组织批判。地院从此开始了由院党委领导下的“反干扰”活动。（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33）

后来有人把 6 月 3 日出现的与 6 月 2 日大字报观点相反的政治观点的大字报等现象，称之为“6·3 反扑事件”（详见参考文献 1、2、3、4）。实际上，在针对地院党委和工作队问题上，广大师生“分化”为两派的基本政治背景从此形成；这也许就是后来文革中“造反派”和“保皇派”产生的由来。

6月3日，党中央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派李雪峰接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同时公布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撤销彭珮云北大党委副书记职务。（详见参考文献 1）

## 1966年6月8日

### 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地质部派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约二三百人（详见参考文献 1），分别进驻到各个系和班级。工作队队长是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副校长是地质部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卞固，工作队员绝大部分是在政治学校培训的地质部野外地质队干部。（编者注：也有的材料说，实际上地质部的文革工作队早在 1966 年 5 月 12 日就悄悄进驻北京地质学院了。）

## 1966年6月13日

### 工作队党委宣布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

工作队党委宣布，工作队党委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同时宣布，地院院长高元贵和党委副书记聂克做检查，地院党委书记王焕任工作队副队长。（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33）

工作队进院后规定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得上街”，“在规定地方贴”，“对院领导的大字报要经过批准后才能贴”等等。

## 1966年6月14日

### 工作队让高元贵院长作检查

工作队召开全院师生大会，让高元贵院长就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问题做检查。（详见参考文献 1）

## 1966年6月16日

### 工作队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

高元贵院长在地院深受绝大多数师生的敬重，文革期间也是如此，这在全国高校中也是很少见的。而工作队拿不出高元贵有什么问题的材料，只是说他“三年不进地质部”，从而要强行批判高元贵院长，并宣布高院长停职反省。于是，部分师生对工作队只让批判高院长，不让批判其他人，对工作队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 1966年6月15日~25日

### 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

这段时间，地院开始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有：地院探工系青年教师王大来、宋翔雁、陆炎德、戎信、吴力文、许高燕、钱天宇、

金希华、周秉义、张希浩、刘大权、白明义等联名写的《这是为什么？》。这是探工系部分教职工第一张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在东饭厅和大饭厅之间的马路边。与此同时，还在旁边贴有岩石教研室李明哲等人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 3, 1, 24 和 33 及本书第六篇）

除了上述二份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之外，6月16日，地院团委书记安静中也贴出了《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号召17级以上干部勇敢站出来向地院党委常委开火的大字报。后来工作队将这一呼吁书定性为“叛党宣言”（详见参考文献 1, 25 和 33 及本书第六篇）

安静中后来还与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青年教师陆炎德、宋翔雁、唐振权等四十余人，或以个人名义，或多组合写了《质疑工作队党委》、《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处？》等重磅大字报。他们还同时上书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院和地质部文革情况。（详见参考文献 2, 3, 1, 24 和 33 及本书第六篇）

此外还有安静中和岩石教研室及地质系江祖如老师联名写的《一定要把保皇党主将周守成及其一伙揪出来》，岩石教研室写的《致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公开信》、江祖如写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等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 26）

这些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工作队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地院的师生就针对院党委和工作队的认识和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工作队提意见的人认为，工作队在地院文革中，舍“高”保“聂”与其他，做法不对，其中必定有文章。而保工作队的人认为，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对党不满，是立场问题。双方僵持不下，争论在继续。

## 1966年6月19日

### 李贵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

晚上，地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李贵，教辅处教导员王瑄堂，岩石教研室教师李明哲、莫宣学，实验员邵道乾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一起反映地院文革开展以来的情况。他们反映：地质部工作队和院党委一些成员采用打击、“抛出”高元贵院长的办法，来镇压群众运动，地院的文革运动发展不健康。要求中央派人到地院调查，纠正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国务院接待站人员表示：可以请国务院工交党委派人到地院了解情况。（详见参考文献 33）

## 1966年6月20日

### 地院“6·20”事件

这一天，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地院师生独立思考及自发组织起

来，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

参加这次活动的师生由最初的几十人扩大到了好几百人（也有人回忆说达到千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游行到达工作队驻地学 12 楼前边，由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庄一龙和吉让寿等六位同学进楼去，把工作队长邹家尤请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概括起来主要的提问和要求如下五点：

1. 坚决要求党中央重派工作队；
2. 坚决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
3. 坚决要求广播李贵的揭发材料；
4. 坚决要求保卫李贵同志的安全；
5. 坚决要求今天立即派车让我们的代表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

邹家尤副部长当时对大家的提问和要求表现得很紧张，也很为难。最后以答应立即派车送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化解了当时的困境，结束了“6·20 事件”。（详见参考文献 1, 4, 2 和 33）

## 1966 年 6 月 21 日

### 宣布撤销高元贵院长职务

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李人林等专程来到地质学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为工作队撑腰。同时，在会上他们宣布撤销高元贵的院长职务，副书记聂克停职反省。会上还告诫地院的师生员工：是否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否站在革命师生和工人一边，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详见参考文献 2 和 1）

这次大会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在以后的几天，师生们对工作队的怀疑与意见继续在发酵，对工作队的做法质疑和反对的呼声一片，不断有这方面的大字报贴出。

## 1966 年 6 月 25 日

###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午饭时间，地院广播台反复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6 月 22 日对北京地质学院“6·20 事件”所作的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去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

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给工作队随便加上什么“保皇派”之名称。

薄一波 6月22日

工作队根据薄一波的批示精神，秘密开始对地院师生的政治态度进行摸底排队，把师生分成三类。把积极拥护工作队的划为第一类，这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把大部分中间状态的或认为可争取的划为第二类；把对工作队积极提意见、反工作队的划为第三类，这些人就是工作队认为的“右派”“游鱼”。随后，工作队分别在大饭厅召集了第一、第二类师生开会，分别由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和下一步“反干扰”的具体安排。但第三类人，是由工作队个别通知，约有二三百人在教工之家听工作队副队长边固的训话，对这些被工作队认定的“右派”，边固警告：“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地院的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开始了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的白色恐怖时期。凡是“6·20事件”的骨干分子、贴工作队大字报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统统是“干扰”，工作队组织对这些人进行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分别在院、系、班上大小会进行批判。还有内部消息：这些“右派分子”要送到沙河劳动改造。据部分班级的统计，在68个班2040名学生中，被迫检查者435人，占总人数的21%，被整理材料者125人，占总人数的6%（详见参考文献1，33）这其中也有：朱成昭、蔡新平、田春林、周永璋、孟繁华、伏庆是、万天丰、王大宾等等。（详见参考文献1、2、4、5）有人后来见到过从木工房地下挖出二包由工作队整理的“朱成昭材料”、“蔡新平材料”。（详见参考文献13）

另外地院17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中，相当多人被“反干扰”运动划为重点对象，其中有十三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全院受到大会批斗：

1. 李贵：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党员
2. 王大来：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党员（注：当时作为干部培养对象，调到京郊农村公社任职）
3. 安静中：院团委书记，党员
4. 郑伯让：地质系副主任、岩石教研室主任，党员
5. 江祖如：地质系政治辅导员，党员
6. 张海涛：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7. 刘万翔：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8. 沈孝宇：教师，党员

9. 王瑄堂：教辅处干部，党员
  10. 陆炎德：探工系总支副书记，党员
  11. 陶世龙：院教务处干部
  12. 李明哲：岩石教研室教师
  13. 傅昭仁：区地教研室教师，党员
- (详见参考文献 1, 33 和本书第四篇)

这场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运动，一直持续到 7 月 29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工作队为止，才慢慢地结束。当时，不仅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文革在“反干扰”，整个北京及全国的高校文革运动都在“反干扰”。

## 1966 年 7 月 18 日

### 工作队就“反干扰”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于 1966 年 7 月 18 日突然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时传出：毛主席对派工作队一事加以否定。于是 1966 年 7 月 18 日晚，北京大学工作队长张承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就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检查。无独有偶，地院工作队也在当晚召开全院师生大会，邹家尤以总结和动员之名，对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自我批评。(详见参考文献 1, 2 和 33)

## 1966 年 7 月 27 日

### 朱成昭等人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地院水文系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在校园里引发了轰动，同时遭受到持不同观点者的大字报围攻。(详见参考文献 2, 1, 27 和 33)

## 1966 年 7 月 29 日

###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队

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宣布中央撤销所有工作队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承认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详见参考文献 2, 1 和 33) 从此，整个文革运动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 1966 年 8 月初

### 朱成昭等去北大找聂元梓

根据多人回忆，8 月初某日上午，朱成昭、庄一龙、蔡新平、殷惟侯、田春

林、伏庆是、周永璋、王大宾、杜金山等同学去北京大学找聂元梓。经过联系，聂元梓接待了他们，他们向聂元梓反映了地院的情况，请她把地院的材料转交给中央文革。聂元梓介绍了江青、陈伯达到北大参加大辩论，支持批评工作队的行动，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等等。（详见参考文献 5, 2, 6 和 1）他们回校后，由殷惟侯执笔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走访北大归来》，贴在北五楼东头地院保卫科的墙上。

## 1966 年 8 月 5 日

**毛泽东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地院师生去清华听周恩来讲话**

晚上周恩来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大操场的大辩论，周恩来最后讲话，给蒯大富平反。地院不少人事前得知消息后，去了清华大学，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并连夜把周恩来讲话抄成大字报和油印小报在院内散发。

## 1966 年 8 月 13 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工作队撤离北京地质学院**

8 月 12 日工作队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何长工出席了大会。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向全院师生作了检查。尽管他在会上发言申明反工作队不能说是反党，并向在“反干扰”运动中受打击、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但是仍然激起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怒，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33）

8 月 13 日午饭后，地院工作队乘坐近十辆大卡车撤离。有人给邹家尤戴大红花，院文革还组织敲锣打鼓欢送。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战斗队，给卡车上贴了谩骂的标语，以至于卡车队伍开出大门演出了南辕北辙的笑话。（详见参考文献 33）

## 1966 年 8 月 17 日

**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在文革开始时，各班观点相同的人常以某某战斗队名义署名写大字报，在地院有名气的战斗队有：“打狗队”、“高旗无畏”、“红岩”、“东方红”、“红色尖兵”、“赤卫兵”等等。而其中“东方红战斗队”是由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伏庆是、蔡新平、周永璋、万慧祥、曹敏久、颜宽等 17 人率先发起的跨班级、年级和系的战斗队。8 月 7 日由伏庆是起草，张华府修改，万慧祥抄写的《东方红战斗

队成立宣言》，于 8 月 8 日早上贴在办公楼面向学生食堂的西墙上。立即引起围观和轰动。（详见参考文献 2，1 和 33）

就在“东方红战斗队”宣布成立的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地院相当多的师生认识到：先前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写的“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正确的和有远见性的。从而使得朱成昭等人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地院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这时，地院许多师生都表达了希望加入“东方红战斗队”的愿望。就在“东方红战斗队”的政治观点不断宣传，人员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意识到，成立全院统一组织的时机到了。于是，经过各系的相互串联，按系、年级、班成立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全院统一组织，仿效巴黎公社，叫做“东方红公社”。

8 月 17 日，“东方红公社”由地质系“红普联”、勘探系“红勘联”、水文系的“红水联”、物探系的“红物联”、探工系的“探工战斗联队”、院广播台的“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的“革命造反队”、地院附中的“东方红支队”等组织联合成立。（详见参考文献 2）成立之初就有上千人，后来又逐步联合扩大，“东方红公社”最后成为占地院人数绝对多数的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北京高校中是最强的、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

8 月 17 日在教工之家举行了东方红公社的成立大会。地质系宫保军上台讲话，还朗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敢》，孟繁华上台念了一首“啊，红日跃出……”的诗。

《东方红公社的宣言》由陈学明等人起草，后经修改定稿。该宣言后来印制在 1966 年毕业（1967 年分配）的纪念册上。（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28）

东方红公社成立之初，经过选举，产生了核心领导成员，他们是朱成昭、蔡新平、蒋良朴、田春林、王大宾、周永璋、陈学明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总负责。当时暂时没有让李贵等教员担任公社的职务。公社先后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等，还办了《东方红报》。

地院“东方红公社”对外简称“地院东方红”；再后来 1967 年，北京高校出现“天派”（指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和“地派”（指以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的称呼，可能也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 1966 年 8 月 18 日

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

席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

## 1966年8月21日

### 地院“斗批改兵团”成立

8月4日勘探系二年级学生程关林、祝天惠发起成立了红五类子女的“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接着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地质系“红星”、探工系“火炬”等战斗队相继成立。成员皆为“红五类”出身。

1966年8月中旬，勘探系红卫兵（程关林）、水文系八一队（李维宇、王庆山）、物探系红旗（王洪超、王震亚）、地质系红星（毛炎超）、探工系火炬（苏椿）、研究生造反队（刘益康）以及工人赤卫队（胡守安、刘强）等人在院木工厂召开联席会议，商量成立全院性质的联合组织“斗批改战斗兵团”。斗批改兵团内的红五类子女合并为“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8月21日宣布正式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为毛炎超，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负责人为程关林。地院“斗批改兵团”是得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政府高官幕后支持的。（详见参考文献2,13）

地院的“斗批改兵团”与地院“东方红”的政治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斗批改兵团死保工作队，认为只有他们是真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是在按“十六条”搞“斗、批、改”的，而地院东方红是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不搞“斗、批、改”，热衷于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机关（地质部），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详见参考文献1）这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所在，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政治势力争斗和分歧，把国人分化利用为二派的结果。

## 1966年8月23日

### 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

8月23日，“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组织了第一次集体行动——一进地质部上访请愿。起因是：“东方红公社”总部核心组成员在朱成昭主持下，连续开会和学习文件、社论精神，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工作队犯下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批评工作队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工作队撤离后，对在“反干扰”运动中错误而残酷地迫害十三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数百名定为“反干扰”重点对象的“右派学生”，并未真正平反和赔礼道歉，整人的黑材料并未销毁……这不公平也不公正。我们应该要求工作队承认方向路线错误；交出迫害整人的黑材料；给这些师生们平反、道歉；工作队应回地院给全院师生讲清楚，并作出大家满意的检查。于是，总部核心组决定：到地质部去上访请愿，到地质部去请回工作队长邹家尤，回地院检查。

为组织领导到地质部上访请愿，总部领导分工，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和后方留守部。前线指挥部由朱成昭为总指挥，蒋良朴、杨雨忠、蔡新平等为总指挥部核心组成员，王大宾负责留守部，同时，出发前对东方红公社战士作了思想动员，宣布纪律。（详见参考文献 33， 5）

在准备安排就位后，一个当时震动北京城的地院东方红千人上访地质部的行动，就开始了。

8月23日清晨，地院东方红的千名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纸制的标语旗帜，从地院徒步两个多小时，走到了位于西四的地质部大院。队伍进入地质部大院后，静静地站着，朱成昭等人去找部领导，希望领导接见，听取我们的申述和请求。但是，面对京城首次发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群众集体上访请愿事件，地质部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应对的预案，显得束手无策，只好回避，不予理睬。造成朱成昭等人在地质部连接待的人都找不到。

站了两个多小时等不到结果后，东方红战士改为静坐请愿。整个地质部上班的干部，抱着不同的心态，站在办公楼的各层窗户旁，观望着楼下大院上访请愿的学生，谁也不敢过问或与学生接触。

中午，派回地院为上访请愿学生打饭的同学，遭受到学校食堂以“过了开饭时间”为由拒绝提供午餐的对待，只好空手而回到地质部大院。被激怒的东方红战士，被迫宣布绝食请愿。（详见参考文，33，5 和 1）这期间，地院斗批改红卫兵和西纠红卫兵被调集来围攻请愿的地院东方红学生。这期间东方红方面表现极为克制，没有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23日晚，北京市委召集地质部负责干部、东方红和斗批改等各派代表在北京市委开会，谈判解决方案。会议由陶鲁笳主持，蔡新平代表东方红参加谈判，达成了8月24号晚，由陶鲁笳主持，地质部领导和工作队负责人到场，听取学生双方意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的决议。8月24日凌晨四点钟左右，陶鲁笳到地质部宣布了这个决议：

1.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 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 地院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于是，地院东方红结束了在地质部的首次上访请愿，坚持步行走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 1、12）

1966年8月24日  
地院召开两派辩论大会

8月24日凌晨，地院东方红队伍回到学校，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当晚就在地院大操场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工作队的意见。实质上就是东方红和斗批改的两方大辩论会。

大辩论只有短短一个白天的准备，推选了双方发言代表。操场会场中间画了一条白线，地院东方红的队伍坐在白线的一边（北边），斗批改兵团则坐在白线另一边（南边）。其他人与外校师生大多站在会场周边。当时地院斗批改的人数多于东方红，但是东方红的队伍整齐，精神饱满。（详见参考文献 33）

晚上八点左右，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在陶鲁笳的陪同下，在主席台就坐。在主席台右边是斗批改的代表任士田、程关林、胡守安；左边则是东方红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贾振远。

大会由陶鲁笳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地院东方红代表贾振远老师。他以具体事实，有理有据地揭露、批评以邹家尤为队长的地院工作队在领导地院文革运动中违背毛泽东思想，压制不同意见，打击镇压批判工作队的革命师生，围剿革命派，反干扰，抓游鱼，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邹家尤必须为受工作队打击的革命师生平反，并道歉。

接着发言的是斗批改兵团的代表、11632 班的同学毛炎超，他为工作队评功摆好，说一个多月来，地院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斗了多少黑帮，写了多少批三家村的文章，斗了多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多少家，写了多少大字报，批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他反复强调：工作队是好的、比较好的，对工作队不信任，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反对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再接下去是轮到东方红代表蔡新平发言。他的发言精彩、鲜明，很有战斗力。他还现场回答了“斗批改兵团”代表的提问，博得了在场人员的赞美之声。

整个辩论会，除了在谁主持大会以及激动时争夺话筒有争吵外，应该说总体是有序、平和、理性和理智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地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程关林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述：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 8·24 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

大辩论当天，中央文革派肖力在会场边上观察辩论会进展情况，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地院东方红田春林、伏庆是和刘长风。（只是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详见参考文献 1、2、5、12、13）

## 1966 年 8 月中旬——9 月底

### 破四旧

在这四十多天里，北京的老红卫兵掀起了“破四旧”高潮和“红色恐怖”，北京因此打死了 1772 人，抄家 33600 余户、被赶出北京的所谓“黑五类” 85000 余人。（详见参考文献 30）

1966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极力赞扬红卫兵打、砸、抢、抄、抓的所谓“破四旧”行动，并称之为：“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详见参考文献 29）

在这一形势下，地院斗批改兵团也在这段时间里，以“破四旧”的名义，在地质学院内组织了抄家行动。所幸的是，斗批改的抄家都有完整记录，所查抄物品没有散失。根据 1967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地质学院编写的《关于原红卫兵查抄财物的处理及查账工作的总结报告》（这是根据中央文件要求进行的）中得知：

1. 地院的抄家活动，全部为“斗批改兵团”中的红卫兵所为，与地院东方红无关。
2. “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共查抄了地院 104 户人家，列出了被查抄人员的名单；其中有三户为外单位的被我院所查抄。
3. 主要被查抄人员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如冯景兰、杨遵义等知名教授，也还包括高元贵等领导干部。（详见参考文献 1、13）

## 1966 年 8 月～9 月

### 神秘人物肖力来到地院

根据田春林、蔡新平、殷惟侯、伏庆是、王大宾、聂树人等人的回忆录，都提到肖力多次来地院，了解地院文革情况，与他们有多次接触。

肖力首次到地院的时间，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比较多的回忆是：1966 年 8 月上旬，工作队快要撤离时，那时东方红战斗队刚成立。肖力自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来地院看大字报时，向地院学生提出：要找地院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成员见面。然后在东方红战斗队（教四楼）伏庆是接待了肖力，并找来朱成昭、田春林、刘长风等人与肖力见面。肖力拿出一张 32 开白色便签，纸上写着：“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落款签名陈伯达。

从此之后，肖力便多次来到地院，包括到地质部。（详见参考文献 5, 6, 2 和 12）

肖力来地院多次，但一直不知她的真实身份，直到 1966 年 9 月 15 日朱成昭

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肖力，得知肖力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这一神秘人物的面纱才揭开。当晚，在地质部的小礼堂里，朱成昭兴奋地向全体东方红战士传达了这一大好消息，说明我们“通天”了！大家群情激昂。（详见参考文献 35）

肖力的出现，及后来关锋、戚本禹多次来地院，周恩来总理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多次来地院，以及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来地院，这说明当时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通天”的群众组织，有后台与靠山。这极大地鼓舞了地院东方红的“革命”积极性。类似现象在北大、清华、北航等也有，外省市也有。但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意义？说明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至今未解之谜，值得今后人们去深思。

### 1966 年 9 月之后 保护老干部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对地院东方红的大力支持，使得当时的地院东方红在社会上名望大增，似乎成了国内“最安全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地院东方红也就保护了全国各地的名人：例如，四川省的廖伯康、《红岩》作家罗广斌夫人及孩子、内蒙作家乌兰巴干、清华大学蒯大富、邓小平的弟弟邓垦以及文艺界的郭兰英、赵燕侠等人。（详见参考文献 5）

### 1966 年 9 月 6 日

#### 地院东方红发起成立首都三司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刻，各高校里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战斗队和群众组织都自发地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共同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66 年 8 月 27 日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高干子女为主导，受工作队支持和操控的北京各高校文革委员会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地院斗批改兵团参加了一司。

1966 年 9 月 5 日，又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告成立，简称首都二司。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和部分高校红卫兵组织参加在其中。

地院东方红没有参加上述两个红卫兵司令部。很显然，地院东方红与一司红卫兵的政治观点是对立的。至于二司，地院东方红认为：二司领导层的政治观点偏向保守，且参加二司的高校造反派组织不够多。因此，这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由地院东方红牵头，重新建立大联合的组织。由核心组成员周永璋带领邱世涛、赵国柱等同学去串联了北京邮电学院、中央财金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建工学院等十六所高校的造反派，一致同意由地院牵头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经过两次筹备会议的准备，聂树人执笔起草了“三司宣言”。1966 年 9 月 6 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刘志坚、

戚本禹、杨成武、郑维山等领导到会，刘志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对三司的成立表示支持，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宣读了大会开幕词。三司成立之初已有红卫兵3000多人。

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最后由清华大学蒯大富带领参会红卫兵宣读了誓词，全文如下：

### 誓词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是您最最忠实的红卫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跟着您，革命造反是我们的天赋！

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造反，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誓词是由聂树人执笔起草的。当时（9月5日）朱成昭带领地院东方红正在二进地质部，所以未能出现在首都三司的成立大会的主席台上（朱成昭和张华府坐在会场的另一地方观看）。当时，蒯大富还没有队伍，但由于中央文革让地院支持蒯大富，这可能是让蒯宣读誓词的原因。

首都三司成立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地院东方红周永璋为首都三司第一任负责人，一个月后，朱成昭派田春林接替。首都三司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由地院东方红聂树人负责，随后又派了孟繁华、黄平稳到首都三司参加宣传部工作。

首都三司的成立，周恩来十分关心与支持。9月22日晚上十点到次日凌晨二点，由周恩来的联络员宋皋具体安排，在中南海西花厅专门接见了首都三司的代表，其中有地院东方红聂树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30多人。周恩来对首都三司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详见参考文献 15）

正是由于周恩来最支持首都三司，所以三司成立后，组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月2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首都高校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966年9月5日——9月19日

## 二进地质部

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的成果，就是地质部的领导何长工、胥光义，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还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同意8月24日晚上到地院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地院工作队的意见。这个听取意见的大会，实质上变成了以支持地院工作队的地院斗批改兵团为一方，和以批评工作队的地院东方红为一方，各自就如何评价工作队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辩论。至于工作队应承认错误、做检查，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销毁黑材料等请求，根本未得到任何兑现。

地院的文革运动，仍是在工作队扶植的“院文革”领导下，继续执行原工作队的方针政策，地院东方红继续受到打压，处于少数派地位。相反，地院斗批改兵团受到“院文革”的支持。事实上，陶鲁笳、李人林等人多次接见斗批改兵团，一直在背后支持他们。（详见参考文献 13）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总部商定，再次进军地质部上访请愿，决心要请邹家尤回地院真正认错、认输，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与道歉，并销毁黑材料。

二进地质部，总部分工与一进一样。二进地质部的时间是1966年9月5日下午一点从地院出发。由朱成昭率领1000多名东方红战士徒步走到地质部大院。

（详见参考文献 33, 5, 1, 13, 和 14）

二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历时十三天，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各派力量都在参与进来。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记录的：

1. 地质部的干部对地院东方红的态度开始分化，通过与学生交流，不少人同情支持学生，还有人在主楼窗户上贴上“坚决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标语。

2. 地质部调动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来围攻地院东方红，大肆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论调，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人；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坚持“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为了保护出身不好的学生免遭西纠伤害，安排出身好的同学坐在外圈，保护坐在内圈出身不好的同学。

3. 地质部偷装窃听器，引起东方红内高层互相猜忌，加之几位领导者在策略上有不同观点，从而导致东方红高层内部分歧的开端（地院东方红内部“朱派”与“蔡派”由此而产生）。

4.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全过程，肖力一直在了解情况、密切关注，还亲自到了地质部现场，与朱成昭、蔡新平等谈话。周恩来总理也一直在关注此事。

历时十三天的二进地质部，最后以迎接国庆、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为理由，同时地院东方红接受了肖力的意见，于9月19日将队伍撤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 5, 1, 35 及本书第三篇“二进地质部专题”）

1966年9月13日

《首都红卫兵报》创刊，第一期发行。

1966年9月中旬~9月24日

###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与北京第一次武斗——争夺地院广播台

当地院东方红9月19日从二进地质部撤回地院后，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作队撤走了，我们仍然受到压制？“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为何随时还会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工作队为什么还没有真正赔礼道歉、平反和销毁黑材料？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工作队操纵下建立的校文革手上。于是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与目标，下决心一定要争得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33, 5和1）

地院东方红总部首先组织策划了“夺院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的行动。

首先东方红发表声明：不承认校文革对学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它是工作队一手操纵建立的，不合法，应予解散。随即东方红派人查封了校文革的办公室。

至于地院广播台，原是由地院斗批改兵团和地院东方红达成协议共同使用的，后来双方有冲突，东方红为了顾全大局退出广播台。这时东方红作出了接管广播台的决定，9月23日，由探工系71653班的东方红战士任“突击队”，王大宾带头爬上一根安有高音喇叭的水泥电线杆，用钳子剪断了广播线，使得大喇叭哑了。整个夺取广播台的行动，双方僵持了近十个多小时，双方都派出了很多人，在狭小的空间过道里，双方发生了你推我拉的肢体冲突，互有抓伤、撕破衣服的情况，也有人因闷热、空气混浊窒息……

这是文革以来，在地院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斗，其中东方红受伤达170多人。事情惊动了周恩来、中央文革、北京市委。夺取广播台事件从23日白天一直持续到24日凌晨才结束。（详见参考文献33）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赶到地院处理这事件。但吴德不能平息事件，无法解决双方的对立冲突。随后中央文革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处理这一事件。在地院现场，吴德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说：“他们根本不听。”戚本禹则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

凌晨在地院大操场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由吴德主持大会，中央文革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关锋首先代表他和戚本禹宣读了陈伯达手书的纸条“兹派关锋、戚本禹作为地质学院观察员”。然后说：

1.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讨。不管有多少

学生，都应当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2.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当去检讨。

3. 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于工作组没有意见，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持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去检讨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扰他们这样做。如果你们采取阻扰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4. 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讨的行动，不能说是错的，是对的。

吴德后来说：“我表示完全拥护关锋和戚本禹同志的意见。”

关锋和戚本禹还把地院东方红和斗批改兵团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关说：“学校的广播台是大家的，不能由一派掌握，可以规定时间，轮流广播嘛！”关还说：“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两派接受了关锋、戚本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后，双方队伍撤离了广播台。从此地院东方红的“高旗无畏”战斗队重新回到广播台。（详见参考文献 5、1 和 2）

因中央文革表态“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在此强大政治压力下，地院“斗批改兵团”一哄而散。从此地院东方红成为全院文革中唯一的群众组织，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 2 和 13）

多年后，吴德在其口述文革往事《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提及此事件，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该事件的过程：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人出面与二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总理还派地质部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详见参考文献 5）

地院东方红除了组织抢夺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外，还领导组织了接管物探系学生食堂。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物探系食堂曾经在另一派的干扰和破坏下，连续三天拒绝给在地质部请愿的东方红学生送饭。地院东方红在回到学校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 10 月 9 日由东方红组织接管了物探系食堂。

从此开始，地院东方红在夺权的道路上逐步向前推进。整个地院文革运动的

领导权及其管理权逐步由东方红控制。

## 1966 年 9 月～10 月

### 又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走进地院

继肖力之后，又一位神秘人物来到地院，她就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五年级学生，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

朱成昭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叶向真的？据朱成昭自己说大约是在 1966 年 9 月，在江青主持的一次中央文革接见中，江青把叶向真介绍给朱成昭认识的。由于他们的观点一致，非常谈得来，关系发展迅速，最后成为恋人，这在地院东方红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东方红总部成员都认识叶向真，由于经常见面，熟悉以后，大家就直呼其名，甚至叫她的小名“牛牛”，有时也乱开玩笑，叶向真也都不在意。东方红总部的一些人在背后称她为“郡主”，而称肖力为“公主”，还有人背后说“公主”没有“郡主”漂亮。（详见参考文献 5，2 和 1）

叶向真在地院的出现，对朱成昭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导致了 1967 年初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的改组。

## 1966 年 9 月 18 日——20 日

### 红楼会议

在北京沙滩原北京大学红楼，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开了个座谈会，张春桥主持会议。后来这次会议被称之为“红楼会议”。清华、北师大、政法、财金等大学派人参加。地院的朱成昭、财金的敖本立、中央戏剧学院的叶向真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大家意见后，国庆节在《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支持学生的革命造反精神，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斗争。（详见本书第五篇）

## 1966 年 10 月 1 日

### 王大宾、聂树人等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国庆节前夕，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在首都三司的聂树人，还有地院斗批改的一位女同学分别收到请柬，邀请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并住进了中南海、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应邀参加活动的红卫兵约有 1000 多人，除北京外，还有外地的；有保守派组织的红卫兵，也有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大家一视同仁。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也应邀参加。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在应邀之列，但请柬被贺鹏飞、刘涛扣下了，未能出席。其他还有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的陈永贵、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等等。红卫兵代表都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其他英

雄模范代表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国防部招待所等地。

红卫兵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江青及周恩来的接见。然后国庆节那天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

据说，这次国庆日庆典活动邀请名单是国庆日庆典活动筹备组吴德、丁国钰和周恩来他们商定的，按名单发送的请柬。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地院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未被邀请？为什么首都三司负责人周永璋未被邀请？为什么地院斗批改兵团头头程关林未被邀请？这个谜至今也未能解开。（详见参考文献1, 5 和 15）

## 1966年10月6日

### 首都三司召开誓师大会

由地院东方红主持的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等首都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和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立场鲜明地支持了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还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在大会发言的还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代表、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代表、清华大学代表陈育延、北京地质学院代表王大宾等。

## 1966年10月8日

### 三进地质部

由于二进地质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10月8日仍然由朱成昭负责组织了二千多人第三次进驻地质部上访请愿。此次除了学生外，教职员也踊跃参加了行动，声势要比前两次进驻地质部大得多，带着乐队、开着广播车，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仍然是徒步从地院走到地质部大院。（详见 1966 年 10 月 13 日《东方红报》第三期）

下午三点，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公布两周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发言揭发了以邹家尤为的工作队迫害师生、镇压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等等罪状，揭发了何长工在一进、二进地质部时压制、造谣等罪状。

三进地质部的行动，还得到来自西安、宣化、旅顺等地以及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医学院、地质科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的支持。在整个大形势下，何长工、邹家尤被迫答应回地院接受检查，同意按中央的指示精神

交出黑材料……

大会到当晚十一点结束，师生们步行返回地院，把何长工和邹家尤一同带回地院。

## 1966年10月13日

《东方红报》第三期出版，从这期开始改用铅印版，以前均为油印版。在这期上发表了：

1，《东方红报》评论员文章：《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回顾与展望》，该文对从1966年6月至10月，四个多月来，地院文革运动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回顾与展望；是研究地院文革运动极为重要的文字史料之一。

2，《东方红报》记者文章：《三次进军地质部 再次炮轰何长工》

## 1966年10月27日

### 四进地质部

此时，地院东方红已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10月27日又组织了四进地质部，受到了地质部机关的支持和欢迎，并与部机关职工联合起来，开展了地质部的文革运动，还在部机关大楼成立了“地院东方红驻部联络站”，作为地院东方红指挥全国运动的指挥部，朱成昭、蒋良朴、田春林等人常驻那里。

## 1966年10月开始

### 地院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

中共中央、国务院9月5日发出大串联的通知《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1966年10月起，在全国掀起了学生大串联的高潮。很显然这是中央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和促进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措施。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的师生也奔向了全国各地，当时地院校园几乎倾巢出动。这样地院东方红也就在全国各地以“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的名义成立了若干联络站。比较著名的有：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青海西宁联络站等等。

这些联络站在促进各地文革运动的开展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得到了当地造反派的好评和中央文革的肯定与支持。例如，三司（主要是地院东方红的人员）驻沪联络站协助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支持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从而带动了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大夺权，及“一月风暴”的掀起。又例

如，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在完成中央文革下达的揪彭德怀回京的任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驻青海西宁联络站为中央调查处理“青海 2·23 事件”提供了积极的协助。但是也不得不说，在大部分人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埋头苦干或“冲锋陷阵”时，也有少数学生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更有个别人在三司、地院东方红盛名下，利用权力挥霍金钱、贪图享乐……（详见参考文献 1、2、5、6、7 和 8）

## 1966 年 12 月 13 日～27 日

### 地院“东方红”奉旨参与揪彭德怀回京

有关地院奉旨如何揪彭德怀一事，详见本书的第三篇《揪彭德怀专题》一节。

## 1966 年 12 月 24 日

晚上，地院召开了《控诉批判原工作队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详见 1967 年 1 月 1 日《东方红报》第七期)

## 1967 年 1 月初

### 朱成昭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前途的担忧

自 1966 年 9 月朱成昭与叶向真认识后，逐渐在思想上受到了一些重要影响。首先是在 1967 年 1 月初地院的文革运动形势分析内部会上。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中央文革叫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另一个。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干部被打倒得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的左倾错误？大家思考、分析。中央文革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真有那么多坏人吗？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希望大家多分析、多思考。”（详见本书第三篇“朱成昭专题”）

朱成昭的内部讲话，很快被传出去了。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朱成昭等人有攻击和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炮打中央文革，应该彻底揭发批判。也有人整理成材料，报送中央文革。

## 1967 年 1 月 24 日

1967 年 1 月 24 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奉命到地院朱成昭办公室，向朱成昭一个人宣读了陈伯达 1 月 23 日写给朱成昭的信。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

的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了，变成了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详见参考文献 5, 2 和 1）

## 1967 年 1 月 25 日

### 孟繁华文章得到毛泽东赞赏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进入 1967 年时，造反派队伍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极端民主化、自由化、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等等充分暴露出来。针对这些现象，地院东方红孟繁华起草了《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一文，作为《首都红卫兵》报的社论刊登在 1967 年 1 月 25 日的报纸上。该文章经毛泽东阅后批准，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详见参考文献 11, 15）

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引起了轰动，并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此事也把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的影响推到了一个高峰。

此文作者孟繁华，后来被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

## 1967 年 1 月 29 日

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三人发表了：《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详见 1967 年 1 月 31 日《东方红报》第 10 期）

## 1967 年 2 月 4 日

针对陈伯达对朱成昭的批评，朱成昭在东方红公社全体大会上做检查，再次讲述了他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即后来被批判的“反动的八大观点”（①大串联搞早了；②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③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④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⑤对“联动”抓人太多；⑥关于坐牢问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⑦聂元梓问题；⑧关于炮打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详见本书张华府回忆录和“朱成昭专题”）

## 1967 年 3 月 5 日

在这期间，地院东方红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王大宾仍在北医三院住院治疗，此时，江青让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和江青多次去北医三院做王大宾的工作，要王大宾和李贵站出来主持工作，地院东方红这面大旗不能倒！（详见参考文献 5, 1）

1967年3月5日，戚本禹，北京市革委会筹备组组长周景芳，（王大宾回忆录中说还有谢富治），在政协礼堂召集地院东方红内部不同意见派别代表开会，解决地院东方红总部领导问题，包括朱成昭等有四十多人到会（详见参考文献 31）。戚本禹说：地质东方红由王大宾负责，把这面大旗扛起来。李贵同志，你是南征北战的老革命，要支持王大宾的工作，和他一起扛起这面大旗。杨雨忠检查得较好，照常工作。还有写‘打倒私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孟繁华同学，也到总部工作，以打倒私字，实现地院的大联合。王大来是已调出地院的干部，他就回管道公社去抓革命促生产。”（详见参考文献 5）

就这样，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王大宾正式成为了东方红的第一把手。

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戚本禹又专门听取朱成昭的意见，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并再次规劝朱成昭：“好好闭门思过，认识检讨错误”。（详见参考文献 5）

## 1967年3月20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击溃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逆流的大会”，即所谓的反击“二月逆流”大会。

## 1967年3月28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了：《关于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声明》（详见1967年4月1日《东方红报》22期）

## 1967年4月3日

###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院革委会成立前，先成立各系的革命委员会分会，首先是探工系分会成立，然后是物探系、地质系、勘探系、水文系分会相继成立。4月3日院革委会成立时，北京市委周景芳、丁国钰到会祝贺，周景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我是受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委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的，中央文革非常关心你们，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拥护，坚决支持。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把东方红的大旗越举越高，越举越红，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王大宾代表革委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从此，地院革委会行使了地院党、政、财、文的一切大权。当时革委会的名称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后来顺应全国大潮流，改为：“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

当时，地院东方红总部议定：新成立的革委会就是地院东方红总部，其常委

会成员就是东方红总部核心组成员。为了应对社会上的需要，保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名称，由常委田春林分管。

从这时开始，地院东方红中的“蔡派”成员被“朱派”排挤出地院革委会组成成员，也被从东方红总部核心组成员中挤出去。从而使得两派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扩大。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成员名单：

第一任期： 1967 年 4 月 3 日～6 月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 黄振群 孟繁华 杨雨忠 朱德喻 贾振远 张海涛 田春林

第二任期： 1967 年 7 月～10 月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 贾振远 黄振群 杨雨忠 张海涛 田春林 高元贵 王焕

（此时，孟繁华已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朱德喻已毕业分配，不再担任常委）

第三任期： 1967 年 10 月～1968 年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聂树人

常委：贾振远 侯力平 李益民 刘佛兴 任云堂 刘家齐

五个系分会主任：

地质系 刘佛兴

勘探系 陈玉新

物探系 陈连成

水文系 任云堂

探工系 吴坤正

（以上详见参考文献 1）

1967 年 4 月 10 日

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十几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1967年4月8日~12日

### 民族宫事件引发天派、地派分歧公开化

1967年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事件起因是：以聂元梓为首，并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与保守的“民族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一起，以民族宫展览有问题为由，要进馆造反，将部分展览材料拿走。此时民族宫已掌权的“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请示上级，中央文革指示：“民族宫展览先不要动，待后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拒绝北大学生进馆，北大学生就用钢锯锯断了反锁住的展览馆综合馆大门，冲进馆内，从而挑起了事端。

民族宫东方红公社的人少，无力阻止北大学生进入，于是就求救于地院东方红。总部得知后，就派人前往，强行将北大学生赶出宫外。但事后“新北大公社”立即又派大批人员前往增援。随着事态的发展，支持“新北大公社”的部分高校红卫兵和支持“地院东方红”的部分原三司的高校红卫兵都派人前往民族宫增援。双方僵持到第二天凌晨，中央文革派人来调停，北大和地院的人陆续撤离现场，并未发生武斗。

这是地院成立革委会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当时，地院革委会包括王大宾在内几个负责人都先后到现场，在现场指挥的是杨雨忠。

1967年4月9日王大宾与唐咸正、陈宝堂等去北大会见聂元梓，并向她说明真相。双方以“误会”平息了事端。但是北大校园里却展出了“4·8事件”中被撕破的衣服等实物，及文字材料，极力扩大事态。地院东方红得知情况后，“高旗无畏”战斗队开着宣传车进入北大，进行反驳和说明真相。结果地院广播车被北大人的砸了，人被打伤了。

为了不使事态扩大，4月11日下午，王大宾与陈宝堂等人再次去北大，想和聂元梓商谈平息这事。他们不仅没找到聂元梓，反倒被“新北大公社”的人包围起来。陈宝堂冲出包围，回到学校，将王大宾被扣的消息带回地院。这事激怒了地院东方红和原首都三司的院校。地院、农大、农机、邮电、政法、北工大、林学院等院校立即派出广播车和人去北大增援地院。一开始，北大东门关闭，不欢迎他们进入北大。后来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双方又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流血事件。  
(详见参考文献 16)

此事一直延续到4月12日下午，由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向双方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才平息下来。紧急通知全文如下：

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新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十一日夜间和十二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到自己的学校。(详见参考文献 16)

从民族宫事件到天派、地派的争斗，说明学生运动派性的大爆发，也是越来越走向反面。多少年后，聂元梓曾说：北京高校群众组织分成天派、地派，天派的后台是江青，地派的后台是王关戚。（详见参考文献 5）

王大宾就这事在回忆录上写道：“1967 年 4 月，在民族宫展览问题上，发生了地院东方红支持一派群众，与北大新北大公社支持一派群众的严重对抗肢体冲突，首次引发了北京红代会内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学校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此事，作为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详见参考文献 5 第 165—167 页）

### 1967 年 4 月 12 日

探工系发表文章：《从探工系“反干扰”看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详见 1967 年 4 月 12 日《东方红报》第 26 期）

### 1967 年 5 月 10 日

在地院召开了由 800 多个单位十万人参加的追悼李全华的誓师大会。

李全华，地质系 22641 班学生，东方红广播台编辑。1967 年 5 月 6 日成都 132 厂发生武装冲突，李全华在前去声援造反派的宣传车上头部中弹身亡。（详见 1967 年 5 月 13 日《东方红报》第 35 期）

### 1967 年 5 月 12 日

谢富治副总理来地院调研。（详见 1967 年 5 月 13 日《东方红报》第 35 期）

### 1967 年 5 月 13 日

高元贵院长以“八·八战斗队”的名义，在全院辩论会上发表了：“对地院斗批改形势的看法”，获得好评。（详见 1967 年 5 月 16 日《东方红报》第 36 期）

### 1967 年 5 月 23 日

比利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司徒·伦斯，中央委员格兰多尔热来地院参观访问。（详见 1967 年 5 月 26 日《东方红报》第 39—40 期合刊）

### 1967 年 5 月 26 日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来地院参观访问。（详见 1967 年 5 月 30 日《东方红报》第 41 期）

## 1967年7月8日

日本共产党左派高野实来地院参观访问。(详见1967年7月14日《东方红报》第55期)

## 1967年7月8日

### 地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67年7月8日，地院革委会作出决定：“复课闹革命”，并决定复课闹革命分二步走。1967年7月和8月为过渡阶段，9月1日以后，全面复课。

1967年7月8日，召开全院师生参加的“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北京市革委会周景芳、李冠英和中央文革的王广宇、王道明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从此地院开始转入正规的“复课闹革命”和“教育革命”。(详见参考文献1)

## 1967年7月10日

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奉命把叶向真、朱成昭等人从广州抓回北京，二天后蒋良朴等人也从广州抓回北京。对这些人开始隔离审查。从这以后，公安部成立了“叶朱反革命集团”专案组，地院也成立了相应的专案组。(详见本书第二篇中蒋良朴、张华府、梅建明的回忆)

## 1967年7月15日

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礼堂召开各大专院校、机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要“立即掀起对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会。7月16日晚上王大宾主持地院革委会常委会，贯彻执行15日会议精神，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小撮开展大批判，会上分工成立了大批判组和领导班子。(详见参考文献5)

## 1967年7月27日

非洲留法学联代表团来地院参观访问。(详见1967年7月28日《东方红报》第59期)

## 1967年7月中旬一下旬

### 地院“东方红”与“揪刘火线”

“揪刘火线”是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起的，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时间发生在1967年7月13日～8月5日。

文革初期，北京建工学院是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试点单位。刘少奇还带领刘澜

涛亲自去建工学院蹲点，找工作组谈话等等，企图开小会来解决矛盾。但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仍是“阶级斗争”、“引蛇出洞”、“抓右派”那一套，却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不符。所以当时就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说，从而造成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

7月，“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纷纷前去中南海西门声援、支持北京建工八一战斗团的行动。（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2）

在“揪刘火线”现场，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群众组织成立了“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到8月初，这个联络站参加单位达到700多个。另一派则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参加单位达到1500多个，还有外地来京人员参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或帐篷，安装了500多高音喇叭，竖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到处人山人海。（详见参考文献 1）

地院东方红对“揪刘火线”行动有不同看法：认为毛主席不在北京，揪斗刘少奇没有毛主席批准是不可能的，而且揪斗刘少奇时机不成熟。但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是地院老战友了，不去支持也不行。因此，地院东方红在揪刘火线事件中，迟迟没有行动，只派了地质系韩文彬带十多人前去安营扎寨，然后7月20日组织了3000多人从地院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揪刘火线现场，表示声援和支持。（详见参考文献 1 和 2）

“揪刘火线”行动延续到8月4日晚上，戚本禹、谢富治通知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商定“揪刘火线”撤走事宜，第二天宣告行动结束。

## 1967年7月19日——26日

中央文革办公室在7月某日给地院电话指示：“与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不要军事院校参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不要太限制群众。要批斗时与北京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还送来了几份批判彭德怀的材料。

“1967年7月19日，北航开小会批斗彭德怀，是韩爱晶首先带头拳打脚踢了彭德怀，其他人再打，造成彭德怀头部撞地重伤，肋骨打断三根。1967年7月26日，韩爱晶主持在北航召开联合批斗彭德怀大会。地院是有人参加，但王大宾没有参与。”（详见参考文献 5，引自律师宣读韩爱晶判决书的有关部分）

## 1967年8月

### 周永璋第一次被抓与被放

周永璋是地院最早被当成“五一六”分子抓起来的人，比全国抓“五一六”

分子的时间要早。地院革委会成立后，周永璋是“蔡派”骨干成员，自然被革委会视为异己。抓周永璋是在聂树人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聂树人在回忆录里专门有一节“捉放周永璋”，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组织抓周永璋的经过。钱佩娟、殷惟侯、蔡新平等人的回忆录也有详细的叙述。（详见参考文献 18、9、17、和 12，及本书第三篇“周永璋二次被抓专题”）

## 1967 年 8 月 15 日

朱成昭提交了“我的检查与交代”（详见本书第三篇“朱成昭专题”）

## 1967 年 9 月 4 日

### “九四事件”砸“大批判广播台”

针对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和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的改组，再加上“蔡派”成员被挤出东方红核心和革委会组成成员。“蔡派”的同学组织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大批判联络站》和“大批判广播台”，并在 1967 年 9 月 4 日晚上组织了有外校学生参加的《批判斗争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大会》。晚上十点左右，“蔡派”的殷惟侯等人在学 12 楼 3 层一房间内，架设了一个广播台，号称“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并开始进行广播。他们在大喇叭中说：“为了忠实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彻底批判朱成昭反动观点，把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宣布：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现在正式开播……”。（详见参考文献 1）当时王大宾在小汤山疗养，聂树人得知此事后，几经思考，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离开地院，去了《前进报社》（详见参考文献 1）。大约在深夜十一点半左右，上述广播台被“朱派”的同学砸了。“蔡派”的殷惟侯、肖体修、赵国柱等同学被打的鼻青脸肿（详见参考文献 1）。这件事情充分反映出当时地院东方红内部的“朱派”和“蔡派”两派对地院内部文革运动的意见分歧和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详见本书第二篇“九四”事件）

## 1967 年 9 月 12 日

院革委会决定撤销作战组和动态组，停出“动态报”。（详见 1967 年 9 月 15 日《东方红报》第 75 期）

## 1967 年 9 月 30 日

由“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专题文章，在《东方红报》第 81 期开始陆续分 36 个部分连载发表，直到 1968 年 2 月 29 日第 118 期结束。参加这一专题文章编写的主要执笔人有地院东方红公社的沙丁茂、黄平稳、林建初等人。该文

是研究全国文革运动极为重要的文字史料之一。

## 1967年9月30日

### 地院自己动手建成毛泽东塑像

1967年年初，不少单位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开始建造毛泽东的塑像。地院东方红也不甘落后，决定自己动手，建造毛泽东塑像。地院东方红成立了美工队，通过到外单位学习、观摩，决定了自己的建造方案。当时成立了翻模组、木工作组、瓦工作组，经过师生员工通力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日日夜夜艰苦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底座高4米，像高8.5米的毛泽东塑像。学校约有100余人参加工作，主要参加人员有方长乐等人。1967年9月30日举行了毛泽东塑像的落成典礼，从此，该塑像就耸立在地院东门广场上。后来，好几个学校都让地院帮他们建造毛泽东像。

## 1967年10月5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同志，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后补委员李班同志等，在李先念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丁国钰同志陪同下来地院参观访问。（详见参考文献32，及1967年10月7日《东方红报》第83期）

## 1967年10月17日

《东方红报》86期发表社论：《全面复课闹革命》

66届毕业生开始毕业分配。

## 1967年11月2日

叶向真、朱成昭、蒋良朴、张华府、梅建明、王北宁、王白莎等人分别被正式抓捕，并关在北京市第一监狱（功德林）。（详见本书第二篇中张华府、梅建明回忆录）

## 1967年12月2日

地院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

- (1) 解散院临时党委筹备组；
- (2) 成立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
- (3) 由核心小组负责地院党组织整顿和发展、处理党员工作；
- (4) 核心小组由李贵、王大宾、聂树人、柴文全、贾振远、王焕、侯力平、

李一民、刘家齐等九位同志组成，并报北京市革委会审批；

(5) 会议建议发展王大宾、聂树人同志入党，不要预备期。(详见 1967 年 12 月 5 日《东方红报》第 101 期)

## 1968 年 1 月 15 日

院革委会和“红色巨浪”战斗队分别组织了对陶世龙、沈孝宇、丰源、王武峰、陈汝箴等人批斗会，以清理阶级队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认定上述人是暗藏的坏蛋和反革命分子。(详见 1968 年 1 月 16 日《东方红报》第 111 期)

## 1968 年 1 月 16 日

院革委会发布 001 号通告：限令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流氓阿飞、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及一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家伙必须在此通告发出四十八小时之内到指定地点报案、自首不得有误。否则由群众揪出后将严加惩处。(详见 1968 年 1 月 16 日《东方红报》111 期)

## 1968 年 1 月 19 日

院革委会发布三个通令：

- ◆ 关于彻底粉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通令——1968 年 1 月 16 日革字(002)号
- ◆ 关于肃清“五一六”分子的通令——1968 年 1 月 16 日革字(003)号
- ◆ 关于斩尽大特务郑公盾伸进我院黑手的通令——1968 年 1 月 16 日革字(004)号

(详见 1968 年 1 月 16 日《东方红报》112 期及本书第四篇)

## 1968 年 1 月 23 日

《东方红报》新建栏目“点鬼台”，把陶世龙、谢小鱼、温树朴、田应丰等人作为反革命分子进行点名揭发批判。(详见 1968 年 1 月 23 日《东方红报》113 期及本书第四篇)

## 1968 年 1 月 26 日

东方红广播台发表文章：《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彻底粉碎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详见 1968 年 1 月 26 日《东方红报》114 期)

## 1968年2月5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普罗科普·穆拉率领的科技代表团来地院参观访问。(详见1968年2月10日《东方红报》115期)

## 1968年3月19日

地院东方红公社就反对军内一小撮和二月逆流等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详见1968年3月19日《东方红报》123-124期)

## 1968年3月25日

地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就3月19日的严正声明,发表《再次严正声明》(详见1968年3月25日《东方红报》125-126期)

## 1968年3月27日

214战斗队、海燕战斗队发表文章:《颠覆革命委员会的宣言书——评二团的“两论”》,该文公开地把地院东方红内部的派性斗争的蔡派(即,二团)认定为:颠覆地院革委会政权的东方红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老右倾机会主义者;老右倾投降主义者;老右倾分裂主义者。从而,把东方红内部朱派和蔡派的矛盾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并公开化。(详见1968年3月27日《东方红报》125-126期)

## 1968年4月11日

地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就关于与北大发生武斗一事,发表《严正声明》(详见1968年4月11日《东方红报》129-130期)

## 1968年5月6日

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关于追认李全华烈士为中共党员的决定。(详见1968年5月6日《东方红报》135期)

## 1968年5月23日

院革委会从1968年5月16日-18日连续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揭发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高元贵破坏文革运动的罪行。从此在院革委会领导下,地院内部开始了一场打倒“高安郑”(指地院前院长高元贵、前团委书记安静中、前岩石教研室党支部书记郑伯让三人)运动。

(详见《东方红报》第137,138,139,140期及本书第三篇“高安郑专题”)

## 1968 年 5 月

67 届毕业生开始毕业分配。

## 1968 年 5 月 30 日

### 杨雨忠自杀事件

1968 年 5 月 30 日午后，探工系 71621 班杨雨忠，在毕业分配前夕，突然从北五楼东头顶层，靠近王大宾宿舍附近的北面阳台上跳楼，立即送医院后已无法抢救，宣告死亡。这是轰动地院的一件大事。事后杨雨忠的父亲从上海立即来到地院，由负责杨雨忠案件的王焕书记（代表革委会）和探工系 7162 级政治辅导员及 71621、71622 班的党支部书记接待、处理此事，并派辅导员和李海荣同学送杨雨忠的父亲回上海。

此事当时是保密的，不让同学参与或过问。到底是什么事，使得杨雨忠选择了自杀的路？至今仍是一个谜！当时知道杨雨忠留下了三份遗书，一份给家人，一份给王大宾、李贵，一份给他专案组的人。但到底是什么内容，至今没有公布。据有人了解一点：院方对杨雨忠的父亲说，受院革委会王大宾的指示，对杨雨忠立案审查，让杨雨忠讲清楚与朱成昭的关系（当时朱早已被捕），不讲清楚，就不让毕业，讲清楚了，可以与大家一起分配。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大家为杨雨忠的死惋惜，但是没有当事人站出来，此事怎么就集体失声呢？（详见参考文献 1，5，13 和 2 及本书第三篇“杨雨忠专题”）

## 1968 年 6 月 13 日

聂树人组织东方红战士去河北三河地震队打捞朱德喻。朱德喻，地院 66 届学生，分配到河北三河地震队，被该队隔离审查，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详见 1968 年 6 月 13 日《东方红报》140 期和参考文献 1560-562 页“打捞朱德喻”一节）

## 1968 年 7 月 28 日

### 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高校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地院五个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头头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时间长达 5 个小时。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张春桥等人。

毛泽东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有不少的插话。王大宾回校后向全校师生进行了传达。由于这次召见的讲话内容非常精彩、丰富，是研究文革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且这次讲话已有书籍专门发表了，此处就不再重述。（详见参考文献 10 和 5）

## 1968 年 8 月 8 日

院革委会常委任云堂代表院革委会在全院批斗“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发表了“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发言，其中把地院的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陶世龙等老师及东方红的蔡派骨干成员周永璋、蔡新平等正式列为组成“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一股反革命势力，从而正式把地院东方红内部的蔡派定性为“敌对势力”（详见 1968 年 8 月 8 日《东方红报》第 148 期和本书第三篇中“高安郑专题”）。这样，“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就成为地院文革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

## 1968 年 8 月 10 日 周永璋第二次被抓

1968 年 8 月 10 日，院革委会组织对周永璋第二次抓捕。理由是，周永璋是反周总理、反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周永璋从 8 月 11 日起宣布绝食，以示抗议（详见本书第三篇“周永璋专题”）。这次前后被抓的同学还有：吉让寿、孙司权、殷惟侯、余九乡、肖体修等人（蔡新平是逃跑者之一）。被抓的老师有：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高元贵、陶世龙、郑雪禾等人。以上这些被抓的人，到军宣队进驻革委会掌权之后，经过军宣队调查、谈话后，逐步逐步解放平反（详见 本书第三篇中“周永璋二次被抓专题”和“高安郑专题”）。

## 1968 年 8 月 25 日

### 军宣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接管了地院革委会的党政大权。

## 1968 年 9 月

### 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

1968 年 8 月 25 日，中央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总人数达 500 人。从此，军宣队、工宣队接管了地院革委会的一切权力。地院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开始了内部的整风运动。李贵、王大宾、聂树人、陶世龙、赵鹏大等人被列为首批整风对象。

1968 年 9 月的一天，军宣队说：大联合了，革委会成立一年多了，“东方红

公社”也该停止活动了。（详见参考文献 1）于是借着“东方红公社”成立二周年之际，由黄平稳写了一个“地质东方红”解散宣言，在北五楼北边放电影的广场上开会，由黄平稳宣布“地质东方红”解散。

## 1968 年 12 月

### 地院 68 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68 届毕业生至 12 月底基本都离开了学校。当年分配由于社会环境动荡，有些省市不予分配，如北京一个不留（而 66-67 届均分配了不少）。和 67 届相同的是都有一部分先分配到部队农场，一年后他们再重新分配。全校约有百名左右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包括应在 7 月份分配的 67 级部分学生，没有参与正常分配，被继续留校“办学习班”。根据伏庆是回忆，军宣队在 1968 年 12 月 15 日后，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名，将伏庆是、田春林、黄瑞华、梅建明、刘万恩、刘梅、林小湫、郑文卿、庄一龙、杨宾芳等人隔离审查，直到 1969 年 6 月后这些同学才被批准毕业分配（详见参考文献 2）。被留校“办学习班”的学生情况因人而异，有的是因文革中在校外活动有问题要查清楚，有的是因为某些言论被认为思想“反动”需要教育反省，有的是因为有海外关系要审查，有的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需要修理……被留校办班学生名单，前期是由革委会定的，后期是由校军工宣队定的。

革委会中前期已留校的王大宾、聂树人也都在这个时间内离开学校了，与正常分配略有不同，但与当时的毕业生待遇一样。军宣队领导对各派头头的毕业离校都分别礼送，王大宾、聂树人是官方的，在车站送行，蔡新平是军宣队一把手牛润五设家宴饯行。

69-70 届学生继续留校“复课闹革命”，或组织到地质队、矿山参加生产劳动，美其名曰“半工半读”教改试点。

### 1970 年下半年 69、70 届学生进行毕业分配。

## 1969 年底

### 地院教职工到江西五七干校

地院军宣队大约是和地质部军代表（当时中央各部委均已被军管，由军代表主持工作和运动）商议后，各自分别在江西峡江县仁和镇龙陂原“共大”旧址和隔江相望的水边兴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在对待教学人员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动员过程中，一些政策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近乎残酷。如对于“双职工”家庭，一般都要求全家老小前往干校安置。如若不愿一起同迁，则老小在京的照料问题需自己解决，组织上或留守处均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对不同行的孩子原

来享有的统筹医疗福利，也就随即终止。军宣队正是利用这类不近人情的措施，迫使教师举家同迁。在“双职工”家庭中，若另一方为非本校的在京职工，则双方可自己选择举家同往对方干校安置。该措施被在京中央单位普遍采用，以减少同迁干校的阻力。若另一方为京外职工时，也允许京外职工随地院职工同迁江西干校，但工资、人事关系不变，今后根据学校教改的情况，可优先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调动问题。

1969年初冬，是地院广大教职工群体，特别是被驱往干校的教职工群体在文革中最为寒冷的季节。军宣队毫无人性的恶劣作法，使他们完全处于任人摆布而又求助无门的悲惨境地。他们不得不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背井离乡，而且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和至亲也要随之浪迹异乡。干校学员中，宋翔雁老师夫妇被迫将未满周岁的孩子留京托人照管，不料三个多月后孩子即被烫伤，并险些送命，为了抢救孩子生命，仅花销的医疗费用就达一千余元；原体育教研室主任刘冠军教授就猝死于干校的劳动中；原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而自尽于深山老林。（详见参考文献3）

## 1970年起

### 地院清查“五一六”、清查“三种人”

军宣队在地院掌权后，1970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并又一次开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清查“三种人”运动，在地院的师生以及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当然也成为了被整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地院东方红的积极分子无一幸免。

王大宾在1971年3月9日从成都被抓回北京，关押在地院，进行有关“五一六分子”的审查，在这时期，王大宾关押审查了四年之久。文革结束并遭到否定之后，“五一六”罪名已不能成立，于是王大宾又被改换罪名，于1978年4月29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正式逮捕王大宾。至1983年8月18日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指控：“王大宾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王大宾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宾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得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详见参考文献5及本书第三篇中“王大宾专题”）

聂树人在1970年10月～1973年4月，被地质学院认定为“五一六”上层骨干分子，在青海省地矿局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79年12月，又以“整理周总理黑材料”、“绑架周总理”等罪名被青海省公安局逮捕审查，后以“不构成犯

罪”而被释放。(详见参考文献 18)

除此以外，地院东方红总部李贵、贾振远、田春林等等都受到关押、审查，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被中央文革炮制的“叶朱反革命集团”，直到 1980 年 6 月，经中组部批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安排工作。该案长达 13 年之久，牵连人数多达 150 多人，成为文革中，中央文革炮制的学生中最大冤假错案。尽管该案起源于地院东方红，但就其复杂性、神秘性却给了中国政坛投下了一颗巨大的震撼弹……。该案还有不被人们所知道的内幕，朱成昭等人最终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详见本书第二篇中张华府、梅建明的回忆录及本书第三篇中“朱成昭专题”)

2016 年 6 月 5 日 初稿

2018 年 7 月 21 日定稿

## 参考文献

1. 聂树人：《地院东方红兴亡史》 2011 年 12 月香港出版
2. 伏庆是：“我与北地文革”
3. 宋翔雁：“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4. 万天丰：“回忆六二〇事件”
5.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 2015 年 10 月香港出版
6. 田春林：《田春林文革回忆录》
7. 陈永迪：“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8. 谭保华：“北地东方红抓彭德怀进京纪实”
9. 钱佩娟：“忆江祖如和地院文革”
10. 张运钧、李颖：《晚秋沉思》 2012 年 12 月香港出版
11. 孟繁华：“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首都红卫兵》报 1967 年 1 月 25 日)
12. 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13. 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
14.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5.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2013 年 12 月香港出版

16. 聂树人：《北京天、地派的争斗》 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17. 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18. 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 2014年香港出版
19. 周永璋：“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20. 梅建明：“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21.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2011年3月香港出版
22. 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3. 11622班“聂沙华”大字报：“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
24. 王大来、陆炎德等24人大字报：“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
25. 安静中大字报：“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
26. 江祖如等人大字报：“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
27. 朱成昭等人（爆破战斗队）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28.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
29. 闫长贵 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2013年1月 第三次印刷。
30. 蒯大富著、许大城编：《清华文革“五十天”》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31. 蔡新平：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附：戚本禹的讲话）
32.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第83期
33. 《东方红报》评论员：“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回顾与展望” 1966年10月13日《东方红报》第三期
34. 《东方红报》记者：“三次进军地质部 再次炮轰何长工” 1966年10月13日  
《东方红报》第三期
35. 李颖：“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 (上)

### 目录明细

编者按：

#### 【乱世的记忆】

蔡新平 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53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前后的政治气氛和我的表现

工作队进驻初期

我带头参加了 6·20 赶工作队游行

薄一波批示让我们成了“反革命”

7月 18 号风向转了 17

反工作队的“反革命”们串联成立“东方红”

一进地质部和 8·24 大辩论

周永璋串联成立三司

二进地质部与朱蔡分裂

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和王大宾执掌“东方红”

高元贵与“蔡派”

蒯大富、聂元梓与我的关系

“杨、余、傅”事件后高校两派斗争升级和校内武斗

一些有关情况的简要交代

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73

一、缘起

二、6·20

三、反干扰

四、东方红

五、朱成昭

六、革委会

七、审查

八、解脱

九、后记

田春林回忆录 141

邹家尤的临别赠言

肖力来地院

我记忆中的抓彭德怀事件

黄克诚说：“红卫兵对我很好”

我和朱成昭的相识

我和朱成昭的分手与重逢

谁举报了朱成昭

关锋给我的一次电话记录

我被清洗出革委会的经过	
地院文革中的四个最黑暗时段	
我所知道的三司	
三司的成立与周永璋	
我怎么到了三司	
如此“总司令部”	
“口号事件”后的周恩来接见与三司大印被抢	
三司发展成员单位的一个原则	
印象较深的一次接见会	
<b>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b>	<b>176</b>
我在学校的基本情况	
在狱中的基本情况	
劳改农场的基本情况	
刑满回校	
<b>李颖：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b>	<b>185</b>
我被工作队划定为第三类人	
我第一次见朱成昭	
二进地质部的点滴	
肖力就是李讷	
绝食——看见朱成昭在吃饭	
我们睡在楼道里	
学校的同学来地质部支持我们	
我进入动态组	
我知道的民族宫“四八”事件	
<b>张华府：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b>	<b>194</b>
一、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二、“东方红”早期内部矛盾和我对几个关键人物的看法	
三、朱成昭的领袖能力	
四、朱成昭被中央文革停职	
五、朱成昭和中央文革渐行渐远	
<b>张华府：无罪的囚徒——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b>	<b>207</b>
六、在学校挨整	
七、进了北京最严酷的监狱功德林	
八、刻骨铭心半步桥	
九、秦城岁月	
十、在农场劳改	
十一、宣判——现行反革命和人民内部矛盾	
十二、一个时代的结束 终于平反	
<b>梅建明：梅建明与“朱叶反党集团”</b>	<b>272</b>
三进地质部	
被彭德怀征服了	
秘密会议	
“朱叶反党集团”	
<b>陈永迪：我见到的北京地院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b>	<b>280</b>

陈永迪：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287
程关林： 被遗忘的群体	292
殷惟侯：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315
第一张大字报	
揭发安静中	
支持朱成昭	
给肖力带路	
“搬掉”东方红，地质学院才能大乱”	
二团的来历	
拉不拉队伍	
大批判联络站和九·四事件	
被非法关押	
避难北大	
开除团籍是乱弹琴	
11622 班文革前的几件事	
关于聂树人的回忆录	
<b>林天民： 文革回忆录</b>	<b>333</b>
夺取地院广播台	
北师大“井冈山”是如何成立的？	
与周总理“辩论”	
“抓捕”彭德怀——忆重庆联络站	
<b>胡昌铭： 文革回忆录（节选）</b>	<b>343</b>
造反派的内斗和武斗	
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中央文革与造反派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	
军宣队、工宣队大搞“红海洋”	
参加社会公益劳动 斗批走	
毕业分配各奔东西	
<b>何建勋： 文革回忆录（节选）</b>	<b>370</b>
一、为了忘却的纪念	
二、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风雨同舟路	
三、尘封的岁月	
四、怀念几位东方红公社的老难友和老校友	
<b>陶世龙： 我的 1978 年</b>	<b>396</b>
 【六二〇事件】	
<b>万天丰： 回忆“六二零事件”</b>	<b>411</b>
一、高元贵院长成为地院的头号“靶子”	
二、群情激愤，反对地质部工作队的倒行逆施	
三、“6.20”的演说、游行与上访	
四、工作队反攻倒算与群众的坚持斗争	
五、撤走工作队，建立与中央的联系	

## 【九·四事件】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关于北京地质学院

“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423

聂树人：“9·4事件” “二团”分裂阴谋的破产 429

**编者按：**本书选用的对地院文革的回忆文章，既有地院“东方红”派别的师生写的，也有其对立面的“斗批改兵团”的人员写的。同样，既有地院“东方红”内部的“朱派”师生写的，也有“蔡派”的师生写的。他们都是当年地院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因此回忆文革文章具有较高的广泛的代表性、真实性和可靠性，而且很生动的反映了当年的场景。它充分还原了当年地院文革的真实情况、展示了文革年代的时代特征。它也是研究地院文革，以至于全国文革的重要的文字史料；我们根据回忆文章内容的不同，设计了不同板块，分类奉献给大家。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第二篇中，近 70 万字的地院文革回忆文章，绝大部分是蔡新平花了好几年时间，向作者作了动员、征集而来，然后又花了大量的心血、精力对每一篇回忆文章进行认真细致的审稿、编辑工作；还与作者本人多次沟通，修改成稿；最后，蔡新平将大家的回忆文稿，推荐给《记忆》和《昨天》二个电子媒体；这二个杂志社的编辑老总们，再次认真审阅稿件，并进一步编辑加工；修改后的稿件又多次与作者沟通，最后才定稿，分别在《记忆》和《昨天》上分批发表。这里的每篇稿件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晶。在此，首先要感谢蔡新平几年来所作的付出，感谢《记忆》的吴迪老总，感谢《昨天》的何蜀老总，以及两个媒体的各位编辑们，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与无私的奉献！

本书的第二篇引用的《记忆》和《昨天》上已发表的文章，在本书编辑时，未再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加工，特此说明。

# 【乱世的记忆】

##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印红标采访 牛彩茹根据录音笔录

采访时间：1990年11月（？）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中科院宿舍

笔录时间：2013年6月～9月

整理注释：蔡新平

蔡新平的说明（下图为蔡新平近照）：



文革研究者印红标先生在1990年找我采访，是孙司权（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二团”成员）的妹妹孙司政介绍的。孙司政原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印红标有朋友或朋友的亲属和她是建设兵团战友。采访时印红标是北大青年教师，有心研究文革史，在来找我之前，据说已经采访过蒯大富等人。采访是记录在录音磁带上。但长时间没有整理，磁带已经老化，有些段落已经损坏。后来在北大资料室的协助下制作成音频电子版（MP3格式）。直到12年后我才与印红标重新联系上，他给我提供了这个转录的MP3音频文件。

我当时因野外工作高山反应后耳朵听力严重受损，磁带转录后音量又很小，也不清晰，我几乎一点也听不出来。我夫人牛彩茹从地质大学退休后鼎力协助我的文革史资料整理工作，文字转录工作全部由她完成，她反反复复地听，连听带猜，边听边打字，很是辛苦。在此对我夫人的辛勤劳动致以我衷心的感谢。由于我已完全听不清录音了，我仅审读了整理出来的文字，在审读中对个别错别字和可能误听的局部文字、名字、词汇等进行了校正。为保持原样，即使是现在已知道有误、与现在看法不一致的地方，也不再做大的改动，需要时以加注的方式说明。

从1990年到现在，又过去了26年，记忆虽然又有所衰退，但通过阅读、交流、学习，特别是老校友们陆续写出的回忆录及有关资料的出现，对回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加之对文革的认识与当年相比有了更深刻的变化。这样回头再看当年的口述，就看到了许多缺陷和不足，有些地方有明显的错误，同时也深感当年认识的肤浅。这个采访录音只作为一个原始资料保存下来，可与我以后正式的回忆录作个比较。

小标题是编辑过程中为阅读方便加的。

##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前后的政治气氛和我的表现

大约是在 1966 年 4、5 月份的时候，当时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等，类似这些文章矛头直指原北京市委，火药味很浓。学生当中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人，认为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来临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我是班长，正在野外<sup>1</sup>实习。我带一个实习小组，小组共 6 个人，都和我关系不错，我就经常跟他们谈这个问题，我说国家要出事，我们得多想些问题。从野外回来后，就到图书馆阅览室看一些杂志，翻早期的一些杂志的时候，从《红旗》杂志上发现了一些觉得有问题的文章，像我们这样的认识水平，就写了一篇文章，批《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想把稿子邮出去，没有邮。告学校领导的一封信当时是怎么发的不知道，怎么落到学校手上的也不知道，总之是叫学校给扣了，保卫处派人到班上来调查来了，也可能是从杂志社转到学校来了，也可能我给院党委写了信？已记不清了<sup>2</sup>。我们觉得压力挺大，心情非常压抑。这是 5 月中下旬的事情。当时我是三年级。<sup>3</sup>

6 月 1 号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我们就感觉到学校的党委跟北大的是一样的，是压制学生的。我们不过是写了一封信，学校保卫处就搞得非常厉害。那时，文化大革命以前，学生和学生的联系不多，除了本班与本年级有联系，外系的很少有联系的，也不知道其他系有什么，外校就更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写东西，我们的想法，都是来自自己的思考。我们 6 个人，在学校党委调查下都很害怕，其中有 3 个人特别害怕，要把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说是蔡新平搞的，他们不知道。推吧，我不否认，本来也是我搞的。

6 月 1 号夜里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后，学校每天早晚大喇叭都要按时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听后很激动。我们几个人就连夜起草了一封信，我们觉

<sup>1</sup> 河北兴隆寿王坟铜矿。

<sup>2</sup> 实际上是给《红旗》杂志写了一封，就地质学院的运动情况给院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这个信交给了我们班的政治教员崔宝成。

<sup>3</sup> 我写的那封信可能没有自己邮出去，而是交给政治老师了。从他们后来揭发党委的大字报语气看，好像是给他们了，请他们代交。带我们班的政治老师和我关系比较好，我常和他交谈想法，或许出于信任，当时就交给他了。在聂树人 2012 年出版的《地质东方红兴亡史》中发现了一段内容，可以与我当年回忆相印证。这段文字是摘自工作组在“反干扰”期间编的《大字报选编》，是政治教研室老师给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周守成贴的大字报《周守成，你为什么不准同学起来革命？》，内容中有：“五月三十日，15632 班有同学向党委写了一个意见书，对党委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说：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怀疑党委有问题。他们反对四平八稳坐下来‘学习’读书，要求投入战斗，批判三家村黑帮，开声讨大会。否则就要往解放军报写信。我们把意见书转交给党委的第二天，党委不但不支持同学的革命要求，反而叫保卫部门出面干涉，查询提意见人的情况。同时，保卫部门还通知崔宝成（下到 15632 班的政治教员）到周守成那里去汇报。（后因周守成有事没有汇报）。”（政治教研室 1966 年 6 月 18 日）大字报提到 15632 班，这就是我所在的班。从大字报内容判断，我是给党委写了意见书，是通过政治老师转给院党委的。

得地质学院的党委和北大的党委一样，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人民日报社去了，去揭露党委压制学生，送告状信。

我还记得清晨下了场雨，到人民日报社后雨过天晴。

等我们从人民日报社回来，就发现学校里的大字报了，半天的功夫贴的就相当多，所有大字报的矛头都是指向党委的，可见已经有很多人对党委不满了。当时从社论和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来看，感觉到中央是要推进这个运动，要揭开北京市的盖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这个盖子，认为北京市要搞修正主义，政治敏感的人从发表一系列文章，如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大气候。大家的认识主要站在社论的立场上，认为各个单位的党委也是修正主义路线。那时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所提出来的都是政治问题，包括老师和学生，一般认为北京市委的那条黑线也都伸到了各个学校的党委。北京市委是领导各个学校的，既然北京市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学校党委对前一阶段表现的态度又很不积极，学生当中凡是有响应这个号召的，呼应报纸社论发表意见的，学校都采取压制的态度，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我估计各个大学的情况类似。对地质部不了解，我们学生跟部里也没打过交道。

从6月1号到6月3号这三天的时间，大字报声势就很大了。到3号下午的时候，校领导就开会，原来校长兼党委书记是高元贵，可能半年前吧，调了个部队干部王焕当了党委书记。党委分析这个形势，认为是类似于1957年的右派反党，认为在包括老师和学生中有右派。当时就召集各系教研室、班干部开会，组织他们再贴出一批大字报来反击右派的大字报，这个在地质学院叫“6·3反扑”。

我不是党员，我现在也不是党员。各个班写大字报，我是大字报没写，我是去了人民日报社反映情况。组织批判时虽然没有完全形成党员站在一边，但大多数党员站在那边。双方虽然还处于辩论的状态，但由于一方是受党委支持的，从气势上就很强，批党委的一方就感到压力很大。

## 工作队进驻初期

地质部就在6月8号，由何长工带队，派工作组进来了，何长工带队，地质部的几个部长都到场了，在会上何长工宣布，我们是来支持学校运动的，以高元贵为首的校党委压制学生运动，他们目无地质部党委。要按何长工讲话，高元贵这个人傲慢得很，三年不进我地质部的门，从不给我汇报工作。然后6月8号这天大会上就宣布撤销高元贵的职务<sup>4</sup>。学生觉得工作组是来解放群众的，那些感到受压抑的学生就欢欣鼓舞。我在底下听这个报告的时候，非常激动，我就喊了口

---

<sup>4</sup> 实际是停职反省，接受批判，罢官是在6·20之后。

号，已经记不清是什么了，大概就是坚决拥护之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我感到很尴尬，感到压力很大。

我回宿舍贴了一张标语，“无产阶级革命右派翻身了”，结果“右”字没打引号，意思是党委把我们提意见的打成“右派”，其实我们是左派。贴出后有一个人边看边念，琢磨这个右字，我一看不对劲，就马上把它给扯下来了，怕抓辫子。说明当时心里非常激动紧张。

这一段时间应当说学生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开始进来的时候并不是像有些学生说的那样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至少对工作组的态度变化大约是五六天后。既然何长工来把高元贵的职务都撤了，因为很多学生还不知道党委书记是王焕，以为高元贵就是党委书记。既然党委书记都撤了，批评党委的人就更活跃了。老师中明白人多，他们不满意撤高元贵，认为地质部搞错对象了，是在用打击高元贵做表面文章，实际在保压制群众的党委。因此他们批党委主要火力是批有实权的几个人，如周守成、聂克、李武元等，王焕来的时间短，对他点得不多。支持党委的人也不甘示弱，双方两派就没黑没夜地天天辩论。

这时候出现一种新情况，派到各个系和各个年级的工作组开始收缩，不再支持这些学生反对党委，对学生中批辅导员这一级的情况工作队反而很放纵。因为工作队成立了新的党委了，由工作队的党委代替学校旧的党委，工作队的党委里吸收了原党委书记王焕，他是部队调来的，时间不长，是何长工派来夺高元贵的权的，1966年上半年的时候撤了高的党委书记，现在又罢了高的校长。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当了党委书记。

从学生的角度认为他们的调子越来越右，限制越来越多，学生开始不满意了，说你们工作队违背了何部长的意图，何部长是支持学生的，当时还没有往更高层的方面想，没指到部一级。认为工作队违背了部党委的意图，所以学生就开始反对工作队了，开始给工作队贴大字报了，说工作队压制了学生，保旧党委。

老师也出现了一帮人，同样也是，包括干部。地质学院当时有个干部叫李贵，是党委委员，教辅处的处长，主管后勤的，这个老头就发表演说。因为当时岩石教研室的老师去北京市委告状去了，北京市委已经是新市委了，告工作队的状，说工作队不把矛头指向批判原来校党委，而引导学生把矛头指向斗辅导员和老师，认为方向错了。已经有大字报怀疑地质部的企图，工作队不是来支持学生革命的，是来夺高元贵的权的，是来保党委的老班子的。

我感觉，学生中斗辅导员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我们系，至少我们年级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别的系个别的班级有，可能有的学生过去被他们年级辅导员，也是年级的党支部批过，不得志，受压，学生出现一些报复情绪，借机就开始批斗辅导员。比如水文系四年级的朱成昭，批判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辅导员，给老师

身上浇墨，把墨水扣到老师身上。这时候老师们就相当不满意了，老师就认为工作队方向不对，为什么引导学生不批判原来的党委？当时群众的认识，认为原校党委是和旧北京市委的黑线连着的，认为工作队保原来的党委，把矛头引向批基层干部，大方向错了。

北京市委就派了两个人到学校来调查看学生大字报，学生把他们围上来，让他们讲话，他们讲话说批判的重点应该是校领导，不应该是年级的党支部和辅导员，他们受修正主义影响，但是他们不是主要的批评对象。来调查的人是支持反映这些情况的老师的。李贵这个老头他跳出来讲话，他也表示支持岩石教研室的这张大字报。但是下来了的时候，工作队就制造舆论，说李贵这个人没有党性，和工作队对着干，而且也出来了批李贵的大字报。

以这个人为分界线，支持和反对的明显对立了。

### 我带头参加了 6·20 赶工作队游行

赶工作队的行动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李贵演讲的当天中午，是物探系还是探工系的一帮学生<sup>5</sup>，拿着一张纸写一个字的大标语，叫“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就到学校的大礼堂前张贴。大礼堂是地质系的大饭厅，我正在吃饭，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别贴了，干脆我们到学校游一圈。同学们都同意，我把碗放下，和他们一起，就一人举一张走起来。这一走就越走人越多了，跟上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一两千人了<sup>6</sup>。跟着走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了。

人一多形势就不一样了，就把工作队住的这个楼包围了，就要求工作队出来答复学生。邹家尤也没有见过这阵势啊，就挺害怕的，就不敢出来，越不敢出来学生就闹腾得越厉害。工作队就提出派代表，因为我是一开始就跟他们游行的，等于是带头的，走在前面的，我就被推举为代表，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庄一龙，戴眼镜的小个子，还有周永璋，其他人还有谁记不住了，当时还互不认识。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江祖如，也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他支持反工作队，还跳到桌子上发表演讲。我想我们年级党支部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如周永璋，是学生中的支部委员，基干民兵连长，参加游行了，紧跟江祖如也演讲。大家当场推举代表，大家也推荐江祖如当代表，但是工作队不要老师只要学生，6个学生，跟工作队谈判，提出四五点要求，总的精神是要工作队撤销王焕，因为王焕是旧党委的党委书记，撤销王焕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接受群众批判，改组工作队党委，撤换工作队。这是关键的一条。另外让邹家尤做公开的检查，承认错误，让他发

<sup>5</sup> 物探系四年级的郭凯等人。

<sup>6</sup>除了我们这一拨外，当天几乎同时还有好几拨自发的行动，聚在一起后边游边壮大。亲历者万天丰老师回忆录说有上千人，加上围观的就更多了。但也有人回忆说不足百人，估计他只是路边的旁观者，只看到了游行开始阶段。非亲历者聂树人回忆录里写道充其量不超过四百人。

表态度，支持李贵、岩石教研室的老师的行动，要求派车送师生到国务院上访等，类似这样一些要求。

当时工作队含含糊糊，也没说同意，也没不同意，说我们要上报部党委研究，认为学生要去国务院反映问题是合理的，同意派车，把学生糊弄下去就算了。学生也没有什么组织，等等吧没什么劲了，学生就散了。

但是当晚谁也不睡觉，都在马路上辩论，后半夜了马路上还都是人，快天亮了才渐渐散去。可是一天亮，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贴出了，原来有的人在外辩论，有的人在家写大字报。

6月21号，部党委和工交口的李人林到学校来支持工作队，警告学生说反工作队背后有黑手，正式宣布罢高元贵的官。这根本不管用，反而招来了反工作队师生的更猛的反击。最后等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大概是6月25号吧，等来了薄一波的批示。在薄一波批示广播之前，学校正辩论得热火朝天，辩论的最关键的是，工作队认为这次游行是有预谋、有计划，是有幕后操纵搞的，而当事人认为并不是有谋划的，而是自发的，认为他们是诬陷。主要是辩论这个问题。如果是有幕后策划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的，就是被坏人操作的，如果是群众自发的，性质就不一样。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辩论。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薄一波指示下来之前一天的时候，我一早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夜车写的。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我也起义》，因为当时很多贴大字报的人就是说他“起义”了，是被人鼓动参加游行的，认为工作队是对的，赶工作队是错的，自己犯了错误，上当受骗，现在反戈一击了，现身说法，说这个运动是有人策划的，就胡编吧，都写自己“起义”了，也就是检举揭发呗。如是我也写了个《我也起义》。当时这张大字报就挺吸引人，你想，当时蔡新平是带头组织游行的，他也“起义”了，说明这真是有问题了。但实际内容就是驳斥他们，写的比较详细，用事实告诉大家风向有些转了，对我们支持的多了。随后更多的人纷纷揭露真相，其中有的揭发那些写“起义”大字报的人，其实他开始并没有参加游行，他就是反对游行的，工作队发现了这样的人，收买了这样的人，让他们也参加游行，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进的游行队伍，当时就是在反对在捣乱，实际是内奸，是工作队收买的人。如是把这种所谓“起义”的人给揭露出来了。这形势更好了，说明工作队在搞阴谋，反工作队的声势反而越来越大了。

### 薄一波批示让我们成了“反革命”

正在这时候，就突然广播了薄一波的批示，批示就是几句话，说学生赶工作队的就是夺工作队的权，夺工作队的权就是夺党的权。因为当时给工作队提了一

条，改组工作队党委，要求组织一部分群众代表参加监督工作队的活动。夺工作队的权就是夺党的权了，反工作队按薄一波批示给定了调子，反工作队就是反党。

当时薄一波挺红的，怎么红呢，当时林彪给工交党委一封信，说工交党委是一面旗子，工作做得好，所以薄一波算是红人，在中央的位置也是比较显赫的。他的调子定得比较高，毫不含糊，反工作队就是反党。

工作队的声势就壮了，把学生就给整下去了。我正在吃饭，听到广播后就像一下子掉到冰洞里了，胸口一下子就堵住了，这饭是吃不下去了。各个班开始批判，我的班上把我睡的那张上下铺床从靠墙的位置就推到了房子的中间，床的四面都贴上批判我的大字报，睡觉时钻进去，不许把大字报碰掉了，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就是监视起来了，天天开会批判。

开始几天我不服气，和他们辩，后来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头了，调子越来越高了。当时我就跟蒯大富差不多，我就宣布绝食，邹家尤就找我谈话，说你绝食你就绝吧，我不害怕，像你这样的人死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人死了，有什么稀奇的？就跟外头死一条狗一样的。话就这么说了，你要绝食你就绝去吧。我一想，这些人也做得出来，他要不管你，你还下不了台，你就白死了，他还不像蒯大富，蒯大富绝食的时候，跟他谈话的是劝他吃饭，年轻人嘛，犯点错误不要紧，来日方长……是从这个角度谈的。可对我就是这么谈的，你要死了，我们就当死了一条狗，反革命死了根本就不可惜。咱就没见过这个阵势：你这个行动就是反党，不要采取这个愚蠢行为。现在我准备通知你的父母。

我一想，我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了，他官不大，过去说他有历史问题，他是 1937 年参加革命的，38 年入党，新四军，当过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机要秘书，后来长期搞地下工作，直到迎接大部队南下，和平解放武汉，发挥了重要作用。审干时说他哪年哪年脱党了，1955 年整党的时候把他的党员抹了。解放初是武汉市劳动局的领导，给他抹了下来，开始定的 13 级吧？搞一次运动降个一两级，文革前就是个 18 级小干部了<sup>7</sup>。真要告诉给父母，那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心里害怕了。所以绝了一两天食，哈哈，也就两天，当然出不了名。

我印象中朱成昭他没有参加 6·20 反工作队游行，他属于斗辅导员的那一拨的，老师们就反对这个嘛。王大宾那个时候是否参加了游行不知道，但是学生代表里面肯定没有他。周永璋和江祖如在一起，周永璋是学生党员，支部委员，江祖如支部书记，都是带头游行的。工作队对带头反工作队游行的人整得最厉害。工作队认为学生斗党支部书记也是反党的，所以朱成昭也挨了整，他主要是从这方面挨整的。

---

<sup>7</sup> 这很符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处置地下党的 16 字方针。直到胡耀邦时代才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党籍，从 1938 年算起。2015 年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94 岁的他作为湖北省抗日老兵的四个代表之一，到北京来参加了阅兵。

薄一波批示下来之后就只有一个声音说话，再也没有反对的意见了。

## 7月18号风向转了

我们就天天在那挨批，批了一段时间后就到了7月中旬了，大概是7月18号吧，头一天就说，明晚上要开一个大的批判会，全校规模的。以前都在班级，顶多也是各个系里开。后来听说，开完批斗会后要把这些右派老师和右派学生押到地质部在塘沽地区一个农场去劳改，有十几个干部、教员，二三十个学生。当时已有风声，真实情况是后来知道的。这是我们班的工作队队长，天津水文队的一个干部，我曾经在1966年的冬天骑自行车去找过他，在他那住了一天，是他告诉我的。当时工作队宣布的五种人嘛，极右、右派、中间、中偏左的、左派，像我们这样的就都定为了“极右”，老师划为极右的好像是13个人，像李贵、安静中、王煊堂、陶世龙、傅昭仁，探工系王大来，地质系老师郑伯让、李明哲、莫宣学、邓晋福、万天丰，辅导员江祖如、林秀伦等；学生中极右的没有公布确切的人数，从批判的调子和点名来看，应当有二三十人之多。极右分子主要是6·20带头游行反工作队的骨干，发表演讲、写大字报批工作队调子高影响大的人。地质系的周永璋、田春林、黄占启、殷惟候等，探工系的王大来，物探系的庄一龙、郭凯等，水文系的朱成昭大概也是。朱成昭整辅导员比较狠，工作队认为他有反动言论，没游行也是右派。

反工作队时王大来的大字报调子特高，有系统有理论。王大来原来是探工系的团总支书记，四清的时候留在了农村里，在北京房山官道公社当了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同学召回来，让他揭发系总支的问题，回来之后很活跃。王大宾出身比较好，贫下中农吧，他是探工系五年级的学生，团干部，跟王大来关系比较好。王大来这个人，嘴厉害，笔头子也厉害，经常在学校里演说，他反工作队的名气与安静中、郑伯让一个级别。工作队后来就把他扣下来，不让他走了，说王大来走不了。王大宾沾了王大来光，跟着王大来上窜下跳，被工作队说成是王大来的小走狗，不明真相的还以为他们是兄弟，两人就是这么连起来的，也就有了点名气。

7月18号开大会之前，我们年级已经做好准备了，当时是一边站一个大汉，只要大会一宣布，马上就把我们这些人揪到台上去批斗，批斗完了第二天就押走。

可是大会一开始，邹家尤不但没说反工作队的学生怎么回事，反而做开检查了，说前一阶段，大多数的学生是好的，学生属于年幼无知，但是老师里面有老奸巨猾的，工作队打击面过宽，极右右派分子划得太多，学生中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下一阶段要转向教改，批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路线，批黑帮。他就改唱这个

调子了。

我们本来就准备了被揪上台去送去劳改的，听了这些就觉得非常奇怪，心里暗暗打鼓，但还是很高兴，高兴没有打成极右分子，没揪上台去批斗，大概也不会去劳改了。但仔细一想这不是工作队的本意，他们怎么会这么突然转弯呢？

回来之后，我就悄悄对要好的同学说，工作队的变化太突然，也不像是地质部的指示，能把薄一波的批示都否了，估计应当是中央有变化，很可能中央有指示。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已经游长江回北京来了。回到班上来后，班上的批判的调子降了降，但是降得不多，好在可以说话了。天天学毛著，我天天和他们辩论。同样是学习主席的文章，我说主席说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什么地方错了，就在什么地方纠正。他们说毛主席也说了，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他们说不许你翻案，不把你打成极右派就够便宜你了，你还想翻什么？

### 反工作队的“反革命”们串联成立“东方红”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吧，公布了毛主席游长江。可能中央开了会吧，到7月末形势就不一样了，工作队做了一个检查后，就匆匆忙忙宣布要撤走了。支持他一派的就敲锣打鼓地欢送，依依惜别，我们就游行反对。反对的一派就有了第一次的聚会。大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被点名批判的首要人物第一次见了面，当时谁是谁还弄不清楚，当时有几个认识的，这是王大宾，这是周永璋，这是朱成昭，这是蔡新平，这是田春林……大家约了一下，开个会。

朱成昭为什么跳到学生前面来了呢？他的弟弟在北大，北大的几次辩论，就是总理、江青去的那几场辩论，朱成昭去北大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他以“爆破战斗队”名义贴了张大字报，把这些右派学生吸引到一起了。我们主要是听朱成昭讲，朱成昭就分析形势。

工作队不是地质部一个单位派了，各个部都派了，他们的总根子是在国务院，归国务院管嘛，修正主义的根子是在中央，这个运动就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央，揭露中央里面的修正主义。这就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啊。我们听了就耳目一新，把我们的思路就开阔了。他也讲了北大的情况。

大家就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当时还没有东方红公社，是东方红战斗队，跨系的。过去的战斗队绝大多数就是本班几个人，跨班的都不多，我们是跨系的。这很重要，这个组织的基础很宽，为以后的扩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不久再吸收了更多小战斗队和个人后，就建立了东方红大队。朱成昭的思想就是：通过批工作队批地质部，通过批地质部要批国务院，我们要把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跳到我们前面去了，大家就推他为头，实际上组织这次会议水文系是朱成昭，地质

系是周永璋。周永璋和我是一个年级的，三司的第一任司令，他是党员。按说他本来是要当头的，但朱成昭带了一些人来，当时谁也不认识谁，显得他的势力比较大，大家就推他为头。周永璋并没有发表朱成昭这样一番高论，而且还认为朱成昭一些思想很危险，他是党员嘛，他说战斗队也要成立党组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他反对把党看得一团黑，他不同意朱成昭的想法，然后他不太积极和这些人联络了，朱成昭就当头了。朱成昭也让我警惕周永璋，说他是党员，他想当头。

朱成昭他父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上海市一个副局长吧？江青在北大的讲话他都知道的，他提出一个建议，成立一个跨系的批判工作队联络组，开始还不叫战斗队，时间大约是“十六条”发表后的几天<sup>8</sup>。

成立这个批判工作队的联络组后，周永璋就找我谈话，说朱成昭这个人很危险。因为我们俩是一个系一个年级的，周永璋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委员，也是学校的老先进了，他也是反对批判辅导员的，他对朱成昭这人一直就很警惕，朱成昭这人一跳出来，他就找我，说你不能跟着朱成昭跑，说他思想太危险。可我比周永璋的思想往前进一点，朱成昭个人有野心，这是肯定的，但是思路有道理，因为我的思想基础是根子在中央，朱成昭的思想很迎合我的思想，所以周永璋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他就没有进到这个里面来，没有进到核心组里面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就让大家到各个系去串联去，把反工作队的人能联络起来的都联络起来，这次会上才决定要成立一个组织，开始有人叫战斗队啊，批判组啊，造反团啊，后来大家都觉得不合适，“东方红公社”这个名称，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来的还是一个叫庄一龙的，这个人是物探系的，他说咱们叫公社吧，巴黎公社，因为“十六条”提出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嘛，大家七嘴八舌啊，后来就叫地院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成立了，我们起草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当时总共一百多人，折腾一段后发展到七八百人，在学校势力还是相当显赫的。

### 一进地质部和 8·24 大辩论

势力的扩大还是第一次到地质部。到地质部的起因，不是去斗何长工，不是去斗胥光义，是要求把工作队的队长邹家尤交回学校来接受学生批判，主要要求就是这一条。可是地质部的部党委就拒绝接见学生，而且坚决不同意这个要求，学生就火了，调子就升高了，朱成昭升的调，就不是要揪邹家尤一个人了，是要批部党委了。朱成昭的思想就是要通过这个打部里嘛。他去的时候他跟我谈，如果地质部不答应这个条件，我们就趁这个机会闹下去，就要揪斗何长工，批判何

<sup>8</sup>最早一两次开会叫联络组，因为不是一个系的，大家还不太熟悉，当时能够成立战斗队往往都是观点一致又特熟悉的几个人，跨班跨系还是第一次。后来还是决定成立战斗队，起名东方红战斗队。

长工。提出五条，第一条，就是交出邹家尤，必须到学校接受批判，何长工也必须到学校接受批判，第二条就是改组部党委，不达目的誓不甘休。那个时候还没有提绝食。

没绝食也没饭吃啊，从上午到晚上，地质部就调动西纠把我们给包围了，西城区纠察队以正牌的红卫兵揪打我们的人，把头发剪掉，用皮带抽，说我们是狗崽子造反嘛。那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西纠就是保爹保妈派的吧。地质东方红和西纠联动的关系从开始就是对立的。

事情是怎么转折的呢？他们在地质部闹的时候，我回到学校里，想给他们送饭去，我就找搞后勤的人说学生一天都没吃饭了，你有没有办法给学生搞点吃的，一天都没有吃饭了。我回学校来了后，这时办公室的人就领一个人进来了，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名字叫肖力，“兹介绍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肖力同志到你校联系，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当时我不知道肖力就是李讷啊，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她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非常高兴啊！李讷就让我汇报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她讲了一下。然后李娜就表态，说中央文革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给地质部提出一些对工作队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从策略上来讲，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样做会使你们很被动，因为目前不可能改组任何一个部党委，你们提出来改组就改组？也不能把何长工揪到你们学校来批斗，所以你们提这么高的要求会使你们非常被动，第二条就是肯定了一条，说你们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当时我们学校和我们对立的观点是血统论观点，我们反对谭力夫的血统论，从他的血统论出来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反对的，这也是我和朱成昭的思想。通过学习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统一战线的方针，认为谁打日本人谁就是革命的，谁反工作队我们就团结，只要反对工作队就可以加入东方红公社，至于是不是红五类，是不是红卫兵无所谓，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后来成立了，他们反对我们这个方针，必须是红五类，将来你出身好的你可以成为骨干，“东方红”不采取这个方针，东方红总部和各个系的负责人在争吵，我是支持朱成昭这个观点的。所以我给肖力的汇报突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肖力说，你们执行了正确的阶级路线，血统论是错误的，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她说，你赶快到地质部去，告诉朱成昭，把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的意见告诉大家，要准备把人撤回来。

这是北京市第一起学生冲击部的事情，总理的秘书也打电话来了，传达总理的意见，也劝我们回去。当时我在地质部，我接了电话，我把肖力的意见也告诉大家，我在大会上讲，中央文革派人和我们联系来了，说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但是我们目前提的口号不合适，希望我们回学校去。

中央文革说话了，总理也说话了，大家就撤呗。撤回来之后，总理也指示部

里，同意工作队回学校接受批判，所以部里也答应了这一条，我们也有台阶下了，我们也就撤回来了。<sup>9</sup>

撤回来的时候都快天亮了，已经早晨 4 点钟了，在大操场上，我就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东方红公社确定一个方针，就是凡是批判工作队的，都可以参加东方红公社，这是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这个问题就不要再争论了。8 月 24 号凌晨，东方红的队伍就撤回学校了。

当时不叫批判会，叫辩论会，校文革是当时工作队在的时候成立的，校文革掌权，校文革有个红卫兵大队，是红五类，一个系一个中队，全校是个大队<sup>10</sup>。他们的势力相当大。

8 月 24 号就开了一个大辩论会，当时何长工没来，陶鲁笳来了，陶鲁笳负责带队来了，当时邹家尤几个副局长都坐在台上。我是当时大会我们这一方的执行主席<sup>11</sup>。这次辩论会大获全胜，辩论会从晚上 8 点辩论到第二天早晨 6 点<sup>12</sup>，折腾了一夜。不光是我们学校的，别的学校也来了，上万人吧？我们（东方红）当时人很少，几百人<sup>13</sup>队伍，坐在台前。

老保在这次辩论中的失败主要是叫他们自己的行动给闹坏了的。他们在台上打我，要把我从台上赶下去。我们班上有几个是团支部的干部，知道我家里的情况，说我是狗崽子，跳上台说，他父亲是叛徒，他根本没有资格代表红卫兵在台上主持会议。要把我从台上轰下去。我说我是东方红公社代表，不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有权选你们的代表，我们有权选我们的代表，你们没有权指定我们的代表，东方红公社的人拥护我在这里主持会议，我就问陶鲁笳他们这是不是无理取闹，陶鲁笳说对对对，你是执行主席，你是你们这派的嘛，一边一个对等发言辩论。他们闹腾完了，我说我发言，讲了一个多钟头，就给工作队定了调子，我定的调子不算很高<sup>14</sup>。朱成昭后来说我右，正是右，得到许多中间群众的拥护，我说工作队绝大多数人是好人，属于好人犯错误，工作队有极个别人，可能受修正主义毒害比较深，是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

（此处换第二盘带）

<sup>9</sup>这段过程在采访时记忆比较模糊。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知道，撤回之前，北京新市委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由陶鲁笳召集了地质部和地院两派学生代表在北京市委开会，会议直到 8 月 24 号凌晨三点才结束，两派最终达成当天（24 号）夜里，由陶鲁笳主持，地质部领导、邹家尤等听取意见，不同意见可以辩论。这就发展成了著名的 8·24 大辩论。参见《昨天》73 期《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sup>10</sup>院文革是工作队撤离之前安排由保工作队的师生组建的学校权力机构，代行原工作队职责，因原院党委和原行政已被工作队夺权，工作队撤走后不能形成权力真空。全院保工作队的各战斗队联合成立了“斗批改兵团”，其中的红五类组成“斗批改红卫兵”。可参见程关林的回忆录《被遗忘的群体》，载《昨天》54 期。

<sup>11</sup>回校后，8 月 24 日上午，“东方红”和院文革、“斗批改”又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对晚上的辩论会的组织方式和程序达成了协议。这个谈判朱成昭全程参加了。辩论双方在主席台上各派两名代表，一名首席代表，一名主辩人，朱成昭是东方红的首席代表，我是主辩人。采访中所说的“执行主席”不准确。

<sup>12</sup>不同人回忆时，有说叫 8·23 大辩论，有说 8·24 大辩论，我们多习惯叫 8·24 大辩论。

<sup>13</sup>我记忆中就是八百多人，有人回忆说有上千人。

<sup>14</sup>当时中央把工作队分为四类，第四类就属于敌我矛盾了，我说工作队是 3.5 类，检查得好，可以回到第三类，态度恶劣就有可能滑到第四类。

我说中央文革的一个同志，亲自告诉我，说我们执行的阶级路线是正确的，底下人哗的上台来，要参加东方红公社，东方红公社就把东方红袖标给跳上台的了，把袖标都带上了，一下就一千多了。从那天起，保守派就散了，队伍散了，人心也散了。好多人宣布参加我们“东方红”，有的不参加但也退出他们的“斗批改”。从那个时候对参加东方红公社的条件就是不看出身，只看反工作队态度积极不积极。

### 周永璋串联成立三司

这个期间周永璋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到北京市（各高校）串联去了。当时北京市成立了一司、二司，成立了两个司令部，我们也派代表找这两个司令部去，我们也想参加他们的司令部。当时他们不让我们参加，因为我们的阶级路线，另外一条是调子太高，当时这两个司令部保守组织都参加了，不是反工作队的，而我们是纯反工作队的，所以这两个司令部都不让我们参加。

这样周永璋就火了，我自己闹个司令部，我就要反工作队的！他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大学去串联，大概串联了邮电学院、林学院、钢铁学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第三司令部。当时就找了刘志坚，既然是一视同仁，就给我们一席之位，当时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也给我们一个三司的办公室，他们有汽车，有打字机，三司什么也没有，总理就让刘志坚给予支持。这样三司的牌子比他一司、二司响亮，只要造反的，不要保守的，比他们吃香就在这地方，而且叫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周永璋他发起串联的，所以他就是最早的三司司令，大家就这么叫吧，是勤务员吧。

朱成昭后来就对周永璋这点不满，认为周永璋凌驾于他之上了。他后来搞了一个“政变”，怎么“政变”的呢？他把各个学校的头召集起来开会，说三司不应该推选某一个人作为核心组的领导成员，而应该选几个学校担任三司常委，作为司令部的常委，至于这个学校的组织派谁来代理，由这个学校的组织来决定。这个观点得到了在三司没有地位的人的赞成。原来由开始发起的五六个人形成的核心组成员，就被学校委任的人给取代了。地院东方红成为三司常委，朱成昭作为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理所当然地就取代了周永璋。但是，一开始并没有把周永璋撤回，同意周永璋做为代表在这主持工作。后来我们反朱成昭了，才把他撤了<sup>15</sup>。

这时东方红公社就比较壮大了，就派人到各个学校去串联，凡是要求成立这个组织的都叫东方红公社，都派人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凡是叫东方红公社的，都是地质学院派人去的。有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在学校只有几十个人，他们开成立

---

<sup>15</sup> 派了田春林代表朱成昭。

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派一千多人<sup>16</sup>去支持，烘托气氛。

## 二进地质部与朱蔡分裂

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是地质学院，不是北京市革委，地质学院的成立革命委员会比北京市还早<sup>17</sup>。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地质学院“东方红”分成两派了。主要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朱成昭二进地质部，因为我反对二进地质部，朱成昭就批判我。

二进地质部，朱成昭的意思，他认为部的矛盾没揭开，部党委的人一个人也没有挨到批判。二进的借口是什么呢？是帮助地质部的群众起来革命，同时要交出邹家尤到学校接受批判。因为第一次接触后就再没见过面。部党委也不答应了，调子就相当高了：坚决改组部党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于是学生进驻了，把各个办公室占领了。第二次西纠就没有了，已经解散了不存在了，变成联动了吧？

18

二进地质部是9月底10月初吧<sup>19</sup>，还有一个夺电台的事件，我知道朱成昭的这个意图，他是指向总理的嘛，他跟我讲，中央有三条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是正确的，以刘少奇为首的是右倾的，以周恩来为首的是形左实右的，重点是攻总理。我对搞刘少奇我也不同意，当时我还发表一个声明。就是有人要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传出之前，有人开始批刘少奇，我当时是东方红公社的政治部主任，大事都要表态，我不参与批刘少奇，我说刘少奇的事由中央来解决。因为这几个问题吧，朱成昭就说我右倾，开会我就跟他们辩论，朱成昭采取了撤周永璋的办法，他也没让我参加开会，说撤销政治部，也没有说开除我，还派些人监视我。

我当时也无所谓，我就发表声明退出<sup>20</sup>。东方红公社下面我们又成立一个小组织，东方红公社造反兵团，有五六个人吧<sup>21</sup>，当时经常参加总部活动的几个成员退出之后，我们就和朱成昭对着干了，他批判我们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 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和王大宾执掌“东方红”

<sup>16</sup> 夸张了点

<sup>17</sup>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7年4月3日，后更名取消了“东方红”三个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4月20日成立。

<sup>18</sup> 实际上西纠在二进地质部期间的前期一直在捣乱，后来就不怎么来了。

<sup>19</sup> 9月5日开始进驻，到9月19日大队人马撤回，还留有少部分人长期驻守。

<sup>20</sup> 我的声明是退出总部而不是退出东方红公社。声明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意是：我作为东方红革命队伍的创始人，我十分珍惜爱护东方红这个战斗集体的荣誉和革命精神，退出总部是为了更好地和总部某些成员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因为朱成昭虽没有公开宣布把我开除总部，但实际上已把我和总部隔离了。所有会议都不再让我参加。还不如自己主动宣布退出

<sup>21</sup> 实际上只有四个人。

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是戚本禹主持的，戚本禹，还有一个叫周景芳的到我们学校来<sup>22</sup>，他说东方红公社成了你们学校唯一的一个革命左派组织，当时保守组织早就垮台了，不像有的单位保守组织还在，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他说你们应当掌握政权。当时地质学院只有一个组织，就一个东方红公社，成立的时候，戚本禹指示说蔡派不许进入革委会，叫朱派、蔡派嘛。

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朱成昭就已经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三进地质部的时候，朱成昭提出口号：由东方红公社派工作组到地质部去，这是戚本禹支持的。朱成昭就坐镇地质部，他当时要增加 200 人的电话交换机，和全国联系：我要在地质部指挥全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叶向真，认识叶向真是在三司，叶向真经常去三司，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后来我们因为反朱成昭嘛，也整理一些朱成昭的材料，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的思想有另外一面，他从来不反对刘少奇，这是当时他和别的学生不一样的思想，他不反彭德怀，他抓彭德怀是要保护彭德怀，这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过程是和叶向真接触后产生的一个变化，抓彭德怀就是在这之后，不是在这之前。

我因为退出东方红之后，10 月底吧，我也出去串联去了。我也没有走多远，大庆、沈阳。回到学校来后，朱成昭就找我，商量联合起来怎么干，他说原来批你右倾不对，他说北京要成立一个批判彭罗陆扬的联络站，由你去主持去。我说，我还是右倾我不去，我始终反对这个打呀，批呀，斗呀，坐飞机啊，我一见就烦，我跟他一个分歧，我最反对抄家，这挡不住，我说写东西从思想上批判就行了，搞那个形式没用。学校任何一个批斗我都不参加，当时批邹家尤啊，旷伏兆啊，我都不参加会议，有时候看一眼就走了。我说这你都知道，你让我参加那玩意，我不去。他说那你组织学农。朱成昭说革命要向农村发展。我说这个行，我就到农村做做调查。

当我从农村回到学校后，王大来从四川回来了，向朱成昭汇报，我恰好在场。他在成都找到了彭德怀。朱成昭说那你还不把他带回来，带回北京来？他说，笨蛋，快去，把他带回来，他说中央已经让北航去抓彭德怀去了，不要让他落到他们手上去。这时候王大来就有些犹豫，他说这老头挺好的，不错，我不忍心去抓他。朱成昭说，他妈的，我叫你抓他也不是叫你整他的，你不把他闹来，别人就把他闹走了，老头子就倒霉了。当时就给王大宾打电话，叫王大宾去四川指挥抓彭德怀。当时王大宾在外面串联，让王大来马上去成都去，把彭德怀弄到我们学

---

<sup>22</sup>准确的史实是：戚本禹 1967 年 3 月 5 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布朱成昭闭门思过，王大宾主持工作，委托周景芳帮助地院成立革委会。详细内容参见《昨天》第 54 期，蔡新平：“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

校了。

这个时候，朱成昭形成了一系列跟中央文革对着干的思想，跟我说，中央文革犯了组织上的错误，现在是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这是第一条，组织上的错误，然后他说，江青不行，这个事情叫她搞坏了，她实际上是不信任我们的。朱成昭的野心是挺大的，他要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这个叫中央文革给顶住了，他的目标是当总理，野心大着呢。当时他已经对江青这人看法很不好，把红卫兵作为攻击她的目标，由全国的红卫兵联合起来，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另外他从叶向真那里听到中央内部头头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对江青就相当反感。当然这个事情也传到中央文革耳朵里头了，就决定开除朱成昭。

后来戚本禹就召集“东方红”的开会，把我也叫去了，说你们是全国最有名的左派组织，你们应该成立革命委员会，朱成昭因为在与中央文革对立，他现在停职反省，不再主持“东方红”的工作，现在你们推选一个人。实际上王大宾就是这个时候上来的。当时戚本禹认为蔡新平思想一贯右倾，他不能主持“东方红”的工作，建议王大宾主持工作。“东方红”核心组原来有五个人，朱成昭、蒋良朴，我、王大宾和朱德瑜，王大宾当时是组织部长，王大宾更倾向支持朱成昭，但对朱成昭也批一下，比较听话，戚本禹就欣赏这一点。

### 高元贵与“蔡派”

(该部分磁带坏了，转录后很不清楚，原录音大部分内容都缺失了)

高年级就比较成熟一些，……一共 135 个，我们这边，就是蔡派观点的大约



122 个。……<sup>23</sup>一成立革命委员会，戚本禹就指示……老师们的理想就跟我的一样，是比较右倾的多。高元贵也结合到革委会了，高元贵跟我们（二团）是最好的了，现在跟我的关系也很好，凡是到高元贵那调查我的，高元贵一听是整我的就把他们教育一番，说“我就是蔡派的”，给推回去。工作组也批判他，何长工也撤他职了，他反而在群众中更有威信了，东方红公社分成两派辩论的时候，他公开表态支持我，支持蔡派。这样他就得到了绝大干部的拥护。（左图：1967 年时的蔡新平。）

这个老头本人的作风也是很不错的，王焕是大家最恨的，一直到后来也恨他，

<sup>23</sup>这段话因录音已经缺失或听不清楚，笔录无法还原。据我回忆应该是指当时的地质系参加“红教联”的老师总数 135 人，蔡派观点的就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在成立革委会时，无论他们如何阻挡蔡派进入革委会，也无法阻止地质系中代表蔡派观点的老师进入革委会，因而岩石教研室老师叶德隆进入了学院革委会，支部书记郑伯让老师进入了地质系革委会并任副主任。

王焕是后来地质学院搬迁到武汉去，地质部让王焕当党委副书记（高元贵恢复党委书记兼院长），现在退休了也没人答理他。他在学校一直没有威信。……

### 蒯大富、聂元梓与我的关系

我们地质学院成立东方红公社的时候，蒯大富在他们学校还是光杆，他跑到我们学校来住着。有一次肖力到我们学校来，问蒯大富干什么呢？他在学校里没势力，孤家寡人，他老呆在我们学校，肖力就找他谈，说蒯大富你的根据地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全国落后了，地质学院在全国是个非重点学校，扛起大旗来了，清华大学是最有影响的学校，你跑到这里来了，你在初期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你的阵地应该在清华大学。

我们说你回去吧，没人给你贴大字报造不了声势，我们帮你贴去。我们一夜就把你们学校的大字报栏盖上。真的，我们到清华大学帮他贴大字报。你把反工作队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你自己的组织。他那个时候害怕，在学校挨整之后，像<sup>24</sup>后来就是清华的骨干成员。我们当时就是谁反工作队最积极，对工作队批得最积极，我们就找谁，他就不敢去找，所以他闹不起组织来。我们的队伍发展那么大了，他还躲在我校。我们是凡是哪个学校成立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我们就去给贴大字报，一晚上，写标语口号也行，写什么都行，抄什么也行。

他和我们关系不错，他和朱成昭后来有矛盾，他和王大宾有矛盾，他反王大宾这个人，他和韩爱晶特别好，他跟我呢，可以，因为我反王大宾，所以他跟我可以。当年我去东北，因为武斗，一些人跑到北京来找我，我在学校也没有势力，管不了他们，我就把他们放到清华，他管他们吃管他们住。

我跟聂元梓也不错，我被地质学院打出来后就住到北大，住在北大的专家楼，我就在那儿住很长时间。王大宾抓我的时候，就出来一帮人保护我。卢平，跟北大校长的名字发音一模一样，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聂元梓是革委会主任，卢平是新北大公社社长，一个革委会，一个群众组织，地质学院就没有革委会再加个群众组织<sup>25</sup>，跟他们不太一样。

### “杨、余、傅”事件后高校两派斗争升级和校内武斗

王大宾成为革委会主任后，就选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是 1967 年的 4 月份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后来主席就号召大联合，办高校两派组织的学习班<sup>26</sup>，地质

<sup>24</sup> 这个名字听不清。

<sup>25</sup>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东方红公社的作用就自动消失了。

<sup>26</sup> 1967 年底到 1968 年 3 月。

学院没有两派组织，但是有两派，我就作为我们这派的代表，参加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在北京高级党校住了好几个月。聂元梓也在。

高校两派学习班瓦解，就是因为杨成武事件。那时高校两派辩论最多的时候，戚本禹下台了。我们这一派是批王关戚的。两派办学习班的那天，中央文革接见两派头头，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两天会，让我发言。当时韩爱晶他们北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他说他不干了，要到农村去。

辩论的关键就是“二月逆流”，对“二月逆流”对还是不对，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逆流”就是王关戚栽赃老干部、整老干部的。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会上江青老是追问这个问题。王大宾他们认为“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的。

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我遇到肖力了，她没坐在台上，前排坐的都是总理、陈伯达、康生，然后就是江青，那边就是李先念什么的……当时阵线就很清楚了。第一天陈伯达主持会议，让畅所欲言，随便说。第二天肖力遇到我了，问我，你有什么意见，也没听你发言。我说我算什么呀，人家都是五大领袖，我也不是哪个组织的。她说你有什么看法，她说人家都抢话，我说我不抢。她说你给江青写个条子吧。我就给江青写个条子，我说我对他们谈论的问题也有一些看法，希望允许我发言。江青就念了这个条子，来请蔡新平讲。我讲话的中心就是认为王关戚就是“二月逆流”祸根子，他们就是整老干部的，中心就讲这个。聂元梓也同意这个观点，大体上同意。蒯大富狡猾，他不涉及这个问题。

我发言那天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完了，中央文革也没表态。第三天开会的时候，邮电学院还是政法学院呢，他们一个常委，他比我讲的观点还多一点，他讲了一半，江青就拍桌子了，说，你认为没有二流派，我看你就是二流派！当时大家就傻眼了。张春桥也起来发了言，康生也讲了一通，之后就没让学生再讲了，就他们讲了。形势马上就起巨变。

当时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还没有回到学校呢，王大宾就组织人把我的宿舍、办公室全部抄了，说蔡新平是二流派。当时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就办不成了，北京市两派就打起来了。

大约是1968年3、4月吧？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就散伙了，聂元梓就找我，她说，江青接见了她，单独接见了她，第三天发火的时候就点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名字了，江青说要去抓人，然后要抓杨、余、傅的后台。聂元梓说江青跟她说要抓后台，聂元梓连夜派人来找我，她问杨、余、傅的后台是谁？聂说，我看是谢富治吧？我说不对吧，我看谢富治跟江青跟得挺紧的。我说是不是要搞叶剑英啊？她坚决要干谢富治。我说你一定要干，你派个战斗组去试探试探中央的意图吧。结果她就弄谢富治了。她搞错了，对江青的意图体会错了，后

来江青就开始办她了。

当时军人在台上的就只有叶剑英啊，能在那指挥军队的只有叶剑英了。中央怎么干预这事情，总理怎么平息这事情的我就不清楚了。北京武斗的升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派还没有什么武斗，打一打，闹一闹，有天派、地派。杨、余、傅事件之后，北京市两派，以聂元梓为首的叫炮轰派，炮轰谢富治。王大宾为首的要抓小爬虫啊，开始和聂元梓公开地对着干。王大宾是保谢富治的。矛盾的焦点就是围绕中央指向的这个“后台”到底是谁，是谢富治，还是叶剑英？所谓“抓军内一小撮”就是天派、地派几个头头个人观点不一致，他们的矛盾是在向中央文革争宠，每个人都在琢磨中央文革的态度，都在押宝。聂元梓也在押宝，可是也没押对，宝没了。韩爱晶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态度，蒯大富我倒知道一点。所以，聂元梓、王大宾和谭厚兰，我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已经回忆不清楚了。

砸民委档案，这一批材料被抢走之后，好多人就暴露了，据说在国外就被收拾了。朱成昭介入了这件事，朱成昭是不是也想搞这些，我就知道了。

天派、地派，聂元梓跟他们是不太和的，这五个人中，她是比较孤立的。韩爱晶和蒯大富观点比较一致，王大宾和谭厚兰比较一致。我们认为，谭厚兰跟《红旗》杂志社，她是王关戚的小爬虫，小爬虫的小爬虫，王大宾是戚本禹支持上台的嘛，所以戚本禹下台之后，大家就认为王大宾是跟王关戚一伙的。王大宾就抓住聂元梓炮轰谢富治，就抓住这一点，互相就揭发，为争宠搞臭对方，争北京市革委会的中的领导权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王大宾嘛，感觉江青并不太赏识他，他实际上没多少能力，领会中央精神也老领会不对，老是闹麻烦，底下叫什么敢死队的，红色尖兵之类的，经常到外面闹事去，制造很多事件，串联在外面制造一些事件，添乱子。

### 一些有关情况的简要交代

(转录第三盘)

这些情况吧，你要有机会到天津去找周永璋聊聊，他在天津冶金地质研究院，在大学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叫“二团”，我们一共八个人，是他召集串联的，他没有参加核心组，我说八个人是反朱成昭的铁杆，八个人都是东方红总部和三司的，一个是周永璋是三司司令，一个是三司的后勤部长邱世涛，一个是什么联络员，他们四个人是三司的，我们四个人是东方红总部的，叫“二团”，他们四个人叫“6·20造反兵团”，我们叫“东方红造反兵团”，八个人合在一起叫“二团”，就是跟朱成昭和王大宾对着干的。

(朱成昭、蒋良朴)最初对他们是刑满释放，后来改为无罪释放，后来就彻

底平反，因为他们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朱成昭一看中国没戏唱了，他就要出国，当时是把他从广州抓回来的，他跟叶向真一块去广州，当时他们里边有个叫梅建民的……因为他们大部分平反了之后就留校了，除了朱成昭没有留北京，回上海外。一直审查不让毕业的，大概有十来个人吧，除了少数人不在地质大学外，其他都留在学校了。现在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武昌的华东工学院的旁边。找他们谈谈经历吧，要说知道中央的内容他们知道的比我多。

我考的中科院地质所张文佑的研究生，他是所长。我一毕业就让我留在北京了，负责一个五年的大课题，国家和中科院的重大项目。还不到三年老先生就去世了。因为老先生跟所里党组织的头头有些矛盾，老先生死了，他们就闹到我头上来了，我也不是党员也整我，成立个专案组，查我“三种人”，撤我课题组长。

所谓保守的大部分是党员多一点，听党的话的，不像我们总有一些想法。

谭力夫造了一阵子，谭力夫是大学生，但他的影响在中学生，没有多少道理，在大学里他的影响有限。主席毕竟还有话嘛，“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加上中央的人有几个出身好的？少数出身好一点，但是没有太大作用。在大学生里这一点大家还是比较明白的，不少人并不在乎。学生里头主要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思想有头脑的，跳得高蹦得高的，响应的人就多。当然有些人也是有野心的啊。有的人政治上特敏感，思想特活跃，他们看问题比较深些，在事情一开始感觉要出大问题。另外一些人也有一些看法，但思想基础不够，没有坚定的思想，一般就是跟着干。还有些就是混，没什么头脑，一看抄家他们也抄家，揪斗打人特积极，在外面冲锋陷阵，搞武斗很起劲，莽汉武夫一个……

文化大革命真是扯蛋！

（这是最后一句话，录音带在此终止）

2013年～2017年整理  
2017年11月26日完成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8年2月28日《昨天》第107期）

编者按：

蔡新平：文革研究学者，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5632班）

# 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伏庆是

作者简介：伏庆是，1944年出生，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文革中曾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办公室主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委会办公室主任。1968年5月至1986年10月被审查。2004年从湖南省地质研究所退休。

## 一、缘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名教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领导，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公开向全国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用当时的话说，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京高校的学生们纷纷放下书本，走出课堂，涌向北大。此时的北京大学已是一片沸腾，大字报铺天盖地。同学们认真地将北大的大字报以及各种见闻记录下来，回校后再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北大的“革命火种”由此形成燎原之势，北京高校停课闹革命由此而始。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3年级11631班学生，22岁。我是6月2日早餐后，在食堂去教室上课的路上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广播的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听到广播后，立刻就有许多同学结伴去北大看大字报，有的则回寝室准备写大字报。

下午，校园内已出现了不少大字报。最初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是转抄北大的大字报和北大见闻，或是笼统地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重用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

不料第二天出现了大批给院领导歌功颂德和“警惕右派翻天”之类的大字报。这显然是当权派在幕后支持，压制文化革命，后被称为“6·3事件”或“6·3

反扑”。学校由此形成了揭批院领导和维护院领导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不久，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又参与了反对地质部派来的工作队的活动，持后种观点的人大多又力保工作队，从而有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

与当权派的意愿相反，“6·3事件”激起众怒，针对院党委和院领导的大字报反而更多了。大字报的矛头大多指向副院长周守成。周副院长五短身材，肥头胖脑，恰似漫画里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他曾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院党委表态，提出大字报要划分区域、各个系要成立编辑组审查大字报稿子、不能超出报纸上已经点到的人的范围等5条规定，给学校的文革定了条条框框。很多人因此认为他是“6·3反扑”的幕后操手。其次是院长高元贵。高院长原本是院长兼院党委书记，是一位睿智而又慈祥的干瘦老人。他与胸无点墨纯粹吃政治饭的领导不同，是一位饱学之士，能与那些资深教授吟诗联对、谈笑风生。据传高院长还是个爱才的人，保护过所谓的“右倾”和“反动”学生。1964年，高院长在一次批判“毒草电影”《早春二月》的大会上，公开宣称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早年也干过类似影片男主角肖润秋干过的事情（片中孙道临扮演的青年知识分子、小学教员肖润秋，因同情和帮助他班里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上官云珠扮演的一位贫苦的年轻寡妇而遭人非议，愤然出走，投身革命），引起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文革前夕，地质部派了王焕来地院任党委书记，免去了高院长党委书记职务，不少人为其感到不平。那些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高院长的。

那时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社会上不时传来“阶级斗争新动向”，简直是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说什么《中国青年》杂志某期的封底画上暗藏着反动标语，某刊物故意将一幅图片中的匕首对准毛主席的画像等等。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事。我班同学张绍宗在食堂吃饭时，随口说了一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不准确，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发展的，如果是顶峰，就不能发展了”，立刻遭到众多同学的围攻，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几乎当场就要批斗他。幸亏张反应快，马上纠正说顶峰也是可以发展的，珠穆朗玛峰不正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抬升吗？这才幸免于难。院办公室主任刘普仑，因自家客厅公然挂着一幅裸体女人油画被揪了出来。我看到不知哪个班的一些同学拖着他往大操场走。刘也算是一位老革命，曾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此时的他，像是瘫痪了一样，任人拖曳着，低垂着头，鼻涕流到了胸前的衣服上，狼狈极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批斗人，非常震撼，心惊肉跳。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有个十分温暖的大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员，上面有1个姐姐和4个哥哥，倍受父母和姐姐哥哥们的呵护照顾。我在学校也是个老师

喜欢的听话学生。我的小学、中学时光是在幸福、温情、无忧无虑中度过的。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和课堂中得来的。凡书本上写的和老师讲的，我都信以为真，完全没有生活经验，不知社会的复杂。进入大学后，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教室和宿舍，不过问身外的是是非非，与世无争。我是个不喜欢主动与人打交道的人，跟老师们也很少接触。回想起来真是惭愧，至今我都不知道我们班女同学的宿舍在哪，许多老师的名字也没记住。6月2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由于我对院领导以及老师们的事情一无所知，写不出大字报，所以不知该干什么，除了非参加不可的集体活动外，其余时间便无所事事。直到“6·20运动”爆发，我才真正卷进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之中，并且差点被淹死

。

## 二、6·20

6月13日，地质部文化革命工作队大队人马开进地院，进驻到各个班级。不久，在工作队主持下，成立了以那些维护院党委和院领导观点人员为主的全院和各个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以为地院的文化革命从此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改变目前的乱象而步入正轨，便决心积极投入运动。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在运动中锻炼自己，争取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出人意料的是工作队在14日就把高院长推了出来，让他在全院大会做检查。同时，工作队热衷于组织教师和干部揭发、批判各教研室和各行政部门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据说还给其中一些人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人。大家认为是“6·3反扑”幕后人的周副院长等却与工作队打得火热，安然无恙。

地院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为数众多，很多人认为工作队把矛头指向他们，是为了保护周副院长等人。还有人认为院级领导中，大家对高院长的意见相对较少，工作队唯独要高院长做检查，明显带有偏向性。于是院里又出现了怀疑、质疑甚至反对地质部工作队的言论和大字报。

6月20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正在宿舍里闲聊，田春林从外面进来，对大家说：“刚才李贵登台讲话了，讲得好极了！”他把李贵的情况讲述了一番，说李贵是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是一个出身贫苦的老干部，不满院领导和工作队的所作所为，决心豁出20年党龄，挺身而出，公开向院党委和工作队开炮了。田春林提议我们去拜访一下李贵，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们走出房门，在楼道上看到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拿着声援和支持李贵的大字报急急忙忙奔下楼去张贴。

来到院办公楼（九楼）117室李贵的办公室，看到里面已有不少人，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在激动地讲着话。问了先到的人，才知道他是教辅处副处长王煊堂。

他讲话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隐约记得他把地院的文化革命分为 4 个阶段，把院党委内部的派系称为“三驾马车”，工作队偏袒周守成，打击高院长。他还介绍了当日早晨他和李贵等人到国务院上访，反映工作队问题的情况。说李贵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等。

王讲话过程中，不断有人挤进来，屋里塞满了人，后到的只能站在办公室窗外听。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个个表情庄严，神态肃穆。王讲完了，院图书馆馆长见秋紧接着说：“我是见秋，我了解李贵。李贵是个好同志，我支持他，他过去很苦……”说到这儿，他用手掩面，抽泣起来。听讲的人大多跟随他哭了。肃静片刻后，不知谁带头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坚决支持李贵！”“化悲痛为力量！”……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田春林说道：“现在首要的是要保障李贵的安全。”这句话让大家冷静下来，几乎人人都举起手，要求加入保卫李贵的行列。

此时，挤在窗外的人群要求王煊堂再讲一遍，王就站在窗台上讲起来。有人提议室内的人到别的房间去，这儿让王演讲，于是大家就转移到对面的 109 室。到了 109 室，田春林说：“我们这样太乱，是不是愿意保卫李贵的人把名字留一下，以便统一安排。”大家就把名字和班号、宿舍写在纸片上，临时推举了几个组长负责收集这些名单。名单共有四十多人，除了各系的同学，还有几位学院里的工人。田春林自然成了保卫李贵的召集人和负责人。有一位叫万天丰的普地教研室老师，自告奋勇愿和田春林一起负责。不久，除了田、万、李贵及几个临时选出来的组长和我，其他人都各自回去吃午饭了。留下来的人中，有人说李贵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田春林就让金同恩等 4 人护送李贵到万天丰的宿舍休息，让我和另外几个人把王煊堂的演讲记录整理一下，出个大字报。我说我不去，我在这里帮你出主意。田春林就让段会恩、陈铭及物探系的杨菱等人整理。当晚，他们编写了大字报《李贵、王煊堂访问记》，贴出去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屋子里只剩下各系几个组长时，我向田春林建议：“工交党委来我院调查情况的同志不是已经到了吗？我们下午可请他们与李贵见见面，让李贵把他的意见都反映上去，我们这些人也旁听一下，一方面可以做记录，一方面也可进一步了解李贵的观点。”我还建议晚上找个时间让各系组长再来碰个头，把今天的情况讨论一下，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田春林根据我的建议决定下午三点半请工交党委的同志到办公楼 403 室接见李贵，晚上凡报名参加保卫李贵的人都来碰头开会。他布置完毕，将写有报名人员名单的纸片交给已经吃了饭的物探系同学余久芗，让他整理一下，我们便也去吃午饭了。

我在饭厅吃饭时，顺便问了食堂大师傅李贵这人如何，他们都说此人不错，很朴素。此时，只见食堂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高呼着支持李贵之类的口号，

准备游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聚集起来的，只是觉得群情激昂、场面激动人心。

饭后已是下午三点钟，我来到办公楼 403 室参加与工交党委来地院调查的两同志的会晤。在场的除李贵、王暄堂、田春林外，还有我们年级的姚瑞林、勘探系 21641 班的王北宁等。王暄堂本想将他上午的演讲重复一遍，但工交党委同志没听完就打断他的话，说是时间有限，让他说得简单些。王只好粗略地讲了一下。李贵接着也讲了几句，大意是说工作队和院党委自运动以来，批斗了不少人，但只斗小的，不斗大的等等。李贵文化程度不高，他的原意大概是说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但他没能说清楚。工交党委同志似乎有些不耐烦，未作任何表态就离去了。

我从九楼走回宿舍时，看到许多人围在十二楼前高呼口号。原来是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在发表演讲。他说他受李贵、王暄堂的委托，代他们向支持他们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后来又说了一大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话。我在人群中看到 11632 班的黄占起，问道：“运动以来江老师一直没出头露面，今天怎么登台了？”黄说江老师始终对运动很关心，觉也睡不着，每天坚持学毛选 3 小时，终于发现了工作队的问题。

我听后十分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我们算是有了依靠，可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运动了。于是跑回宿舍，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一张号召同学们“团结在李贵和江祖如同志周围，揭穿一切阴谋诡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书”，署上我和田春林、黄占起的名字贴了出去。围观的人说，只能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怎能团结在李贵、江祖如周围？我马上醒悟过来，吓得半死，立刻做了纠正。当时幸亏没人再追究，不然可是不得了的大罪过。

当晚，因为工作队组织各班讨论真假左派的问题，原定报名保卫李贵的人员碰头会推迟到 10 点钟才开始。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余久芗介绍了物探系讨论的情况。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这些人成立一个保卫李贵的组织，这组织没有党的领导，属于什么性质呢？勘探系的于众发言，也是这个意思。田春林要我讲讲。我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因保卫李贵的共同心愿而碰到一起的，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也不可能成立什么组织。于是，保卫李贵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当我们这些人在为保卫李贵而费心劳神、纸上谈兵的时候，校园内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李贵、反对工作队的游行。我下午在十二楼前看到江祖如老师演讲的时候，示威游行已接近尾声。

据参与者叙说，游行的有几百至一千人。游行队伍沿北五楼前的林荫大道西行至家属区，往南经游泳池转向东，再沿南五楼前的林荫大道东行，最后停留在工作队驻地学十二楼前，要求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出来与大家见面。

最初邹不愿出来，要大家推选代表与他谈。地质系的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物探系的庄一龙和吉让寿等 6 位同学进到楼内，经过说服，将邹副部长请了出来。有几个同学立即从就近的物探系食堂搬来一张桌子，请邹副部长登上桌子与大家对话。

同学们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求广播李贵的揭发材料并保证李贵的安全，还要求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邹家尤进退两难，哆哆嗦嗦的很是紧张，无奈之下，答应立即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这才解了围。

这就是 1966 年 6 月 20 日发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校园内的“6·20 运动”。

“6·20 运动”不但是文革中出现的首例“惊世骇俗”之举，恐怕也开创了中共执政以来青年学生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的先河。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即兴的，完全没有预谋策划、事先组织，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真实情绪；

其次，它是有序的，游行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也有不少人围观看热闹，但没有嬉笑打骂、出言不逊的，可谓秩序井然；

第三，它是和平的，游行自始至终没有超出和平请愿的范畴，没有肢体冲突，没有“挂黑牌、戴高帽、坐飞机”之类的“革命行动”。

在“6·20 运动”影响下，北京的高等院校接二连三掀起反工作队的浪潮。一些高校的工作队不得不撤离，还有一些高校的工作队虽然没撤离，但实质上已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地质部派驻北京地院的工作队却采取高压政策，对反工作队的师生员工实行清算。凡参与“6·20”游行、贴工作队大字报、给工作队提意见，包括我这样参与了流产的保卫李贵活动的人，都成了网中之鱼。

### 三、反干扰

21 日，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国务院工交口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等专程来到地院，为工作队撑腰。他们宣布撤销高元贵的院长职务，副院长聂克停职反省，称这是“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同时告诫地院的师生员工，“是否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否站在革命师生和工人一边，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他们组织拥护工作队的积极分子开会，给保守派鼓劲，还安排了一场游行，意在表明他们深受广大师生员工的拥护爱戴。但是因为绝大多数师生不愿参加，只好动员一些工人家属、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凑数。

“6·20 运动”让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也知道了学校上层的一些信息。譬如地质部工作队早在大队人马进驻之前就有小股人员来到地院了，并且与院领导勾结

得很紧，“6·3事件”就是工作队与周守成等共同策划和操纵的；工作队在组织揭批中层干部时，没有制止戴高帽和打人的行为，邹家尤还说“动一下手也没关系”之类的话；何长工与高院长很早就存有芥蒂，何长工说高元贵“三年没进地质部的门”，以示对高的不满；周副院长等有事没事就往地质部跑，向何长工等部领导汇报，从而得到部领导的信任，所以工作队是有意识的“打高保周”，等等。因此，尽管何长工等千方百计维护工作队，但大家对工作队的怀疑却有增无减，质问工作队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问题越提越尖锐。我也写了《回忆与对比》一文，把当前的情况比作新一轮“6·3事件”。

“6·20运动”的导火索是李贵和王煊堂的演讲，其实在“6·20”之前，就有不少教职工对院党委和工作队提出质疑。院党委委员、原院团委书记安静中在6月13日及以后数天里在多种场面向院党委和工作队提出意见，16日发出《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号召：“17级以上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向顽固堡垒——院党委常委会开火！”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离校后任北京市房山县官道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的王大来，返校参加文革。安静中与王大来串联了陆炎德、宋翔雁、唐振权等40余人，或以个人名义、或多组合，写了《质疑工作队党委》、《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处？》等重磅大字报，还上书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院和地质部文革情况，阐述对文革如何进行到底的看法。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计划建立材料组、出版组等。薄一波批示后，他们被压制下去，不然，北京地院的文革，很可能就由这些老师主导了。

工作队对质疑和反工作队的人和大字报又气又恨，除了由保守派出面与造反派辩论或谩骂、围攻外，还派人悄悄抄下大字报，备案存档，留待秋后算账。时至今日，这些档案便成了文革的史料。

6月25日，学校的广播喇叭突然反复播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院“6·20事件”作的批示：“如果再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这实际



上是将“6·20”定性为“反党夺权”。保守派听了这个批示欢欣鼓舞，扬眉吐气，造反派则如晴天霹雳，万分惊愕。

（左图：2016年两位老友在武汉留影，右为伏庆是，左为田春林。）

薄一波的批示使地院的形势急剧逆转，使文革运动变成“反干扰”

运动。所谓“反干扰”，就是把“6·20”游行、贴工作队大字报、给工作队提意见说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从而打着捍卫文革的旗号，对积极投入文革的师生员工实施全面围剿。

我和田春林成了班里“反干扰”的重点对象。工作队把“6·20”比作“匈牙利事件”，把那天我们商量如何保卫李贵的活动比作“裴多菲俱乐部”，组织全班同学批判我俩，要我们老实交代反工作队的问题。我俩若稍作解释，便被斥为“狡辩”、“负隅顽抗”，批判就会升级。田春林在“6·20”干的事比我多一些，“知名度”比我高一些，态度也比我强硬一些，所以对他的批判就更严厉一些。

在薄一波批示和“反干扰”的强大压力下，我不得不做了违心的交代和检查，前后写了4次检查和交代材料，共2万余字。我在交代和检查中将“6·20”前后见过的人、干过的事一一做了梳理，从“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根源”、“错误的严重性”几个方面做了检查。为了让检查显得深刻，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无限上纲，但实际上却是华而不实、空洞无物，就像如今的许多商品一样，西瓜大小的华丽包装里面，只有鸡蛋大小的实物，所以总也过不了关。工作队的最终目的，是要我承认主观上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好像我天生就是反革命，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们是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大多是四五岁的孩童，从小就受到共产党正统的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是无时无处不在的，甚至在初中的英语课本里也充斥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式的课文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的政治词汇。1960年，在大家都吃不饱饭的时候，通过参观“忆苦思甜”展览，听“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饭”，使我们虽然饿着肚子，依然觉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1960年代以来，林彪在军队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3年，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在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文，开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这一切，让我们这代人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担负着“反修防修”、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历史使命。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化大革命正是在共产党长期教育下听党的话、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表现，怎么反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工作队如此对待我们，实际上就是硬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后来据工作队成员揭发，当时工作队确实已拟定了一批反革命人员名单，准备运动后期押送农场劳改。所以要不是后来工作队撤离了的话，我们这些人无论如何检查交代，都逃脱不了

当“反革命”被劳改的命运。

就全院而言，对我和田春林的批判还算是温和的，不少人受到了更严酷的对待。李贵、安静中、江祖如、陆炎德等 13 位干部和老师被多次批斗，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被盯梢监视。李贵首当其冲，被人按住头，拳打脚踢。那时候，如果你被列为批斗对象，那么你过去的一言一行也都变成了反革命言行。一个往日被江祖如老师作为入党对象重点培养的学生，在江的批斗会上揭发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原来，该学生为争取入党，积极表现，夜晚熄灯后，还在楼道昏暗的灯下学毛著。有次被江老师看到，对他说：“楼道灯光太暗，别把眼睛看坏了。”这就成了反革命言论：学毛著只可能越学眼睛越明亮，怎会把眼睛看坏呢？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知道前途在何处。许多同学整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当时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挨不完的批斗，请不完的罪。”整个地院如同毛泽东在他 8 月 5 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说的那样，笼罩在死气沉沉的“白色恐怖”之中。

然而思想是不能压服的。有天晚上，我偶尔走到办公楼附近，突然看见路旁的大字报席棚上有一幅醒目的巨大标语：“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是鲁迅的名句，用在此时此处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幅标语没有署名，显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贴上去的。像是在黑夜里见到一丝光亮，我心头为之一热，压抑的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7 月 18 日晚上，工作组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邹家尤和国务院工交口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先后讲话。他们虽然依旧说“反干扰”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承认前一阶段工作队民主作风不够。这是破天荒的。工作队向来是一贯正确，怎么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呢？在讲到李贵等人的问题时，调子也缓和了许多。他们还表示绝不整学生，要把主要矛头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宣布周守成停职反省。凭直觉，我感到形势有了变化。果然，此后工作队似乎不怎么管我们了，也不要我们继续写检查做交代了。据传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批评。虽然这一传言尚未得到证实，但我确信是真的，因为我实在太希望是真的了。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与会的大多是受工作队压制的学生。我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探工系一年级学生张华府等人也被通知参加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队。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承认工作队有缺点错误，但同时宣称“派工作队是中央决定的”。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证实了前些天的那些传言。全场立刻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

聋。

此后人们便认定，工作队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未经毛主席同意，冒以中央名义派出的，他们才是工作队的后台。饱受工作队压制的人们自然就迁怒于他们，这就给以后打倒刘少奇埋下了伏笔。

然而刘少奇其实也没错。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南方的一个山洞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按照惯例派工作队下去并把“反工作队”的人打成“反革命”，应该说是顺理成章、有据可依的，以往的运动不都是这样干的吗？不过刘主席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这一招不灵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主席更没想到的是，这次他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而且下场比以往那些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人更悲惨。

如今看来，这是毛泽东的一步妙棋。这步棋让刘少奇戴上一顶“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帽子，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让毛泽东获得了打倒刘少奇的群众基础。毫无疑问，这步棋只有毛泽东才敢走，才能走，因为他是“绝对权威”。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少奇等同志鼎力相助、积极推崇的功劳。不知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那凄风苦雨的最后岁月，在那弥留之际，有没有想过这些？无独有偶，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林彪副统帅最后也落了个机毁人亡的下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 四、东方红

7月29日之后，校园又热闹起来，围绕工作队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保守派认为工作队“为革命而来”，即使要撤离，也是“为革命而去”，始终是革命的；造反派则认为工作队压制群众，转移文化革命的大方向，是不革命的。许多大字报以自身经历控诉了工作队的迫害。我写了篇名为《“反干扰”的伟大成绩》的大字报。所谓“成绩”，实为反话，如“成绩之一：工作队七斗八斗，终于发现被斗的人都不是反革命”；“成绩之二：工作队放手发动群众，终于没人再写大字报了”等等。也有文学爱好者，填词写诗挖苦工作队。如：“天地转，烈火燃。风雷激荡地院乱。为解何府春江愁，家犬披甲镇变叛。”“凄惨，凄惨，三伏只恨衣单。进院坏事刚干，竟起巨澜翻船。船翻，船翻，家兵赶我滚蛋！”（何长工曾说地院学生都是“何家兵”，故词中“家兵”是指地院的同学。）我很是佩服这些同学的诗词功底，没想到地院还有如此高手。

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为工作队问题争论不休之际，北京的中学和高校相继出现了“红卫兵”和各类“战斗队”组织。

红卫兵首先在中学兴起，由“红五类”子女组成。“红五类”是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红五类”子女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他们的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些中学生红卫兵最早在社会上“破四旧”、“斗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有时也称自己是“造反派”，不过他们的“造反”方式是砸庙宇、毁文物、焚书、抄家、打人、罚跪、戴高帽、挂黑牌、剪裤腿、剃阴阳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批早期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服，左臂佩戴着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据说袖章的宽窄，决定于他们父母官职的大小。当时有个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老红卫兵”奉为信条。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称他们的“革命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8月18日，毛泽东佩戴了师大女附中学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1966年8月成为老红卫兵历史上的“红八月”。

老红卫兵中有一小部分高、中级军官和干部子女，成立了一个“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以纠察队自居，对社会上他们看不惯的事情进行“纠察”。大约在1966年底，老红卫兵们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专与造反派作对。后来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抓了一些“联动”成员。探工系一年级学生陈广智在担任“东方红”办公室副主任的时候，曾协助公安部长谢富治抓捕和看管被关押的“联动”。他向我诉说了部分“联动”成员的暴行，如剥光被抓人的衣服，用带有铜头的皮带抽打，往他们身上撒尿等等，令人发指。

后来，红卫兵组织不再局限于中学，在大专院校、机关单位、工厂农村甚至街道里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遍及全国。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的红卫兵已不像老红卫兵那样“正统”，与普通的群众组织相差无几。所以文革过后很长时间中，人们讲起文革的事情或观看含文革内容的影视，认为戴红袖章的都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也不无道理。

所谓“战斗队”，最初只是大字报的一种落款和署名，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战斗队。后来逐渐有了观点相同的人凑在一起统一参加文革活动的战斗队，但也只是三五人或十几人的自由结合，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地院造反派战斗队的名称多取自毛泽东诗词，如“从中笑”、“红烂漫”、“从头越”、“只争朝夕”等，既有战斗精神，又富有诗意，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意味。也有自创的，如“高旗无畏”、“红色尖兵”、“永向前”等，还有火药味十足的，如“爆破”、“大喊大叫”和“打狗队”等。我还听说外校有个“朝三暮四”战斗队。这可能带有自嘲性质，也可能暗示当时形势多变，不可捉摸。

诸多战斗队中，水文系“爆破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可谓“言如其名”，在学校里引发了“爆破”，从而书写了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新篇章。

一天晚饭后，田春林告诉我北五楼前的大字报棚有一篇署名“爆破战斗队”的大字报，内容是要“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因为当时还没人能认识到，更没人敢于提出工作队犯了路线错误。我既惊奇又兴奋，便随田春林一起去拜访大字报的作者朱成昭。

我和田春林在北五楼4层水文系学生寝室见到了朱成昭。他的房间里人来人往很热闹，都是看了他的大字报后来串联的。朱向我们讲述了北大情况，说是最近这几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多次去北大了解情况，开座谈会，认为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聂元梓等北大师生批判工作队的革命行动。我觉得朱成昭在向我们讲述的时候，虽然语气很平静，但内心还是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因为派驻北大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不能说明所有工作队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万一地质部工作队不在此列，他放的“爆破”那一炮就成问题了，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他那大字报刚一贴出来，就遭到众多大字报的批判和围攻了。我们认为应该把北地的情况向聂元梓反映一下，请她帮我们分析地质部工作队是不是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不久后某日上午，我们一行人前往北大。我已完全记不起同行的是哪几个人了，模糊印象里有田春林、王大宾等。我们在北大哲学系教学楼前见到了聂元梓。她被人们包围和簇拥着，不停地讲着话，像是演讲，又像是回答人们的问题。我在一旁仔细端详她，想看看这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究竟是何等人物。当时正直盛夏，聂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大约40多岁年纪，面色白皙，短发，戴一付浅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地道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模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仿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们挤到她身边，说明来意，她让我们到哲学楼一层的一间办公室详谈。她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已记不清，只记得她向我们透露，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从北大返回学校后，我们一方面继续写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大字报，一方面加强了串联工作。此时的北京地院依然是“保守派”的天下，因为工作队撤离前，把地院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完全移交给了院文革委员会。他们对工作队感激不尽，敲锣打鼓地欢送走工作队，然后更加卖劲地给工作队歌功颂德，向写工作队大字报的人施压。院文革的头头坐着高元贵院长的吉姆牌轿车，穿梭于地质部与学校之间，向邹家尤汇报地院的一举一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串联是悄悄进行的，具有半地下活动的色彩。活动地点大多在教四楼的教室里，有时也在朱成昭的宿舍里，但参加的人员要少得多。

我保存着两份当年串联会的发言记录，都是记在薄薄的用来写大字报的纸上

的。一份是 1966 年 8 月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教四楼 209 室；另一份无时间地点，从发言内容看，也是在此前后。在这两份发言记录上记录着朱成昭、蔡新平、周永璋、田春林、颜宽、程希平、刘万恩、林小湫、贾维谦、黄占起、刘文德、李振海和我共 13 人的发言。串联会肯定不止这两次，人员也不只是这 13 人。因为当时既无组织又无纪律，愿者参加，所以有时这几个人凑在一起，有时那几个人凑在一起，无法确定谁先谁后和准确的人数。串联会几乎都是讨论形势和联合起来建立组织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观点，但是否建立组织，意见就不完全一致了。有人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存有顾虑。

大约在 8 月 5、6 号左右，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和我（另外可能还有周永璋、蔡新平等，但记不清了，不能确定）在朱的宿舍开会。朱认为不必等大家意见统一，我们几个可率先成立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张华府提议叫“东方红战斗队”，大家一致认可。我自告奋勇写“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我写好后拿给朱看，朱说不行，太软，让张华府改写。张的父母都是老干部，在郑州担任厅、局级领导。他根红苗正，敢作敢为，是“打狗队”这一名称不雅的战斗队的队长。他人也长得帅，身材匀称，面目清秀而不失男子汉的威严，是女同学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按理说他应该是“老红卫兵”的料，但当时他却成了反工作队的造反派。后来他被当作“朱成昭、叶向真反革命叛国集团”主要成员，坐了大牢。2016 年我与他在长沙会面，他已年近 70，并不显老，只是变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当年那股冲劲已荡然无存。

张华府改写的《宣言》其实是重写，调子比我写得高八度，是向邹家尤工作队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宣战书。朱成昭看了大为满意，决定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8 月 7 日晚，勘探系女同学、院美工队的万慧祥连夜在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伏在用几张课桌拼起来的大桌子上，用口杯大的黑体字一笔一划地把《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抄写完毕。我至今还记得她专注抄写的情景并深为感动。

8 月 8 日晨，张华府和王琦等几个探工系一年级学生架着梯子，把《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贴在办公楼面向学生食堂的西墙上，立即引起围观。《成立宣言》只署了 8 个人的名字，除朱成昭、蔡新平、张华府、田春林和我外，另外 3 人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似乎是周永璋、颜宽、万慧祥，但不敢确定。为什么只有 8 人署名？有两种可能：一是那天在朱成昭宿舍开会时这 8 人都在场，共同决定成立东方红战斗队；二是在万慧祥抄写《宣言》时，我凭印象觉得这 8 人都同意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就让万将他们的名字写上去了。“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得比较仓促，没有充分的讨论和认真的计划。由 8 人署名的《成立宣言》更像是一份“号召书”，与平常联名写大字报的形式差不多。后来地院流传“东方红”由 8 人发起之说，即源于此。

据庄一龙回忆，朱成昭、庄一龙、蔡新平、殷维侯、田春林、伏庆是、王大宾等7人（可能还有杜金山）走访北大后联名写了一份大字报《声明——走访北大归来》，贴在学院保卫科墙壁上，后来这7人或8人便被称为“东方红”的发起人。

另据程希平回忆，《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由田春林、伏庆是起草，签名的有朱成昭，吕才发、郑文卿、汤鸣皋、田春林、伏庆是、蔡新平、周永璋、程西平、颜宽、杜金山、任克亚、滑振本、张华府、陈广智、曹敏久、万慧祥等共17人。签名是各人自己手写，不能代笔。最后由万慧祥抄写成大字报。

此外还有各种说法，不一一列举。如今恐怕很难说请哪一种说法更准确了。大家之所以对“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过程记忆模糊，是因为“东方红战斗队”很快就被“东方红公社”取代了。“东方红战斗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闪即逝，被人遗忘了。

8月8日晚，也就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贴出当晚，中央电台播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讲了16个问题，故又称“十六条”。其中第七条，在“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条款下说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者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第二条“主流和曲折”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话简直就是针对我们学校的情况讲的。反干扰中受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校园里，欢呼“十六条”发表，欣喜若狂、彻夜难眠。

“十六条”证实了朱成昭“爆破”大字报和《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观点的正确性和远见性，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有了很高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许多学生甚至一些教师和行政干部都来找朱成昭串联，希望加入东方红战斗队。8月11日，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突然现身中南海文革群众接待站，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消息，前往朱成昭处串联的人就更多了。朱成昭和一些先期加入“东方红战斗队”的人认为到了建立全院统一组织的时候了，就让各系来串联的人先把各自所在系的同学联合起来，然后再以系为单位组成全院性组织。大家认为全院性的组织应与“巴黎公社”相似，同时又是以“东方红战斗队”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于是就定名为“东方红公社”。

8月17日，由地质系“红普联”、勘探系“红勘联”、水文系“红水联”、物探系“红物联”、探矿工程系“探工战斗联队”、院广播台“高旗无畏战斗队”、研

究生“革命造反队”、地院附属中学“东方红支队”联合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我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之初及酝酿成立“东方红公社”的阶段就负责筹建办公室，公社成立大会的会场布置自然是办公室的差事。我为了拿几面红旗摆放在主席台上，和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入团介绍人、院学生会干部韩洪文争抢了起来。她紧抓住旗杆，我拉着旗杆的另一端，两人都不肯松手。相持了一会儿，不知谁先放开手，总之我是拿到旗帜了。2004年我出差郑州，同班同学刘明臣请我吃饭，也请了在郑州工作的韩洪文作陪。我与她笑谈起这段往事，她说她已完全不记得了。可见有些事，在当时如果上纲上线，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但事后想起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就像小孩打架玩耍一样。

成立大会宣读并一致通过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宣言》指出：“6·20 好得很！反干扰糟得很！以邹家尤同志为首的原工作队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宣言》阐述了“公社”的方针政策：“东方红公社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谦虚谨慎，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逼、供、信，反对以力服人，要用文斗，反对武斗。”

东方红公社在后来的活动中，除个别人员或个别战斗队外，总体上可以说是恪守了《宣言》精神的。公社自始至终都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推行人，没有“破四旧”，没有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学术权威”，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东方红”掌权后，也没对保守派实施报复。甚至在受中央文革之命，去四川抓彭德怀的过程中，听了彭的一席话，反倒赞同彭的观点并对其表示同情，因而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这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即使今天，恐怕也少有人能做到。

与此同时，保守派也在筹备建立组织。7月底或8月初，勘探系二年级21643班的程关林、祝天惠贴出大字报，号召“全院红五类子女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月4日，程、祝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稍后，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地质系“红星”、探工系“火炬”等战斗队相继成立，成员皆为“红五类”出身。8月21日，这些战斗队及胡守安、刘强等人的“工人赤卫队”联合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

“斗批改”是“十六条”所阐述的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

“斗批改兵团”专与“东方红”较劲，死保工作队。正如程关林的回忆录所说：“反正在这期间，‘东方红’到处去造，我们跟着到处去保”。他们也斗了一些人，不过斗的是学校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查抄了几位老教授的家，没收了高跟鞋、连衣裙之类“奇装异服”及摄有外国场景的照片等“封、资、修”物品，销毁了一批“反动”和“黄色”书籍。地质系主任、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的出国护照和1949年以前一些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证照也被他们没收了。他们中还有极个别人学习中学红卫兵，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一位“右派”老师剃了“阴阳头”。

“地、富、反、坏、右”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统称“黑五类”，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产物。他们与“红五类”相反，处在社会最底层，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人欺凌而不能有丝毫抗争。“黑五类”在以往的多次运动中已受到处罚，是“死老虎”，但只要运动来了，他们不论好歹都还是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因此又称为“老运动员”。“黑五类”的子女也受到歧视。共产党的政策公开宣传的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花钱捐了门槛，任人践踏，还是没能洗清其寡妇身份带来的“原罪”。绝大多数“黑五类”子女无论表现如何好，在升学、就业、入党、提干、参军，甚至婚姻等方面，依然壁垒重重。

“斗批改”批斗死老虎，既具革命性，又无任何风险，何乐不为。

“东方红公社”初期，已逾两千人。后又有教师的“红教联”、党政干部的“红干联”等组织加入，队伍更为壮大。公社没有“社长”之类的官衔，唯有朱成昭这个“总指挥”是大家公认的。所谓“总指挥”也不过是在向外人介绍“东方红”的时候才会提起。如果有人问“谁是你们的头头？”一般都会回答：“是朱成昭，他是总指挥。”而在内部，我从未听人称其为“朱总指挥”。我们都是直呼其名，与他走得较近的低年级同学也喜欢称他为“朱头”。

原“东方红战斗队”的主要成员和各系的负责人组成公社核心组，或称公社“总部”。实际上，“核心组”或“总部”也不是固定的，来去自由。与朱成昭经常接触的人，碰到开会的时候自然也就参会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核心组”或“总部”会议。公社总部设办公室、作战部、政治部等，都在教四楼各自找间教室立足。各部门负责人的任命大多是朱成昭的一句话而已。有的没有任命，只是在那儿干得久了，自然也就成了那儿的负责人，并没经过推举、投票之类的程序，更没有任命书。我那时虽然是公认的“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其实也没有正式的任命。早在商议成立“东方红战斗队”的时候，朱成昭让我去搞间办公室，我就在教四楼的一间大教室内（具体哪间教室已忘记）将几张桌子拼起来，贴上“接待组”、“秘书组”之类的字条，便成了“东方红”办公室，后来一段时间内也就成

了“东方红公社”办公室，我自然成了“办公室主任”。各部门工作人员大多是毛遂自荐，主动参与，很随意，时有变动。那时候，一个头头的话，大家可以不听，而一个不是什么头头的话，反倒可能有很多人响应，全凭个人的号召力、威信和人们当时的情绪。有些人既不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也不是总部任何部门的负责人，反倒“后来者居上”，脱颖而出。后来成为“东方红副总指挥”的蒋良朴，成为作战部“部长”的杨雨忠，成为后勤部“部长”的朱德瑜，即如此。

不久，“东方红”也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成了红卫兵。“东方红”是反对血统论的，无论家庭出身如何，都一视同仁。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一是大势所趋，二是可以和保守派红卫兵抗衡。保守派红卫兵，尤其是“西纠”、“联动”，动辄便问：“你是什么出身？”先声夺人，非红五类出身的便矮了半截，败下阵来，弄不好，还要被毒打一顿。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遇到这种情况，就可挺身而出，针尖对麦芒，硬碰硬。“东方红”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朱成昭让张华府总负责，但因为“东方红”从不单独以红卫兵名义行动，都是打着“东方红”的旗号，所以张华府这个红卫兵负责人的头衔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张对此也毫不在乎。

我父亲曾是上海某区政府民政科的一名办事员，我在档案里填写的家庭出身是“职员”。我不是红五类出身，但因为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所以破例也成了红卫兵。我至今还保留着红卫兵证呢。我想，这也与中共“一大”时，与会的没一人是真正的工人出身，却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同一道理吧？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发起人，也就不必考虑你的出身了，你自然就成了这一出身的代表了。

按照“东方红公社宣言”的精神，“公社”的首要任务，是批判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路线”（那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8月12日，在工作队撤离之际，邹家尤就工作队问题做了一次检查，“东方红”认为邹的检查纯属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于是8月23日，“东方红”一进地质部，要求邹回地院做深刻检查。“斗批改兵团”也闻风而动，前往地质部阻止“东方红”的行动。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造反派前来支持“东方红”，“西纠”前来支持“斗批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行动我没参加，不了解详情。我只知道北京市委为此做出指示，要“东方红公社”与“斗批改兵团”按照“十六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精神，回学校开辩论会。同时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主持辩论会，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和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校长邹家尤、胥光义参加。于是“东方红”与“斗批改”两派人马都撤离了地质部，回校准备辩论。

24日晚，辩论会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东方红”与“斗批改”双方成员各自

带着凳子排队进入操场。许多两派都没参加的和外校人员围在四周，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我陪伴肖力站在操场北侧大马路的白杨树下观看辩论。

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坐在主席台正中，左右两侧分别坐着“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蔡新平和“院文革”、“斗批改”负责人任士田、程关林、胡守安等。按事先约定，双方派等量代表轮流交替上台发言。

开始时，辩论基本按商议的程序进行。“东方红”首先发言的是“红教联”的负责人贾振远老师，接着是“斗批改”的毛炎超，然后是“东方红”代表、地质系11622班的殷惟侯，再接着又由“斗批改”代表发言。贾老师和殷惟侯都是早期的东方红成员，同时也是东方红中的“策略派”或“温和派”，惯于以理服人。他们引用“十六条”等中央文件和中央文革等“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说明邹家尤8月12日的检查过于肤浅，应该做更深刻的检查。殷惟侯还分析了工作队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没处理好如何对待群众与群众运动的问题。毛炎超的发言，首先肯定邹的8·12检查完全通得过，接着列举了“斗批改”批斗“黑五类”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业绩，最后表示要与院内高元贵、聂克、周守成等院内走资派斗争到底。毛的发言，归根结底就是保邹家尤过关。毛是我和田春林的同班同学，是“斗批改”的负责人之一。他平时是个随和、活泼、很可爱的人，同学们给他起了个“二癞子”的外号，他也不生气。我与田跟他虽然是对立两派的头头，但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2002年，我们班同学在校庆50周年的时候，在分别34年后首次返校聚会，大家见了面都很亲热。他毕业工作后走的主要是仕途，官至江西省九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正处级领导。他给大家带来了景德镇产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瓷人，开玩笑说送每人一个“小姐”。想当年他们抄家时把高跟鞋、连衣裙都作为“封、资、修”没收，如今也“与时俱进”，开起“小姐”的玩笑来了。我也给大家带了礼物，是产在浏阳河河床下石灰岩中的菊花石。毛炎超不幸于2013年病逝，享年69岁。田春林还专程去九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起初几人发言后，一个外校红卫兵打破既定发言顺序强行上台大骂东方红。朱成昭等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虽然恢复了依次发言的顺序，但每当蔡新平、田春林、宫保军等东方红一方发言时，台下斗批改人员便责问、吵闹、起哄。台上也出现了为争夺麦克风而相互拉扯的场面。工人赤卫队、外校红卫兵接二连三上台声讨东方红，要把东方红这些“资产阶级的混蛋们杀个人仰马翻，叫他们鸡犬不宁。把他们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已不是辩论，完全是叫嚣和恐吓了。“斗批改”一位工人代表发言，因保工作队心切，情急中居然说“邹家尤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位家属代表向东方红发出“最后通牒”：“严重警告东方红这群混蛋，闯进地质部，抢文件。强烈要求立即没收东方红公社的旗帜。”台上台下的斗批改、红卫兵全都站立起来，齐声高喊：“把旗子交出来！交出来！”这时，

只见主席台上的朱成昭走到台沿边，举起右臂，向着台下的人群高声朗诵：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他念最后一句时，台下的东方红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伴着他的节奏齐声朗诵起来。

“斗批改”们又唱起“老子反动儿混蛋”、“滚他妈的蛋”等“红卫兵战歌”。

东方红的同学们坐在凳子上，不慌不乱，一遍又一遍地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可能是经过调停，台上又恢复了平静。代表“东方红”发言的一位水文系女同学讲述受工作队迫害情景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包括“斗批改”在内的全场人员都为之动容。一位同学发言说，他是“红五类”出身，因为给工作队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人发言，说他既不是“东方红”也不是“斗批改”，但看到今天辩论会上“东方红”不卑不亢，纪律严明，所以决定加入东方红。许多外校和外地旁听辩论会的人，也上台谴责“斗批改”横蛮无理，扰乱会场，支持“东方红”并要求加入“东方红”。甚至有“斗批改”的成员，当场表示退出“斗批改”，参加“东方红”。之后，台上的发言和台下人群的情绪几乎是一边倒，“斗批改”已无招架之力。辩论会以“东方红”的胜利告终。

此时已是 25 日黎明，东方露出一线曙光。田春林站在主席台前，面向冉冉升起的红日，挥动双手，指挥大家唱起了《东方红》。

起初，我们一直认为工作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邹家尤还是革命同志，并不想一棍子将他打死。可是在 8·24 大辩论之后，何长工、邹家尤等依然抱成一团，与“东方红”死磕到底。“东方红”因此提高了批判的调子，决心将他们拉下马。

“东方红”因此又二进、三进、四进地质部。其间曾把邹家尤揪到地院，但又给“斗批改兵团”抢了回去。后来“东方红”联合地质部机关的造反派，抓住何长工长征时期曾在张国焘的“伪中央”当过“组织部长”、邹家尤参加过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组织的辫子，将他们作为“三反分子”和“国民党特务”揪了出来。何、邹的这些罪名在毛泽东仙逝后，自然也就像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一样，获得平反。

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就是四进地质部。当时公社总部人员大多都在地质部“前线”上，我独自留守办公室，对现场情况不甚了解，只留下亲身所见不完整的片断记忆。

## 片断一 绝食

9月5日，“东方红”二进地质部。“西纠”和“斗批改兵团”照例又来“保卫”地质部。“东方红”在地质部张贴的大字报被撕毁，人员遭到有组织的围攻。“西纠”根据“斗批改”人员提供的“东方红”中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名单，把他们拖出来辱骂、殴打。学校连续3天不给送饭，逼迫“东方红”自动退兵。然而，“东方红”不但没退兵，反而提出“要革命，不要馒头”的口号，干脆以绝食表示抗议。“东方红”的同学们忍着饥饿，在地质部院内举办联欢会，相互鼓舞斗志，并向对“东方红”表示同情支持和围观的及路过的人们宣讲我们的观点，控诉工作队的迫害。

我听说进驻地质部的“东方红”战友绝食了，马上叫人将这一消息写成布告，号召留校的“东方红”成员也绝食，以示对“前线”战友的支援，同时也为了表明“东方红公社”步调一致。布告张贴在各学生宿舍楼和各学生食堂的门口。不少“东方红”同学已走到食堂门口，看见布告，又转身默默离去。有的“东方红”同学没注意到布告，已经进入食堂开始吃饭了，“斗批改”的人讥讽说，你们不是绝食了吗，干嘛还吃饭？“东方红”同学听到此话后便丢下碗筷走了。那时的情景，既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在校的同学绝食后，我只身去地质部，把这信息告诉在地质部绝食的同学，表达对“前线”战友的声援，给他们鼓劲。来到地质部，只见同学们横七竖八地坐在空地上，显得很疲惫。在地质部礼堂内的一间小房间里，我见到了公社总部与各系的负责人，大家正在商量下一步如何办。我印象中，勘探系的胡乐成等人激烈地表示要将绝食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有人表示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如果何长工、邹家尤对绝食挨饿的学生置若罔闻，死扛着不答应“东方红”让他们回地院作检查的要求，难道我们真的要绝食至死吗？看到这种情况，我也感到进退两难，无可奈何。我向屋内的一人要了根烟。这是我第一次抽烟，加上是空腹吸烟，抽了一口就难受得要命，脑袋晕眩，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我看商量无结果，坐了一会儿便回学校了。后来如何停止了绝食，我就知道了。

## 片断二 肖力

前述我曾在8·24辩论大会时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观看辩论，但我还有另一个与肖力初次见面的记忆。

那是在绝食期间，我在教四楼公社总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来访者。来者是位女同志，自称是《解放军报》记者，名肖力。她看上去年纪比我稍大一些，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双排扣列宁装，脚穿一双黑色有搭扣的布鞋。我站着与她讲话时眼睛平视，正好对着她的眼睛，说明她和我差不多高，1.66米左右。我瞧着

她的脸庞，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我向她详细介绍了地院的文革情况及“东方红”为什么要去地质部，再三说明我们不是向党绝食，是为了让工作队做检查迫不得已而为。我说到激动处几乎是热泪盈眶。肖力认真听我诉说，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只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下去。我望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既觉得有所宽慰，又觉得若有所失。

不久我便从朱成昭和田春林那里知道肖力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怪不得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因为她的脸型和神态很像毛泽东。我得知后既高兴又惊奇。高兴的是我有幸认识了毛泽东的女儿，没想到她是如此简朴；惊奇的是文革以来，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如今李讷也出来活动。毛主席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居然连妻子和女儿都出动了，觉得有点不寻常。

以上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应该不会有错，但细想起来，又与前述我在 8·24 大辩论时陪同肖力观看辩论的情况不符。8·24 大辩论在二进地质部之前，如果那时我已认识肖力，为什么我记忆中第一次见肖力是在二进地质部绝食期间并含泪向她解释我们不是向党绝食呢？50 年过去了，实在是无法回忆起来了，只能如此了。

### 片断三 何长工

大约在 10 月中旬，何长工被带到地院接受批判和交代问题。“东方红”同学让他住在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还让他带了一个小勤务员照顾他，给他打水洗脸洗脚，端茶送饭。同学们并没怎么难为他，只是让他在学校东大门发放和检查出入校门的自行车牌。待遇比当时那些被关进“牛棚”的“走资派”好得多。没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何长工一瘸一拐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方头大耳，面色紫里带黑，低声下气地对我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要他参加，能不能让他给地质部打个电话要辆车来接他。我说你打吧。他颤抖着手拿起电话打过去。不一会儿地质部来车将他接走了。所以可以说是我放走了何长工。

### 片断四 邹家尤

我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见到邹家尤是在他被抓到地院接受批判的时候。那天我从大食堂往办公楼方向走，看见两位同学分别架着邹的左右两臂，按着他的头，押他到大食堂开批判会。大食堂里已坐满了等待开会的同学。只见一个大个子同学走到邹的面前，顺手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邹的脸上立刻留下一个血红的手印。邹家尤仪表堂堂，面色白里透红，保养得很好。那记耳光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他无任何表示，依然倔犟地往前走。

“东方红”虽然在批判工作队和大辩论中取得节节胜利，但院文革、“斗批改”依然把持着地院大权。他们控制了广播台、车库、食堂、印刷厂等部门，处处钳制“东方红”。这让“东方红”认识到必须要掌握文革的领导权。院办公楼前的大字报席棚出现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巨幅标语。我不记得这标语是如何产生的了，但这标志着地院的文革由此进入夺权阶段。

我偶尔保存了一份 1966 年 9 月 21 日在教四楼 301 室召开的“东方红”核心组扩大会议记录。在会上发言的有朱成昭、蒋良朴、王大宾、田春林、朱德瑜、汤鸣皋、程希平、庄一龙、杜金山、李海魁、李珍及物探系和探工系各一人（他俩没记下名字）。蒋良朴主持会议，我记录。会上研究了形势，也谈到了夺权问题。探工系的一位负责人（没记下名字）发言，主张尽快夺权，重点是广播台。他表示如果总部再不做决定，探工系便单独干。

北京地质学院广播台在北京高校中久负盛名，音量、音质和播放技术在当年都属一流。播音员的水平几乎能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媲美。文革开始后，广播台中造反派占多数，组成了“高旗无畏战斗队”，主要成员有黄瑞华、刘万恩、刘梅、郁秀荣、林小湫等。他们得天独厚，利用广播台这一阵地，播发了大量批判工作队、支持造反派的稿件，影响力是其他战斗队无法比拟的。“高旗无畏”因此能以一独立单位加入东方红公社。其负责人，物探系三年级的黄瑞华也成为公社核心组成员，后又成为院革委会成员。“反干扰”之后，台里的保守派“红色宣传员”要把“高旗无畏”赶出广播台。“高旗无畏”发表声明，表示以革命利益为重，为避免冲突，主动退出广播台。所以，“东方红”收回广播台，势在必行。

23 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朱成昭突然跑了进来，对我吼道：“你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夺广播台！”我从未见朱成昭发这么大的火，赶紧叫了办公室的五六个人，下楼向广播台跑去。

广播台在北五楼底层的西头。我赶到时，底层已挤满人，水泄不通。“东方红”同学还在拼命往里挤。我也想挤进去看个究竟，刚挤进楼道口，就觉得楼道里空气浑浊、闷热无比、让人窒息。同学们个个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我再往里挤，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去了，不得已退了出来。楼外“东方红”的人在呐喊助威，也有“斗批改”的人在说三道四，骂骂咧咧。有几位支持“东方红”的老师或干部买了冰棒，从楼道口一根一根传递到挤在最里面的人手中，边递边叫：“冰棒是给东方红的，老保不能吃！”

我觉得我在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看了一会儿，又回到办公室。

据探工系 71653 班同学、广播台报道组的林天民叙说，是王大宾指定他担任“前敌指挥”，由他们班组成“突击队”首先采取行动的。在相互拥挤中，一名“东方红”女同学突然窒息晕厥，大家将她举过头顶，慢慢往外移动，好不容易才移

到楼外。林还说，王大宾爬上一根安有高音喇叭的水泥电线杆，用钳子把广播线剪断，大喇叭一下子就哑了。围困在播音室里的“红色宣传员”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无法向他们的人求救。“东方红”不断向他们喊话：“不要当保皇派的喉舌，要当革命造反派的先锋！”相持了2小时左右，里面“斗批改”的人丧失了斗志，“东方红”夺取了广播台。从此，地院广播台改称为“东方红广播台”。

夺广播台是发生在学校内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最大规模的肢体冲突，除相互拥挤之外，还出现了人员昏倒、保守派（主要是“斗批改”的工人赤卫队）拉扯、打人的情况。如果说这算是武斗的话，那么文革中发生在地院内部的武斗，仅此一例。

夺广播台的行动惊动了中央文革。当晚，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来到地院，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关、戚先念了一个条子。条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写的，大意是“派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去北京地院做观察员”。然后，关、戚二人便以中央文革观察员的身份宣布：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那天之后，“斗批改兵团”一哄而散，土崩瓦解，其成员纷纷脱离“斗批改”总部的领导，要求加入“东方红”。有想不通，不愿参加“东方红”的，也随其自然，不强加于人。“东方红”由此成为全院唯一组织，掌握了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各个班级的东方红战斗队负责人，成为事实上的班长。

10月8日，“红物联”又夺了物探系食堂的“权”。事情的起因是他们食堂的大师傅大多是保守派的，声称不愿做饭给造反派吃。物探系造反派于是便接管了食堂，学生们自己动手做饭。物探系食堂也就称之为“东方红食堂”。

地院东方红进驻国家机关、绝食、夺权等行动，能够全身而退，逢凶化吉，成为统一全院的唯一组织，在全北京和全国都是一枝独秀，被视为文革的一面旗帜。朱成昭因此享有盛名。后来被称为“五大学生领袖”的清华大学蒯大富、航空学院韩爱晶等，也都对朱成昭深表钦佩。蒯大富当初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还是借助地院东方红的支持才有所起色。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走资派”后来也称赞起朱成昭了。然而，这都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有毛泽东幕后撑腰。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文革这一特定阶段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早就要把牢底坐穿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事实上，造反派的头头们后来确实不是坐牢，就是被审查，几乎无一幸免。

“东方红”成立时与我争夺旗帜的韩洪文，在9·24之后，主动向我做检查，说她“站错了队”等等。她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在争取入团时，向她做过思想汇报。因为无论入党或入团，都要向组织交心，取得组织信任才有可能加入。如今反过来她向我汇报思想，我很不习惯，很尴尬，不知说什么好。我含含糊糊地

说，什么站错队不站错队，我们是同学，用不着这一套。说老实话，我之所以成为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是“站对了队”，其实纯属偶然。如果 6·20 那天我不跟田春林去听李贵、王煊堂演讲，就不会挨工作队整，也就不会找朱成昭串联，不会参与发起成立“东方红”，不会有以后那些事。我认为，正像工作队整我的时候我不是“反革命”一样，现在的我也不是什么“路线觉悟高”的“革命闯将”。我还是原来的我。我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我所做的，只是为了从工作队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得到彻底平反，像正常人一样平平安安地毕业，分配工作。至于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者有何根本区别，我至今都没弄明白。

1966 年 10 月 1 日，国庆 17 周年。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总部所在的教四楼，张灯结彩，门口有东方红“战士”站岗守卫。10 月 8 日后，总部人员开会到深夜时，东方红食堂还会送来热腾腾的面条。这短暂的几天，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最轻松、最舒心的日子。

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几天，东方红开始自我整风。总部人员下到各系各战斗队听取意见，站岗和夜宵很快就取消了。

我看到东方红已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彻底平反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学校里没什么事可干了，就想去看望在鞍钢工作的我的三哥。那时，已有全国各地大批红卫兵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也有北京的红卫兵和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都可免费坐火车。

10 月 15 日，我离开学校，前往鞍山。当时主要是外地学生来北京，进京的火车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而离开北京北上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所以我坐上了软卧。到了鞍山，三哥见到我时是又惊又喜。自文革开始，我就没给家里人写信，他们听说北京又打又闹，乱得很，都在为我担心。我向三哥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说学校里已无事可干，打算从鞍山直接回上海家中休息，等学校复课了再回北京。三哥是党员，他严肃地对我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劝我回校继续参加革命。他带我参观了鞍钢，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准备串联穿的鞋，把我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我从沈阳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徘徊了许久。是南下去上海还是西行回学校，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听三哥的，回校继续闹革命。

10 月 20 日，我回到学校。此时很多同学都外出串联了，学校显得很冷清。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向大连海运学院 15 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兵”学习，进行徒步串联。大串联由此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

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大多都介入到地方的运动。当地各类群众组织往

往因为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的支持而士气大振，从而加剧了地方各派组织的争斗。地院同学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组驻该地联络站。虽说是打着东方红或三司的旗号，但几乎都不是东方红或三司委派的，而是在那里串联的同学即兴成立的。不过在建立后，大多都得到了东方红总部或三司的认可。

“首都三司”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的跨校组织。“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地质系 11632 班的周永璋同学，以地院东方红的名义串联了北京工大、农大、邮电学院、政法学院、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外语学院等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于 9 月 6 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为“三司”或“首都三司”。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已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总部”，分别称为“一司”和“二司”，所以排名第三。三司的成立壮大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地院东方红的威望，扩大了地院东方红的影响。

我曾记录了部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各地联络站的负责人名单。这些人也不是固定的，很可能干了几天就离开了，另有他人接替。名单不全，我把他们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文革中确实有联络站这么回事。

驻沪联络站：江涛、朱德瑜、鲁雷（鲍国熙）

无锡联络站：李海荣（探工系 71621 班）

苏州联络站：施国飞（？）

南充联络站：朱莜丽（探工系）

萍乡联络站：徐忠树（？）

河南联络站：李洛根（地质系 15631 班）

山西联络站：刘占生（水文系）

内蒙联络站：曹敏九（探工系 71654 班）

新疆联络站：何汉贻（勘探系）

其中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在支持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等事情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从而带动了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即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其负责人江涛当时在上海是位显赫人物，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常委。而他在学校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我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我有一份上海人民公社早期印制的通讯录，是用一张纸片对折而成的。上面有王洪文、徐景贤、江涛等人的电话号码。应该是那个时候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给我的。

朱成昭和我等总部一伙人也想外出串联。朱是安徽人，他的父亲是位高干，曾是新四军的干部，后任上海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所以他家也在上海。我们打算从上海出发，经江西，过湖南，入贵州，进四川，沿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爬雪山、过草地、赴延安，然后再由延安返回北京。朱让我先回上海准备一些锅碗瓢

勺之类的野炊用具，等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就正式出发。

10月底，我与颜宽回到上海。颜是地质系一年级学生，也是上海人。他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是中学同学，所以早就认识朱成昭。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串联活动，应该算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颜宽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属“黑色”出身，不宜出头露面，所以没担任总部的任何职务，只做些具体工作，敲敲边鼓。朱成昭曾对我说，等形势好了以后，要提拔颜宽。我将这话告诉颜，他当时没吭声，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感动的。

1966年10月的上海，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虽然有些单位已出现了在工作队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之争，但尚未波及全市。但是红卫兵的抄家、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活动已开展了好几遍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等社会名流以及1949年后存留下来的大小资本家不计其数，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傍晚我跟着一伙人去到一处住宅，为什么去那里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上楼的时候，从一扇窗户望见里面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小圆桌，低头悄然无声地吃晚饭。他们听到我们上楼的脚步声，惊恐地抬起头看我们，那目光里流露出的惧怕、乞怜、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种眼神，是德国犹太人见到搜捕他们的纳粹党卫军的眼神，是美国黑人见到手举火把，身着长袍，头戴面罩的三K党徒的眼神。这种眼神我过去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我们那次并不是去抄家的，我们也从没抄过家。只因为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引起人家那么大的恐慌。我像做了贼似的，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我住在家里，没事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看看。联络站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311号，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洋楼。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在造反之初，得到三司联络站的支持，因此这栋房子被看成是王洪文的起家之地。在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作为文革纪念地保护起来，供人瞻仰。“四人帮”垮台后，这里应该算是“反革命巢穴”了吧？2014年10月，我从长沙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在逛街时偶尔走到愚园路，便想去看看这栋小楼，却没能找到。

我在联络站里很少看到江涛，倒是看到水文系的徐娟娟、勘探系的方柄尧以及与我同系同年级古生物专业的彭善慈等人。另外还有一些借大串联之机回上海探亲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女孩子。她们是文革前未考取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动员下主动报名进入建设兵团，成为兵团“战士”，不属于文革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她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在联络站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方柄尧不久离开了联络站，回家乡浙江金华介入了当地运动，在一次武斗中打死了人，判了死缓，后改为无期。据方自己说，其实当时很混乱，究竟是谁给了那人致命一击，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个替罪羊。徐娟娟毕业后在湖南长沙工作期间，也

受到审查。彭善慈不介入任何造反行动，只是跟着大家一起玩。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开车。有天晚上，我坐着他驾驶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上海的街道错综复杂，他来上海不久便能穿行自如，而且是在晚上，真不容易。他毕业后先分配在湖南四一七地质队，不久调至湖南地质研究所，后又调至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他对三叶虫的研究很有造诣，在湖南建立了两个金钉子（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及点位），是我认识的同学中学术成就最高的。

这期间我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徐娟娟串联的一个单位的两派进行辩论。徐说你是东方红总部的，就由你主持吧。具体是哪个单位，辩论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辩论会是在一座大楼内一个很大的礼堂举行的。我按照地院 8·24 大辩论的模式，让双方代表轮流交替发言。辩论过程中不时有人从下面递条子到主席台，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我当众把条子读给大家听，做出解释，表示无论有什么意见，都要遵照规则一个一个发言。辩论会顺利结束。许多参会的人说我公平公正，但徐娟娟怪我没能偏袒她串联的那一派。

第二件是与上海市长曹荻秋会谈。会谈是在上海展览馆的一间房间里进行的。上海展览馆原先叫中苏友好大厦，是位于南京西路一座带有俄罗斯风格的皇宫式建筑，比北京展览馆气派多了。

为了与曹荻秋会谈，我事先写了个会谈提纲，内容主要是希望他给联络站提供一些通讯、交通、办公等方面便利，同时也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以协商口气提出的，没有强加于人的条款。曹市长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我与他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特别柔软。他答应了给联络站提供方便的所有要求，对于其他问题的回答，我已记不起来了。总之，虽然会谈中有几个同学讲了一些激烈的话语，但总体是平静和谐的。

我和颜宽久等朱成昭不来，在上海呆着又没什么意思，大约在 12 月中旬，在三司联络站弄了两辆自行车，骑车去杭州游玩。妈妈烙了几张饼，煎了一些咸带鱼，让我们带在路上吃。骑车途中有很长路段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无际的田野，不由人不感叹祖国山川的锦绣壮丽。一路上我们超过不少扛着红旗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机械化，他们回答说就是不够革命化。

我们在杭州玩了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后朱成昭还是没来，于是在 12 月下旬，我和颜宽又回到北京。这一回去，便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沾上了边，被当做该集团的一员，经受了 18 年无休止的审查。

## 五、朱成昭

1966年12月下旬回到北京后，朱成昭见到我，说我在家吃胖了，脸上胖得眼睛都快看不見了，又说他们在北京累得要命，说我回来得正好，可以帮他一把。他郑重其事地把办公室和总部有关人员叫来开会，说“东方红”的老办公室主任回来了，说我是他的左膀右臂，以后办公室的事就由我管，不用再找他了。我就这样又“上岗”了。

此时“东方红”总部已迁到院办公楼，总部办公室设在二楼最东头原先高院长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套间，里面是会议室，摆着一张长条会议桌，沿墙摆满沙发；外间靠窗是一张黑色大办公桌，桌上有两部电话。我就在外间“办公”。当时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安排他们的吃、穿（当时北京已是严冬，南方来的学生穿得少，冻得发抖，要给他们发放棉衣）、住、行。同时，还负责处理外地、外单位群众的来信来访，要为各种各样的会议做准备、发通知。这些都是大量的、细小繁琐的事情。此外，我还要参加一些会议和首长接见，解决一些突发事情。我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夜深了就合衣睡在里间的沙发上。

有一次，已是深夜，中央文革办公室来电话，说是京棉二厂有一些纺织女工绝食，要我们派人去劝劝她们。我和田春林到了北京东南郊的京棉二厂，受到工人们的夹道欢迎。他们激动地呼喊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向地院东方红学习、致敬”、“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我跟在高大魁梧的田春林身后，低头缩颈，右手不停地摇晃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那模样与林彪跟在毛主席后面畏畏缩缩的样子差不多。不知为什么，面对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反倒有种底气不足、心里发虚的感觉。田春林对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的几十位绝食的纺织女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首先表示地院东方红和首都三司的革命造反派与红卫兵小将坚决同她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等，接着就说要吃饱饭，养好身体，才能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长期斗争等等。这些空话、套话很管用，她们决定停止绝食，我们也圆满完成了任务，皆大欢喜。

又一次，也是夜深人静时分，电话铃突然响起，是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的，说你们学校有个干部赖在公安局接待室不走，要我们把他接回去。原来此人是学校保卫处的一名干部，与学校放电影的工人师傅的妻子有染。该师傅身材瘦小，暴牙齿，两颗大门牙露在外面，形象确实不敢恭维，而他妻子却年轻貌美，娇小玲珑。他妻子是农村的，嫁给他纯粹是为了进城。工人师傅与保卫干部同住一个楼，他老婆就与保卫干部勾搭成奸，而且多次被抓，仍难舍难分。放电影师傅惧怕娇妻离婚，只能忍气吞声。文革来了，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他将此事告诉了造反派，保卫干部便挨了一顿打。保卫干部居然是个讲法律的人，说自己与他人妻子通奸固然不对，但造反派打人是违法，就到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声称不解决就不

走。这种事我完全可以不管，但考虑到保卫干部赖在公安局也不是个事，就要了一辆车去接他。开始时他还不肯回去，我说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没打死你就算你运气，你还摆什么谱，你不走我就回去，不管你了，他才上了车。车子送到他家楼门口，他千恩万谢地下车了。此后我再没见到他，也不知他的姓名。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乱着，突然我的堂兄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我堂兄是转业军人，在上海水泥厂当供销科长。他是保守派，是来京告造反派状的。他希望我帮他见一次中央首长，他要把告状信直接送交给中央文革。我说没问题，只要这期间有中央首长接见，我一定安排他参加。他说他有地方住，就没住在学校里。我给他找了一件带毛领子的棉军大衣，给了他一张公共汽车月票。因为那期间没有小范围的首长接见，我让他参加了一次在大会堂举行的大规模会议。虽然那次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和周总理都出席了，但都坐在主席台上，我堂兄只能远远望着，无法靠近。不过堂兄已经很满足了，总算见到了中央首长。他临走时把军大衣和汽车月票还给我，又给了我10元钱。这应该算是我的一次“以权谋私”吧。

还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接电话，有个面熟但不知姓名的同学突然闯进办公室，不知为了何事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们这些头头如今是当官做老爷，变修了等等。我刚放下电话，又一电话铃响了。我对他说：“好好好，我当官做老爷，我变修了。我不干了，行了吧？现在电话来了，你去接，你去处理吧！”这同学一下愣住了，红着脸，愣了一会儿不声不响地走了。

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东方红总部几乎只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顶着，不清楚朱成昭、将良朴、王大宾、杨雨忠等人在干些什么。听说把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抓回来了。这事发生在我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前，所以我没见到彭老总，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后来才逐渐听说是中央文革要地院东方红去四川抓彭，王大宾他们通过与彭接触，觉得他的“万言书”没错，对他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表示不解和同情，本不想抓他，经不住中央文革的压力，才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回北京。为此，戚本禹批评说：本让你们去控制彭的，你们反倒被他控制了。

我只见过黄克诚大将。黄被带到学校后，住在办公楼三层靠西头的一间屋子。我安排了两个同学在楼梯口守卫，不准别人随意进入。这样黄克诚大将还可以在三楼西头的楼道来回漫步而无人干扰。至于他为何被带到学校和如何被带到学校的，我一无所知。

在这期间，我还隐隐约约觉得朱成昭有所变化，好像心事重重。有天晚上，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告诉田春林，如果田再干涉他与叶向真的事，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才知道他与田有了很大的矛盾。叶向真是中共元老级人物叶剑英元帅的千金，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那时我和田春林虽然同

住在办公楼四层最西头南边的房间里，但却是各忙各的，很少有时间在一起。我只知道田作为首都三司文艺部负责人，与中戏来往密切，但并不知道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决定不把这个电话告诉田，免得刺激田，加深他们的矛盾。直到 2011 年 3 月 12 日，我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餐厅和蒋良朴、田春林一起吃饭时才讲了这事。可是田却说我当时就对他讲了。这真是说不清了。总之，朱、田、叶之间的恩怨情仇，田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专门叙述，我不了解具体情况，自然也就不便作何评论。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从朱成昭与叶向真牵上线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变化。这一变化，终于在 1 月 19 日的东方红总部会议上公开了出来。

大约在 1 月 10 日前后，中央文革来电话要我们去人大会堂开会。晚上 9 点多钟，我带了几个人到了人大会堂北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王广宇在台阶上等着我，把我们带到里面。当时首长们正在接见外地来京的造反派，让我们在一个大厅里等候。大会堂的走廊、大厅都铺着厚厚的地毯，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室内温暖如春，卫生间有热水洗手。我们坐在沙发上与大会堂年轻的女服务员们聊天。等到 12 点左右，首长们还没出来。服务员用手推车给我们送来夜宵。手推车上下 2 层，上面是一大盆内容丰富的炒饭，下面是一大盆汤，估计是剩饭剩菜做成的，但是味道鲜美，我们吃得很香。

我们吃饭的时候，首长们从开会的房间里出来了，说是他们的会还没完，这是利用会间休息来看看大家。我站起来边吃饭边与王力说话，将一颗饭粒溅到了他的嘴角边。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他却转身走了。

我参加过多次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这次是与首长们距离最近的一次。首长接见有三种情形。大范围的接见是在大会堂开大会，中等范围的接见是在某个会议厅里，参加的人往往有近百人到数百人。小范围接见就像这次，首长的人数与被接见的人数几乎一样多，有时首长的人数甚至多于被接见的人数。当然还可能有更小范围的接见，具体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所谓首长接见，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周恩来总理大多时候也在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话大家听不懂，就由王力当翻译。陈矮胖，戴眼镜，像是一对金鱼眼。王力中等身材，总是笑眯眯的。关锋瘦小，沉默寡言。顾问康生，干瘦威严。高大魁梧的戚本禹和矮胖的姚文元很少讲话。唯有副组长江青最活跃，不但话多，还时常打断别人的话。记得一次中等范围接见会上，有个小女孩（可能是个中学红卫兵）当场站起来，说“江青同志，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就有两名军人请她出去。江青连忙说不要带她走，可还是被带出了房间。还有一次，也是中等范围的接见。散会时一群人围着陈伯达，要他解答问题。周总理连忙过去给他解围，大声说道：“伯达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我们要爱护他的身体，请你们让他回去休息，我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陈伯达趁机溜了。当时我很惊讶。在我的心目中，周总理的形象是高大的，是受人敬仰的。他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为对下属的悉心关照，体贴入微，但又使我觉得有点讨好陈伯达的意思，有点过分，有失总理的身份。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被带进会议厅，在一张大的长形会议桌前坐下。不一会儿首长们鱼贯进入，坐在我们对面。江青拿起一份名单看了看，突然说：“伏庆……伏庆什么？”我连忙站起来，说：“是，伏庆是。”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就坐下了。我正好坐在江青的对面，她穿一身军服，没戴帽子，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面色微黄。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她有多漂亮。我在三司上海联络站看到过她30年代的照片。她身穿一件白色毛绒大衣，戴一副墨镜，侧卧在雪地上，年轻、美丽、时髦、风流。很难想象她这样的人会成为穷苦人的救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老婆。

接见我们的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周总理外，还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及几位军队领导。说是中央决定对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实行军训，北大、清华、北航、北地、北京矿业学院5个学校作为试点首先开展。还说将会派解放军到学校具体领导军训，要我们回去后与各组织负责人好好商量一下，做好军训的思想、组织准备，与帮助军训的解放军处理好关系，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好。

1月19日下午，东方红总部在办公楼的大会议室（309室）开会，研究军训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成昭、蒋良朴、李贵、贾振远、宋云、刘佛兴、汤鸣皋、徐川和我等总部人员，可能还有王大宾和张海涛，但不能肯定。来我院帮助军训的解放军第六十五军的首长也在场。蒋主持会议。开始时，讨论了有关军训的一些问题，当朱成昭发言时，他却谈起了形势问题。他主要说了以下几方面的事：

1. 大串联搞早了。1966年10月份，正当《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把北京的人都放出去了，还怎么能批资反路线；
2. 现在中央文革动辄就召开几万人的大会，参会的群众只会跟着举手喊口号，根本搞不清批判对象到底有什么问题，该批什么，该怎样批。这是把群众当阿斗，不是搞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
3. 联动都是不懂事的中学红卫兵，只会大喊大叫，胡闹一通，抓那么多，有什么用？越抓越多，越压越多，牢里都放不下了；
4. 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坐火车不要钱，如此下去，国家如何受得了？经济如何发展？人民如何生活？

朱成昭的这番话，后来被人们概括成“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4个短句，称之为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观点”。

朱成昭还说，他准备将这些看法写成大字报公布出去，但又考虑到地院东方红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了，公布出去会造成混乱，运动至少会推迟半年，所以还没有最后确定写还是不写。

朱成昭的发言让大家始料不及，人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朱成昭究竟怎么了。李贵很快就清醒了，说：“这可是大事，不能胡来。”汤鸣皋则表示同意朱的看法。我看了看六十五军首长，他们面无表情，纹丝不动。我在总部办公室的这些日子里，不断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信”、“求救信”，接触到来校串联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深感一个“乱”字，乱得不可开交。我特别看不惯动不动就让批斗对象下跪、戴高帽、挂黑牌，所以很赞同朱成昭对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的看法。当时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便小声对他说，如果写大字报，我也签名。

研究军训的会议，因朱成昭突如其来的发言而不了了之。

朱成昭是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的，很快就传到中央文革那里。1月23日，陈伯达的秘书张光有传达了陈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批示说，听说你要同我们干，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如果你要这样做，就会掉到茅屎坑里。朱听了这批示，很不服气。他对我说：“都说薄一波的6·22批示是万吨水压机，陈伯达的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要厉害。”他还说他只不过是想写大字报，考虑到影响太大，并没有写，陈就要一棍子打死他。中央文革过河拆桥，他准备坐牢等等。

我们总部几个人，也觉得陈伯达的批示太过分，就决定去找肖力解释一下，看看她的态度。一天晚上，蒋良朴、杨雨忠和我等几个人坐了辆吉普车，到北京近郊的门头沟煤矿找肖力。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肖力便下到工人中去了。我记得我们抵达门头沟时已是深夜，肖力是披着军大衣，从一间平房中匆忙出来与我们见面的。我们在寒冷的室外与她交谈，具体怎么讲的已无法记起。我印象中她好像已知道了朱成昭的事，因为我们告诉她朱的情况时她并没有惊讶的感觉。她说朱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要我们回去做朱的工作。

陈伯达的批示很快在学校传开了，就有一些人要揪斗朱成昭。我至今不知这是哪些人，估计应该是“斗批改”那帮人吧。朱成昭和蒋良朴躲了起来，躲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有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楼下的一阵躁动惊醒，隐约听到朱、蒋的说话声，好像在与人争论什么。我正犹豫是不是下楼看看，声音却远去了，可能是他俩被带走了。次日，我思来想去，觉得“东方红”已散了架，没有主心骨了，我还留在总部办公室干什么，还是回家当逍遥派吧。

我于1月底再次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与三个月前我第一次回来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控制了上海局面，到处可见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和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2月5

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致敬电说：“我们，上海和外地在沪的全体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含着激愤的热泪，捧着红彤彤的语录本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彻底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不久，毛泽东指示，“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上海人民公社因此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成立大会都只向毛主席个人发致敬电，仿佛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了。

我对这些已毫无兴趣，熟视无睹。我在家里看看书，与家人聊聊天，走访一些中学时代的朋友，也是自得其乐。不过我还是时不时地到三司联络站转转，打探一下学校的消息。有一天恰巧遇见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也来到联络站。张先将他的小车停在距联络站大约 200 米的地方，然后独自步行到联络站。他披着棉军大衣，斜靠着椅背与我们聊天。看似闲聊，其实有个主题，就是要学生到工人中去，发动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张讲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从容不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月中旬，我听说朱成昭回到上海，就去他家找他。那时朱成昭的家在杨浦区四平路一带，离我家不是很远。在朱成昭家里，我见到很多人，至少有十几个。其中有跟朱一起从北京过来的，也有早先就来到上海串联的人。但我能清晰记得的，只有张华府和童隆裴，好像还有王北宁，其他人都记不清了。我们七嘴八舌地述说着“东方红”早期斗争的艰苦和胜利后的喜悦，尽情地发泄对陈伯达批示和中央文革的不满。朱成昭说，现在我们是无官一身轻，不用再对东方红公社负责了，可以实现我们早就提出的宏伟的长征计划了。于是话题就转到长征串联上。不知谁说，有不少红卫兵到越南参加了胡志明领导的北越人民军，抗击美国人，我们不如也到越南打仗去。张华府说，他串联到过云南，亲眼见到红卫兵越境去了越南，从云南边界越境去越南很容易，很随便。后来，又讲到只要到了越南，就可以再到其他国家去，就可周游世界了。大家围绕周游世界的话题漫无边际地聊起来，作了种种设想，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后决定先到云南再说，如果能出去就出去，出去不了，游览一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也是件美事。

第二天，三司联络站传达戚本禹打来的电话，说戚本禹要找朱成昭谈话，让他马上回京。朱临行前，要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做好去云南的准备，如果他与戚谈崩了，我们还是要去云南，如果谈好了，大家就都回北京。

游山玩水、周游世界，一直是我向往的事，用现在的话说，是我的一个中国梦。我之所以报考地质学院，很大程度上是以为地质工作能游山玩水，走遍全国。我们家在 1950 年代订了《旅行家》杂志，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

学家侯仁之先生主编的。我三哥曾给侯教授去信，表达了我们爱好旅行的愿望。侯教授回信鼓励了我们。1957年，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三哥带着我和四哥步行到川沙江镇海边看日出（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就是那个出“赤脚医生”的地方）。走了一整天，晚上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小学借宿。因为太疲劳，年纪又小，睡得很死，第二天醒来太阳已到头顶，日出没看成。1960年，我初中毕业那年暑假，三哥又带着我和四哥徒步旅行到苏州，走了两天，晚上抵达苏州，在玄庙观的屋檐下露宿。所以，那天我们在朱成昭家里关于周游世界的设想和议论，很对我的胃口。我是真心实意想出去的，完全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更没想到我们这些议论，后来成了“叛国”的证据，我也就成了“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成员。

3月初，还没得到朱成昭的消息。我们几个决定先到云南，在云南等候朱成昭。我、张华府、戴良吉及一个非要和我们一起走的北京中学生，通过三司联络站，与来往于上海武汉之间的《东方红号》客轮的造反派取得联系，坐他们的船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从武汉到云南。船上的造反派安排我们住在二等舱，2人1个房间，有单独的浴室，可在船员餐厅用餐。轮船出了吴淞口，在长江逆水行驶了3天3夜72个小时。电影《上甘岭》里郭兰英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曾引起我对长江美好的遐想。可眼下虽已开春，依然无比寒冷，万木凋零，天低云暗，使人压抑。

船到武汉，得到朱成昭消息，要我们回北京。我们就从武汉坐火车回到学校。

回校后才知道朱成昭奉戚本禹之命，在学校“闭门思过”。同时还听说，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全院大会上以做检讨为名，大肆宣传他的“四大观点”，并且又增加了“北京市夺权时机未成熟”等观点，形成了“八大观点”。上海夺权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不能落后，也在酝酿夺权。朱成昭认为，上海一月风暴夺了权，是因为上海工人阶级力量强大，进行了全市性的大搏斗，“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而北京市的工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阵线不清楚，所以还不到夺权的时候。这就被看作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夺权，成为朱成昭的又一个大罪名。

朱成昭在西三楼327房间“闭门思过”。房门上贴着“本人闭门思过，恕不接待来访”的字条。这当然是摆摆样子的，其实天天有人去看他。我是常去看他的人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但我与他们很少碰面，只记得黄瑞华给朱送过方便面。那时方便面还很稀罕，所以我有印象。我到此时才见到叶向真，之前没见过。叶面色苍白，眼睛很大，身材瘦长，我和朱成昭讲话时，她像猫一样蜷着身子斜躺在床上，从不插话。

在这段时间里，朱成昭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禹谈了三四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

过。说叶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自 1966 年 7 月我认识朱成昭后，发觉他总能把一些问题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分析讲述，而且他目标清晰、行动果断、意志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正因如此，中央文革才树起了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东方红”很早就掌控了地院，不像其他一些学校那样分裂成多种派别，武斗不断，地院因此保持了相对稳定。“东方红”不主张批斗“牛鬼蛇神”，客观上保护了一批“老运动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学校里很多人对朱成昭怀有好感，有的甚至怀有感激之情。在对待中央文革的问题上，我虽然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但并不希望他同中央文革对抗，惹祸上身。我希望他向中央文革服一下软，认真作个检讨，这样我们大家就还可以在一起干。戚本禹也说过，朱成昭还在犹豫，拉一把，还可能拉过来。我拿了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给他。斯特朗在那本书里说，1930 年代斯大林对苏共大清洗，枪毙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央委员，从而保障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我想以此说明，目前打倒老干部的做法，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希望朱不要耿耿于怀。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幼稚可笑。

不久，院革委会成立，我参加了革委会工作，就逐渐不到朱成昭那里去了。我到革委会工作，是跟朱成昭打了招呼的。我对他说：“现在要成立革委会了，你看我是进革委会还是不进？”朱成昭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不会出卖他，但也不会跟着他干一些过激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反对我进革委会。我之所以问他，是不想让他认为我为了“当官”就抛弃他们。朱很善解人意，他说：“你去吧，你进革委会，对我们也有好处。”他的回答，使我得到很大宽慰。

后来听说他和叶向真、蒋良朴、梅建明、张华府、颜宽等跑到广州，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亲自将他们带回北京等等，对这些我一概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被逮捕关进监狱，我也不清楚。

上海“一月风暴”后，反文革思潮有所显现。朱成昭等人在造反成功，名声显赫之时，毅然反水，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虽经多方规劝仍不妥协，锒铛入狱也

无怨无悔，实属难得。上海复旦大学的造反派领军人物，最初坚决反上海市委，“安亭事件”后转而反张春桥，受到严酷镇压，与朱成昭等如出一辙。

反文革思潮逐渐蔓延全国，既有造反组织的集体转向，也有个人的奋力抗争。更多的则表现为文革热情的衰退，逍遥派的骤增。

保守派的所作所为实际也是与文化革命宗旨相抵触的，但他们始终不敢旗帜鲜明的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因此与那些转向的造反派有实质性的差异。文革中，转向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惩治，可是文革全盘否定后，他们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已平反，却依然被边缘化。保守派则受到信任。这就造成了朱成昭的悲剧。这也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添上了悲壮的一页。

我再次见到朱成昭，已是十二年之后。

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就预感朱成昭他们将要平反了。1978年，朱成昭他们出狱回到学校等候落实政策和分配工作。那时北京地院已迁到武昌，叫武汉地院。朱成昭让蒋良朴写信告诉我这一情况，可是信寄到我当时所在地质队的那天上午，我就回上海探亲了，所以直到半个月后我从上海回到队上，才看到那封信。我马上又请假，次日上午就到了武昌。

进入武汉地院，到处都是要求把学校迁回北京的标语。我见到了朱、蒋和张华府。颜宽好像是已分配工作或是回上海探亲，没在学校。大家受尽磨难后久别重逢，自然唏嘘不已。我一直想问他们究竟干了什么，以至于判刑坐牢，我还想知道他们在牢里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吃了很多苦……但不知为什么，不知他们是不是有意回避，总没有形成谈论这些话题的机会。我看到学校负责落实政策的老师到朱这儿来，朱向他们发脾气，他们都是笑脸相对，好言宽慰。那时，很多64、65年入学，69、70年毕业并已分配工作的同学，又回到学校补课，叫做“回炉”。他们午饭时在食堂门口看到我们，高兴地把我们围住，争着和我们握手。有认识的就相互叫着名字问好，不认识的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哪个系哪个班或那个战斗队的。那情景真是感人极了。

我在武汉地院住了一晚，在招待所遇到张海涛，他也是来要求落实政策的，显得很憔悴，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因为朱成昭落实政策和分配工作问题一时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能久等，决定回去。当时，张华府的女朋友从广州来陪张，他们住在一起，算是有个家，所以临别那天中午，就由张做东，给我送行。张向人要了一些肉票（那时还有粮票、布票、油票之类），弄了几个菜。饭后朱、蒋二人把我送到珞喻路上的公共汽车站，就此一别，往后便失去了联系。

1993年4、5月份，我到广州出差，通过一位叫梁小萃的勘探系同学（他姐姐梁小牧是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女子羽毛球单打冠军）联系到了陈广智。陈住在天河区体育场附近，房子很好。在他家我与朱成昭通了电话，又与朱取得

了联系。陈广智是探工系一年级学生，曾是东方红办公室副主任。1966年底和1967年初的一段时间，他在公安部配合谢富治抓捕和看管“联动”分子，当时可以说是他点名抓谁就抓谁，他因此也认识了许多高干子女红二代。他是个坐不住的人，从未好好在办公室呆过。他虽说是办公室副主任，但我从没管过他，也管不了他。朱成昭出狱等待分配和后来在北京十三陵那段日子，陈都给朱邮寄过生活物品，可见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在广州见到陈的时候，他因为不服从单位领导，丢了工作，身上没钱，当晚为了请我喝夜茶，把他弟弟叫来替他买单。后来我又到过几次广州，去看他，他的工作问题一直没解决。可惜他已过早去世，不然，有关“联动”的情况，他会叙述得很清楚的，他也很善于叙述。

我与朱成昭联系上后，于8、9月份租了一台钻机，带了一个钻工，到了上海，在朱成昭那里住了40天。

朱成昭分配到江苏省地质局水文地质二队，队部在苏州。不久，他被队上派到上海从事工程地质工作。在上海有了一定基础后，他开始单干，挂靠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属下的四海工程公司，任该公司三处处长。那时上海正在大规模建楼房，修高架路，全国各地的施工队伍云集上海。朱成昭有四海工程公司的招牌，又有他父亲在上海建工局的一些关系，干得顺风顺水。他在上海西郊公园附近的一个老干部休养所租了一个单元，大约有七八间房间，作为他的“三处”机关所在地。我到那里的时候，朱还在浦东工地上，晚上才赶回来与我见面。当晚颜宽知道我来了，骑自行车从他家过来。他出狱后经过一番周折，最后调到上海港务局工作，回到了上海。我和他二十多年没见了，我俩紧握双手，久久没有松开。谈到深夜，他说朱成昭“当家不理财，不是搞经济的料”。他说，起初，朱成昭认识了一个三流女演员，两人同居，让那女人管理财务。后来朱又有了新欢，带着新欢去老家安徽巢湖游玩。那位三流演员又妒又恨，席卷了资金，带了两台钻机跑了。最要命的是她还到处讲朱成昭的坏话，卡断了朱的一些业务来源。此后，朱成昭又如此重复一遍，再次遭受了同样的损失。现在的这位小蜜，已是第三个了。颜宽告诫我，朱成昭经过这两次变故，元气大伤，现在只是勉强维持，恐怕很难翻身了，叫我不要陷得太深。我说我已带了台钻机过来了，看看再说吧。

第二天，朱成昭召集了他的全班人马一起吃饭，有出纳、会计、保卫和他的小蜜、他的堂弟及从工地回来的几个管施工的共十来个人。那些管施工的都是他安徽老家的亲戚，都姓朱。饭菜是自己弄的，只在外面买了几瓶啤酒。朱成昭正式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他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是杀头的朋友，今后我的话就是他的话，让他们都要听我的。那些人听朱这么说，但看我又是个不起眼的人，不知我有什么来头，都很惊奇。饭后，朱成昭说我不熟悉工程施工的事，不用去工地，就在这里替他管好这个家吧。

这个家其实没什么可管的，经常在这里的只有三四个人，由那个女出纳买菜做饭。有时那小蜜没出去，也在那里吃饭。小蜜二十多点年纪，很白，但也说不上有多漂亮。她摆出一副贵妇的派头，养了条哈巴狗。这畜牲喜欢咬人，被咬的人敢怒不敢言。有一次这狗在我脚下磨蹭，我狠狠一脚将它踢飞出去，那小蜜也没敢作声。财务的账上根本就没钱，实在没钱买菜做饭了，就向小蜜要个一二百块维持几天。小蜜不在的时候，只好我拿钱给他们救急。其实当时朱成昭还有几十万老工程款没收回，他也就不再去讨要了。因为朱挂靠在四海工程公司，工程款不直接打给他，而是打给四海公司，四海公司不及时下拨，朱成昭就发不出工资。有一回我和朱成昭一起到四海公司的办事处去催工程款，办事处在延安西路的延安饭店内。办事处的人不但不给钱，反把朱成昭数落了一番，朱只能尴尬地笑着。我心想朱成昭何时受过这样的气？过去都是他训别人，哪有别人训他的，他连中央文革都敢顶撞，如今却要在这个既不像军人、又不像商人的人面前陪笑脸，真是难为他了。由此可见经济的力量要大于政治的力量，政治上可以喊口号应付了事，经济上却是实实在在能否有饭吃的问题，所以经济因素更能改变人。

朱成昭不愿低声下气求人，就不知从哪找了个女的替他讨账，答应讨回后按比例给她提成。那女人三十多岁，一脸横肉，我看她就像是社会上的那种女混混。后来据颜宽说，这女人确实讨回了一些工程款，但都进了她自己的腰包，朱成昭一分钱也没得到。

朱成昭常在浦东工地上，我也不经常见到他。有一天我们终于有时间做了一次长谈。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战役是经济战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经济战役是为第三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他还说，等我们赚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座小别墅，把大家召集起来，读书、学习、讨论、写作，开展文化运动。

朱成昭的这一席话，使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没想到他还有如此长远的打算。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这么久，不像欧洲那样挣脱中世纪宗教神权的桎梏后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运动。关于这些问题，朱成昭有更深入的看法。我们又回到现实问题上。我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公司和施工资质，哪怕是三级资质也好，不能长期挂靠别人的公司，受人钳制。我还建议朱从他的办公地腾出几间房间作为招待所，凡地院同学出差来上海或途经上海，都请到招待所免费吃住。北地同学遍布全国各地，有许多搞工程的，还有不少有一定职权的，不愁没有施工队伍，不愁没有业务来源。长此下去，就可以建立起我们“东方红”的工程公司。

几天后，朱成昭可能是通过他那小蜜的弟弟联系到浦东陆家嘴一带一家乡镇企业（小蜜家在浦东，我去过她家）。这家乡镇企业有三级基础工程施工资质，有几百平米的平房做办公地点和仓库，说是只要先预付 2 万元定金，资质和房子都可以给我们用。我和朱成昭去看了现场，很满意。可是朱始终没能拿出 2 万元，此事便告吹。

我在朱成昭那里已住了一个多月，不能不回湖南了。离开上海前，我约颜宽和庄一龙在火车北站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见面，通报了朱的情况。大家无可奈何，我乘车离去。

1996 年前后，我再次来到上海，让颜宽带我去见朱成昭。那时朱已住到徐汇区他的前妻那里。颜宽说朱成昭已经完全垮了，因为他付不起工资，他的那些亲戚就翻了脸，将他办公地的电视机等值钱东西一抢而空。小蜜自然也离开了他。朱的堂弟朱成树由朱成昭担保，借了 20 万元开公司做生意，将 20 万花个精光，一件生意也没做成。因为是朱成昭担保的，人家就向他要这 20 万。朱成昭没钱，被派出所带去关了起来。上海的一些同学和亲戚朋友凑了一点钱，才把他保出来。颜宽带我到了朱成昭前妻家里，我说走，到外面吃饭去。朱说他没钱。我说又不要你请客，我来买单。我们三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前的衡山路上的一家饭店吃羊肉火锅。此次午餐，成为我和朱成昭的永别。

1998 年 3 月，朱成昭应邀赴京，居十三陵悼陵监村北极山庄，潜心思虑编写“东方红”史及回忆录等事宜。9 月 26 日早上，我突然接到朱德瑜电话，告知朱成昭病逝，并号召北地同学捐款，以料理后事。我随即邮去 300 元。中国地质大学组成“地大同学朱成昭治丧小组”，蒋良朴从武汉赶到北京主持和处理善后。数日后朱德瑜又给我一信，内有《朱成昭生平》、《朱成昭在京的最后经历》函件各一，另有朱成昭遗照、追悼会照片等。现将地大同学朱成昭治丧小组写的《朱成昭生平》抄录如下，也算是我对他的祭奠吧：

### 朱成昭生平

1942 年 1 月 20 日生于上海。1960 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1962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6 年 6 月至 1967 年春在地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接受审查。1978 年恢复自由后，分配到江苏地质局第二水文大队工作。1979 年 10 月平反。此后经商写作，多所筹划。三十年来载沉载浮，艰苦备尝，瞑目以念东方，翘首以望北极。眠食无节，心力憔悴，于 1998 年 9 月 25 日晨在北京昌平十三陵北极山庄溘然长逝。终年 56 岁。

## 六、革委会

1967年3月11日，我和张华府等从武汉回到北京。张先带我到了四机部副部长王世光家里。王世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他的女儿王白沙是我们地院附中的学生，可能是年龄相近的缘故吧，她和附中的几个学生与张华府、陈广智、徐建勋等69、70届的低年级同学关系较好，时有来往。在王的家里，我看到了3月5日戚本禹会见地院东方红同学的讲话。戚问大家：朱成昭垮了，还有哪些人可以当东方红的领导人？同学们回答说有王大宾、李贵、孟繁华、田春林和伏庆是等人。我极少在大场合上出头露面，更没有一呼百应的魄力，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没想到同学们居然会提到我的名字。但不管怎么说，这对我都是一种激励。我回校后，一方面时常到“闭门思过”的朱成昭那里去，一方面又与大宾、李贵等着手筹备成立革委会。

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大操场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东方红”的负责人或早期成员，除了朱成昭、蒋良朴因反中央文革扶不起来，蔡新平、周永璋因与朱成昭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而很早就被边缘化之外，几乎都进入了革委会。王大宾是院革委会主任，李贵、聂树人是副主任（聂是否在革委会成立之初就是副主任以及如何成为副主任的，我已记不起来了），田春林、孟繁华、杨雨忠、朱德瑜等学生及黄振群、贾振远、张海涛等老师或行政人员，都成为院革委会常委。原先各个系的“东方红”负责人大多都成为院革委会委员或常委，同时也是各自所在系的系革委会主任。

院革委会的组织机构，大致分为办公室、政工部、作战部、后勤部和东方红红卫兵总部5大块。各大块又下设分支机构，如政工部下设组织、宣传、教改组；作战部下设情报、动态组等等。孟繁华、黄振群主管政工部，杨雨忠、田春林主管作战部，朱德瑜、黄光复（原后勤处干部）主管后勤部，田春林兼管东方红红卫兵总部，我还是老本行，主管办公室。那时为了精简机构，部以下不再沿用“处”、“科”设置，一律称为“组”。

革委会成立不久，便接连发生了几起大事件。

## 一、冲击“沙家浜兵团”事件

1967年4月8日午饭后，探工系的一个同学匆匆忙忙来到办公室，要拿东方红公社的大旗。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冲沙家浜兵团。

“沙家浜兵团”是北京京剧团现代京剧《沙家浜》剧组人员的组织，是江青亲自扶植的革命样板戏剧团，所以我就对他说：“沙家浜兵团不能冲。”那同学扛起放在办公室里间的东方红大旗就往外走，边走边说：“你知道什么，这是作战部决定的。”

下午4、5点钟左右，冲沙家浜兵团的人用汽车将一部分北京京剧团的人带回

学校，但那些人拒不下车，要求立即把他们送回去。双方相持不下，就到革委会办公室找头头解决。我下去一看，只见教四楼前停着一辆大客车，车上坐着京剧团的人，车下围着我们“东方红”的同学，相互争吵着。我进到车内，对他们说，这样僵着不是办法，有什么话请你们到革委会办公室慢慢讲。他们仍然不下车。我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下车。车下的同学火了，愤怒声四起。我正在为难，田春林来了，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诉说情况，说是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兵团打了我们的人，抢了我们的车，所以被拉到学校来了，可又赖在车上不下来等等。田听后把手一挥，说：“把他们拉下来！”同学们要的就是这声号令，立刻上车，七手八脚把几个为首的拉下车，其余人也就自己走下来了。这时，院革委会的两位常委黄振群和张海涛也过来了，把京剧团的人和一些同学请到教四楼的教室里进行调解。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不清个头绪。不久，田、黄和我们“东方红”同学都吃晚饭去了，只我和张海涛陪着沙家浜兵团的人。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要给他们吃饭，二要派车送他们回去，三要向他们赔礼道歉。我和张觉得，给他们吃饭是理所当然，派车送他们回去也可考虑，只是目前还不知谁是谁非，谈不上赔礼道歉。他们说不答应条件就不走，我们说不走就在那里耗着，我们奉陪。大约晚上8、9点钟，中央文革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沙家浜兵团是江青同志支持的，与他们发生冲突是错误的，要我们答应他们的一切条件，送他们回去。我和张海涛这才给他们讲了许多好话，派车把他们送走了。

次日晚，中央文革为此事在政协礼堂召见我院和其他几个学校的代表，我也去了。原本是戚本禹和大家谈的，等了很久，不见戚来。最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工作人员代表戚向大家介绍了北京京剧团的情况，说过去你们不了解情况，与他们起了冲突，不怪你们，就算了，今后可不行，下不为例。

那时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最先说这话的好像是江青，但也不敢肯定。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然是中央文革说了算。地院东方红打江青的样板戏剧团，是“好人打好人”的典型案例，不过两家究竟为何打起来，我至今没搞清。

## 二、中央民族文化宫事件

1967年4月8日晚，我送走了沙家浜兵团的人，在院革委会办公室守电话。夜深了，一切都入睡了，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杨雨忠从民族文化宫打来的。他说我们和北京大学打起来了，我们被包围了，需要派人支援。我问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民族宫里有个建国以来民族工作成就展览，是北京旧市委彭真他们搞的，贯穿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北京红代会决定将此展览封闭，以待批判。但北大聂元梓等却要将展品劫到北大，独揽批判权。我们知道后前去干涉，他们叫来人

把我们围住，这样我们就被夹在中间，前后受敌，不来支援就不能解围。这种事本应作战部管，但他们都在民族宫，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出马。我到北五楼叫醒了正在沉睡的张学连等几个探工系负责人，他们又叫醒了一些同学，集合了两卡车人，急驰而去。

卡车到了西长安街上的民族宫附近，我让车停下来，要大家原地待命，我先去看看情况。在民族宫前广场的大门口，我见到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的头头高升，他带了一卡车人来支援地院东方红。我和他进入民族宫，看到大厅内三五成群地坐着或躺着好多人，但都很安静，看不出发生激烈冲突的痕迹。我想问题并非电话里讲的那么严重。在楼上一房间里，我见到了杨雨忠。他说危机已过去，中央文革来人调解了。我看，原来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张根成来了，北大的聂元梓也在。双方争着讲各自的道理，乱七八糟，听不出个所以然。张根成要双方各选几个人留下来讲道理，其他人都离开这房间。杨点了胡乐成、郑文清、董小瑛等几个作战部的人，要他们留下来。我是后来者，不了解情况，便退出房间。在民族宫里，我遇到了孟繁华，感到很惊奇，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在这里。孟也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年初写了篇文章，提出造反派要夺头脑中“私”字的权，实行革命大联合（大意，不是原话），发表在我们学校自编的《东方红报》上，被毛主席看中，让《人民日报》转载。孟因此成为地院革委会常委，毕业后破例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他做事稳妥，为人低调，不好张扬。在场的一些同学看到我俩，笑道：“真不简单，文人也上阵了。”

我通知在外面等候的两卡车人到大厅内休息后，就在四处转了转，又遇到了田春林，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和田来到我们学校同学聚集的地方，看到同学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又冷又疲倦，便建议大家都回学校。但有些人兴致很高，不愿回去。看来没有作战部杨雨忠的命令，调不动他们，我和田春林就离开大家，先回学校了。到校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已拂晓。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带兵“出征”，幸好是有惊无险。

后来听说由于这次事件，存放在民族宫里的许多重要档案、文件、材料遗失了，事件的起因并非民族工作成就展和展品问题，而是有很深的内幕，为此上面追查了很久。不知如今水落石出否？

民族宫事件震惊北京，北京学生造反派的分歧由此公开化，形成了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为主的“地”派和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大学为主的“天”派。

### 三、北京大学事件

4月11日，地院、北工大等地派组织，派宣传车进入北大校园，宣传民族宫

事件“真相”，声讨制造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聂元梓。北大的同学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包围了宣传车，揪打了宣传车里的地派同学。挨打的向各自学校打电话告急，各校纷纷调兵遣将杀向北大。我得知这一情况已是晚上。地院离北大不是很远，那里的高音喇叭尖叫声和激动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呐喊声，时隐时现地传到我们学校。我在办公楼前的大路上，看到一群人围着王大宾，向他“请战”，要他下命令，大宾却在犹豫不决。不一会儿，可能是作战部出面，调了大批人去北大，也有一些人是跟着去看热闹的，学校几乎走空了。

我也跟着人群到了现场，只见北京大学围墙外人山人海，将北大围得水泄不通。北大各处校门都紧紧关闭着，里面有人把守，一旦外面的人往里冲，一场大规模武斗必不可免。后来不知是北大屈服了还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北大的校门打开了。外面的人群涌进校园，立即在操场召开了“现场会”。我看到操场上挤满了人，近处的人群和远处楼房的黑影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人群，哪是黑影。我远远看去好像是杨雨忠在主持会议。胡乐成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阵阵掌声和口号声。可惜我已完全记不起他讲了些什么，也可能当时就没听清。还有一些挨打的同学，也上台控诉了北大的“法西斯暴行”。我看到场面已经稳定，没什么事了，只身返回了学校。

地派冲进北大并在北大控诉北大，可以说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地派因此威名大振。

在这之后，北京各高校相继成立了革委会。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我代表地院革委会前去祝贺，在主席台上见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科大名誉校长郭沫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念了首诗以示祝贺。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红旗插遍大、中、小”。就是说大、中、小学都成立革委会了，也就都插上红旗了。毛泽东曾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告诫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因骄傲自满而丧失革命政权。为此我特意看了这篇文章。在我看来郭文中流露的意思，是李自成没能听取知识分子李岩的意见才导致短命的大顺朝的毁灭，并对李岩和红娘子的命运表示惋惜，可见郭内心是怀有深深的知识分子情结的。文革后期我又看了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女神》等，这些作品以优美的文字，动人的情感表达了对正义和自由的赞美与向往。郭沫若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又写了一些颂扬毛泽东、江青的诗，直白得像标语口号，让人不齿。不过正因如此，他才能成为文革中寥寥可数的几个未遭灭顶之灾的文化大家之一。

北京各高校虽然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派战却没停息。我对天、地两派的争斗完全没有兴趣，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争斗。在我看来，聂元梓要把民族宫的展览拿到北大去批判，让她拿去好了，谁批判都一样，我们没必要同她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认为，既然成立了革委会，就应该恢复正常秩序，管好自己学校的

事情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去冲冲杀杀呢？我把这些归罪于作战部，认为作战部的权力过大，独断专行，牵着革委会的鼻子走。为此我向常委会提出两项建议。第一项是完善、健全院革委会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能、权限和相互关系，任何部门都不能凌驾于常委会之上——为此我还附了一份院革委会组织机构图及其说明；第二项是加强集体领导，建立常委会会议制度，一周至少要召开一次常委会碰头会，一切重大问题需由碰头会讨论，任何部门不能擅自行动。我又以院革委会办公室名义作出几项规定，其中一项规定是学校车库出车，需经李贵或我同意方可派车外出，借此限制作战部的擅自行动。

几天后，大宾来到我办公室，给了我几本列宁、斯大林阐述联共（布）组织建设的著作，要我参考，进一步修改我的建议。我心想这么简单的事，常委会定了就行了，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吗？我翻阅了一下他给我的那几本书，反而不知该怎么写了，我的建议也就搁浅了。最近我因为写回忆而整理从前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在 50 年前的破旧记录本里，找到了这些建议和规定的底稿。

1967 年 4 月至 8 月期间，派战成风，混乱不堪。当时的情况是，地院东方红在学校取得一统天下后，北京各高校的造反队伍也迅速扩大，但大多数学校始终没能形成一派独大的局面，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也是几派势力的混合体。各派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就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革命、更造反、更有影响力，这样才能得到中央文革的认可，才有可能在已经成立或将要成立的各级革委会中，取得立足之地。因为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时不时变更，“你方唱罢我登场”，实难捉摸，弄不好就反错了人或保错了人。例如中南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文革初红极一时，但很快就倒台了。陶铸在文革初一步登天，成为仅次于毛、林、周的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又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揪了出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武汉“7·20”事件后归来，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盛大欢迎，没几天也被揪出来了。各派组织抓住对方保错了人或反错了人的把柄，相互攻击，造对方的反。原先的一些保守派组织也改头换面，树起了造反大旗，加入混战。部队文艺团体、军事院校、军事机关也出现了造反组织。毛泽东发出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后，军队名正言顺地介入了地方文革。各派都自称是革命左派，未得到部队支持的一派，便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支左人员，说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名为支左，实为推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深挖部队支左人员的后台，进而出现了一股“抓军内一小撮”之风。派战也就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搅得周天寒彻”。

北京以外各个地方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只是越往基层，越是混乱，越没有道理可讲。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之间的“山头”之争，群众组织的内讧或相互吞并，文革前领导班子成员的勾心斗角、挟私报复，不同阶级成分地位的不平等，

都可能成为派战的缘由。派战往往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机枪。举国上下，狼烟四起，不亚于一场内战。我班同学贾维谦，参与四川两派武斗，打伤了腿。他山东农村老家的妻子来校护理，生活困难，我让后勤部补助了他200元钱。另一同学李全华，在四川武斗中被打死。院革委会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李贵为主任，我是副主任，在教工食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我的那些建议和规定主要是用来限制作战部的，但我对杨雨忠本人并无恶意。杨也是上海人，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有一种学者风度，不像个敢打敢冲的人。他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打派仗呢？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名声早已确立，根本不需要再去争斗。如果说他希望因此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但他上头有王大宾，王可以说是御批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王大宾。所以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把地院东方红，或者说是把自己当作了正确路线的化身，就像红二代们把捍卫祖辈打下的红色江山看作是天经地义一般，他把“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他那办公室的灯光时常亮到天明，他在灯下仔细研究着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情报、动态，分析形势，鉴别哪些是真造反派，哪些是受走资派幕后操控的假造反派，决定哪些该支持，哪些该反对。我曾劝他不要管那么多事情，他瞪着我，露出不屑的神情，反倒说我、同时也连带到田春林，说我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混日子。杨雨忠确实是全身心投入到文革中去了，可以说到了忘我的境界。但或许正是他的这种执着，才让他丢了性命。1968年5月30日下午，杨雨忠从他的宿舍里跳楼身亡。那天中午，我在去食堂的路上，恰巧遇到他。那时我和他都已离开革委会回班接受审查。我见他面色苍白，神情恍惚，步履蹒跚，便劝他要想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凝视了我片刻，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没说一句话，低头往食堂走去。当晚我听说他跳楼了，大吃一惊。那时革委会对我和他的审查，主要是朱成昭问题，据我所知，他与朱的关系，恐怕还没有我与朱那么密切，能有多大问题？据说他班的同学批斗了他，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是不是为了尊严而死？或许，因为作战部涉及的事过多、过大，他因后怕而死呢？这些都是我的猜测，真相至今不明。

杨雨忠说我和田春林混日子，并非没有道理。革委会成立后，鸟枪换炮，办公室有了十多个工作人员，有同学，也有老师，不是“东方红”时期只我一个光杆主任了。我把办公室分为“一线”和“二线”。“一线”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称作“办事组”；“二线”主要是为常委会服务，称作“秘书组”，分别由两位副主任（都是老师）负责。我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田春林因为跟杨雨忠合不到一块儿，所以名为作战部的负责人之一，其实没真正管过作战部，红卫兵总部也没多少事可干，我们就有了较多空闲时间。我和田春林都不是喜欢抓权管事的人，并且早已对打派仗厌烦，乐得清闲自在。当时有个设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批毒草电影

联络站”，我们经常到那里的小放映室看“毒草”电影，还到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去看他们的排练或演出。文工团的女演员叙说她们在文革前去中南海陪伴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的事，我觉得很新奇。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我心中的印象是艰苦朴素、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例如毛主席的睡衣补了又补，刘主席思虑国事白了头发，周总理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等等。没想到中南海每周都有舞会，而且有文艺团体的年轻女演员陪舞，真让我大开眼界。

7月份，又发生了围困中南海的大事件。

1967年7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说是刘在文革初期到过他们学校，亲自在他们学校贩卖了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他回建工学院检查交代问题。刘少奇为此写了一份材料，不知怎么却被交给了该校“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新八一战斗团”是从老“八一战斗团”中分裂出来的，属天派组织。“老八一”认为刘故意将材料交给“新八一”，是只承认分裂出去的“新八一”而不承认他们正宗的“老八一”，是分裂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于是就把队伍拉到中南海西门外，要求刘少奇出来接受批斗，不出来不行，不出来他们就绝食。“新八一”为了撇清和刘少奇的关系，也来到中南海前绝食示威，要求批斗刘少奇，显得比老“八一”更激进。地派组织赶来声援老“八一”，天派组织则赶来声援“新八一”，全北京的高校差不多都卷了进来，形成了数万人围困中南海的局面。中南海西门外大街成了“揪刘火线”，持续了很多日子。据说戚本禹在中南海西门会见了揪刘火线的革命群众，代表中央文革肯定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和革命积极性。

这些都是我当时听说的情况，实际如何，不得而知。我们学校作为地派之首，自然要去支援。最初是作战部组织了一批人前往，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记得杨雨忠从“揪刘火线”叫人带了一张纸条给我，要我为“前线”准备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之类，好像还有帐篷。我说办公室不管这事，就转给了后勤部。

我参加的一次是全院行动。我们到了“揪刘火线”后，只见人群似海，红旗如潮。“前线”的人见来了支援队伍，一片欢呼。地派的头头们立即聚在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对策。其实大家心中都明白，刘少奇毕竟是国家主席、国家元首，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强行抓出来批斗，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谁也不敢负这个责任，不敢留下这个骂名。即便是毛泽东，此刻也不可能作出让刘少奇走出中南海接受群众批判的决定。所以围困中南海，顶多不过是造造声势而已，应该适可而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体面地收场。此时，不知何人传来消息，说是天派的人准备强行冲进中南海，硬要把刘少奇揪出来。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他们真要冲，我们的人必须守住中南海围墙，绝对不能让他们冲进去。然而并没有发生往里冲的情况。

到了下午6、7点钟，我们决定返校。同学们疲劳过度，走不动了，要求派车

来接。我在附近的胡同找到个公用电话，通知学校来车。车库出动了所有车辆，边走边接，往返好几趟，才接走全部人员。

围困中南海事件最后是如何收场的，我已完全没有印象，只知道刘少奇从此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听说他先是在中南海接受身边工作人员的批斗，后被秘密转移。至于谁决定他离开中南海，又是如何被转移的，就不是我们该知道的事了。直到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到来，才知道刘少奇惨死于河南开封。

那时候，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文革恐怕就是学北京地院了。各地、各单位造反派以能得到地院的支持为荣。许多文艺界、体育界的名人也来地院串联。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等乒乓名将都来过地院，我在办公室与他们交谈，互赠毛主席像章。庄则栋与徐寅生后来都当上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徐是因为写了篇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打乒乓球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而庄则栋是在参加乒乓球邀请赛中对美国运动员主动表示友好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起到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作用，当时被称为“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从而得到中央的重视、提拔，“四人帮”垮台后，丢了官，受审查。

从1967年4月到10月，我主持接待了七批来地院参观学习的外宾。其中规格最高的是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来的锡兰（如今叫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他还带着他那可爱的小女儿。其他就是日本和非洲一些小国家的民间团体或社会组织。接待方式主要是组织“东方红”同学与他们座谈。我通常会找东方红广播台的同学参加座谈。有个称作“小豆豆”的播音员郁秀荣，口齿伶俐，思路清晰，表达能力很强。有时也叫上一两个我们班的同学，例如温加寿，他平时少言寡语，我就让他来“见见世面”。来访的外宾问的大多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还要夺权，什么是走资派之类概念性的问题，至于武斗、死人之类的细节外宾一般不会问，我们当然更不会主动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年轻，却已深谙“家丑不可外扬”之道，能够自觉遵守“宜粗不宜细”这一原则了。

刚果（布）即首都在布拉柴维尔的刚果新任驻华大使在使馆举办招待会，招待各国外交官，意在其新上任，与大家认识一下，也给地院发了请柬。我没让学校派车，独自前往。我知道这种场合不能迟到，但也不能提前，所以先乘公交车到了三里屯使馆区，找到刚果（布）使馆，然后在附近溜达，等时间差不多了才进去。门前站立着二男一女三位使馆人员（当然都是黑人）迎接宾客，依次与我握手。北京市革委会外事组长丁国钰与新任大使一同进来后，招待会正式开始。所谓招待会，就是在一大客厅内围绕一张长条桌站着喝点饮料，用些糕点菜肴，并不是正式的宴会。各国外交官及夫人们端着酒杯在大厅内来回走动，相互问候致意。现场只我一人戴着红卫兵袖章，特别显眼。老外都不搭理我，只是用一种

奇特的目光瞄我一眼。有个中国官员模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走到跟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有没有车，招待会结束后要不要他送我回去。我谎说我有车，婉言谢绝了。

那个时候，中国既反帝又反苏，在国际上很孤立，只与远在亚得里亚海边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小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阿国家歌舞团访华期间，与红卫兵联欢，我也去了。在人大会堂二楼一间大厅内，阿方表演了“山鹰之歌”等，我方表演了“拿起笔做刀枪”等。联欢会表演的节目概括而言就是拳打脚踢、活蹦乱跳。地毯上扬起灰尘，大厅内乌烟瘴气。联欢会在“北京——地拉那”、“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歌声中结束。

越南副总理黄文欢也来过地院，院革委会召开全院大会隆重迎接，王大宾和黄文欢在大会上先后讲话。那时我可能已离开革委会，对具体情况没一点印象。

革委会成立后，除在革委会中有职务的外，全院教职员都回归原状，从哪来的回哪去。虽然很多活动依然打着“东方红”的旗号，但“东方红”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已名存实亡，完全附属于革委会了。有些“东方红”成员认为革委会是“东方红”艰苦奋斗得来的，一些在艰苦时期没参加斗争或斗争不力的人，如今却进入革委会或成为革委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是摘桃派。王大宾、李贵容忍这些人，就是忘记了过去。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现在的革委会已经变质，不能代表“东方红”了。学校里因此出现了要求朱成昭复出的声音。

大约在6、7月份，宋云十分神秘地把我从办公室叫出来，通知我晚上参加一个会。宋云是学校里的一个工人，6·20那天报名保卫李贵的人中好像就有他。后来他成了“东方红公社工人赤卫队”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他是个“老东方红”。革委会成立后，他好像在后勤部负一些责。我因为很早就认识他，而且办公室与后勤部工作联系较多，所以跟他很熟。晚上我到了开会的地方，看到大约有二十来人，以工人为主，也有几个学生，都是熟面孔，但大多叫不出名字。大家七嘴八舌，表达对革委会的不满。他们说，只要我站出来，向革委会要求朱成昭复出，他们立即在外面响应，大造声势。我深深为他们对我的信任而感动，同时又觉得他们太肤浅无知。我说，大家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朱成昭的问题很严重，不可能复出了。我讲完后，便散会了。

这件事情，我没对任何人说，至今无人知晓。从感情上说，我当然希望朱成昭回来，但是我知道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即使朱能回来，对他本人，对大家，对我们学校，并不是好事。因为按朱的脾气，他回来后必定会带领大家同中央文革对着干。有了地院这个阵地，对抗的程度必定更为激烈，结果朱等人就不是坐牢而是杀头了，同时也会有大批追随者跟着一起遭殃。再说，学校里本来就有一批

反朱的人，他们必定趁机拉起队伍，两派互斗，学校大乱。

此事之后某日，院革委会正在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办公楼二楼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院、系革委会的负责人。突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开会的人都很惊奇，不知出了什么事。不一会，还没听清喇叭里讲什么，声音又没了，于是继续开会。不久，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两个勘探系“红色尖兵”的同学一左一右扯着胡乐成的胳膊进来了。他俩说胡擅自广播“新东方红公社”声明，妄图颠覆革委会，问大宾该如何处理。大宾皱着眉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胡乐成刚想说话，那两同学将胡的胳膊往上抬，他的肩膀就自然向下压，两同学又使劲拉着胡的头往后仰。胡的上衣领口就勒住了喉咙，几乎说不出话来。只听他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大，大宾，你们不，不，不能这样对待我……”全场鸦雀无声，没任何人表态。那两同学觉得在这里问不出结果，就押着胡离开了会议室。

此时我才知道出了个新东方红公社。新东方红公社的宗旨是什么？包不包括宋云他们？后来是如何处理胡乐成的？我一概不知道。我的印象中，此事没有扩大，新东方红公社到此为止。院革委会对此事也没有深挖深究，估计也没把胡乐成怎么样，最多是在班上或系里批斗一番完事。

胡乐成是勘探系三年级学生。他不算是“老东方红”，但在二进地质部、四川抓彭德怀、打派仗等活动中表现得很激进，因此也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很善于演讲，他那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很有鼓动性。他虽然言语激烈，其实是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知识面很广、有内涵的人，同他聊天很愉快。他曾当面说我是事务主义者，是米高扬似的“三朝元老”（米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斯大林对苏共的多次清洗中都幸存下来，被认为是“不倒翁”），我都欣然接受。记得有一次院革委会开会分析形势，我一声不吭，直到散会的时候，我才大声说道：“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全院大扫除。”引起哄堂大笑。所以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我是个事务主义者，只是别人不当面说而已。胡乐成毕业后留校，在“一打三反”、“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受到打击，精神上出问题。我每次去武汉，都要田春林带我到他家里去看看他。开始时他讲话还算正常，不久就胡言乱语起来。

这期间学校里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批朱成昭，并且要揪出院革委会中的“朱成昭分子”和朱的代理人。朱成昭已经因为反中央文革下了台，院革委会也组织了对朱的批判，何必总揪着朱成昭问题不放呢？院革委会成员大多是“老东方红”，或是与朱有战斗情谊，或是与朱有所牵扯，所以多数人认为所谓批朱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这问题上，我与田春林发生了分歧。在7、8月间革委会的一次整风中，批朱、揪代理人的声音又高昂起来。我认为整风主要是解决革委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问题，而田春林认为整风就是要以批朱为主。为此我俩闹得很

不愉快。8月1日前后，以姚文元为团长、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头头陈敢峰（此人在中共九大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是文革期间唯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学生造反派，后因与被定为“林彪死党”的王维国的关系而垮台）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阿尔巴尼亚归来，在人大会堂做报告，我和田春林都在主席台就坐。田走到我座位前主动和我打招呼，我都没理他。但毕竟是同甘共苦的哥们，不久又和好如初。

1967年4、5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在革委会成立过程中和成立之后，几乎都出现了反对或分裂革委会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不满；有的是认为革委会成员名额、座次安排不公；有的是因为自己一派没能进入革委会；还有的是从根本上就不承认革委会。革委会是毛泽东树起来的新生的权力机构，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和分裂革委会无疑就是反文革、反毛，都受到毫不留情的压制。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因反市革委会，反王洪文，遭到残酷镇压。王大宾和院革委会对类似问题的处理，还算是温和的，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对抗。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意味着自1966年6月1日开始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代的结束。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由此开始革自己的命，等待他们的，或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或成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臭老九”。还有一些人，等到的是牢房。

院革委会开展了一些教育改革、解放干部、组织同学下乡劳动，清理文件、资料、档案，收回被占用的教室、宿舍、办公室等工作。此外，还动员同学们主动上交抄家或串联时收获的不义之财。据说有人用萝卜刻了个某某红卫兵司令部的章子，串联路上被迎来送往，吃喝随意，满载而归。这一切，其实都是为文革前阶段造成的混乱擦屁股、买单，并且远远没有擦干净，没有买完单。

11月30日，田春林被“隔离审查”。原因是田受《红旗》编辑部的郑公盾之托，通过陈毅元帅替他向江青递交了一份反映历史问题的材料，而江青说郑公盾不是好人，也就殃及了田。田春林因此成为第一个下台的院革委会常委。

1968年在寒风中到来了。新年之初，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戚本禹倒下了。至此，中央文革只剩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四位领导和姚文元一个组员了。这是不是应了朱成昭的“替罪羊”之说呢？

接着，中央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突然被宣布打倒，北京掀起了批判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大抓“黑干将”、“变色龙”、“小爬虫”的高潮，并很快波及全国。“二月逆流”说的是1967年2月，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帅和副总理在中

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发生争论的事。当时，“二月逆流”被看做是资反路线对文革的猖狂反扑，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

随着对“二月逆流”批判的升级，朱成昭的罪名也水涨船高。由朱和叶向真的关系，联系到他们和叶剑英的关系，因此“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又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爬虫。学校里批朱和揪革委会里朱成昭分子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我也感到了岌岌可危。3月份某日，大宾来到我办公室，坐到我对面，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冒出一句话：“伏庆是，你要加强学习。”我理解为这是他婉转地要我离开革委会，我就有了走的打算。我对留不留革委会并不在乎，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这帮学生能坐稳革委会这把交椅。这不是我事后诸葛亮，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我之所以有这想法，完全是出于常识，也可以说是出于本能。自我懂事起，就知道共产党的干部都是领导提拔的，从没有平民百姓推翻领导取而代之的。革委会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而不正常的事情是不可能长久的。每个地方都成立革委会，那要不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呢？

最后促使我离开的，是贴在办公楼正对面的大字报。那大字报说我是隐藏很深的朱成昭分子，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给死刑犯名字打红叉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不知源于何时，只知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法院布告还都保持这一特色。虽然大字报不是法院布告，但仍让我胆战心惊，决心一走了之。我向物探系一位叫蔡永胜（或盛）的同学借了20元钱购买返沪的火车票。蔡的父亲是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家境富裕。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之初，他找到我，将一辆机器脚踏车捐给了我们。那个时候这种车子是极为罕见的，不像现在遍地皆是。他说放在家里迟早会给红卫兵抄家抄走，不如给你们“东方红”。那车成为东方红总部的公车，成为来往于学校和地质部的主要交通工具。朱成昭等总部人员曾在地质部前的西四大街上争先恐后地抢着练习骑这辆车。蔡后来出了国，我借他的20元钱至今没有还给他。

1968年4月11日，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悄然离开学校。12日回到上海家中。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三次回上海，这次是彻底告别了“东方红”和革委会，回家避难了。

## 七、审查

我在上海家中住了几天，就到了常熟我大哥家。大哥在常熟税务局工作，家在虞山脚下，氛围恬静。我常登上虞山，坐在裸露的石灰岩上，瞭望四方，浮想联翩。山下是平静如镜的阳澄湖，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里开发成旅游区后，我曾乘船在芦苇荡中穿行。芦苇荡中藏一些人，确实很难

被发现的。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也确实有个水缸，旅游景点的导游说这就是当年胡司令藏身的水缸。但我觉得这个水缸小了一点，装不下胡司令那肥硕的身躯。我奇怪景点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换一个大一些的水缸呢？而且水缸的位置很明显，除非日本鬼子对阿庆嫂特别关照，不然的话只需掀开茶馆盖子，胡司令就暴露无遗了。好在游人并不在乎这些，只有吹毛求疵的人才会想那么多，而吹毛求疵的人总是不受欢迎的。

5月3日午饭后，我正在澡堂洗澡，大哥找到我，对我说：“庆是，你学校来人找你了。”我赶紧穿好衣服跟大哥回去。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到，所以并不感突然。回到大哥家，原来是同班的张永昌和勘探系三年级的朴扬正。我对他俩说：“是不是学校要你们来请我回去？”他俩连忙站起来，笑着点点头。我们当即乘汽车到苏州，在苏州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上我们三人有说有笑，车到安徽境内，他们还买了当地特产符离集烧鸡与我共享。我们全都闭口不提学校为什么要我回去。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回去后会受到什么待遇，但克制着不问他们。我知道如果我一问，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我只想把这和谐的气氛维持得久一些，巴不得火车晚一些抵达北京。

次日傍晚，我们回到学校。第二天上午，黄占起向我宣布了院革委会的三条决定：一是撤销我院革委会委员、院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回班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监督；二是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宿舍与食堂之间，不得擅自离开学校；三是我的一切来往通信都要接受检查，不得私自向外投寄信件，传递消息。

黄占起就是6·20那天与我共同署名写“团结在李贵、江祖如周围……”那个“号召书”的11632班同学，他是以地质系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代表院革委会向我宣布以上决定的。此时的他，阴沉着脸，讲话的口气，好像我就是阶级敌人，与我不共戴天似的，让我望而生畏。不过之后他从未找过我，偶尔在路上碰到，他都低着脑袋，从我面前悄悄走过，好像受审查的不是我，而是他。由此我得到一个认识，就是有时候某人表面对你很凶，并非他同你个人过不去，而只是他当时所扮演的角色的需要。这样想着，对有些事就可以理解，自己的内心也可释然，不必耿耿于怀。黄占起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工作，也当上了地质勘查院总工程师或副院长之类的副处级领导。2002年校庆50周年，我在学校与同班同学团聚时，他从远处走来，匆匆与我握了一下手，便离去了。

我一下子从院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沦为群众监督对象，落差太大，而且不知道今后还会对我采取什么措施，虽然我已有思想准备，但依然受不了。那天午睡时，我躺在双人床的上铺伤心得像个娘们一样哭了。如今回想起来感到自己真没出息，真不好意思。但是好在我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我们班的同学根本就没有管我，更没有开会批斗我，我成了一个不必参加任何文革活动的无人管束的人，我

也就逐渐平静下来了。

我虽然偶尔也会与人海阔天空神聊一通，但绝大多数时候喜欢一个人待着，静静地看看书，讨厌别人打扰。5月21日，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支援法国学生与工人们的罢课、罢工行动，只留我一个人在寝室里。不知哪位同学有意或是无意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我床边的课桌上，我打开收音机，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整个宿舍楼空无一人，宿舍楼下的白杨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明媚的阳光照进房里，时而激昂，时而悠扬的乐曲声在空中飘荡。此时的我，已忘了自己是戴罪之身，觉得生活真是美好啊。

上个世纪60-70年代，真可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亚非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似乎眼看着世界革命就要胜利了。在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法国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大造资本主义的反。但好像没多久就偃旗息鼓了，法国照旧走他们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法国政府也采取了派军队进驻学校，清查“三种人”之类的措施呢？无从知晓。

这一阶段，只有朱成昭专案组的人时不时地找我，要我交代问题，重点交代那次在朱的家里谈论去越南打仗的情况。我又像“反干扰”时写交代、做检讨那样，“揭发”和批判了众所周知的朱成昭的“八大观点”。至于在朱的家中谈论出国的问题，我首先表明我们主观上根本没想到要叛国，实际上也没付诸行动。然后就上纲上线，表示如果真的出国了，客观上就具有叛国性质。再然后就对“如果出国了”的后果、危害进行大刀阔斧的批判，总之是把我们想出国的“一闪念”批得体无完肤，批得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叛国分子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光让我写材料做检讨，没见院革委会来人找我谈话，我沉不住气了，决定去找院革委会，不管好坏，总得给个说法。大约在6月8日或9日前后，我找了管组织的柴文全老师，我在院革委会的时候，他应该算是我的下级。他告诉我，我的事已经由中央文革管了，院革委会做不了主。我很知趣，知道他这是推脱之词，便不再问他，免得他为难。我本想再去找王大宾，但又一想，大宾一定会好言宽慰我一番，但不一定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结果。于是我决定找李贵。11日，我直接到了李贵家。从“东方红”初期到成立院革委会这一阶段，我与李贵来往较多，混得很熟，有时在他家商量事，中午他老伴就下面条给我们吃。我们这些愣头青只顾吃得痛快，哪里想到我们这顿饭吃了他老两口好几天的粮食定量，他俩该如何弥补？李贵热情地接待了我，说年轻人犯错误，不算什么，认识了就好，要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将来还可以干大事。我这人胸无大志，从未想过干什么大事，也干不了大事，眼下只想平平安安毕业分配工作，别无所求。不过听了老李贵这番话，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两天后，6月13日，就停止对我审查了。

此时的北京地院已经没有任何群众组织，也没有派仗可打了。院革委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又要挨批斗了。那时候大家都已回到班上，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参加活动。大多数同学已失去文革初期的那股热情，心思不放在文革上了。每当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时，虽然还是照例不分昼夜在第一时间游行庆祝，只是那劲头比过去小多了，游行完了也就完了。同学们有的开始看起专业书，有的迷上半导体收音机，四处收集材料，自己动手组装，还有的则热衷于谈恋爱。我已停止审查，可以参加各项活动了，不过对于开批斗会批斗人之类的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因此也就不清楚这阶段学校到底批斗了多少人和批斗了哪些人。

在我们学校老老实实践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时候，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两大派正打得不可开交。为此，7月下旬，由三万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园。“井冈山”凭借当年他们反对刘少奇、王光美工作队的成功经验，以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反扑，竟然开枪打死打伤了多名工宣队员。“井冈山”头头、赫赫有名的蒯司令蒯大富扬言要追查工宣队的“黑后台”。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见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五大学生领袖”。毛主席说：“你们不是要抓工宣队的黑后台吗？黑后台就是我。”这就宣告，工宣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委派的，与两年前刘少奇的工作队不可同日而语。

8月25日，各大报纸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25日和26日，首都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地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院后，不但继续深入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而且还要清查一切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委员会以及冲击军事机关和保密单位的人和事。这样一来，不光是已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和“老运动员”们，那些私下里有过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不满言论的人，那些外出串联参与地方派战、冲击党政军机关、与部队发生过摩擦的人，也都紧张起来，不知什么时候账会算到自己头上。学校的气氛又变得凝重了，同学们也不那么散漫了，规规矩矩地参加军宣队、工宣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大字报几乎没有了，有的也只是针对批斗对象的应景之作。那时最主要的活动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现已无法记起究竟有过多少次批斗会和批斗了哪些人。我只记得一次在大操场举行的全院性批斗会，台上站着十来个批斗对象，其中一位是教过我们测量课的女老师（我已记不起她的姓名）。批斗会上说她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跳出来猖狂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中央文革，

收集和整理了厚厚一大本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她时而被人按住头，要她低头认罪，时而又被拉扯着头发仰起头，让广大革命群众看清她的“狰狞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她那姣好的面容和满脸不服的神情，可与张志新媲美（张志新是一位党员女干部，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又不认罪被处极刑。行刑前为防止其喊叫，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此事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曾有过广泛报道）。

我还听说，有一对“右派”老师夫妇，受不了批斗折磨，几次寻死而未成。最后一次是在押送途中，趁押送人员不备，一头撞向走廊墙边的暖气管，结果还是没有死成。这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院之前由革委会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我已记不清了。

我不知道北京地院在1957年划过多少个“右派”，只知道在教过我们课的老师中，就有三个。除了那位测量课女老师外，还有一位古生物老师和一位地史课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衣着整洁、得体，不苟言笑，有一种老式知识分子的气质，在教学上都认真、严谨、一丝不苟。那位古生物老师是位讲师，有一回我们在观察石燕化石标本的时候，觉得其中一块标本有些异样，向他询问。他说这只是石燕个体发生了病变。他能通过石化了的遗体发现三亿多年前古生代泥盆纪时期的一个小小的海洋动物身上的病变，让我们这些学生钦佩之至。教地史的王鸿祯教授是地质界的知名学者，讲课细腻而又沉稳。他在讲授地史时把地壳的海陆变迁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论联系起来，可见他的一片苦心。像这样一些被划过“右派”的老师，虽然谨小慎微做人，文革中免不了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或冲击。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他们都得到了解脱。那位古生物老师去了加拿大，王鸿祯教授还一度担任了地院的领导。

我那时也随班参加各批斗会，跟着喊口号。其实我口中喊着“打倒”某某人，心里想的却是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院革委会虽然停止对我的审查，但并没有下什么结论，就算有了结论，也保不住随时被拉出来批斗一番。于是我又想去院革委会问问情况，探探风声。但又想，现在掌权的是军宣队，院革委会只是个摆设，他们中的有些人恐怕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便打消了去找院革委会的念头。

大约在10或11月份，传来了同学们盼望已久的62、63届（也就是本应在1967、1968年夏季完成学业的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消息。

11月25日下午，在同学们即将分配之际，军宣队召开了全院“宽严大会”。大家自带凳子，排队进入操场，在划定的位置坐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宽严大会”就是在会上当场宣布对那些认罪态度好、积极揭发检举他人的人从宽或免于处理，对那些不老实交代问题、不认罪或不接受改造的人从严处理或加大批斗

的力量。这是在那阶级斗争岁月常用的手法，很有威慑力。大会结束的时候，军宣队负责人宣布：“……对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成员伏庆是实行隔离审查。”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我没记住，只记住了最后这部分，难以忘怀。

在那年月，像我这样受过审查的人都会变得很敏感。那天上午，我隐隐感到我们班的张永昌和刘明臣对我特别关照，好像是时刻注意着我的动向，下午开会又坐在我的身后，我就觉得有点异常。果不然，此时他俩从凳子上站起来说：“走吧。”从而印证了我的猜测。我问道：“我的凳子怎么办？”他俩说：“你不用管了，就放在这儿吧。”那情景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说来也奇怪，当时我既不紧张，也不害怕，完全不同于上次从常熟被带回来的样子。可能是经过上次审查，得到锻炼了吧。

刘、张二位没对我采用“喷气式”，只是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把我送到了西四楼 302 隔离室。我进去后发现里面已经有了一位先到者，原来是周守成副院长，他是作为地院最大的走资派被隔离审查的。我和周副院长就这样成了同一“牢房”的难友。

西四楼原本是学校的医务室，是一幢三层的筒子楼，现改为关押隔离审查人员的“牢房”。302 室在三楼西端的北侧，正对着楼梯口。房间面积约 10 平米，窗户在北墙，已被封死，东墙贴着毛主席像。天花板正中吊着一个电灯泡，因为规定夜里不能熄灯，所以整天都亮着。房内并排摆放着两张单人床，北边靠窗的一张是周副院长的，南边靠门的一张是我的。我的床与门之间放着两张小课桌，木质的门上挖了一只小孔，可以在门外监视屋内的动静。

我进去的时候，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皮带也被解下交由看押人员保管，可能是为了防止自杀吧。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和周副院长都只能并排坐在我的床沿上，正对着门。面前的课桌上放着一本毛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 100 页材料纸。为了防止撕毁，材料纸都打了页码。一早一晚，我们都要面对东墙的毛主席像低头请罪。对于广大革命群众而言，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对于我们而言，当然只能是“早请罪，晚请罪”了。每当面向毛主席像低头请罪的时候，周副院长都非常虔诚，一脸沉痛的表情，口中念念有词，就像在庙里烧香拜菩萨似的。我心想人家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认罪态度就是好。我就差远了，虽然也低着头，不敢造次，但心里往往回想着别的事情，未能集中思想全心全意请罪。

除此之外，在生活上我们并未受虐待。房间里有暖气，一日三餐都有人送饭。饭菜是从学生食堂打来的，同我们平日的伙食一样。送饭的是两位低年级同学，一个端一脸盆菜，另一个端一盆米饭或馒头，自西往东依次送到各间“牢房”。几乎每次送饭，脸盆里都会剩一点菜，那两同学就从东头回到西头我和周副院长的

“牢房”。周副院长比较胖，所以饭量也比较大，总是把碗伸到那打菜的同学面前，希望分一点剩菜。那同学也总是把他的碗推开，将剩菜倒到我的碗里。其实我的饭量不大，并不需要那点剩菜，很想把它让给周副院长。可是按规定同一“牢房”的人相互不能讲话，不能有任何方式的交流。我和周副院长自始至终都严格遵守这一规定，所以我的这一意愿无法表达，只能委屈周副院长了。

隔离审查人员被关押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交代问题。我从早到晚伏案写交代材料，因为已交代好几遍了，所以交代材料写得很流畅，时间也就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几天过去了。交代写完后，整天面对着房门坐在床沿上，既无事可做，又无法活动，也没有放风时间，那日子就难捱了，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的情绪开始焦虑烦躁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焦躁情绪与日俱增。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东想西想无法入睡。我想起 1963 年我来北京报到的情景。那年夏季发大水，京沪铁路部分路段被淹，交通部派了艘轮船把我们这批到北京入学的新生送到天津，再由天津坐火车到北京。我面向一望无际的大海，情不自禁地冒出四句话：

万吨巨轮向北进，  
理想之路已启程；  
心潮汹涌似海浪，  
破浪直上北京城。

然而文革开始至今，两年多的时间，我已被审查三次了。第一次是地质部工作队对我的审查，第二次是院革委会的审查，这次是军宣队的审查。年纪轻轻就成了“老运动员”，还有什么理想可言？还不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想起天一亮，就又要坐在床沿上，对着门发呆，真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屋内西墙有放洗脸盆的架子，共三层，最上面一层离地面大约有 2 米高。我光着脚爬到第三层架子上，头朝下往水泥地撞去，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隐约觉得有双手在我头上缠纱布，很快又有一只手将缠纱布的手推开，接着便有两个人将我带出房间，沿着楼道向东走去。他们带我到了楼道最东头的一间房间，原来这是审讯室。室内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军人，旁边坐着一个学生。我头脑昏沉沉的，房内的灯光又暗，没看清那学生的脸。不过从体型和讲话的声音判断，应该是雷存云。那军人还没作声，雷存云抢先开腔了。

他厉声问道：“伏庆是，你为什么要自杀？”

我说：“我不想活了。”

他又问：“为什么不想活？”

我说：“不想活就是不想活，没有为什么。”

他说：“伏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畏罪自杀。快说，你还有什么重大问题没有交代？”

我说：“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没交代。”

他说：“你还不老实，没有重大问题你会自杀？”

我说：“我就是不想活了，不信我死给你看。”

我说着就往窗户走去。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军人挥了一下手，站在我后面的两人立刻把我拉住了。

审讯到此结束，又把我带回了 302 “牢房”。

雷存云在院革委会设立朱成昭专案时，就是专案组成员。我原先并不认识他，但估计他应该也是“东方红”成员，因为院革委会不可能让保守派参加专案组。他是在我的整个审查期间（包括毕业后在地质队的审查）所见到的唯一的一个凶神恶煞的人。之所以这么说，并不完全因为他态度凶狠，而是他把人往死里整。他毕业后不知分配到哪，我一直想找到他。倒不是找他算账，只是想问问他，他为什么对所谓的“朱成昭分子”如此仇恨？我想对他说，我和他一样，都是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在文革中没有批斗任何人，没有写针对任何个人的大字报，没有打砸抢，甚至没有骂过人，不知他对我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我赞同过朱成昭的一些反中央文革言论，他因此把我当作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而仇恨的话，那么后来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他又应该仇恨谁呢？如果说因为我曾有过出国周游世界的念头，他把我当作叛国分子而仇恨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那么多的人都出国了，他又该仇恨谁呢？2002 年校庆 50 周年北京聚会的时候，我似乎听说雷存云已去世了。我希望他安息，希望他来世做人不要那么极端。

出乎意料的是，文革后期抓“5·16 分子”和文革结束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朱成昭专案组成员也都成了审查对象。原因是他们办理朱的案件时，涉及到叶向真的老爸叶剑英元帅等所谓“二月逆流”一些人的情况，于是便被认为是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黑材料，所以也被审查得死去活来，也有人自杀。我并不因为他们也被审查而幸灾乐祸。我只是觉得世事难料，无比茫然。

为防止我再次自杀，302 “牢房”又关进来一位老师。我不认识他，如今连他的面貌也记不清了。三张床并排靠在一起，我的床夹在中间，应该是万无一失了。这时我发现，原来洗脸盆架下有一凳子，那天夜里我往下栽的时候，头先撞到凳子，然后才落到水泥地面。不然，就算不死，也是终生残疾，成为废人。我感谢

上苍在冥冥之中保佑了我。我不想死了，要好好活着。

12月15日，解除了对我的隔离，回到南五楼学生宿舍。宿舍里已空无一人，同学们都毕业离校了，只有我考取大学后家里给我买的那只帆布箱，孤零零地躺在我的床底下。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人去楼空。我非常感谢我们班的同学，他们没搜查我的箱子，使我的一些笔记、会议记录等材料能够保存下来。

我在隔离期间，百无聊赖之时，冥思苦想了两首自以为诗词之类的句子。当时不敢记在纸上，只能记在心里。回到宿舍后，赶紧写到一个小本子上，作为我对这段经历的记忆。

## 一、梦境

床前灯光黄，疑是鲜花放；  
梦中入天堂，醒来在牢房。

## 二、毕业

正毕业，薄言一声希望灭。希望灭，萧萧寒风，昏昏灯色。  
人生廿四恰逢春，我却因之头碰壁。头碰壁，肌肤未碎，筋骨未裂。

解除隔离并不等于完事了，我又到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那时学校里有问题的学生分为三个等级。问题最严重的朱成昭等人已经关进监狱。问题较严重的经过隔离审查后再到学习班，也有没隔离直接到学习班的。一般问题的可正常分配工作，只是要在毕业鉴定上加上一笔。我记得我所在的那个学习班里有田春林、黄瑞华、梅建明、刘万恩、刘梅、林小湫、郑文卿、庄一龙、杨宾芳等。此外还有几个疑似有问题的人，没过几天就搞清了问题毕业走人了。黄瑞华、刘万恩、刘梅、林小湫是东方红广播台的。其中刘万恩和刘梅是播音员，是一对金童玉女，工作后成了恩爱夫妻。梅建明的父亲是相当于部长级或比部长级更高一些的高干，与周总理很熟。郑文卿是作战部情报组的。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因为朱成昭问题被留下来的。黄瑞华是院革委会委员，是高旗无畏战斗队和东方红广播台的负责人，颇有文采。他外形瘦弱，面色蜡黄，身体很差，但却很坚强，无论是开会还是问他问题，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合作。庄一龙是上海人，也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我不清楚他为何也留在了学习班。他在地质部搞了个抗癌联络站，据说江青找他看过病。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很快就分配工作了。宣布他毕业分配那天，军宣队指挥部的首长亲自来到学习班，先是用十分柔和的口吻批评他不该写

告状信，接着就说了许多关于他的好话。首长还将自己的棉大衣给他披上，以示关心。他是个杂家，对书法、古诗词、文物、甚至量子物理学都有研究，并小有成就。

管理学习班的是来自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的赵华。那时部队取消了军衔，如果算军衔的话我估计他至少是上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与我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赵。他从不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训斥别人，甚至也没对黄瑞华一声不吭的不合作态度发脾气。我与他个别交谈时，讲了一些在当时属于不合时宜的话，他既不反驳，也没表示赞同，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同情我们的。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后，还时常想起他。1971年9·13事件后，空军政治学院是重点审查单位，驻地院军宣队的几位首长也被抓起来了。不知老赵安然无恙否？他如果还健在，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由于学习班管得不是很严，我们星期天还可出去游玩。大约在1969年3月份，珍宝岛中苏冲突发生后的某日，我和田春林到颐和园去，那时颐和园的门票只要1毛（或2毛）钱。在颐和园门口，看到一辆红旗轿车，我们估计来了一位至少部长级别的领导。果然，我们进去后看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和他的夫人坐在长廊旁的一个亭子里。距他俩十几米处一个年轻得像小孩子似的解放军看护着他们。田春林对这小解放军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能不能跟我们的部长说几句话？那小解放军点了点头。我和田春林走到亭子里叫了一声：“李部长好！”李部长立刻欠起身与我们握手。他那气质高雅的夫人悄悄坐到一旁去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是我们的必修课。在中国的地质部门，长时期以来都用他的地质力学观点分析解释地质构造问题。我们原打算同他聊聊地质或学校方面的事情，不料他却讲起了国际形势。他说中苏打不起来，因为苏联如果要打中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把他们的军队从欧洲调到中苏边界；二是要与美国达成默契。目前苏军的主力还在他们的西部边界用来对抗北约，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已经同美国达成了默契。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我们并没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为什么主动向我们讲这些呢？因为他的这番话与当时“要准备打仗”的主流说法是相悖的，所以我记忆至今。

到了1969年4月份，学习班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可讲，没有什么东西可学了，有些人已陆陆续续毕业分配走了。剩下的人随69、70届同学到北京郊区的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了一个月。这实际上是在拖时间，等待上面对我们这帮人的处理意见。1969年6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有关部门给出了让我们毕业分配的决定。我分到湖南，田春林分到湖北。从此，我们这批人就离开学校，各奔前程了。

我们比应届正常分配的同学晚分配了半年，比文革前正常分配的时间晚了一年。文革拖延了好几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不但是这些毕业生

的损失，更是国家的一项损失。

## 八、解脱

1969年6月下旬，我到湖南省地质局报到后，被分配到大队部设在攸县的416地质队。416队把我安排到正在衡东县的深山里找矿的一分队普查组。

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都先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劳动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才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我先是在一分队普查组跟工人们一起挖探槽，后来周转过几个分队，几乎干遍了地质队各工种的苦活，累活，其艰辛程度难以言表。不过工人师傅们也和我干着同样的活，劳动强度比我还大一些，况且地质工作的性质就是如此，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1969年底，回队部冬训，接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攸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同时开进队部。那时攸县基本没有工业，只有一些小手工业，哪来的产业工人？所谓的工宣队成员大多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干部，工宣队队长就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

“一打三反”无非是再次将“老运动员”们揪出来批斗一番。但也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中南矿业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因收听“美国之音”被人揭发，定为“收听敌台罪”判刑7年。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工宣队员，每当台上厉声宣布“把某某人揪上台来”批斗的时候，她就站起来察看台下参会群众的表情。如果有人显得惊恐不安，她便认为此人心中有鬼，便内查外调，期盼着挖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从而扩大“一打三反”的战果。

这位美女工宣队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一个文革前中专毕业的地质技术员，写纸条向她表达爱慕之情。美女工宣队员将纸条交给了组织。技术员因此被认为企图腐蚀工宣队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段。这名技术员被下放劳动。人们私下说这女的是个资深破鞋，与多名公社干部有一腿，所以才人模狗样地当了工宣队员。

1970年3月，冬训结束，各分队的人又重返野外，开展工作。“一打三反”告一段落，我幸免于难。

几天后，我突然被叫到队部，工宣队长亲自找我谈话，要我交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之后对我采取了什么措施，如何处理的，我已完全忘记了，可能是很快就回野外工作了。只记得从那之后有些会我就不能参加了，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先开小会在党员中传达，后开大会向群众传达，我都没资格去听。有次在钻机劳动，一位工人由于操作失误，差点被卷进钻机的皮带盘内。那时我还没操作过钻机，不知如何开关。可当时机房内只我一人，去

机房外喊人已来不及。我情急中匆忙跑去拉下一个把手，居然拉对了，钻机停了，救了那工人一命。事后开事故分析会，也没让我参加。此外，分队几次评我先进工作者，报到大队部，都没批下来。如此种种，让全416队的人都认为我一定是个有问题的人了。

1972年4、5月，其他人早已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了，而我还在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一天，有人带信给我，要我去队部。我以为终于让我搞技术工作了，高高兴兴来到队部，不料却是要我回队部交代问题。我又迎来了第四次审查。如此翻来覆去的审查，我已厌烦了，无所谓了。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对这次审查，我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他们要我到队部的家属农场劳动。在家属农场干活的都是女的，只我一个男的。我干了半天，发觉那些堂客们（湖南把已婚妇女称为“堂客”）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一个大男人混在女人堆里已经觉得很尴尬了，又见她们议论我，顿时面红耳赤。我不想干了。我对保卫科管我的人说：“家属农场是集体单位，我是拿国家工资的。让我在家属农场劳动就是花国家的钱给家属们干活，等于是国有资金流失，以公肥私。我不应该到家属农场来。”保卫科的人无言以对。我赢得了在队部休息几天的时间。

过了几天，又让我到队部食堂干活。队部食堂的管理员是河北地质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学地质的女生除非特别有事业心，或业务能力特别强，否则到了地质队只能干些辅助性或打杂的工作，没其他事可干。该女大学生管理员身材粗壮，用现在的话说是“女汉子”的形象。她特别要求进步，声称不入党就不结婚。可她不久前在野外的分队部当炊事员的时候，人们纷纷传说她和分队食堂的男管理员关系暧昧。理由是有人看到那男管理员在冰冷的河水里给她洗内裤和月经带。那男管理员四十多岁，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孤男寡女在一起，人们自然就认为他俩有那个事。不过人家也可能是出自纯洁的革命友谊，相互帮助，所以只能说关系暧昧，不能说真有什么事。为平息流言，也为防患于未然，她被调回大队部食堂。

我从未干过厨房的事，自然笨手笨脚，磕磕碰碰。这女汉子便对我指手画脚，大声呵斥。我又不愿干了。我对保卫科管我的人说：“你们太没阶级斗争观念了。我是个有问题受审查的人，而食堂是要害部门，万一哪天我狗急跳墙在饭菜里投毒可怎么得了？你们怎么能把我放在食堂呢？出了问题你们谁敢负责？”

队部除了这些活，实在找不到我能干的事情，总不能让我坐办公室吧。从那之后，只要求我专心致志交代问题，写交代材料，没再安排我干活。做交代，写材料似乎成了我的专业。

这样在队部磨蹭了一个多月后，又要我回分队继续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我

找到队党委书记，要求给我个结论。在这之前我已找过他多次，他都回避了。这次我是在快下班的时候等在书记办公室外面，在他下班出办公室的时候把他堵在办公室门口。

我对书记说：“你们已经审查我一个多月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总得有个结论吧？”

书记说：“你的态度很不好。你等着吧，等我们把问题搞清了，一定从严处理。”

我说：“书记你的话有矛盾。”

他说：“怎么有矛盾，有什么矛盾？”

我说：“你们把我叫回队部的时候，对我说你们已经掌握了我的所有问题，关键是看我的态度。现在又说等问题搞清后再对我从严处理，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书记气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我怕进一步激怒他，不好收场，扭身走了。

1973年10月，国家决定给文革中毕业参加工作的本科和大专生转正。我们参加工作四年了，一直没转正，拿的是实习工资。基本工资41元，野外津贴15元，共56元。转正后基本工资58元，增加了17元，这不是个小数目，再加15元野外津贴，共73元。在当时，算是较高的工资了。1974年元月，同学们都领到了转正工资，只有我还是实习工资。我着急了。

文革以来，家里就一直为我担心。我晚分配半年，在学习班期间，还要家里供养，觉得对不起家人，尤其对不起我的母亲。我妈妈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裹着小脚，把六个孩子带大是多么不容易呀。我记忆中，从不知妈妈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我醒来的时候，妈妈已把早饭做好。我睡觉的时候，妈妈还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总有干不完的活。1961年，妈妈为了让我们多吃点，自己经常挨饿，加上过度劳累，得了肺结核。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妈妈对我更是疼爱。她常让我去附近的小商店打油买醋，找的零钱就给了我。我用这钱到书摊看小人书，一分钱可看两本。《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故事，我最初都是从连环画里看到的。

我工作后，每月寄25元钱给妈妈。我父亲在1968年去世，妈妈住在上海的大姐或二哥家，并不需要钱。我给她的钱是让她自由支配的私房钱。妈妈乐善好施，凡前去看望她的亲戚或晚辈，她都要塞给人家一点钱，从而使老太太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每到领工资那天，我都要走十几里路前往一个公社所在地，到那里的邮电所给妈妈寄钱。只有这时，我才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活着还有意义。到了1973年上半年，我大哥说，庆是差不多30岁了，自己应该存些钱准备结婚成家，就不让我单独给妈妈寄钱了。改由我们兄弟五人每人每月给妈妈5元钱，让妈妈每月仍然有25元私房钱。

不给我转正，工资比别人少了一大截，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的。这不仅是

钱的问题，还有荣誉和尊严问题。我决定去问个明白。我所在的普查小组离分队部约 30 里，都是山路。离大队部 100 多里，先走 10 里山路到公路，再换两次班车才能抵达队部。每天只一趟班车，不一定正好能赶上。再说去问了也不一定会告诉我真实情况。那时攸县属湘潭地区，干部归湘潭地委管（那时中专以上毕业生都包分配，属于部编制），于是我决定直接去湘潭地委。

元月下旬的一天，我没请假就离开普查组，走了六十多里山路，下午四五点钟到了湘江边的衡山县城。我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连夜写了份申诉报告，简略叙述了我的文革经历，重点说明我文革中的问题已在学校解决，经北京市革委会批准毕业分配工作。416 队对我的审查是对北京市革委会和驻北京地院军宣队所作决定的不尊重，违反了党的相关政策，而且也没查出任何新问题。

第二天一早，我乘坐一条小轮船顺湘江而下，驶往湘潭。湖南的冬季，只要没下雨就十分暖和。那天风和日丽，波澜不惊。两岸丘陵起伏，树木森森，真是山清水秀。我想，在这片宁静偏远的土地上，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风流人物，中国为之天翻地覆呢？

船到湘潭已是傍晚。次日晨我直奔湘潭地委，随着上班的人群毫无阻拦地进入地委大院内。我事先已打听到管大学生转正的是组织科的李科长。我在一间办公室找到李科长，给他看了我的北京地院学生证和毕业证，说明来意。李科长 50 岁上下，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碜，脸上已有很深的皱纹，看上去像个循规蹈矩的公务人员。他听了我的讲述，未作任何表示。我把申诉报告交给他就告辞了。

我估计普查组发现我失踪了，一定会报告分队，这可能需要一天时间。分队报告大队部，顺利的话一天，不顺利可能两天或更久。今天已是我擅离职守的第三天，必须在大队收到分队的报告前赶回去。不然，大队收到报告，一定会大张旗鼓地找我，还会向上级机关或派出所报告，事情就闹大了。从湘潭到普查组虽然距离近一些，但交通不便。到大队部虽然远一些，但有公路相通，有班车，要快得多。所以应该先回大队。我换了几次班车，终于在当天下午下班前赶到大队部。我故意在各办公室前走了一圈，让他们看到我。走到保卫科门前时，门开着，里面正在打电话。只听保卫科的人说“他在这里”。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分队的报告才到。之后，分队领导和大队有关人员都没问我到哪里去了，去干什么。大概他们以为我这几天都在大队部。我觉得是上苍又一次保佑了我。

我回到普查组后，不知申诉效果如何，心里不踏实，就写信给三哥。我在信中详细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表示如果申诉不成功，我准备绝食，以死相争。

两个星期后，大队政治处的王志谦专程到我这分队（此时普查组已回到分队部），告诉我湘潭地委批准我转正了，并向我表示祝贺。王是兰州大学地质系 1966 届毕业生，在学校就是党员。他分配到 416 队后，只劳动锻炼了几个月就调到大

队政治处成为专业政工人员。416 队对我的审查实际是由他具体负责。他始终对我客客气气，简直像朋友一样。我在大队审查时，有时有些突击性劳动，队部人员都要参加，他总是很照顾我，抢着替我干重活。他对我的情况一清二楚，但没向我透露丝毫。这是他作为政工人员的基本操守，我可以理解。大约在 1982 或 1983 年，他借调到地质部工作。本可大展宏图，青云直上，据说在地质部的权斗中，他一不留神得罪了人，被退了回来。之后一蹶不振，退休时才混了个政治处副主任的头衔，正科级。与之相反，有个湖南地质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比王晚到政治处十多年。他先是为加工资，利用工作便利给自己的老婆改档案，后又因男女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但他与一位也是中专毕业的部长级人物拉上关系，带病提拔，成为国家某部的司长，后因贪腐被双规。

几天后，我的同班同学，也分配到 416 队的宋银生，从附近一个矿区翻过一座大山来到我这里，说他接到了我三哥的电话，他告诉三哥我的转正问题已经解决了，请我三哥放心。原来三哥收到我那封信后，怕我真的绝食，心急如焚。那时没有程控电话，鞍山到攸县的长途电话很难叫通，有时等待整整一天，还是没能打通。三哥打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叫通了攸县 416 队部的电话，可我并不在队部。后来几经周折，打通了宋银生所在矿区的电话。宋接了电话后，不惜翻山越岭，跑来告诉我。1983 年前后，开始重用知识分子。宋银生从分队长到总工程师到副大队长，最后成为 416 队队长。

1976 年 10 月上旬，我到长沙办理私事。回 416 队时，在长沙火车站看到北方开来的火车车厢外面，贴满了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口号。我回到分队后告诉同事们。有人将信将疑，对我说：“你别到处乱讲，万一搞错了你就倒霉了。”

我对“四人帮”的垮台深信不疑，对这些人的愚钝感到可悲。其实在毛主席逝世后，我就预感事情一定会翻过来。我的这种预感完全来自我的文革经历。我一贯认为，凡是不正常的事情都是不能持久的。文化大革命太不正常了，物极必反。不过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毛主席去世才几天就下手了。没想到江青也被抓起来，总该给主席留点面子吧？好在之后的一些中央文件和媒体舆论说，毛主席早就对江青不满，警告她不要搞“四人帮”，甚至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遗愿。这就把毛主席与“四人帮”完全切割开了。真是高明啊！这就叫政治。

“四人帮”垮台后，朱成昭迟早会平反。只要朱平反了，我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完全解放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轻松舒畅，工作干劲也大。

可是没多久，又开始清查“三种人”。所谓“三种人”是指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打砸抢、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清查“三种人”完全是针对造反派的。我再次成为审查对象。

我早在 1968 年 5 月就被革委会开除了，起了什么家？我基本上连批斗会都不参加，迫害了什么人？何长工还是我放走的呢，可以说我是保护了老干部。对于打砸抢，我一贯是深恶痛绝的，更不要说参加了。416 队以往对我长期的马拉松式的审查中，能调查的地方都查遍了，没发现任何问题，所以这次清查“三种人”，对我无从下手，无法对我采取任何措施。可是在全国性的清查高潮中，不断有外调人员找我了解情况。对于他们要调查的人，我大多数都不认识或不了解，讲不出什么情况。但是 416 队把这当作一个突破口，希望能够从中发现我的新问题，借此就把我作为潜在的嫌疑人，悬挂起来了。

每次来人外调，都会把我叫回队部与他们见面。那些外调人员为了能从我这里了解到情况，都很和蔼，就像促膝谈心。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与他们随意聊天。我曾对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好比是一列火车，说是开往北京的，那些一心想去北京的人就上了火车，不料火车开到了广州。这时，不去追究火车司机或有关调度人员，反倒揪住乘客不放。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他们大多笑而不答。

粉碎“四人帮”带来的振奋心情逐渐淡薄了，回到了平常心态，按部就班过日子。我在 1973 年前后就不再劳动锻炼，开始从事地质技术工作。起初是跟在老技术人员后面跑跑腿，打打杂，慢慢能独立承担一些工作任务。后来历时四年主持完成了两个较大型的工作项目。一个是 1：5 万区域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另一个是矿产区划和资源总量预测。416 队以前从未承担过这两类工作项目，因此在 416 队，我主持的这两项工作被认为具有创新意义。

那期间我写有一诗，表达我的状况与心情：

一线清泉半山腰，两层竹楼是吾巢。  
白昼登峰观云海，夜晚卧榻听松涛。  
烈日炎炎焦肌肤，细雨绵绵滋心苗。  
足迹踏遍千重岭，为觅地下万代宝。

1985 年 12 月 9 日，416 队“队党纪字（85）第 02 号文”给我做了结论。至今我依然保存着这份文件。结论中说我：“文革初期参与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造反派组织的造反活动，并担任了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和此后成立的革委会中的较高职务，对此，应负一定责任。”然后说：“伏庆是同志在文革中的错误属一般性质的错误，故建议对其记录在案的问题作解脱处理。”

这个结论很有意思。从未听说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和革委会是反革命组织或反动组织，当然也不是国民党组织，为什么在其中担任过“较高职务”就“应负一定责任”？至于参加造反活动，当时全国上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谁没参

加过对各级“走资派”的批斗会？谁没参加过“打倒刘少奇”的游行？这算不算造反活动？全国人民是不是都“应负一定责任”？

我已没有心思计较结论的措辞了。我急于得到结论，以便调动工作。10个月后，1986年的10月，我调到设在长沙的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从此摆脱了笼罩我20年的文革阴霾。

## 九、后记

本篇回忆，动笔于2011年。刚一动笔就写不下去了。50年前的事，如同很久以前看过的老电影，只能记住某些精彩的画面和个别印象深刻的人物，具体情节已完全记不清。后来从箱底翻出一些当年的笔记和“交代材料”，记忆的闸门才逐渐打开。再后来又看到几位校友的回忆录，许多事情才清晰起来。中间有段时间，情绪不佳，不想再写，搁置多日。后又再动笔，拖拖拉拉终于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本篇回忆主要记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为了叙述的连贯性，有些我没参加、不知情的事情参考了他人的资料。主要参考了程关林的《被遗忘的群体》，宫保军的《我的文革十年》。有些我记不清且一时无法弄清的事，如“东方红战斗队”发展到“东方红公社”的过程，各种说法都比较含糊。我便一笔带过，不作详述。虽有所遗憾，但也不影响全局。

文革过后，各类回忆或评论文字颇多。回忆多拘泥于诉苦，有辛酸泪水，无深刻内涵。评论或大气磅礴给文革全面定位，或零打碎敲对个别事件作出评述。两者均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之嫌。另有对文革一无所知之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多是调皮捣蛋或不得志的落后分子。北京地院恰好相反。朱成昭、王大宾、蒋良朴、周永璋、蔡新平、田春林、杨雨忠、孟繁华、聂树人、黄瑞华、张华府、王北宁等“东方红”的主要成员或早期成员，均出身于军人、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家庭，且大多是班长或团支部书记之类的学生干部。有的还是党员或预备党员或学习尖子、学校重点培养对象。

我没有能力评论文化大革命，只有挥之不去的一些疑问。

1960年代中期，毛主席的权威达到顶峰。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党的话，就要听毛主席的话。人人都说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产生对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既然都听他话，为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呢？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谁听毛主席的话，谁不听毛主席的话？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呢？

既然毛主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什么不通过正常途径，采用组织手段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非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揪斗当权派，从而造成社会的撕裂呢？有人说毛主席是通过大乱达到大治。可是国共三年内战之后不是已经大治了吗，为何才过了十几年又要大乱呢？还有人说毛主席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难道以往历次运动，先在党内解决，然后从上至下传达学习就不能教育群众吗？非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呢？再说，群众又受到了什么教育呢？

大中小学不上学，不招生，停课闹革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千万知青下农村。古今中外，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如此为所欲为？抗战时期，国土沦丧，炮火连天，还有个西南联大，延安也还有抗大、鲁艺。难道在和平年代，反倒不能办学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同意吗？如果都同意，难道不违背常理吗？如果不同意，为什么又践行了呢？

我年过古稀，黄土已埋到脖子，恐怕要带着这些疑问去见阎王爷或者马克思了。

2017年9月5日终稿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11月30日《昨天》第101期）

**编者按：**

伏庆是：文革研究学者，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1631班）

# 田春林回忆录

## 田春林

作者简介：田春林，1943年9月出生，河南驻马店人，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文革期间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的创立人之一，曾代表东方红参与首都三司核心组工作，后任首都红代会常委，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黄石市省冶金地质队工作，1985年调入河南省驻马店市勘察设计院，1993年评聘为工程系列高级工程师。退休后长住武昌。

### 邹家尤的临别赠言

大约是在1966年的7月底，毛泽东已从南方回京，中央已经明确了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向大专院校派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北大地质系也有同学冲破阻力来地院煽风点火。说中央首长在北大宣布责令工作队撤出学校。驻地院的地质部工作队也毫不例外的着手做撤出地质学院的准备工作。作为前段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重点人物之一，我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

一天，驻班级工作队队长突然通知我到学十二楼的工作队驻地去开一个座谈会。我如约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学十二楼二层的一个小会议室，进门后看到已到了不少人，有些人我认识，像李仲学等人在6·20时就认识，有些我不认识，人已基本坐满后大概有二三十人的规模。会前并没有说是什么会，只说是座谈会，但见到与会者以后，发觉这些人都是在前段6·20事件中表现积极，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的“游鱼”、“反革命”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与我相同的遭遇。我心想，是不是要宣布对我们的处理决定啦？因为在“反干扰”期间从工作队就传出运动很快就结束，已经风言风语听到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河北沙城劳改农场去改造。

正在思绪不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开会，并请出工作队队长邹家尤讲话。这么近距离接触邹副部长，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邹家尤讲话的内容大致是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由于这次文化大革命来的突然，没有思想准备面临瞬息万变的形势，很不适应，很不得力，工作队从组队到进院不到十天的时间仓促上马，对地院的形势也没作深入了解，就匆忙上阵了，因此在前段的地院文化大革命中工作队显得很不得力，很不适应，领导运动很不得法，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这个工作队队长负责任，不怪下面的工作队员们。

第二层意思是说，在前一段的反干扰运动中由于工作队的错误领导，使一些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打击和不公平的待遇。尤其是在座的同学们受到的打击，伤害更大，我代表工作队党委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一切受到伤害的同学赔礼道歉，前阶段大家的检讨书，认罪书以及批判你们的文章，整理你们的材料等一律退还本人当面销毁。不入档案，不影响入党、入团和工作分配，

第三层意思，邹家尤语重心长现身说法，说到自己从小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家庭出身很苦，是一个红小鬼出身。就这样在延安整风时也受到了怀疑和审查，受到委曲，被关过禁闭，并下到基层当战士等不公正待遇。但是经过组织上的审查外调证明我是清白的，最后又恢复了名誉和职务。重新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总之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受到革命斗争残酷环境生死的考验，有时还会受到内部的误会、误伤，不被信任等等的考验。这样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接班人。

最后他要求我们回去以后不要有怨气、不背包袱，不要对前阶段反对过自己，批评过自己的同学闹对立，要有宽广的胸怀，原谅那些同志。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总的来说，这个会是邹家尤在撤出前的小型检讨会，是安抚会，是一个临别的赠言。会后两三天，工作队就悄悄撤出了地院，看来走得很匆忙、很低调、很不光彩。记得邹家尤讲完话还要大家自由发了言，说有什么气就出出吧，当时朱成昭发了言，他称邹家尤为邹叔叔，这大概是那个年代干部出身的晚辈对与他们父辈有同样革命经历的长辈的流行称谓吧。朱成昭发言的内容是说自己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自己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在前一段的运动中自己满腔热情投入运动，只是对工作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在班上就被批判斗争，思想上很是想不通，通过邹叔叔的这次讲话，思想上也转过来了，保证不背包袱，不计前嫌，积极投入运动。朱成昭是又倒苦水，又表了态度，会议就这样在比较温和的气氛中结束了。

对这次工作队临别前的安抚会，我有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本来“反干扰”的起因是由薄一波批示引起，是由邹家尤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亲口传达的薄一波批示，并把它作为一个尚方宝剑来镇压地院群众运动的，但在这个会上邹家尤都只字未提薄一波批示，而是大包大揽把一切错误责任统统归于工作队，归于自己名下。

据后来听到传闻，在这次安抚会后，薄副总理在计委小会议室曾经小范围接见了地院“反干扰”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学，接见的人员范围比这次更小些，是在一天的夜里，由何长工、邹家尤将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的全院重点人物名单交给了薄一波，薄一波还一个个点名并和大家握手，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也有我的名字，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接到通知，没有参加，只是后来听到朱成昭的口头

传达。据说会上薄一波发了脾气，狠狠批评何长工、邹家尤，大意是说我是分管工交口副总理，是抓工交生产的，并不管运动的，看到你们一个关于地院文革情况汇报后就在上面随便写了几句话，并没让你们（指工作队）去传达，更没让你们乱解释，什么反工作队就是反党、反革命等等。更不知道这几句话对地院文化革命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很显然，这是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文革当中派工作队并镇压学生的作法已表示出不满，风向变了，工作队错了，薄一波为了推卸责任来了这么一招，使何长工和邹家尤们替他受过，有口难辩。

有一个细节不能不强调的是，就在这次薄一波的接见会前，由邹家尤交上去的地质学院“反干扰”期间受打击迫害的重点人员名单，二十年后，给我带来了大麻烦。我毕业后分到湖北黄石工作。1985年，薄一波已经平反并荣升中顾委副主任、中央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到湖北检查整党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情况。薄在省委洪山礼堂听取各地方组织清查部门汇报，当听到黄石市委的汇报时，从兜里拿出一个小本本，翻看后告诉黄石市清查办的领导，地质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田春林，听说在你们黄石市，这个人你们如何处理？他要不定“三种人”，那就没有“三种人”了。如此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我这个当年并不曾得罪过他老人家且从未谋面的学生，今天在山沟里搞地质的一个小小地质匠，不失时机地如此“关照”。可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这个细节是我在黄石地质队工作时与我关系不错的副队长（也是我河南老乡）事后告诉我的。他是我专案组成员，在黄石清查办听传达时，清查办的人说的。并说薄老的记忆力真好，都二十年了还没忘记你这个红卫兵小将。这话不知是对老人家的褒还是贬。

这年我从湖北调河南驻马店，本来湖北原单位想让我调走了事，不转材料了，有点想保我的意思（这时队上领导班子已进行了大调整，与抓516时不同了）。哪知我回河南才两个月，湖北原队上一位副书记，是不久前刚从技术人员提起的，人很正派，跑到河南我家，向我透露，叫我思想作好准备，可能又要折腾一番了，我们本想让你一走了之，不转材料，哪想黄石市委不依不饶，三天两头打电话催问。他们是受省、中央整党办、清查三种人办公室催办，不得已才把材料转河南来的，我估计我们这些重点人是难逃劫数的，尤其是那位薄大人对我特别关照，由此我对原单位心存感激，毫无怨言。

果然，不几天，驻马店市委组织部找上门来和我谈话，好在一切不影响，照常生活，上班。这几位后来熟了，说，要知道你有这些破事，我市不该接收你，当时是把你作技术人才引进的呢。他们也说中央整党办、清查三种人办也过几天就打电话问情况。由此，驻马店组织部又组织一个三人小组，外调我半年多，最

后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行政记大过一次。这个结论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我的签字是：保留意见。

## 肖力来地院

肖力来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 1966 年的 7 月底、8 月初，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时间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当时我和伏庆是从学 11 楼五层宿舍搬到教四楼东方红战斗队办公室，在二楼，当时东方红战斗队设有办公室、来访接待室、宣传部、印刷室等机构。在来访接待室负责接待的同学我记得比较清的有我们班的贾维千等人。

有一天，接待室同学带一位女同学来见我，说是北大的同学，要见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成员，那时候外校到地院东方红来串联了解文革情况的同学很多，比如建工学院的张玉晋、贾建，政法学院的陈荣金，石油学院的姜阳，农机学院的潘朝金（文革中改名潘朝东），北工大的高升等。这些外校的同学就是那时通过来我校串联我才认识的，后来他们都成为各自学校少数派的头头，但是北大的从没见来过。这位自称北大的并要见核心组的女同学自然使我很关注。

来人二十五岁左右，身高 1.65 米以上，身材丰满，戴眼镜，齐耳短发，上穿短袖白衫，下身蓝布裤，手提一个黑色塑料文件袋，脚上是塑料凉鞋。她自称是北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我们握了一下手就坐在椅子上交谈起来，这时她从文件袋中拿出一张 32 开、用粗黑铅笔书写的便笺，字是从右向左竖着写的，内容是：

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

陈伯达

看了陈伯达亲笔签名的便笺，我心中十分激动，欣喜若狂。她笑着对我说，想和核心组的所有成员见个面。我立马照办，就把在其他屋忙的核心组人员都叫来并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非常高兴。那天核心组到场的有伏庆是、朱成昭、刘长风，其他的我不记得了。聊的内容是问了我们核心组成员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读几年级等基本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又问了工作队的情况，如队长姓名、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离校，“反干扰”抓了多少“游鱼”，东方红战斗队有多少人参加等等。我们还专门介绍了刘长风，说他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儿子。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就告辞走了。

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后来的东方红战斗队的核心组和早期成员都知道肖力的名字。地院的许多重大活动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和影响。“二

进地质部”期间她与地院东方红主要领导成员的来往尤为频繁。

肖力真实身份的确定，是在一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朱成昭受邀作为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代表上了天安门。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据蔡新平说是在“二进地质部”期间，那么就可能是“九一五”那一次。那天，当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大厅走出来时，朱成昭发现搀扶老人家的是一位青年女军人，当朱成昭仔细端详时惊呆了，天哪，那不是肖力吗？她怎么搀扶着毛主席，她和主席是什么关系？这时传来了革军子弟也是东方红老战友的张玉晋的声音，他告诉朱头：肖力是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这使朱头激动万分。他回来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核心组的几个人，大家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的腰杆更硬了，我们是通天的，我们的后台是毛泽东！看你“斗批改”还能蹦跶几天！（下图：肖力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消息不久大家都知道了，连保守组织也知道了，这对他们的信心是极大打击。肖力的特殊身份相当于毛泽东的文革观察员，只此一点就足以具有地震效应。

8月22号，东方红公社几百人“一进地质部”，要求地质部交出工作队长邹家尤到地院检查交代，接受批判，地质部领导拒不接受。静坐抗议的同学被西城区红卫兵团团。正是通过肖力，中央文革促成了北京新市委领导陶鲁笳出面主持，地质部主要领导和邹家尤到场，东方红和对立面保守派的斗批改红卫兵两派面对面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大辩论从23号夜里9点多开始，直到24号凌晨结束。据说辩论一开始肖力就来了。她在会场后边时而走动，时而伫足，观察辩论会进展情况。虽然到会旁听的有很多外校的人，但没人认识她，只有我们东方红核心组的人知道。当时朱成昭代表东方红在主席台坐镇，蔡新平作为东方红的首席代表，主辩手，组织并参加辩论。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我、伏庆是、刘长风等同学，我也因为主要任务是维持我方秩序，处理临时事务而只跟她聊了几句。刘长风、伏庆是陪她的时间更长些。她是何时离去的我也不知道。

这场辩论结果东方红大获全胜。“8·24”是东方红由弱变强的转折点，大辩论后几天的功夫，东方红队伍就由几百人猛增到一两千人，保守派从此一蹶不振。



开创了文革期间尖锐对立的两派用文斗，说理辩论，以理服人从而战胜对手的先例。可惜，文革后来的发展，已很少有这种漂亮的说理斗争了，武斗和蛮不讲理全面取代了文斗和以理服人。

1966 年的 10 月份，我在三司核心组工作，有一天肖力打电话给我，让我约朱成昭、蒋良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见面。我就给住在地质部的朱、蒋打了电话，三司总部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我们三人一起在文化宫门口迎接了肖力。已经是秋天了，她穿了一件双排扣女式秋装，围一条蓝色三角巾，手提塑料文件袋。我们四人边走边聊，走向文化宫后院，找了一个休息凉亭坐下，这次见面我感觉就是聊天，气氛宽松而愉快，她又一一问了我们的年龄、年级。我们三人老蒋最大，1941 年出生，朱成昭 1942 年出生，我 1943 年出生，她说她 1940 年出生，因此我们应叫她大姐。她又顺便了解了一下三司的情况，诸如有多少学校参加三司，下设哪些机构等，又问了学校出外串联的情况。

告别时，我们三人把她送到文化宫大门口，朱成昭代表我们三人托她向主席、江青同志问好，她也知道我们已知道她的身份，彼此心照不宣，微笑着点点头，向西沿长安街而去。文化宫离中南海新华门很近，中间只隔一个天安门，想必她是直接回家了。

我最后一次和肖力见面是在地质部联络站期间，时间应该是 1966 年的 12 月底。那时同学们大都外出串联了，地质部机关被地院东方红折腾得处于“停摆”状态，留在北京的几个核心组成员都住在地质部当时称之为“地院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朱成昭、蒋良朴和我等人就驻在那里，联络站建有自己的广播台，由黄瑞华负责广播台的事，每天通过广播台向大院广播有关文革的宣传内容。当时的地质部联络站事实上是地院东方红的临时指挥部，朱成昭通过电话与出外串联的东方红驻外地联络站联系指挥，他曾扬言说在地质部装几十部电话可以指挥全国运动。而外地返京的同学也都到地质部联络站汇报请示工作，有几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就是在地质部联络站策划完成的。

1966 年 12 月，我因骑摩托摔成脑挫伤，先是住在宣武医院治疗，出院后住在地质部联络站休养，水文系一年级汤鸣皋同学负责照顾我的生活，每天给我打饭、提开水什么的。到 12 月下旬我已基本痊愈，能够自由行动了。

有一天肖力突然来访，但是朱、蒋等核心组人员都不在，而肖力只认识我，按照常规，肖力来之前都会先来电话预约，但这次却落空了——后来我分析，朱成昭可能是有意回避，不愿见肖力。因为那时候叶向真已经和朱成昭打得火热，随着叶、朱关系的升温，朱已经开始淡化了和肖力的关系，平时在言谈中已经流露出对江青、肖力的不尊重。

肖力的到来使我感到很突然，汤鸣皋同学和我向她介绍了我伤情恢复的情况，

她又问了一下学校和朱成昭的情况，我们三人就下楼边走边聊，三人从地质部北大门一直走到白塔寺，中途在一个小饭馆随意吃了点快餐后，她在白塔寺搭公交车回家了。

在我的记忆里，肖力就是毛泽东派出的担负特殊使命的自由战士，她的任务就是煽风点火，她的足迹不只是地质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陈荣金也跟她很熟，建工学院“八一”兵团的张玉晋也跟她很熟。后来听说陈荣金在抓 5·16 时被逼疯，自称是肖力的男朋友，并且跑到中南海要见肖力（当然没见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最近听说陈荣金已去世多年，不知是正常死亡还是死于非命。

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 5·16 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 1949 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 年发动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 我记忆中的抓彭德怀事件

在地院的文革史上，我认为有几件大事有必要重点叙述，来龙去脉要搞得清清楚楚。一个是抓彭德怀事件，一个是揪斗彭陆罗杨事件，第三个是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事件。

对于抓彭德怀事件，有的同学写了不少文章，这件事的亲历者除去王大来、钱欣两位已经去世以外，还大有人在，完全可以搞得清楚。我作为这件事的北京总部的亲历者，只能就北京总部的指挥策划过程作个交代。而在写这段文字之前的 2011 年 3 月 13 日，在武昌的地质大学内和蒋良朴、伏庆是聚会时，我把我的记忆和蒋交换了看法，他当时也和我一样住在地质部联络站，他对我的回忆内容表示肯定。

抓彭德怀事件发生在 1966 年 12 月份，当时大部份同学都已到外地串联，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各地以三司的名义或地质东方红的名义建了不少联络站。而总部朱成昭、蒋良朴等人从“四进地质部”后就留了下来，成立了地质部联络站，实际上这里成了地质东方红的总指挥部。我当时因为骑摩托摔成脑挫伤，

出院后住在地质部休养，因此也参与了一些总部的活动。

在我的记忆中并不像有人写文章说的抓彭德怀是周总理、江青等中央文革派地质东方红去成都。我记得的情况是，大串联开始后，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涌向四川成都串联，其原因我分析有以下几点：第一成都也有一个地质学院，他们学校的三系也就是放射性地质和放射性物探系是从我们学校刚刚整体合并到成都地院的。因有此历史渊源，同学、熟人较多，便于联系；第二个原因是成都是西南第一大城市，四川成都的运动对云、贵、川（包括重庆）有较大影响，因此三司的西南联络站自然建在成都。在这个联络站的师生，我有印象的有王大来，有钱欣、郑文卿（外号小炉匠）、谭宝华、朱德玉等人，后来王大宾也从武汉到了成都。这些同学在成都活跃在各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到处去看大字报。有一天郑文清等人给总部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内容是：他们在成都看大字报时发现了彭德怀的行踪，当时彭德怀被贬到大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任副总指挥是公开的事情，说彭德怀到学校等处看大字报，并不回避红卫兵，有时还和红卫兵交谈。朱成昭接到这个电话后指示他们要注意彭的动态，搞清他的住址和周围环境，当时并没有让他们把彭抓回北京，而是在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了中央文革江青和周总理。并请示是否可以把彭搞回北京来。很快从中央文革江青、戚本禹等处反馈回了消息，说是可以把彭搞回北京来批斗。这个中央文革的批示很快又通过长途电话由朱成昭传达到成都的同学那里。并且为了保密，把这次行动定为“抓聂克”行动。但是当郑文清、王大来搞清了彭的住址，和彭有了几次接触以后，他们竟被彭老总给说服了，动摇了，认为老头子在庐山会议上是冤枉的，他所反映的大跃进以来造成的饥荒、饿死人等都是事实。他们不想再把彭抓回北京了，他们天真地认为四川天高皇帝远，有利于彭德怀躲过这场风暴和打击。

对于前方的动摇犹豫，朱成昭又一次反馈到中央文革，这时江青派了自己的秘书阎长贵到地质部，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阎长贵，个子不高，穿军服，山东人，豫东口音，他的到来是传达中央文革江青的指示的，是来督战的，再次明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所指的。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要求地质东方红的红卫兵在抓彭问题上不能犹豫，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个政治态度，不要犯政治错误。针对这种情况，经过总部研究，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由总部派人坐飞机迅速赶到成都督战，坚决贯彻总部和中央文革的意图，迅速将“聂克”押回北京，第二是电话命令正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领串联同学转道成都加强力量，贯彻总部指示不动摇。王大宾接到朱成昭电话，很快赶到了成都。在派往成都代表指挥的人选上开始曾考虑让我去，我也表示愿意去，后来认为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就又另外选派刚从外地串联回来的胡乐成去。后来又发生了北航红旗在成都串联的人探听到中央文革的指令介入此事并与我们发生争执的一波

三折。但最终还是由王大宾他们将彭押回到北京。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朱成昭 12 月份在地质部期间，思想上还是紧跟中央文革的，对待中央文革的指示基本上还是服从和执行的。

### 黄克诚说“红卫兵对我很好”

事情发生在 1967 年 2 月份，彭德怀已经被地院押回北京并交卫戍区监护。有一天我在学九楼的卧室兼办公室接到一个从山西太原打来的电话，来电话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地院东方红驻山西联络站的同学，他说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黄克诚在山西。黄克诚 1959 年庐山会议后被贬到山西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很自然被山西省委造反派揪了出来，来电话的同学问我可不可以把黄克诚像彭德怀一样也搞回北京？我稍加思索后回答可以，我当时并没有想保护黄老的意思，我还没有那么高的超前意识和境界，只是觉得“彭黄集团”嘛，彭都搞回北京了，那么黄也应当搞回北京，和彭一起交中央处理。当时我给来电话的同学几点意见：第一要和山西省委造反派协调好，万不可发生冲突，做到和平交接。他说不会，他们和造反派关系很好，当地造反派一切都听他们的。另一条是要低调处理，就乘一般列车，不坐专列，不搞宣传造声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回校后也不要宣传。他们说可以，就照我说的办。我将此事告诉了办公室主任伏庆是，并叫他作好生活上的住宿安排。

大约两三天后黄老来到了地院，那几个陪同的同学把他和警卫秘书交到总部就完成任务走了。黄老和他的秘书被安排住在和我只隔一个门的九楼四层一个房间。

有一天我走出住室，在走廊上碰到一个瘦削老头，中等个子，穿一件旧军大衣，高度近视，戴一顶咖啡色裁绒军帽，向我打听男厕所在哪里。伏庆是告诉我他就是黄克诚。等黄老出了厕所回到卧室，我和伏庆是一同来到他们屋子。询问秘书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们寒暄几句就出来了。

在黄老到地院的同时，我们就电话通知了卫戍区李钟奇办公室，没几天就来了一辆军绿色大轿车将黄老接到卫戍区去了。

黄克诚到地院这件事，我是自己作主处理的，没有请示任何人，就只有我和伏庆是知道。这件事也是我多次受审的罪状之一。第一次提出是 1971 年抓 5·16 的时候，让我交待黄老到地院的过程，我就如实将以上过程写了一遍。可能是 1971 年时黄老尚未平反，此事就挂起来了。到 1978 年在“说清楚”运动中（说清楚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又作为一条罪状提出来，这时黄老已获平反并恢复工作，当时我所在的地质队党委书记刘恩贵（曾作为中南冶金勘探公司宣传队派

驻武汉地院担任过党委副书记）亲自跑到北京黄办去外调。黄老立即命秘书写了一个证明材料：我于 1967 年 2 月 X 日被红卫兵从太原带回北京地质学院，在地质学院共 X 天。红卫兵对我很好，没有给我制造任何麻烦。几天后就被卫戍区带走，证明人：黄克诚。

运动结束后和刘书记聊天时，他向我说了这次外调的经过。听完后令我感动。联想到文革运动初期，邹家尤在向薄一波汇报地院“反干扰”运动中被打击的学生名单时，上面有我的名字。这个名单被他保存到 1985 年到湖北检查清查“三种人”工作时拿出来“秋后算账”，说要把我定为“三种人”，使我又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同为中共高层的老革命家，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 我和朱成昭的相识

我和朱成昭相识于 1966 年的 6 月 20 号以后，也就是地院文革史著名的反工作队事件，“6·20”事件之后，“反干扰”运动之前。他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我是地质系三年学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认识谁。在“6·20”事件之前地院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还只局限于各系、各年级、各班进行，大字报多是以一个人的名义或者同班几个人的名义贴出。一般大字报贴出后在下面写上班级署上姓名，说白了，就是单打独斗阶段。6 月 19 日院教辅处处长李贵在学九楼对面大字报栏贴出了第一张向工作队开炮的大字报。当我看到大字报后非常兴奋，在第一时间以个人名义发表支持李贵观点的大字报，并将大字报贴在李贵大字报的旁边，最显眼的位置。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马打破了工作队进院后文革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竟有那么多的同学和我持同一观点，在我发表声明的大字报下方空白处不到两个小时就有几十个同学跟贴签名表示支持，把大字报空白处完全占满。当人们散去后，我带着一个小本子将在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学的班级、姓名抄了下来，然后按图索骥去和那些同学联络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我认识了几十个同学，现在记得的有张华福、滑振东、李仲学、王北宁、程西平、刘长风……等等，这些同学就是后来成立东方红战斗队的第一批成员，也就是所谓的老东方红。

“6·20”事件以后大字报铺天盖地，掀起了一个矛头指向工作队的高潮，提出了“搬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工作队是小脚女人”，“踢开工作队自己解放自己”等等口号，这时候就出现了以班级相同观点的同学组织战斗队刷大字报的新形式，比较著名的有水文四年级朱成昭的“爆破战斗队”，探工一年级张华福的“打狗队”，还有什么“红岩”、“丛中笑”、“海燕”、“赤卫兵战斗队”等。

我和朱成昭也就是在这时候相识的。那天我和同班同学伏庆是相约一起去北

五楼的四层水文四年级男生宿舍，找到了朱成昭。朱成昭，上海人，伏庆是也是上海人，两位上海老乡很快就聊得很开心，很投机。

在薄一波批示传达之后（大约 6 月 26 号之后），“反干扰”的大棒砸向了我们头上，从此在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时期，我和朱成昭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都各自缩回到班上接受工作队的批判，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问题。

我和朱成昭的再次聚头就是工作队撤出前由邹家尤召开的那个带有赔礼道歉安抚性质的小型座谈会，从那天开始，我和朱成昭几乎天天在一起讨论文革的有关话题，并到北大看大字报，向聂元梓求援。为了有一个议事的场所，我和伏庆是把行李搬到了教四楼二层的一个小教室，应是 7 月底 8 月初，把课桌一合就成了床铺，白天议事，夜晚就在那里睡觉，从此教四楼成了我院少数派的办公楼，在这里诞生了第一个跨系、跨年级和班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队，并在一楼大门口写上了“东方红战斗队办公室”的红底黑字的招牌，二楼设有办公室、接待室、印刷室、宣传室等等。那时候年青气盛，革命热情高涨，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几天几夜不睡是常有的事，还天真地认为，自己没有赶上“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而现实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当年的“五四”“一二·九”，是非常幸运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教四楼可以说是东方红的摇篮。在这里我们接待了中央文革派来支持我们的肖力同志，在这里我们接待了无数来自外校甚至外地还在受压未获解放的难兄难弟们，把革命造反的火种撒向四方，在这里我们策划了“8·8”庆祝 16 条发布的大游行，策划了进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我和共患难的朱成昭建立了兄弟般的战斗友情。

### 我和朱成昭的分手与重逢

凡经历过地院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届同学校友，都知道我和朱成昭是共患难又一起扯旗造反创立东方红的哥们、战友。但为什么从 1967 年的 2、3 月份，在朱成昭的周围却不见了田春林的影子呢？为什么在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叶朱反革命集团”案中没有田春林的名字，他是如何漏网的呢？

对于这些，外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说田春林背叛了朱成昭，有的说朱成昭抛弃了田春林，甚至还有人说田春林是花花公子，到文艺界追美女去了。对于以上种种说法我都一笑了之，不加任何辩解。对于其中的缘由，大概我只和伏庆是等几个铁哥们透露过大概。但从未详细披露过。

要说朱成昭对我的信任，那真是铁哥们，从以下几件事情可见一般。

先说三司的成立。三司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中成立最晚的红卫兵组织，最

初是由我们东方红牵头，串联政法公社、建工“八一”、清华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筹备成立的，最初我院是由周永璋同学以东方红（老东方红）的名义出面上下联络筹备，并于9月初召开成立大会，挂牌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办公地点。三司是受到中央文革、周总理、江青等人大力支持的，它在首都，乃至全国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朱成昭对周永璋一直存有戒心，为怕三司大权落入周永璋等人手里，而自己又没有精力顾及三司要务，对周又不放心，于是委派我代表他和地质东方红为常驻三司代表，参加核心组工作，将周永璋排挤出领导核心。此举足见他对我的信任程度。

又一件事是我在三司工作期间，1966年12月下旬，骑摩托车出车祸造成脑挫伤，被送到宣武医院救治，朱成昭和老蒋在第一时间赶赴医院，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朱成昭泪流满面弯下腰在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此情此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宣武医院住院期间，他又指派汤鸣皋、王北宁等同学照料我的生活，那时因为年轻，身体素质好，在宣武医院住半个月就出院了，出院当天，朱成昭和老蒋又要了地质部部长专车吉姆车，把我接到地质部休息，并安排汤鸣皋照料我的生活。朱成昭对我所作的这一切可以说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但是我们还是分道扬镳了。导致我们兄弟分手的原因，是对一个特殊人物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个特殊人物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头头叶向真。

事情是从我在三司工作期间的一件事情引起的。1967年初，我出院后在地质部休息一段，就又回三司上班去了。不久，朱成昭也搬回学校，住在西三楼三层东北角的一间教师宿舍，此后几个月，朱的宿舍也成了东方红上层的一个议事房，可以称上书房吧。

有一天晚上，我到北京人艺我的朋友蔡安安（北京人艺造反派的头头，曾在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李四光》中扮演华为和李四光的一个学生）那里去玩，碰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女生王敏（此人后来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蔡安安给我们作了互相介绍，当王敏听说我是地质东方红头头之一又在三司核心组工作时，极为兴奋地向我介绍她们学校的运动情况。她和叶向真在中戏导演系是同班同学，她参加的组织名称为中戏“红旗战斗队”。头头名叫魏阳，也是导演系同班。她说，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是造反派组织而是假造反真保皇，是工作队的打手，而红旗战斗队才是真的造反派，少数派、挨整派，叶向真是个投机派、保皇派，文革初期，中戏工作队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来的，叶的父亲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院长。工作队进院后成立了校文革小组并扶持叶向真当文革小组长，在那期间工作队和叶向真同样抓了“游鱼”，整了反工作队师生的黑材

料，当7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并开始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叶向真见风向变了，也可能听到了内幕消息，就摇身一变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在中戏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工作队撤出后她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组织人到军事科学院去抢所谓的黑材料，冲击档案室并发生了严重冲突，打伤了军事科学院警卫战士。而红旗战斗队的同学们是由“反干扰”期间挨整的师生组成，由于消息没有叶向真灵通，“红旗”成立比叶向真的红卫兵要晚，但红旗战斗队才是中戏真正的造反派。她还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三司。第二天王敏陪同魏阳等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来见我，并重述了王敏问我讲叙的情况。魏阳说他们学校被整过的同学至今都没宣布平反，黑材料也没退还。说到激动处甚至痛哭流涕。通过他们的叙述使我对中戏红旗的同学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知道受压挨整的滋味。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震惊和高度的关注。因为三司虽然成立最晚，但由于受到中央的支持而威望最高，影响最大，它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但总的原则是只吸收首都北京大专院校在刘邓路线中受压挨整而成立的少数派组织。使我对中戏文革产生兴趣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已经在这之前，和她的丈夫刘诗昆一起带人到三司来闹过事，采取封门、刷大标语等方式，并扬言要踏平三司，说三司是黑五类的保护伞等等，后来她又以另外的脸色去找朱成昭，要求参加三司，我们也正在考虑朱的意见准备给叶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三司身份证件。而此时叶向真已经成为我们东方红的一把手朱头的座上宾并有可能已经成为热恋中人。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决定亲自到军事科学院深入调查了解中戏文革的真相。那时在三司核心组，清华井冈山老蒯也派出了一位和我一样身份的同学代表他常驻三司处理日常事务，事隔几十年忘了名字，2011年春节，为了写这个东西，特地给远在深圳的老蒯通了电话，这老弟记忆真好，还记得我的名字并热情约我去深圳，我说明了原因，他立马告诉我，那同学名字叫张云辉，北京人，清华数力系一年级学生，现为加拿大籍华人，常驻无锡，并告知了电话，使我和张取得了联系。我们在电话中互致问候，叙了别情，回忆了三司往事。

张云辉中等个子，当时常穿高腰皮靴，骑一辆捷克造佳瓦牌摩托车来往于三司和清华之间。他说他们学校摩托车多得很，他为了方便随便就借了一辆。我就邀请他一道跑一趟军事科学院，一来方便，他骑摩托车带上我就行了，二来搞外调二人同往也符合规矩（出了车祸后，我是不敢再单独骑摩托车了）。于是到办公室开了三司证明，我们二人骑摩托车来到了位于西北郊玉泉山下的军事科学院。卫兵看了介绍信马上打电话叫出了一个参谋模样的军人，把我们引入后院接待室，

那时的三司名声极大，威望极高，一般的党政机关都不敢怠慢，三司被人们戏称为“第二文革小组”。

不一会从后面走出一位中等身材有些发福，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的首长，参谋介绍是胡主任，此人名叫胡秉权，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大名。大家相互介绍落座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对话主要由我和胡将军之间进行，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们来就是证实中戏红旗魏阳他们反映的有关叶向真和中戏文化革命情况。胡将军也毫不掩饰和盘托出。从他的话中证实了中戏红旗的同学介绍的情况完全属实：一、中戏工作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二、工作队在中戏期间扶持成立了校文革领导小组，其组长就是叶向真；三、工作队在中戏领导运动期间也无例外地执行了刘邓错误路线，整了反工作队的少数同学，但在工作队撤出学校时，这些黑材料都全部移交给了叶向真为首的校文革（胡将军说，我们是军事机关，要那些材料有什么用呢？）；四、中戏以叶向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我们这里抢所谓黑材料并冲击军事机关档案室，是十分错误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保卫档案室，我们的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他们有的人对我们战士大打出手，造成战士负伤，有的当场昏倒。但我们战士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

我问胡将军，叶向真明知这里没有黑材料，那她为什么要策划这次行动呢？胡笑笑：赶时髦呗！表示自己是革命左派嘛！当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确实有那么一阵抢材料的风气。与胡将军的谈话进一步深入，我又提出了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军事科学院这样的上层军事机关，要向一个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地方文艺院校派出文革工作队？这在全国可能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事。按照惯例，中央戏剧学院是文化部直属院校，工作队理应由文化部组织派遣，就像地院工作队由地质部派遣那样。胡将军对我的提问稍有迟疑后回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是奉命令而为。我又进一步追问：叶帅是你们的院长，向中戏派工作队是不是叶帅的意思？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我注意到他在回答我这一提问时表情极不自然，并且岔开话题，语重心长，以长辈对晚辈的口吻嘱咐我们：万不可将叶向真的问题和叶帅扯到一起，你们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但考虑问题往往不全面。

我和这位可敬的胡秉权将军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留了他的电话。后来在一次地质东方红将要采取重大行动，也就是炮打叶剑英的大标语、大字报即将上街的紧要时刻，我给胡将军去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想法和将要采取的行动告诉了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将军听到以后首先对我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并在电话中以十分紧迫十分关切十分诚恳的口吻劝导我和我的同学们千万不要走这一步，否则将会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并一再强调叶向真的问题不

能和叶帅扯到一起，头脑不要发热等等告诫的话。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将这个电话内容告诉了杨雨中。那时杨正在布置一个战斗队准备大标语和大字报，配合中戏红旗炮打叶剑英的行动。杨也听从了我的劝告，头脑冷静下来。其结果是炮打叶剑英的活动东方红没有参加。这件事情发生在叶向真、朱成昭被于桑带回北京被隔离审查以后。

从军事科学院调查回来后，联想到朱成昭最近一段和叶向真打得火热，平常接触中又发现他对中央文革首长，对肖力、江青出言不逊的作派，我感到发展下去十分危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将军事科学院调查之行的结果向朱成昭作一次长谈，并劝他与叶向真一刀两断。我也知道朱成昭的性格特点，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出来，不说不符合我的性格，说了以后听与不听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有一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上书房”，很郑重地向朱成昭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向他汇报。我将军事科学院调查等情况和盘托出，并将我对叶向真的看法以及中戏红旗兵团及其他文艺界人士对叶的看法如实告之，劝他远离叶向真，不要再与她来往。我当时是豁出去了，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也不看朱的脸色，一吐为快。当我讲完话，我看到朱成昭强压怒火，抽一口烟，对我解释：我们和叶向真来往主要是想更多了解中央高层路线斗争的信息，避免多走弯路。我立马反驳他：我们不是可以通过肖力这条线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上层路线斗争的信息吗？老兄，实践证明，我们东方红在这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得到肖力的点拨，并且每一步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朱成昭见我用肖力来噎他，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

我说：“肖力怎么了？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你朱成昭和东方红了？”

朱成昭对肖力的恶劣态度当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接着他对我下了最后通牒：“田君，你以后可以继续支持中戏红旗，我以个人名义支持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谈不下去了，于是我告辞退出，二人不欢而散。

这就是我和朱成昭的分手。后来他先告诉了伏庆是。他知道伏和我关系密切，叫伏转告我：若再干预他和叶向真的事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当然他这是放的狠话。这事直到 2011 年 3 月 12 号我和伏庆是在武昌聚会时，伏还对我提起，蒋良朴也在场。

这就是我和朱成昭分手的全部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以后的朱成昭周围少了一个田春林，为什么在“叶朱集团”中没有田春林的名字。因为受到我的劝告和影响，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朱的上海老乡的伏庆是，在朱的问题上也涉足不深，避免了牢狱之灾。

朱成昭的叛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接见会上，江青曾无奈地说，地质东方红是我们树立的一面旗帜，朱成昭不行了，但东方红的大旗不能倒。叶、朱从1967年4、5月份被隔离审查，不久逮捕入狱。两个人虽同时入狱，但处境却大相径庭。我注意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1973年9月，美国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报上报道了陪同周总理和江青接见乐团的文艺界人士中出现了刘诗昆的名字。刘诗昆是叶向真的前夫，也是“叶朱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后来听说叶向真也已经出狱获得了自由，出来后先改行到北医学医，毕业后分到301医院当医生。我当时就想，朱成昭也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我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的认识太肤浅了。朱成昭一直到1980年，在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由胡耀邦的亲自过问才获平反出狱。

1980年，地院已南迁到武昌喻家山下新址，张海涛给我来信，说他在学校招待所正等待学校的平反结论。风雨沧桑，多年不见很想见我一面，并告诉我朱成昭、老蒋他们已平反，也在学校等待分配。接信后我来到学校，先是见到了张海涛，后来到朱成昭住处。大家已分别十三年了！互相之间问候、叙别自不说，我看到这几个哥们十几年的牢狱之苦，九死一生出来后精神、身体都还不错。和朱成昭交谈中，有一个话题他不提，我更不敢触及，那就是叶向真。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朱成昭被单位派驻上海开发地质工程市场。这时正值浦东大开发，朱成昭第二次人生的机遇来了，他利用工作之便联系了不少工程勘察和桩基工程，也有了自己的公司，埋头苦干几年后可以发笔大财。那时我和他通过电话，当得知我已调回河南的工程设计单位作工程勘察和地基处理工作，他想约我去上海发展，而当时我们这里建筑市场也很火爆，我也是单位这方面的技术负责人，走不开。当时地质队比较萧条，很多地质队没活干，我就撺掇伏庆是租借一台单位的钻机去上海，并给伏寄去了有关工程地质方面的规范规程等资料。后来伏就从单位租了一台钻机赶到了上海。一个月后伏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回到湖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朱成昭根本不是经商的料，初开始也确实挣了不少钱，工程也不少，但是由于当时三角债问题，加上管理不善公司坐吃山空，很难为继。要命的是又有两个女人纠缠住了朱成昭，把他弄得神魂颠倒，甚至把公司财务大权交由一个相好的来管。最后连设备和现金都被席卷一空，朱成昭还叫伏和他一起到一个棚户区去找其中的一个小秘。但按照地址去找，根本没有这个人。

朱成昭出狱后回到上海，找了一个老知青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后由于朱在外面胡混导致两人离了婚。朱的第二次人生机遇又没把握住，最后弄得穷困潦倒。后由梅建民引荐认识了研究文革的某外籍华人记者。由这位媒体人资助来

到北京，住在昌平十三陵的农家院里写文革回忆录。这时的朱成昭已经心力憔悴。1999年我到北京梅建明处看到他去世前在北京的照片，只见人已脱了形，连1980年出狱时的精神状态都不如，瘦得可怕。朱在1998年下半年突然猝死在十三陵寓所。后朱德瑜等同学为他料理了后事，因朱成昭没有丝毫积蓄，让我们老同学给予支持，我当时也因身体患了小中风不能前往，为表心意寄了点钱去。后来和老蒋聊起这事，他说朱去世前半夜还和他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后半夜就暴亡了。朱在去世前，精神抑郁，情绪失控，有病从来不去医院看，去世时年仅56岁。

### 谁举报了朱成昭

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些沉重，我曾经想回避，让它烂掉在我肚子里。经过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决定揭开这个谜底。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向中央文革肖力写信举报朱成昭的是张海涛，我是知情人和递信人。

已经四十多年了，两位当事人都已作古，对于我来说也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讲了，我想既然是还原历史，那就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毫无保留地将回忆得起来的事交代清楚。过去在隔离室交代是被专案组高压下逼着，现在自觉自愿的氛围里更不能有所隐瞒，况且大家都已经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回顾历史，大家已经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我想如果张海涛没有去世，他对我们这次回忆和反思地院文革史的活动肯定会积极支持，热情参与，实话实说的。

关于这个话题，圈内有各种说法，我听到的有三种，第一种说法是王大宾向中央文革揭发了朱成昭，道理显而易见，不用我多解释，他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第二种说法是朱的反对派“二团”的蔡新平、周永璋，联合校外势力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向中央文革揭发了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情况；第三种说法是学校陶世龙老师等人写信检举了朱成昭。

在将这件事全过程交代给大家之前，首先我将张海涛的情况以及我和张在文革中的关系说一说。

张海涛，东北辽宁人，1933年出生，家庭出身佃农，按照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这个出身是革命坚定的依靠对象。虽然家里很穷但还是咬着牙供他读完了小学，这在当时也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前身解放了他的家乡，他仅14周岁，坚决要求参军，凭借他人聪明又有些文化底子，被部队破格批准入伍，这个人的优点是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特别崇拜文化人并且也想成为一个文化人。在部队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文化教员、文

书之类的写写画画，这对他自己文化水平的提高大有帮助。解放后，部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高潮，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并取得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1956年考取人大哲学系马列主义专业。哪知流年不利，赶上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因为他为大右派林希翎说了几句公道话，在“反右”运动结束时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文字结论是“同情大右派林希翎”。他原来是部队带职的调干生，原定毕业后回部队，并在1955年军队授衔时已被授予中尉军衔，就因为这个“污点”改变了他的命运，改为由地方分配。当时他爱人已从部队转业到清华无线电系作实验员，照顾关系把他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研室工作，后来地院成立了附中，他又被以加强附中老师队伍为由调到附中当语文教员。在附中由于工作努力，教学成绩突出，又一次在薛玉峰等人的介绍下重新入了党。

张海涛给我的印象是人很勤奋，爱动脑子，遇事喜欢动笔记下来，这本来是个好习惯，但在那个血腥的年代却往往给人带来灾祸。空军军宣队进校的1968年秋天，他是第一批被隔离审查关进军队自建监狱——西四楼校医院的三楼里的。后又被正式逮捕送进了秦城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出狱。在“6·20”事件后几天全院反邹家尤工作队的日子里。附中曾出现一张反工作队的很有名的大字报，落款的署名为“玉万海瑞”。在“反干扰”时，附中和地院有人把这张大字报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联系上了，说他们是为海瑞翻案，是和姚文元唱反调，为当代海瑞彭德怀翻案。这件事在“反干扰”中，在地质学院几乎人人皆知，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心想附中还真有人如此大胆敢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后来认识了张海涛，才知道真相。原来，“玉万海瑞”的署名是取写大字报的四位老师名字中间一字组成的笔名，这四位老师是薛玉峰、刘万祥、张海涛、单瑞康，而排列的顺序则是按入党的先后。没有经过那种年代的年轻人，不可能理解那个年代会有多么荒唐，人们的思想会有多么病态。这四位老师在“反干扰”时都受到了口诛笔伐的批斗和迫害。后来到了8月份，成立了东方红公社，这四位老师中除了单瑞康老师以外，其他三人都是东方红公社红教联的积极分子，其中薛玉峰老师后来参加了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领导工作，并被结合进了北京市革委会作了委员，而张海涛成了我们东方红公社红教联核心组成员并进了公社领导班子，我就是在那时和他相识并相知相交的。

我和张海涛相识以后接触慢慢多了，发现我们在对文革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有共同语言，因此关系愈加紧密，个人关系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们成为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骆辅琴大姐是我的河南老乡，骆大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贤妻良母，河南商丘人，也是建国前参军的，属于河南的地方部队。吴芝圃是她们的首长，后编入中原野战军。解放初中共中央在长春建了一个机要学

校，专为中央培养机要人员，可见进这个学校政审上是非常严格的，而她能进这个学校说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但是这个学校只办了两期，第一期的毕业生大都进了中央直属机关机要工作，像后来成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谢静宜就是早一期的学员，而骆大姐她们却都转业到地方，由地方分配，她分配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作实验员。张海涛在地院附中没有住房，清华给骆辅琴分了一个平房大杂院的筒子间，地址叫做第六宿舍，小两口就蜗居在这里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清华才给骆大姐分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还在七层的顶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逢星期天、节假日，他们在清华的蜗居地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不用说每次去少不了吃饺子，喝小酒。记得后来孟繁华同学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每次我都约孟结伴前往张家打打牙祭。

1967年的元月份，外出串联的同学陆续返校，朱成昭等人也从地质部撤回学校住在三层最东边一间教师宿舍内，我把它叫东方红的“上书房”，是朱头的卧室兼会客室，除去学院内部的人进出之外，每天进出的还有校外一些中学生联动分子，来得最多的是叶向真。叶向真是否到来有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她有一辆灰色伏尔加轿车代步，只要楼下停一辆灰色伏尔加，她一准在朱头那。有时一停就是大半夜。朱头这时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不再过问学校运动和东方红的具体事务，张海涛也到他那里去交谈过，发现他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都进行攻击和不满，我也将到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档案室，叶向真在中戏文革中的表现等情况说给张听，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朱成昭由于自己的父亲受到冲击和叶向真对他灌输的中央高层的斗争情况，朱成昭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下去很危险。

有一天，张海涛对我说，准备给肖力写一封信，反映朱成昭近来思想的变化情况，引起肖力的注意，我们这些人的話他听不进去，中央文革、肖力的话他不敢不听吧？过了几天信写好后，张海涛找到我，把这封信的全文读给我听，信的标题是《关于朱成昭近期思想变化的汇报信》，全文大意是：

朱成昭近期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在一次和我的深入谈话中，他想当然的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他说外国就有这样政变的例子。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

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

尤其是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月风暴被群众揪出来受到冲击以后，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经常对群众运动发牢骚，散布对运动攻击和不满的言论，他放言说就是坐牢也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他甚至放肆攻击中央首长，对中央首长的接见也拒绝参加。他与那些被处理过的中学联动交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出入他的房间，他与中央戏剧学院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叶向真关系密切，两人经常闭门长谈，甚至彻夜密谈，叶向真的影响是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两人关系很不正常。这些人还可能有经济问题，生活腐化，几乎每天下馆子大吃大喝，高级香烟不离手。

张海涛的信最后说：我们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希望肖力同志和中央文革首长对朱成昭的情况引起注意，能够批评他，警告他，使他能够幡然醒悟，悬崖勒马，改正错误，继续带领地质东方红这支队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信的落款署名是“地质东方红红教联张海涛”。

以上就是张海涛给肖力举报朱成昭信的主要内容。因为事关重大，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记忆仍比较清晰。读完信，张海涛向我征询意见，我说可以。然后他就重新把信折叠好装进信封交给我，要我在首长接见的时候递给肖力。他没有要求我共同署名，因为他知道，我既然能将信交给肖力，本身就表明我的态度，有关信中反映的问题肖力也会向我当面问明。

那段时间，无论是在三司或是后来的红代会，作为核心组成员，每当有中央首长接见活动，总有列席的入场券给我们送来，所以见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而且几乎每一次这种接见会，肖力都会出现在群众座位当中，她跟很多高校的头头都很熟。也有不少外地来京上访的群众通过熟人关系委托我们向中央首长转交信件。

过了几天，在一次人民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上，我见到了肖力，把张海涛的信交给了她。又过了几天的一次接见会上，当我刚找一个位置坐下，远远看见肖力在向我招手示意，叫我到她那里去坐。当我穿过人群坐到她旁边，两人就聊了起来。她先问我张海涛的情况，因为之前肖力并不认识张海涛，她到地院来主要接触的是她在东方红早期认识的学生成员，我向她介绍了张海涛的有关情况，后来她又问了朱成昭和叶向真的有关情况，我都将我知道的情况如实相告，因为熟了，说话有些随便，我笑着说：“叶向真可比你有派头，进出地院都是以伏尔加代步，还有专车司机。”她略加停顿说：“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从肖力接到张海涛的信以后的情况来看，我估计张信肯定已引起肖力的高度注意。当然也不排除她从其它渠道了解朱成昭的思想动向，比方微服私访，来校看大字报，因为对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动向，当时地院的“杀猪（朱）派”在大

字报上已有所反映，或者也有人写信反映了朱的问题。不久，在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传达了陈伯达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过去关照你们，现在还有责任来和你们打招呼。听说你们要搞中央文革，还要斗到底。”“一定不要这样，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招呼你们是为了照顾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要陷入泥坑里去，那是自作自受。”从内容和态度看，可以肯定是肖力接到了张海涛的信并综合其它方面的信息向陈伯达作了口头或书面的汇报，也只有肖力这种特殊身份的人的话才能引起陈伯达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请大家不要忘记，肖力是陈伯达亲自签署便笺派往地院的文化革命观察员。应该说，肖力与朱成昭也是非常熟悉的，对他和叶向真接触并走向叛逆，肖力是十分痛心和反感的，但从陈伯达的批示看，对朱成昭还只是一种警告和批评，再从 3 月 5 号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中，要朱成昭“闭门思过，学习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检查”来看，对他还是一种挽救的态度，从张海涛写信的本意来看，也是想让肖力和中央文革出面来批评他，警醒他，挽救他，并没有想一棍子把他打死。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朱成昭发展到抛出“八大观点”公开对抗，又南逃广州，最后惊动周恩来命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出面从广州带回北京，从此投入大狱，九死一生十三年。

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三位当事人中两位已经去世，今天我第一次将这个秘密展示在同学的面前，再现那段历史，无论同学们如何评价我，总算对历史有了一个交代。

### 关锋给我的一次电话记录

有人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里看到 1967 年 8 月 9 日关锋给我的一次电话记录，内容是：

田春林同志：

听说你们那里因为地院革委会确定朱红、黄占启两同志随我去一趟的问题有很大的争论，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争论，妨碍掌握斗争大方向，既然争论很大，这次你们那里可以不去人。

希望你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把朱成昭批深批透。你们那里批判朱成昭和大方向一致。8 月 2 日，你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讲了几句话，大

致也是这个意见。

关锋

八月九日

关锋说的 8 月 2 日这个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在人大会堂开一个群众大会，我作为红代会常委上主席台，座位与关锋相邻，跟他聊了几句，主要是我向他口头汇报学校当时揭批“叶、朱反革命集团”的形势——当时叶向真、朱成昭已经被于桑从广州带回隔离在地院十二楼，全院以二团为首的“杀猪（朱）派”掀起揭批叶、朱高潮。关锋在跟我谈话中强调要“追后台”，这使我感觉是不是想把矛头引向叶帅？他没明说，我也没多问。

当时，造反初期的老东方红战斗队很多同学对朱成昭倒台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与朱决沒有反文革的思想共鸣和行动的跟进，这些人被当时“杀猪派”戏称为“啃猪蹄”的，还是朱派。这完全是派性使然。关锋这个电话记录中提到的黃占启和朱虹（电话记录中写作朱红）就属这种情况，黃是周永璋一班的，“反干扰”中也被工作队整得够呛，后来是东方红战斗队骨干，地院革委会成立后任地质系分会副主任；朱虹是水文系一年级女生。当时关锋准备到外省去处理一个派斗之事，地院东方红在当地影响较大，关锋就准备带两个东方红战士一起去协助他工作，派谁去的名单是地院革委会推荐的，“杀猪派”知道后强烈反对，说他们是“啃朱蹄”的，贴了一些大字报，从而使这事取消了。

大概关锋那次打来电话时我不在，就由接电话的人做了这个记录。若不由知情者加以说明，以后的人就很难明白这个电话记录里说的是什么事。

### 我被清洗出革委会的经过

事情要从 1967 年成立院革委会说起，院革委会成立时，王大宾很自然成为主任，当时他已是市革委会常委、红代会副主任。我因为是东方红公社创始人之一，和朱成昭案又没有什么瓜葛，自然也就进了革委会成为常委。因为我在三司工作过，与外校的同学较熟悉，就又被王大宾派到红代会，代表地院东方红进入红代会核心组。每天骑自行车来往于北大和地院之间（红代会设在北大俄语楼）我住在学九楼顶楼最西头的一间屋子，和伏庆是同室，住室内设有电话，和外界联系很方便。

我们系五年级有一个同学陈家庚，福建人，他当时联系校内外及中学红卫兵，成立了一个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当站长，设在西单的中国电影家协会院内。陈家庚后来的夫人李冲那时是中学红卫兵，参加批影联络站而相识相爱的。我们学

校还有张吉顺等人参加。陈家庚隔三岔五给我送来电影票，因为要批判毒草电影就要先看毒草电影，在那个时期我和伏庆是没少看不花钱的电影，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欣赏，或者打着批判的幌子欣赏电影艺术，想看什么电影打个电话他们立马可以调出拷贝拿来放映，像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白痴》《白夜》，国产电影《武训传》《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

大约在 1967 年 10 月的一天夜里，陈家庚到寝室来找我，表情很严肃，说是有一个人事需要我帮忙。他有个亲戚名叫郑公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郑是他姐的前夫，郑跟他姐共生有三个子女，老大郑伯农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老二郑仲兵在民族学院工作，老三是女孩叫郑立中，就读于哈军工。这三个外甥都很有出息，虽然郑公盾已和他姐离婚多年，但三个外甥跟他常有来往，关系很好，而郑公盾在经济上对他读书也有些接济。他介绍说郑公盾是个文人，解放前毕业于杭州大学，后从事媒体方面的文字工作，三十年代和江青也有过交往，因为英文基础较好，解放前曾供职于美国驻华新闻处，解放后进入红旗杂志社作文艺评论方面的工作，常在杂志和报纸上写一些评论文章。文革中曾任中央文革文艺组办公室主任。可能是在杂志社内部的派系斗争中站错了队，得罪了人，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历史问题被翻出来，不知什么人向江青打小报告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在最近的一次接见会上江青点了郑公盾的名。使郑公盾陷入了困境，处于被软禁状态。陈家庚说郑公盾有一封说明情况的申诉材料想通过我转交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因我是红代会常委，经常参加一些外交应酬活动，见首长的机会比较多。我平常和家庚关系不错，他既然提出来了，我也就没多加考虑，就和他还有伏庆是三个人一起搭公交车来到沙滩的红旗杂志社家属院。门卫看到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也就没阻拦。到了郑公盾家里，除了郑公盾还有他的现夫人在家，因为事前陈家庚已将我们要来的消息电话通知了他，进门后大家不用介绍就在客厅落座。郑公盾将自己的经历叙述一遍后又说，美国新闻处是没有官方背景的纯粹新闻社团，在世界各国都设有分支机构，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关系。自己到那里工作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已经加入地下党，思想上还是进步的，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个美国特务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自己这段历史解放后已多次向组织交待过并没隐瞒什么。正在这时，从外面进来十来个人说是来抄郑公盾家的。带队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造反队头头石洗，此人后来在电影《李四光》中饰演李四光的学生。我和他虽没打过交道，在首长接见时见过面，也面熟，何况我又戴着红代会的袖标。互相打过招呼后，他见我们已先到一步，也就没采取行动，也没停留就退出去了。我们和石洗并没发生冲突。

时间很晚了，我们怕搭不上末班车就告退出来。临行前郑公盾交给我一封信，收信人是江青，落款为郑公盾。

不久，西哈努克亲王为庆祝柬埔寨国庆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宴会在人大常委会二楼小宴会厅，我作为红代会常委应邀出席。会上遇到陈毅，我们坐邻桌。宴会结束时我将郑公盾的信交给了陈毅，他满口答应说一定转交江青同志。

我和郑公盾的接触仅此一次，为他办事也仅此一件。那时为下面或外地上访群众向中央首长转交信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因为我们那时的特殊身份，见中央首长的机会是很多的。

1967年11月30日下午，院革委委员、地质系革委会主任刘佛兴来到我的住处通知我去眷属区眷8楼周守成的住处开会。周守成已搬出了这个独立二层小楼，我说怎么不在会议室开，他说天冷，没暖气，周守成的二层小楼有小锅炉可以独立供暖。我就信以为真跟随着刘佛兴来到眷8楼周守成原住处。当上到二楼会客厅后，刘佛兴啪的把门反锁上站在门后，这时走出四五个地质系一年级的同学，刘佛兴从身上拿出一张纸对我宣布：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决定，从即日起对田春林隔离审查。我当时就急眼了，扑上去揪着刘佛兴的衣领大骂。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同学上来把我扯开，刘佛兴也走了。不一会那几个人去学九楼把我的行李也搬到了隔离室。从此我被聂树人、李贵在这里隔离了一个月整。

一个月后，当我走出隔离室，同学们告诉我在隔离我的当天晚上，学九楼门前的大字报栏就贴出了大标语，内容是“揪出反革命分子郑公盾伸向地院的黑手”、“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公盾在地院的代理人田春林”等等，看来李贵、聂树人对我下此狠招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的专案组成员就一个人，名叫陆焱德，是探工系教师。被隔离后三四天都没人理我，在第五天陆焱德来到隔离室找我谈话，吓唬我说郑公盾案很大很严重，与郑接触过的人都要接受审查，要我老实交代争取宽大。我也吓得够呛，就将那天晚上和陈家庚到郑公盾家后又替他转交一封信的情况如实交代。交代完了后又是好几天没事。我要求见李贵，因为王大宾已经到鞍山汤岗子温泉治疗风湿病去了。但李贵在我被关押一个星期之后才姗姗来迟，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他闪烁其词，说隔离我是周总理的批示，我让他拿批示给我看，他拿不出，又说是总理的讲话中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郑公盾反革命集团伸向地院的黑手云云。在郑公盾问题上又重复了陆焱德和我谈的内容，然后就试探性地问我高元贵的关系，和二团的关系。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就具实告知：本来我和高元贵、二团的接触都是正常接触，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我也公开声明在对待校内外运动问题上支持二团观点，并且曾建议吸收蔡新平进革委会，与我持同一观点的有张海涛、高元贵、黄振群等革委会委员。有一次在李贵家里开常委会，就这一问题发生严重争论，聂树人和张海涛拍桌子大吵。聂指责张是二团观点的代理人，这位东北汉子忽地一下站起来说：我就支持二团，看你把我怎么样！说完话，甩手而去，搞得会不欢而散。张这句话给自己留下了祸根，在

这次大清洗中他被以是附中的人，关系不在学校为借口赶出了革委会。而隔离室期间，朱成昭专案组组长李思田找过我两三次，当然他关心的是我和朱成昭的联系，来了两次见从我嘴里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就没有再来。后来听说这位煤田教研室老师、朱成昭专案组组长在抓 5·16 运动中也被揪了出来，说他是真 5·16 分子，假抓 5·16。曾经被逼触电自杀，因抢救及时没死成，不然就是第二个李明哲了。现在他是著名的煤田地质学家、博士生导师了。

隔离室后半个月很有意思，看守我的学生全部撤出，换了一个工人日夜陪我，开饭时他给我打饭，晚上与我同室睡觉，其余时间是陪我聊天下棋。聊天中知道他原来是前任院党委书记刘邢的警卫员，跟随刘邢从部队转业来到地院，刘调走后他留了下来，家也安在了地院。因天津战役中下身受伤，睾丸打坏了，至今没有生育。最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1967 年的 12 月 31 日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被隔离整整一个月后，我们班上的张绍宗、张金生两位同学来到隔离室，帮我拿行李回班，说是院革委会通知班上把我接回班，院革委会没有任何人和我见面宣布解除隔离。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重新回到南五楼 514 室我们 11631 的宿舍，回到了同学们中间，过起了逍遥派的生活。伏庆是照样当他的革委会委员，办公室主任，我问他隔离我的决定开没开会研究，他说根本就没开会，那天晚上他也去了郑公盾家，怎么没隔离他？除了聂树人、李贵、刘佛兴三人之外，其他委员都不知道要隔离我的事。只是我被隔离后出了几幅大标语才知道我被隔离了。

后来我在 1968 年夏天军宣队进校后见到陈家庚，他也刚从隔离室出来，被关了半年多。而郑公盾在我们之后被逮捕关押在秦城 8 年之久。这次革委会大清洗的结果，高元贵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赶出革委会，交群众批斗，张海涛以关系在附中为借口赶出革委会，我是因“郑公盾黑手”清洗回班当上了逍遥派，黄振群被清除的借口是什么忘记了。通过这次清洗，“纯洁了革委会，打击了走资派的复辟阴谋，清除了二团的代言人，院革委会政权得到了空前巩固”。后来又闹出了自己批准自己入党，成立院党委会，李贵顺理成章当上了党委书记，王大宾、聂树人也入了党并进入了党委班子。不久在 1968 年的冬季，在新的院党委和革委会的英明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在聂、李清洗反对派，改组革委会的那段时间，王大宾在东北汤岗子温泉疗养，等他回来一切已成了事实，王大宾事实上已变成汉献帝了。地院的这些变化，连中央最高层都有所察觉，在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时就问王大宾，“听说你的二把手夺了你的权是这样吗？”指的就是这件事。

## 地院文革中四个最黑暗时段

纵观地院十年文革史，有四个最黑暗的时段。

第一个黑暗时段是“反干扰”，发生在 1966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底，是由地质部邹家尤、边固工作队造成的，没有逼人至死的记录。

第二个黑暗时段是第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发生在 1968 年元月至 2 月间，是由王大宾、聂树人、李贵的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王大宾虽不是直接操作者，但负有领导责任。

第三次黑暗时段发生在 1968 年的秋冬之交，是由空军大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的牛润五，林凯领导造成的。

第四个最黑暗的时段是 1970 年下半年开始的抓 5·16 运动，也是由军宣队导演。这次的特点是第二次的整人者一个不剩地进入了重点被整和打击对象，像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等头面人物都成了抓 5·16 的重点人物，而他们之前的战绩被认为是真 5·16 假抓 5·16 的行为。当然像我这样的早就列入另册的人也和他们殊途同归了。

这次抓 5·16 的另一特点是，文革前入学的学生已全部分配出去，像我一样大部分学生是走上社会后被整的，也有被逼至死的记录，像探工系的李仲学。而校内的代表人物是李明哲，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被逼死在江西峡江的野山上，死后数日才被发现，尸体已高度腐败成了副骨架。

建议这次文革资料征集小组把地院文革十年中被整死的人作个统计，目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将来我们的后代子孙们回头看这段血腥的历史会加倍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可以使像王鸿夫妇们那样冤死者的后代子孙们可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

在聂树人、李贵的大清洗中，最惨的是高院长，他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交给各班级战斗队轮流批斗。在我脑子里就清晰地定格着我们班批斗高元贵的情景，那天我们班参加劳动，在南五楼与航院交界的菜地拔草，劳动间隙里批斗也和我们一起劳动的老夫子，我们班的刘××上去给老人家架喷气式，当时高已是年届 60 岁柔弱的老人，真不知道老人家是如何挺过那段凄惨日子的。此情此景使我终生难忘。

(编者注：该文以上部分发表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昨天》第 54 期)

## 我所知道的三司

## 田春林

首都三司，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什么又叫“三司”？是因为在它之前已成立了两个全市性红卫兵大专院校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简称一司和二司。

首都一司，成立于 1966 年 8 月 27 日，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杨勇、刘志坚、汪东兴等到会祝贺。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担任辅导员。一司总指挥汪延群（汪东兴之女，轻工学院学生）。它的成员主要由军队高干和党政高干的子女组成。由于他们家庭的特殊地位，对中央上层的政治动向消息比较灵通，当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率先拉队伍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组织。

首都二司成立于 1966 年 9 月 5 日，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江青、刘志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到会祝贺。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任辅导员。二司总指挥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中将之子，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负责人）。其组成人员也主要是出身好的非当权派子女，许多还是保党委一派的，但政治上不像一司那么激进，比较温和，他们对一司那些出身高贵的军干子女的作派也很反感。

三司紧随二司之后，成立于 1966 年 9 月 6 日，据资料记载，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大会，由刘志坚代表周恩来和江青讲话，建议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作三司顾问，刘志坚、杨成武作辅导员。但据周永璋的回忆和我的记忆，三司的辅导员是刘志坚与郑维山，杨成武从未参加过。三司未设总指挥，前期的召集人主要是北京地院东方红的周永璋。三司组成成份是清一色的各院校中前一时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的“少数派”即造反派。因此三司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而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具有崇高威望。

### 三司的成立与周永璋

三司的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始作俑者。因为地质东方红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北京大专院校中率先取得全院“一片红”的绝对优势，在其它院校少数派同学还没获得解放或刚获得解放的时候，地质东方红已经成了气候，像清华的蒯大富就还处在困难境地，不时来地院寻求支持。

谈到成立三司，不能不说一个人，他是三司的发起人和主创者，也是三司前期主要的“召集人”，地质东方红战斗队的早期成员之一周永璋。周永璋和我是同系，同年级，同一专业不同班的同学。我们 1963 年入学的地质学专业共招收

62人，一个大班，分成两个小班，每班31人，我是一班，他是二班，宿舍都在学五楼的五层，两宿舍紧挨在一起，因为同一专业，很多大课和野外实习都在一块儿上，因此彼此都非常熟悉。

周永璋是江苏如皋县人，说话带有浓重苏北口音，出身贫苦，小时候家里穷，得了头癣没钱治，落下了一个秃头的后遗症，除了头上周边几根稀少的头发外，基本全秃。为了遮丑，夏天带一顶草编礼帽，其余季节常年带一顶赵本山式的解放帽。因为出身好，又靠拢组织，因此被我们政治辅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发展为第一批学生党员。此人平时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口无遮拦，喜欢侃大山，吹牛皮，同学之间争论到激动处，嘴角唾沫星直冒，不时把头上的帽子一把甩到桌上侃侃而谈。他是属于那种非常善于沟通、很有外交才干的人；再一特点是此人人缘特好，从来没见过他和谁红过脸，没有防人之心，像我们这些老同学混熟了说话随便时就直呼周秃子，他也不发脾气，整天见人一脸笑，人绝对是好人，不整人不害人。

周永璋是在地院“6·20”事件中紧跟江祖如老师反对工作队，在“反干扰”中被工作队定为极右学生，工作队对学生干部公开宣布罢官的三人之一（其他两人是蔡新平，黄占启），受到打击迫害，因此在我和朱成昭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他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但是没能进到东方红核心组。

这人有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大的毛病，就是政治优越感。因为出身好，又是学生党员，总是政治上自我感觉不错，有点显摆。东方红战斗队刚成立，领导核心没有他，他就经常在我们核心成员面前说教：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要加强党的领导，防止斗批改抓辫子。而当时核心组成员里的确没有一个党员，包括朱成昭也只是个团员，而像我连个团员都没混上，伏庆是也是刚入团。对他的这番说教，大家都很反感，尤其是朱头，甚至认为他想以自己是党员为借口篡夺东方红领导权。因此对他很冷淡，也不让他参加核心组议事。由于得不到大家的待见，又经常坐冷板凳，慢慢地他也就淡出了东方红核心组的视线。

哪知道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这位老兄胸中酝酿，那就是成立一个跨学校的，由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组成的组织，也就是后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说周永璋也是个有心人，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在教四楼的东方红战斗队来访接待室，每天都有不少外院校还处在受压状态的同学来访问座谈，取经交流，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很多后来成了各自院校造反派领袖的同学，像人大赵桂林，政法的陈荣金，建工的张玉晋，贾建，北工大的高升，石油的姜阳，清华的老蒯，航院的景岗山，韩爱晶等人，这些人脉关系的建立就为后来三司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永璋是一个具有外交才干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和这些院校建立起关系，同时又与中央上层和北京新市委取得联系，以便得到上层的支持。

持。当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有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红卫兵接待站，北京新市委也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我记得在三司成立之前，吴德就批款给地质东方红买了五辆济南轻骑牌摩托车，购车时我和朱成昭拿着支票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挑选，后来我们的动态组都配了几辆这种车子，方便他们跑各校收集资料掌握动态。我和伏庆是都骑过这种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先进的交通工具。周永璋就是通过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的红卫兵接待站，认识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吴德，并通过他们向周总理汇报了筹备成立三司的设想和计划。从而获得周总理的支持和指导，在一次召开全体成员院校的筹备会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与周荣鑫、吴德和全体成员合了影。周永璋曾拿照片给我和朱成昭看过，不知还有其他核心级成员看到过没有，也不知道几十年后周老兄可曾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经过周永璋等人紧锣密鼓的筹备，又经过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在物资上的大力支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就是三司应运而生了。三司成立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座无虚席，各成员学校的红卫兵领袖都上了主席台，我和我们的朱成昭、老蒋等人也上了主席台。大会由周永璋主持，大会发了成立宣言，宣读了决心书，各组成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上台发了言，表了决心。

三司的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宣传部办了一个三司的机关报《首都红卫兵》，由我院地质系四年级的聂树人同学为主编。为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可能是受总理的指派，北京军区专门派出了一摩托化步兵班的战士驻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班里配有十几辆两轮和三轮摩托车（据周永璋回忆，是一辆卡车、三辆吉普、三辆摩托），随时接受我们的调遣，解决了三司对外联系的交通工具问题，还开了临时的食堂解决吃饭问题。记得当时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将军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将军不时到文化宫三司来关心大家，问有什么困难需要部队帮助解决。郑维山黑瘦精干，刘志坚像个文人，脚有些跛。他们来三司都在那个摩托化步兵班落脚。总之，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由于毛主席支持，党政军都行动起来支持红卫兵运动，尤其是支持三司的红卫兵。

## 我怎么到了三司

三司的发起成立是由地质东方红挑大梁，三司成立时，老蒯也给予了关注，他派驻三司核心组的工作人员名叫张云辉，跟我关系处得不错。三司是由周永璋以地质东方红的名义串联各兄弟院校成立的，他完全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受总部核心组的派遣和批准，等到木已成舟，他才向总部朱头汇报，这本来也让朱头心

中不快，而形势的发展，三司的前途又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么，这是一个受到中央支持的跨学校的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因此一直对周永璋存有戒心的朱成昭开始动脑筋，他自己肯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校内，放在东方红公社的建设上，没有时间过问三司的事，但对周永璋又不放心，必须派一个有资历没野心他信得过的人去三司代表他工作，这个人选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第一我是东方红的发起人和东方红战斗队的创始人之一，在地院知名度很高；第二我是和他最早串联一起反工作队，又一同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我又没有与他争权的野心，是能让他放心的人。

在我奉派上任三司前，朱头首先向老蒯、聂元梓、陈荣金等外校的头头都打了招呼，说明了换人的原因，而我也和这些外校的头头早已相熟，因此我去三司工作很自然得到他们的接受和认可。周永璋看出了苗头，表现了很高的姿态，慢慢地自动淡出了三司的“召集人”位置。我从来没同他理论过这个事，我和周永璋之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大家见面照样说笑自然，而我当时也没觉得这种摘果子吃的作法有什么不对，现在回忆起这一切，都感到当年对周的作法有点过分了。当年毕竟年轻气盛不成熟，现在再回忆当年，自己有时也觉得可笑。

周永璋后来组织了东方红内部的反朱派即二团之一的“620造反兵团”。十三年后的1999年，我们都是年近六旬之人了，我到北京去看望老友，住在西三楼招待所，去看江祖如老师时他很高兴，告诉我真巧了，周秃子也来了，并且告诉了他住的房间号，我立马去看望他，他也很兴奋，大家回忆起三十几年前那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真是感慨万千，他向我介绍了离校后的经历。正是由于他不受朱成昭的待见，早早离开了朱成昭，成了朱的反对派，地院后来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他无关，毕业分配也没有受到影响，分到四川，到地质队后又调到宣化地院去当老师，后又考上了岩石专业邓晋福老师的研究生。抓5·16运动，“说清楚”运动，清理“三种人”运动，都没有他的事。

关于串联创立三司的事，他没有提及是否给他带来了麻烦，但我却从另外的渠道获得了他为串联成立三司自投罗网挨整的一件趣事。1980年前后，冶金部天津地质调查所有两个外调人员来到湖北我所工作的地质队，外调一个从我们队上调入他们所的中层干部的事，在与我谈完正事闲聊时，他们问我是否认识周永璋，我说当然认识。他们说周永璋读研毕业后为照顾夫妻关系也分到他们所里。这是毕业十年后我第一次得知周的去向。他们对我说，周永璋这个人吃亏就在他那张嘴上，他口无遮拦的秉性不改，胡侃乱吹文革初期在学校参加东方红、成立三司那些陈年旧事，说自己是东方红的领导人之一，又是串联成立三司的发起者，又是和周总理、周荣鑫、吴德等领导在一起如何商讨成立三司的具体事宜，吹得天花乱坠。我对他们说，周永璋确实是地质东方红的早期骨干成员，串联成立

三司他确实功不可没。他并不都是吹牛皮。来人对我说：现在的政治形势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人们视造反派、红卫兵、首都三司为洪水猛兽，妖魔鬼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把那段历史作为自己的光荣加以炫耀，这不是缺心眼吗？这不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这就是这位老兄的可爱之处。本来这单位并不了解他文革中的表现，他的自我表白反而给那些以整人为职业的政工干部们找到了新的目标，单位又组成专案组跑到地院外调了一通，把他折腾一番，回来后除了落实了他三司那些破事，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而不了了之。本来具有研究生学历，又是名校的研究生，在单位也没得到重用，分配他去搞资料情报工作，业务上也没机会上进。来人倒对他没有恶意，只是和我闲扯，感到惋惜。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位老兄啼笑皆非的天真率性。

### 如此“总司令部”

关于三司的话题，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由此也可见当时群众组织“乌合之众”的真相之一斑。

三司作为所谓“总司令部”，是徒有虚名，它对“下属”的组成院校红卫兵组织并没有指挥权，人事上也没有任免权，取得了三司身份证件的各院校红卫兵也没有义务向三司负责什么承担什么。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就是一个以地质东方红为主要力量组成的对外联络站。它的成员，组织机构，三司都不知道，主要人员是我们东方红红卫兵，只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三司空白介绍信便于开展工作，他们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们的主要成员，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我院学生江涛，什么时候加入的东方红，我们都不知道，在校时我们核心组就没有人认识他，但在上海，他是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马天水等人十分崇敬的首都三司代表，上海文革运动许多重要事件都有三司的功劳。据说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有一个提案是让江涛参加三结合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把他永远留在上海。后来听说张春桥等上层领导发话，不能开这个口子，北京红卫兵运动结束后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

三司西南联络站，也和上海联络站的情况相似，也是由地质东方红为主，对推动西南主要是四川的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句话，三司是一个群众运动中大轰大嗡的产物，它充其量是个各大专院校造反派之间松散的联合体，按周永璋的说法，只是个联络机构。但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三司成了一面革命造反的大旗。在那个革命造反光荣、时髦的时期，人人都想高举这面大旗去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也有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拉这面

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去吓唬别人。

三司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领导班子，没有什么总指挥、司令、副司令、组织部长、政治委员等称谓。它的主要组成院校的头头们像朱成昭、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等人也从来没在一起议论过谁是几把手，如何排座次等等。坊间传的所谓蒯司令、朱司令、田代司令等等不过是玩笑话，调侃之词，甚至是不怀好意的嘲讽之语。现在网上有人吹嘘自己是三司几把手云云，我听后觉得是在说疯话。实际上，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谁也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司，那只是一面大旗，一块招牌，一个橡皮图章。朱成昭也只是在三司成立初期走马观花地去晃了两下，以后再也没去过。只是委托我常驻三司，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比较起来，我印象中，蒯大富到三司的次数还多些，但他自从去上海等地串联后，也就再也没来过三司了，而是像朱成昭一样派了一个自己的铁杆常驻三司处理日常事务，此人名叫张云辉，清华一年级数理系学生，他骑一个摩托车来往于学校和三司之间，他和我处得很好，有一次我还邀他一起到西郊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军队档案室事件，就是他骑摩托带我一同去的。而且，在我印象中，老蒯很少和朱成昭单独在一起议事，在老蒯还没解放以前来地院求援避难时在一起多些，清华井冈山成立后没见过老蒯来和朱单独议事。我印象中，老蒯这人有点怵朱头，他在下面对我说过朱这人有点冷峻，不太好接近。两人性格完全不同，蒯外向，爱出风头，朱内向，有点给人不好打交道的样子。他俩在一起时，蒯像个小学生，看着朱的脸色说话。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头头的刘诗昆和他老婆、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头头叶向真大闹三司的事件。那天我不在，事后是工作人员向我反映的。说是刘诗昆、叶向真等人带着十来个人来三司闹事，到处刷攻击三司的大标语，并散发传单。我回来后看到三司办公室内外一片狼藉，标语大字报满世界都是，内容是要“踏平三司”，“三司是反革命黑五类的避风港、保护伞”等等。奇怪的是，过了不久，叶向真又换了一幅面孔，要求批准她的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三司成员。我们当然没有批准。

### “口号事件”后的周恩来接见与三司大印被抢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发生了所谓“口号事件”。按当时的说法（造反派的大事记记载），认为是陶铸与熊复一起炮制印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将原发的“标语口号”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删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被三司有人发现后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了新的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新口号。

“口号事件”那次接见红卫兵过后，以地院为首的一些高校七千多师生员工举行了示威游行，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了大家。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晚被接见的有地院、北航、政法、石油、矿院、农机、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高校师生员工，没有清华。周恩来讲话中表示感谢红卫兵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并为自己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的官僚主义向大家道歉。

当晚我也在主席台上，印象最深的是会前红卫兵和总理卫队发生了小磨擦，卫士长为保总理安全，要红卫兵队伍退后，和主席台隔开一定距离，可大伙都想要离总理近些，尽量往前挤，这样就引起冲突，干扰了总理讲话。卫士长很坚持职责，要担保总理安全。双方僵持不下时，朱成昭向总理报告后，向台下大声说：请解放军相信红卫兵，请解放军后撤，由我们红卫兵负责总理安全，大家说好不好？台下齐声高呼：“好！”这时总理过来亲自让卫士们后撤，大会才继续进行。

据蔡新平讲，周永璋去世后他去天津，王秀云把周永璋在中组部审查他时写的一份自述材料的复印件给了蔡，估计是周永璋上交前自己复印留底的。关于他如何离开三司的内容中写到了“口号事件”。他说，“口号事件”过后没两天，朱成昭就把他从三司开除了。

此后三司大乱，发生了基层组织来抢大印的事。

这件事由政法学院的学生刘富元所为。政法学院造反派头头陈荣金是最早到我院串联的少数派，是和东方红最铁的战友之一，他成立了政法公社，是三司的骨干成员。这位刘富元是陈荣金的反对派，他也可能把对陈荣金的嫉恨转嫁到三司头上了（另一种说法是他对周永璋被三司开除不满）。有一天他带了几位同伙对三司搞突然袭击，把三司大印抢走了。

我回去把这事急报朱成昭，当晚朱和我、老蒋带上我院一二百人跑到政法学院去讨要，在他们礼堂和刘富元激烈辩论，但并没发生武斗。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是谢富治批准又重新刻了一套印章。但后来不知怎么刘富元又成了朱头的座上宾，常来找朱。

2011年我到北京老蔡家去，蔡夫人牛彩茹很神秘地给我看一件她收藏的宝贝，她退休前在地大任老干处长，她说有一次在储藏室清理废品时偶然发现了当年三司的钢印。她用力搬出来，我们几位老同学仔细观看，感慨万千，并感谢小牛的细心周全。这大钢印做工非常考究，还带一个杠杆压把，是发证件时才用的。这将来应该是文物级别了。被抢走的那个三司大印是橡皮或木刻的印章。

### 三司发展成员单位的一个原则

三司在发展成员单位时有几个原则，一是必须是校址在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不管是中央直属的院校还是北京地方院校；第二必须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不吸收；第三是只发展学生组织，不面向社会，科研单位、工厂企业的不吸收。

这一条后来也有了一些变通，那时北京不少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式也和大专院校相类似，也由上级单位指派了工作组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有名的艺术家，像中央歌舞剧院的陈爱莲，中国歌舞剧院的郭兰英、王昆等人，这些文艺院团都受到了工作队的打击，后来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这些院团的少数派也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他们也想打首都三司这面大旗，他们的头头纷纷来到三司，找我和其他核心组成员，这些文艺界人士嘴皮子功夫很厉害，每天来回找你死缠滥磨，后来我们几个研究了一下，我们也非常需要文艺宣传队伍来造舆论，便要求他们各自组织三司名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又都在北京，便于我们管理、联系，于是就网开一面，破格吸收了几个文艺院团的造反派组织为三司成员，记得有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全总文工团、煤矿文工团、铁路文工团等院团。后来这些院团打着三司的旗号组织了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的确起了不少作用。后来北京人艺的蔡安安，全总文工团的曹乃介等人还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

三司的组成员，绝大多数在筹备阶段就固定下来了，北京那时共有五十二所大专院校，只有极少数院校漏掉了，是三司成立后补充进来的，都是些规模较小的院校，像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外地的院校我们一个也没发展。但确有一些外地文艺单位通过他们在京文艺院团的同学、同事关系介绍来找我们要求参加三司，印象最深的是长春的两个文艺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吉林人民艺术剧院。长影厂的造反派组织来找我的是曾在电影《鸡毛信》中饰演海娃的蔡元元，是蔡安安的同胞弟弟；吉林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组织头头名叫李启明，是个帅哥，后来在《刑场上的婚礼》中饰演过周文雍烈士，他是蔡安安的中戏校友。他们知道我和蔡安安是好朋友，都打着安安的旗号来找我要求参加三司，那更是好话说尽，功夫下完，但是我们始终不答应吸收他们，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口子一开，凭着三司当时的名气，那将是一发不可收，一个北京市的学生组织岂不演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岂不成变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大杂烩组织？这样一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始终不松口。最后为了不使他们太失望太伤心，达成妥协，我们给每一个来人发了一个盖有三司大印的红袖章，才算把这些人打发走，他们对这个结果也还算满意。

## 印象较深的一次接见会

我在三司期间，全国各地运动发展不平衡，太多的省市造反派还在受压，有不少外省市的受压派跑来北京上访，寻找支持，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每天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中央首长接见外地来访者的接见会频繁召开，而每一次这样的接见总要给三司发入场券，我参加了多少次这样的接见，已经记不清楚了。

印象较深的第一次是在 1966 年的 12 月中旬，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三司，办公室给我一张人民大会堂入场券，告诉我中央首长接见。我拿着入场券，背着小背包从文化宫南大门斜穿天安门广场来到大会堂东门，门卫验过入场券会场位置后，我大步向西走去，正好看见周总理迎面由西向东走来，我忙上前向总理问好，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问我这是来开会的吧？我说是，他说跟我一起走。我随总理向前转弯来到在会堂东南角的一个小型临时会议厅。会议还没开始，但人已到齐，可能是在等总理吧。

总理坐下后，江青宣布开会。这是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东西长，南北短。首长们面北坐在南边，群众南坐在北面。首长到得很齐，除周总理外，康生、江青、陈伯达和王、关、戚都来了。群众席上有首都各高校的少数派头头。我们地院朱头和老蒋也都到会，我和聂树人是作为三司代表到会。还有一些外地来京上访的学生受压派，印象比较深的有西安交大的头头李世英，这个人当时很有名。

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这次首长接见的主要内容好像是了解各校、各地文革运动发展的情况，像学校受打击迫害的人数有多少，有没有成立自己的组织，蒯大富汇报了清华的运动情况，首长们对西安交大的运动很关注，详细询问了交大的两派情况，比如工作组是由哪里派出的，有多少师生受到迫害打击，工作组撤出后运动的情况等等。

### 编者按：

田春林：文革研究学者，1963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1631 班）

#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李颖记录整理

说明：蒋良朴是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 61 级学生（文革开始时已是五年级，即将毕业），文革中组织勘探系造反派学生加入东方红公社，任东方红公社核心组成员，副总指挥（总指挥朱成昭）。后追随朱成昭反中央文革，1967 年 6 月在逃出北京后又被中央文革抓回交地院革委会关押批判。当年 11 月 2 日，与朱成昭、叶向真等一起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后辗转关押于多个监狱，屡遭酷刑。1975 年 5 月释放后又被押送煤矿劳改。1978 年以刑满名义释放。1981 年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始得平反。后回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任教，1993 年“下海”经商。2011 年 2 月 26 日在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交流中心会议室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有 20 多位原地院的老师与老同学参加），老蒋作了长篇发言。以下按他的发言提纲整理。

老朱（朱成昭）离开我们 13 年了，他在走之前三小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1998 年 9 月 25 日晚上 11 点多钟），他说：老蒋，我要走了，我要干的事恐怕干不完了，你们下面接着干吧……

我想，把北地（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史写好也是他的心愿吧！

剩下的，我们对这件事要有紧迫感，我们剩下的这一大批人是文革的当事人、见证者，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宝贵财产，要抓紧时间……

写文革史，我想到的基本原则是：

- 一、真实性：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夸大、不捏造；
- 二、和谐性：不带观点，不评是非，顺着历史走过了来，老朱、老蒋、大宾、老蒯都是历史相处友人，都是朋友……
- 三、我们写的是民间文革史：可以正常发挥……
- 四、要体现历史价值；要经得起世代的考验。

时间跨度要大一些：前文革时期 10 年（学毛着、搞四清……），文革时期 10 年；后文革时间至今又经历了 40 多年。文革中哪些人物有丰富的辛酸苦辣，可以写得很生动，可读性很强……

今天与大家是四十五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想谈下面三个大问题，只能提纲性谈谈，占用了大家时间，谢谢！

## 一、在学校的基本情况

（一）陈伯达（1967 年元月 23 日）倒朱批示前的情况：

1. 紧跟毛的路线，批资反路线，成立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批斗彭罗陆杨……  
1966年我们批斗彭罗陆杨大会时，周总理指示，要保护老干部。  
于光远在《我的文革》中写到，在这场批斗中，地院东方红对我们最好，保护我们，没坐飞机，没打骂。
2. 后来走向反面，元月中在梅建明家开反文革黑会，张九九也参加了，准备向中央文革写大字报；
3. 1967年元月23日陈伯达到地院下达倒朱批示：听说你们要与中央文革斗，我劝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就会掉进茅厕，自作自受……

## （二）陈伯达批示之后的情况

1. 1967年2月初，朱成昭抛出“八大观点”：文革太左；运动群众；打击面过大等等。紧接朱、蒋、杨（杨雨中）发表了五点声明……
2. 1967年2月19日，朱、蒋逃到上海，当日中央文革命令朱返京；
3. 1967年3月6日戚本禹要朱成昭“闭门思过”一个月，以观后效；
4. 5月1日朱、蒋等人去周家花园野餐庆五一（有诗一首——野餐记）；

## 野餐记

喧喧呼喧喧，“花园”去野餐。  
园内有禁令，人家不让干。  
那人态度硬，老蒋舌如簧。  
好歹说成了，各自将活干：  
颜宽偷香椿，“王八”把哨放。  
丽华去鱼鳞，成华把鱼断。  
老蒋砌炉灶，她把蚊子赶。  
妞妞挖野菜，老朱去何方？  
功夫不一会，准备全妥当。  
山谷炊烟起，遍地饭菜香：  
饭盆烧大鱼，香椿炒鸡蛋，  
还有大螃蟹，外加洗锅汤。  
美美开一顿，简至涨断肠，  
留下一大壶，带给华府嚐。  
动身往回走，夕阳下西山。

（六七年国际劳动节我等被林彪“四人帮”剥夺了庆祝“五一”权力，便兴致勃勃到北京周家花园去野餐。后在狱中追记一首。）

5. 5月上旬蒋赴成都（当时武斗正盛），想为上台立新功。

### (三) 关于广州之行：

1. 6月初，朱提出为避免揪斗外出游玩（广州）。由杜金山去筹备，叶向真同往。因无钱只买了两三张票，共有8个人，躲在厕所内逃查票，而传言我们要投敌叛国……

2. 朱一出发，上海、广州警司就行动抓人。6月10日朱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带回北京。但我们一行被送广军疗养院玩了二天，逛了广州从化瀑布，就被送回北京。狱中有追忆诗三首：《登两樵山》（《登两樵山》和良朴——朱成昭 79年2月2日）、《为水帘洞咏歌》、《游泳》。

### 蹬西樵山

朝披彩霞蹬西樵，  
脚踩云梯步步高。  
“飞流千尺”送美酒，  
天山拂帘兴有摇。  
枯石横桥深万丈，  
窟窿壁现阴水凉。  
穿梭云云知实际，  
何食力壮未正阳？

### 蹬西樵山 和良朴 79.2.22 于成丰

旭日伐薪攀西樵，  
本义少年越台高。  
赤练七紫盘我舞，  
北海蛟波力更摇。  
秃云骄横绝一世，  
烈火铁窗荫吾凉。  
海鸥串创风雨过，  
扶桑木顶是正阳。

——朱成昭

### 游 泳

——六七年七月游从化瀑布之一

噗噗绯落吟示娇，

幽巡翠晰狰容儿。  
漫舞失溅情舒暖，  
仙歌盈盈屏影俏。

## 为水帘洞咏歌

——一九六七年七月游从化瀑布之二

十万八千身一跃，  
万山红遍花果摇。  
天然一个水帘洞，  
试问天公何处找！

(四) 1967年8月朱在政协附近华嘉胡同8号度过一段时间。

(五) 1967年8月下旬我到上海避难：

- 途经济南，去找我大嫂，她帮我洗衣服，给路费，带我去游趵突泉，后狱中有追忆诗一首《趵突泉记》，反映逃亡生活。

## 趵突泉记

泉上浮石床，  
和风入梦乡。  
酷阳斜楼影，  
醒来赶路忙。

(一九六七年八月赴上海途经济南)

- 与朱成昭欲赴黄山游玩，途经杭州，求友不济，后回上海。在狱中有追忆一首《黄山行》。

## 黄山行

(六七年十月去黄山途至杭州求友不济而返沪)

夜宿西湖畔，  
朝乘西湖船。  
午食“灵隐”面，  
“鱼府”绿茶香。  
别了“黄龙洞”，

扁豆充饥肠。  
再去告亲友，  
归来住通舱。  
断行黄山路，  
回沪夜茫茫。

3. 1967年10月12日由上海返京，被学校关押写材料，住原周守成（原地院副院长，文革被搬出此房）家。

4. 1967年11月2日被公安部正式拘留，送北京第二监狱。

## 二、在狱中的基本情况

(一) 1967年11月2日——1969年1月29日被关在北京第二监狱(功德林)。

1. 身体摧残：伙食费每月5元，开水漂白菜，每天两餐，两个窝窝头。12月10日才在走廊上有一个火炉，狱内马桶结冰，披着被子坐着睡。

2. 精神摧残：剃光头，放风（与朱有暗号），24小时不定提审，脸上标“枪毙”等等；

3. 放风与朱暗号联系。

(二) 1969年1月29日转北京第一监狱（大观园边上）

1. 大约5月份开始有几个月伙食大改善，一天4个鸡蛋，大勺打肉一大盆。

2. 1970年春节后，我用马桶砸看守（上厕刚蹲下，就要我起来），被反铐（吃饭不便），后改成前铐一年整，不洗澡，后来解开后衣服腐烂了，一条腿一碗泥。

3. 被打的第二天，我绝水7天，绝食9天。我会唱京剧（花旦）《满江红》，唱了上句便会唱下句，看守都来听。

4. 一个神秘的夜晚，雷电大作，打破了窗玻璃：

——有人向我说话：你认为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是你在给我打电话。

——那为什么没电话你能收到我的话？

——我想了许久，“是因为你的思维控制了我的思维”

从这天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分析了文革的斗争形势，认为康生是中央文革一派的总头目。

——重新设计了万吨水压机

——为家乡设计了引水渠，引河水浇田（1980年回乡果真有其事）。

——论述了“石油成因”、“思维本质”、“生命本质”、“无穷大”以及一些哲学问题。

(三) 1971年12月9日转秦城监狱

1. 蒙头专车送北京郊区山地秦城监狱;
2. 房子大了，伙食也好一些;
3. 1974年初，伙食大改善，另转大房间，肚子小了，吃不下了!
4. 1975年5月放了，回武汉地质学院。

叶向真只坐了4年，总理保她，就出去了。

#### (四) 从秦城放回到武汉地质学院

1. 享受战犯待遇，出狱有一套新制服，我没穿！
2. 回武汉地质学院（武汉航空路地质学校）有专人专房看管。
3. 几天后，高院长（原地院校长高元贵）找我谈话：你有问题未定案，安心等待……
4. 6月上旬王焕（原地院书记）找我谈话：准备送你去农场劳动。我不拒绝……  
(此时朱成昭、张华府、颜宽均已送农场劳动。)
5. 6月上旬，中央二办林克等赴武汉宣判：不认罪，发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3年。我拒签字，被打，喊口号……

### 三、在劳改农场的基本情况

1. 1975年7月12日，专车送到湖北襄北农场劳动改造（煤矿）；
2. 管教指导员张明千说：你是中央送来政治犯，坐了八年牢。身体不好，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坐在旁边休息。
3. 所以狱友很尊重我，没让我为难。
4. 上完一个班下来，只见两只眼睛，衣服是代代相传……
5. 饭量惊人，一个月吃粮食89斤（狱友可送定量）；
6. 因为人正直，被大家选为班长（人人服啊）；
7. 力大无比：2×2×1见方大石头，几锤就砸开；
8.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绝食三天，写了《卜算子》，被批斗；

### 花儿心

#### 卜算子

雪压洒冬阳，  
喝令寒流碾。  
腊年又复三尺冻，  
晶莹花蕾放。  
花俏坠绝崖，  
却知春必到。

怒放横扫山间残，  
江山百花娇。  
(七六年春节于襄北农场)

9. 1978年5月10日刑满回校：存钱买了一套新衣服，余现金二百多元。

#### 四、刑满回校

1. (学校)有关人士说：你是反革命，早被开除了，不能收留。
2. 地院招待所范老师(原东方红的)收我住下。
3. 唐咸正、邵洁莲老师热情接待。
4. 朱成昭母亲来武汉，找到陈丕显(与朱父亲是战友关系)，送材料，陈命省组织部叫朱(成昭)、张(华府)、颜(宽)等回学校。
5. 胡耀邦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过问此事。
6. 学校由陈安民、任继承组成审查小组平反。陈告诉我：你们这个案难翻过来，是中央定的，当时五个政治局委员都签了字(包括总理)，你和朱成昭是内判了死刑的。
7. 当时胡耀邦将我们与张志新列为全国两大典型案，欲加以宣传，被叶帅勾销。佳运擦肩而过……
8. 考虑到工作与生活，当时我边搞平反边到教研室听课，专业底子(原是五年级学生)还可以，捡起来很快。1981年一平反，我就可以上课(教学)。
9. 1981年—1986年当老师讲课，1986年—1992年到出版社，后任副总编辑；
10. 我姐、兄、母的态度
11. 1993年初下海经商——搞图书出版、销售(略)。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6年7月30日《昨天》第73期上)

蒋良朴写的其余的诗附下：

#### 悼友人

今惜不幸失金山，  
悲泪滴滴入心肠。  
哀歌一曲从天降，  
青山忠骨万年长。

## 斗浪

长江浊浪翻，  
入水斗巨澜。  
惊涛何所惧？  
年少斗志昂。

(作于六七年九月上海，成华友改为五绝)

## 杨柳颂（故乡）

玉屏如故泣下山，  
红宅石马臂无断。  
一江古酒悬何令？  
数究风光建崎传。

## 回衡阳（游岳屏学桥）

一峰栩栩，  
如白玉带直下。  
楼阁装伴桥连两似锦。  
送走千年沉睡，  
筹建万世一新。

## 为母亲祝寿

母在七旬人不衰，  
离别十年多寒载。  
若是赤童归阳柳，  
人间悲欢苍柏哀。  
荒山扑扑慈母泪，  
山竹抽泣小群才。  
一改江山除旧岁，  
周天同尽幸福孩。

(作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襄北农场)

## 寄北京

### 水调歌头

十岁越往事，  
水花击浪荡。  
一隔三千临此，  
心聆歌满汉。  
仍是神奕如故，  
不谓漫山初茅，  
早已破层障。  
听得黄洋炮，  
犹如在身旁。

忽又翻，  
大江怒，  
妙其间？  
三十八年过去，  
未尝人间欢。  
劲臂划破万里，  
游来新生百代，  
鼻唧当沉浮，  
长江东奔去，  
莫识水性惭。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于襄北农场)

## 怀念毛主席

### 满江红

茫茫苍天，  
劈下惊雷飞石落。  
丁当响，  
碎片如匕，  
铁镣闪烁。  
狂飙着神情鬼动，  
纪元七十雪花多。  
正风华，  
击水战中流，  
忆北国。

东风舞，  
拂寥廓；  
乌云滚，  
天慾坠。  
囚人面下泣，  
汇入泪河。  
东边筑起千古厦，  
我伴世人有评说。  
见高阳悬宇环球转，  
通天乐！

(七七年九月九日于襄北)

编者按：

蒋良朴 文革研究学者，1961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

# 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李 颖

我是 1961 年从上海考进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地球物理勘探系），即 61611 班。1965 年 9 月刚升到五年级的我们，学校规定砍掉了几门功课，停课参加了地质部系统的四清运动。在学校集训一段时间，学习了 23 条，听取前一批四清单位的经验，然后分配到各省地质局。我们班分到湖南省地质局下属的 402 地质队（在浏阳永和）搞四清，我被分在 402 队地质科。

1966 年 4 月，四清工作结束，我们回到学校，准备马上要投入毕业实习。此时，由于我在四清运动中表现好，努力改造思想。4 月 26 日班上团支部通过讨论，批准我加入共青团！由于我爸是“右派分子”，我努力了 8 年，才终于加入了共青团。

1966 年“五一”刚过，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起分到湖北大冶的冶金部物探队进行毕业实习。

在野外，6 月 1 日我们听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广播。当时大家学习议论了一下，但是野外生产照常进行。可是中旬，分队接到上级通知，暂时停产。于是，我们从野外分队收队回到黄石市的大队部，等待何时再恢复生产。几天后，老师通知我们回学校。于是我们几个人于 1966 年 6 月 21 日回到学校。

## 我被工作队划定为第三类人

6 月 21 日回到学校，看到大马路的两边树林都钉上芦席，上面铺天盖地的贴上了大字报，有质问工作队为什么“舍高保聂”，还有什么“6.20 事件”的等等好多内容，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们到班上集合，有留校的同学介绍了“620 事件”的前后。我们还见到了我们班的工作队员老张（是山西省物探队的分队长），对我们回校参加运动表示欢迎。我们通过学习，看大字报后，大家表示：我们也应该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

于是，大家让我执笔写大字报，几位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的，没有草稿，直接成文。记得当时有钱满银（我班团支部委员，现已去世）、方长乐、李速成、

孟润西等十来个人。题目是：“我们的严正声明”，一共五、六条：先是表示要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质问工作队“舍高保聂”（高是院长高元贵，我们都尊敬他，聂是书记聂克）定框框，追问有什么阴谋等等。总之，大字报的调子不是很高，因为是五年级学生，思想都是较稳健。在大字报写最后落款时，我问：怎么落款？方长乐提议，叫 61611（我们的班号）打狗队吧！（已有其他的大字报已用打狗队的名称）我们都说，好！于是我写了这落款，马上就有几个男同学拿出去贴了。这张大字报，当时在地院是不起眼的，没想到被工作队记住了。

这以后几天，我就看看大字报，与有些同学讨论，没有再写任何其他大字报。

6月25日下午，形势突变，广播了薄一波的批示：“…如果有人非要赶走工作队，就是夺党的权。…”大家称为万吨水压机的批示不停的广播，对工作队的质疑的声音没了。

第二天，学校宣布要听工作队领导的报告。这时，我班工作队员老张把我叫出去，给我一张小条子，告诉我，你听报告的时间地点在小条上。我当时还很高兴，以为我得到了什么优待。记忆很深，是下午二点，在教工之家听报告。下午我提前到了会场，还没什么人来，等了一会，陆续有人来，我都不认识。作报告的是工作队的书记卞固（他是地质部的干部），报告一开始就恶狠狠的。说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满脑子在想，是否工作队把我搞错了？为什么这都是对右派讲的话。

散会后，我去找工作队员老张，为什么把我划到第三类人。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上面定的。我不知道这是哪个上面？我们年级的？系里的？

第二天，在面对食堂的男生宿舍楼的一面墙上，贴出整版批判我的大字报，甚至把我几年前曾把“早春二月”剧照贴在床头的事也拿出来，说明实在是没什么材料了。在那段时间，我先后收到了大大小小 10 份大字报。

接着，我们班就开始批判我，我们班与我一同挨批判的还有侯瑞祺。我表示，也不能回来三天就当反革命，我想不通。侯瑞祺表示，我们出发点是好的，给工作队提意见。可是批判我们的人说，动机与效果应是统一的，既然效果是反工作队，那么动机也有问题等等。我们班当时有十人左右曾在那张大字报上签过名，全班一共 28 人，所以在我们班的势力不是很极左，开过二三次会，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在工作队掌权时，我毕竟是划定为第三类人，记录在案，我很迷茫，不知

最终对我怎么处理？是否作为右派学生，能否分配，谁也不知道？马上要毕业了，前途在哪里？

这段时间，我进入了人生的低潮，不知出路是什么？我们年级二十多女同学绝大部分不理我，我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而只有王同学同情我，关心我，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

### 我第一次见朱成昭

7月底，一天晚饭后，北大的学生来我校煽风。就在女生宿舍楼下叫：地质学院的同学们，你们要觉醒起来，工作队犯了错误。……我们听到声音，下楼，许多同学围着北大的同学，他们在讲，他们学校的工作队犯错误了……。这时，学校马上有人把北大学生连拉带推，推出校门，而且宣布，不准外校人来地院，也不让地院人外出串联。但我们一直在思考，是我们错了？还是工作队是错了？

7月底，“爆破战斗队”朱成昭贴出大字报，指出地院工作队犯错误。这时大家都在思考，寻找正确的答案。

为了找出真正的答案，8月初一天上午，我与我班的女同学张某某决定到北大找聂元梓，去咨询她，地院工作队是否也是犯错误了。

在北大找到聂元梓办公室，就孙蓬一在，他说，聂出去了，不在。我们说等她。于是我们从上午等中午他们下班，不见聂来，我们只能在楼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等，等了下午，孙蓬一来上班还说聂没回来。这样我们几乎等了一天也没等到聂元梓，从此，我对孙蓬一印象坏极了，就是在耍我们。4日晚上，听说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到清华了，我与张同学赶到清华大学，在大操场边的小树林里，听到了周总理给蒯大富平反的报告，我边听边记录，回来后马上把周总理的讲话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我们知道中央不是毛主席派的工作队。

8月8日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战斗队贴出了成立宣言。校内各种观点纷纷亮相。当然他们是极少数，我与我们年级的王同学，认为朱成昭的观点很对。在我被孤立时，王同学一直在关心我、陪同我，我们也经常一起讨论观点，而且我们俩的观点也一致。对于我们五年级的学生来说，又刚挨了工作队整，所以我们在思想与行动上都是很慎重的。

8月13日午饭后，我回到宿舍，竟然我们年级女生宿舍空无一人，我等了好

一会，仍不见有人回来，我很奇怪，他们背着我又在干什么？我到校园去看。看到大马路上停着载满工作队员排着长长的十几辆大卡车，原来是工作队要撤走了，此消息是封锁的。拥护工作队的人，都在敲锣打鼓地欢送工作队撤离地院。而东方红战斗队组织了一系列动作，在大门口放鞭炮，大叫送瘟神，在地上与汽车上刷标语，都是什么滚蛋之类的。吓得工作队的车队，本应开出东大门向南开，看到南面路边有东方红的人放鞭炮，马上倒转车头，向北开出去了。这就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工作队害怕而“南辕北辙”的故事。

13日下午，工作队撤走后，我与王同学决定去找朱成昭聊聊，如果认为与他的观点一致，就报名加入东方红战斗队。因为当时东方红战斗队，都是外系的人，我们不认识，也不太了解。我们到了教四楼101阶梯大教室，看见认识的万慧祥，告诉她，我们要找朱成昭。她看了一下，指了一下，朱在某一排位置上。我们过去先自我介绍某系某年级的。然后说，我们支持你的观点，但是对今天撤工作队的事，有些意见，我们认为应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还没说完，朱成昭跳起来说，我们做的没什么不对的，我们还做得不够...。谈话无法进行，于是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认为，作为头头，太狂妄了，这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水平不够。这就是第一次与朱成昭见面。

后来，因为大家的观点一致，我们都通过本系，参加了东方红公社。

## 二进地质部的点滴

我们作为东方红的普通成员，参加了一进至四进地质部。其中二进地质部持续时间最长，我把经历的二进地质部的一些事写出来。

### ◆ 西纠围困

9月5日午饭后，通知在操场集合，然后有近一千人，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地院出发，步行经过学院路、平安里最后进入西四的地质部大院。在大楼前的广场上席地而坐。总部安排：女同学坐在中间，出身不好的坐在中间，而出身红五类、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坐在外围。行动由蒋良朴指挥，他代表东方红要求邹家尤出来做检查。而何长工来说邹家尤不在部里。正在双方僵持时，一会“西纠”来到地质部，把我们围起来，与外围的同学发生冲突，有同学被打伤，衣服撕破。我们派代表去找邹家尤，西纠守着大楼不让我们的人上楼，于是又

发生了冲突。双方一直持续了一晚上。地院东方红是第一个进入政府机关去闹革命的，中央文革与国务院都知道事态的发展。第三天，突然西纠接到命令就撤离了地质部

#### ◆ 东方红总部出现“叛徒”、“托派”——地质部偷偷安装窃听器：

我们进入地质部后，一天下午出现大暴雨，我们只能躲在楼边的屋檐下，可是人多，不少人都淋湿了。那是北京的夏天，下午一阵大雨是常见的。第二天下午，暴雨如期而至，这时，部里的一个干部，拿了钥匙，打开了广场东边的礼堂门，说让大家可以进去躲雨。大家很高兴，不知怎么有人发善心，让我们有地方待。当时的礼堂十分简陋，就是一间平房。可是这成为了我们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基地啊！在礼堂里面，还有一间小房间，这就成为头头们讨论事情之用。

几天后，总部召集各年级负责人紧急会议，我们年级头不在，就让我代表参加会议。负责人会议在该礼堂开的，朱成昭说，我们核心组出现“叛徒”、“托派”，核心组讨论的事，包括我们的战略部署，第二天地质部的人就知道，一定有人出卖了信息，要求发动大家找出叛徒。开完这会，我把这事很放在心上，绕着礼堂外墙走一圈，看看小房子根本没有窗，不可能有人偷听。我当时又把核心组7-8人排了一下，认为不可能有人是卧底，或是当叛徒。但是核心组的裂痕从此开始。由于在地质部撤与不撤的问题上，朱与蔡新平观点不同。回学校后，朱成昭就把蔡新平那些人叫做托派。从此，东方红内部的朱派和蔡派就产生了……。

1973年底，我丈夫老张在部里参加科研项目，我探亲假就到北京，在部里住了几天。我见到熟人陈薇西，她叫我一同到她丈夫蔡某办公室坐坐，蔡某当时在部里政治部负责宣传，于是我们一起在蔡某办公室聊天。后出来见到老朋友李承达，他劝告我，不要与蔡某来往，那人人品很次。当年地院东方红在部里的礼堂里，是他去安装窃听器，偷听了你们东方红的消息！啊，7年前秘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部里知道这事的人还有，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包括朱成昭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他！

#### ◆ 肖力就是李讷

9月15日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朱成昭上了天安门，见到了肖力，

下午回来，马上在部礼堂召开全体会议。朱成昭向大家报告了最激动人心的消息。他说，他在天安门城楼见到肖力，站在毛主席身旁，原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肖力，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我们通天了！大家群情激奋。本来在地质部已经十天，大家都非常疲乏，这个消息，又使大家激动不已。有当时的照片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 ◆ 绝食——看见朱成昭在吃饭

在地质部待了近十天后，学校食堂的工人不支持我们去地质部，于是工人罢工，不给我们送饭。这样，就开始了绝食斗争。实际上是被迫没有饭吃而抗议。第二天，我与王同学认为没必要绝食，还是要少吃点，维持生命与体力。于是我们到地质部门外的小吃店，买点烧饼。这时，看见朱成昭在里面吃饭，于是我们对他笑一笑，就离开了。当时我们对这事有点看法，就是策略上就不该叫绝食，而是人家不给我们饭吃。事后，他们解释，是肖力来了解情况，他们与肖力一起吃点东西，一边谈话。我们回去没与其他人谈起此事，但是有不少人也看到这件事。

#### ◆ 我们睡在楼道里

我们刚到地质部的前几天，晚上就在广场上过夜。几天后，部里有人支持同情我们，把西楼的门打开，同意我们在西楼一层的楼道里过夜，刚开始，铺点报纸，后来，大家回学校拿了行李，在西楼楼道按系、班分配地方，打了大通铺住下来。在这期间，大家与部里不同观点的人，通过讨论或辩论，让地质部的人了解我们，于是部里有的人开始转为支持我们。

#### ◆ 学校的同学来地质部支持我们

在校有不少同情东方红的人，听说我们绝食了，学校发了大卡车，不少人来看望我们。我们年级也来了好几位，其中还有二位女同学来看望我们。而且来的人，有的当场表示加入东方红，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我们的力量不断在壮大。

在此期间，外地院校也不断有人来地质部支持地院东方红。

还有在我们二进地质部没几天，地质部主楼五层窗外贴出“坚决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的标语，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我们也不断与地质部干部说了工作队整学生之事，地质部的干部也有不少

人开始倾向我们与支持我们。

二进地质部后期，东方红一直处于僵持阶段，后来，朱成昭听了肖力的意见，以要回校过国庆节为由，于9月19日撤出地质部回到了学校。

#### ◆ 斗批改趁机私自查看我们物品

在我们回到宿舍后，发现我的抽屉锁被撬了，箱子的锁也被撬了（还放了其他同学的日记与信件）。这是我们年级“斗批改兵团”的周xx，乘我们不在校，进入我们宿舍，私自撬开锁，私自查看我们的日记与私人信件。据说，她坐在桌上，高声朗读我们的日记。这个同学自以为是红五类，在地院“斗批改兵团”掌握大权时，对不同观点东方红的同学，就能这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撬开私人物品，随意检查私人日记与信件。这足以看到当时东方红受压制时，“斗批改兵团”是怎样对待被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东方红同学的。

### 我进入动态组

1967年1月中旬，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学校。在大马路上碰到我班男同学吕某，他问我在干什么呢，我说没什么事。他让我到他办公室去看看。于是我们到了学九楼二层的动态组办公室。他当时负责动态组。他说由于同学流动性大，人手不够，希望我来动态组帮忙。我说，考虑考虑再说。

没想到，一天后，早上一个男同学到我宿舍找我，让我去动态组办公室。这时因吕同学住在办公室，发高烧，马上要去医院住院。他把事情向我交代一下，就有车送到北医三院住院了。这样，我就临时负责了动态组，以后也成了事实上的副组长。革委会成立后，任命各部门与负责人，于是我就成了任命的副组长。

外人认为动态组很神秘，其实，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两项：代表地院东方红每天出版一期《动态报》（周日停刊）；了解社会上各单位各派文革的动向、每天所发生的大事，以及向总部或中央反映的动向。

出版《动态报》：据说动态组是1966年12月份为了总部及时了解外面情况而成立的。除周日外，每天出版一期，一开始是二版（一个十六开纸），后来内容多了有四版或八版。每天上午是编辑时间，中午油印，下午二点是各单位来取动态报或交换的时间。对校内发放的动态报是放在各班邮箱中，外单位要想得到地院《动态报》，需要经过我们批准后，发一个领取的卡片，外地的单位，我们负责邮

寄。刚开始，每期印 200-300 份，后来外单位不断来要求申领，于是最多每期达到 800 份及上千份，一方面时油印技术提高，后来刻二张蜡板。初期，编辑、刻蜡板工作是学生做，后来由于人员流动性太大，请了老师来帮忙。老师们管编辑、发放、收寄等工作，认真负责。每期《动态报》油印前，需要组长签字过目的。

在 1967 年 1-2 月份，朱成昭处于不管事的状态，王大宾在住院，群龙无首之时，地院的《动态报》与《东方红报》按期出版，这表明地院还是在运转中。

为了及时了解文革的动向，动态组相应成立：文艺组、中学组、军内组等负责联系各单位有关造反派。后来只有军内组坚持了一段时间，主要与各军事院校建立良好关系。其他组有的存在几天就都不存在了。

在革委会成立后，公布了组织架构。把动态组划归作战部领导。事实上，我们说，先有动态组，后有作战部，他们有自己的队伍。他们在学九楼四层的东头，我们在学九楼四层的西头。总部开会时大家一起参加。我倒是常常去作战部走走，聊聊天。

当时动态组与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刘桂莲（女），她出示的是“红旗”记者证。大约一、二周她来找吕或我，了解情况。

我们与周总理的联络员是王文政，他大约二、三周来一次，有时他要什么材料让我们送至中南海西门。

当时动态组由总部给我们配备了两辆自行车（据说是余秋里给地院十辆自行车其中的），还有就是跑外人员，每月给买一张通用学生月票。所以我们外出都是或是骑车或是坐公汽。

我在动态组待到八月下旬生病住学校医院，出院后就回上海养病十几天。九月份 66 届的毕业班开始分配，后来返校参加毕业分配，我们都在 11-12 月就离开了学校。因为在大专院校中，地院是一派掌权，所以也是最早参与毕业分配的。

## 我知道的民族宫“四八”事件

1967 年 4 月 8 日傍晚，我从外面回到学校，他们告诉我，民族宫打起来了，杨雨忠已经派了队伍去支援了。我就坐公汽去了民族宫，到那里是晚上七点多了。我见到了杨雨忠，了解了情况。地院本来支持民族宫的造反派，他们准备要批判民族宫原来的展览。但是，今天下午，对立派叫来北大的学生，突然袭击，抢走

了展览的资料，藏在隔壁的民委院子里。这样，我院驻民族宫的人员，向总部汇报情况，要求援助。总部增派人员，到了民族宫。我去时，双方的民委院子对峙。我院的人想冲进去，他们的人在防守着。僵持几个小时，中央文革得到消息，晚上大约十二点派了一位办公室人员来，召集双方头头开会，杨雨忠让我也参加了。双方争吵，最后决定，让北大通知聂元梓来，地院通知王大宾来，要双方头头来解决问题。等到半夜，聂元梓也没来。我就离开，找了一个过道的椅子上睡着了。大约五点钟，天还蒙蒙亮，有我们的人来告诉我，聂元梓一直没来，但北大的人撤走了。我看到我们的人从民委院子里抬出一个高的保险柜（就是带密码的文件柜），后来装车运回地院，放在总部二层办公室。

回地院找人打开了文件柜，就是用黄绸子包着的展览资料。绝不是流传的什么抢机密档案。几天后，由我院驻民族宫的人员，把资料带回民族宫。

4月11日听说地院广播车去北大，遭到北大的围攻与殴打。此事，我没有参与，不知道前因后果。但这以后，地院与北大就开始对立了。

此事发生后没几天，中央文革与谢富治副总理召集了几次地院、北大，还包括清华、北航在内的头头谈话，我也参加过二次。他们希望我们能团结起来。在派性到达登峰造极的时代，怎么可能团结起来。应该说，“天派”“地派”的形成是那时开始的，但是真正叫“天派”“地派”是在更晚的时间

# 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张华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第二至五章，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有关作者与朱成昭等南下广州一行的回忆详见本刊第 100 期作者的《我当逍遙派后的“大串联”故事》。编者对个别地方加了注释。

## 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整个上学期学习的时间没有多少。下学期开学没多久，我们又去周口店实习了。到 5 月份，我们感到政治气氛开始变得火辣辣的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报纸上广播里是天天批海瑞，批三家村，批这个黑帮那个黑帮。接着又出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炮轰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热辣辣的气氛直接而迅速地感染了我们，我们纷纷要求回校闹革命。学校很快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回到学校，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潮之中。

我们这些一年级的新生，对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了解，却在报纸电台的鼓动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紧跟着北京大学的步伐，纷纷成立战斗队，开始了炮轰学校党委的革命行动。我们班的战斗队叫打狗队，是我带头发起的。我和我们班的战友们热血沸腾，几乎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么大干劲。

然而好景不长，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我们这些干革命最起劲的学生，成了挨整的对象。说我们炮轰院党委就是反党，要把我们往右派和反革命的圈子里赶。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时局的变化太快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从革命小将要变成反革命学生了。政治这个东西真是瞬息万变。这是政治给我的当头棒喝，也是政治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召开中央会议，开始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派工作组去学校是“镇压学生运动”。1966 年 7 月 27 日晚上，江青在北京大学发表反工作组讲话。28 日上午，朱成昭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弟弟朱成华即把江青讲话的内容告诉了朱成昭。朱成昭原来打算 28 日就开串联会的。但因为 27 日晚上北京大学的大会因下雨而提前结束，没有开完。定于 28 晚上继续开。朱成昭决定再等一天，等 28 号江青在北大讲完话后再开。28 日晚上，江青一行又来到北大，江青继续

发表了支持学生反工作组的讲话。29日上午，朱成华又把江青28日讲话的内容完完整整地向朱成昭做了通报。

朱成昭本想抓紧时机，在29日下午召集一个小型的串联会。不巧，7月29号下午，朱成昭被学校指定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天，我也作为我们系的代表参加了那个大会。朱成昭不得不又一次把串联会推迟到30号下午。

参加7月29号大会的大学生都是学校指派的，有拥护工作组的，也有反工作组的，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讲了话。承认了前一段时间工作组压制学生是不对的。学校把反工作组的学生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来参加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想借此为这些学生平反，有恢复名誉的意思。在大会要结束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毛泽东突然出现了，他在几个人的簇拥下，径直从主席台的右侧出来，直接走到了台子的中央，向参加大会的学生们招手。台下的学生们纷纷站立起来，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喊声不绝于耳。毛泽东没有讲话，只是在台子中央停留了一会儿，又径直从左侧下去了。毛泽东这次露面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向和他共事多年的战友和同事寒暄一句，连礼貌性的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完全是旁若无人。这些征兆的含义我当时都没有悟出来。

7月30号下午，朱成昭约了我和其他七八个人到北五楼他的宿舍坐谈，这几个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我现在能记起的有程希平、田春林、伏庆是、汤鸣皋、郑文卿、刘长风、杜金山等人。朱成昭向我们转述了7月27、28号江青在北京大学讲话的内容。他告诉我们，中央已经认定工作组是镇压学生的，我们应该尽快成立一个全校性的战斗队，来自己解放自己。当时商定了分头去联系一些前一时期知名的战斗队和个人，约定31日下午在教四楼二楼开座谈会，商议成立全校性的群众组织。

7月31日下午，我们在教四楼开了座谈会，大约有近二十个人参加。我们班有四个人：我、王家传、王奇、卓明德。这一次座谈会，我又认识了一些人，如周永璋、蔡新平、黄瑞华、殷惟侯、万慧祥等。通过热烈的讨论，傍晚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成立以朱成昭为领头人的全校性的战斗队。在商议战斗队的名字时，费了不少时间，很久不能想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名字。后来，我提议，就叫东方红战斗队吧，“东方红”是毛主席的象征，表明我们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这个名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朱成昭开始是委托伏庆是，后来就委托我起草东方红战斗队宣言。

到了晚上1点多钟，我起草好了宣言。朱成昭过目后，表示很满意，要求我尽快张贴出来。我连夜约了我们班的王奇，用他拿手的漂亮的毛笔字，用大字体

整整齐齐地誊写出来。我又委托万慧祥用水彩画画了一幅旭日东升的狭长的刊头。一直忙到凌晨 5 点左右，全部搞好了。我们搬着梯子到学九楼西侧的墙去粘贴。粘贴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学生起床了，纷纷站在那里观看，议论纷纷。很多同学在问吸不吸收他们参加、在哪里报名参加。我说，到教四楼二楼大教室报名，今天上午就开始报名。

此后的三四天里，我一直在教四楼接待来访的同学，解答各种疑问。同学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几天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了几百人。这里，我需要对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时间做一下澄清。不少人认为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时间是 1966 年的 8 月 8 号，根据我的记忆，这是不准确的。8 月 8 号只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后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日期，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核心组的成员及核心组成员的工作分工。这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以后开的第一次会议，并不是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大会，也不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日子。而且，我们成立的组织叫东方红战斗队，并不是东方红战斗大队，并没有那个“大”字。朱成昭是个抓战机非常及时的人，1966 年 7 月 29 号上午，他得知了中央文革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反工作组的讲话，当天下午他就想约人到他的宿舍商议成立全校性群众组织的事。他是要争分夺秒地尽快成立第一个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他绝不会再拖一个星期之久，拖到 8 月 8 号才成立这个组织，他会尽一切努力尽快地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根据我的回忆，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时间应该是在 1966 年 8 月 1 日。7 月 31 日下午开的会，8 月 1 日清晨贴出的东方红宣言。

“东方红”刚刚成立，就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被看作是一股正义的力量，被普遍认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是“东方红”成立还没几天的时候，我还在教四楼接待来访。我们校图书馆的一位女老师匆匆来到教四楼找我（抱歉，我当时没问她的名字），说学校斗批改兵团的人来到图书馆，要破四旧，要烧书，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事情，保护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情况很紧急，老师说斗批改的人现在就在图书馆。我一向对这种打砸烧的简单粗暴浅薄的做法很反感，但当时这种粗野的做法却正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我们“东方红”也刚刚成立，无法正面去阻止。我对那位老师说，社会上现在流行这种无知的做法，“东方红”刚刚成立，正面去阻止有困难。我建议：你们可以先给他们一些准备报废的、破烂不堪的书。如果数量不够，再从那些同一版本数量较多的藏书中拿一些出来，凑几十本书应付他们一下，同时对他们说，图书馆也正在清理封资修的东西，等清理完了，一定再交给他们。先应付应付他们，把他们打发走算了。老师听了我这么一说，就心知肚明了。她笑着说，我知道怎么做了。匆匆赶回了图书馆。后来图书馆交给了斗批改兵团的人几十本挑出来的书。斗批改兵团的人把这些书堆在图书馆前面的空地上烧了，还拍了照片，作为他们破四旧的成果来展示。

## “东方红”早期内部矛盾和我对几个关键人物的看法

提到地质东方红，就不能不说一说朱成昭。我和朱成昭在以前素不相识，到“东方红”成立时才开始共事。朱成昭作为地质东方红的一把手，带领“东方红”，从刚成立时的几百人的队伍，直到“东方红”在地质学院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并且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使地质东方红成为了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完全扭转了战局和形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时的地质东方红领导层人才济济，团结一致，人尽其用，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长处，这是“东方红”初期能够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蔡新平，“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东方红”成立之初，他和朱成昭关系极为密切，朱成昭对他非常信任。他是“东方红”的政治部主任。但从二进地质部开始，“东方红”核心组的两个重要成员朱成昭和蔡新平产生了隔阂，起因源于二进地质部的决策。朱成昭力主二进地质部，蔡新平对二进地质部持保留意见。进入地质部后，遇到不小的阻力，朱成昭主张绝食抗议，蔡新平认为此举过于激进，反对绝食的主张。这本来只是一些斗争策略上的不同意见，很正常。但是朱成昭后来发现，“东方红”核心组做出的所有决策几乎都很快被地质部所掌握，这说明在“东方红”核心组存在着严重的泄密甚至“通敌”的问题。经过摸底，核心组最后认定蔡新平有重大嫌疑。于是决定暂时中止蔡新平参加核心组的会议。朱成昭对蔡新平的态度也从充分相信变成了完全不相信。所以以后核心组开会均不通知蔡新平参加。蔡新平觉得自己受到了排挤，对朱成昭很有意见。

核心组中两个重要人物的矛盾越来越大，蔡新平的一些同情者和支持者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即“蔡派”。他们仍留在“东方红”内，主要是反对朱成昭。他们称支持朱成昭的“东方红”群众为“啃猪蹄的”。在“东方红”内支持朱成昭的是大多数，这些“东方红”群众则把蔡派称作是“喝菜汤的”。这就是朱派和蔡派的由来。

在朱成昭主持工作时期，他对蔡派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既不打压他们，也不开除他们，完全是置之不理，不当回事儿。所以，那时蔡派是挺活跃的。那时和蔡派的矛盾主要存在于“东方红”的主流群众和蔡派的群众之间。朱成昭从未撤过蔡新平的职务，甚至在1966年12月份还想重新起用蔡新平，但因为朱派的群众和核心组其他成员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地质部政治部的干事张金声才对蔡新平透露了“东

“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当时地质部在“东方红”核心组经常开会的那个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东方红”讨论的所有决策他们全都掌握，这才是泄密的根本原因。此事在张运钧和李颖写的地院东方红史中也有记载<sup>27</sup>。地质部当时的当权派利用他们窃听到的信息，有目的地进行挑拨和分化，造成了“东方红”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和。

我不得不承认地质部当权派采用的离间计是成功的，它分化了“东方红”的队伍，分散了“东方红”的战斗力，使一个原来很出色很团结的核心组陷入了分裂和内耗之中。后来当朱成昭作为一个质疑中央文革的先锋人物出现的时候，他原本可能会得到一个有力臂膀的支持，现在不仅没有了这个战友的支持，反而增多了一个举报人，增多了一份举报材料。对于整个“东方红”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挫败。文化大革命确实充满了权谋，我们作为一个群众团体，没有权，又缺乏了智谋，注定是要吃亏的。

周永璋在“东方红”成立初期，为“东方红”是出过不少力的，特别是在筹备三司和三司成立初期在三司主持工作时，都有不俗的表现，这是值得肯定的。周永璋也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我认为周永璋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朱成昭安排他去筹建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不辞辛苦，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各个院校串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筹建工作，为成立三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周永璋具有相当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后来却因为工作安排问题和朱成昭产生分歧，最后和朱成昭分道扬镳，相当可惜。当时朱成昭要派我常驻三司，替换周永璋。我不同意，拒绝了。后来朱成昭把田春林派到了三司取代了周永璋。再后来，在三司的“东方红”常驻代表又换成了聂树人。

朱成昭为什么要把周永璋从三司换下来？这个问题我原来想避开不谈，因为周永璋已经故去，我没有必要再提及这个事了。但是我最近又看到了田春林写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了朱成昭撤换周永璋的原因，是朱担心周的威望会超过他，因而把周换了下来。我认为，这个理由过于牵强，当时朱成昭的威望如日中天，远非周永璋所能比及，况且朱成昭也非小肚鸡肠之人，不可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现在既然田春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有了那样的说法，我就不得不讲出事情的真相。我并没有对周永璋不敬的意思，希望周永璋地下有知，能够原谅我。（下图：周永璋在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发言。）

<sup>27</sup> “二进地质部，……地质部让同学们去院子东面的礼堂避雨。说这个小礼堂可以归东方红使用。在礼堂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朱成昭等头头经常在里面开会，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成昭是激进派，蔡新平是策略派，二人意见常常相左。有一天，总部召集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朱成昭说，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总部八个人开会商定的下一步行动，地质部都知道了。一定有人告密了，要求严查。朱并把矛头对着蔡新平，这也是朱、蔡分歧的开始。若干年后，才知道，当时地质部政工组办公室蔡××伙同张××，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他的当天连夜在小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把东方红的动向知道得一清二楚。”（参看《昨天》95期，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事情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在三司的



成立大会上，当时周永璋代表三司发言。朱成昭看了周永璋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发言的情况。那天应该是9月6号，是我们二进地质部的第二天下午。中午，朱成昭叫上我，说我们去看看三司成立的大会<sup>28</sup>。我跟他一起去了北京体育馆，没有上主席台，而是上了二楼，我们坐在二楼的第一排，整个二楼都没有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楼下的人并不多，没有坐满，还有很多空位。地质东方红来的人很少，主力都在地质部。我们在二楼，这个位置非常好，看主席台看得清清楚楚。那天并没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来出席这个成立大会。周永璋代表三司发言，照着稿子念，在周永璋念稿子发言时，我亲眼看到朱成昭当时简直就看不下去，坐不住了。他认为周永璋形象不行，拿个稿子在念，不仅仅是方言的问题，照着念稿子还结结巴巴，连断句都有问题。简直太丢“东方红”的脸了。他觉得周永璋适合做一些具体的实际工作，不适合做大型活动台面上的工作。他觉得把周永璋放在三司工作会影响地质东方红的形象。所以他才坚持要把周永璋换下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他当时就对我说，要我去三司，把周永璋换下来。我说，这不合适，他为成立三司出过大力。三司刚成立，怎么能把周永璋换下来？我不去。周永璋在大会上讲话确实是不行的，那天的发言连我也看不下去。后来，朱成昭派了田春林去三司，把周永璋换了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朱成昭对田春林是非常信任的。

1966年10月1日前，中央给了地质东方红一张上天安门的请柬，指名要王大宾去。当时王大宾自己都非常吃惊，王大宾表示坚决不去。他对朱成昭说，你

<sup>28</sup>据《首都红卫兵报》记载：三司成立大会是1966年9月6日上午10点开始，周永璋主持，王大宾致开幕词。大会进行中，中央首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刘志坚、郑维山、戚本禹、周荣鑫、杨奇清等来到了会场。聂树人回忆录中记载朱成昭没有参加。按本回忆录表述，实际情况应当是朱成昭没有上主席台，是自己去观看的。（参见聂树人回忆录《“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去你去，你拿着去，怎么能叫我去呢？简直是开玩笑。当时朱成昭很大度地说，叫你去你就去，谁去都是代表的地质东方红，谁去不一样？我9月15号已经上去过了。我们今后就是大家轮流上，不能总是一个人上。这样王大宾才同意去了。我觉得当时中央文革对王大宾也是相当重视的。

## 朱成昭的领袖能力

地质东方红从开始时的几个人壮大到上千人，再到一统地质学院，并不是通过武斗做到的。恰恰相反，在地质学院除了抢广播站那一次稍有肢体接触外，几乎没有发生过武斗。全靠行动决策的正确，是民心所向的结果。事实足以证明朱成昭极具领袖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生领袖。他政治嗅觉极其敏锐，这从朱成华刚刚把江青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反工作组的讲话转告给他，他立即就开始串联人员成立全校性的战斗队就能看出来。他组织能力强，选择行动方向正确而且果断。这是其他几个所谓的学生领袖远远不能及的。

拿蒯大富来说，他的政治嗅觉是十分敏锐的，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一传出来，他就嗅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打倒刘少奇。为了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他不惜采取类似黑社会的手法，把王光美诱骗出来，然后强行进行批斗，以求获取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一方面他是成功的。但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就比较弱了一点，始终组织不起来自己的队伍。蒯大富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得到天地两派共同支持的幸运者，北航的韩爱晶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朱成昭也是大力支持他的。朱成昭曾尽力帮助他，蒯大富在最困难的时候，没地方可去，躲在地质学院，“东方红”保护了他。朱成昭还把地质东方红拉到清华大学，为他壮声势，为他拉队伍。虽然如此，但蒯大富最终也未能在清华“一统天下”。依靠有上通的管道得到指令或暗示，去抓谁，斗谁，打倒谁，那不需要天分，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是白痴都可以做到。但从一个小小的、孤立无援的、挨整的、还没有任何上层支持的、开始只有几个人的群众组织，能够在两个月的时间，把地质学院的整个形势改变过来，并且对北京和全国的运动进程产生重大推动作用，那决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而朱成昭做到了。

朱成昭的另一个长处是政策把控能力强，当时在全国兴起的打砸抢风潮中，地质东方红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没有非法抄家，没有体罚游斗“黑帮”和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也是第一个不问“家庭出身”，人人皆可参加的群众组织。在这方面，北师大的谭厚兰去砸孔庙，破四旧，给全国带了一个极坏的头。

朱成昭的最大特点是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判断能力强，决策能力强，指挥能

力强。我为我曾经有这样一位战友感到自豪。在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核心组中，王大宾有一定的号召能力和工作能力。周永璋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像朱成昭这样具有全面能力的人还没有第二个。

如今，朱成昭已经故去，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过早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但他仍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这是不可否认的。

### 朱成昭被中央文革停职

1967年初我外出串联后回到北京还没两天，应该是1967年2月4号吧，就赶上“东方红”在探工食堂开大会，朱成昭在台上讲话。我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坐在台下听朱成昭做报告。原以为朱成昭会说“东方红”下一步会展开一个什么重大行动，结果不是，是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台下静悄悄的，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没想到，也感到新奇，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到了对打倒老干部的看法，对抓联动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还说现在的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同了，群众运动现在变成中央文革运动群众了。

他还说了几个问题，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感觉他的见解挺独到的，也是挺大胆的。有些问题我觉得说得不错，我也有同感。从台下的群众鸦雀无声来看，应该是台下听众都被触动了，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会后，批判的大字报很快就出来了，说是批判“反动的八大观点”，我这才弄清楚原来会上讲了八个问题。当然，这肯定算是一个重大事件，马上就有人上报给了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没有多久，中央文革就由戚本禹出面，勒令朱成昭“闭门思过”，地质东方红的工作暂由王大宾负责。

朱成昭下台了，这应该是蔡派取得的一次胜利，他们的眼中钉朱成昭被撵下去了。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被扶正，反而同样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说“蔡派也要检查自己的问题”。看来中央文革对蔡派还是有警惕的。毕竟朱成昭是中央文革树起的一面旗帜，中央文革培养一个学生领袖不容易，自己树起来的学生领袖又被自己打倒，怎么说都还是自己的损失。他们对在中间拨弄是非的蔡派不可能有好脸色。蔡派在地质东方红内仍然是一个另类。

我本来这时已经成了个“逍遥派”，还打算出去趁串联之机游玩，但觉得自己的朋友遭难了，在这种时候我出去游山玩水，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告诉在上海等我的王白沙<sup>29</sup>等伙伴们，朱头出事了，在短期内我去不了上海了。

---

<sup>29</sup> 王白沙（1948~1992），女，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二学生，最早参加地院“东方红”的中学生，还曾是“东方红”核心组成员。因是王光美的侄女，在王光美与刘少奇被打倒，她父母受到株连之后，她因家庭遭遇而退出造反运动，但仍在清查“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时遭到地院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关

朱成昭从接到“闭门思过”的通知开始，就把自己关在了西三楼的 327 室，基本上不再外出。除了去小卖部买香烟，他连去食堂吃饭都懒得去，基本上都是打电话叫我去给他送饭。他是我的老战友，现在他有难了，给他送饭我觉得是我应尽的责任。

蒋良朴虽然并没有被停职，但他为了表示对朱成昭的支持，也自我停职，不再到总部去了，而是经常到西三楼和朱成昭待在一起。其他老“东方红”的战友们也不断地去西三楼看望。从 2 月中旬到 3 月上旬这一段时间，老“东方红”们去看望朱成昭的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但从 3 月中旬起，去的人就很少了，大概是看到朱成昭复出无望吧。后一段时间，经常去看朱成昭的，也就是蒋良朴、李尤江、颜宽、王北宁，还有我了。叶向真在那段时间也经常去探望朱成昭。我们在一起时也无所事事，整天也就是谈天说地，山南海北，东拉西扯，自觉地不去谈论政治问题，用闲谈来打发时间罢了。

为了消磨时间，我拿出了我喜欢的新鲜玩具飞镖，他们都没有见过，很稀罕。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没有标靶，我就在门上掷着玩。刚开始时，朱成昭也觉得新鲜，也尝试着投了一会儿，很快他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我始终都兴趣盎然。后来我挑了两三个好的，放在了我中学的同学张延群那里保存了起来，准备回家的时候带给我弟弟玩。

我的好伙伴们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也来看望朱成昭。他们了解了这一事件发生的经过。最有戏剧性的是有一次，王白沙来看朱成昭，很凑巧，那一天叶向真也在，但是王白沙并不认识叶向真，她只看到有一个穿军大衣的女子也在那里，并没有引起她特别的注意。王白沙对朱成昭说，他的八大观点肯定是受了叶向真的影响。朱成昭不承认。王白沙说，不是她对你说的，那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闹矛盾你怎么会知道？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吵架拍桌子把手指骨拍断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句话把朱成昭问住了，无言以对。接着王白沙就把叶向真数落了一通，说朱成昭就是毁在叶向真手里了。

叶向真当时有些狼狈，她不能说她就是叶向真，也不能去制止王白沙，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朱成昭当时也不便说明，他不好说这就是叶向真，你别再说了。所以当时整个局面使朱，叶两人相当尴尬。王白沙是性情耿直坦荡之人，她对朱成昭下台相当惋惜，因而数落起叶向真来毫不客气。这一句一句的，一般人听了肯定受不了。多亏了叶向真修养好，始终不发一声。事后，王白沙知道了那

---

押审查和残酷批斗。释放后曾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名为王征。改革开放后曾去美国留学。1992 年 2 月 11 日不幸病逝，终年仅 44 岁。王白沙在文革中的遭遇可参阅：石白河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hibaihe49>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雪后荡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101z64jc33> 《纪念同窗同桌王白沙》

个被她骂的叶向真原来就是那个穿军大衣的女人，她也并不在意，还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说，我本来就想当面数落她，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她，还正好叫我碰上了。

再后来，王白沙和童隆裴发现了朱成昭与叶向真的关系，认为他生活作风不检点，觉得他不正派，以后就不再去看朱成昭了。这使我比较为难，一边是我过去的战友，现在落魄了，另一边是我的挚友，我的好伙伴。两方面我都不愿意舍弃，我只能两方面维持。

这期间，我还去过王白沙家里几次。每次都是王白沙说她妈妈想见我，要和我说说话。我也很喜欢他们家的气氛，很民主，家长和孩子之间亲密无间，很平等，没有家长的架子。我们家就缺少这种气氛。所以我是有请必到。其中有一次是我带着伏庆是一起去的。但是去大串联的事却迟迟定不下来，我总想等朱头的事情能够告一段落后，我们再去大串联，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

转眼就到了3月底。朱成昭说，闭门思过快结束了，闷了一个多月，哪里也没有去，下个月要出去好好玩一玩，散散心。我们就商量着买4月份的月票。那时候月票很便宜，一张月票只要四块钱。蒋良朴家是湖南农村的，连四块钱也拿不出来，李尤江善解人意，自己掏钱替蒋良朴买了月票。同时买月票的还有我、朱成昭、颜宽和王北宁。

### 朱成昭和中央文革渐行渐远

朱成昭思想的转变，即从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转变为对中央文革有怀疑，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我无从知晓，应该是发生在我上次去大串联的那段时间吧。我不认为这完全是他独自思考的结果，应该是受外部影响和当时形势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回顾起来，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两个，一个原因是叶向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彭德怀事件对他思想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66年12月份，中央文革指示地质东方红去成都抓彭德怀。朱成昭遵照中央文革指示派出地质东方红的小分队去执行这个任务。不料连派了两批人员前去，都被彭德怀感化。被派去的“东方红”战士都认为抓彭德怀是错的，彭德怀是冤枉的。小分队的负责人王大来还专门回到北京向朱成昭反映他们的看法。朱成昭也如实向中央文革反映了地质东方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央文革因为此事对地质东方红非常恼怒，于是戚本禹又改派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朱成昭不得已，又派出第三拨人马，由王大宾和胡乐成去督阵，才完成了任务。朱成昭是个有思想的人，被派去抓彭德怀的小分队前后共有一百多人，从小分队领导到普通的“东方

红”战士，为什么一致认为彭德怀是冤枉的，不应该抓？我认为朱成昭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

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朱成昭不愿意把彭德怀交给北京卫戍区，而是直接把彭德怀接到地质学院了。应该是朱成昭留了个心眼，想弄清这个问题，把彭德怀留着地质学院，彭肯定是安全的，决不会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决不会受皮肉之苦。所以他心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彭德怀交给在北京站等着接人的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他先安排梅建明去弄两辆高级小轿车，小梅就去找何长工和旷伏兆，把他们两个人的小轿车和司机都借来了。朱成昭先把这两辆小轿车开到了丰台车站，利用火车在丰台停靠的机会，把彭德怀提前接下了车，直接把彭德怀带到了地质学院。使在北京站等着接人的李钟奇等了个空<sup>30</sup>。朱成昭把彭德怀安排好住处后，当天夜里，朱成昭彻夜未睡觉，在看彭德怀的万言书和彭德怀随身带的其它一些中央文件。后来，迫于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压力，他才不得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有可能是朱成昭那天夜里看了一些彭德怀带的中央文件，了解了一些真相，他或许也认为彭德怀是被冤枉的。此事对他思想的转变应该也有相当的影响。

朱成昭思想的转变，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从中央文革不得执行的一些政策就可以感受到。中央文革从原来的抓联动，到4月份又改为放联动。从打倒老干部，改变为拉拢大部分老干部。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中央文革暂停承认各地的造反派大夺权，是中央文革改变既定政策的最明显的征兆。

造反派大夺权的浪潮首先从上海开始，上海“一月革命”就是试点，也是号角。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已经拉开了全国造反派大夺权的序幕。当时“一月革命”被评价得那么高，宣传得那么厉害，是什么的？它并不是放个大礼花，让全国人民看看热闹就完了。它是给全国树立的一个样板，是全国都要照着做的。接下来，很快就会是全国性的清一色的造反派大夺权，建立清一色的造反派全国政权。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没有在全国铺开。在山西、青岛和“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再加上从“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复会”之后，中央再没有承认新的夺权。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在2月初，朱成昭公开发布了他的八大观点。而这八大观点明显地是和中央文革唱反调的。这个意外出现的突发事件，打乱了中央文革既定的战略部署。迫使中央文革暂停了预定的全国造反派自下而上大夺权的计划，不得不花出时间和精力来整合和解决造反派内部出现的问题，将一度竭力鼓吹的造反派大夺权改良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

---

<sup>30</sup> 这段回忆与王大宾回忆有较大大差别，按王大宾回忆录，彭德怀的列车到了北京站，李钟奇、朱成昭都到了北京站，发生了纠纷，戚本禹来也没有解决了纠纷。朱成昭不顾总理指示，强行将彭德怀带回地院。

这些情况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中央文革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调整？我个人认为，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朱成昭思想的转变而引发的连锁效应。有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他们会说，朱成昭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错，朱成昭是一名普通学生。不过，不要忘记他当时已经是一名学生领袖了。而他的学生领袖地位正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亲手树立起来的，他已经成了中央文革指挥全国运动方向的旗帜。朱成昭在 12 月份曾经对“东方红”核心组成员说过，要在地质部装 100 部电话，要在全国成立几十个联络站，要指挥全国的运动。一个学校的群众组织头头，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口气，这么大的野心？显然应该是当时他就已经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授意。现在，如果朱成昭继续紧跟中央文革，那么中央文革把这面旗帜指向哪里，全国的运动方向就奔向哪里。中央文革的意图就是要通过这些造反派来实现的。毕竟中央文革手中并没有正规军队，中央文革手中的军队就是红卫兵，就是造反派。这是中央文革运用得最得心应手最听话的军队。但是，现在这个军队的头头朱成昭已经有二心了，已经不听话了，那么中央文革还能依靠谁呢？所以中央文革应该是最不愿意朱成昭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是最希望朱成昭能继续留在中央文革麾下的。这就是为什么在 2 月初，朱成昭闭门思过刚刚结束，中央文革就由江青直接出面，派王大宾给朱成昭做工作，传达中央文革对他的挽留，希望朱成昭能“归队”。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时间，是在 4 月初，4 月 6 号。朱成昭 3 月 31 号“闭门思过”才期满，仅仅几天之后，中央文革就做出这个大动作，表现得很急迫。我认为这是中央文革想尽快地平复这一突发事件，不要影响到他们战略部署的正常进行。第二点，是由江青直接出面来摆平此事，这也极不寻常。当初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的是戚本禹，而现在要朱成昭“归队”的是江青。由这么个重量级的人物出面，足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谁能够否认这不是中国的一把手毛泽东的意思呢？

所以，此时朱成昭的立场，对中央文革既定方针的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希望朱成昭能做个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注意，只是要求做个检查。然后呢？然后就是朱成昭“归队”，“东方红恢复原来的秩序”——这是中央文革的原话。就是说，朱成昭做检查以后，朱成昭就可以复出了，仍然担任地质东方红和三司的一把手，一切照旧。

这是 2014 年我去探访王大宾时，王大宾亲口对我说的。当时王大宾为了有个旁证，特意带上李贵一起去给朱成昭做工作。王大宾给朱成昭说得非常清楚，他对朱成昭说，做个检查就完事了，你总得给中央文革一个台阶下啊！

这是一个看似小事，实际上却是一个能扭转乾坤的关键点。但是，朱成昭拒

绝了。这或许是朱成昭过于耿直，不愿意做违心的检查；或许是朱成昭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新秀，还不太成熟，还没有太多的城府；或许——我不能不提及这一点，是叶向真对他思想的影响太深，他不愿意辜负了叶向真。总之，是朱成昭拒绝做检查，拒绝和中央文革妥协，拒绝再重新回到中央文革的麾下来。

这段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它是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新生势力之间，对红卫兵造反派掌控权的争夺战。这一争夺战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阵营取得胜利而告终。他们成功地把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离间了。历史就这样定格了。

这是一个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事件。可惜，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接下来，中央文革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了。你想想，连中央文革亲手树立起来的旗帜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方针都怀疑了，都和中央文革决裂了。那还会有多少基本群众会死心塌地地继续跟着中央文革干呢？造反派全面夺权走不通了，那么，调整方针是势在必行了。1967年4月下旬，中央文革先是把所有被抓的联动请到人民大会堂，由谢富治承担抓他们的责任。然后宣布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要把联动全部释放。而且，被抓的这一段历史不留档案，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时，不仅被抓的联动热泪盈眶，感激涕零，而且也对一大批高级干部起了安抚作用。中央文革只能放弃原先的全国统一由造反派掌权的第一方案了。退而求其次，先“三结合”吧。

历史给一个人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朱成昭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永远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先是拒绝了中央文革的提议，后来，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味过来，又表示要做检查。但是，晚了。历史就是光阴的流淌，过去了就追不回来了。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8年2月28日《昨天》第107期）

**编者按：**

张华府 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7165班）

# 无罪的囚徒

## ——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

张华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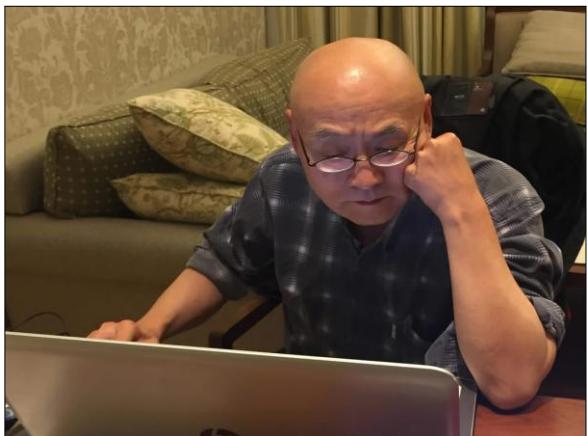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华府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第六至十二章有关他身陷“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冤案的苦难历程（左图为作者近照）。



“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前期由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炮制的首都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一大冤案，由中央专案组办理。冤案受害人以首都高校“造反派的旗帜”——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为主，从一度最受中央文革小组看重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到下边的一些普通大、中学生及有关亲属（好几个家庭是全家被抓），全案牵连上百人，为坐实罪名和追查“后台”，使用了种种法西斯手段进行逼供、诱供

及令人发指的身心摧残。因受害人中有的已经病故，有的因种种原因不愿或不便公开那段痛苦经历，因而此案蒙冤者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可谓“鲜为人知”。感谢张华府含泪忍痛写下了这个回忆录，让今天和今后的读者得以了解到冤案的冰山一角。他在回忆录的前言（劫后感言）中沉痛写道：“如今再提那些往事，把这些记忆再重新翻腾出来，对我的身心是一个巨大的创痛，对我原本的信仰是一个巨大的颠覆，这无疑会使我又经历一次痛苦的洗礼。”但是在原校友的再三邀约下，“同时，我也看到了大批曾经经过那场浩劫的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那段历史，更有少數文革残渣余孽还在美化那段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欺骗和误导现在的年轻人，又觉得有责任把那段经历写出来，让年轻一代了解那个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右图：张华府2017年在北京修改回忆录。）

张华府，1965 年从河南郑州考进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文革爆发时为 71654 班学生。是地院“东方红”发起人之一，东方红战斗队宣言的起草人。他早在 1966



年 10 月即淡出造反运动成为“逍遥派”，但却因“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案身陷冤狱十余年。

有关张华府与朱成昭等南下广州一行（这是被冤案炮制者认定为“叛国外逃”罪行的一个重要由头）的回忆，详见本刊第 100 期张华府《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为帮助读者理解，编者对个别地方略加了注释。

## 六、在学校挨整

### 1. 专案组要我交待问题并揭发朱成昭“罪行”

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小梅（梅建明）先回家了。我直接回了学校。进了宿舍，放下背包。还没有消停一会儿，也就是几十分钟吧，就进来两个年轻的学生，个子都很矮，两个我都不认识。他们径直走到我面前，直接叫了我的名字，接着说，我们是朱成昭专案组<sup>31</sup>的，想找你了解了解情况，跟我们去一下吧。我说好吧，就要跟他们走。他们其中一个，用下巴朝我的床上努了一下，说，把你的行李带上。我背上了我刚放下不久的背包，跟着他们出了宿舍，下了楼。

我问他们，去哪里？他们不说话，其中一个径直往前走，另一个又把嘴往前面努了一下，说，跟着走。我就跟着前面的那个人走，他又跟在我的后面走。路上，碰到有熟人和我打招呼，我停了脚步，也简单地回个招呼，前面走着的那个人就稍作停顿，见我招呼打完了，前面的人又继续往前走，我又跟着往前走。后面跟着我的人，见我停下，他也停下，并不做声。见我开始往前走了，他也跟着往前走。一路上都是这样，过路人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我心里还挺佩服这两个人的，看起来也是一、二年级的学生，怎么想出了这么好的带路的方法呀，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没有惊动任何人就把我带到他们要我去的地方了。

我记不清那是教六楼还是教几楼了，上了二楼，进了一间教室。教室里有一个中年人在等着，看我进去了，他就含笑向我打招呼，说，我们是朱成昭专案组的。又指着刚才领路的那两个学生说，这是雷存云，是我们专案组的组长；那个叫周幼如；我姓李，也是专案组的。他没有说他叫什么，我也没有多问。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只大眼睛，非常大，和他的五官有点不成比例，我总觉得有点像牛的眼睛。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叫李思田，是我们学校勘探系的

<sup>31</sup> 指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建立的专案组，当时革委会主任是王大宾，分管专案工作的副主任是李贵。据聂树人（时任革委会常委）回忆：朱成昭被（从广州）押送回地院后，即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成立了“朱成昭专案组”，配合其工作。“朱成昭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是李思田老师和一个叫雷存云的学生。他们的汇报程序是，先向公安部汇报，同时向主抓这事的李贵汇报，进而向王大宾汇报情况。最后，才视必要，由王大宾和李贵决定，向我或其他几个未与朱成昭共过事的常委通报情况。（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史》）

老师<sup>32</sup>。

他对我说，今天刚回来？我说，是，到学校没多大一会儿。他指着我背的背包说，这是你随身带的行李？我说，是。他接着说，把它打开，让我们看一下。我愣住了，我没想到他们还要检查我的行李。我想问为什么，还没有说出声，他就接着说，你不要多心，我们是考虑到安全的因素，需要检查一下。我真不明白他说话的含义，也没弄懂他说的安全的考虑是什么意思。我不想和他们弄僵了，于是很不情愿地把背包递给了他。他没有接，他说，不，我们不检查。你打开它，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让我们看。我很不情愿地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背包不大，随身物品也不多，其中有一个小手绢包着的两沓钱，每一沓钱又分别用纸包着。李思田叫我打开它，我打开了，他看到是很多钱，那两个大眼睛顿时显得更大了。他问，这是什么钱？我说一包是在广州卖报纸的报费，一包是我自己的积蓄。他伸手把钱拿了过去，说，这钱现在由我们保管。我说报费可以交给你们，我自己的存款要还给我。李思田眼睛一瞪，说，这怎么区分？你怎么证明报费有多少？你自己的有多少？现在要全部由我们保管。你自己身上不许带钱。我说，那你打个条子给我吧。李思田有点恼怒地说，打什么条子？等你的问题搞清楚了你再来找我。就这样，既没有当面点清钱的数目，又没有给我写下任何凭证，就把我的钱给收了去。

——我没想到，“问题搞清楚”的时间竟会在十年之后。被收走的那两包钱，还有我的皮箱及其他物品，以后再也没有归还给我，也无人向我作过任何交代说明。

接着，李思田又说，朱成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已经被抓起来了。你和他走得最近，你必须交待自己的问题，同时要揭发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你不要以为朱成昭有后台，就没人敢动他，不要有任何幻想。他不是有后台吗？叶向真不是照样抓进去了？不管他的根子有多深，后台有多硬，我们都会一挖到底，坚决清除一切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听他这么说，我才知道朱成昭已经被抓起来了。而且，叶向真也被抓进去了。听李思田讲话的意思，抓朱成昭还不是为了批判他的错误——他批评文化大革命的八大观点<sup>33</sup>。从李思田说的话来看，他们是想通过朱成昭这个藤子头，顺着往

<sup>32</sup> 李思田，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煤田地质勘查专业教师。因曾任校革委朱成昭专案组组长，在军、工宣队进校当政后遭到清查，批“五一六”运动中遭到反复审查，文革结束后又被作为“三种人”清查。以后潜心钻研学术，取得极大成就，任地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沉积盆地与沉积矿产研究所所长，是中国地质学会沉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力学学会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多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委及国家科技进步三大奖评委。

<sup>33</sup> 八大观点：1967年1月开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朱成昭在各种不同场合提出他对当前文革形势不同于“主旋律”宣传调子的思考与看法，被中央文革小组得知后，决定要他离职“闭门思过”，东方红公社由中央文革小组指定王大宾担任领导。1967年2月4日晚上，在地院东方红整风领导小组的要求下，朱成昭在地院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检查”。他以检查为名，系统阐述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早了；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4.大

上摸，摸到“后台”那里去。我当时觉得就算朱成昭的八大观点是错误的，那也是思想认识问题，最多也是应该通过批评或者批判来解决的，也到不了抓捕的份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央（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央文革）从一开始，就是打算来抓后台的。

我当时就感到了朱成昭处境的险恶，但还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被深深地陷进去。因为我只知道朱成昭和叶向真是男女朋友关系，其它一概不知。就连八大观点也是朱成昭做报告时我听到的，当时是全体“东方红”战士都听到的。

李思田那天对我说，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他要我认清形势，回去认真地回忆，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揭发朱成昭的问题。明天要竹筒倒豆子，把问题都谈出来，争取宽大处理。他给我讲了大概两个钟头的形势，无非是说朱成昭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等等。晚饭前让我回到了宿舍。

## 2. 我们被诬陷为“叛国外逃”

第二天下午，还是那两个小个子的学生来到我宿舍找我，一个叫雷存云，另一个是三年级的学生，叫周幼如，就是那个总爱努嘴的。他们两个又和昨天一样，一前一后地包夹着我，带我到了昨天去的那间教室。

进了那间教室，李思田用手往前面一伸，指向的是桌子前面的一张凳子，嘴里说着，请坐。他坐在桌子的对面，雷存云和周幼如坐在他两边。李思田说，考虑了一天，怎么样？痛痛快快说吧。我说，八大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可能有些片面，我对八大观点也是赞同的，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点片面……我刚说了几句，就看见李思田把眼睛一瞪，身子往后一仰，我觉得此时他的眼睛确实像牛的眼睛，特别是在他瞪眼睛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什么八大观点？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现在不是问你这个问题，是叫你交待问题，揭发朱成昭的罪行！我说，我就知道他的八大观点被批判了，说是攻击文化大革命。他说，你整天和他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么一点儿东西？我说，我是经常去他那里，也就是聊天说闲话。李思田说，什么说闲话，你们那是开黑会，恶毒攻击。看来你是不想交待了，我们是想挽救你，希望你能和朱成昭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能竹筒倒豆子，把问题说清楚了就没你的事了。现在复课闹革命，你就可以回去上课。将来毕业了你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做贡献。你怎么执迷不悟呢？我说，我就知道这八大观点，我不知道他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李思田突然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厉声说，你们跑到广州干什么去了？说！

---

联合大夺权搞早了；5.关于联动问题，抓人太多；6.关于坐牢问题，不怕坐牢、杀头；7.聂元梓问题；8.关于高级党校问题和首都高校造反派“炮打康生”问题。这“八大观点”表明了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提出怀疑与反对。

我说，我们去广州旅游去了。

李思田说，什么旅游？旅游？中央会派公安部副部长去抓你们？

我说，没有抓我们，是让我们自己回来的。

李思田说，不要狡辩了，你们那是叛国外逃，当时没有抓你们是时候未到，现在不是把朱成昭抓起来了？

我说，为什么抓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叛国外逃。

李思田说，那你说，你们说没说过出国的事？

我说，我说过有红卫兵去抗美援越的事，那是我大串联时听说的，大串联回来后我给很多人说过。

李思田说，什么抗美援越？别美化自己了。你们说出国就出国了？谁批准你们出国了？没有经过批准，私自出国就是叛国。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出国的？你们是在朱成昭飞黄腾达的时候想出国的吗？不是。你们是在朱成昭挨批斗的情况下想出国的，是企图逃避对他的惩罚，这不是外逃吗？你们是叛国外逃，这是铁板钉钉的事，你还敢狡辩？

我是第一次听说“叛国外逃”的罪名，而且理由冠冕堂皇，叫你无法辩驳。同时，叛国外逃这四个字言简意赅，这么专业的用语，应该是专业人士下的定义，这应该是中央文革下的定义。我觉得李思田个人应该是不敢这样给我们定性的，因为这样的逻辑太荒诞了。如果是中央文革这样给我们几个人定性，那这个罪名是逃不过去了。要不然，朱成昭也不会被抓进去了。任何一个人一问，你什么罪名？叛国外逃。可是具体事实呢？只不过是我听说了有红卫兵跑到越南去抗美援越了，而我又把听说来的这个事，又对别人说了。事实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中央已经给你定性叛国外逃了，你躲也躲不过去。就像李思田给我做工作时说的一样，老老实实认罪，落个态度好，可以宽大处理，继续上学上课，毕业后分配工作。既然不承认也要给你这样定性，还要多吃很多苦头，那何必不干脆认下来，落个态度好，继续读书上学呢？权衡了一下利弊后于是我认了这个罪名。但是在这个罪名之下，我交待的具体事实，仍然是我听别人讲过有红卫兵去越南抗美援越的事，我又对很多人讲过这个事。至于李思田说的，我们多次开黑会，策划叛国外逃，我坚决否认，因为确实没有这样的事。当时我想，不管你帽子扣得有多大，事实只不过是我听过和说过有北京的红卫兵跑到越南去抗美援越了。这难道还算个事儿吗。

李思田看到今天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决定暂时收兵。他对我说，今天先到这儿吧，你回去继续考虑，交待其他问题。

类似这样的盘问，每个星期都有，有时一个星期还盘问好几次。通过这一段时间和专案组打交道，我才弄清楚了，雷存云虽然名义上是专案组组长，但实际

上是个傀儡。真正主事的，出点子的，制定计划和选择突破方向的，都是李思田。

### 3. 杜金山和杨雨忠之死

就这样，对我的盘问连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期间还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杜金山后来受戴良吉之邀请，从南京去了江西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江西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武斗。杜金山不幸意外被步枪子弹射中而去世<sup>34</sup>。杜金山的姐姐来学校找“东方红”的领导人，要求追认杜金山为烈士，要求给杜金山开追悼会，被“东方红”的继任领导人以杜金山和朱成昭走得太近，是朱成昭集团的成员为由而拒绝。而我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正在接受审查，对这件事没有话语权，无法对杜金山的姐姐提供任何帮助。我的一个老战友老朋友就这样默默地离去了。

另一个使人伤感的事，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就是杨雨忠<sup>35</sup>竟然跳楼自杀了。这真是绝对意料不到的事。杨雨忠当时是“东方红”的作战部长，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待人诚恳。这样一个老实人竟然被逼跳楼自杀，真不知他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我想起了他那善良老实的双亲，他们该多么悲痛多么难受呀！另外我还知道了他留下了三封遗书，一封给王大宾，一封给专案组，一封给他父母。前两封遗书说了什么？内容一直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

那时，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天的下午，叫我去交待问题。我实在没什么好交待的，又不得不应付他，只好这一次交待八大观点里的这个观点，下一次又交待八大观点里的另一个观点。李思田说我是挤牙膏，挤我一下，我就交待一点儿，不挤就不交待。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可交待的。

在这个灰暗的时期，我接到了在广州串联时认识而且很谈得来的一个女孩朱敏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很快就要毕业分配了，还不知道会分到哪里。为了不失去联系，她把她的老家的地址给了我。信中没有任何感情方面的表示，但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她想表达的意思。而此时，我正在接受审查，前途未卜。我不能向她表示什么，也不想给她回信。我去信了，必然又有回信。我不知道对我的审查会继续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给我做什么结论，一切个人问题都要等到我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才能考虑。当时完全不会想到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竟会在多年之后，而在这些年里我再也没有给她回信的机会。不过，尽管我没有回信，但是我记住了她老家的地址。

<sup>34</sup>杜金山，时为北京质学院 15632 班学生，参加了串联发起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是地院“东方红”最早的成员。朱成昭被中央文革罢免“东方红”负责人后心灰意冷，决意出走。1967 年 8 月，在去江西的轮船上，因下舱有人玩枪走火，打中腰部，到岸后才能送医院，因流血过多，抢救不及死亡。

<sup>35</sup>杨雨忠，时为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 71621 班学生，东方红公社核心组成员，地院革委会常委，在受到革委会专案审查迫害中，于 1968 年 5 月 30 日午后在地院北五楼东头顶层跳楼自杀，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家里，一封给专案组组长王焕（地院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三结合干部）；一封给革委会主任王大宾。这三封遗书内容至今没有公开，《王大宾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

#### 4. 逼我承认莫须有的“滔天大罪”

又是几个星期以后，李思田好像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对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逼供。一天下午，又把我叫到了那个教室，问我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了，要我交待新的问题。我还是拿出八大观点来交待。李思田猛地一拍桌子，厉声说，净交待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以为能蒙混过关？你还有滔天大罪没有交待，我们一直给你机会想让你主动说出来，希望给你一条生路，别人都交待了，你还在负隅顽抗，你想找死吗？朱成昭怎么样？他不是有后台吗？他的后台能保他吗？他不是照样进去了？我还告诉你，蒋良朴也抓起来了，你们的问题大了，不过，你和他俩还不一样，你不是主要分子，只要交待出来，就可以宽大处理，没有必要去一起陪葬。何去何从，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说！

我当时极其震惊，不是因为我真犯了什么罪被发现了而震惊，而是因为今天先给我扣上“滔天大罪”的帽子，要我交待“滔天大罪”而震惊。我感到对我们的定性又升级了，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整啊！何为“滔天大罪”？是杀人放火吗？不是，杀人放火那只不过算是严重罪行。李思田说的是“滔天大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所谓的滔天大罪，那一定是涉及到天的。何谓天？中国的天，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外，谁又能配得上这个天字呢？滔天大罪，那不是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罪吗？犯了涉及伟大领袖的滔天大罪，还能有生路吗？我们这些普通学生，我们和毛主席可以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我们如何能对毛主席犯下滔天大罪呢？这个罪，即使我想认，都没有办法去认哪！更糟糕的是，如今专案组要我认这个罪，这恐怕不是李思田本人的意见，应该是李思田背后的人的意见。那就说明，是上面想给我们定这个罪呀！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思田个人野心极大，一心想搞出个大案子，来凸显他自己。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我们确实要大祸临头了。

当天，我坐在那里几个钟头，心乱如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一直到开晚饭的时候，李思田说，你今天晚上认真考虑，明天必须交待问题。我回到宿舍，心情极差，连晚饭也不想吃。结果，吃晚饭的钟点还没有过去多长时间，雷存云那两个矮个子又来了，要我跟他们走。我跟他们走到了不知道是眷几楼的二层的一个套房，李思田等在那里。他宣布我被隔离审查了。这个房间的窗户贴满了报纸，外面的一切，一点都看不到。我睡的房间还有两个看守我的人也睡在这里，专门看管着我。在这里，我晚上基本睡不好，我想了很多事情，心里非常难受。我想到朱成昭、蒋良朴，他们也都是年轻的大学生，虽然比我高几个年级，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都被抓进去了。如果这些罪名敲定了，他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出不来了。而这一切仅仅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朱成昭不和叶向真谈恋爱，或

者如果叶向真只是平民之女，那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再或者，即便叶向真是名门之后，但是如果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不认为她的父亲是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那叶向真的家人也将是安全的。那朱成昭也不可能会遭此横祸。但是现在，社会上要清除伟大领袖身边的定时炸弹的呼声甚嚣尘上。那么搜集朱成昭的罪行就势在必行，而朱成昭实际上只不过是公开发表了他的八大观点罢了。而八大观点即便是错误的，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又能算多大的罪呢？仅凭这个罪名能把后台揪出来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必须加重朱成昭的罪名，才能顺理成章把他的后台追出来，从而达到清除伟大领袖身边定时炸弹的目的。那这样看来，把朱成昭的罪名加大加重并且坐实了，也就势在必行了。不这么做，怎么教人信服呢。从中央文革的大局考虑，朱成昭，还有蒋良朴，也可能还要算上我，只不过是一个祭品，一个牺牲品。对他们的大局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能理顺这些脉络，甚至还能预见到结果，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就像被赶向屠宰场的羔羊。无知的羔羊是懵懵懂懂往前走，虽然前面就是死路，但在死亡之前，它们不会感到恐惧，也不知道害怕。但是对于那些已经知道前面就是屠宰场的羔羊来说，却是在极端的恐惧中度过这段行程的，这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这是一个劫数，确实在劫难逃了。为了确保伟大领袖革命基业的传承，有些人是要做出牺牲的。不幸的是恰恰我们几个学生成了合适的人选。

在被隔离审查的那些天，我的心情很不好，晚上也睡不好觉，白天也不想吃饭。那个小个子每天负责替我买饭菜，通常是问我吃什么，我把饭票给他。他去食堂自己先吃完了，然后把我的饭菜带回来。我因为心情不好，精神负担重，没有食欲，所以只想吃些清淡的素菜。但是有一天晚饭前，我突然想吃肉了。我请那个矮个子帮我买一份粉蒸肉，如果没有粉蒸肉，就随便买一个荤菜。他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当时也没有在意，一心等着吃粉蒸肉。他回来了，把碗往我前面的桌子上一放一推。我一看，是五分钱一份的素白菜。我看着他，说，我要的是肉菜。他不冷不热地说，没有了，只有素菜。我知道他在撒谎，可能粉蒸肉会卖完，但肯定不会所有的荤菜都卖完。他头歪歪地看着我，表情坏坏的，我感到他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大概在晚上八点多钟，隔离我的这栋房子的大门突然打开了。我看门口站了很多人，我只认得有一个是我们班的史恩泉。我正诧异时，他们一拥而上，把我的两只胳膊抓住，往上一掀，就使我坐起了飞机。然后架着我的胳膊下楼，走到了校园的马路上。我的胳膊被他们架得很高，以致我的头几乎快碰到我的膝盖上。我听见他们在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华府”。我明白我又升级了，现在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我以为要游街，要开我的批斗会。我当时还戴着眼镜，因为头被按得太低，眼镜顺着鼻梁往下滑，我很担心眼镜会滑落到地上被踩碎。这时

我听见一个人说，到了，车就在前边。

我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不是开批斗会，而是要抓我进去啊。

我不知道那一天的确切日期，我只知道那是 1968 年 3 月初的一天。

## 七、进了北京最严酷的监狱功德林

### 1. 狱友都是造反派头头

汽车开了很长时间，转来转去，我也不知道开到了什么地方，应该是一个监狱的门口吧。车停了下来，叫我下了车。我当时脑子里一片茫然，有点麻木，下了车就呆站在那里。大门里面有间房子，开着门，亮着灯。一个声音说，进去！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只是按吩咐进了那间屋子。屋里灯光通明。里面的人叫我把衣服脱了，我脱了外衣。他们还叫我继续脱，脱得只剩下一个三角裤头。我的外衣有人拿去检查，把衣服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检查，我衣服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学校专案组在我隔离审查时就检查过了，东西也都搜走了。另一个人过来检查我的身上，胳膊，腋下，裆下，大腿小腿，叫我脱了鞋子，又检查鞋子。检查完了，叫我穿上衣裤。我裤子上的皮带被抽走了，我穿上了裤子，用两只手提着裤子说，我的皮带？那个搜我衣服的人说，皮带不能给你，保管在这里，你什么时候出去了再给你。我很诧异，心想，没皮带怎么穿裤子呀！那个人似乎看到了我想说什么，大声对我说，用手提着。我又看看他，想说，我难道要整天提着裤子吗？他又看出来我想说什么，又大声对我说，整天提着，走哪儿提哪儿。门口站着的两个当兵的对我说，走！说罢了，一个当兵的就转身大步向前走去，我提着裤子跟着他向前走。我发现，离我几步远，另一个当兵的在我后面跟着走。我又恍然大悟了一件事，原来这个押送人的方法不是我们学校专案组发明的，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模式了。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学校专案组那几个人在这里受过培训，学会了这种押送的方法。

当天晚上我就被送到了一间牢房里，我进去时，看到里面已经关有两个人了，是两个中年人。牢房很小，床铺很低，大概只有二十多公分高。一边的铺位宽一点，可以睡两个人，另一边的铺位很窄，只能睡一个人。两个铺位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大约三十公分的空隙。那两个已经被关在这里的人似乎比较友好，看到我是新来的，就叫我睡在那个窄的铺位上，他们两个睡在宽一点的铺位上。当天已经很晚了，我在小床上（姑且叫它床吧）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就被叫醒了。外面走廊里的看守在大声嚷嚷着“起床，起床！”起来后，那两个人告诉我要把被子迭好，码整齐。我看他们俩把被子

迭好了，又拍拍整整，把被子整理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就像我们去部队锻炼时，那些当兵的迭的被子一样。我问，迭这么整齐，一会儿想躺下时，不又弄乱了吗？他们俩说，不能随便躺啊！从现在起，一直到晚上 10 点半睡觉，都不允许躺在床上。我问，那累了也不可以躺一会儿吗？他们俩说，不可以，这是监规。我又问，那我们每天几点起床呢，他们俩说，早上六点，冬天是六点半。我心里想，又不能睡午觉，白天又不能活动，整天坐在这么低的铺板上，多不好受呀。

我打量了一下牢房，这间牢房只有一扇小窗户。窗户的玻璃上涂了一层白油漆，然后又糊了一层报纸。房间里的光线很暗。屋里只有一盏瓦数很小的小灯泡，二十四小时长明，夜里是肯定开着的，便于看守观察关在里面的人。从铺位头到门口，大约只有一米多点儿的距离，这么小的空间的一边，还放有一个马桶，就是一个普通的铁皮桶，大小便都在这个桶里。我问他们俩，三个人都拉在桶里，满了怎么办？他们告诉我，每天早上和下午有放茅时间。我不懂什么是放茅。他们看我不懂，又解释说，放茅就是提着马桶去茅房，把大小便倒了，桶里再接点水，洗脸盆里也接点水回来，用这点水洗脸刷牙。我的裤子没有了皮带，我只要站起来，手就要提着裤子，活动十分不便。他们两个也看到了，较年轻的那个给我找了一个大约十几公分长的小布条，让我把裤子上穿皮带的布纽中的前面两个用布条系起来，这样裤子就不会掉下去了。

不一会儿，我听见走廊对面的第一间牢房的门被打开了，几个人散乱而匆忙的脚步声，他们向一个方向小跑着走去，大约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又回来了。脚步急促而沉重，还夹杂着看守“快，快”的催促声。然后就听见砰的关门声，哐里喀嚓地上插销上锁的声音。接着又是开第二个门的声音，放第二个门的人去放茅，又回来，又锁门的声音。然后又是第三个，第四个。我待的这个牢房是走廊这边的第一间。放茅的顺序是从走廊对面的第一间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间。然后就是我们这一边的最里面一间，倒数第二间、第三间，最后才轮到我们这一间。

快轮到我们这一间时，稍微年轻一点儿的那个中年人叫我拿着洗脸盆，他提着马桶。我这才注意到那个年龄比较大的中年人原来还戴着手铐。牢房门一开，我们就急急忙忙往茅房走，像小跑一样。到茅房一看，里面有一溜小便池，还有五六个大便池，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我问，能在这儿解大便吗？他们两个说，哪有时间啊？回去解。快接洗脸水。我连忙开水龙头接洗脸水。那个年轻一点的急急忙忙倒马桶，又慌忙接了点儿水涮了一下马桶，又急忙倒了，再急忙在马桶里又接了一点儿水。然后我们又急忙快步赶回了牢房。刚迈进牢房，身后就是哐里喀嚓地上牢房插销、挂锁、上锁的声音。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看守的动作十分娴熟。我没想到监狱里连上厕所都这么紧张。放茅回到开饭，中间有一段

时间，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地质学院的。他们中稍年轻一点的那个，是通县一个中学的老师，也是他们学校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姓黄。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个姓李，是一个劳改释放人员组织的头头。都是作为反革命组织的头头被抓进来的。他们给我介绍了监狱的情况和监规。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才知道即使坐牢也不能在里面闲着无所事事，必须在里面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语录。他们还告诉我说，这里面伙食很差，每个囚犯一天共四个窝窝头。每天两顿饭，每顿饭两个窝窝头，一碗菜汤。每天都吃不饱，饿得心发慌。我说我现在不想吃东西，没有感到饿。他们说，那是你刚进来，太紧张了，感觉不到饿。到明天你就知道饿了。我们现在是一天到晚都觉得饿，一顿饭吃完了，食欲好像刚起来一样，还是觉得饿。平时他们尽量不活动，降低消耗。不然就会感到更饿。听了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很紧张。如果成年累月地一直在饥饿的状态下生活，那等于是一直在受折磨啊！不仅身体会垮掉，精神也会彻底垮掉的。

过了一会儿，开始打饭了。打饭的顺序和刚才放茅的顺序是一样的，仍是从对面的第一个门开始，先是开锁开门，接着是屋里的人以小跑步的姿态很快地冲到打饭的地方，打了饭，又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去，然后又是关门上锁的声音。接着又是开第二个门……轮到我们这个牢房的时候，我跟着他们俩一起小跑着到了打饭的地方，那是几个筒道的交汇处，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好像是三个或四个筒道交汇在这里。在筒道尽头放了一个大木桶，里面装的是菜汤。旁边放了两三层的蒸笼，蒸笼上是黄黄的窝窝头。我们这个牢房是三个人，拿了两个小盆儿，我和老黄各拿一个，一个盆装汤，一个盆装窝窝头。老李戴有铐子，他空着手，但也必须跟着出去，再跟着回来。因为监狱规定，不许一个人留在牢房里。我们紧紧张张地跑了出去，又紧紧张张地跑了回来。回到房里，老黄把菜汤分到三个碗里，一人一碗，是白萝卜片汤。白萝卜片比较厚，汤有点咸味儿，也能看见一点儿油花儿。窝窝头是一人两个，自己拿着吃。我没有食欲，本来不想吃，可一想到他们俩说的，以后就要挨饿了，觉得应该先补充一点营养，给身体增加一点储备，就强着自己一点一点地吃完了。在我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两个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很注意我吃饭的样子。

刚吃完了饭，看守就在筒道大声喊，学习了，学习了！别在那儿说闲话！从筒道这头一直喊到筒道那头，再从筒道那头走回来，嘴里也喊了一路。我问，刚吃过饭就开始学习了？学到几点啊？他俩看着我，笑了笑，说，学到几点？没有头，一直学到下一顿饭。下一顿饭吃完了再学习。反正是吃过饭就学习，一直到该睡觉了才结束。我很惊讶，说，那咱就不能聊聊天，打打牌了？一天到晚都是学习？我看《红岩》小说，里面写的，在牢房里可以自由活动，想干啥就干啥呀！老李听了，不禁苦笑了一下，说，你说的那是小说，那是国民党的监狱。现在是

解放后，我们坐的是共产党的监狱。我说，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共产党的监狱，应该比国民党的监狱好才对呀！他俩愣愣地看看我，露出一副不敢相信的眼神，嘴唇动了动，终于什么都没说出来。但是他们脸上的神色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原来罩在我身上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的光环，已经变得一钱不值了。他们原来还以为我见多识广，对我还有点敬仰之心。现在觉得我是个啥都不懂的白痴了，我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肯定是一落千丈。

我们学习，里面没有报纸，也没有其它书籍，每人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只有这个可以带进来。我们各自坐在床边，各自拿着小红书，看一会儿，悄悄地说一会闲话。看守在筒道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掀开门上窥视孔的盖布，窥视孔里露出两只眼睛，快速而又警惕地巡视着房间。几秒钟后，那块盖布被放下，脚步声离去，又转向了下一个牢房。看守来的时候，我们就认真地看书，看守走了，我们就悄悄地说闲话。我问他们俩，怎么看守都穿军装呀？他们俩告诉我，现在都军管了，大部分看守都换成当兵的了。

过了两天，大家比较熟悉了，他们俩问我，把你抓进来的时候你不害怕？我说，怕呀，抓进来谁不害怕呀？老黄说，我看你进来时没有害怕的样子。我问，真的？我当时脑子懵懵的，好像没有思想了，就像梦游一样进来了。我都不知道害怕不害怕了。老李说，一般害怕的人，刚进来时思想负担很重，第一顿饭，甚至第一天都吃不下去。可我看你第一顿饭，窝窝头一口一口都吃完了，一口没剩。起先我和老黄见来了个新人，还挺高兴的，心想，我们俩今天可以多吃一点了。没成想，你一口一口都吃完了。我们俩愣是一口没捞着多吃。我脑子里马上映出了他们俩那天的眼神，原来是盼着多吃几口窝窝头呀！我真太不善解人意了。我抱歉地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那天在惦着多吃几口窝头。其实那天我一点都不想吃，我是被你们说的今后会很饿很饿的话给吓住了。心想抓紧补充一点营养吧，省得以后饿得受不了，就强着自己吃下去了。其实我当时一点食欲都没有。早知道我就让给你们吃了。你看，结果弄得这是我不想吃强着自己吃。你们是饿得想多吃点儿又没吃着……真对不起，对不起！

一天晚上，还没到睡觉时间，我们还坐在矮木板床上装模作样地学习。突然听到筒道头上那个厅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是几个人很沉重的脚步移动声，好像是在拖一个很重的东西。老李低声说，听，听，有事了。我们都竖起耳朵，屏起呼吸，全神贯注地倾听。冷不丁地传来“警察打人了”的凄厉叫声，这声音来的太突然，又太凄厉，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只一声，第二声刚发出来就变成呜呜声了，显然是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接着连呜呜声也没有了，只能听见一些沉重的动作声。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动作，我只能感到是几个人在做着什么。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十分紧张和震惊。我问他俩：“我觉得是在打那个人，咱们监狱不

是不兴打人么？”他俩再一次对我的浅薄吃了一惊。我当时已经顾不上他们会怎么样看我了，只顾说：“都是说只有国民党的监狱才打人，我们的监狱不打人，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怎么这里也打人哪？那会不会还用刑啊？会不会还有老虎凳啊？”老李没正面回答我，他说：“看起来书读多了也没什么好处，除了书上的东西，别的啥都不知道。你先弄清楚，这是监狱，不是在学校。监狱里啥事不能发生？整天喊着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怎么样专政你都行。”

我顿时无语了。脑子里思绪翻滚，自己在外面也是整天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从未想过专政实施起来，并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真刀真枪，冷冰冰的，是充满血腥的。

又过了几天，还是在晚上，我们这个牢房的门突然响起了开锁的声音。紧接着牢房门被打开了，一个年轻人被推了进来，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门边。看守站在门口，冷冷地叫老李收拾东西出去。老李急急忙忙拿上自己的几件衣服，走出了牢房。看守随即把牢房门关上。老李被调到别的牢房去了。

## 2. 我对自己案情的分析——很可能没有出头之日

一切又静了下来。我这才有了时间去注视那个刚进来的年轻人，他年纪很轻，看起来比我还小一些，却留了个大背头，还在门口那儿站着。相对于他，我倒成了老人了，我毕竟比他早进来几天。老黄对他说，进来坐，站那儿干啥？又指指老李原来睡觉的地方，这个位置是你的铺位，过来收拾一下吧。那个小伙子才走过来，用手把铺位简单地扑拉了几下，就坐了下来。当晚已经到了睡觉时间，也没多说话，各自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才开始聊了起来。

小伙子说，他叫裴卫红，是京棉三厂（北京国棉三厂）的工人，也是他们厂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因为另一派造反组织掌权了，所以就把他当反革命分子送进来了。我说，看你的年龄很小，又年轻，又留了个大背头，我昨天晚上还在想，你可能是个小流氓被送进来了。没想到你还是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他已经恢复了常态，笑笑说，人家都说我留个背头好看，就你说我留背头不好看。我说，那是审美观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的名字是文化大革命改的吧？他说，是，你怎么知道？我说，男的叫这个名字，就卫红这两个字，我就觉得像是文化大革命改的名字。

他又笑笑，说，你年龄也不大呀，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唉，我的事不好说。说小吧，实际上是啥事也没有，根本就不该进来。说大吧，不得了，可能就出不去了。就看上级想给我定个什么罪名了，我的事我做不了主。老黄说，前几天我不好意思问你犯了什么事。现在你看，咱们三个都是造反派的，地质东方

红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咱们三个就不算是外人了。你要是想说，就给我们聊聊。

我说，朱成昭，你们知道吧？他们两个说，知道，大名鼎鼎，地质东方红的头头。后来怎么就没有消息了？我说，他也进来了。我也弄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应该比我早进来几个月吧。他们问，他是什么问题进来的？我就把朱成昭在 1967 年 2 月份发表了八大观点，中央文革让他闭门思过，他拒绝做检查，等等，给他们说了一遍。他们俩问，八大观点是什么内容？我就把我能记得的内容尽量给他们讲了一遍。然后说，其实八大观点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我就在他做报告时听过一次，没记那么清。后来我交待八大观点时，也是凭我的想像硬凑了八个，比如，文化大革命打击面太大，把老干部都打倒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群众运动，后来是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等等，可能有些并不是他的观点。老黄说，我觉得这些观点挺好呀。就凭这，也不能抓起来吧？我说，还有叛国外逃。老黄说，你们叛国外逃了？我说，没有。1966 年底我大串联去过云南西双版纳，在那里听说有红卫兵跑到越南去参加抗美援越了。我回北京后给朱成昭还有很多人说过这个事。结果专案组给定性说，未经允许出国就是叛国，朱成昭受批判了还跑去广州就是外逃。合起来就是叛国外逃。专案组说上级已经给定性了。老黄问，那你们去广州是不是想跑出去？我说，哪有那事啊，朱成昭早就想去串联，过去在台上没有时间去。下台了，没事了，有时间了，正好出去转转。我又把我们去上海，广州去玩的事给老黄和小裴说了一遍。我说，我们从广州被送回来后，又没人管我们，我们如果真想跑出去，那不早就跑出去了？我后来还去过很多地方，山东啦，大连啦，哈尔滨啦，从来没想过要出去的事。你想想，我们大学毕业后都会分配一份不错的工作，接着就是结婚生孩子，过舒舒服服的小日子，那不是挺好的么。我们跑到国外去干什么？无亲无故，语言又不通，出去了干什么？做苦力吗？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都在国内，出去了举目无亲，孤苦伶仃，那不是受罪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可上级就给你定性是叛国外逃，你有什么办法？

老黄问，就算是叛国外逃，那关几年也可以出去。你刚才怎么说，可能就出不去了呢？我说，我是说如果上级想给我们定个大的罪名的话，我们可能就出不去了。老黄问，上级是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学校的专案组，专案组的上级是谁我也不知道，估计是中央文革。老黄说，你的意思是说专案组的上级想给你们定个大的罪名？我说，就是这样。老黄感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又问，那到底想给你们定个什么罪呢？我说，专案组已经给我提示了，具体是什么罪名还得我来猜。老黄说，那怎么猜啊？我说，其实不难猜，我已经猜出来了。我先告诉你专案组说的话，你来猜一猜，看我们俩猜的一样不一样。老黄说，好，你说说，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我说，专案组说我们犯了滔天大罪，要我交待这个

滔天大罪。你猜猜应该是个什么罪？

老黄想了想，说，涉及到滔天大罪那肯定不是什么强奸盗窃，什么杀人放火，那肯定是涉及到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才是滔天大罪呀！中国的天不就是毛主席么？怎么？你们不会真的针对毛主席吧？我说，哪有的事啊？我只是让你猜猜专案组定的这个罪名和我猜想的一样不一样。因为他给定的这个罪名的面太窄了，在中国，除了毛主席，谁又能配比做天呢？所以你猜的和我猜的一样，我也猜想上级是想给我们定这个罪。

老黄十分同情和担忧地看着我，小心地问，那，为什么上面想给你们定这个罪呢？我说，我也不可能肯定，我推测出了一个理由，如果不是这个理由，我想不出为什么要给我们几个普通学生定这么大的罪名。老黄和小裴立马都聚精会神起来，我接着说，朱成昭虽然很有名气，他也只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才是个一年级的学生。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犯不着对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大动干戈。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才会使我们变得很有利用价值。学校的专案组也对我提示过，说要抓后台。告诉你们吧，朱成昭有一个女朋友，叫叶向真，她是叶剑英的女儿。朱成昭和叶向真大约是在 1966 年 8 月 24 号大辩论之后不久，相识并成为了男女朋友，两个人关系密切。我们去广州串联时，叶向真也跟着去了。1967 年 2 月份，朱成昭公开发表了八大观点，被外界认为是受了叶向真的影响。中央文革无疑也是有这个看法的。现在外面一直在提要清除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还有谁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呢？现在风传的“二月逆流”以及老帅们大闹怀仁堂，说明目标是几个老帅。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陈毅已基本上被打倒了，徐向前、聂荣臻也基本上靠边站了，唯一一个还在管事的老帅就是叶剑英了。我估计要清除的这个定时炸弹，可能指的就是叶剑英。怎么样能够找理由把他清除掉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抓朱成昭的黑后台，通过叶向真的关系很容易就连到了叶剑英的身上。但是朱成昭的问题只有八大观点，而八大观点只是个认识问题，以这个理由来抓后台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又加上了叛国外逃，叛国外逃可以定朱成昭的罪了。但是用来抓后台还显得分量不够，必须还要加重罪名，才能顺理成章地把后台挖出来，达到清除毛主席身边定时炸弹的目的。所以我们这几个学生就有了这个利用价值。我觉得我们几个现在很危险了，很可能没有出头之日了。

老黄和小裴觉得我分析得很有道理，他们很同情地看着我，流露出很难受的样子。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随时都可以剁了你。听天由命吧。人生在世，很多时候，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管怎么说，我也二十多岁了，比起那些刚生出来就死去的婴儿，那些几岁十几岁因病因事故因意外死去的小孩，我比他们强多了，我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上了大学了，也见

了不少世面了。我现在的遗憾是，我还没结婚，我还没经历过男女之事，我还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只从小说里看到过描写，说很舒服很销魂，可是连那个事到底怎么做我都还不知道。唉，留到下辈子再体验吧。

这一席话说出来，不仅我心情沉重，老黄和小裴也倍感伤感，都低着头，一时无话。静了一会儿，我振作了起来，说，不考虑那么多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活一天就高兴一天吧。我轻松地问小裴，我看着你很年轻，没想到你比我还大一岁。你有女朋友了吗？小裴说，我都结婚了。我有点惊奇，哎哟，你这么小就结婚了？小裴说，不小了，我都二十三了。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就可以结婚了，我都超过两岁了。我不无遗憾地说，我如果不上大学我可能也结婚了，我就可以体验一下完美的人生了。现在可惜啊，有些事是体验不到了。小裴，还有老黄马上安慰我说，男女之事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稀罕的。我说，你们是体验过了才说不稀罕了，我是没经过，就觉得稀罕了。

在里面闲着无事，什么话题都可能会谈到。有一天，我们聊起了宇宙，关于宇宙的大小，有限与无限等等。还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武松，谈到了对潘金莲的评价。

关集体号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交谈，可以沟通。这就可以活跃思想，不会使人变得呆滞。不会使人丧失与人交往的能力。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对一个人的伤害就十分巨大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流，很快就可以使人变得呆滞，思维僵化，使人丧失交流的能力。我后来被关在单人牢房，对此体会很深。那时我很怀念刚开始的那两个月，能够关在集体号中，比单独囚禁幸福多了。

每天都吃不饱，每天都觉得饿。我进来一个多月了，一次风没放过，我也不想去放风。饿得很，还不如待在屋里不动。每天聊聊天，还能打发无聊漫长饥饿的日子。

### 3. 提审

有一天，小裴被提审了，只剩下我和老黄在牢房里，我问老黄被提审过没有，老黄说进来几个月了一次也没有提审过。我说小裴运气不错啊，刚进来没几天就提审了。老黄说，怎么？提审就是运气好啊？我说那当然了，那说明你的事有人管啊。早提审，早弄清楚，早出去。要是没人管没人问，那啥时候能出去啊？老黄觉得有道理，也盼着早点提审。他说，你也进来有一个多月了吧？你怎么也没提审啊？我说，肯定是先调查调查我犯没犯罪吧？我其实啥事也没有，能调查个啥呀！我的事其实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而是想给我定个什么罪名，我只有等的份儿。

下午，小裴回来了。我和老黄还没有被提审过，也不知道提审是怎么回事，连忙问他情况。小裴说，两个人坐在桌子后面问他，他坐在桌子前面的一个凳子上，问什么，就答什么。他们有一个人在做记录。就问了问他们厂里的情况，以及厂里送他进来的经过。问完了，把记录让他看一下，然后签名，再按个手印。我说，这就完了？小裴说，完了。又说让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斗私批修。我听了小裴这么说，很替小裴高兴，我说，你没事了，快该出去了。小裴说，怎么这么说？我说，让你斗私批修，那不就是说，你是人民内部矛盾么？如果是敌我矛盾还要你斗私批修么？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还关你干什么？不是很快就要出去了么？老黄和小裴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小裴显得很高兴。

我们都在等着小裴什么时候被放出去。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过去了。还是没有放小裴出去，小裴兴奋的心情也消失了。我和老黄替小裴高兴的心情也消失了，我们大家的情绪都消沉了。

有一天，我们刚吃完饭没多久，我们牢房的门又打开了，我正在猜想是不是要放小裴了？却突然听到叫我的名字，紧接着就听到提审两个字。我连忙站起来，就想往外走，老黄连忙提醒我：“语录，语录！”我又忙着弯腰从铺上拿了语录，跟着看守出了牢门。外面站着两个军人，见我出来了，也不说话，一名军人径直向前走去，我自觉地跟着走，另一名军人自然走在了我的后面。行走的路上，路旁的树上有几只乌鸦在叫，我觉得不吉利，很想吐口吐沫再踩三脚来避避邪。在平常听到乌鸦叫都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是在提审的路上，我不敢造次，就忍住了。

也记不清拐了几个弯，到了一排平房的前面，其中有一个门是敞开着的，前面的军人走了进去，我也跟着走了进去，后面的军人跟着也走了进来，并把门关上了。我看前面是一排桌子，已经有两名军人坐在那里了。其中有一名穿海军服的年轻女军人，还有一名戴眼镜的年纪较大的军人。我还愣愣地站在那里，那戴眼镜的年长军人用手指指桌子前面的方凳子说，坐。我机械地坐了上去，两只手还捧着语录本。年长的军人先问了我的名字，年龄。然后让我念一段语录，这一段语录我以前没念过，其中有一句话叫“怙恶不悛”，这个悛字我还会读。年长军人说：“念悛。”我就按这个音又念了一遍。念完了，又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心里想，这我怎么回答呢，不是你们抓我进来的吗？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只好说，是学校专案组把我送进来的。年长的军人说，学校专案组是学校专案组，我们是我们。你进来了就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要以为你犯了罪别人不知道，不要心存侥幸。不仅要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时要揭发别人的罪行，帮助组织上把问题弄清楚。我心里有点懵了，难道学校的专案组不是受他们指使搞的？还是学校专案组自行另搞一套？我无法判断。但不管是怎么回事，这里既然要求实事求是，那就实事求是呗，不

是还有洗清自己的机会吗？于是我说，我其实并没有犯罪。旁边一个微胖较矮的军人插话说，咦，别美化自己了，没有罪？没有罪把你抓进来了？是把你抓错了吗？我说，我有错误，但没有罪。那个军人说，只有错误？那你说说有什么错误？我说，我同意八大观点，我经常给别人谈论八大观点。对面的军人说，就这？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要老实交代。我交待不出来什么东西，他们又叫我念语录，我记不清念的是哪一段了。念完了，我还是交待不出来。又给我做工作，说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启发我交待问题。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也交待不出来问题。后来，年长的军人说，今天先这样吧，你回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好好回想自己的问题，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哎呀，也给我说要斗私批修了，那就是说我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已经是人们内部矛盾了？但是，我又想到另一种可能，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呀？如果这句话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样是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可能并不是我原先认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才斗私批修，敌我矛盾的就不斗私批修了，所以我也不必为这句话过于高兴了。

第一次提审就这样结束了。回到牢房，牢房门刚锁上，小裴就着急问我，叫你斗私批修了没有？我轻轻说，叫了。小裴高兴地说，那你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了，你很快也可以出去了。可是我心里已经不再因为有这句话而欣喜若狂了。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重燃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我看到审讯组的成员都是军人，这些军人组成的审讯团，可能是受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很钦佩林彪副统帅，我希望这些军人组成的专案组是归中央军委领导的，而不是归中央文革领导。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军人专案组有可能会比较公正地处理我们的问题，不会把我们这几个大学生当成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直到我 1979 年跑到北京去要求平反见到梅建明，又见到程希平，才知道了管我们案子的是中央二办那个戴眼镜的军人是林克。小梅和程希平从功德林转到 689 集中营，那里实际上是出狱前过度的学习班，比较宽松了，他们那时已知道了管我们这个案子的是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中央二办，那个戴眼镜的年长军人叫林克。以下的回忆中，凡是提到林克的地方，都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任何人的名字。

没想到，这次提审后不久，小裴就被从这个牢房转到别的牢房去了。又过了几天，老黄也被转到别的牢房去了，这个牢房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人可以说话，时间就显得很漫长，饥饿的感觉就更强烈了。一天四个玉米面窝窝头，八两粗粮的定量，不挨饿是不可能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牢房又来了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刚进来的时候，他显得气哼哼的，火气很大，一进门就嚷嚷说，以前坐国民党的牢，现在坐共产党的牢，我要看看共产党的牢是什么样的。不过几天之后他就没什么脾气了。饥饿开

始向他袭来，孤寂也开始向他袭来，他想找人发脾气，但是没有发泄的对像，牢房里只有我这个在他看起来啥也不懂的大学生。他想质问为什么抓他，但是没有人提审他，他没有质问的对像。他就一天一天地变蔫了。我听老黄说过，老黄曾经和聂绀弩关在一个牢房。聂绀弩给他讲过很多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我很羡慕老黄，竟然能和中国的知名文人关在一个牢房，成为了狱友，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视野。我很希望现在这个和我关在一起的老干部，也能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了，我的这个狱友可能是个工农干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可能不太丰富。在我的多次请教下，我终于学到了一首古诗七绝。现在我还能记得其中的两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老干部也被调到其他牢房了，这个牢房又剩下我一个。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人和我关在一起，我被单独囚禁了起来。

又是一天的上午，终于盼来了又一次的提审。因为我觉得，只有多提审，才能尽快地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才能尽快地出去。我向往自由的欲望是这么强烈，以至于我天天盼着提审。这次提审，却是叫我交待王新的问题，我当时还不知道王新是谁。我说我不认识王新。他们不相信，说，你态度不老实，你整天去他家里，你还假装不认识？我说，我真不认识他，也没去过他家里。其中一个军人有点发怒了，说，我看你是要顽固到底了，王新你不认识？王白莎你认识不认识？他这么一点，我才醒悟过来，我问，你说的是王白莎的妈妈？军人说，你还装糊涂？还敢说不认识？这时我才明白他们说的“去他家”是“去她家”。我说，我认识王白莎的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叫王新。你经常去她家怎么会不知道她叫什么？我说，我虽然去过她家里，但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人家是长辈，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叫什么名字。军人稍做沉默，可能认可了我的解释。接着问，你去过她家多少次？都说了些什么？这真叫我为难了，我虽然去了几次，但都是聊聊天，东一句西一句的，都是家常话，如今怎么能记得都说了些什么呢。我说，就是随便说说话，都是家常话，现在也记不清了。对方说，不是让你交待闲话废话，要交待反革命言论，反革命活动。我说，我没有说过反革命言论，也没有反革命活动。人家是老干部，我怎么敢在人家家里说反革命言论啊！军人怒斥我说，什么老革命？她是叛徒、反革命。我说，那我不知道。军人说，不知道？现在告诉你了，还不知道？别东拉西扯地交待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交待反革命罪行。我实在没办法，只好交待说，我散布了八大观点。对方说，你散布反革命的八大观点，她赞成没有？我说，她没说话，她没说赞成不赞成。对方说，她没有反对，那不就是赞成吗？我没有说话，低头不语。对方又说，你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不要写“王白莎的妈妈”，就写“王新”，要有名有姓。知道吗？我说，原来我不知道名字，所以说王白莎的妈妈。现在知道叫王新了，以后我就写“王新”。对方又训斥

我，你有没有阶级立场？什么王新？是反革命分子王新，叛徒王新！我说，知道了，我以后就在名字前面加上反革命分子、叛徒这个定语。追问王白莎家里的事大约提审了我两次。我去过王白莎家好几次，不知道交待什么，只好交待说，我这一次去是散布了八大观点的这个观点，下一次去我又散布了八大观点的另一个观点。我还真该庆幸，幸亏我听到过八大观点，如果连这八大观点也没有听说过，我就真不知道交待什么了。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像上面对叶家已经没有兴趣了，转而把矛头又对向刘家了。当时是 1968 年的春夏之交，大概是 4、5 月份。后来我知道了，在 1968 年下半年，，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提审我的那段时间，应该正是紧锣密鼓地收集材料的时期。

#### 4. 难熬的寒冬

牢房里的光线很暗。我在这么昏暗的屋里写材料。不写材料的时候，就是看《毛主席语录》。因为牢房里没有别的东西可看，只有这个语录本。也没有人和我说话，没有人可以交流，只能看语录。我看得遍数多了，以至于我能把这本语录从头到尾都背下来了。可能再加上营养不良这个因素，我发现我的视力急剧下降。看语录的时候，需要离书很近才能看到，距离几乎是把书贴到鼻子上。我原来戴的近视镜是 250 度，可是这时，我估计可能已经到了八百、九百、一千度了。

我不知道这个监狱的位置在哪里，可是我知道离北师大不远。因为北师大的红卫兵广播站每天都在广播，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很清楚。我是 1968 年 3 月份进来的，刚进来的那两个月，就没放过风。后来开始放风了，一个星期也就是一次。每次放风的时间也很短。因为这里的放风和我看的《红岩》那本小说里写的不一样，《红岩》写的是民国时期的监狱，是很多人在一起放风，放风的人可以在放风场自由活动，自由说话。这里放风是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轮流放风。也就是说，你永远只能看到你同一个牢房的人，也只能和你同一个牢房的人说话。看不到其他任何人，也不可能有和其他人说话的机会。我是在单人牢房，所以一直是我一个人，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和交流的机会。每一次放风的时间都很短，因为牢房多，一个一个轮流放风，每个牢房放风的时间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这里解大便用的手纸是一种黄草纸，一小块儿一小块儿，每一块儿有巴掌那么大，是看守剪好的。每一个人一小块儿，每天发一次。在里面，个人用品，如洗脸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等都是需要在监狱里购买的。我是从学校专案组的隔离室直接送过来的，我的个人用品和钱，都被学校专案组给收走了，只给我留了几块钱。所以我来到这里时，是两手空空，只有这几块钱。这几块钱并不留在我身上，而是存在监狱方。他们有一个账本，上面记着我有几块钱。我进来后就

用我存的钱买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把牙刷和一只牙膏。

我刚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初春了，已经不太冷了。再加上那时还有老黄老李，后来老李换成了小裴，都是三个人在一个牢房，人多体温也高一些，所以没有感到很冷。现在已经进入到大约 11 月份了，我已经感到了阵阵的寒意。这里面没有暖气，也没有蜂窝煤炉的烟筒通到牢房里。更不幸的是，我只有一床薄被子。而这床薄被子因为盖得久了，里面的棉花已经不是平铺的一层了，而是成了棉花疙瘩，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了棉花。把被子一提，下面是一堆棉花疙瘩，上面只剩下被里被面两层布了。这床被子夏天盖还可以，冬天盖就没有多少御寒的功能了。铺上铺的是一床粗棉线毯。夏天时，我光着身子，只穿一个三角裤头躺着睡。可是现在快进入冬天了，我没有任何多余的御寒的东西。刚进入十一月已经感到很冷了，那到了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时候，该怎么过啊？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季。我也没有棉裤，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穿棉裤，只穿了一件棉袄。监狱方给我发了一条棉裤，棉裤的裤裆很大，就在我的膝盖上面一点儿的地方。这是因为关押的人犯有高有矮，监狱方不可能为每个人犯量身定做。于是做的是万能棉裤，把裤裆做得很低。这样的棉裤不管是高个还是矮个的人犯就都可以穿了。个子矮的人犯穿了，裤裆正好，可裤腰就到了人犯的胸口部位。个子高的人犯穿了，裤腰的长度正好，可裤裆就低到了膝盖的部位。不管怎么着吧，毕竟有了一件可以御寒的棉裤。

冬天一天一天逼近了，我很冷又无法逃避。白天还好一些，到了夜里，我感到好像被冻僵了。我只好不停地翻转身体，以免被冻僵。我全身蜷缩在被窝里，把头蒙起来，把呼吸呼出来的热气留在被窝里，以增加些微温度。我开始是穿着棉衣睡，后来我发现，只穿着棉裤睡，把棉衣脱掉，把头缩进被窝里，再把棉衣盖在头上，保暖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后来睡觉时，我就用我的洗脸毛巾把被子的一头扎起来，然后人拱进去，整个人缩在被窝里，棉衣盖在头部和上半身。寒气一刻不停地侵袭着我，我觉得寒到了骨头里。我没有一天熟睡过，我需要每隔一会儿就翻转一下身体，才能保持不被冻僵。那真是一段炼狱之苦，永远也无法忘记。我很庆幸，我竟然熬过了北京这寒冷的冬季。

在这个监狱里偶尔还可以洗一次澡，1968 年夏天我就赶上了一次洗澡的机会。那天吃过早饭没多久，就听见看守在筒道里喊：“准备洗澡了，准备洗澡了！”几分钟后，就开始开第一个牢房的门，伴随着看守“快，快”的呼喊声，我听见第一间牢房的在押者噗噗踏踏地跑了出去。几分钟后，又开第二个牢房的门，又听见几个人的奔跑声，同样伴随着“快，快”的催促声……就这样一间一间地轮流开门，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人，仍然是不同牢房的人不能互相见面。放了几个牢房以后，突然又听见看守大声传来了新的命令：“都不要穿衣服，先脱衣服，

都把衣服脱光了再出去！”于是，这以后去洗澡的在押者都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出了牢房，奔跑在去澡堂的路上。我也赶快把衣服脱光了，准备着等轮到我的时候尽快跑出去。我想，这可能是为了节省洗澡者到澡堂后先脱衣服，洗澡后再穿衣服的这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几批赤身裸体的洗澡者依次跑出去后，突然又传来了新的命令：“不要光着身子出去，穿上衣服再出去！”我又赶紧把衣服穿了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轮到我了，牢房门一开，我就快步向外跑去。我看见通往洗澡堂的路上，每隔不远就站着一个看守，嘴里不住地喊着“快，快”。还有当官模样的人，背着手站在路旁，看着这些奔跑的人群。我意识到，刚才叫赤身裸体跑出来洗澡的主意可能是低级干部出的。后来被级别高的干部看到了，觉得不雅，一群光着身子的人在路上跑来跑去，成什么体统？就给制止了。我就在这一路的催促声中跑着，到了澡堂，我看到澡堂里有两个大池子，但没有水，也不是在大池子里洗澡。还有一长排木制的间隔起来的洗澡房，同一牢房的人进一个小房间，进去后，看守就把门在外面插上。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看守叫我进了一个开着门的小房间，他在外面把门插上了。小房间没有屋顶，其实不能算是房间，只能说是间隔。这个隔断里面有一个淋浴头。我连忙脱了衣服，拧开了淋浴的开关，开始调水温。温度一时也调不好，我听见前面的小房间刚进去的人已经被催促着快穿衣服快出来的喊声。我担心时间不够用，水温也没有调好，就不管水冷水热，只管冲洗。我带了肥皂，但是我不敢用。主要是担心时间不够，万一我把肥皂抹上，还没有冲洗干净，就喊我快出去，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没有用肥皂，只用水冲洗。听到了看守在外面喊“出来，走”的声音，就连忙擦了擦身体，快速地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我约摸整个时间也就是三四分钟。接着就在充斥耳边的“快，快”的声浪中，紧张地一路小跑地回到了牢房。

北师大的红卫兵广播站很卖力，从早上到晚上，大概一天广播十几个小时。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听得很清楚。我进来没多久，就听见广播站的大喇叭里高喊着“打倒杨玉夫”。“杨玉夫”这个人我以前没听说过，猜想可能是北师大学校的走资派。后来听多了，觉得不是，一个学校的走资派不可能天天批判，况且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也早就过了批判本单位走资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个知名人物，如果不是知名人物，不会天天拿来批判。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杨玉夫”到底是个什么人。终于有一天，我茅塞顿开，原来“杨玉夫”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名字的简称，这三个人应该是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这三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就是杨余傅，不是我想像的杨玉夫，是同音不同字。这三个人都是部队里的重要人物，这么重要的人物一起被打倒了，十分令人吃惊，看起来现在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军队。那么，提前把朱成昭抓起来，接着又把跟朱成昭走得最近的

几个学生，包括我抓起来，是不是下一步就要打倒叶剑英了？我心里这样猜想。可是直到这时也没有问过我有关叶向真的任何事，更不要说有关叶剑英的任何事了。不过，即使问了，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什么事呢。

直到我出狱以后很久，在我又见到我的老战友时，他们告诉我，原来我住的这个监狱叫功德林。我从 1968 年初，一直到 1969 年初，一直待在这里。而且除了刚进来的那两个月，我曾经先后和老李、老黄、小裴同在一个牢房。在老黄和小裴调走以后，我这里又调进来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这个老干部从我的牢房调走后，这个牢房就剩下我一个人。而且，从此开始了对我的单独囚禁。

## 八、刻骨铭心半步桥

### 1. 入狱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

1968 年底，寒冬来临，严酷难熬的日子就要来了。一天晚上，我只知道这一天大约是年底，也可能是 1969 年初，但不知道是几号，甚至也不知道到底是 12 月？还是 1969 年的元月？因为我在里面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不知道月份，不知道日期。我只大概地知道季节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不会像一些小说里写的那样，用笔在墙上画道道来计算日期。我没有笔，即使有笔，监狱也不允许在墙上画。那是违反监规，会受到严惩的。姑且算是年底的一天吧，是晚上，我的牢房门突然被打开，看守站在门口，叫了我的名字，冲着我说，收拾东西，出来。我连忙把自己可怜的几件东西拿了起来，走出了牢房门口。外面站着两个专案组的军人，仍然是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向外走去。拐了几个弯，到了一块空地上，那里停了一辆小轿车，车灯开着，军人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副驾驶座上也坐着一名专案组的军人。走在前面的押我的军人，走到小车旁，把后面车门一拉，冲我说“上去”。我低头进入车内，坐在了后排中间的位置，两名押我的军人从两边进了车，一左一右坐在了我的两旁，然后对我说“头低着，别乱看”。接着汽车就开动了。我没有时间概念，只觉得开了不短的时间，在一个什么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叫我下车。

我看到我已经在一个大门里面了，接着叫我进了一间屋子，叫我脱衣服检查，我才明白我被转到了另一个监狱了。检查完了，又押着我走，拐来拐去，到了一个两层楼的门口，我觉得这个楼似曾相识。进了楼，里面是一个近似圆的厅，圆厅的四周是几个筒道的口。我突然想起，这不正是陈广智曾经带我来过的，关押联动的那个王八楼监狱吗？我知道，这里是叫做半步桥的监狱。我曾经来这里看过被关押的联动成员孔丹，而如今我成了这里的囚犯。

我没有被关押在楼下，而是带着我从一个拐角处上了楼，然后进了一个筒道，走到了筒道的尽头，把我关在了最里面的一间牢房。这个牢房的大小和我原来住的那一间差不多，但这里是一个通铺，从这边墙一直顶到了那边墙。不像原来那一间，是一大一小两个铺，两个铺的中间有一条窄窄的、大约 30 多公分宽的空间，人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来回地走动。现在这个牢房连这个狭窄的活动空间也没有了，只有从铺到门口的墙之间不到一米宽的空间可以活动，而且这个空间的一头还放有一个马桶。这个马桶是必不可少的，一整天的大小便都靠这个马桶。这个牢房比功德林监狱的牢房暖和，有一条长长的烟筒，从各个牢房墙壁顶部的一个圆洞里穿过，给各个牢房带来些微的暖气。在各个筒道汇集的中间的那个小厅里，生有一个蜂窝煤炉子。这个炉子一方面供值班的看守们取暖，另一个功能就是从这个炉子上部伸出了五个烟筒，分别通到五个筒道，每个筒道的墙壁的高处挖有一个刚刚能伸进烟筒的洞，烟筒从那里穿过。这个烟筒提供的热量虽然很少很小，但毕竟没有冰天雪地的感觉了，晚上睡觉也没有要被冻僵的感觉了，条件比前一个监狱好多了。

第二天早上，仍然是很早就催着囚犯起床了。我发现这里的光线也比原来那个监狱明亮多了，尽管这里的窗户上也是涂有白油漆，也贴有报纸，毕竟是在二楼，遮挡物较少，光线好了很多。到了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的伙食也比功德林好多了。这里不吃窝窝头了，而是白面馒头，菜里也有油水了。住了一段时间，我知道了这里的菜里还经常可以吃到肉，伙食明显比功德林强。更好的是，这里发的手纸，不再是一小片黄草纸，而是一卷卫生纸。当然，我也不敢随便用，因为我不知道多长时间发一卷。万一是三个月才发一卷，我提前用完了，后面就没得用了。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基本上是一个月发一卷卫生纸。我不用再为卫生纸发愁了。

这里仍然没有报纸看，仍然是每天学习毛语录。但是这里没有放风，我进来后，连续几个月都没有放风。一直到了春夏之交，天气已经热了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放风。这里的放风也和功德林不一样，这里的放风场是一个个的小放风场。实际上就是一排没有屋顶的房子，四周都是墙，上面是露天的，没有屋顶，但是罩有一层细铁丝编成的网。透过网眼可以看到天空。囚犯之间仍然是互不见面。采用的是一个牢房一个小放风场。放风时间明显比功德林长了，我觉得应该有半个小时或更多一点儿。我第一次放风时，进到这个放风场觉得很新奇，面积不大，大概五六个平方米，可以在里面转来转去。放风场的高处有一长溜儿走道，有栏杆拦着。有卫兵在上面走来走去，监视着脚下各个放风场里的囚犯。我感受到我们的党的监狱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隔离和单独囚禁，不允许你和任何人（包括其他囚犯）接触，你在里面永远是孤独的。放风时，先是一个牢房的囚犯进了一个

放风场，关了门，第二个牢房的囚犯才出来……永远是叫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其他人。

我搬到这里几个月后，有一天，破天荒地突然给每个牢房发了一份《北京日报》。我很惊奇，也很兴奋，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过报，也没看过书了（除了语录本外）。我接过报纸，先看了日期，是 1969 年 3 月 3 号，接着就饥不择食地打开来看，映入眼帘的却是令人极其震惊的爆炸性新闻，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的报道和中苏两国政府关于此事的声明。我简直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珍宝岛在哪里我不知道，以前也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怎么会在这个岛上发生武装冲突呢？我迫不及待地要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两国政府的声明都很长，我开始急急地浏览两国政府的声明。中国政府的声明里，说苏联方面首先向我方开枪开炮，但没有叙述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接着就是谴责批判，后面就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完了中国政府的声明，我对这次冲突发生的过程仍然不太清楚。我接着看苏联政府的声明，苏联方面的声明首先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说是中国方面一个营的兵力在前一天的夜里潜伏到了岛上。在 2 号清晨，中国的一个巡逻队越界进入苏方地界巡逻。苏方派出了一个小队前往阻止，当苏方的巡逻小队走到离中国巡逻小队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时，中方士兵突然开枪射击，打死了苏方这一小队士兵。当苏方派出部队增援时，中国这支巡逻队缓缓向珍宝岛撤去。苏方的增援部队追到岛上时，又遭到了中方潜伏在岛上的部队的伏击。看来这次冲突，苏方损失不小。苏方声明接着叙述了苏中关系这些年的变化过程，表明了苏联方面的立场。双方的声明看完了，我的思绪很乱。我相信这一次冲突应该是中国挑起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前一天的夜里先在岛上埋伏了部队。策划得那么周密，显然是事前做足了功课。但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冲突，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却理不出一点头绪。按理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很多事情都还没有搞定，内患还没有消除，不应该再挑起外部冲突啊！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没有解开的谜一样，一直存在我的心里。直到后来，基辛格访问中国，和中国密谈。接着又是在日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再接着是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签署上海联合公报……我才意识到这一系列外交成果的获得，归功于珍宝岛武装冲突。珍宝岛武装冲突是这一系列外交长剧的序幕。

1969 年 3 月 2 号开始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实在给我增加了思想压力。我担心一旦中苏大战爆发，我将永没有出狱的日子。记得我刚进来的那段日子，当时还是和老黄小裴在一个牢房的时候。有一次闲聊，不知怎么说起中苏会不会打仗的问题。老黄说，如果中国和苏联打起来了，可能就会提前放我们出去了。我问他，你怎么会这样想？老黄说，以前日本鬼子打进来的时候，当时关押的许多

囚犯只要愿意去当兵，就可以提前释放。现在如果苏联打进来，也需要有人去当兵，我们只要愿意当兵，也就可以出去了。我说，如果我们还想活着出去，那就要期盼天下太平，形势一片大好。只有国内形势大好，我们还有可能被释放出去。如果战争打起来，我们就更无活着出去的希望。你想想，现在中央文革是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的。战争打起来，当局怎么可能会把我们这些“敌人”放出去？那不是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了吗？所以一旦战争打起来，绝对不会把我们放出去，反而是我们可能会死得更快。所以我们要求求老天爷不要让战争打起来，要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出去的希望。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今中苏关系竟然会如此紧张，我真担心会真的打起来。所幸当时的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慢慢地缓和下来了。

## 2. 难忘一个女政治犯的脚镣声

搬到这个监狱之后，有几个月都没有提审我，有很长时间也没有放过风，每天都是一个人孤独地待在牢房里。这里牢房的地面和通道的地面都是水泥地面。在一楼有一个或两个关押女性的通道。我估计这里关押的都是政治犯，有一个女政治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也不知道她是哪里人和犯了什么事。只知道她是个政治异议者。她被当作重刑犯对待，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可能双手还戴着背铐。我看不见她，只能做这样的猜测。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都被提审，沉重的脚镣在水泥地面上哗啦哗啦缓慢地移动着，每走一步都要停顿一下。我听说，有的脚镣有几十斤重。可想而知，每移动一步要付出多大的力气，要忍受多大的痛苦。从楼下的通道，到楼外的水泥地面，哗啦哗啦的声音，缓慢又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的心一直揪着。我仿佛能看见她那被脚镣磨破的脚踝，还有那渗出的血，淌下的血。有一次，她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楼门口，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尊严！”她连续说了两遍，我听得清清楚楚。从这句话中，我知道了她是个政治犯，也知道了她是个女性。估计她应该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很可能是犯了攻击领导人的攻击罪。那一段时间，对她的提审十分密集，通常都是连续几天连着提审，然后又会停几天。接着又是连续几天提审，然后又会停几天。我觉得断断续续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提审的那些天，上午她戴着脚镣哗啦哗啦地磨着水泥地面由近而慢慢地远去。下午，她又带着这种令人心头颤栗的哗啦哗啦声由远处缓慢归来。可以想像得到这去和回的两段路程，实际上也是她遭受酷刑的苦难历程，这个女人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这段时间过去后，后来就再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了。

### 3. 要我写出文革中每天的大事记

到了5月份，又开始提审我了。照例是我跟着前面的提审员走，另一个提审员走在我后面。从这个两层楼的监舍走出去，对面就是一排没有屋顶的屋子，那就是放风场。放风场和监舍之间是一条水泥小路，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小门。走出小门，我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院子里。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个两层的监舍是在一个小院子里。我跟着提审员顺着大院子的高墙向前走，在我的右前方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最少有十多层，很可能是二十多层的监舍大楼。因为是在提审的路上，我没有时间把它数清楚。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监狱。再向前走了一段距离，我看到顺着墙有一排平房。提审员带我进了其中的一间审讯室。我突然想到，从我所在的小王八楼监舍到这里的审讯室，距离实在是不短，那个戴脚镣的女囚犯就这样每天走两趟，那要忍受多大痛苦啊！

我跟着前面的审讯员走进了审讯室，看见有一个个头高一点的审讯员和另一个矮个微胖的审讯员已经在里面了。照样还是先念毛主席语录，念完了，矮个的审讯员对我说，怎么样？让你考虑了这么长时间，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么长时间不提审，是要让我考虑呀！我还在里面傻等着他们在外面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呢，我还等着他们调查清楚了放我出去，我还可以继续我的学业呢！我没办法回答他的话。他又说，考虑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想清楚了，交待自己的问题吧。我还是没法回答，我只知道我没有犯罪，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问题要交待。我于是说，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问题还没交待。审讯员又叫我念了一段有关茅厕里的石头什么什么的又臭又硬的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又叫我交待问题。我还是找不出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的。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我甚至常常会后悔自己为什么在外面不犯点错误呢？如果犯有错误，现在我就可以竹筒倒豆子，统统交待了，就可以出去了。现在没有犯错误，想交待都找不到东西可交待，结果落个态度不好，反而一直出不去。

这一次提审，我以为还要追问王白莎家的事，不料这一次不问了，改问王北宁家里的事了。审讯员说，你到过王雷家没有？我说，没有，我不知道谁是王雷。审讯员说，就是王北宁家，王北宁的父亲王雷。我说，哦，那我认识，我去过他们家吃过一次饭。但是我不知道王北宁父亲的名字。审讯员说，你去过他们家，他还请你吃饭。你还说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一点儿都不老实。我说，我是去他们家吃过一次饭，是好几个人一起去的。人家是老革命，人家不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好意思随便问人家的名字呢？审讯员严厉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叛徒。我说，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我觉得这次提审在开始阶段

和上一次问王白莎家里的情况时如出一辙。接着审讯员很详细地询问吃饭那一天的所有情况，什么时候去的？和谁去的？怎么去的？都说了什么？都做了什么？等等。我心里感到纳闷，我是和朱成昭、蒋良朴等几个人去过他们家吃过一次饭，可是吃一次饭也算罪过吗？虽然我不理解是为什么问这些事，但我还是尽力回忆了那一天的情况，尽量配合，希望能尽量准确地还原那一天的原貌。我和王北宁是比较熟，因为都是老“东方红”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干部，她的家在北京展览馆。我估计她的父亲可能是那里的领导，但我从来没问过王北宁。现在突然说起她父亲的名字，我根本就对不上号。审讯员又问我是哪一天去的，我说，具体是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4月下旬或是4月底吧。审讯员听我这么说，打断了我的话，他说，4月底？又在胡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好好想想。我说，这个时间应该不会错。根据我的记忆应该是4月底，最早也是在4月下旬。这时，林克推门进来了。他相对温和地对我说，你说是在4月底，又说得那么肯定，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我说，2月份朱成昭抛出八大观点以后，中央文革叫他闭门思过。整个3月份他都在西三楼327室闭门思过，几乎不出门。到了3月底，朱成昭说，闷了一个月了，闭门思过快结束了。下个月要出去散散心，多出去玩玩。我们就商量着买4月份的月票。我、朱成昭、蒋良朴、李尤江、颜宽都买了。蒋良朴家是农村的，一张月票四块钱，他连四块钱也拿不出来，他的月票还是李尤江帮他买的。我到北京以后，只买过一个月的月票，就是1967年4月份的月票。4月份我们去玩了很多地方，十三陵、八大处、香山、北海、颐和园，都是在4月份去的。那一天我们去王北宁家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王北宁的家在哪里，我是和朱成昭、蒋良朴一起坐公交车去的。李尤江是自己从甘家口去的。我们到的时候，李尤江还没有到。后来她到了北京展览馆，不知道怎么去王北宁的家，就在大门口给王北宁打电话。朱成昭就叫我去大门口接她。我到了大门口，看到李尤江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上衣。我们4月中旬去十三陵玩的时候，她还是穿的军棉袄，现在已经穿短袖上衣了，可见那一天的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在4月底，最早也应该是4月下旬。从我元月份大串联回来认识李尤江开始，她就一直穿的军棉袄，我一直认为她是个胖子，现在她改穿了短袖上衣，我才知道她并不胖。所以给我留下的印像比较深。

林克听我说完了，眼睛盯着我，注意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觉得我应该表明一下态度，于是我说，我承认我去反革命叛徒家里吃饭了，这是个罪，我认罪。我觉得去反革命分子家吃饭是主要问题。至于吃饭的具体时间，早几天晚几天，那是次要问题，哪一天都行。如果上级觉得应该是别的时间，那我也承认。你看，我这个态度行吗？林克看着我，没有马上说话。我觉得他盯着我足足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他才把右手的食指伸出来，弯曲着，对着我的鼻子，轻轻地点了一下，

又点了一下，边点边说，你呀，要端正态度，好好地考虑自己的问题。还有哪些没交待的，没揭发的，都写出来。要老老实实，不要心存侥幸。另外，你要写出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记，从 1966 年你参加“东方红”写起，按天来写。哪一天干什么了？和谁在一起？一天一天地写出来，越详细越好。我大吃一惊，说，那怎么写啊？一天一天地写，那怎么能记得起来啊？林克说，你要端正态度，尽量回忆，可能会有些时间记不太清楚了，但要把事情写出来，接触的人写出来。时间上也要求尽量准确。你来这里是什么目的？就是来交待问题的。这里每天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你要利用这些时间把问题交待清楚。

我没有办法，为了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我只有尽力去想去回忆这些年的经历了。我问，要求我多长时间写完？林克说，你尽量写，写详细。写好了，交给看守就行了。

我回到牢房以后，就准备写两个材料，一个就是揭发王北宁父亲的材料。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写的，我就去他们家里吃过那么一次饭，而且是那么多人在一起的场合，总共也没和她父亲说过一两句话，有什么可揭发的呢？但是我总不能一句话不写吧。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老调重弹，说我又散布反动的八大观点了，选了一两个观点写了一下。就这样交了差。第二个材料就更难写了，你想想要把每天做的事情写出来，还要写出来每天和谁在一起，都做了什么？明天又做了什么，又和谁在一起……这一天一天的，怎么能记得起来呀？又不是十天半个月前的事，还可以想起来。现在要写这一两年每天做的什么事，那怎么想得出来呀？真是愁死我了。但是没办法，为了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争取早日出去，只有调动脑子里的每一个细胞来仔细想了。

我每天都在冥思苦想，从早到晚，除了睡着了，是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些年的经历。连吃饭、放风、走路都在想，连睡觉都是在想着想着睡着的。如果当时有个同号的人和我关在一起，他一定会认为我是神经了。幸亏我那时年轻，脑子好，终于把我这近两年来的经历都写出来了。我把这两年的流水账交给了看守。就等着他们调查清楚了以后，就放我出去呢。

#### 4. 逼我承认“危害毛主席安全”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有一天又提审我了。到了审讯室，是一个矮个稍胖的审讯员和一个中等个儿的审讯员在等我。没有看到林克。矮个的审讯员说，考虑了这么长时间，该交待了吧？我说，我都交待了，一天一天的，都写清楚了。审讯员丝毫不提我写的大事记，就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一样。他慢慢地说，你们在西三

楼都干什么？还玩飞镖，你们是普通地玩飞镖<sup>36</sup>吗？突然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愣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心里嘀咕了一下，我是喜欢玩飞镖，可是难道玩飞镖也需要交待吗？我当然不敢这样反问他，我只是心里这样想的。我说，飞镖我是喜欢玩，在西三楼也玩过。矮个的审讯员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直盯着我的眼，厉声说，你们玩飞镖是普通地玩吗？你们是用飞镖犯罪。你必须交待，你和谁一起玩的？是怎么扎的？扎哪里？我突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玩飞镖不会是犯罪，是不是又想牵连到什么事呢？我没法预测。我如实回答，我在西三楼是玩过飞镖，就是往门上扎扎。审讯员厉声问，都有谁参加了？说。我说，主要是我喜欢玩，一般是一边聊着天，一边往门上扎。记得朱成昭有一次也试着投了几下。审讯员追问，还有谁扎过？我说，我因为喜欢玩，随身都带着，有空就扎几下。别人都不像我那么有兴趣，可能偶尔也会扎两下，我记不清了。审讯员说，记不清了？一到关键问题就记不清了？你们在门上扎什么？我说，没什么，门是木头的，好扎，所以在屋里就扎门，在外面就扎树。审讯员更严厉地问，门上有什么？说，别避重就轻。我感到审讯员在尽力想往什么方向引，对此我又无可奈何，我只能说，门上什么都没有，我是扎着玩的。审讯员说，什么都没有？朱成昭屋里的毛主席像是怎么破的？就你顽固，你老实回答，这是看你的态度。我说，朱成昭屋里根本就没有毛主席像。审讯员接着说，你不是主犯，你还最不老实。我再问你，你说，朱成昭屋里的毛主席像是怎么破的？我明显地知道了审讯员想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可是，人家没有明说，我又能怎么解释呢？我只能说我没有在朱成昭屋里看到有毛主席像，我也不知道有毛主席像破了的事。

审讯员指着审讯室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厉声说，你过来，对着毛主席请罪。我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着毛主席像，心里一阵委屈，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审讯员追到我前面，两眼直盯着我，口气十分清晰十分严厉地说，你敢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誓，说你没有危害毛主席的安全？没有对毛主席犯罪吗？听他怎么一说，我几乎要绝望了，这还是要给我加上滔天大罪的罪名啊！我满腹的冤屈涌上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就哗哗流了下来。我觉得我的冤屈可能无法洗清了，面对着毛主席像，我极其悲愤地说，我向毛主席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危害毛主席的安全，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说完后，我就不再说话，但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审讯员没有再逼迫我，他走回到他的椅子旁，坐了下来。然后他拿着审讯笔录让我过目，我也没有心思去细看，草草地溜了一下，就推回给他。当时因为情绪有些崩溃，我甚至觉得我当时好像并没有签字。当天的审讯结束了，我又机械地跟着审讯员回到了牢房。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叹了一口气，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旦夕之间，不定会遭遇什么祸福，自己又掌控不了，只有

<sup>36</sup> 当时专案组诬陷朱成昭等人将毛泽东像贴在门后练习用飞镖掷扎毛的头面部，还声称找到了被扎坏的毛泽东像。

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上午，又是提审。继续启发我交待问题，但是没有再逼迫我承认昨天强加给我的罪名。审讯员仍然在给我施加压力，审讯员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交待问题就关你个十年八年，在这里面一直待着了。反正我们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你好好想想，你想一辈子待在这里面？我们告诉你，你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我当时真的又一次想认个罪名，争取宽大处理，能够早日出去。因为，认个罪，即使判了，也是有期限的。可是，不认罪，一直关着你，却是没有期限的。我再一次后悔为什么我以前不犯点罪呢？如果以前犯了点罪，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全部交待了，落个态度好，争取个从宽处理，我就可以早点出去了。这种想法在学校的专案组审查我时，我就有过。当时我采取了妥协，委曲求全，结果吃了大亏。如今竟然又会出现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可怕。人的思想竟然这么容易被操控，真是太可怕了！幸亏有了以往的教训，面对今天的困境，我仍能把持住自己。我绝对不能胡编一个罪名来认，因为我如果编了一个罪名，要想把这个罪名讲清楚，我就不得不再编十个、百个甚至千个其它的谎言来圆前面的那个谎言。谎言会越来越多，到后来，我甚至会连前面编造的谎言是什么都记不清了。就像把蜘蛛网缠在自己身上，越缠越多，最后把自己缠死。那就真正是死路一条了。我很庆幸对这一点我还有清醒的认识，使我不敢胡编乱造。即使我住了那么多年的单人牢房，也守住了这条底线。

这一天的提审，基本上就是审讯员不停地给我做思想工作的一天。他们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我犯了很多罪，然后持之以恒地诱导我交待问题。我也认为他们是很有经验的办案人员，但是偏偏他们抓了我这样一个并没有犯罪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交待出他们希望的犯罪事实。他们没有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一直关着我不让出来。这一天又过去了，审讯员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从此就把我撂在牢房里，冷藏了起来。不管不问，一撂就是几年，再没有提审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我还在里面天天盼着提审。因为只有提审，才有可能把你的问题搞清楚，然后才有可能出去。今天盼，明天盼，天天盼。有了这个念想，才支撑着我熬过了那孤独漫长近乎绝望的艰难岁月。

我在期待提审的煎熬中进入了 1970 年。按常规，在这一年我该大学毕业了，该参加工作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我想起了审讯员说的话，“你不交待，就关你个十年八年，你就在里面待着吧。”这不是恐吓，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我切身感受到在我们国家，专政机器的无法无天，平民百姓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手段。

在半步桥，每年要洗一次被子，每个囚犯自己洗自己的。一般都选择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找一个大晴天，每个筒道用一天的时间。从早上开始，每个牢房的囚犯先把自己的被子拆开，然后轮流去茅房把被子洗出来，洗好了马上拿到外面，在放风场前面有专门晾衣服的铁丝。在铁丝上晾好了，再马上返回自己的牢房。接着第二个牢房的囚犯再去茅房洗被子……直到这个筒道每个牢房都洗好晾好才结束。一般等到下午三四点钟，外面晒的被罩都已经全干了。再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去收回来。都收好了以后，看守就给每个牢房发针线。然后，每个囚犯在各自的牢房，自己缝自己的被子。

我在缝被子的时候，有一次该换线了，不小心针掉到地上了。我去找针，弯着腰，低着头找，竟然看不见针。在功德林的那一年时间，严重损害了我的双眼。那里牢房的光线很暗，加上营养不良，我的视力急剧下降。这时我必须跪在地上，脸趴在地上，离地面很近的距离，是鼻子几乎要碰到地面的距离，一点一点地扫描才找到了针。我这时才知道我的眼睛已经近视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了。而且，还不仅是我的眼睛受到了伤害，还有我的牙齿。我身上带来的几块钱，在 1969 年就已经用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无法再买牙膏了，我也无法再刷牙了。时间长了，我的牙上开始长牙垢，后来就发展到牙齿松动。到我出狱的时候，牙齿的情况也是糟透了。

在万般无奈的等待中，进入了 8 月份。天气酷热，我的牢房在二楼，上面的房顶都晒透了。牢房里又不通风，身上整天汗汲汲的，真是闷热难耐。我身上只穿了一个三角裤头。反正牢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也没有羞耻感了。这里冬天不是太冷了，夏天又太酷热了。

## 5. 在国庆节遭到残酷折磨

又是一年过去了，已经到了 1971 年。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时间按照它的规律在走着，我的生命也在没有希望没有期许没有感觉的孤独中消耗着，像行尸走肉般地活着。1971 年 9 月中下旬，我突然发现从某一天开始，在报纸上看不到了“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的消息了，报纸上只有“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的消息。这使我又有些不安起来，老帅们已经打倒了不少，副总理们也打倒了不少，中央文革的成员也打倒了不少，难道这还不够，连“亲密战友”、“副统帅”也会被打倒吗？我不敢相信真会这样，我也不想中国再继续动乱下去，只能再看看后续的发展吧。但是直到 9 月底，报纸上仍然没有“永远健康”的消息。我想，后天就是 10 月 1 号了，全体领导人就都会出来了。如果明天的报纸上仍然没有“永远健康”的消息，我相信是又出了大事了。

9月30号，一切似乎和往常一样。上午放茅时，我照例是把马桶倒完后，准备再接半盆清水，但是被看守阻止了。我说我接水还要刷碗洗脸。看守说，现在不能接水。等下午放茅再接。但是这个筒道的其它监室都可以接水，因为我的监室正对着茅房，我听得很清楚。我争取未果后，只好端着空盆子回到牢房。等到下午，放茅的时间到了，我听到了别的筒道都在放茅，而我在的这个筒道还迟迟没有开始放茅。我还是耐心地等着，一直到了开晚饭的时间，我们这个筒道也没有放茅。这些异常现像我虽然注意到了，但是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思考。

开始打晚饭了，这个监狱打饭的规矩和功德林不一样，功德林打饭是由炊事班把一大木桶菜汤放在各筒道交汇的地方，由各筒道的看守依次开自己筒道的牢房的门，一个个牢房的囚犯依次出来打饭。现在这个半步桥监狱，是炊事班只管送饭，不负责打饭。打饭由各个筒道的看守给自己看管的筒道打饭。通常的程序是，先打菜和主食，主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馒头（这比功德林每天都是窝窝头好多了）。看守提一小桶菜和一小桶馒头放在筒道的入口处，然后依次开牢房的门，门只是打开一个小缝，牢房里的囚犯并不出门，他只是伸手把盆和碗往门口一放，看守用勺子给他打一勺菜，再在碗里放一个馒头。囚犯拿着碗，手往牢房里一缩，看守把牢房门一锁就搞定了。一个个牢房打过饭，随着馒头和菜的不断减少，桶是越来越轻了。我是筒道最里面的一间牢房，我的对面就是茅房了。所以到我这里时，桶基本上已经空了。然后看守把两个空桶提出去，再提一桶开水来。同样是从筒道的头上开始，一个牢房一个牢房打一勺开水。

今天轮到给我打饭的时候，没有菜，却意外地在我的碗里放了两个包子。我坐牢几年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包子，我很惊奇，也很高兴。心想，明天是国庆节了，囚犯也改善生活了，我还雀跃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吃包子，一咬一大口，包子闻起来很香，但是却出奇的咸。不是一般的咸，是比腌过头的咸鸭蛋还要咸。我怀疑一个包子里可能放了一两的盐，不然怎么会这么咸呢？我停住了，我不想再吃了。我抬头看见监视孔的遮布被掀开了，看守正贴着监视孔在看我。他看到我不吃了，就打开了牢房的门，问我为什么不吃？我说，太咸了，吃不下去。他说，给你改善生活哩，还说吃不下去？他看我没有动，又说，快吃，一会儿给你打水。等我打水过来以前，你必须吃完。说罢就走了。我听见筒道口开始打水了，就强迫自己吃下去了一个包子，第二个是实在吃不下去了。一会儿轮到给我打水了，门开了，我连忙把两个碗都放到了门口，准备要两碗水。以前在功德林，刚开始时是集体号，打菜是一个盆，打水也是一个盆，水可以多打一些。但后来搬到了这里，只给了我两个不大的瓷碗，想多打点水都不行。今天的包子太咸了，我放了两只碗，想打两碗水。但是今天想打两碗水愿望都不可得。往常水都是富裕的，打不完，水都会剩下小半桶。但是今天，轮到给我打水时，水却没有了，

只剩下一点桶根儿。而且连这点桶根儿的水也不给我好好倒。看守提起桶猛力一倒，大部分水都溅到了地上，我的一只碗里只剩下小半碗水锈和一点点水，另一只碗里是一点儿水没有。我对看守哀求说，今天的包子太咸了，请多给我一点儿水吧。看守说，你先吃，一会儿再给你点儿水。说完就锁上了门。我不敢吃包子，在牢房里等着给我送水。一会儿看守过来了，打开了门，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水给我。看守两只眼盯着我说，为什么还不吃？我说，太咸了，吃不下去，我想等水来了再吃。看守严厉地说，不行，你必须吃下去，现在就吃下去。我手里拿起包子，却怎么也不想吃下去。我恳求他说，请给我一点儿水，有了水我就可以吃下去了。看守丝毫不理会我的哀求，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是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你不吃就是不服从管教，和政府对抗。你要知道对抗政府的后果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你不吃饭政府就对你没办法，你想以绝食来对抗政府，只会加重你的罪行，政府有的是办法来对付你这种顽固分子。不信你就试试！

那个时刻，我再一次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专制制度的黑暗和残忍，这个制度可以用任何方法把你整死在监狱里，而你在外面的任何亲人朋友同学都不会知道一点儿风声。为了求得生存，我只能屈服于淫威，强制自己把这个包子吃了下去。看守一直盯着我把整个包子都吃了下去，才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锁门离去。原来就已经无比干渴的我，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咸包子，那滋味更是火上浇油，难受无比。浑身刺挠得无所适从，站不是，坐不是，动也不是。我只好打报告要水喝。

打报告是监狱里的一个专用名词，在窥视孔的边上，挂有一个用小细绳拴着的小木牌。牢房里的囚犯如果有事要找看守，不可以喊叫看守，只可以把小木牌从窥视孔投出去。要等到看守巡视过来看到了报告牌，问你有什么事时，才能说给看守听，这就叫做打报告。报告打过了，我心焦地等待着。终于等到看守巡视过来了，掀开窥视孔的帘布，问我什么事？我说太渴了，想要点儿水喝。看守说，等着。把小布帘一放，转身就走了。我等着。我听见筒道的小厅里，传来水桶倒水的声音，从这个桶倒到那个桶，不停地在倒来倒去。我知道各个筒道的水桶里都剩有水，我觉得过一会儿我就可以喝到水了。可是我一等没有来，二等也没有来。很久都没有过来巡视。我忍不住，只好又打报告。又等了一会儿，看守巡视过来了，一问我还是要水喝，说，等着。又走开了。我又等了很久，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了，灯是不关的，夜里一直亮着。我躺在低矮的床上，无法入睡，浑身火烧火燎。实在难以忍受，只好又起来打报告。等了很久，看守又巡视过来了，又问我什么事？我看到看守已经换班了，换了另一个看守，我心里涌出了一点儿希望，希望这个看守能给我点儿水喝。我恳求说，我太渴了，请给我一点儿水喝。可能我的情况在他们交接班时已经交待过了，这个看守干脆地说，喝什么水？没有。我又哀求，没有开水，能不能让我接点儿自来水喝？他说，不行，等明天再

说。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我知道彻底没戏了，只好上床睡觉。但是那种难受，那种血管好像要炸开的感觉，让我受够了折磨。可以说是一夜未睡，受了一夜的罪。

第二天上午，我的牢房门外面的锁被突然打开了，门被拉开，一个看守站在门前，对我说，出来。我跟着他走了出来。心里有点纳闷，今天是国庆节，放假，难道还提审吗？我跟着他走出筒道，并没有提审员等在外面，原来并不是提审。那个看守把我带到楼外的一间平房里，指着一个低矮的小板凳说，坐下。我坐在了这个小板凳上，看守说：“说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我就把昨天晚上的包子很咸，我想要点儿水喝的情况讲了一下。看守对我说：“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专政机关！这是在你家里吗？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给你水，你就一再要水喝？你是成心和专政机关做对。你这是闹监，你敢闹监？你胆子不小啊？”我说，我只是想要点水喝，我并没有吵闹。我是按规定打报告要水喝的。看守说，我告诉你，现在是国庆节上午 10 点钟。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登上天安门城楼。你在国庆节闹监，是成心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话没有说完，他就突然飞起一脚，狠狠地踢在我的胸口上，我仰面朝天地从小板凳上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那个看守紧跟着走过来，一把就抓住了我的左手中指，他握着我的中指用力地往后掰，我被完全控制住躺在了地上。然后，他穿着皮鞋的脚就踩在我的右手掌心上，他用皮鞋后跟踩在我的手掌心上很用力地拧转。他的动作十分熟练和老到，我的手掌背贴着水泥地面，手掌心承受的是他的硬皮鞋底和他的体重。他的脚后跟踩在我的手心上，加上他全身的重量，在我的手上拧来拧去，不一会儿，我的手背就已经血肉模糊了……

这个恶看守还不罢休，又把他的脚从我的右手换到我的左手，用同样的方法，全身压上来，用皮鞋后跟踩住我的左手掌继续又踩又拧，我的左手掌很快也是鲜血淋漓。恶看守折磨完了，又把我的一只胳膊往下一拧，用活动手铐给铐住了，接着他又把我的另一只手臂一拧，也铐了起来，而且铐得非常紧。一会儿功夫，我就感到手指尖已经开始麻木了。这个恶看守看起来有 50 来岁，面色黑黄，身体精瘦，应该是个老看守。因为新来的军管的军人大部分比较年轻，没有这么大年纪的。这个老看守接着又把我押回了牢房，把我往牢房里一推，就喊里喀嚓锁上了门，然后扬长而去。我戴着背铐坐在矮木板床上，这一会儿的功夫，我已经感到我的两只手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胀了，指尖和手背已经感到麻木了。本来就觉得漫长的时间现在就更漫长了。

到了打晚饭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到吃饭的时间会不会给我临时解开手铐，不然我怎么吃饭呢。轮到该我打饭了，看守开了锁，把门拉开，站在门口看着我，我不知所措。看守见我站在那里不动，冷冷地说：“打饭。怎么？还想让我伺候你？”

我说，我被铐住了。看守厉声说，铐住了就不能打饭了？铐住了就该我伺候你了？快，打饭。我只好尝试着蹲低一点儿，倒背着身子，用已经有些僵硬的手指去够放在铺板上的碗。摸摸索索地够到了碗，并尝试着拿起了一只碗，再慢慢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再慢慢转过身来，把背后拿着的碗对着看守。看守在我的碗里放了一个馒头。我又转过身，走到铺板前，再转过身，慢慢蹲下去，摸索着慢慢把碗放到铺板上。然后又摸到了另一个碗，再拿起来，慢慢站起来，走到门边，再转过身去，把碗伸向看守。看守又在我的碗里打了一点菜。我又走回到铺板前，再转过身，背对着铺板，弯下腰，把碗慢慢摸索着放到铺板上。看守走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吃饭，我想等看守来的时候，请求他先给我解开背铐，等我吃完饭再给我铐上。一会儿，看守过来了，把门哗啦一开，厉声问道，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现在上着背铐，没法吃，能不能先给我打开，等我吃完饭再给我铐上？看守根本不理会我的请求，而是冲着我说，没法吃？铐上了就没法吃？怎么没法吃？像狗一样趴那儿吃，添着吃！我告诉你，不吃，你就是绝食，你就是继续对抗政府，只会加重惩罚，我们有办法对付你！你考虑好，吃不吃？

在我刚进功德林不久的一个晚上，我用耳朵听到了几个看守对一个囚犯实施了暴力。那时，在我震惊之余，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要有承受胯下之辱的思想准备。绝不要和专政机器正面对抗，以防被这个专政机器找到借口把你整疯、整傻、整残废。为了苟且偷生，为了活着出去，我又一次放弃了做人的尊严，屈服于淫威之下。我跪在铺板边的地上，趴在饭碗上，用嘴叼着馒头，咬一口，慢慢咽下。再咬一口，慢慢咽下。一点一点地添着菜汤，一点一点地咽下。吃下了我人生中最屈辱最难堪最不容易的一餐饭。

专政是最没有人性的，它用最残忍最冷酷的方法对付每一个不顺从它的人，威吓所有的人做它的顺民。在我出狱后，在 1979 年，我看到了张志新烈士的报道。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女性，受尽了种种酷刑。那是善良的人们根本无法想像的超越基本人性界限的酷刑，包括被轮奸，以及后来的被踩在地上割断喉管。而这一切都是官方批准和安排的，可能还有些未被公开报道出来的手段。在残暴摧残之下，把一个坚强女性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疯子，沾着自己的经血吃馒头。专政机器的残暴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会形成了这么一种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人为什么都变得没有一点人性？我至今无法找出准确的答案。

我后来看到的一些资料使我知道了，在民国时期，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关在监狱里。他最后找的那位年轻的妻子，还可以几乎每天都给他送牢饭。还可以进到牢房陪他吃饭聊天。他们甚至还毫无忌惮地公然在牢房里做爱。看守忍无可忍，不得不数次提醒陈独秀“要检点一些”，陈独秀不但不听，反而对看守

破口大骂。那是在被我党指责批判为专制独裁的民国政府时期。

我在这一天都没有解手。我不知道等到明天我要解手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大概也只有尝试着用铐在背后的手慢慢把裤子一点一点地褪下去，解完了，不擦屁股，再尝试着把裤子一点一点地提起来吧。既然都不是人了，那还在乎什么呢？

第二天，又这样趴着吃了两次饭。傍晚，我的牢房门又被打开，一个长得高高大大的年轻看守进来了。他站在门口，看着我，说，好受不好受？尝到滋味了吧？知道和政府对抗的后果了吧？我看看他，一声不吭。他接着说，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背铐太紧了，时间长了手指可能会坏死，请你把我的背铐松一点儿。他说，你不端正态度，坏死也是活该！我告诉你，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叫你知道和政府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接着，他叫我把身子转过来。我顺从地转过身子，把背对向他。他掏出钥匙，把我的背铐打开了。他又叫我转过身来，又掏出一副传统式的非活动式的手铐，从正面给我铐上了。临走，他说，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然后就锁上门走了。我坐在铺板上，看着我的两只手，手背和手指都肿了，颜色发紫，手指已经是乌色了。手掌背面满是伤痕，在水泥地上被磨破的地方，肉绽开着。两只手腕被活动手铐勒出了两圈伤痕，外皮全破，两圈凹痕嵌进了肉里，这些伤口很长时间以后才慢慢愈合，留下了很多疤痕。我戴着固定铐子，吃饭，解手都不方便，但比起背铐来讲，还是好多了。就这样大约又戴了一个星期，我戴的手铐才被解除。

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次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从我要一点儿水喝这样的小事，就发展到对我进行体罚和惩戒呢？有一天，我又在琢磨这个事，突然飞来一道灵感。我突然想到那一天我渴得无法忍受，怎么别的囚犯就没有一点反应呢？难道他们就不觉得渴吗？我突然有了这么一个设想，是不是给我的这两个包子是特制的呢？想到了这一个关键点，对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我就全部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从那一天的早上放茅开始，就已经按部就班地开始实行了。首先是放茅时，别的囚犯都可以接水带回去，唯独到我放茅时不许我接水。在我要求接水时，看守又搪塞说下午放茅时才叫我接水。等到下午放茅时，我听见别的筒道都在放茅，唯独我在的这个筒道不放茅。这样就确保了在我的牢房里没有一点儿水，以防我在干渴难忍时我可以饮用盆里的水来解渴。晚饭时给我的两个包子，肯定是专门做的。别的囚犯吃的包子肯定没有这么咸，甚至可能别的囚犯吃的根本就不是包子，他们吃的可能还是日常的饭菜。因为打饭的程序是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单独打的，每个牢房的囚犯只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别的牢房吃的是什么。在打水的时候，往常一桶水根本打不完，可是那一天却只剩下一个桶根儿。而且看守在给我打水的时候，故意提起桶猛力一倒，大部分水都冲到了地上，我的碗里只剩下小半碗带水垢的水。晚上，在我要水喝的时

候，看守又故意在筒道头上提起水桶，从这个桶倒到另一个桶，又从那个桶倒到这个桶。使我听到还有很多水，更激发我多次要水喝。第二天，把我叫出去，那个看守又专门提到“现在是 10 月 1 号上午 10 点钟，是毛主席上天安门的时候”，仍然是暗示我，说我是毛主席的敌人。以此来惩戒我，是逼我交待反毛主席的问题。一切都捋清楚了，但是我实在是没有犯什么罪，我怎么能交待得出来呢。

我每天还是认真地看报纸，“永远健康”还是没有出来，不仅是“永远健康”没有出来，而且连毛主席和所有的领导人都不上天安门城楼了。我直觉地感到“永远健康”可能是被打倒了，但是自己又不敢相信这样的结论。因为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天天和“万寿无疆”并列，并排地摆在中国的神位上，一起享受着全国人民的膜拜，一起成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寄托。突然有一天，“万寿无疆”把“永远健康”打倒了，这种 180 度的急转弯就太难解释了吧？如果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化成为了常态，那“万寿无疆”的信誉度又何存呢？难道真把八亿中国人都当成阿斗了吗？

## 九、秦城岁月

### 1. 伙食比学校好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报纸对这个事只字不提，不做任何解释。我也一直像是处在云里雾里，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每天依旧是在牢房里虚度着岁月，消耗着生命。我记不清是在 1971 年的年底还是在 1972 年的年初了，仍然是一天的晚上，我的牢房门又被打开了，看守站在门外对我说，收拾东西，快！我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物品，除了一条破烂的毛巾。一分钟我就拿好了我的全部家当，跟着看守走出了筒道，走出了这个两层的监舍，走出了监舍所在院子的小门。门外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男一女两个提审员站在车旁边。男的用手指指已经拉开的车门说，上去。我弯腰钻到了车里，坐在了后排中间的地方。男提审员跟着进来，坐在了我的左侧，女提审员从另一面进来坐在了我的右侧。前排右侧已经坐了一个提审员，司机已经坐在驾驶位上等着了，看到后排坐好了，就悄无声息地开动了车子。

我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无惊无诧，无悲无喜。汽车开行了很久，仍然在继续开行。我有个坐汽车晕车的毛病，汽车坐久了就会晕车。我已经有点儿晕车了，我希望快点能到目的地，我担心万一晕车了呕吐起来会是很大的麻烦。我强忍了一会儿，车还在开。我有点儿想吐，我恐惧万一忍不住吐在了车上，将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可能会当作政治事件来处理，

他们可能会给我安上破坏物资或对抗政府的罪名，或者是你想像不到的其它罪名，我可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我于是请求说，我晕车，想吐，能不能让我吐一下？

“老实点，别耍花招。”坐在前排的提审员严厉警告我。我被吓了一下，晕车的感觉好像也受了点遏制，我觉得减缓了一点儿。不过，过了一会儿，那种想吐的感觉又来了。我甚至想好了，万一忍不住要吐了，我要马上把上衣的前摆掀起来接住，千万不能吐到车上。我并没有被戴手铐，我可以用手做到这一点。

所幸，上天在庇护我，还没有到控制不住非吐不可的时候，车就到了。外面很黑，我根本不知道是到了何处。他们办好了交接，我跟着往里走，我看到路边还有花圃，不太像个监狱。转了几个弯就进到一个大楼里，进入了一楼的走廊，我看到这个走廊只有一边有一个个的门，另一边好像没有门。看守把我带到了一个门前，我看不见门上贴有一个号码，但是我的眼睛已经很近视了，除非把眼睛贴在门上看，否则我看不清楚，我想，可能是我的编号吧？直到我出狱，我都不知道我的编号是什么。看守打开门，我走了进去。看守在我身后把门锁上了。我打量了一下这个新牢房，觉得比我原来住的牢房好得太多了。正对着门的那一头，靠着墙放有一个单人木板床。床当然还是很矮，矮到绝对不会容下一个人能钻进去。床头贴着左侧的墙，床脚离另一面墙还有个几十厘米的距离。在一进门的右侧是一个可以冲水的下蹲式便池。便池的旁边有一个洗脸池，洗脸池上方有一个自来水龙头，这就方便多了。最令人惊奇的是，这里面还有暖气，冬天再也不用担心受冻了。在床上方的墙上，很高处，有一个很大的横长竖窄的窗户，在窗户的内侧装有铁栏杆。窗户的开启也很特别，它是从上方斜着向外面开启的。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天空，但看不到正面和下面。

我没有表，也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应该是已经过了规定的睡觉时间了。我也不多想什么，就赶快上床睡觉。牢房的灯在夜里是开着的，是长明灯，我也早已经习惯了。我躺在了床上，很自然地就面朝里面睡了起来。不一会儿，看守过来了，砰砰砰地敲门，我转过头来看，看守在窥视孔说：“脸朝外睡，不许脸朝里睡！”哎哟，这倒是新规矩呀，睡觉连翻身都不可以了，只能脸朝外睡。这是前两个监狱都没有的规矩。“历朝历代历国，哪有睡觉不让翻身的？简直是法西斯的平方，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我小声地这么嘟囔了一句。尽管我知道这里面很可能装有窃听器，监视器，我还是这么说了。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呢？管它呢。睡了一觉，想翻身了，我记起了不让面对着墙睡的警训，于是我就倒了个头睡，比如原来是头朝东，翻身后头朝西。脸还是朝外，每夜会折腾这么三四次。

第二天早上起来，才体验到这里的光线比前两个监狱，特别比功德林好太多了。我解了手。洗了脸。洗脸时用手指擦了擦牙。囚禁的条件好了，但心情早就没有了庆幸和满足的成分。长久以来，心里的所有空间都被忧愁和压抑占满了。

我只知道，肯定又是长期关押。如果短期内有释放你的打算，就不会把你又换到这里来了。不过，反正都是坐牢，这里条件好，那当然喜欢换到这里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就是在这里关了几十年，一直到关死为止。

一会儿，开始打早饭了。这里是一天三顿饭，打饭也不用出门，也不用开门。在牢房门的下方，有一个小窗口一样的方孔，这个方孔安了一个小门，在外面上了锁。打饭的时候，看守从外面把小门打开，囚犯从这个小洞里把碗伸出去，放在地上，看守把饭菜打到碗里，囚犯再把碗端回来。轮到我的时候，小门打开了，我蹲在门前，把两个碗伸出去放在了地上，我尽力向外看，看到这里用的不是铁桶，而是用一辆专门的四个小轮的送饭车。饭菜都在车上放着，送饭车远高于这个打饭的小门，看不到车上装的是什么。虽然都是同一个简道的囚犯，吃的饭菜却不一定相同。早餐是一碗大米稀饭，一个馒头和一份小菜。这还是我入狱几年来，第一次喝到稀饭。这当然是比较舒适的早餐了，和在外面时吃的差不多。早餐后开始看报纸，那时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公开批判“永远健康”了。我原来推测“永远健康”是被打倒了，但罪名竟然是叛国外逃！这实在出乎我的猜想，真使我难于置信。我想起，学校专案组给我安的罪名也是叛国外逃。一个是普通的大学生，另一个是全国全党的副统帅，这两个竟然会是同样的罪名！我不知道应该感到可气还是可笑。

不一会，开始放风了。我的牢房在这个简道是第一个门，一开始就算到了。门一拉开，看守在门口说：“放风，快！”我就急匆匆走出门去。出了简道往右拐了个弯，出了一个门，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连在一起的几十个没有房顶的格子。另一个看守已经在拉开门的放风房门口等我了。我小跑过去，进了门，身后的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每个放风房的面积大约有四平方米左右。上面露天，用细铁丝做的网罩在上面。里面的一面墙的上面是一条巡视通道，有士兵在上面巡逻。里面墙的另一面是另外一排放风房，这里是两排放风房。我也没有专门数过，大约共有三十多间吧？在里面可以晒晒太阳，可以看看天，可以转转小圈子。我在里面仰着脸，望着天，看着云，随随便便地慢慢移动着。放风时间比较长。我体力已经很差了，时间长了，我就感到累了，不想动了。地面不是水泥地面，是土地面，墙角处还长有一些青草，我就蹲在那里看青草。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多小时吧？放风结束了。我们又按顺序一个一个地回到了各自的牢房。

回来后又看了一会儿报纸，就到了午饭的时间了。午饭也不错，一个荤素搭配的炒菜，一个馒头。我是从小就吃食堂伙食的，吃饭也不挑剔，我觉得味道不错，比学校的伙食还好。

下午的时间就觉得漫长了，报纸看完了，无所事事了。我只好在屋里慢慢走，我转过了四个墙角，发现有三个墙角都有蜘蛛网，蜘蛛网上都有蜘蛛。只有靠门

的那个墙角没有蜘蛛网。我看到的蜘蛛的种类还不相同，我就凑近蜘蛛网观察蜘蛛。我发现我的牢房里有三种蜘蛛，一种是最常见的那种腿又细又长的，像踩着高跷走路的那种淡黄灰色的蜘蛛。一种是肚子圆圆的，背部是黑色带白点儿的，腿短短的胖乎乎的蜘蛛。另一种是长相有点像乌贼，蜘蛛腿全部向前撮着，颜色有点像干枯的叶子的那种蜘蛛。我从此找到了打发时间的场所，我开始观察蜘蛛的日常活动，蜘蛛成了陪伴我在这里度过春夏秋冬的生灵。

晚饭来了，一个馒头。一份有荤有素的炒菜。我并不是一个讲究吃喝的人，老实说，我对这里的伙食很满意，特别是，这里还不断地变换着花样。比如，早餐有时会换成打有鸡蛋的面疙瘩汤，或者是伴有奶粉的稀饭。中午或晚上的主食有时会换成大米饭等。

过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晚上我睡觉时，看守又敲我的门，他在窥视孔对我说，你可以脸朝里睡了。这样我晚上睡觉也可以来回翻身了，不用再颠来倒去折腾了。

## 2. 狱中阅读马列著作的另类体会

每天有一份报纸，都是批林批孔的内容，还透露有一些“571工程纪要”政变的内容。但对这些内容我都不太感兴趣，我只是浏览一下，并不仔细去看。我感兴趣的是这里还可以看到书。那是我刚搬到这里不久的一天上午，看守喊了一声：“借书了！”我高兴起来，原来这里还有书看！看守推了一辆送餐用的小推车，小推车的下层堆了一些书。轮到我的时候，门下方打饭的小窗口打开了，我趴在窗口处用手扒拉那些书，绝大部分是马恩列斯的书，另外还有一些鲁迅的书，没有别的书。我问看守，多长时间换一次书？看守说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我就挑那些厚的书看。我决定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起，我最先借的就是《资本论》。《资本论》我早就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读过，我想看看《资本论》到底是讲什么的。有了书看，我的日子就好打发了。我每天所有的空闲时间几乎都在看书，中间想让眼睛休息一会儿时，我就到墙角去观察蜘蛛。一个星期以后，书看完了。没有搞清楚的地方，我就反复看。

我猜测我所在的监狱可能是秦城监狱。除了秦城监狱，全国还有哪个监狱会有这么好的条件呢？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是什么地方。一直等到我出狱后才确认最后关押我的监狱就是秦城监狱。我从高中时候开始就成了一个狂热的毛分子，对毛十分崇拜，是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资本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是类似于《圣经》的殿堂级的著作了。所以我想看看这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是怎么说的。可是，在我看完《资本论》后，我感觉非常失望。这部被捧为共产党人圣典的书，其实根本就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书的大部分只是

一些手稿的凌乱堆积。这本书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资本论》这本书中，只有剩余价值学说这一部分是相对完整的，其余的都是不知所云的手稿。《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学说，因为只有剩余价值学说成立了，马克思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指责才会成立。然后工人反对资本家才有合理性，然后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有正当性。为此，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理论做了大量的论述。他先赋予商品有一个价值，然后说这个价值有多种含义，什么商品本身的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社会价值，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马克思学说里的商品的价值是计算不出来的，而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资本家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成本都是可以计算得清清楚楚的。但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说得十分抽象，绕来绕去，越说越糊涂，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这些论述在我看来其实非常简单，马克思思想说的那个价值，其实就是产品的生产成本，这样说，一目了然。一个产品的生产成本是一块钱，资本家卖了一块五毛钱，这多出来的五毛钱，马克思叫它剩余价值。并且说，这个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这个剩余价值应该归工人，资本家拿走了是不合理的，所以工人应该把这个剩余价值夺回来。如果像我这么直接地把这个事讲明白了，那工人就鼓动不起来了，工人也不会去反对资本家了。所以马克思不这么讲，他云里雾里绕圈子，使工人都相信了资本家夺走了他们的剩余价值，鼓动着工人去革资本家的命。《资本论》除了剩余价值这一部分还可以自成一体，成为比较完整的一部分外，其它章节实际上是支离破碎，不知所云。恩格斯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为马克思的这个手稿修修补补，也还是不能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更不能算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我接着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集一集地看。我看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录，更是令我大开眼界，使我对马克思的人品产生了质疑。马克思从年轻时起就没有正式工作过，他入赘到比他大四岁的燕妮家里，而且一直跟着燕妮生活。燕妮家是富翁，实际上马克思是靠燕妮养活的。在马克思认识了恩格斯后，就开始不断地给恩格斯写信，隔三差五地向恩格斯要钱花。很多信件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要钱。要钱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这些信件使我对马克思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在我的脑海里绝对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形像了。

随后，我开始看《列宁全集》。看了十几卷后，还能让我记住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剩下三点：一点是俄国的那些革命者在流放地的生活还是很自由的，甚至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可以聚会，可以过生日，可以举办派对，可以聚餐，可以讨论他们的革命。他们仅仅只是远离了大城市而已。这令我十分惊疑，我原来一直以为他们是被流放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吃尽了苦头，绝对想不到他们竟过得那么惬意。他们总是说沙皇如何如何残暴，我一直信以为真。可是从列宁自己的这些书信里反映的情况，我反而觉得沙皇对他的子民是很仁慈的。像这些

反政府的人物，他们在流放地还可以自由地讨论革命。而我崇拜的列宁，在他把沙皇推翻后，却把沙皇全家老小都杀害了，连几个年幼的小孩子都不能幸免。在列宁和斯大林掌权的苏联，如果有谁敢反对政府，那是格杀勿论的，哪里还会把你送到流放地去？第二点，列宁描述在沙皇时期，一个地方监狱的狱警对囚犯动粗，进行了肉体折磨。囚犯告了对他动粗的警察。沙皇的政府，随即把这个对囚犯施暴的狱警送上了法庭，并且被法官判处了徒刑。但是，列宁还是认为沙皇的政府判决不公，偏袒了狱警。号召人们推翻沙皇的暴政。我想到在列宁斯大林夺权后，他们的警察，克格勃，对囚犯的体罚不是家常便饭吗？又有哪一个警察被判过刑呢？更有哪一个囚犯敢去告警察呢？如果你敢去告警察，那不等于你去找死吗？第三点，在列宁执政后，他在内部谈到经济政策时，说，应该给工人提高工资，以提高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在提高工资后，随即要提高物价，再把多付出的钱收回来。这确实又使我的心打了一个寒战。我觉得，像列宁这个级别的革命领袖对人民也是伪善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就是这么说的，这实在使我难以接受。我感到革命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参加的，因为我太平民化，既有善恶感，又有是非观，用党性泯灭人性，我做不到。我觉得我不太容易能融入革命的队伍。

在以后的日子，我主要是看《斯大林全集》了。我大约看了二十多卷《斯大林全集》。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对布哈林的斗争占了很多的篇幅。这些文章具有强大的洗脑作用，以至于影响到我的判断。当时我认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机会主义分子，是苏联革命的敌人。直到我出狱以后很久，当我又看到一些其他的数据后，才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

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非但没有把我变成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反而改变了我原来的世界观，使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把我从一个马列主义者，一个毛分子，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

### 3. 墙角的蜘蛛成了我漫长囚禁岁月的室友

我对蜘蛛的观察越来越深入，我对蜘蛛的生活习性也了解得越来越多了。蜘蛛的捕食过程令人吃惊，任何碰触到蜘蛛网上的昆虫都很难逃脱被蜘蛛吃掉的命运。蜘蛛躲在蜘蛛网的一角，只要昆虫碰触到蜘蛛网，就会被蛛网粘住，在昆虫还在蛛网上挣扎时，蜘蛛会迅速地冲出来，用两条后腿把蛛丝撩起来飞快地把猎物缠住。蛛丝是从蜘蛛的肛门分泌出来的，有极高的粘性和韧性。蜘蛛先用蛛丝把猎物缠上几十圈，把猎物基本控制以后，就会用嘴在猎物的腿上，或在猎物边缘部位迅速地咬上一口。咬这一口是为了注入毒液。然后，蜘蛛就会退到一旁，

静静地等待。我觉得蜘蛛的毒液有很强的麻醉作用，猎物在网上拼命挣扎大约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一动不动了。这时蜘蛛才大摇大摆爬到猎物旁边，用两条后腿，轮流地从肛门处拽出蛛丝，一圈一圈地把猎物包缠起来，两条后腿的动作十分迅速，可以用飞快来形容。一会儿功夫就把猎物缠得像个蚕茧一样，包裹得严严实实。这时，蜘蛛才会急不可耐地趴在猎物身上，隔着蛛丝茧的皮，咬开一个缝隙，再一口咬在猎物身上，再不松口，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吸食猎物。它完全不需要挪动地方，就可以把整个猎物吸干净，只剩下一个空壳。我觉得蜘蛛的毒液除了有麻醉作用外，还有重要的溶化作用，它可以把猎物体内的任何器官都溶化成液体，以至于蜘蛛趴在猎物的旁边，不需要挪动身体，只凭借着蜘蛛咬开的一个小口，就可以把猎物的整体都吸食掉，不管是什硬物什么器官，一点不剩，只留下一个空壳。对于大的猎物，它可以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几天几夜，一直到把整个猎物吸干，吸成空壳为止。我看着蜘蛛的肚子不住地胀大，圆滚滚的，真担心它会被撑破。但是它不会被撑破，它竟然那么有韧性。我可以大胆地推测出蜘蛛分泌的毒液的这两个作用，就是强烈的麻醉作用和强烈的溶化作用。有一年的春天，我在放风场里看见了一只蝗虫，不是太大，大约有一寸长。我突发奇想，这么大个儿的家伙，又会蹦又会跳，不知道蜘蛛能不能对付得了它。我抓住了这个蝗虫，握在手心里。等放风结束后带回了牢房。我选择了一个长腿蜘蛛的网，我把手放在蜘蛛网的上方，一松手，蝗虫就掉在了蜘蛛网上。蝗虫拼命挣扎，两条长腿不停地弹腾，踢断了好几根蛛丝，把蛛网踢开了一个大洞，但是蛛丝还粘着它，它的身子还挂在网上，还没有掉下去。这时蜘蛛已经飞快地冲了过来，熟练地用两条后腿把屁股眼里的蛛丝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去缠那个挣扎的蝗虫。蛛丝粘性很强，韧性也很强，蝗虫的挣扎变缓慢了。蜘蛛又迅速地扑过去，对着蝗虫的一条腿咬了一口，然后就退到了蜘蛛网边上躲了起来，静静地虎视眈眈地看着它的猎物。蝗虫的挣扎越来越缓慢，大约一分钟后，蝗虫就一动不动了。蜘蛛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用两条后腿飞速地扯着蛛丝进行着缠绕工程，我感觉有点儿像唱戏的武生用双手耍花枪那样的动作。一会儿功夫就缠成了一个蚕茧一样丝袋子，里面包裹着的是一动不动的蝗虫。这只蜘蛛趴了上去，咬住了这只蝗虫的边沿部位，再不松口。这只蜘蛛连着吸食了几天，肚子胀大了几倍，也可能是十几倍，但它的肚子竟然没有被撑破，还是完好无损。蜘蛛把整个蝗虫吸食干净后，咬断了挂这个茧状物的几根蛛丝，然后用两条后腿一蹬，那个包裹着蝗虫的茧状物就掉在了地上。我捡了起来，拿在手里仔细观看，轻得几乎没有分量。里面的蝗虫只剩下一个几乎透明的躯壳，躯壳里面已经完全空了！是一种什么物质，竟然能使蝗虫的躯体包括所有内部器官全部溶化成液体状呢？我想像不出来。我当时曾想，我如果有朝一日能出去，我就研究蜘蛛，把这个谜解开。

蜘蛛在长大的过程中，会脱皮，就像蛇蜕皮一样。小蜘蛛长到一定的程度，外壳限制了它继续长大，它就会开始蜕皮。它蜕皮的时候，会倒挂在蛛网上，自己用蛛丝把自己的一两个长脚固定在蛛网上，一动不动地吊在那里。蜘蛛的外壳会慢慢变得透明。然后，它的后背处会慢慢开裂。开裂到一定程度，蜘蛛就会用力把身体往外挣。等背部挣脱出来后，八条长腿再慢慢挣脱出来，蜕皮过程就算完成了。从开始挂在蛛网上等待，到蜕皮结束，要两三天的时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在这期间，它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也没有任何逃跑的能力，很容易被路过的其他蜘蛛吃掉。我曾经看到过一只蜘蛛挂在网上等待蜕皮时，正好碰到另一只蜘蛛从这里经过。这只蜘蛛算是碰到了一顿大餐，迅速地用蛛丝把它缠了起来，又把它吸成了一个空壳，然后扬长而去。

蜘蛛生殖的特点，我刚开始时全然不知。看到蛛网上突然多了很多小蜘蛛，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在牢房里连续观察了好几年，才弄清楚了蜘蛛生育的整个过程。首先说一说雄雌蜘蛛的区别，雄蜘蛛的外形很像个干瘪的葵花籽。雌蜘蛛的体型显得比较富态，下半身是圆鼓鼓的。雄蜘蛛很少自己织网捕食，我还真不知道它们吃什么，是怎么生存的。在我的牢房里，我没有见过一张雄蜘蛛的网，也没见过雄蜘蛛待在网上等猎物。我看到的雄蜘蛛，都是不停地到处游走，显得很忙碌。不知道它是从哪里爬过来的，它爬到蜘蛛网上只是寻求交配。交配完了，它就离开。我也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它们又爬到哪里去。

蜘蛛的生殖器官更是特别，以至于在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干瘪的蜘蛛用头顶着另一个胖蜘蛛的肚子时，我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雄蜘蛛的生殖器长在它的头部，是两个伸出的像触须一样的东西。而雌蜘蛛的生殖器则长在它的腹腔上，好像人的肚脐所在的位置。雄蜘蛛在寻求交配时，先是爬到雌蜘蛛的网上，在网的边上停下来，然后它会抖动蛛网，发出求爱信号。如果雌蜘蛛同意了，也会轻轻抖动蛛网做出回应。然后这两只蜘蛛会慢慢爬到蛛网的中间去。雄蜘蛛会继续抖动蛛网，雌蜘蛛则会趴在网上一动不动。然后雄蜘蛛会慢慢靠近，再慢慢地用头部的触须抚摸雌蜘蛛的腹部。如果雌蜘蛛仍然不动而任其抚摸时，就是其同意交配了。这时雄蜘蛛就会慢慢地把它头部的两只触须伸到雌蜘蛛腹部的圆孔中去。大约在里面停留十几分钟的时间，射精完了以后，此时雌蜘蛛还有几秒钟的呆滞期。这时雄蜘蛛要把触须拔出来，然后迅速离开雌蜘蛛，离开这张蛛网。如果稍有迟缓，没有及时离开，等雌蜘蛛从迷离中清醒过来后，就会毫不迟疑地用蛛网把雄蜘蛛捕获，用蛛丝裹起来，把雄蜘蛛吸干，也就是吃掉。我在牢房里看到过这种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但是绝大部分雄蜘蛛都安然无恙地离开了。雌蜘蛛在受精后大约一两个星期，就会排出受精卵。在排卵以前，雌蜘蛛会静静地待在蛛网的中央部位等待着，突然，从它的腹腔口涌出了一大团

白色的东西，好像一个小型的爆炸一样，很快很迅速，像变魔术一样，喷发了出来。而且喷发出来的东西的体积，看起来似乎比雌蜘蛛的腹部还要大，有点不可思议。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情况时，我惊呆了，我还以为是它的肚子破了，后来才知道是它产的卵。不是一粒，而是很多很多粒，粘在一起。随后，雌蜘蛛就用它的拿手好戏，用蛛丝把这些卵层层包裹起来，吊在网上。很像一个小蚕茧。排出的受精卵通常要经过一个多星期到三个多星期的孵化时间，孵化期的长短取决于气温的高低。如果是夏天，气温很高，只要一个多星期，这些卵就孵化了。如果是冬天，虽然屋里有暖气，温度仍然偏低，则需要三个多星期才能孵化出来。孵化成功的这一天，小蜘蛛出壳的情景也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孵化出来的第一个小蜘蛛咬破了茧壳，爬了出来。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小蜘蛛蜂拥着爬了出来，它们的出生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蛛网上就爬满了小蜘蛛，有几十个，上百个之多。这些小蜘蛛在网上不多停留，就迅速地四散开去。似乎它们也知道，它们的母亲的母爱只有不多的一天时间。过了这个时间，那些仍然停留在网上的小蜘蛛就会被它们的母亲毫不留情地吃掉。我十分感慨我有幸托生为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受到父母的关爱，从嗷嗷待哺，蹒跚学步，再到呀呀学语，无时不在父母的关照之中。看看这些小蜘蛛，它们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完全独立的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凶险的世界，它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尽快离开它们的出生之地——蛛网，这是它们母亲的领地，它们如果离开得晚了一些，就可能成为它们母亲的腹中之物。没有谁教它们，也没有谁帮它们，这些弱小且无知的小生命，要四散开去，去闯荡一个危机四伏的莫大世界，它们要面对雨雪风霜，要躲避无数的天敌，去寻找一个适合它们布网建巢的生息之地。

我在秦城的四年时间，没有提审，也没有人和我说话。是这些蜘蛛们帮我度过了这段孤独又漫长的岁月。我每天都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观察蜘蛛，它们成了我的宠物，我的室友。

#### 4. 弟弟来探监

1974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吃完午饭不久，我的牢房门被打开了。看守站在门口对我说，出来，提审。

提审对我来讲也已经久违了。我出了牢房的门，见到了两个提审员，都是我熟悉的面孔，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我跟着他们走进一间审讯室，看到里面已经坐着两位也是我熟悉的提审员。他们用手指一指桌子前面的凳子，说，坐。我坐了下来。他们看着我，没有说话。我也静静地坐在那里，等他们说话。大约过了几分钟，他们其中一个才问我，你有没有一个弟弟叫张华南？我说，有。

他又停了下来，不说话，似乎在等着我说什么。我继续沉默地坐在那里，没有反应，一动不动。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弟弟来看你了。上级领导也批准了你们见面。但是有一些限制，就是关于案情和这里面的任何情况都不许说。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我听明白了。他用手朝门口指了指，说，走吧。

我跟着他们走，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大房间，可能是接待室。我走了进去，看到有几个人分别坐在几个沙发上，有林克和另一个审讯员。还有一个穿蓝衣服的年轻人。穿蓝衣服的年轻人看见我进来，呼一下站了起来，个头比我还高。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哥！”就抓住了我的手。我定睛一看，真的是华南，只是长大了，脸型没有怎么变，个子长得高多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还在上小学，个子大约才一米五几，现在都快有一米八了。我多年以来寂静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双手抓住他的双臂，上上下下打量起来，我难得地笑了一下，说：“哟，都长成大人了，长得比我还高了。家里情况怎么样？给我说说。”

我们俩手拉着手一起坐在了长沙发上。我弟弟告诉我，爸爸分到了平顶山的五七干校，妈妈分到了信阳专区的幼儿园了。大妹妹先下乡去了洛阳地区的一个公社落户，最近刚分到偃师摩托车厂工作。小妹妹下乡去了信阳的一个农村公社，现在是公社的赤脚医生。小弟弟当了兵，在南京部队空军当通讯兵。华南他自己因为有病留在了城市……

我忙问，是什么病？我弟弟说是肺结核，已经快好了。我问弟弟，你怎么找到我的？我弟弟说，你这么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人都很着急。但爸爸妈妈还不方便出来，两个姐姐都下乡了，想出来都要请假。小弟弟当兵在外地。只有他自己有时间，所以就来北京找我。他先跑到学校找我，学校说，得找公安局。我弟弟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查我这个人。等了几天，公安局才告诉他，公安局没有这个人，要去问公安部。我弟弟又去找公安部，又等了一个星期，才通知他，今天可以来看我。我问他，你在北京待了这么久，住在哪儿呀？我弟弟说，住在二舅家。我二舅是北京市一个中学的校长。留的联系电话也是二舅办公室的电话。多少年来，我都不敢想家里的事。这么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人该多么着急呀！可是没有办法，我只有硬挺着，不去想。天天去想，人是会发疯的。现在见到了我弟弟，家里人的情况也大致了解了，我心里无比舒畅。担心家里人的这个包袱终于可以不背了，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会见的时间很快结束了，林克对我说，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事要给家里交待的，就给你弟弟说吧。我知道这是他在礼貌地提醒我，会见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问林克，我想托我弟弟替我写一封信，可以吗？林克毫不犹豫地说，可以，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对我弟弟说，以前在广州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朋友，现在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你替

我写封信，向她问个好吧。我弟弟说，她要是问起你的情况，我怎么告诉她呢？我说，如实告诉她，这怎么能隐瞒呢？一定要如实说。我弟弟又问，怎么和她联系呢？有联系地址吗？我转头看向林克，问他，我可以把地址告诉我弟弟吗？林克竟然罕见地对我笑了一下，说，可以可以。我就对我弟弟说了地址，广西横县城关×街×号××收。我弟弟记在了本子上。

会见结束了，我弟弟给我带了两包水果糖要留给我。我不要，要我弟弟带回去。我弟弟不肯。我说，我怎么能一下子吃这么多水果糖呢？你带回去给家里人吃吧。这时，林克对我说，你带回去吧，那么远给你带来了，你拿回去慢慢吃。我才接过了这两包水果糖。

我跟着两个提审员要回去了，我弟弟恋恋不舍地看着我。我挥了一下手，扭头跟着提审员走了。回到牢房，心情还很激动，平静不下来。我拿了一颗水果糖，放到了嘴里，嘴里感到甜丝丝的，心里也感到甜丝丝的。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感到很开心。我不再考虑我的前程，我只想享受我目前拥有的好心情。我弟弟带来的水果糖我每天只吃一颗，我要回味得长久一些，我连续吃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我都感到开心，不那么烦躁了。

## 十、在农场劳改

### 1. 出狱但不是释放

1975年4月的一天，那时我弟弟带来的水果糖已经吃完了。我的牢房门又是突然打开了，看守站在门前，简短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

我迅速地整理了自己的几件物品，就走了出来，跟着前面的看守走，后面另一个看守走在我后面。走到了和我原来的牢房平行的另一个监舍楼的走廊里，来到这个同样也是一楼的筒道，走到一个牢房的门口。不是头上第一个牢房了，而是比较靠中间的一个牢房。看守拉开了门，我走了进去。我背后喀嚓一声，看守就把牢房门锁上了。

这个筒道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几个人。我从打饭的声音和放风时开门的声音就能听出来。第二天放风时，我正在放风场慢慢转悠，丝毫也没有料到，我的放风场的门被一个人一下子拉开了。门口站了一个年轻的女子，穿了一身白衣服，左手端了一个托盘。她冲着我说，过来，吃药。我走到门口，才看清楚这个年轻的女护士眉目清秀，长得还相当漂亮。我说，吃什么药？我没有病，不吃药。女护士以不容争辩的语气说，叫你吃药就是你有病，快吃。我只好接过药，是一个白药片，我放到了口里，又接过她递来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把药咽了下去。

女护士接着说，张嘴。我张开嘴，她往我嘴里看了一下，见药确实咽下去了。就把放风房的门喀嚓一关，离去了。

放风以后，我回到牢房，就觉得没什么精神了，光想打瞌睡。可是这里除了晚上睡觉时间，平常不允许睡觉。这使我非常难受，只好不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实在忍受不住时我就坐在铺板上打瞌睡。

第二天，那个女护士又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在放风的时候，是我在牢房的时候。这次她没有开门，而是拉开了门上面的一个小窗口，又递给我药叫我吃。我说，我没有病，不想吃药。吃了药直打瞌睡。她说，那就对了，叫你吃你就吃。她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不容辩驳，是命令式的。我无可奈何，只好把药又吃了下去。她又叫我张开嘴，检查了我确实把药吃下去了，才关上小窗口离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要让我吃药，尽管不情愿，但又不能抗拒，只有服从，任人摆布。

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到了5月份了，不知道是几号，我的牢房门又被打开了。看守站在门前说，提审，快。我走出门，跟着提审员到了询问室，另两个提审员已经坐在那里了。其中一个用手指指前面的凳子——这里的凳子不是半步桥和功德林那里的方木凳，而是形状像个大腰鼓一样的，质地像陶瓷一样的圆墩墩，示意我坐下。我坐了上去，等着提审员的问话。提审员看了我一会儿，没有马上说话，又看了我一会儿才问我，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没法回答，“怎么样啊”，我怎么回答呢？我没有回答，没有说话。又停了一会儿，提审员说，现在给你宣布一个决定。他又定睛看了看我，才接着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放你出去，接受劳动锻炼，等候审查结论。

他说完了，继续看着我，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没有激动，没有兴奋，继续静静地木然地坐在那里。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流，和外界隔绝。我都怀疑我还能不能顺畅地讲话，还能不能和外界正常地交流。我只是听明白了提审员说的话，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能说什么，又该说什么，唯有沉默。

提审员看到我没什么反应，又对我说，组织上给你发了一套新衣服，你先回去，把衣服换上，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即刻就走，学校的人来接你了。

我跟着提审员回到牢房，换上了新衣服，是一套蓝色的像中山装一样的衣服，我觉得好像跟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前不久刚被释放的战犯发的衣服一样。我一无所有，基本上没有任何物品可带走的。我只是对牢房又打量了一下，就转身出来了。

我跟着提审员走出了筒道，走出了监舍大楼，走上了通向大门的一条水泥路。路的两旁还有花坛，花坛里还种着花，花还开着。出去的大门口还有一个接待室，两个学校的人在那里等我。我认出了其中一个是任继存，他是我们学校保卫科的。

后来我才知道，学校的保卫科已经升格为保卫处了，任继存也已经升为保卫处长了。我跟着他们坐上了学校派来的吉普车，驶离了这个我住了四年的叫秦城的监狱。

我原以为会回学校，不料却直接开到了火车站——北京站。任继存说，为了战备的需要，防止苏修侵略，北京的大专院校都迁出了北京。我们学校已经迁到湖北了。我们现在直接去武汉。上了火车，是卧铺车厢。上中下三个铺位，我睡中铺，他们两个，一上一下，还是夹着我。傍晚，车上开始卖晚餐了。任继存他们两个准备买盒饭。任继存问我，你要不要？我当然想要，可是我身无分文，怎么买呢？我只好说，我不要。我听见他们两个在吃饭，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

## 2. 荆头山农场劳改的日子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汉口。我跟着他们两个下了车，到了原武汉地质学校的招待所住下了。我们学校搬到了湖北，原来选的校址在江陵。后来中苏局势缓和下来，学校又改在武昌喻家山建新校址。这样一来，原先的武汉地质学校就并归到我们学校来了。在汉口地质学校休息了一天，我又和任继存他们两个坐吉普车去了江陵。在江陵我们学校的筹备处住了几天。学校知道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些天的花费都是学校给我出的。我现在可以享受阳光，可以和周围的人交谈。但是，多年的单独囚禁已经彻底改变了我的性格，由原来的活泼好动，快言快语，变成了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不善交际。

几天后，任继存找我谈话。他说，上级指示，要安排你劳动锻炼。可是我们学校刚刚筹建，不具备这个条件。上级决定先把你安排到一个国营农场去劳动锻炼。我问是什么地方，他说，是湖北阳新县荆头山农场。你在那里一边劳动锻炼，一边等待对你的审查结论。你有什么顾虑，可以说出来，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帮你解决。

我说，我并不怕去劳动，只是我现在体力没有恢复，从小又没有做过农活。那里的农活重不重，我能不能干得了，特别是，在那里劳动有没有定额，我都不知道。如果有定额，万一我完不成，会不会因此又惹上麻烦，增加新的罪名，加重对我的处罚？这是我最担心的。

任继存说，这个你放心，我们会给他们交待清楚的。你是去劳动锻炼，不是监督劳动。能干多少是多少，只要不是故意偷懒就行了。另外一点，你要注意，这是上级部门对你的要求，就是到了那里，不要说你的来历和你的身份。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来的，除了名字，什么都不要说。你以前的经历都不能说，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你听清楚没有？

我问，如果当地的领导问我，我也不说吗？任继存说，那也不能说。我们会给他们打招呼的，他们也不会问你的。我说，那好，我听清楚了，我不会说的。

任继存接着又说，还有一个规定要你遵守，这也是上级对你的要求。我说，什么要求？你说吧。任继存说，你现在去劳动，是在等候审查结论。在审查结论下来以前，你在农场可以和家里人写信，但来往信件必须经过农场保卫部门检查。农场会专门安排一个保卫干事负责这件事。你写好了信，先交给保卫干事审查，然后由他给你寄出去。给你来的回信，保卫干事看完后再交给你。这是规定。

我听了这话，心里虽然感到相当不舒服，但自己本身还不是个自由人，除了服从还能怎么样呢？总体上，特别是对我的劳动安排上，我还是很感谢学校对我的关照的，我还是稍稍心定了一些。要不然，到时候劳动完不成定额，就说你对抗政府，或者说你破坏生产，对你进行批斗，或者再给你加个什么罪名就麻烦了。

我没有被褥，任继存就从学校的招待所里给我拿来了一套被褥和枕头，还有蚊帐，湖北的蚊子很多。第二天一早，我跟着任继存他们俩又坐上吉普车动身前往阳新县。路上，我晕车，中间休息了几次，每次休息时，我都下车转一转，缓和一下，然后再走。开了好几个小时，到了阳新县委。

我们进了一个接待室，阳新县的一个负责人，是书记还是副书记，我记不清了，已经等在那里了。同时等在那里的还有一个荆头山农场的陈子善副书记。入座以后，阳新县委书记把农场的陈副书记介绍给我们，说，这是荆头山农场的副书记陈子善同志。又把任继存介绍给陈副书记。他指着任继存对陈副书记说，这是上级领导。然后就说，具体的事，你们慢慢谈，我就不参加了。说完，他就回避了，离开了。随后，农场的副书记陈子善就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大致情况。他说荆头山农场在刚解放时是一个劳改农场，1958年前后开始改为国营农场。接着介绍了农场的一些概况。然后就转入具体问题，说是准备把我安排在综合队劳动。显然，在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充分沟通过了。队长姓张，是个老同志，安排我和张队长住一间屋子。又说，综合队自己有一个食堂，场部也有一个食堂，看看我想在哪一个食堂吃饭？任继存问我的意见，我说，既然在综合队劳动，就在队里的食堂吃饭吧，这样方便些。陈副书记又介绍了农场的收入情况。他说，农场的一个男劳力每个月的收入在二十七八块钱到三十一二块之间，每个月会有不同，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内。接着就商量我的生活费，任继存对我说，和一个男劳力大致持平吧，高了会脱离群众。他问我，一个月三十块，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可以，我也花不了多少钱。另外，还说好了，我跟大家一起劳动，量力而行，不设定额。农场工人是半个月休息一天，我也是一样。农场有卫生所，我看病享受农场工人待遇，享受公费医疗等问题一一进行了确定。随后在县委招待所食堂简单吃了点儿午饭。任继存等二人就和我告辞回去了。

我跟着陈副书记走到了一条河边，陈副书记说，农场有自己的船队，专门跑运输。我们就坐农场的船回去。我们在码头上了船，是一艘木制的机动船。一会儿，船发动了，沿着这条河顺流而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农场地界。张队长已经在码头边上等我了，他帮我拿了东西。我跟着他到了住的地方。那是一排平房的第三间。这一排房子的第一间住的是农场商店的党支部书记，第二间是综合队的办公室，会计和统计都在里面办公。第四间是武汉来的一个下乡女知青，她现在已经是农场中学的老师了。我住的这间房里面有三张床，里面一张是张队长住的。张队长的对面那张床住的是队里的统计，他同时也是队里的团支部书记。靠门口这一张床是给我住的。张队长对我说，你睡的这张床原来是队里的会计住的，知道你今天要来，他昨天就搬到另外的地方了。我铺好了被褥，挂好了蚊帐，一切都就绪了。傍晚，张队长领我去队里的食堂吃饭，食堂很简陋，没有桌子凳子，只有一个用来做饭的烧柴禾的大炉灶，和一张切菜用的大案板。吃饭都是蹲在地上吃。

第二天就开始出工了，由张队长安排活。开始几天都是和张队长在一起干活，张队长对我比较关照，安排的活我还都能干得了。队里有几十个劳动力，男男女女都有。他们看到我这个新来的，也十分好奇，东问西问，但我什么也不说。张队长也制止了他们问我。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有点儿来头，私下里议论纷纷，但也不再问我了，我也落得个省心。

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后，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家里人，我已经出来了，现在在湖北省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劳动。写好以后，我就拿上信，信封和邮票，去找负责看信的那个保卫干事。我把写好的信交给他，他看过了，觉得没什么问题。他说他会帮我寄出去。我把信、信封、邮票留下。就去上工了。没多久，保卫干事派人来叫我，我到了他那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你家里来信了。按规定需要他先过目，他觉得没问题了，才会交给我。他让我先打开信，然后再交给他。他当着我的面把信看了一遍。又把信递给我，说，你拿回去看吧。我把信拿回去就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信是我弟弟写的，他告诉我一些家里的近况，我妈妈已经从信阳调回原单位工作了。另外，还告诉我，朱敏已经联系上了。巧的是她还没有结婚，而且她还在春节期间专门到郑州来了一次，和家里人见了面。我弟弟把她的地址给了我，叫我给她写信。妈妈还给我寄了几十块钱。

我心里美滋滋的，我很快给家里和朱敏都写了信。第二天，又把信给了保卫干事过目。让他给我寄了出去。通信虽然还要审查，但毕竟可以和家里人保持联系了。

这里的蚊子十分凶悍，个头也大，像个小轰炸机似的，叮人的时候，扑上去就咬，没有什么前奏曲。被蚊子叮一口就会鼓起一块红斑，痒得难受。不像我们

老家的蚊子，围着你转来转去，哼哼唧唧地叫，千挑万选，迟迟不下嘴，选好了地方才趴上去咬……我虽然挂有蚊帐，但每天晚上都会有几个蚊子钻进来，不知道是怎么钻进来的。我早上起来，就看见几个蚊子喝得饱饱的，挺着大肚子趴在蚊帐上面的角落处。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蚊子，把这几个喝我血的蚊子给消灭了，才去干别的事。

几个星期后，我开始发烧，烧了一天，第二天又觉得发冷，盖上被子还嫌冷。我忍不住，就去卫生所看病。卫生所的一个梁医生给我量了一下体温，一看是 41 度多。梁医生就对我说是重感冒。给我打了一针，又给我开了点药。我回去吃了药，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好，热的时候烧得很厉害，冷的时候盖上棉被还打哆嗦，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张队长就叫我休息，不用出工了。我身上难受，两天没吃饭，一点儿劲也没有。我突然想到，我这一天热一天冷的症状是不是疟疾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挣扎着爬起来，慢慢向卫生所走去。到了卫生所，我就直截了当对医生说，我怀疑我这个病是疟疾。医生似乎也醒悟了，就给我开了化验单，上面专门写上了“注意疟原虫”几个字。卫生所护士给我抽了血，我坐在那里等着。化验结果出来了，果然是疟疾。于是医生给我开了专治疟疾的一套药品。我回去吃了，只过一天，就感觉好多了，想吃饭了。第二天，我觉得有精神了，好像正常了。我又休息了一天就出工了。但是我仍然持续吃药，直到把一个疗程的药吃完了。

那一段时间，我虽然每天出工，但总感觉两条腿没有力气，胯关节总觉得别别扭扭，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于是有一天收工后，我又去了卫生所，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说是坐骨神经痛。需要隔一天打一针，连续地给我打针。于是每隔一天放工后，我就要去一趟卫生所。

8 月份是农场最忙的季节，当地把这一段时间叫“双抢”，意思就是抢收抢种，即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一段时间，早上五点就出工了，不过中午可以休息两三个小时。下午出工后，经常要到晚上九点多十点多才收工。我还从没有收割过稻子，更没有插过秧。稻田里有很多蚂蟥，爬到小腿上叮血，我根本就感觉不到。叮完了，我才发现小腿上有几个地方流血了。有一天，我的脚趾被划破了，我涂了些红汞。结果，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这一整天都没有蚂蟥叮我，原来蚂蟥怕红汞的味道。以后我就在下水前先在脚趾上涂点儿红汞，就没有蚂蟥来叮我了。后来我看到有的农工穿着长筒胶靴下水，我觉得不错，我也买了一双。

湖北的夏天，气温很高，经常在 40 多 C 氏度，连稻田里的水都是烫的。中午酷热，晚上闷热。我竟然也都适应了。前后大约二十多天时间，“双抢”季节就过去了，农场又步入了正规。我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样子了，我一定被晒得像一个黑人了。

有一天，我觉得被子有点儿潮，出工前就把被子晒了出去。晚上收工回来去收被子，一个和我同行的工人看到我的被子上印有“北京地质学院招待所”几个字，很惊讶地问我，你是北京来的？我没办法说谎，只好点头哼了一声。没想到他把这当成了特大新闻，回去就给很多人说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场部。当天晚上，保卫干事就把我叫到场部，准备狠狠地批评我。他严厉地对我说，你今天下午对别人说，你是从北京来的，有没有这回事？上级是怎么给你规定的？你为什么要违反规定？我解释说，今天早上我出工前我把被子晒了，下午收工时去收被子，一个和我一起收工的工人看见我被子上印有北京地质学院招待所几个大字，就问我，你是北京来的？我没办法否认，只好点头哼了一下。他听了我的解释，神情稍有缓和。他严肃地对我说，以后不许再给别人讲了，一定要遵守上级的规定。这个事我会向上级汇报的，上级如果有什么精神下来，我再找你。就叫我走了。后来也没再找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表面上看我是自由的，实际上我是被严密地监视着。

大约是我到这里两个多月后的一个休息日。隔壁女老师的男朋友来了，他是昨天晚上来的。上午，他没事了，就搬了个凳子在门口坐着。我那天也没事，在门口进进出出的，他看我也不像个一般的工人，就和我说闲话。因为我个人的情况什么都不能说，所以也没谈什么，也就是泛泛说了几句话。没曾想，等我进屋后，就有人过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叫到场部去了。在场部，有人把他盘问了很久，怀疑他是派过来和我联络的。又把那个女老师也叫了去，分头询问他们两个，想从中找出破绽，以确定是不是有人来和我接头。最后也没问出什么，但是警告他们俩不许对我透露消息。这一下，把女老师吓得从此不敢和我说话，把女老师的男朋友吓得当天下午就回自己单位去了，而且从此以后再不到这个农场来了。当然，这些事我当时都不知道，这是在我平反后，回农场搬东西时，那个女老师告诉我的。

## 十一、宣判——现行反革命和人民内部矛盾

### 1. 我拒绝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判决

又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一个下午，场部来人叫我去我们队的职工赵兰香家。我跟着他走过去，到了门口，他对我说，你进去吧，有人等你。他说罢就走了。我推门进去，看见里面坐着两个人，竟然是林克和另外一个审讯员，而这里住的一家人已经被临时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是临时借用这个屋子用的。我当时确实是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对我宣布结论来了，

我心里一阵狂喜，不由自主地非常亲热地说，哎呀，你们来了。就像是《智取威虎山》里那个猎户看到解放军来到他家一样的心情。

他们俩似乎也露出一点笑意，也许并没有，只是由于我的兴奋而想像出来的。林克用手一指，说，坐。屋里已经把小赵家吃饭用的小方桌摆好了，还有一个小凳子放在那里。我坐在小凳子上。林克说，今天我们过来，是向你宣布审查结论。接着就向我宣读结论，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欢快地跳动起来。他一字一句地念着，我听着听着，心却一步步地在变冷，当他念到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我的心几乎冷到了冰点。我失望透了。

林克念完了，看着我，说，听完了对你的审查结论，你有什么意见？接受不接受组织对你的结论？哀莫大于心死，我受尽屈辱，委曲求全，只想还我一个清白之身，使我以后能够不受歧视地立足于社会。我坐了八年冤狱，对面坐的这几个人对我审查了八年之久。今天，他们对我宣布的审查结论竟然还是叛国外逃，还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能让我不愤怒？绵羊也有发火的时候吧？

我当时已经忍无可忍，没有了一丝的害怕，我大声说，不接受！我没有犯罪！

林克说，你的结论是我们经过多年的调查做出的，怎么？你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连你的问题都搞不清楚？

我愤怒地说，你们就是吃干饭的。你们审查我这么多年了，你们的结论还是这样？这和你们当初抓我的时候给我定的罪名有什么不同？你们不是吃干饭的是什么？

林克倒能沉得住气，他说，我们希望你能签字，希望你接受组织对你做的结论。当然，如果你有保留意见也可以表达出来。

我说，那好，我把不同意见写上，我签字。我在签字的上方的空白处写了三条，第一条是我没有反对毛主席；第二条是我同意八大观点，对中央文革，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第三条是我没有叛国外逃，我只是给别人说过有红卫兵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事。然后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克说，一会儿在场部礼堂当众宣布对你的审查结论。再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能改变态度，接受组织的结论。

我站起来，用手指着林克，悲愤地说，我这一生就是毁在你们这些昏官手里了。

那一天，整个农场因为要宣布对我的审查结论已经整个下午不上工了，全场职工已经全部坐在礼堂里等着宣布对我做的结论，而我竟然事前对此一无所知。我跟着林克他们进到礼堂里面，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在边上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林克一行人坐在了前面。林克站起来，向全场人员宣布对我的处理结果。但他并没有当众宣读对我的审查结论的具体内容，只说了对我的处理结果，是定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完了，他又说，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执迷不悟，希望我能认真考虑，接受组织做的结论。我呼地站了起来，大声说，我不接受！我没有罪，我怎么接受？接受什么？林克可能是怕我接着再说下去会说到具体内容，连忙制止我，他对着我说，你不要说话，谁允许你说话了？你出去！我自己都奇怪，我当时竟然毫无惧色，转过身，大步就走了出去。

我回到宿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我这一生就这么给毁了，我这一生都将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被整个社会监管的贱民。林克他们当天下午就走了，走前也没有再找我。

## 2.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要结婚

当天晚上，我给家里和朱敏各写了一封信，把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的事告诉了家里和朱敏。给朱敏的信中说，根据目前新的情况，希望她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慎重做出选择。。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找农场的保卫干事，说我要寄信。他对我说，上级昨天已经交代了，你的问题已经审查完了，做了结论，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已经不再负责审查你的信件了，你以后也不用把信拿给我看了。你自己把信寄了吧。这倒是个好消息，我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这以后，我照常出工收工，像以前一样。农场的工人很朴实，他们也没有另眼看我，我和他们相处得不错。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找我玩，谈天说地，问东问西，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

我在综合队的时候，还发生过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差点把我诬陷进去。综合队的会计是个小青年，姓袁。会计不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还是在农场的生产队，都是很有地位的。除了党支部和队长，就数会计了。可是小袁这个会计却闯下大祸，也差一点把我害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和几个年轻人下棋。下了一会儿，到 10 点左右，我就回去睡觉了。但是小袁却没有睡意，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在办公室磨蹭了很晚才走。第二天一早，队里的统计去了办公室，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一行字，写的是“打倒毛泽东”。他连忙跑到场部去报告。场部的人看过了又连忙报告了县公安局。公安局来人调查，找上了小袁。小袁可能是为了推脱责任，对公安局的人说，我们场最近来了个反革命分子，是他写的，他昨天晚上来过这里。他说的这个反革命分子就是我。

农场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当时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情，可以说是毫无察觉。我是上面放到这里来的反革命分子，这事非同小可。公安局和农场

保卫部的人十分谨慎，一面向上级汇报，一面在农场明察暗访，又对小袁进行了笔迹测验，又把小袁带到县公安局进行询问。经过笔迹鉴定，确认是小袁所写。后来小袁承认了那条反动标语是他写的，为了逃避责任才推到了我身上。最后小袁并没有被逮捕，只是撤销了会计的职务。

这件事从开始到结束，我都没有听到一点儿风声。过了很久以后，才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听到后当时确实吃了一惊，很有些后怕。万一这件事搞不清楚，安在了我的头上，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我就惨了。幸亏他们觉得我是上面派下来的人，他们比较小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另外，对小袁的处理结果也使我觉得不同寻常。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很严重的罪行，最少也会判上几年。而小袁仅仅被撤销会计职务，这其中可能还有猫腻。这样的处理令人十分不解。

农场有一个砖厂，专门烧制红砖和红瓦，供应本场盖房子用，也卖给周围的公社和生产队。农场领导大概看我不会农活，后来就把我安排到砖厂去了。我随即搬到了砖厂去住，和一个河南老乡李兆安同住一个屋。河南比较穷，这个农场有很多河南人跑到这里来当农工。小李的舅舅是阳新县农机局的局长，他舅舅就把他从河南农村搞到这里当农工。他刚二十来岁，高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还没有结婚。我们两个很合得来。砖厂有一个管技术的师傅，其余的都是农工。

砖厂最辛苦的活就是出窑。砖烧好后，熄火。几天后就开始出窑，那时窑里的温度还很高，夏天出窑更是非常辛苦。加上粉尘又大，所以这是一个又苦又累又脏的活。每次烧窑的时候都要挑四个烧窑工，两班倒，每班两个人，一班是白班，一班是夜班。小李年轻，又是高中生，所以做了烧窑工。技术师傅看我有点文化，也叫我做了烧窑工。因为另外两个烧窑工有家室，所以就叫他们两个上白班。我和小李都是单身，我们两个就上夜班。烧窑工在出窑的时候照样要出窑，因为那时已经不烧窑了。

下半年的一天傍晚，我们收工回来路过河边，我看见停靠在河边的小火轮上突然冒起了浓烟，我意识到可能是起火了，连忙跑了过去准备救火。我登上了小火轮，看到是船舱下面的柴油发动机起火了。船上的工人在水桶上绑上绳子，正准备打河里的水来救火。我当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大声制止说，不要用水，用河边的沙。这条河的岸边沉积着厚厚的细沙。我一边说一边脱下自己的棉衣，在船边弯腰把棉衣沁湿了，然后下到船舱，把湿棉衣盖到起火的发动机上，这时一桶桶的沙从上面递了过来，我接过上面递下来的沙，倒在了起火处。一桶一桶的沙倒了上去，不一会儿功夫，火就被压灭了。工人伸手把我拉了上去。我走到船边，跳到了河滩上，径直回到了住处。然后洗澡换衣，到食堂吃饭。

第二天，陈子善副书记派人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过去了，进去后，我看见

他罕见地笑着对我说，坐，坐。我坐下后，陈副书记说，你昨天救火的事我知道了，做得很好啊。农场党委研究了一下，决定赔偿你一件棉衣。你可以去买一件棉衣，直接拿发票到场部报销就行了。

我离开后，就想先解决棉衣的问题，毕竟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我不打算买成衣了，又贵，棉花还不一定好。农场有缝纫铺，又有棉花卖，做一件棉衣很方便。我先去了缝纫铺，缝纫铺的老板看我进来了，满脸堆笑，他也知道了我救火的事。我说我想做一件棉衣。老板说，好，好，你想做什么样式的？什么颜色的？我说，款式我不讲究，一般人穿的就行；颜色，就蓝的吧。什么布比较好？老板说，咔叽布就很好。我说，那好，我去买布。你帮我买棉花好吗？老板说，那算啥大事，交给我了。我先给你量一下尺寸。今天你把布送来，明天下午你就来拿衣服。老板量完了尺寸，告诉我要买多少布。我就去了农场商店，买了蓝咔叽布还有里子布，回头就送到了裁缝铺。第二天下午收工后，我就穿上了新棉衣，总共才花了不到 10 块钱。

我的审查结论出来后，我就给朱敏写信告知了这个情况。朱敏没有悔意，仍然同意和我结婚。我于是向农场陈副书记提出了结婚申请。陈副书记说，他会把我的申请转交给上级，让我等候通知。大约等了半个多月，陈副书记通知我说，上级已经同意了你的结婚申请。他还给了我一个月的探亲假。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朱敏。我准备春节回家结婚。

两年以后，当我回到北京要求平反我的案子的时候，我去拜会我们学校的高元贵院长。说起了往事，我才知道，当年我的结婚申请递上来后，具体经办人不敢签字，推到了高院长这里。高院长说，既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就应该享受一切人民应该享受的权利，你们怕什么怕？高院长当即就签了字。要不是碰上这么开明的高院长，我当时可能还结不了婚。如今，高院长虽然已经过世多年，我仍然对高院长怀着崇高的敬意，我仍然深深地感谢和怀念着我们敬爱的高院长。

春节快到了，我带上农场开的办结婚的介绍信，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农场的介绍信写得很有意思，写的得是“兹介绍在我场劳动的张华府”——姓名后面没有加惯用的“同志”二字，当然，也没有写“反革命分子”这几个字。管他怎么写呢，能领结婚证就行了。

我已经九年多没有回家了，心情自然很是激动。我回到家里见到了多年没有见面的母亲、妹妹和弟弟。母亲忍不住流下泪来，妹妹们也哭了。我们互相述说着这些年来各自的经历，有诸多感慨。每个人都经历了磨难，现在终于都平安了。不求荣华富贵，平安是福啊！我也知道了姥姥和大姨都已经去世了。我没有能见她们最后一面，也没能送她们最后一程，这是我终生的遗憾。特别是我未能见我大姨一面，未能就我年轻时的狂热当面向我大姨道歉，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痛，也

是我终生都将背负的心债。

我的母亲原本是要下放到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的。当时信阳地区由军管会负责，信阳军管会的负责人是当时信阳军分区的司令员张云阁。张云阁恰巧是我母亲在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当省里下放干部的名单送到信阳后，首先由军管会负责人张云阁过目。他看到名单中有我母亲的名字，心里想，这会不会是他的老战友李大姐呢？就调来了我母亲的档案。一看档案，果然是我的母亲。他当时的权限并不能任命下放来的干部，他就做了一个变通，没有把我母亲分配到五七干校去，而是分到了信阳地委的幼儿园工作。我母亲因而就少受了很多苦，在信阳过了几年清静的日子。

春节的前几天，朱敏到了郑州，第二天我们去办理了结婚登记，这是 1976 年 2 月初。这一年我已经 30 岁了。我们没有举办婚礼，没有举办任何结婚仪式，也没有宴请任何人。一切都是悄悄地，只有自己家里人知道，也只有自己家里人庆祝。妈妈，我和朱敏，两个妹妹，华南弟弟，只有一个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一个家庭的聚餐。是我的两个妹妹掌厨的一桌当地人的传统菜肴，一些喜糖，这些就是我们结婚宴席的全部内容。那时，我的父母因为文革期间各自的境遇，已经离异。我的父亲没有来。我的小弟弟在部队服役也未能回来。我就是这样悄悄地小范围地完成了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历程。

二十几天后，我该返回农场了。朱敏陪着我一起乘火车到了武昌，然后再转长途汽车到了阳新县城，再乘农场的船到了农场。小李回去探亲还没有回来，我们正好可以把我的住处做为洞房再住两天。工人们友好地来看望我们，我们拿出准备好的水果糖招待他们。他们很稀罕地看着和赞赏着我的这个和当地人不一样的南方媳妇。第三天一早，我和我的新婚妻子又坐农场的船到了阳新县城，再乘汽车赶到武昌，在武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恋恋不舍地把朱敏送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分别之后，我又转身赶到长途车站搭乘去阳新的汽车，再乘船回到了荆头山农场。

一切都像梦一样，一切没有经过的，我都经过了。我又回到了现实的世界，待在这个我不知道我还会待多久的这个农场。

## 十二、一个时代的结束

### 1. 毛泽东之死和“四人帮”完蛋

转眼到了 1976 年的 9 月，很平常的一天，却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毛泽东逝世了。农场的广播喇叭反复地播放着中央电台的悼词和哀乐，每个人都听到了，

知道了。整个农场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们照样要出工，照样要干活。农工们在议论纷纷，传播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小道消息。

老实说，我并没有难过的感觉，相反，我还有了庆幸的感觉，我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变化，我希望这些变化能使国家变好些，至少也要稳定一些。小李和我在议论这件事，他看到我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意，心领神会，他就知道了我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又一致了。他笑着趴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今天晚上喝点酒吧？我说，好啊，我去买肉！小李抽空去农场的酒厂买了点儿酒。

下午收工后，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做了一个豆角炒肉。做好了，我们两个就慢慢地喝着酒，吃着菜，享受着这美味的晚餐。我们什么都没说，只有轻松愉快的情绪陪伴着我们。

第二天上午，农场场部来通知，下午不出工了，全体员工到场部礼堂开追悼会，地富反坏右不许参加。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没戴帽子，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参加。反正无所谓，不参加我正好可以在家休息。不过，一会儿就有人来通知我了，要我参加今天的追悼会。吃过午饭，我们就去场部集合，排着队，依次进入大礼堂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再依次走出去。排队的人群并不像我后来看到的北京追悼会的电影片子里那样人人肃穆流泪，神情悲哀，甚至是嚎啕大哭。相反，这里的人们照样是轻松自如，唧唧喳喳，谈天说地，无拘无束，甚至还在打打闹闹，推来推去。我感到这是真正的民意，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工，此时此刻是他们真实情感的流露，完全不是北京发布的那些哭天抢地的画面里的样子。我也完全融入了这个气氛中，无所顾忌地和周围的人说着话聊着天。论到我了，我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就跟着人群走了出去。

我预感到中国会发生变化，但是决没有料到变化会来得这么快，变化得会这么巨大。一个月不到，包括毛泽东夫人在内的“四人帮”被一锅端了。这实际上等于说是把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完全否定了。虽然新的领导人口头上不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只是口头上不便于承认罢了。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下面按大人物指示去做小人物都有罪，上面发指示的大人物没有罪。但中国政局的这一变化仍使我感到十分兴奋，我知道我和我的难友们的事将会获得平反了。我每天还在这里劳动，但是心情已大不一样了，我心里已经充满了希望。

到 1977 年的春节前，我又该探亲了，我先回家见了母亲和妹妹弟弟，住了几天，就去了广东和朱敏会面。南方的气候和北方不同，冬天也没有感到寒冷，我觉得南方的冬天反而气候宜人。一个月的探亲假很快就要到期了，我离开了朱敏，又踏上返回农场的行程。

日复一日的劳动又重新开始。那时全国的高考已经开始，大学已经开始招生了。农场的一位职工的孩子是农场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他的母亲请我为她的孩子

辅导功课，准备考大学。我利用晚上收工以后的时间给他辅导数理化的课程，辅导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感到了他在这一段时间的进步，因为刚接手的时候，他的解题能力很差，对很多题目无从下手。我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基本概念不清楚。我就对数理化这三门功课从头进行系统的讲解，把让他搞清基本概念作为重点。然后再让他把课本上和参考书上的题目一题一题地挨着做。他不会做的，我就先告诉他解这一题的思路，再告诉他做题的技巧。临考试前的一段时间，我让他把所有这些题目重新再做了一遍，我已经看出他的解题能力大大提高了。我告诉他，没有问题，你一定能考上大学。他考试完了，自我感觉也不错。发通知时，他考上了武汉的一所不错的大学。那一年，农场的应届毕业生，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另一个是女生，考上了黄石的一个大专院校，是一个三年制的师范学院。其他几个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来找我，问他们以后该怎么办？他们不想一辈子都在农场劳动。我建议他们去当兵，在部队里能提干更好。即使提不了干部，回来了也会分配工作。如果在农场劳动，能提成干部的，那简直是凤毛麟角。有几个年轻人听了我的话，纷纷去当了兵。有王文胜的弟弟王文友，刘绪猛的弟弟刘绪刚，还有闻支书的儿子权子等都去当了兵。刘绪猛是民兵连长，高中毕业后就留在农场劳动，为人正直。他十分好学，也十分聪明。举一个例子，当时他就想搞电热毯。他把他的思路告诉我，说是在两层毯子中间放上一排一排的电阻丝，通电后利用电阻丝产生的热量来取暖。我很赞赏他的思路，给他提了两点建议，第一个是，注意安全性。一定要注意电阻的材质，绝对不能漏电，以免起火，造成事故。第二点，注意成本。成本不能太高，不能脱离当前的消费水平。没有多久，他就做出了一个电热毯的样本。他拿给了农场的丁书记试用，丁书记有老寒腿的毛病。这大概是全国第一个电热毯的样品，也可能是提出电热毯的构思和设计理念的全国第一人，那还是 1977 年底的事。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那一次是砖厂的工人到一个农村去扛木料。农场要盖房子，在农村买了一些木料要扛回来。几十个工人一起去了。买的都是原木，又长又粗又重，每根原木大约有 4 米长。我一直觉得我的两腿无力，路程又远，大约有二十多里的山路，木料又重。我担心我扛不回去，就挑了一根细一点的原木来扛。扛着这根原木走了几十里的山间小路，数不清一路上歇了多少回，终于回到了农场。

这件事在平时也算不了什么，偏偏那时砖厂刚来了一个年轻工人，名叫华孝。他是个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在农业队的时候就喜欢搞大批判，并因此被调到了砖瓦厂，还被提拔为小队长。砖厂里除了我，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他的阶级斗争武器派不上用场。现在他觉得可以抓住我没有扛大木头这件事做文章，想开一个批斗会来批斗我。于是他向砖厂党支部提议开我的批斗会，说我不好好劳动改

造，干活怕苦怕累，磨洋工。党支部书叫张定堂，他本想敷衍过去。但是华孝不干，又闹到场部去，非要开我的批斗会。场部本来也不想惹事，但是华孝这个贫下中农不依不饶，一定要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批斗会，厂部不敢得罪这个贫下中农。于是同意开我的批斗会，还派来了场武装部长来压阵。

那天上午把全厂工人集中在一个会议室里，厂党支部书记张定堂先讲话，下面的人也不管他在上面说些什么，三三两两地在下面说闲话，妇女手里还做着家务活。小李还故意大声地和我说话，我也应着他。我们视若无人地聊着天，根本不听张定堂在说什么。张定堂说完了，华孝站起来发言了。下面的人更不把他放在眼里，连听也不听，在下面各说各的，说笑话的，嘻嘻哈哈的，围了几个小圈子。武装部严部长坐在下面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华孝一个人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说了一会儿，也没词了。他就在那里大声喊着，还有谁发言？还有谁发言？没有一个人发言，也没有一个人应他的话。都在三五成群地唧唧喳喳说着闲话。张定堂一看没人发言，趁机宣布说，没人发言了，散会。上午不出工了，都回家吧。大家伙儿一哄而散，都回家了。严部长一声不吭，站起身背着手走了。

张定堂走过来，对我笑笑，说，他想积极表现自己，我们也没办法。这半天不用出工了，回去休息。我和小李直接就去了小赵的家里，小赵又叫了汪合意，我们四个人打起了扑克。

中国的形势在当时变化很快，农场的人跟形势也跟得很紧。农场的人从上到下，差不多都能感觉到我的事一定会平反，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事。农场的机务队开始邀我去给机务队绘图纸，我连续一个多月都在给机务队绘图，砖厂从不叫我去出工。图纸绘完了，农场的测绘队又邀我去给农场测绘地形图，一干又是一个多月。那时候砖厂烧窑用的煤是从附近的一个煤矿拉来的，需要派几个工人常驻在那里给农场拉煤的车装车。张定堂就把我和另外三个工人派了去。我们四个住在当地的旅馆里，每天上午给农场拉煤的汽车装两车煤，下午再装两车煤，一天的活儿就干完了，相当轻松。半个月后，煤拉够了，我们就跟车回来了。张定堂又想叫我改革砖厂用的切砖机，把人工操作改为自动操作。这个活我估计我做不了，因为机械方面的知识我在学校学的并不多，机械自动化方面的知识更是一点儿没学过。我对张支书说，我不影响出工，我用业余的时间考虑这个事。不过，你也不要抱太高的希望，因为我没学过这个专业，我可能搞不出来。其实，当时我最希望的是去农场中学教书，去带毕业班。我相信我能带好毕业班，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农场中学的升学率，使毕业班的学生大比例地考上大学。但是农场的领导没有人考虑到利用我这一方面的潜能，我自己也不好意思提这样的要求。

## 2. 终于平反

1979年初，春节又快来临了，我和朱敏约好了在郑州见面。那时全国已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了，我沉寂的心已经开始跳跃了。我和朱敏在郑州住了几天，就一起去了北京，找到了学校。我没有想到，当时小梅（梅建明）正在急着要找我们。我和小梅在学校见了面，一时间觉得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来，只有激动，别的全忘了。小梅先要给我找住处，他找到了他的老师徐老师和邵老师两口子。徐老师和邵老师极其热情，对我和朱敏是一见如故。他们把他们西四楼的一间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两口子住。

安顿住好以后，小梅给我讲了我进去以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是我被抓进去的同时，小梅，程希平，石白河也先后被抓了进去，但他们被关的时间都没有我长，而且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被单独囚禁，是关的集体号。大概关了一年多，在1970年庐山会议毛林决裂后，就放出来了。叶向真关的时间比较长，我估计她可能也是单独囚禁（我没有问过她当时的情况）。在这个叫“叶朱反革命集团”的案子中，叶家被抓的人最多，除了叶向真，还有叶选平、叶选宁、叶楚梅和邹家华。另外还有两个家庭，王白莎全家，她的父母都抓进去了。王北宁全家，她的父母也都被抓进去了。小梅的全家，他的父亲也被抓进监狱，关在秦城。他的母亲也被抓了，两个哥哥都进了牛棚，全家人都受到牵连，受尽了迫害。“叶朱反革命集团”全案牵连的人达150多人。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叶向真就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不久还公派到美国留学去了。

小梅给我讲了北京当前的局势。他说，中组部现在正在平反冤假错案，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学生的冤假错案，哪一个案子能比我们这个案子更冤？我心急得不能行，想赶快找到你们，赶快写申诉材料，争取早日平反。正好你过来了。我们要赶快找到他们几个，尽快写材料递上去申诉，争取早日平反。材料递得越早，平反来得才会越早。我说，我的材料我现在就可以写。其他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只有麻烦你运用关系找他们了。

我用了两天时间把我的申诉材料写好了。小梅看了一下，说，我们两个明天就去中组部，先把我们两个的材料递上去，先挂上号再说，然后再找他们几个，他们的材料以后再分头递上去。先找到谁，谁先写好了谁就递上去。写好一个递一个，越快越好。递上去早了，肯定会先解决，递上去晚了，肯定排到后边了。

我和小梅在第二天就跑到中组部把我们的申诉材料递了上去。

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的探亲假时间快到了。我和小梅商量，是不是我先回农场一趟，请了假再出来。小梅说，还回去干什么呀？本来就冤枉我们了，再回去受冤枉？不回去。我觉得小梅说得在理，不回去了。当天我给农场陈子善副书记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正在北京要求平反我的冤假错案，不回农场了。陈副

书记后来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说，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回到农场来，边劳动边等待，等等。我没有理他，也没有给他回信。

（下图：十余年冤狱后同案部分难友重逢。左起：张华府、朱成昭、蒋良朴、程希平。）

没过多久，想不到蒋良朴自己也摸到北京，到学校来了，他见了小梅和我，也看到了北京的形势，信心大增，很快就写好了申诉材料，也递交给了中组部。那时朱敏的探亲假也快到期了，我们俩决定



先回郑州住一段时间，她再从郑州回单位。蒋良朴在北京无依无靠，我请蒋良朴和我们一起去郑州住一段时间，等朱敏回单位了，我和蒋良朴再一起到北京来。蒋良朴欣然同意，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了郑州。我母亲很欢迎蒋良朴的到来，我妹妹每天都给我们做好吃的，经常炖羊肉给我们吃。我们还到黄河边花园口去玩了一天，到郑州附近的公园景区转了转。这一段时间是我和蒋良朴这么多年以来，少有的开心日子。

送走了朱敏以后，我和蒋良朴又回到了北京。这次回来又和王北宁取得了联系，王北宁的家已经搬到了外交部大院，房子也比较宽裕了。蒋良朴就住在了王北宁家里，我还是住在邵老师家里。那时北京正流行放映内部电影，中央各大机关都在放，外交部礼堂每星期都会放几场。王北宁的妹妹北星、弟弟北方都有办法搞到内部电影票。我们就经常去外交部礼堂看内部电影，主要是香港的武打片。文化大革命十年只能看几个样板戏，现在能看到这些香港的武打片，感觉很新颖，确实耳目一新。

后来又先后找到了朱成昭和颜宽，我们这几个难友算是到齐了。他们两个也各自写了申诉材料，分别递交给了中组部。这期间，我们还见了我们学校的高元贵院长，我们非常敬重我们的老院长，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造反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批判过他。



（上图：张华府与妻子朱敏和女儿2012年在深圳。下图：张华府夫妇与两个儿子、儿媳和孙子在一起。）

1979年下半年，我又找小梅问我们案子的进展情况。小梅给我说了一个新情况，是上面的人对他说的。本来我们这个案子，中组部原来准备作为学生冤假错案的典型公开见报的，准备公开平反。报上去后，到了叶剑英那里后，叶剑英却不同意见报。此案，叶家人受牵连太多，叶剑英不想他们家成为全国议论的焦点，他不同意见报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叶剑英当时位高权重，中组部考虑到叶帅的态度，决定降低这个案子平反的规格，把案子转交给湖北省委组织部处理了。重新移交卷宗，重新阅卷，使我们的平反时间差不多晚了一年之久。当时，中组部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中组部积压的冤假错案太多，如果全靠中组部来平反，将会拖很长时间。于是中央决定分流一些案子，像我们的案子，由于我们学校已经迁到武汉了，中组部就把我们的案子转到湖北省委组织部，委托湖北省委组织部审核平反我们的案子了。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于是，我、朱成昭、蒋良朴、颜宽四个人就从北京来到了武昌喻家山，那是我们学校的新校址。学校给我们四个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住，我们在这里等候消息。我们去省委组织部见了湖北省委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他们详细地向我们询问了很多当时的情况。然后叫我们安心地回学校等消息。这期间，小梅经常给我们通报北京的情况和新消息。

我们的案子终于在1980年的下半年获得平反。虽然是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不留尾巴，虽然是补发了工资，安排了工作，但我们吃的苦，遭的罪，亲人的担心，家人受的连累，能补回来吗？特别是，由于这个案子没有公开见报，大批受此案牵连的“东方红”战士并不知情，他们还在本单位受歧视受迫害，这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往事已经过去，并没有如烟消散。它还留在当事人的心中，还留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历史来评判吧。

写于2016年元月  
改毕于2017年11月

(编者注：该文已发表2018年2月28日《昨天》第106期)



# 梅建明与“朱叶反党集团”

## 梅建明

1967年1月底的一天，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梅建明的父亲，是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梅龚彬，“文革”开始时即受批判。参会的人包括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朱成昭以及叶剑英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向真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总结出了后来震慑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的观点。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他们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激化，最后被打成“朱叶反党集团”。

### 三进地质部

1966年6月1日，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北京地质学院（简称“地院”）大一学生梅建明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实习。他们接到通知，立刻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8月8日，地院成立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因为不限出身，声势很快壮大，以致后来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东方红”联络站。总司令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其他核心人员包括勘探系五年级的蒋良朴、探工专业五年级的王大宾等人。

为了让工作组退还整右派学生的“黑材料”，8月23日，“东方红”一千多人从海淀区的地院步行15公里，来到西四的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师生作检讨。因为地质部拒绝交出邹家尤，9月5日，“东方红”再次冲进地质部。

梅建明在这次行动中有立功表现。朱成昭问谁有办法找到地质部副部长们的住址和电话，他想办法从家里偷出了父亲的秘密电话本，得到朱的赞赏，后被提拔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

“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此时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她常常往返于钓鱼台和“东方红”，也很支持“东方红”。

身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梅建明带了一支特殊的“战斗队”进驻地质部，任务是跑“东方红”驻各单位院校的联络站，搜集动态，并在地质部

进行宣传，形成对部党委的政治攻势。国家计委特地拨了一批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给他们，表示支援。作为站长，梅建明能参加地质部的党委会，听取老干部们的思想检查。

10月18日，“东方红”第三次冲进地质部，并在地质部召开“揭发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日深夜，把何长工带到地院。

“何长工在‘文革’初期不支持红卫兵小将，他已经作检讨。但‘中央文革’要继续批斗他，找些事情强加在他头上，逼他认罪，我很反感。”梅建明说。

梅建明对老干部有种复杂的感情。他们中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开国功臣。他觉得，他们工作中是有错误，但不至于发动一场运动来斗争他们吧？他开始有点动摇了。

### 被彭德怀征服了

1966年11月10日，梅建明带着联络站的一个小分队离京串联，12月回北京时，朱成昭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成昭见面就问梅建明：“你对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法？”梅建明说：“老干部已经检讨得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得差不多了，不该再没完没了地整下去了。”朱成昭想了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以后，跟‘中央文革’谈一次。”

正在这时，朱成昭接到“中央文革”的命令：把彭德怀从西南抓回北京。他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头头，名头响亮，深受“中央文革”器重。

时任“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后做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回忆：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

阎长贵与李讷同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年纪相仿，走得很近。他从李讷处对朱成昭早有耳闻。李讷很赞赏朱，认为他有思想，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

“‘中央文革’将抓彭回京这个任务交给朱成昭，也足见对他的信任。”在位于沙滩北街的寓所，阎长贵回忆。

当天下午，阎长贵在“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交代了这项紧迫又特殊的政治任务。朱即刻派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人赶赴成都。

在成都与彭德怀详谈之后，王大宾觉得 1959 年对彭的批判是错误的，彭是支持“文革”的，遂电话向朱成昭汇报，朱同意派人向“中央文革”汇报后再做决定。

听完汇报之后，戚本禹很恼怒，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遂派“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再赴成都抓彭。

朱成昭心有不甘，派出“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赶赴成都。因是秘密行动，为掩人耳目，“东方红”内部称之为“揪聂克行动”（聂克是地院党委副书记）。梅建明的任务是从地质部调出部长们的小车，随时待命。

“东方红”在成都设有联络站，仗着人多，反应灵活，胡乐成、王大宾等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到彭德怀，将其护送上火车，又与他一路恳谈。

12月27日，列车开到北京西直门车站，梅建明调来的小车将彭德怀接回了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我们想跟彭聊聊天，可他可能是太累了，不愿意说。”梅建明回忆。

朱成昭安排彭德怀住下，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份万言书，都认为言辞恳切，戳中要害。

三四个小时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地院接走了彭德怀。

“彭德怀被接走后，我们开始看清‘中央文革’的意图。我恍然大悟，彻底明白了，原来‘中央文革’是要把一帮元老搞下去。”梅建明说。

### 秘密会议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开始大规模抓捕“联动”分子。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梅建明认识的，他觉得，“中央文革”不该这样把他们往死里整。

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和康生在会上公开点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名，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1月23日，陈伯达手书一封意在警告朱成昭的亲笔信，让“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拿去单独念给他听。王广宇记得，其中一句大意是：要是继续往下走，就掉到茅屎坑里，成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广宇回忆，朱成昭听完信后很冷静。他问：“伯达同志的这封信要不要向总部人员传达？”王广宇回答：“他没说向别人传达，传达不传达，怎么传达，由你决定。”最后，朱成昭向总部人员传达了这封信，等于公开了“中央文革”和他的矛盾。这让王广宇觉得，他还是“挺磊落”的一个人。

几天之后，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人包括朱成昭、王大宾、蒋良朴、杜金山和梅建明这几位“东方红”的核心人员，还有叶向真和她的朋友张九九。

“文革”开始后，叶向真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于1966年9、10月间来地院找朱成昭，请求援助。两人政治观点非常一致，也很谈得来，不久陷入恋爱中。

会上，大家交流了对“文革”的看法。

梅建明认为，运动扩大化了，不像群众运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马上说，这像不像运动群众？于是定下一条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

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

“当时我们就认为，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梅建明说。

讨论后，大家的意见被归纳成八条。第一，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大串联搞早了。第二，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第三，关于

揪与保的问题上，认为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第四，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认为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第五，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认为抓人太多。第六，关于坐牢问题，都认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第七，聂元梓问题。第八，关于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

2月3日，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请“中央文革”派人来先内部沟通，不行就贴大字报。会后，朱成昭回到地院，给“中央文革”打了电话。“中央文革”很快派了人来。对方听了他们的八大观点，斥为“一派胡言，纯属反动言论”。

此后，“中央文革”责令朱成昭闭门思过。他被关在西三楼三层的一个小房间，不许与外界接触。梅建明是精神上思过，但不限制行动自由。

第二天，2月4日，“东方红”三千人聚在地院大饭厅，听朱成昭作检讨。大礼堂外面也挤满了人。口才很好的朱成昭趁机亮出八大观点，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他讲的时候，全场都安静地听。

“散会后，很多人碰见我说，讲得太好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梅建明回忆。会后，有人根据记录写成大字报贴出来，流传很广。

### “朱叶反党集团”

朱成昭受批判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阎长贵几次去见“东方红”的二把手王大宾。当时，王大宾因腿部有病，正在住院。“‘东方红’在全国影响很大。我当时觉得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我去医院劝王大宾，你应该挑起来这个担子。”阎长贵说。王大宾成为一把手后，改组了“东方红”总部。

梅建明听到风声，“中央文革”要继续“肃清朱成昭余毒”，于1967年7月南下广州。广州“东方红”联络站的人仍然认朱成昭的牌子，视梅建明为总部派来的人，任他调遣。梅建明向朱汇报广州的情况之后，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想法。

7月10日，朱成昭、梅建明、张华清和张华府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杭州，一路走走玩玩，南下广州。为避免目标过大，叶向真和蒋良朴已先走。

他们刚离开北京，戚本禹就得到了报告。他立刻报告“中央文革”，说朱成昭、叶向真等人携带地质部的机密文件，企图叛国外逃。周恩来立刻给北京卫戍

区、上海警备区和广州警备区都打了招呼，要他们一旦发现这几个人即刻请回北京。广州警备司令部立刻派出侦察人员，守在火车站口，守株待兔。

所幸的是，朱成昭、梅建明五人在前一站下了火车。到广州后，他们联系上叶向真和蒋良朴。一行人去广州西樵山、佛山玩了两天，打算回广州落脚到张华府的姑姑家，但刚到不到半小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到了。张华府的姑父和姑姑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早就被打了招呼。

据梅建明所知，抓叶向真时，“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当时处境困难的叶帅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6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几个人被很客气地逮起来，送到从化疗养院，好吃好喝地款待，等待中央来人带他们回北京。梅建明觉得，一来这跟周恩来“请他们回北京”的指示有关，二来是因为叶家在当地的影响力。

过了一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北京赶来，与朱成昭、叶向真单独谈话。朱、叶二人一口咬定，来广州只是为躲避“中央文革”的批斗，出来散心。于桑将二人带回了北京。

蒋良朴三人由广州警备司令部送回北京。梅建明由哥哥梅向明接回京。彼时，其父梅龚彬已被逮捕，以“特务”之名关进了秦城监狱。

1967年11月初，正在外地串联的梅建明接到电话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一回校，他就被看押起来。朱成昭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宣布，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朱成昭专案组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让梅建明交代的问题有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叛逃国外；冲击中南海，谋害毛泽东。

第三条事出有因。大约在1967年8月，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等人在颐和园开会。有人提出，直接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跟他谈“中央文革”的问题。若他不知道“中央文革”的行径，就提醒他；如果他知道并支持，不如动员老帅们起来废掉江青。但这次会梅建明因事并未参加，只是会后听他们谈起过。他只坦白承认第一条，让专案组的人非常恼怒。

1968年3月17日，梅建明被北京卫戍区带走，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走时，他听到校广播站的广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8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叶向真、蒋良朴等人一起，也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1969年2月，梅建明被转移到半步桥监狱。6月，又被转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从1968年9月到1972年9月的四年间，这里设有三期“干部子女学习班”。据研究者称，这个学习班前后关押过65名高干子女，其中副总理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叶选平，陆定一之子陆德，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锐等人。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婿邹家华等13人。

三个月后，地院派人到少管所来接梅建明，称其问题已查清，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学校监督改造。离开少管所时，因顶撞过队长，少管所对他作的结论是：学习态度不端正，顽固，拒不认罪。

1970年，梅建明大学毕业，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到湖北丹江五七地质队劳动改造，后在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分校教矿相课，每月只能拿到20元的生活费。

“文革”结束后，1976年，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高元贵复任院长，了解了“朱叶反党集团”情况后，决定给梅建明等这些在校劳改的人恢复工资。

1980年，在陈云的帮助下，梅龚彬获得平反。1981年，梅建明经过一番周折，调回了北京，在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部（当时改名武汉地质学院）工作。

叶向真后来被关进功德林监狱，再到半步桥监狱，最后转入秦城监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剑英重新出来主持军委工作。叶向真从秦城监狱出狱。由于与世隔离太久，她几乎不会讲话了。1972年，她改名江峰，在北京医学院学习，并留下做了外科医生，与朱成昭、梅建明等人几乎断了联系。1978年，她又改名凌孜（又名凌子），回归文艺界，执导了电影《原野》，一举成名。

1975年，朱成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湖北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

年，回学校等候处理。1980年，获得平反。1985年，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自办建筑公司，生意一度做到很大，但后来破产，壮年病逝。朱成昭去世后，学校破例贴出了讣告。当年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一起，在北京昌平的殡仪馆，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编者注：该文引自2014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688期。  
系杨敏采访梅建明的整理稿件。)

**编者按：**

梅建明 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

#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 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

陈永迪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是御封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北地东方红还有一位比王大宾更有思想深度，更具“领袖”风范的负责人——朱成昭。1967年3月以前朱成昭一直是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如果说三司有“司令”，朱成昭就是。朱的父亲是新四军老革命，时任上海市建工局副局长，随着运动的深入也受到冲击，导致他对文革的看法随之发生改变。在朱成昭思想转变过程中，叶向真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是东方红的一把手，他的重要言行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披露出来，朱对文革的不同意见暴露后，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王广宇到地院传达了陈伯达给他的一封信，陈伯达警告朱不要掉到茅厕里成为又臭又硬的石头，赶紧悬崖勒马！2月4日在地院东方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朱成昭借检讨之机将他对文革的看法系统地归纳为“八大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归结为四句话：“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sup>37</sup>。在私下里召开的“秘密”会上，朱成昭对文革还有更尖端的看法，他说：“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sup>38</sup>。

“八大观点”表明朱成昭并未“悬崖勒马”。不知出于何目的，这封打击朱成昭的中央文革并未要求公布的信被朱成昭公布，朱主动将自己置于中央文革的对立面，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此后，在大字报区看见3月4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首都红代会工作人员的报道，会上戚本禹说朱成昭“刚愎自用”，应该“闭门思过”从此，朱成昭走上了不归路。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成立革委会，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成为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地院革委会主任。

限于认识水平，我并不赞同朱公布的“八大观点”，当时认为文革的主流是好

<sup>37</sup> 《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1期（增刊），【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4 伏庆是专辑】

<sup>38</sup> 《华夏文摘》（增刊）2012年5月21日第680期 张蕴章“首都红卫兵三司司令朱成昭”

的，中央文革是正确的，对群众运动要像大革命时期支持“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说“好得很！”。虽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只觉得他太偏激，看问题主次不分，把缺点看大了。

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只是个小角色，甚至角色都谈不上，仅为普通一员。东方红总部和核心组的成员都是 1966 年 6 月份反对工作组的“老造反”，即参加“6·20 游行”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我和一些同学那时还在山东胜利油田毕业实习，待到 7 月初回到学校，已是工作队独霸天下，我们班没人被打成“反革命”，当然也无缘“老造反”。虽然没有参加造反，但对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有一定同情心，有一些“反革命”在工作组进校前还是党团员、班干部，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对当时批斗院长高元贵也有看法，工作队传达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的话：“高元贵骄傲自大，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这也是打倒的理由，荒唐！

我第一次见到朱成昭是 1966 年 8 月 24 日晚上的大辩论，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先作检讨，听完检讨后，保守的“斗批改”大叫“通得过！”造反的东方红齐喊“通不过！”双方围绕工作队的行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东方红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加入。“斗批改”抓住这一“软肋”，敬起“血统论”的大棒，对东方红的发言人逐一盘查家庭出身，稍有瑕疵就打成“狗崽子”“阶级敌人”。就在东方红快要撑不住时，朱成昭登台，他高大的身躯、威武的形象，雄辩的口才加上硬邦邦的家庭出身，挡住了“斗批改”的攻击狂潮。朱成昭大气磅礴，上台先背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接着痛斥工作队残酷迫害学生的罪行，声泪俱下、句句在理，博得台下一片掌声。东方红的学生纷纷上台声讨工作队，有“斗批改”的同学当场表示要加入东方红，还有受感动的外地学生也表示要成为一名“东方红战士”。此后，“斗批改”

节节败退，东方红大获全胜。从此，朱成昭在我心中留下了英雄的形象。

叶向真，叶剑英元帅的女儿。文革时是中央戏剧学院文革小组组长，中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负责人。不知何故，她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在一次中央文革召开的会议上，江青介绍她认识了朱成昭<sup>39</sup>。两人观点相近，交谈甚欢，从此你来我往一发不可收，终于擦出爱情的火花。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凭着她掌握的高层信息再加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将朱成昭折服。66年底两人的关系已迈入火热阶段，据东方红办公室主任伏庆是回忆：“有天晚上，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告诉田春林<sup>40</sup>，如果田再干涉他与叶向真的事，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sup>41</sup>

在朱成昭闭门思过期间，东方红没有对他采取约束措施，仍可以自由活动。7月初朱成昭决定南下，想去上海、广东散散心，这一散心引起了高层的注意，给朱成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重了对他的惩罚。

朱离开学校去了南方，很快成为校园议论的热点，学校大字报每天都有他的传闻，说他和叶向真双双逃到广东，企图叛国投敌。有说他们躲到广州市长曾生家里，因为叶剑英和曾生是老上下级，叶向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与曾生亲如一家；有说周总理知道叶、朱跑到广州，立刻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亲自去捉拿………对这些传闻我们都很感兴趣。也有人同情朱成昭和叶向真，为他们的命运捏把汗，担心他们凶多吉少。

北京的夏天，白天炎热难熬，晚上凉风习习，我们都习惯于晚饭后去北五楼前的大字报区游荡。一天傍晚，学院的大喇叭突然播出一条爆炸性消息，说已经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捉拿回校，地院革委会决定当天晚上在学院大食堂开批斗会。<sup>42</sup>

此消息在学院炸开了锅，大家都兴奋地向大食堂涌去。学院大食堂兼有礼堂的功能，是全校的活动中心。在大食堂我们曾经聆听过谢觉哉的报告，欣赏过李

---

<sup>39</sup> 张运钧 李颖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2017年7月30日第95期

<sup>40</sup> 田春林，当时是地院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与朱成昭同为地院东方红的发起人。

<sup>41</sup> 《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1期（增刊），『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4 伏庆是专辑』

<sup>42</sup> 聂树人 《地质东方红史》第二部分 第十四章 朱成昭走向灭亡：《新东方红公社宣言》的风波过后，王大宾主持召开常委会，说要研究批判朱成昭的反动观点，以肃清他的流毒。常委会上，大家对召开批判大会没有异议。

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的演奏，观看过庄则栋与李富荣精彩的乒乓比赛.....

当然，也批斗过不少“走资派”。大食堂东西朝向，西边的主席台兼舞台，可以容纳上百人演出。舞台下面是空荡宽敞的大厅，没有座椅，开会时要自带板凳。

批判会虽然是地院革委会召开的，但不像是正规的批判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拉横幅，没有设立主持人和贵宾的专门座位。在主席台南北两端拥挤着近距离观战的人群，只有中间留出一个小小空间，供批判人发言与被批判人挨斗使用。我特意挤到主席台南端可以观察全局的位置，只见食堂大厅里陆陆续续进来很多人，黑压压一片。地院已实现大联合，表面上没有人公开拉出队伍唱对台戏，暗地里不同观点依然存在。有拥朱的“啃猪蹄”派，有拥蔡新平为首反朱的“喝菜汤”派，有拥王大宾的“杀猪切菜拥王”派。过了一会儿，地院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宣布：“把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押上来！”

只见一群“东方红战士”将一位大汉从后台推出来，此人正是这些“战士”们曾经的“领袖”朱成昭。朱成昭被两人架成“喷气式”，一人用手掐着他的后颈窝往前推，旁边还簇拥着不少人。被批判人朱成昭比推他的人高出大半个头，胳膊被反拧着身体依然直立，脸上充满不屑的表情，那气质与我在 8.24 辩论会上见到的朱成昭毫不逊色。这滑稽的场面，使我联想起电影里典型的英雄就义：共产党员形象高大、昂首挺胸、戴着脚镣手铐在前面走着，国民党兵矮小猥琐、抗着一杆破枪、跌跌撞撞在后面跟着。朱不停地将头拧向后方，拼命地反抗着，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白色圆领衫已经湿透。被推到舞台中央后，押解人松开手，朱成昭将头高高地扬起，台下的群众见状齐声大喊：“低头！低头！低头！”刚松手的押解人又重新拧住朱的胳膊企图制服他，舞台两边也有人上去助阵的，朱拼命抵抗着就是不低头，台上扭成一团。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窜出一个黑影，上去就抱着朱成昭的头，将身体吊在他的脖子上，用尽全身力量往下压，朱终于被按在地上了。我想，朱成昭再也挣扎不起来，只能趴在舞台上接受批判了。突然，朱甩掉压在他身上的人，像弹簧一样蹦起来，台下立即又爆发出“低头！低头！低头”的声浪，围在朱身边的人又将他按住。这时有人上去向他劝到：“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请罪！”在那个时代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朱同意了。人们松手让他站起来，朱成昭面向西，朝主席台西边的毛主席像微微低头，屁股向东对着台下的群众，这姿态明摆着是羞辱批判他的群众。我们都看出问题了，如果强迫他将身体转 180°，

就会将屁股对着毛主席像，这也是大不敬，直到批判会结束没人敢纠正他的姿态。此后，批判者一个个上台发言，已经忘记他们说了些啥，无非是叛国投敌，罪该万死之类。散会后，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朱成昭不屈的身影以及他把屁股对着群众的场面，心想这小子真厉害，有一手！

批斗朱成昭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大操场西边的马路上，我看见一群人正拥着一个什么人往大操场主席台走，在主席台北侧停下来。人群围成一个小圈，待我挤进人群里才看清楚，被押着的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年龄比我略大，面色饥黄像没吃饱饭的农妇<sup>43</sup>。此时，她正被反拧着胳膊，一般年轻女人的胳膊都是浑圆的，可这小女人的胳膊瘦得像竹片，真担心这竹片再用一点劲就要被拧断。我好奇地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呀？有人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向真。眼前的这个女人，穿一件浅色短袖衫，瘦骨伶仃，面目清秀，脸形很像叶剑英。人群里爆发了口号：“打倒叶向真！”“叶向真必须老实交代！”“叶向真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有人冲着叶向真吼道：“叶向真！赶快交代叛国罪！”叶小声说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不管人群怎样喊叫，她只重复这句话。也许押她的人只想把叶向真游街示众，没有在此地开批斗会的意图，在“打倒叶向真”的喊声中，她被押着往北边大字报区的方向走去。

叶向真在地院关押地点有两处，先押在南五楼，后转移到学十二楼。据聂树人在《地质东方红史》第二部分“叶向真的命运”一节里引尚凤生的话说：“叶向真从广州被押到地院后，关在南五楼 224 室。我曾看守叶向真一个星期，后来不看了。南五楼是男生宿舍，没有女厕，叶向贞得去楼前桃园中工人的简易厕所中入厕，曾引起误会。”据时任地院革委会常委朱德渝回忆：“叶向真关押在南五楼二层西头勘探系三年级红色尖兵战斗队处，她住一个小宿舍。我曾在一天晚上开会回来，去南五楼二层西头准备上卫生间，可卫生间门口有位男生站岗，告诉我不进去。”

有一天，测井班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一个“秘密”，说叶向真关押在学十二楼二楼，我当时很吃惊，原来帅府千金关押在我们住的楼上。为什么把叶向真从南五楼转移到学十二楼，作为东方红的普通一兵只能猜想，南五楼和北五楼（朱成昭、王大宾住在北五楼）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两栋男生宿舍楼，两栋楼结构大小相同。

---

<sup>43</sup> 据在叶向真春风得意时见过她的校友回忆，叶向真是个美女。人一倒霉，美女变丑女，所以我在游街示众时见到的叶的形象与美女大相径庭。

南五楼的宿舍房间很大，大的可住 25--30 人，小的也要住 8 人，楼道很长，住的人也很多，不适合封闭关押叶向真这样重要的敏感的人物。其次，在南五楼腾一个房间至少要迁走 8 人，而学十二楼二楼是研究生宿舍，腾一个房间只需迁移 4 人，这可能是把叶转移到学十二楼的重要原因。

又过了几天，班上东方红的负责人把我叫去，要我到二楼去当看守。看守有几人已记不清了，反正大家轮流值班。在二楼的过道口摆了一张小课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记事本，任务是阻止无关人员随意闯入，就是经过总部批准的入也要登记。当年看守叶向真分为外勤和内勤两拨人，我们是外勤，不管内勤的事。在我的印象中内勤有女同学，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完全没有记忆了。审问她的人是专案组的，吃喝拉撒全由专案组的人负责，我们不能随便进出她的房间。晚上不值班，将二楼的过道门上锁就可以回宿舍睡大觉。

整个关押期间很少见她出房间，估计大多数时间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在学十二楼关押的时间不长，大概有 20 天左右，有时内勤把叶从房间带出来去了哪儿，我也不关心，因为不是我的任务。

在关押期间的某一天，也是那位测井班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拿给我一份油印件，标题是《我的检讨》，检讨人写着“叶向真”几个大字。同学告诉我抓紧看，这份检讨书不能外传，看了还给他。我如获至宝，赶紧读起来。印象很深的是叶向真那份检讨油印件的字写的很漂亮，标准的楷体，字体大，字间距大，所以看起来很悦目，可惜当时没有将重要内容抄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细节都淡忘了。读叶向真检讨的第一感觉是她的文字功底极好，那份检讨写得像一部有关叶、朱恋爱史的文学作品。她写了怎样认识朱成昭的，文革初期叶向真和刘诗昆已经离婚，认识朱成昭时已是单身。俊男靓女，干柴烈火，着火很正常。她向朱成昭传达过叶剑英的一段话，说毛主席信任红卫兵，现在把老干部老将军都打倒了，将来敌人打过来，蒯大富能带兵去打仗吗？还交代去广东是她的主意，因为她从小在广州生活，对那里的人和环境都熟悉，去那儿散散心，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什么叛国投敌想都没有想过。她承认朱成昭的八大观点有她的影响，朱宣布八大观点后，被中央文革责令闭门思过，心情很苦闷。为了安慰朱成昭，叶向真邀请他到叶帅城里的家去住。那段时间他们特别幸福，在一起不谈政治，读世界名著，读普希金的诗，双方都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乐不思蜀”。

叶向真高兴时还给朱成昭弹奏钢琴，叶宅俨然成了世外桃源。可好景不长，有一天正下着大雨，朱成昭患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叶向真接到一个电话，是叶帅打来的，叶帅说，听说我们家里住着一个反对中央文革的人，马上把他赶出去！叶向真接到电话后哭了，她舍不得朱成昭，但是父命不可违，只有把真相告诉朱成昭，朱听后也哭了。朱成昭毕竟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他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在倾盆大雨中走出叶宅，叶向真望着朱的背影，伤心的哭着……我看了几遍，因朱成昭被赶出叶家的情节具有精彩的戏剧性而印象特别深刻。叶向真的检讨策略很高明：以情动人，蒙混过关。她的检讨用大量篇幅写过程，写情节，真正的认识很少，这就是她的高明之处。她毕竟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对人的感情世界比我们了解得深透，我就是不知不觉被打动的。

看了叶向真的检讨，充满了对他们的同情。上面说，叶向真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情调腐蚀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必须坚决批判。检讨书很快被收回了。

叶向真在学十二楼只关押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就被带走了，去了那里不得而知。从八月开始，传说要将 66 届的学生毕业分配，在外地“逍遙”的、回家躲派性混战的同学纷纷回到学校，盼望早日分配工作拿到工资，还有带着未婚妻回学校的。于是宿舍又开始满员了。当然，也还有其它我不知道的因素，叶向真是中戏的人，不排除中戏要批斗把她接走。像叶向真这样敏感重要的人物，关押在何处也不是地院革委会左右得了的，决定她命运更多的是中央。

听说叶向真后来被关押到 1972 年，出狱后读医大，在 301 医院当外科大夫。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曹禺话剧改编的电影《原野》颇有影响，后来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凌子就是叶向真，她又重操旧业了。再后来在电视上看见她接受采访侃侃而谈，但对文革中的真实经历却讳莫如深。不知她当年那个检讨书如今是否藏在哪个档案馆里。

#### 编者按：

陈永迪 文革研究学者，1961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62611 班）

##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陈永迪

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勤务组成员田春林在《昨天》54期（第一个北京地院专辑）上发表的回忆录，写到为了摸清中央戏剧学院文革的真实情况，他和清华的张云辉亲自到军事科学院调查，接待他们的是军科的胡秉权主任，田写到：“对话主要由我和胡将军之间进行，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们来就是证实中戏红旗魏阳他们反映的有关叶向真和中戏文化革命情况。胡将军也毫不掩饰和盘托出。从他的话中证实了中戏红旗的同学介绍的情况完全属实：一、中戏工作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二、工作队在中戏期间扶持成立了校文革领导小组，其组长就是叶向真；三、工作队在中戏领导运动期间也无例外地执行了刘邓错误路线，整了反工作队的少数同学，但在工作队撤出学校时，这些黑材料都全部移交给了叶向真为首的校文革（胡将军说，我们是军事机关，要那些材料有什么用呢？）；四、中戏以叶向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我们这里抢所谓黑材料并冲击军事机关档案室，是十分错误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保卫档案室，我们的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他们有的人对我们战士大打出手，造成战士负伤，有的当场昏倒。但我们战士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我问胡将军，叶向真明知这里没有黑材料，那她为什么要策划这次行动呢？胡笑笑：赶时髦呗！表示自己是革命左派嘛！当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确实有那么一阵抢材料的风气。”

这件事，我是参加者，据我的亲身经历，当时发生的“严重冲突”，是我们这些奉命去“抢黑材料”的学生与警卫战士之间的拉扯之类肢体冲突，在这过程中可能有人受伤，但不是殴打武斗那样的“打伤”。现将具体情况回忆如下。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也可能是11月初），天气比较冷了，不少人穿上了棉衣。一天上午，系里通知我们去执行任务，没有说明任务的性质，去什么地方，只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跟着头儿走到学九楼前，看见马路边停了几辆军绿色

大卡车，车上的篷布拉得严严实实。

我被安排在倒数第二辆车上。上车后待了好一阵没见动静，也不准我们下车。大约半小时后车开动起来了。车篷的遮挡使我看不清沿途的情景，但是感觉车在往西边走，过了中关村转往颐和园方向，沿着颐和园的外墙进了西山。

车停在一个大院的马路边，我跳下车来好奇地观察，院子坐落在群山之中，大院很开阔，笔直的马路伸向远方看不到尽头，路边的白杨树高大挺拔。凭感觉这是一所军事大机关，一般军事机关大门一人站岗，而这里哨兵是两位，在马路上行走的军人穿呢子大衣的居多（1965年取消军衔后，没有肩章很难区分干部的级别，但是可以凭军官的大衣判断，校官以上的军官穿呢子大衣，尉官穿棉大衣）。这时领头的同学（是外系的，不认识）叫大家集合，在头儿的身边站着几位外校的红卫兵，正在焦急地向我们头儿介绍情况。这帮人长相不凡，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帅哥靓女，后来才知道是中央戏剧学院叶向真派来的，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捷足先登，因人数太少被警卫战士赶出来了。

我们的头儿听完他们介绍后，向我们宣布：“今天的任务是抢‘黑材料’！”文革初期，北京的学生冲击各校领导，中央派工作组控制局势，工作组与学生产生激烈冲突，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整了他们很多“罪行”材料，我们统称“黑材料”。后来中央下令撤工作组，要求将整学生的材料一律销毁，不少工作组阳奉阴违，并未按中央的要求彻底销毁。于是学生们采取暴力手段抢夺，“抢黑材料”由此得名。头儿在讲话中没有交代是那家的“黑材料”，谁整的？整谁的？“黑材料”为什么放在军事机关里？他只强调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指哪儿打哪儿。那时我们对“抢黑材料”之类的行动都很有兴趣，把那些“黑材料”从神秘的角落里挖出来，当众曝光当众销毁，就像猫抓住老鼠一样令人兴奋。

训话完毕，由外校红卫兵带领我们走到一座大楼旁，大楼很气派，规模相当于我们学院办公楼的四到五倍，楼后面的小山坡上鳞次栉比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楼房。我们的队伍在办公楼西边的一座楼前停下来。楼的入口已被警卫战士封锁，战士们手挽手排成横队严阵以待，这阵势暗示我们“黑材料”就藏在里面。

这时一个军官站在楼前向我们喊话：“同学们，这里是军事重地，不许进入，请马上撤离！”一位同学针锋相对地喊道：“解放军同志，楼里藏的是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只要交出‘黑材料’我们马上撤退。”那军官说：“我不知道什么‘黑

材料’‘白材料’，我只知道这里是军事重地，上级命令不准无关人员进入，请你们马上离开！”。

当时大楼旁还站了不少军官在看热闹，我感到很奇怪：这栋大楼要真是军事重地，为什么军官们不奋起保卫？看他们的表情冷漠而无奈，我还听见一位军官给旁边一位说：“怎么回事？院里的领导一个也不出面，真不像话！……”

僵持了一阵，我们终于拿出造反派的脾气向入口发起冲击，由身强力壮的大个子同学打头阵，组成锥子队形向战士的队伍钻进。我也跟着一组人往里挤，挤了一会儿就挤不动了，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再看战士队伍像一堵墙一样巍然不动。他们毕竟是受过训练的军人，我们这些书生那儿抵得过。

正在一筹莫展时，在大楼四周转悠的探子悄悄来报：发现藏“黑材料”的房间了！那房间就在一楼，此时传来咣当一声响，只见一位同学用砖头砸烂那个房间的窗玻璃，打开了窗户，飞身跳入，其他同学也跟随其后从砸开的窗口往里跳，人群不断涌入藏“黑材料”的房间。

我也跟着爬了进去。那房间和我们学校小教室的面积相当，屋里空空荡荡，完全不像胡将军说的“档案室”，如果是“档案室”应该有放置档案的柜子或架子，这一切都不见踪影。屋子的墙角堆了一些纸箱，估计那箱子里装的就是“黑材料”。进屋的人很快自动排成两行，形成“传送带”，把纸箱往外送。正当我们庆幸“战利品”来得如此轻松时，房门突然被踢开了，七八个战士冲了进来，他们奋不顾身地扑向纸箱和我们争抢，拉来扯去混战一场。

危急中，有人果断指挥一部分同学堵住房门，将企图增援的战士挡在门外，屋里这七八个战士孤军奋战哪里是我们的对手，有的被按翻在地，有的被挤在墙角动弹不得，局势很快被控制。我们继续把“黑材料”往外传。

不一会儿，屋里的“黑材料”传完了，我跟着人群从窗户爬出来，支援正在进攻大楼入口的队伍，目的是进到楼里搜索其它房间是否还有“漏网之鱼”。

经过紧急磋商，头儿决定改变战术，把“往里挤”改为“往外拽”，每四个人一组同时抓住一个战士的手和脚，大喊一声使劲往外拽，战士们被一个个拽了出来。每拽出一个，外边的同学就鼓掌欢迎，我们跟着喊口号：“欢迎解放军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的战士被拉出去后又冲回来，再拉出去再冲回来，还有战士泪流满面哭喊着向我们扑过来，估计他们因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守卫任务

而羞愧气愤。一位同学在我面前悄悄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我也打心眼里佩服，这样的战士上了战场，肯定个个都是英雄。

楼道清理完毕后，我们又将屋里被控制的战士一个个往外拽，最后在全体同学的掌声中，战士们全部被拽出了大楼。经过搜索，没有发现其它房间有“黑材料”，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

北京的初冬已经很冷了，我们和战士们反复“拉锯战”，都已筋疲力尽，而那些看热闹的军官们穿着大衣在寒风中冷漠地站着，仿佛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摔跤比赛，这一幕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回到学校后，心中的疑问挥之不去：那天去的哪儿？为什么“黑材料”藏在军事机关里？我们在为谁卖力？

几天后，终于在学校的马路上遇到带队的同学，我想事情已经过去，应该解密了，于是大胆向他提问。他很爽快地告诉我：是给中央戏剧学院的叶向真抢黑材料，藏黑材料的地方是军事科学院。

后来我了解到，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她和我院东方红的头儿朱成昭关系非同一般。我只能猜想，那天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先到军科抢“黑材料”，因寡不敌众被警卫战士赶了出来，于是叶向朱成昭发出增援请求，朱成昭欣然承诺，并直接命令我们去救场——这大概就是身为东方红公社勤务组中分管“作战”的田春林也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原因。我们到场后看见的那些行动失利情绪焦躁的帅哥靓女都是叶向真的部下。

想来军官们对我们的行为很不解：军科院是军事重地，谁吃了豹子胆敢把地方上的造反派引进来？为什么院领导没有一人出面阻拦？面对上百人的“抢劫大军”，手无寸铁而且奉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战士又怎能抵挡得住？

然而叶向真也有软肋，她的第一任丈夫刘诗昆文革初期被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人物”，刘诗昆在上海的家被红卫兵查抄，报纸上已经公开点名。因为有刘诗昆这根软肋，工作组进中央戏剧学院后她很配合，工作组投桃报李，任命她当中央戏剧学院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工作组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人被毛主席赶下台，在革命群众面前低头认罪，赔礼道歉，所写的“黑材料”一律销毁。叶向真见工作组大势已去，很快举起造反大旗反戈一击。她的马仔早已打探清楚，工作组整的“黑材料”有部分藏在军科院，领导们碍于叶帅的面子不会阻拦也不敢阻拦。怪不得有军官抱怨院领导躲哪儿去了，可怜那些忠诚的战士们

汗水白流。

有人将事情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后来叶向真和朱成昭都被抓起来了。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批评叶向真在北京带头搞绑架（指绑架彭真等人的事），也提到叶向真“首先冲击军事科学院”，指的应该就是那次“抢黑材料”的事。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昨天》第 107 期)

# 被遗忘的群体

程关林

颂扬它时，说它是“反修防修”也好；批判它时，说它是“一场浩劫”也罢；但确是“史无前例”、“触及灵魂”。这，就是现在人们有意无意弄得谈虎色变的“文化大革命”，或曰文革。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想写一点走在祖国石油天然气产业最前列、理应感动中国的石油地质队员们的史实时，扯来扯去，动不动却跟文革挂上了钩？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认为，对于文革，应该正视它而不是留下十年的历史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在哈佛，不少学生选修文革课程，而中国的年青一代，反而对这一段虽然痛苦，却客观存在的历史茫然无知。

我想告诉年轻人，文革及其曾担纲其中主体的红卫兵，绝不是当今你们所见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中那样的无头脑的群氓以及只知挥舞皮带打砸抢的地痞的一幕闹剧，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人们从茫然到醒悟的灵魂触动，是其它年代不可能有的。原来，我动笔的念想还是源于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教诲。而且，似乎与我有类同想法的同龄人还不在少数。因此，本文在朱德瑜老大哥下达征文启示一、二年前，基本上已完稿。

而今，不少当年的“造反派”在网上大书特书，一个“三司”司令问题就争得个不亦乐乎。却鲜有“老保”出来说几句话，当年的“老保”，或曰“保守派”、“保皇派”，成了被人遗忘的一个群体。

国外研究文革史的应当能收集到北京高校天、地两派各自出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虽各抒己见，但幕前大事基本有所反映，幕后活动可寻蛛丝马迹。“老保”由于迅速垮台，故不可能出此类记叙“战斗历程”的东西。然而，一个舞台，只有正面角色，没有反面角色，或者只有主角，没有配角，好像难以成戏。

其实，北京地质学院不仅造反派“东方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因“天、地”两派的“地派”而闻名，它的对立面——老保“斗批改兵团”、“红卫兵”，同样蛮有特色。本人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为研究文革史的人们提供一个提纲式的回忆。讲一讲文革中一些较轻松的花絮，尤其是当时的心理活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地院21643班某宿舍同学间有一次争辩，余久芗等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兆。祝天惠等认为，是历史学界学术之争。这是我们上大学以来，同学间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不同政见的碰撞。平常我对问题的反映还是比较敏感的，此时却哑口无言。因为其间究竟哪一种观点正确，已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1966年4、5月，辅导员赵永芳组织学生集体学习，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

自从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后，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信念已在我脑中扎根，但中国政坛的风云，还是让我们无所措手足。

业务课停了，连篮球场都空荡荡的。同学之间议论并不多，大家都心事重重，一副忧国忧民的沉重。

1966年5月底还是6月1日，我班李昌平等贴出全校第一张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包括我在内，我班大部分同学都在此大字报上签了名。逻辑是：北京市领导出了问题，与北京市委关系密切的院党委脱不了干系。院党委立即组织人马用大字报反击，后称“六三”反扑。

1966年6月上旬，以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为团长，政治部主任卞固为副团长的工作组进驻地院。

6月17日，工作组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这可是捅了马蜂窝。“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显然低估了当了七、八年地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高元贵在全院师生中的威望和号召力。即便是6月初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矛头所向，也是聂克、周守成、刘普仑等人居多，针对高元贵的很少。

1966年6月20日，首都各高校先后莫名其妙地反对和驱赶工作组，地院周永璋等学生拿着李贵（院教辅处长，工农干部，造反派，后为革委会二把手）的破床单游行，后演变成反对和驱赶工作组的事件。

工作组才进校几天，就有人苦大仇深地反工作组，而且首都各高校几乎都统一在“6·20”，没有高位者摇羽毛扇，才怪！可惜至今仍无人坦陈。

我对院党委并无要去“打倒”的仇恨，工作组进院，引导大家联系：院党委→高教部蒋南翔→北京旧市委，我们也不知所以。对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更无深仇大恨。我茫然，每天在地院、航院、钢院、矿院等看大字报，认真地看、摘抄。我班蒋浩旋、黄凯生、朱冬梅等同学通宵达旦，写了汇报材料。清晨，专门去国务院接待站，咨询对反工作组及保工作组的看法。

6月，北京的初夏，正是柳絮纷飞的季节。北京地院贯穿东西向的柏油路，宽敞豁达，路两旁高耸的白杨，枝繁叶茂。往常晨起时，师生在路上跑步操练，傍晚，师生在路上漫步谈心。而今，铁丝绕过树干，粗野地将苇席固定在白杨之

间，一层层的浆糊，一层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抒政见。一个个都自以为最领会毛泽东思想，最紧跟党中央精神，一个个的聪明才智跃然于大字报字里行间，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写写大字报，就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豪情。

我也是参与者，但更多的是忧心和迷茫。地院师生引以为豪的大马路、林荫道，留在我印象中的，却是：

白杨、柳絮、林荫道，  
大鸣、大放、大字报；  
浆糊、粘土、使劲造，  
迷茫、盲从、瞎胡闹。

很长时间，闻着香喷喷的贴大字报用的浆糊，想着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情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一种红色的粘土代替了浆糊，心中略感平衡。写大字报的纸，一捆捆，一卷卷，每天不知耗费多少。真是家大业大啊！不过，闹革命么……孰是孰非，岂是我一个年刚 19 岁，从小在江南小镇长大的穷店员的儿子所能判断的——到底谁是在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

6月21日，到各院校看了一天大字报没看出个所以然的我，左思右想，决定找工作组提意见，理论理论。邹家尤可能听到我在门口要见他，工作人员不让我进去的争吵声，开门让我进去。门一开，一位浓眉大眼、敦敦实实的人正跟邹部长告别。后知，此人叫胡守安，地院司机，曾经的小八路。

见到邹部长，一肚子准备好的话，不知从何说起。邹家尤给我倒了杯水：“别着急，有意见尽管提。”我对派到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不了解情况就指手划脚不感冒，对工作组一些做法有意见，但我又不同意赶工作组，因此，言词并不尖刻。邹部长从“四清”时毛主席就派工作组，他自己也作为组长去陕西讲起，一直讲到“6·20”：“有意见可以提么，像你这样就很好，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否则，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有意见，想不通，随时可来找我。”

祝天惠去清华还是北大，会见比他消息还灵通的高干子女“哥们儿”，回来后动员我保工作组。我欣然同意。此后，从参与者跨入积极参与者行列。并与胡守安、祝天惠、李唯宇等成为“东方红公社”实际上的对立面。虽然地院东方红在文革时学生中有周永璋、朱成昭、蔡新平、蒋良朴、王大宾、殷惟侯、田春林、杨雨忠，聂树人、孟繁华、朱德瑜、胡乐成等。

毕竟，高干子女们比我们要了解中央的意图——在政治运动中，在大是大非中，站错了队可是一辈子的政治生命——1957 年的右派就是前车之鉴。

副部长胥光义带着薄一波副总理批示来地院，先开会。传达文件分三批：支持工作组的，中间态度的，反对工作组的。第一批人开会时，并没人通知我。邹家尤看到在马路上张望的我，叫上我进了会场。我一看，我班已有几个同学在，

他们是谁通知的，不清楚。

“反干扰”开始，我算“左派”，与班上反工作组的同学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动机、效果的文章，无批斗现象。然而，虽说是批评、自我批评，但硬要反工作组的同学承认因“效果不好”，动机也说不上好，也是挺折磨人的。宋永坤就一直坚持：“我动机是好的。”后来干脆一声不吭，以示抗议。我们也无可奈何，毕竟都是同班同学。我也没忘记，湖北半工半读劳动，宋永坤被分在最艰苦的测量组。须知，在到处是悬崖陡壁的天柱山测绘地形地物，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他始终没叫过苦，也没炫耀过。

我与张聪贤等追查“6·20”的后台，从吉让寿、白美騫等11621、11622班学生追到安静中。我和张聪贤本是去调查安静中的，反被安静中一席话说得无言以对。

我和安静中素不相识，但久闻其大名。“安静中道路”的说法，地院人都知道，他是地院团委书记，28岁就当了院党委委员。我从来自傲，可在安静中面前，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1967年后，多次与他（我们都已叫他“安静”）、小濮（大家这么叫濮大姐）交谈，听安静一席话总能解我之疑，解我之惑。与安静只要见面，当晚必定聊至达旦。

由于有余久芗、黄凯生两个“大个子叔叔”，我只能被安、濮的长子安天剑称为“小个子叔叔”。

在追查“6·20”后台的过程中，江祖如老师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参加了地质系对江祖如的批判会，接触了几次，“又臭又硬”是江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

8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在学校马路上见江祖如骑车而停，周永璋从江手中接过自行车骑上，急匆匆而去。我骂了句：“又他妈搞反革命串联去了。”江瞪了我一眼，没理我。当后来我与“二团”一起反“左”时才知，周永璋那时正为成立“三司”而奔忙。

江祖如爱人钱佩娟大姐也是位女中豪杰，后来为地院校友会没少出力。我2008年前曾是校友会新疆分会的会长，再加上江老师的关系，凡到北京，必去安静中、江祖如家。

1966年7月底，工作组撤走前夕，祝天惠、王秀英、程秀梅和我，应邀列席地质部党组会议。何长工主持会议，旷伏兆、胥光义、邹家尤、卞固等与会。还有的人，是否有宋应、李轩，不认识。李四光部长为何未到会，也不清楚。王秀英哭着问何部长：“工作组为什么要撤走？”4个学生中，3个高干子女，就我老爸是平民百姓。我并不自卑，但由于不懂礼数，只能聚神聆听。何部长长叹一声：“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派工作组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明白了，这是一次向保工作组的学生的打招呼会议。

工作组进地院后，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听何部长这一说，我都懵了。也是从那时开始，隐约间感到，毛主席与刘主席好像对文化大革命意见不一样？

7月底，8月初，我与祝天惠等人在北五楼前贴出大字报《全院红五类子女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保工作组的许多“红五类”子女都签了名。如朱成昭、聂树人、王大宾、田春林等。其中，我与聂树人熟识，因我是院文学社社员，聂是院文学社副社长，挺器重我，经常指点我写作。认识田春林是在篮球场，他是校队的（我也爱打球，但1968年才进校队）。

1966年8月4日，我和祝天惠发起，与张聪贤、黄凯生、王锡金、武玉印、陈生宝、王秀英、程秀梅等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并在学九楼西墙贴出《宣言》。《宣言》由我起草，祝天惠修改定稿，黄凯生用漂亮的宋体字书写。因在此《宣言》中，我们保工作组的态度鲜明，我又是第一个在上面签的名，所以后来各“老保”战斗队找我们“红卫兵”串联时，都是找我。

我们这一“红卫兵”组织，在北京高校乃至一些中学里，在全国，都可算得上是“老红卫兵”。

继我们“红卫兵”之后，李维宇、王庆山（后为程秀梅丈夫，两口子分配到甘肃白银市某矿山）等人随即在水文系成立“八一”战斗队，其骨干是军人子女，广播台的李绥胜（后为李维宇夫人，两口子1968年辍学去301医院从军，再转业到广州市）是其一员。他们在广场给学校右派剃阴阳头的举措轰动全院。对此，我大不以为然。李维宇对我的劝告回答：“你太右！”后李维宇去一司任后勤部长（一司是司令值班制），走前郑重地对我说：“我去跟兄弟院校打交道，院内的事就靠你们了。”

8月上旬，胡守安叫上我，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我一看，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转移到何处，还是销毁了，我没过问。我只是明白，工作组确实整了学生的黑材料，但我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个人。

1966年8月中旬，勘探系红卫兵（程关林）、水文系八一队（李维宇、王庆山）、物探系红旗（王洪超、王震亚）、地质系红星（毛炎超）、探工系火炬（苏椿）、研究生造反队（刘益康）以及工人赤卫队（胡守安、刘强）等人在院木工厂召开联席会议，商量成立“斗批改兵团”和其中的红五类子女并入我们勘探系红卫兵，扩充为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事宜。我们勘探系红卫兵办公的南翼楼也成了红卫兵总部。当时议定，以与会各组织的头头为主，成立总部。

这个全地院的“红卫兵”算是8月21日成立的，有第一期“红卫兵报”为证（我未收集到第二期“红卫兵报”，可能就出了一期）。但它一成立就背离了木工厂联席会议精神，是个松散组织，背后仍是工作组时的文革小组。一些人，既要

揽权当官，又不愿冲锋陷阵，更不敢出头办事。各战斗队也互相不服。

而能调动人员与“东方红”的行动相抗衡的，也就是工人赤卫队和勘探系“红卫兵”、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等战斗小队。去经委、工交口、地质部保老干部，去《红旗》杂志社辩论……大部分有可能被人“秋后算账”的重大任务都是由胡守安与我互相通知，由“工人赤卫队”及少数红卫兵骨干执行。

勘探系“红卫兵”与水文系“八一”关系最铁，我那时穿的军装，系的皮带，背的挎包，都是李维宇、王庆山他们送的。研究生“造反队”的商锡钧、刘益康等以出谋划策为主。

对商锡钧、任士田这些学长，我和祝天惠很尊重，但互不干预。对另一总部成员王××，则不太感冒。

8月18日晚，北航红卫兵二男（似乎叫李明清、赖锐锐）二女专程到地院找到我和祝天惠，问道：“今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们为什么没去？”我们说：“没人通知我们。”“太遗憾了，主席跟我们握了手，还照了相。”说完，向我们伸出手来：

“握握我们今天跟毛主席握过的手吧！”

8月24日晚，地院操场西头搭了个台子，造反派、老保两派大辩论。中央派陶鲁笳主持会议，自然居中而坐。他右边是代表我方上主席台的任士田（斗批改）、程关林（红卫兵）、胡守安（工人赤卫队）；陶鲁笳左边是对方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贾振远。这也是地院文革中唯一的两派同台亮相。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当晚，我派不少人就宣布退出红卫兵（或斗批改）。我方辩论组组长谷尚（上？）礼、副组长王××也被撤换。可以说，“8·24”大辩论后，院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坚持的只是勘探系“红卫兵”等各系保守派战斗小队及工人赤卫队。

奇怪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次又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在辩论会前还热情与我方代表握手，还拍拍我肩膀。而当双方正辩论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他递了张纸条后，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对“东方红”代表唯唯诺诺，低声下气。

8月25日凌晨，我正为陶鲁笳在辩论会上表态支持“东方红”而恼火，祝天

惠来电话，说陶鲁笳、李人林要接见祝、程等人。我正生着陶鲁笳的气，未去。一个多小时后，祝天惠敲开我的门：“国务院工交口是支持我们的，会上表态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央文革的也到了辩论会现场。今后调子要变……”

我方按此调，回避工作组问题，强调向前看，革命学生团结起来，共同搞好院内斗批改。此举收效，一批人宣布退出“东方红”。但大家已明白，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是支持“东方红”的，所以大局已难以挽回。由于周荣鑫曾向胡守安和我面授机宜，所以我底气还是很足的。

院内失势，“东方红”将矛头指向地质部。

“东方红”几进地质部静坐示威，直至绝食。我带人去地质部，担任保卫地质部总指挥（卞固任副总指挥）。一个多月，我睡在部传达室长凳上，盖着我二姐夫给我的旧棉大衣。有时还得回校。来回串，或车接送，或步行。亢奋的激情下，人并不觉得累，反而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动力是：井冈山朱、毛会师，还是何长工当的联络员；王佐还是何长工去收编的；留法时，何长工还是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我们保的，正是何长工为党组书记的地质部。

“东方红”一进、二进地质部，也是哀兵动人，声势很大。祝天惠、王秀英等不太放心，多次打电话询问。我对祝天惠说：“你们抓好院内的斗、批、改，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东方红”几次揪斗何长工、邹家尤等，都被我带人抢了回来。

保卫地质部的主力军其实是名噪一时的中学生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对于我们红卫兵中的少数人向“西纠”提供在静坐的“东方红”人员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姓名，由中学生对他们辱骂的做法，我并不同意，但作为总指挥，又不便公然反对，只能持保留态度，否则，又是“右”。

对于“‘东方红’，脸皮厚，原子弹，打不透”之类的辱骂，我认为也属下三滥，没什么水平。倒是形容“逍遥派”、“骑墙派”的圆滑——“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的对联，还觉得有点意思。至于“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纯属地痞语言，我从不附和。

反正在这期间，“东方红”到处去造，我们跟着到处去保，仅国家经委就去了几次。对方显然有高人指点，我们每次行动都落后一步，但总算未让那些革命元勋受到冲击——在我们组织还未垮台时。

8月下旬（？），“东方红”批斗邹家尤，我和胡守安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将邹部长救出，藏在西三楼。邹衬衣血迹斑斑。

与邹部长1966年9月在地质部分手后，再次见到他，是1973年初。那天，我在地质部招待所办理住国务院招待所证明，见一熟悉的中年人在院子里扫地，

这不是邹家尤吗？我连忙上去问好。邹部长很激动，没说话，拉着我去他家——招待所后院的小二楼。并见到了邹的夫人，原地质部石海局财务处长姜坤。

提起姜坤，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的老同志都用“干练、豪爽”来形容。我见她时——一个被造反派折磨得神志不太正常的老女人。姜坤半倚在床上，听完邹的介绍后，无神的双眼泪光闪闪，握住我的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由于病中的姜坤盼望有人跟她聊天、讲故事，我又不常在北京，所以征得邹同意，我带博学多才，又善于表达的常江见了邹、姜。几个幽默的政治笑话一讲，常江也成了受姜坤欢迎的人。邹部长说：“她对谁都不愿理，难得跟你们俩这么谈得来。你们以后可要常来啊！”

我远在青海、新疆，也就趁出差到北京看看他们。常江倒是经常去问寒问暖，跟他们聊天解闷。

我已经记不得去过邹部长家多少次了。只记得 1976 年底，邹部长托人从北京给我带了封信来。信中言及，他已重新工作，问我是否想调北京。我回信深表感谢，同时示意，要自己闯道。

八十年代初的一次，还是在西单皮库胡同地质部招待所后院，邹部长家。姜坤精神比原来好多了。见我后，拿出一大叠照片，问我认不认得照片上的人。我仔细地看了看，全都是记录地院“东方红”造反史的。几进地质部，抢广播台，揪斗老干部，示威游行——上面许多人我是认识的，但我不可能指认谁是谁。也不知是谁居然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邹部长等人，让他们“秋后算账”。邹家尤比较大度：“小程，别听你姜姨的。”并对姜说：“那时他们才多大？”姜不服：“里面还有不少造反派老师，可不是学生娃。”邹摇了摇头：“当年这些事，又有谁说得清楚。好歹我们没被整死，能活着看到粉碎‘四人帮’，你我就知足吧，别为难小程了。”邹要带我去看望何部长，我说：“跟何部长不太熟，算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悔。

邹部长离休搬到复兴门部长楼时，姜处长已病逝。我最后一次见邹部长，是 1993 年 12 月。我和常江去看望因患癌症在家养病的邹部长。我特地叮嘱常江：“这么多年，我们也没跟邹部长合个影。这次，你务必带上照相机。”现在我保留的我和常江、邹部长、邹部长后娶的夫人的几张照片，就是那次拍的。邹部长很瘦，但精神还好。饭后，边喝茶边聊天。邹部长说：“去年，我到武汉参加了北京地院 40 年校庆，很受感动。希望中国地大能发扬北京地院的好校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为地质事业献身精神的优质人才。”

我和邹部长相交二十多年，他对地院造反派，从来是谅解、谅解再谅解。真正革命者的胸怀。

由于“十六条”中有关破除“四旧”的号召，以中学生为主体，北京街头改

路名，砸招牌，谓之“扫四旧，立四新”，党报又表支持，一时声势浩大。

8月上旬，我们红卫兵刚在南翼楼安营扎寨，就有人来报告：地院附中红卫兵到院图书馆“扫四旧”去了。我急忙带人去图书馆。沿途，一堆堆的书冒着一股股浓烟。我心疼、恼怒，因我爱书、惜书，家贫又买不起贵的书：“他妈的，这不是焚书……”赶到图书馆，馆方老师们正阻拦着那些不知高低的中学生，眼看挡不住了。我们一去，形势大变。我把领头的附中学生叫到一边，亮明我的身份、观点，他带人撤走了。我跟图书馆领导商议，象征性地烧一点本该卖给收破烂的书刊之类就行了。此后多年，我一直是图书馆的上宾。

1966年8月21日，院红卫兵成立后，就宣布扫四旧、抄家。我是8月20日从祝天惠那里得知此事的。闻讯后，与祝天惠连夜通知一些教授，让他们有个准备。后来赵鹏大家的高跟鞋（安娜的）、周守成家的美人照片等，都是我叫人退还给他们的。

说起以扫四旧为名义，对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的违法抄家，多说几句。因为我毕竟了解一些情况。

抄家是由北京中学红卫兵掀起，从而席卷北京，乃至全国的。

“抄家”，在北京地院是谁提议、谁组织安排的，反正我不清楚，也就是说，至少是背着我和胡守安等人决定的。这当然与“斗批改”兵团与红卫兵的组织建制有关。多中心，各山头谁也指挥不了谁。祝天惠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东方红”一致——“死老虎”，有什么可打的？作秀（现代词）！

当时胡守安和我直接听从国务院、工交口、地质部领导指示，实际在指挥两派斗争中我方被动应付的多，所以对“抄家”之类事情，也不太过问。是情况所迫，才不得不过问的。

抄家的第二天，我照例去南翼楼上班，走廊里，几间原先空闲的教室堆满了沙发、弹簧床垫、高跟鞋之类“四旧”物资。也没人张罗、登记。见到任士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反问：“你也是总部头头，怎么问我？要不你帮助管管。”于是，我自命为“造反办公室”主任，任命恰巧在我办公室的地质系69届的任金龙（浙江人，戴眼镜）为副主任，工作人员就物探系的平文田。叫了几个人，将走廊里堆放的东西全部搬到教室内。

一接手，发现状况比我预计的好得多。首先，抄家时，基本上由被抄者所属单位的红卫兵负责，即有组织；其次，抄走的东西全作了登记，一式复写三份，被抄者、去抄者各持一份，交红卫兵总部一份，且有双方签名，即已备案；此外，绝大部分抄来的“四旧”存放在“教工之家”，准备在那里办“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

我是这样安排的：凡列入清单的物品，均在总部登记，由我负责登记在一本

蓝封面、土黄色纸页的“保密本”上（困难时期印制的本子）；任金龙去“教工之家”，持总部那份清单，负责登记查对准备在那里展出的人员（我记得有冯景兰、袁复礼、杨遵义等）的物资，并筹备展览，对展出物品负责；平文田督办：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反动物证、现金等必须在三天内查清，务必账物相符；总部（即我处）只保留登记本，其余物品（沙发及床垫除外）均移交“教工之家”任金龙处。可以说，当时核对全部账物相符。

在“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展出时，贵重物品还全部与我登记本上记载的相符，至于后来，我就不清楚了。

凭心而论，1966年8月，“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的“前言”和“不结束语”还是十分精彩的。作者是常江，满族人，本姓成，物探系61届，地院广播电台台长、院文学社副社长。其诗词在地院颇有名气，时而上台即兴朗诵一首，掌声四座。我在院文学社里，也攻诗词，挺崇拜他。然而，有缘结识常江，友谊至今不变，是缘于我找“不结束语”的作者。

我问他，为什么将“结束语”写成“不结束语”？常江得意地回答：“革命尚未成功！”后来，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不少“不结束语”，是否由此而来，谁是首创？不得而知。

地院“东方红”到国家经委造反，我带人去保护薄一波，常江在其中。我带人去红旗杂志社，与关锋、戚本禹辩论，常江在其中……

我毕业后分到青海，很快联系上在湟源县青海地质局物探队工作的常江。在青海，同搞物探，我借工作之便，去湟源物探队看过常江多次，他也到平安驿看过我和杨明英几次。常江夫人也是68年北京支边青年。只要我到北京，除了安静中家，常江家是我必须在那里借宿的。常江调回北京前，在北京住在象前街。

抓“五一六”时，正赶上我去湟源。一进院子，常江家周围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无非是该打倒常江这个“五一六分子”。我不管那一套，径直走进常江家。在门口，我对围观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八张纸一个字的标语，哥们都还没害怕过，这小阵势，吓唬谁？！”就在那一次，我对常江说：“你的近作（油印的）已经拜读，就‘庐山颂’中‘放眼大江东去，昂首万里云天’一句，有气势。”此诗后来普得好评。

常江调回北京地院后，专攻楹联，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专著出了不少，还是我国楹联协会秘书长、作协会员。逢年过节还经常在电视上就楹联而露露面，俨然成了中国楹联大家。

1966年8月21日地院统一组织的抄家，我没参与，却在红卫兵总部一些学长的忽悠下，冒全院之大不韪，于8月23日带人去了市里高院长家。结果是一张纸片也没抄来。“老运动员”高元贵早把跟高教部等有关的材料付之一炬。一无所

获的我问高元贵：“怎么回事？”高直言不讳：“等你们来，我早处理掉了。”此后，不仅与高院长成了忘年交，还多次得到他的教诲。

那时，地院党委陷于瘫痪状态，对群众运动毫无惧色的是高元贵。高院长曾指着马路两旁的大字报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时，我就负责游行队伍的车辆调动。”我只能自叹不如。

而此后当我重提“抄家”这件往事时，高院长说：“你想想，我18岁就搞地下工作了，跟你文革时年龄差不多。能让你们从我这里抓到北京市委、高教部的把柄吗？”

高院长有两次谈话，我记忆犹新。

一次是1969年5月的一天，珍宝岛事件不久，我去西三楼高院长宿舍。高院长正看着报纸，抽着烟。屋内，一桌、一木椅、一木床、一方凳，简得不能再简。高见我，指指方凳，示意我坐下。将桌上的“飞马”烟、火柴往我跟前一推，示意我抽烟。没等我开口，高院长便道：“不用你说，肯定是问我对珍宝岛事件的看法。”我惊讶地点点头。高轻轻地咳了咳，吸了口烟，如同在向全院师生作形势报告：“中苏珍宝岛之战，不会引发两国大规模战争，世界冲突的焦点在欧洲和中东，是美苏之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际经济利益是政治的基础。中国也是同样，别看现在乱，也必将由大乱走向大治。”

1983年春节过后，去铁狮子胡同15号探望多年未见的高院长。一见我，他就关心地问我：“在单位上有没有因为学校（文革中）的事受到冲击？”我说：“没有。”“那就好，那就好。我当地质部顾问后，已给不少受文革株连的同学的单位去了函……”询问了我在毕业后的经历，又嘱咐我：“如有人找麻烦”，尽管找他这个院长。

话锋一转，他说：“你们这批学生中这次可能有人能当副部长。”又问我：“××文革中是哪一派的？”我一时想不起来，高提示：“跟商锡钧一个班的。”我马上联想到文革中的往事：“他跟我和商锡钧、刘益康一派，百分之百‘老保’。我担保！”“这我就放心了。”高院长挺高兴，跟我解释了一下：“有人在×××进部党组时就不放心，怕他是‘东方红’造反派。”

临别前，高院长说了一番当时令我莫名其妙，却使我后来走上经济管理之路的良言：“你应该学点政治经济学。地质部门要有一批懂经济的专家。地质事业要兴旺发达，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我1989～1991年在南开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以平均成绩93分毕业，受到蒋承菘副校长接见专谈，未辜负高院长期望。

那次离开高院长家，才想起，1976年2月，我在北京见到了安静中和濮大姐。安静曾告诉我，高院长1975年参加了周总理抱病在景山召开的部分老同志会议，这是继邓小平复出后，总理所作的又一战略部署。……我应该问一问具体情况。

可惜，安静中、高元贵两位人杰已成鬼雄，再也问不成了。

文革初期，我与“东方红”头头打交道最多的是蔡新平。1966年8~9月，我与蔡新平有过多次交锋。

一次是他向我们红卫兵借广播器材，居然有人借给了他。也有人当即向我报告了。我赶过去，蔡新平已走。我一问，连借条都未打！我顾不上内斗，急忙带人赶到教三（四？）楼“东方红”总部，找蔡新平理论。他道理比我还充分：“都是地院的群众组织，都是国家的财产，凭什么你们占了院广播台，我们连一个话筒都没有？”我说：“不管你怎么说，借东西总得打个借条吧？”他避而不答，自信地说：“等革命胜利后加倍还给你们。”

另一次是我接到“东方红”内部线报：王大来老师已回到地院，就躲在教五楼地下室。凌晨2~3时，我带人悄悄地从南翼楼赶到近在咫尺的教五楼。地下室的铁门紧闭着。我们一敲门，隐约间可听到里面有杂乱的响声。敲了一阵，蔡新平出来了。“又是你”蔡新平见我没好话。“怎么啦！你们‘东方红’窝藏北京旧市委的黑典型王大来，还有理了？”我理直气壮。蔡新平略有点慌乱，但迅即来了一句：“谁说的？”“这你就别管了。”我感到已打中蔡新平的要害，看他怎么狡辩。见我们硬要往里闯，蔡新平急了：“你们有没有搜查令？！”那时，谁想到，又怎么能办到搜查令？但“老保”是讲国法、政策的，明知王大来就在里面，也只得打道回府。

第三次，“东方红”在地质部闹腾未果，无奈之下，宣布绝食。我在那里保卫地质部，当然知道他们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并无当年革命烈士在国民党监狱绝食的境界。所以，我令人从地质部食堂抬来两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几个人分头劝说“东方红”的同学吃饭。眼看我们有所收效，刚刚赶到的蔡新平急了，他站到凳子上，张开双手吼叫：“大家不要上当！我们绝食的革命行动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和肯定！”他接着讲了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三条指示，不仅重新鼓起了“东方红”同学的士气，我方顿觉：“这下完了。”

后来，蔡新平与牛彩茹结婚后，我在北京“全聚德”贺请他们，曾向嫂子牛彩茹讲了文革中与蔡打交道，领教蔡诡辩技巧的趣闻——我的话是：“九头鸟，狡猾狡猾的。”

1966年9月，“东方红”由田春林带队抢广播台，我和刘志强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护卫广播台。“东方红”的人还拍了不少照片。一位木工厂的工人告诉我，我说：“不管他。”我们人多，把他们的人一个个“请”了出去。双方都未打斗——北京地院文革中自始至终未发生两派武斗。

鉴于斗批改、红卫兵组织涣散，战斗力差，我和胡守安等商议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工人赤卫队、红卫兵联合指挥部”，胡任总指挥，我和刘志强任副总指挥。

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1966年10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文章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并宣告其破产。老保组织作鸟兽散。我们红卫兵总部连带广播台坚持到最后——1966年12月的，也就是红卫兵发起人之一，我班的张聪贤。这位共产党淮阴地区游击大队长的儿子，就是有这么股倔劲。

当时首都并存三个红卫兵司令部，首都一司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最早，老保与造反派红卫兵各占一半，中央还派了刘志坚当一司的辅导员；首都二司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除北航红旗外，全部是老保；首都三司很狂，名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部是造反派。成立时，二司人最多，一司次之，三司人最少。

对《红旗》13期社论，占首都红卫兵70%以上的“老保”们，想不通，不服气。我们这些学生，怎么能清楚中央两派之间的斗争？怎么能清楚保护中央各部委领导反而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一心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怎么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一切的一切，无人解释，无法想通。

10月3日晚，我带北京地院20名红卫兵，会同北航21名红卫兵，赶往《红旗》杂志社，找关锋、戚本禹辩论。关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社大院里接见了我们。同时被接见的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瘦瘦的小个子关锋没讲话，胖大的大个子戚本禹先吹嘘一通关锋是个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如何如何高的延安老革命，又讲了一番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造反不分先后。物探系一位姓李的女同学当场哭着向戚本禹认错，戚热情地握着她的手：“好，好，欢迎，欢迎。”我们无精打采地败走。

10月4日晚，我们红卫兵在大食堂召开大会。×××代表研究生造反队发言，犀利地抨击关锋、戚本禹。北航红卫兵最高指示宣传队演出“大海航行靠舵手”、“拿起笔，作刀枪”等节目。专门给我们助威、打气。后北京地院红卫兵也成立了最高指示宣传队。我记得有李克昌、庞国智等。

庞国智，探工系64届，系篮球队的，在校就认识，毕业后分到青海地质局13地质队。夫人张梅霞，物探系70届，毕业后改名张梅。对张梅霞的印象源于此：1966年8月，她跟物探系一姓詹的男同学找到我的办公室，张气冲冲地指着詹同学说：“他们在袁复礼家抄家时，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了袁家的咸鸭蛋，你当头头的看怎么处理。”这情况，在那时算严重问题。我反问张梅霞：“你是战斗队长，你的意见呢？”张说：“我和詹都是党员，回去开个党小组会，看他检查态度再说。”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难置可否。

上世纪七十年代，算上我和杨明英、李小栓，同分在地质部第一普查大队、文革中稍有名气的同学还有范如松、王怀恩、何定一、叶留生等。与我所在 321 分队毗邻的 13 地质队，除庞国智、张梅，还有刘文德、肖文波、雷世泰、赵小燕等。加上李珍、常江等，连同其他院校毕业的安义中、林伟、郑芷萍、王鹤、金传谋、王嘉斌、李太成、陈起群、杨凯……人才荟萃。

这些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在“四人帮”未垮台前那几年动荡的政治风云中，在雷世泰、赵小燕及我和杨明英家经常聚会。那时，不分你原来是那一派，都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崇敬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地院乒乓球队的肖文波一到我家，什么话都敢说，但总要先敲敲墙壁，生怕隔墙有耳：“还是小心点好，王来昇（勘探系 63 届，也在 13 队）一帮人正追查‘政治谣言’，听说重点就是你们和雷世泰家。”

而肖体休、郑碧玉、刘若君、我和杨明英等人还戏剧性地在青海省会西宁市聚了一次。肖体休说：“难得我们朱派、蔡派，‘东方红’、‘斗批改’的聚在一起，为大团结，以茶代酒，干杯！”在大家都抢着买单时，郑碧玉霸道地说：“谁也不要争，谁工资高谁请客。”于是由在青海最艰苦地区工作，工资也高的郑碧玉、刘若君买了单。

大文豪常江老兄一来，雷世泰、安义中齐聚我家，我们 4 个学理工，却酷爱国学的在一起，饮酒作诗，严循平仄韵律，一人一句，其乐无穷。但更多的还是不忘家事、国事、天下事。

1966 年 10 月 5 日，祝天惠、我、张伟堂、杨根源、刘锡生、闫素斋、张东亮、迟双元等成立“棱角”战斗队。战斗队宣言由祝天惠起草，我修改定稿，张伟堂书写。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闫素斋曾在我的办公室气愤地斥责江青：“说这个是阴谋家，那个是野心家，我看她才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我和祝天惠听了后，心里是赞同的，她只是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针对“棱角”战斗队，“东方红”马上出来个“锉刀”战斗队——锉掉你棱角；我方立马出来个“铁锤”战斗队——砸烂你这把锉刀；对方又出来个“铸工”战斗队——铸化铁锤……

那时，“东方红”已从“哀兵”成为扬眉吐气的狂妄之师，有人反中央文革，不遗余力地予以围剿。幸亏我们这个“棱角”战斗队只活跃了十几天，未被查出，否则早就身入囹圄。

10 月 10 日左右，一天凌晨，南翼楼楼道里的嚷嚷声把我吵醒，过一阵，我办公室门也被敲开。东方红“红色尖兵”由肖体休带队，押着红卫兵总部的王来昇，扬言来查抄黑材料。他们没想到，整栋楼我方已几乎没人。我们从未整过黑材料，自然也没有黑材料。他们走时，我指了指我作床的会议桌：“希望你们‘东

方红’掌权后，和我们一样艰苦朴素。”自始至终，肖他们无过激行为。

10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与我们第一司令部的“老保”集聚中南海门口，上万红卫兵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周总理，周总理，我们要见毛主席！”——年轻的红卫兵们实在想不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的占首都学生中绝对多数的红五类子女，被《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一下子就打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认为周总理是支持我们“老保”的，认为毛主席被中央文革蒙蔽，所以要见毛主席。

10月18日凌晨，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敏、肖体休等骑着自行车，带着馒头、咸菜、棉袄，向我们表示慰问。我身为地院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未受其“蛊惑”，但实际已为尔后观点打下伏笔。

在有关工作人员劝说下，时间不长，红卫兵们便秩序井然地离开中南海门口，徒步去天安门，等候毛主席接见。

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我带着北地的几百个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与“东方红”的相邻，双方还挤来挤去，互不相让。

10月18日晚，周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两派红卫兵。北地红卫兵我带队，“东方红”由王北宁带队。也就是这一次，是二司组织，一司中的“老保”响应，三司及北航红旗等被动跟进。从中南海走到工人体育馆，总理还未到。我安顿好地院红卫兵后，挤到体育馆门口等着。周总理微笑着，边挥手边与挤到他身边的红卫兵握手。我被推到前面，拼命向前伸手，接触了一下周总理匆匆掠过的伟人之手，顿感电击般一股暖流掠过全身。

不知为什么，三司的红卫兵强行将警卫的解放军战士换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保”来晚了，三司的门卫不让他们进，他们硬冲，造成小小骚乱。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周总理讲的第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而且果断地一挥手），究竟针对何人？何事？

其间，三司的红卫兵齐喊：“老保，滚出去！老保，滚出去！”而另有人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看，是一司中的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的。

提到王北宁，这位地院附中毕业的高干之女，是年级党支部培养的64届第一批学生党员。王北宁曾像一位大姐姐那样关照过我。不少男同学写信给她，对这位秀丽、体贴人的女士表示爱慕之情，她却把情书交给了辅导员赵永芳。嗨！

1966年10月18日那天，她还劝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惜红颜薄命，王北宁婚姻不如意，又因文革之事在狱中关了几年。1994年她来乌鲁木齐我家时，不到50岁的她，苍老得像60多岁的老人——这难道是当年那位充满朝气的王北宁？至今，犹记得王北宁那句“监狱不是那么好呆的……”

1966年“八二四”大辩论前后，聂树人也曾两次劝我加入“东方红”。可以

说，“东方红”的头头中，文革前与我关系较好，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聂树人。

10月19日，张伟堂拿来火车票。当天，我们乘火车赴武汉。同行的还有一批张伟堂认识的中学生。祝天惠带一些人去山西，既回家，又去调查六十一个“叛徒”之事。

分手前，祝天惠对大势有个分析：关林，你看，矿院的造反派从保守派手中抢广播台，没人干预，可保守派组织力量反抢时，公安局出动警力抓了人，抓的全都是保守派的……由此可见，国家专政机构对两派的态度。我们大势已去。

之前，《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不甘失败的“老保”们曾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第四司令部”，重新组织力量与“三司”抗衡，在什么地方开的会我记不得了，我和任士田未去，祝天惠和王来昇去了。祝天惠的结论是：一帮毛孩子瞎吵吵，成不了气候。其实，即使组织能力再强，策略再准确、灵活，也没用。

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毛主席著作和党报是文革中我每天必读的精神食粮，每篇“社论”都逐字逐句分析、思索。因此，那时已感到站错了队，愧对毛主席；但又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喝几口水，没什么了不起的，重新振作起来：无鬼不怕鬼，无私大无畏，何惧征途难，此身早度外。

说到“大串连”，后人很难想象。一开始，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红卫兵便争先恐后拥往北京。学生哪来坐火车的钱，成群结伙的学生，车站、列车上谁敢管？去见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阻挡谁就是“反革命”。到了北京，管他们住，管他们吃，安排他们分批接受毛主席检阅。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8次接见红卫兵，可见进入北京的学生，少说达几千万。

而北京的红卫兵，以“老大”自居，自1966年8月下旬开始，先是一司派红卫兵到上海保曹荻秋、陈丕显，后各司令部陆续向各省、市派驻人员。其中，10月后，主要是三司等造反派四处煽风点火，谓之“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这样互串互连，交叉往来，铁路运输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从武汉去长沙的火车，座位上，座位下，厕所里，行李架上，全是人，如同罐装的沙丁鱼。吃饭、喝水、上厕所，你想都别想。一位十岁左右的红小兵，实在憋不住了，央求：“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求求你们，我……”我见状，与几个同行的学生挤出一个空间，在车厢地上铺几张不知何方印的小报，让此红小兵蹲下拉屎。一拉一大堆，本来臭气熏天的车厢内，更是臭不可闻，骂声不断。将人强行拉开，打开窗，扔出大粪，每一步都得罪人，仗着我们人多才办到。一旦临时停车，满世界是拉屎拉尿的人群，人在那种情况下，已经顾不上脸面了，管他的，解决“内急”再说。

中央巧妙地采取“疏导”——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号召红卫兵学大连海运学院学生的做法，步行串连，并加上许多赞

词。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火车的压力，但各地的接待工作毫不轻松。好在我国街道、居委会作用巨大，成为接待红卫兵的主力军。各地做法不一，许多地方是白吃、白住，也有不少地方吃饭要登记学校、姓名。我们老实巴交的，如实报名，在1967年时补交了伙食费（我交了约5~6元）。也有不少人乱报个假名，混的。所以，后来“高元贵”院长的名下，款项最多。主要那时没有身份证件，才给人混水摸鱼之机。

在武汉，住华中工学院约一个月。结识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对立派吴大力、李淑琴等人，共组“首都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保张体学。湖北省委给我们一辆值班面包车，安上扩音器，每天在武汉市走街串巷播送我们的观点。

《人民日报》“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发表后，张伟堂、吴大力等人要徒步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我和其他北京学生先去长沙，住长沙湖南省湘剧院。去中南矿冶学院看了看该院的“老保”琦建春同学（她8月来北京串连时认识）。后去广州，住广东省委，保赵紫阳。在省委参加过一次辩论，与我们北京红卫兵相比，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不是我们对手。

1966年12月30日，我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几个原中学时的同学，徒步从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出发。经嘉兴到杭州，学元旦社论，去杭州通用机械厂劳动。本去同工人阶级相结合，谁料让我们顶班，工人们去了上海。

继续“长征”，经富阳、常山、玉山到上饶。沿途基本上都是浙北的平地、丘陵和山区边缘，平均日行70里左右。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后，本想去井冈山，因井冈山发生流感，政府出告示不让去串连，未成行。坐火车返嘉兴，回盛泽过年。

1966年8月~1967年1月，我和我班“东方红”的只与李昌平见过面。“8·24”大辩论后，昌平在大操场碰到我，诚恳而又自豪地用浓重的河北普通话劝我：“关林，现在你还看不清形势吗？中央文革支持我们，肖力昨天还接见了我们。中央文革、肖力代表谁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但心想：“周荣鑫、李人林、陶鲁笳、薄一波代表谁，你知道不？”话未出口，仅婉拒之。

刚过年，北京地院来电报：“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接电后速回，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幸亏是我拿到的电报，否则不吓坏爹娘？

不敢怠慢，1967年2月中旬，火车硬座返北京。祝天惠在校门口等我。一见面，他就拉我到四道口小饭馆吃了顿饺子。他说：“等了你几天，才等到你，把我急坏了。”我俩统一口径：一是不能暴露我们与周荣鑫、何长工、邹家尤等领导的关系；二是不能暴露我们炮打中央文革之事；三是所有责任我们两个担起来，不株连其他师生。尤其是一、二条，打死也不能说。祝天惠扶了扶眼镜：“我相信你。”我没说话，伸出手，与祝天惠的手紧握在一起。

回到宿舍，未几，学院的高音喇叭响起：“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

听着：必须作出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随时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不准离开宿舍，有事向造反派请假……”

看管我、祝天惠的是我班的×××。我尽量婉转地对×××说：“××，我不是‘红卫兵’的祖师爷。”“那是谁？”×××追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从容回答。×××扶了扶眼镜框，瞪了瞪我。我心中暗笑。

总之，那一阶段的老保是：“受不完的蒙蔽，请不完的罪；作不完的检查，流不尽的泪。”

厄运不长。2月下旬，我班去江西串连的造反派郝云书、李捷芳、朱冬梅、王龙朝等回来了。郝云书拿了个篮球来找我：“走，打篮球去。”我说：“我检查还没写完，出去得向×××请假……”旁边的朱冬梅笑了：“去他妈的，你解放了。”于是，我解放了。“东方红”几次批斗“老保”，都是我班的造反派保了我，免受坐“飞机”等皮肉和精神之苦。

郝云书、李捷芳、王龙朝、朱冬梅一直是我关系较好的同学。李捷芳更是我的“一帮一，一对红”。他们也从未追究我们“保”时的所作所为。我在文革中的日记及收集的大量资料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得益于他们的宽容。

2月底，朱成昭请我和祝天惠开会，朱成昭的观点是：“造反派、老保中的骨干是最革命的，应重新组织起来。”我和祝未去。去开了会的曹凤珍（原老保）、梅建明（造反派）等人，后来都倒了霉。

1967年3、4月，协助革委会保卫处（水文系几个同学）清查抄家物资，住在“教工之家”近一个月。给我的结论是：清白，肯合作。我问他们，抄家的东西怎么处理？他们说，全都交到北京市，有部门统一登记、接收。

1983年8月，地质部干部考察组，尔后北京地院来函，都向我了解过红卫兵抄家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写了详细的材料，认真、客观地作了回答。

1967年“五一”，我随朱冬梅、王龙朝等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值勤。第一次参加造反派的活动，挺兴奋。我们学生在文化宫大门两侧最里层，我们身后是解放军战士。可见对学生的信赖。做梦也没想到，是毛主席站在敞篷车上，车缓缓地驶过我们身边。我们一面呼叫“毛主席万岁”，一面使劲抵住后面蜂拥的人群。毛主席皮肤黑中透红，眼神威严、慈祥。我们离毛主席也就1米左右，看得太真切了。反正，现在演毛主席的，也就古月较像。

在短暂的“逍遥”日子里，每天，下午打篮球，晚上，宿舍中人一人讲一个故事后睡觉。谁的故事评为最差，第二天早餐由他负责代购，每人一个馒头夹块臭豆腐。其他人睡懒觉。

至于后来与余久芬、张聪贤、黄凯生、马殿军组成“一月风暴”，与“二团”（周永璋、蔡新平、殷惟侯、吉让寿、肖体休、孙司权、邱世寿、赵国柱）一起

反对极左思潮，又陷入受压之中，主角就不是我了。在这期间，系统地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主办了反映我们观点的油印《火星报》。

我不主张“怀疑一切”，但已对凡“最高指示”即代表真理、代表党有所质疑。所以，希望从马、列这些老祖宗的经典中寻找答案。也在此阶段跟蔡新平、余久芗等学会抽烟的陋习。

不过，原来只知“出口成章”一词，结识殷惟侯后，方知词意。每次，他讲，我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才子。

1967年8月，随李珍、余久芗等人赴哈尔滨，支持炮轰派。

那时，相当一批学生到哈尔滨后，是去太阳岛、镜泊湖等地玩耍的。我看不惯，认为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于是，便在小报上发表《我们不是来哈尔滨度假的》文章。一日，李珍陪同孟繁华专程来看我——李珍说：“孟繁华很赏识你的文章。”天哪，我实在受宠若惊。孟繁华什么人？我心目中，“东方红”出的大字报，比我文才高的，也就是殷惟侯、孟繁华、聂树人、汪南屏等寥寥几人而已。更何况毛主席都表扬过孟繁华的文章。

孟繁华表扬了我的文章，主要是从继续革命的角度，并问我：“加入‘东方红’没有？”我摇摇头。孟郑重其事地摘下自己佩戴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的徽章，给我挂上。我虽然始终没填表加入“东方红”，但孟繁华给我的徽章，却好好地保存着。

哈尔滨那时已发生武斗，幸未波及我们居住的哈尔滨师范学院。我们明白，打死他人，迟早要受惩处；武斗中被人打死——22641的李全华死在四川，还不是白死？

我因托人将黑龙江革委会常委（原省委常委？）张凤久的信经北师大女附中丁夫全转交中央，1968年底，黑龙江还两次派专人来调查，一次是省计委的，一次是哈工大的。我不认为向中央反映问题是“问题”，代转一封信更不成问题，如实陈述就是了。

1967年11月起，“复课闹革命”。半工半读教研室由赵鹏大担纲，星期天加课，晚自习到半夜……

1967年12月，随聂树人去《首都红卫兵》报社，好像是抢夺编辑、出版权，反正是造反派内部权力之争，本人不感兴趣。去是去了，出工不出力，观望一趟。窃笑。

“复课闹革命”，我班再次团聚。其间，我没闲过。我参加了院图书馆的清理，趁机博览群书。

从1967年底到1968年5月，我与潘复林老师和杨明英被勘探系派去筹建革委会主办的“教育革命展览”，达半年之久。我们负责1958～1960年间的，组长

是物探系老师罗孝宽。

由于我始终是“东方红”及其革委会的对立派，在此有必要肯定对方三点：一是“东方红”掌权后，虽有几次批斗我们“老保”的场合，毕竟只是走走形式，未作组织处理式整人；二是同学们的助学金，每月都按时发放，从未克扣，包括我们半工半读有争议的工读费；三是对教育革命，进行了总结、实践、探索，“地质公社”实际上是以革命旗号的半工半读翻版。

当然，我也没忘记，“红色尖兵”的把孙司权打成熊猫眼；安静中、江祖如等老师被革委会关押；“二团”的弟兄们不得不跑到北大去避难；朱益麟毫不犹豫地跟我、马殿军、黄凯生、张聪贤、张钦文、陈铭、洛甫等人去北大看望避难者；汪南屏（小妖怪）、陈学敏、勘探系“大喊大叫”战斗队也是反“左”的……

1968年5月25日，我班“朱派”叫了十几个红色尖兵胡乐成之类的，以批判高元贵为名，要余久芗揭发高元贵的第二套班子及高的后台。纠缠到“啃猪蹄、喝菜汤”的争执，气氛不太对头。去上厕所的21641班的崔元顺听闻，回宿舍一讲，引起也是“老‘东方红’”的蔡云长、高忠林、王泉等人的强烈不满，出面干预：“这年头，还搞群众斗群众？”我班唯一的一次内哄，不了了之。

5月30日，杨雨中跳楼自杀，留下三封遗书，一给王大宾，一给“长征”战斗队，一给家中。其死因，与屈死在“五七”干校荒山野岭的李明哲老师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1968年7月26日，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8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我院。其中，空军政治学院军人200人，七机部811厂工人100人，橡胶厂工人200人，共500人。8月28日，刘元广（军人）、雷乃廷、赵宝旭（811厂工人）进驻我班，召开会议。宣传队的人讲完话，会场寂静。我实在忍不住，通、通、通发了言。我的观点是：宣传队宣布每个班由5人核心组领导，为什么只剩3人，排斥2位学生代表？余久芗、郭建中“反红色政权革委会”的说法无根据！

此后是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

8月的某一天，军宣队的一辆吉普车将我和我并不很熟识的21642班的李清连拉到空军政治学院。一位院级领导在他家里对我和李清连说：“你们是宣传队信任的同志，找你们来，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学院里老师和学生对宣传队的态度，及时将情况直接向院、系军宣队汇报。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也是考验！”并郑重叮嘱：“这次谈话，必须绝对保密，不得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还有些什么话，记不清了。反正我听了后，口干舌焦，心跳加速，脑呈空白。直到回到学院，才缓过劲来。我和李清连互相保证：“此事务必保密，但坑害老师、同学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此后我和李清连接受的任务也就是每星期一二次在半夜悄悄溜出宿

舍，随宣传队的人在校内或去教师宿舍查夜。

陶世龙、黄占秋老师划归军宣队要我重点盯防的人物，我却有机会跟他们半夜还一起侃人生，谈学问。我的结论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杂家、大师甚至宗师级人物。

1968年8月底、9月初，两次分送马殿军家老四和我在哈尔滨结识的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朋友去内蒙插队。此后再未见面，42年过去了，也不知她们及另一位当老师的杨华可安好？

9月3日，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东方红公社”及其下属组织宣告解散。李贵、聂树人、张海涛等先后被宣传队发动群众收拾。

9月7日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而地院的革委会在宣传队进院后，已形同虚设。

工宣队、军宣队将我班树为两派大联合的典型，1968年11月，我和王龙朝（后改名王刚）代表两派在全院大会上发了言。

宣传队导演的“清理阶级队伍”，践踏了人权法治，破坏了师生关系，留下的后遗症难以治愈。我们班就分别成立了“赵鹏大”、“李志峰”、“周超凡”、“陆家仕”四个专案组。我是“陆家仕”专案组成员之一。虽然我们组比较讲政策，也比较温和，我和李捷芳还就其他专案组的一些过激作法向宣传队反映过，但逼人交待的疲劳战等客观存在，那种千方百计逼人就范的手段，是在摧毁被整者和整人者双方的人性。在此，向陆家仕老师诚恳道歉！

1969年国庆前队列操练，我当了个学生中的小组长，管包括梅建明在一班同学。军宣队又叫我注意梅建明：“有情况随时反映。”我与梅建明一相处，十分融洽，相识恨晚。

我在工、军宣队进院后当了系宣传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李玉和，另一副组长是杨明英。真得感谢给我的这个机会。

和杨明英第一次打交道是1966年8月。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我就去过一次，适逢杨明英、李学田向我提出：有人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志。我召集大家讲了讲周总理这方面的3条指示：一是有成份论，二是不唯成份论，三是重在政治表现。即，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会后，物探系叫董恒功的红卫兵还拿着油印的北工大潭立夫的“血统论”，专门到我办公室找我辩论。我懒得理他。

后与罗孝宽、潘福林、杨明英一起搞教育革命资料整理，也就是互相见面打招呼。

真正熟悉是在同一个宣传组。一起采访、调研，写稿、改稿，出板报……从友谊到爱情，很自然地一步步走了过来。我对人生一直持积极奋进的态度，失误之处甚多。但与杨明英共结连理，却是我一生最为自豪、自得的成功。与此相比，

地位名利，何足挂齿。

与杨明英的一次误会是：1969年10月，我们在首钢850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冉宗培、李紫金、余素玉等召开党支部会议。由于涉及宣传，让我这个“组长”列席。在会上，我不太同意冉书记的意见，谈了自己对宣传工作的具体建议，李紫金、余素玉老师肯定了我的建议，冉老师也同意。但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一次会议，我的一个发言，传到杨明英那里，就成了我“凌驾于党支部之上”了。我怎么解释，明英半信半疑。还是余素玉老师帮我澄清了事实。

我与工宣队处得不错，与空军政治学院派的军宣队时有争执。记得1969年国庆前，军宣队授意我代表北京地院的红卫兵写一篇提倡大联合、大团结的文章。我认真地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军宣队还是不满意。我明白，他们要我删去文中“在大联合中，不能用派性去消除派性”以及工、军宣队要“一碗水真正端平”的观点。我就是不删。军代表杨上校居然说：“怪不得有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见其失态和无奈。最后还是杨明英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与我原稿面目全非。

1969年12月，去湖南前，与几位老师告别。

安静中和濮长萱大姐留我吃饭。饭后，安静问我：“快毕业了，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听我说“已解决”，安静问：“哪个系？”听说是勘探系的，64年在四川负责招生的安静沉思片刻后说：“勘探系，除了杨明英，其他女孩子你看不上。”“杨明英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上清华都没问题。”濮大姐把她第一届全运会上代表中南区所得的女篮银牌送给了我。

余素玉老师正同他爱人整理书刊，她知道我爱书，指着一堆书说：“你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反正我准备卖掉。”冥冥中如有天意，我挑了本油印的《石油地质学》。那时，我哪能知道，自己一辈子搞石油物探、石油经济。那次，21641的杨流孝也正好来看望余老师，我们还一起喝了两杯葡萄酒。

.....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封建社会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都有人一遍遍翻出来，电视、电影，比比皆是。为何独要回避文革中目前尚能说清楚一部分的事呢？史实又怎能回避！

近几年，在新疆频繁地见到抱“老有所为”心态而来的蔡新平、朱德瑜、张北峰、王润民等学友。“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之余，深感，乘尚未老年痴呆，还是应写点东西留下来。每个个体，眼见的可能也未必为实，但无数点水珠终可汇成汪洋大海，而且内蕴着无数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

必须指出，文革中，无论造反派、老保还是逍遥派，都有个底线：忠于毛主席！你说是个人崇拜也好，个人迷信也罢，这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学生们衡量是

非的标准。

必须指出，文革确实深刻地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并不在于你是哪一派的，而在于每个人的品德和良知；对中央指令，你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否实事求是地做人、办事。

另一大遗憾是：1966年10月前，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上天安门城楼的珍贵名单是由李维宇打电话与我商定的，我推荐了我班的陈生宝，自己却失去了机会。李维宇、陈生宝都有幸与毛主席一起照了相，至今李维宇还珍藏着，并数落我“太傻！”

历史决定，我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奉献为主，学雷锋那样，甘做“傻子”的一代。期望后有来者。

2011年6月18日于乌鲁木齐

(编者注：此文的作者是当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对立派“斗批改兵团”的负责人所写，该文发表在2015年6月30日《昨天》第54期增刊)

编者按：

程关林 196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

#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殷惟侯

## \*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北京地质学院掀起了揭发、炮轰院党委的浪潮。我是一个不屑赶时髦、随大流的人，看了几天大字报，心里产生许多疑问。工作队进院前，我在地质系食堂北窗侧贴出了我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十点异议】。看的人很多，内容是吸取搞四清和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大家按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搞大轰大嗡。30年后，比我高一届，过去从无交往的师姐王黎天，初次和我见面时提到此事和文革前组织批【早春二月】时，为了推进批判，我用笔名写的一篇为【早春二月】辩护的文章（当时我是地质系学生会课余活动部负责人），才使我想起这两件事。

## \*100个为什么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感到【十点异议】的框架不符合文革的实际了。文革不是整风，不是四清，文革的目标要深广得多。运动开始，发动群众，不能过多用政策和策略去束缚群众的手脚，要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态度去对待运动初期的一些过激行为。那么，我干什么呢？揭发党委？我对党委内幕一无所知。批判旧的教育路线？凭我当时的认识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我看，我想，没写一张大字报。工作队进驻了，出现了一些疑点，我想：怎样保证地院文革健康深入发展呢？关键在领导，如果工作队错了，甚至被走资派控制着，地院文革就完了。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监督、收集工作队的问题上，并最后写出了【100个为什么？】，（工作队进驻后，地院有反工作队的【十个为什么】【20个为什么】【60个为什么】）

## \*揭发安静中

团委书记安静中文革前就在我们“落后的”11622班蹲点，我和他有过一次个别谈话。我向他请教：面对尖锐的反修防修斗争和紧迫的建设任务，我是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者还是又红又专的专业技术人员呢？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是走像你一样的道路还是走马杏垣（他是地下党出身的教授）道路？我一

天只有 24 小时，不可能得兼呀！。安静中明确回答：我是例外，大多数同学应该成为又红又专的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文革开始后我和他接触很多，反干扰安静中被打成全院十三个反党分子之一，我也成了地质系四年级头号反党学生。没有政治经验的我被打懵了，我满腔热情听毛主席话，参加文革，怎么会反党呢？我不得不承认“客观反党”并“竹筒倒豆子”般揭发安静中，成了批斗安静中随叫随到的学生。我也做好了去劳改的准备，下决心：哪里摔倒在哪里爬起，好好劳动，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的赤胆忠心一定会被承认的。

#### \*支持朱成昭

66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反干扰已悄然无声，朱成昭贴出了控诉工作队的大字报，轰动全校并受到围攻。我感到出事了，和孙司权立即奔北大，很快就明白：我们没错，是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立即回校起草了支持朱成昭的声明，颜文瑞抄写的，全班 31 人有 20 多人签了名，当天下午就贴出去了。这是全校第一张支持朱成昭的大字报。聂树人后来说这张大字报是他写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声望，我过去也从来没有和他去争。这又不是“独立宣言”或“人权宣言”之类流芳百世的东西，有什么好争的？记得“13 个反党分子”第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是江祖如，他在大饭厅前广场东侧黑板上贴了一张白纸，上书毛主席咏梅词，落款：江祖如，使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老师肃然起敬。

#### \*给肖力带路

【东方红】成立不久，一天，我在学九楼前看大字报，边上有一位高个子，穿普通灰色两用衫的女同志向我打听：【东方红】是怎么回事？我向他简要说明后，她问我：【东方红】在哪里办公？我问她：您是谁？她说：我叫肖力，是解放军报的。我就把它带到教四楼 201 【东方红】队部，把她介绍给朱成昭等头头。很多天后才知道：肖力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有人回忆说肖力第一次来地院穿军装、说自己是北大的，与我的记忆不符。如果她是北大的，我只会给他指路，不会专门陪她去队部。

#### \*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战斗队和其他战斗队不同，这是一个跨系的学生组织，人数不多，是几十个活跃分子围绕朱成昭成立的，后来东方红战斗队和几十个学生战斗队合并成立了东方红战斗大队，最后和教师红教联、员工赤卫队、研究生造反队等合并成立

了东方红公社。作为东方红最早串联发起人之一，由于我不是红五类，而且我的秉性不喜欢被具体事务缠绕，我没有进入东方红领导班子。11622 班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就成立了永向前战斗队，由我任勤务员，我上任即宣布：民主决策，任何人对我不满都有权提出弹劾动议，只要有过半同学同意，我就下台。由于东方红的成立，不久，永向前战斗队这个名称就不用了。

#### \*炮轰地质部

由于工作队不肯认错，并对反干扰的结论留下了尾巴，虽撤回了地质部，地质学院仍然是工作队扶植的斗批改红卫兵的天下，面临“秋后算账”威胁的东方红决定炮轰地质部。这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即使今天或者将来也是不容歪曲的。在炮轰地质部期间，东方红守纪律、讲政策、没有过激行为，面对血统论、老保、和西城区纠察队（联动前身）的武力威胁，亲密团结岿然不动。老保指引西纠在东方红静坐队伍中抓黑五类，东方红战士则挺身出来掩护他们。我亲眼见到西纠那些不懂事的狂热孩子拿铜头皮带把\*\*部“黑帮”郑天翔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楼梯下。皱家尤这个地院工作队队长，搞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站到群众的对立面，是东方红炮轰地质部的直接原因。如果炮轰地质部导致地质部无法正常工作，责任也必须由皱家尤和地质部的当权者负责。皱家尤文革后秋后算账，把所有地质东方红成员打入“另册”（如果温家宝在履历中写上：参加过地质东方红，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这是对毛泽东的背叛，他们最终走上权贵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 \*东方红一兵

一进地质部，由于我没有具体职务，比较超脱、自由。我没有参加静坐，也没有参加具体的、面对面的斗争。我在静坐队伍外围观察、听取反映，奔波于地院和地质部之间，了解动态。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落款是东方红一兵 殷惟侯。内容是分析运动形势，说明为什么要炮轰地质部，重点分析文革和 57 年整风的根本区别，鼓励群众不要怕“秋后算账”，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把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行到底……。这篇大字报贴在北五楼南大马路上，引起轰动，抄者云集。有人因此把“东方红理论家”的“桂冠”扣到了我的头上。

#### \*东方红和斗批改在市委的辩论

一进地质部期间戚本禹召集地院两派在北京市委辩论，东方红由蔡新平、我、黄平稳等十余人参加，具体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黄平稳坐在我和蔡新平之间，他在本子上写了：蔡新平侃侃而谈……。这次辩论后决定在地质学院进行两大派的大辩论。后来，1967年在北京市委还有一次以学习班名义举行的辩论，地院蔡派由我、蔡新平和另几位参加，朱派有王若柏和另几位。内容是要各派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 \*8.24 大辩论

1966年8月23日夜，地院两派在大操场进行大辩论，有一万多人参加，东方红是少数派，在讲台前北侧形成一个整齐的方队，人数多几倍的斗批改红卫兵在南侧和后面对着东方红，外围还有大量校外群众。辩论从22点开始直到24日凌晨东方发白，东方红由朱成昭主持、蔡新平主讲，我也代表东方红发了言。东方红纪律严明，秩序良好，摆事实、讲道理；斗批改靠血统论、抓一小撮，和狂呼乱叫以势压人，还弄来了西城区纠察队夺话筒，挥皮带……。群众在事实面前看清了正义在谁的手里，斗批改群众纷纷当场表态脱离斗批改，要求参加东方红，形成老保土崩瓦解的局面。8.24大辩论不仅是地院文革最精彩一页，也应该以正面的形象载入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册。如果中国最终形成了竞争型的民主制度，东方红在8.24大辩论时的表现，应该成为所有政治派别的楷模。如果都像斗批改那样，中国绝无宁日。

我在8.24大辩论时的发言大部分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三四次热烈的掌声，也有轰我下台的嗡嗡声。面对一万多人的大场面，我头脑有点乱，对自己发言也不满意，没有把想讲的讲清楚。记得是老保先讲，他们不敢正面为工作队辩护，而是大力宣扬在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中的“赫赫战果”。我开头几句是对斗批改红卫兵开展的破四旧表示赞赏和祝贺，（我的理念历来是：我反对你的观点，但首先要承认：你也有正确的一面。）这几句话就获得了掌声。现在看起来，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正是文革开始时的罪恶。我的另一段获得掌声的话大体是这样的：工作队和斗批改说，你们东方红群众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你们中有一小撮坏人，你们要警惕被少数坏人利用。任何群众运动都难免混入一小撮坏人，判断群众运动的性质要看这个运动的大方向，东方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与其说东方红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如说这一小撮被广大革命群众利用

了。

### \*劝回红卫兵

8. 24 大辩论后，东方红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有些班级对老保红卫兵群众进行人人过关的批判，激起老保反抗，他们的骨干带着一支宣传队到市委静坐抗议。我和蔡新平、焦洪波知道后连夜骑自行车到市委，老保们看到蔡新平和我，上来围攻。我们耐心地劝他们：毛主席说：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他们搞批判不是东方红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欢迎大家回学校和东方红团结起来一起闹革命。红卫兵看到我们诚恳的解释，鼓起掌来，请我们坐下看他们宣传队的表演，和我们一起返回了学校。这件事后来成了朱成昭发动突然袭击，攻击蔡新平和我背叛东方红，和老保勾勾搭搭的依据。1988 年科技日报附属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要一位可靠的人去海南任雷雨公司总经理，蔡新平向时任科技日报总编的焦洪波推荐我，焦洪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亲口对我说：仅凭劝回红卫兵一件事，我信任你。

### \*二进地质部

二进地质部是东方红掌权后的事，本意是解决靠辩论没有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推进地质部文化大革命。由于缺乏明确、一致的目标，形成持久的僵持局面，在领导层和群众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以蔡新平、殷惟侯为代表的“策略派”主张：不要脱离学校多数群众，地矿部的运动要靠地矿部广大群众，主张见好就收，回校闹革命。朱成昭和他的支持者不同意，但没有形成尖锐的意见对立。后来进驻事实上成了“鸡肋”，只好回校。但朱成昭耿耿于怀，一个阴谋在他心中酝酿着。

### \*教四楼 201 战斗队长会议

回校没几天，朱成昭在教四楼 201 召开东方红战斗队长会议。突然声色俱厉的向蔡新平、殷惟侯进行点名攻击。污蔑蔡殷形成小集团，反对二进地质部；以讲策略为名，实际干着托派取消革命的勾当；和老保勾结，阴谋夺权……。我和蔡新平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曾经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刚翻身就要窝里斗。有备而来的朱成昭滔滔不绝，我和蔡新平坐在后面，我们几次想站起来反驳，被坐在我右边的王大宾劝住了，主要我们顾全大局，答应会后他陪我们和朱成昭好好谈谈。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朱成昭讲完就宣布散会。蔡新平、我和王大宾立刻拦住朱成昭，要求面谈。朱成昭说：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谈的！一下子就关上了和

解的大门。

回想起来，如果蔡新平和我当场反驳，支持我们的不见得会是少数，反驳就是东方红的分裂。由于我们“顾全大局”忍让，结果我们被开除出东方红，紧接着，一批反托派的大字报就上了墙，不明真相的东方红战士纷纷唾弃我们。蔡新平和我这两个书呆子，没有权力概念，只有天真烂漫的思想自由，如果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争，如果是国共两党之争。我和蔡新平将是历史的罪人。

#### \* “整” 沈孝宇

二进地质部前后，水文系两个同学来找我，说：沈孝宇想见我。我和孙司权一起到沈的办公室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沈的谈话主题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革前 17 年是黑线统治，等等。这些极左观点我和孙司权都比较警惕。不知何因，水文系有人要整沈孝宇，知道沈约我去谈过话，来找我，了解沈都讲了些什么，我如实告诉了他们。后来他们在大礼堂批判沈孝宇，邀请我做旁证，我应邀去并如实做了旁证。整人是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拼杀中自我保护过度养成的坏传统，我在文革中没有整过一个当权派，没有整过一个学术权威，更没有整过一个群众。要说“整”，反干扰时整安静中是被逼的，批沈孝宇只是如实做旁证，反工作队、反朱成昭、反王大宾聂树人控制的革委会都是对自认为正确路线的坚持，而且是对压迫的反抗。不管怎样，沈孝宇挨整我参与了，我应该向他道歉。

#### \* 【“搬掉” 东方红， 地质学院才能大乱】

被开除出东方红对于我和蔡新平，不是什么灾难，反而是一种解脱。我们无拘无束，在学校看大字报，和同学、老师交流。一天，我、蔡新平、孙司权在大马路上溜达，碰见肖体休，一聊，他的观点和我们完全相同。我们在教五楼找了一个小间，天天在那里神侃，那是我们思想最自由，思路最奔放的日子。大约 66 年 10 月，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各自独立的形成了 5 个题目，写了 5 篇轰动的大字报，落款是红色造反兵团某某某。蔡新平写的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写的是【“搬掉” 东方红， 地质学院才能大乱】，肖体休写的是【串联去吧】，另两篇是什么记不清了，肯定有一篇是孙司权写的。五篇大字报扭转了“托派”的舆论，许多误解我们的东方红战士也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广播台铁杆朱派“高旗无畏”的刘梅就在我的大字报上批语：坚决支持如何如何。王大宾 1967 年曾告诉我：江

青看了我们的五篇大字报，至于江青如何评论，王大宾保密至今。

【“搬掉”东方红，地质学院才能大乱】主题是：东方红掌权后，怎样保持受压时的活力，为什么一切大型组织都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东方红需要在集中力量的同时充分发扬队自为战、人自为战的精神。“搬掉”“大乱”只是当时的时髦词汇，为了吸引眼球用的。这篇大字报流传之广出人意料，几个月后我在上海遇到一位高中同学，拿出一份他在四川得到的铅印传单问我：真是你写的吗？标题就是【“搬掉”东方红，地质学院才能大乱】。

#### \*二团的来历

周永璋是 6.20 的风云人物，共产党员，出身又好，说话富于煽动性，笔头懒，活动能力极强，是东方红早期骨干之一，他利用地质东方红名声，联络各校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一司、二司是老保），成为三司实际负责人。曾经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和周恩来坐在一部车上为毛主席开路，和周恩来一起下车疏导堵塞通道的群众。二进地质部后发生一次三司夺印事件，朱成昭带着地院队伍冲到政法学院，要周永璋和政法学院造反派头头刘富元、顾家桂把三司大印交出来，没有得逞，也没有武斗。周永璋和三司负责组织联络的赵国柱、邱世寿，负责宣传的吉让寿从此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以 6.20 造反兵团名称贴出了反击朱成昭的大字报。聂树人主编三司“首都红卫兵报”是事实，自称是三司负责人有什么意思呢？

6.20 造反兵团和红色造反兵团在江祖如、安静中的撮合下、在反朱成昭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了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交融，最终成了风雨同舟的“二团”，是地院松散的“蔡派”的经常代言人。蔡派的真正核心应该是安静中、江祖如。

#### \*步行串联

【串联去吧】发表时，朱派有人攻击此文是拆散东方红的大阴谋，没过几天，大串联就开始了。66 年 11 月下旬，我、蔡新平、孙司权、罗璞、张钦文和另外几个同学第一站乘火车去了大庆，在返回时太挤，走散了，我、孙司权、张钦文回了北京，蔡新平、罗璞和另几个人去了营口。在京等了几天，我、孙司权、汪南屏、张钦文、魏秀莲五人乘火车去上海，拥挤时无法上车，只好挂在老式车厢车门外。从上海出发步行奔井冈山。12 月 6 日，寒流刚到，水面结有薄冰，我们从富阳出发，沿富春江走 60 里，青山碧水太美了！到窄溪三岔口过富春江。汪南屏、

张钦文、魏秀莲坐船，我和孙司权决定游过去。一个猛子扎进清澈、冰凉的水里，好不容易喘过气来，觉得：没什么嘛！游着游着，两岸群众轰动了：红卫兵游泳过江了！江上的渔船也停下来观望。在距岸 150 米左右时，我发现四肢麻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我坚持。距岸 80 米左右时呼吸越来越费力，我知道，该认输了，挥手招呼附近的渔船。马上几条小船向我靠拢，我头脑还清醒，在一条小船船头向我逼近时，头一低，向右侧一翻，伸手抓住了船帮，再也没有力气上爬了。两个渔民把我拖上船，我躺在那里庆幸：捡了一条命。孙司权比我棒，他一直游到对岸，上岸也没有我那么狼狈。下午又走 30 里到桐庐过夜。步行期间我们最多一夜走了 120 里，中间在老乡的稻草垛上掏洞睡了一觉，体会了陈毅打游击时盖“金丝棉被”的滋味。到达目的地后一顿吃了一斤米饭，是我一生最高纪录。**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怎会有这样精彩的人生。我们在浙北山里一个生产特种钢的横山钢铁厂介入运动，写了轰动的大字报，支持了造反派，不知该厂后来如何？估计文革后秋后算账，造反派不会好过，而我们这几个过路神仙他们也够不着。大约 66 年 12 月 20 日前后，到达上饶北山汪南屏家时收到学校电报：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快回校。我们立即步行翻过大山在上饶乘火车赶回北京。

### \*整朱成昭

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如此突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说我们是整朱成昭的祸首没有根据，杨雨中自杀和我们毫无关系就是证明。对朱成昭这个人，我历来佩服他的胆识和魄力，他是真正的乱世英雄，如果是改朝换代，他必定会成为一方诸侯。和他相比，蔡新平可以当一个参谋长，我只是一个笔杆子，一个幕僚而已。但是，朱成昭野心太大了，分不清文革是毛泽东绝对控制下的继续革命，他周围那群铁杆更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毛孩子。朱成昭企图靠地矿部 50 部红电话控制全国的运动，完全不着边际。有人说朱成昭是最早反思文革，认识到文革祸害的英雄，甚至胡说胡耀邦想把他和张志新并列成反左标兵，根本不符事实。文革后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五大领袖罪状”，王大宾基本是朱成昭的替罪羊，除了抓斗彭德怀与事实不符，王大宾“挑起天地两大派武斗”“冲击国棉一厂”“冲击北大”“民族文化宫抢档案”“冲天安门要江青接见”；等等罪行无一不是朱成昭实际指挥的。包括因反中央文革，戚本禹逼他“闭门思过”期间所为（据聂元梓：地质东方红

第一次冲北大是 67 年 4.11)。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反对了，判他刑，坐牢应该平反。但他反中央文革不是出于对文革的深刻认识，而是因为父亲受到了冲击和结识了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知道一些上层笔杆子和枪杆子斗的内幕，做出笔杆子必输的判断，于是，迎合当时社会上一股反中央文革潮流，向中央文革叫板，抛出了八大观点。【八大观点】内容仅仅是批中央文革太左，而他恰恰是北京文革中最左的，不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从根本上反对文革。

朱成昭被中央文革抛弃我们当然高兴，我回京后，了解了情况，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严正声明】贴在教四楼前大字报棚上，由于大部分学生在外面串联，看到的人不多，孟繁华欣赏我的文笔，问我要底稿，我抄了一份给他。在抓、审“朱成昭反革命集团”过程中，我们二团的确出了力，他们逃广州就是周永璋陪同公安部副部长去抓回的。对于“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的错判、迫害，我们有一定责任，应该向所有被错判的同学赔礼道歉。

### \*保护朱成昭

朱成昭不耐“闭门思过”，出逃被抓回。一天我路过学九楼，见围了一大群人，一个人被反剪双臂从门里押出来，许多人上去吐唾沫、拳打脚踢。我看是朱成昭，立即上去阻止：“不许打人！”我没有深思熟虑，只是出于本能：不能武斗！我看当时的气氛，我不挺身而出，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作为朱成昭的对头，保护他会有效，有“啃猪蹄”的讥笑我：殷惟侯惺惺作态，我不管。我在朱成昭前面，挡着各个方向袭来的拳、脚、土坷垃，跟着游街的队伍，从学九楼到大操场西侧，到教七楼，到东门，再绕回学九楼。朱成昭没有受伤，他挨的拳、脚、土坷垃没有我多，进学九楼二楼一个办公室坐下后，我教训了朱成昭一句：你看，你的民愤有多大。

### \*马路社和羊肠小道社

67 年五月后，东方红运动的重点在外地，特别是四川，学校相对比较冷清。六月份我去了一趟新疆，在南疆阿克苏把被围攻的农一师 17 场造反派妹妹劝到北京。回校后见到牛马骆开了一个“马路社”专门收集小道消息，甚至胡编乱造攻击二团。我忍无可忍开“羊肠小道社”和他针锋相对，不到十个回合，他就销声匿迹了。牛马骆这个人，是个品质恶劣的投机分子，工作队掌权时，他紧跟工作队；东方红造反，他不遗余力的和东方红作对；东方红翻身后，他消失几天。朱成

昭整蔡派后，他又成了最积极的反二团份子。歪曲、夸大是他的本能，胡编乱造是他的专利，真不知道中国文化从哪个角落能蹦出这么一个孽障。这次 60 周年校庆，有认识他的同学在聚会时提到他。说他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在文革中故意两边挑动，制造矛盾。

#### \*拉不拉队伍

全国各单位的造反派，翻身或没翻身都在各单位形成了两派，争权夺利甚至武斗。北京地质学院却是例外，有观点分歧的两派：朱派（啃猪蹄）和蔡派（喝菜汤），但没有组织上对立的两大派。有掌权派对反对派的武力镇压，没有两派拉开架势的武斗。为了自卫，为了扩大影响，蔡派学生有人多次要求拉队伍，特别是比较激进的周永璋等人。但是，安静中、江祖如、郑伯让等老师劝阻了他们。理由很简单：东方红不能分裂，拉队伍就不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组织上的对立了，有了队伍，身不由己，难免犯错误。有比较成熟、有经验的老师把关，地院蔡派成了理由最充分，又最没地方讲理的特例。1994 年经万慧祥介绍我在上海认识了戚本禹，初次见面我就告诉他：你倒台，我们最高兴，你为什么要支持朱成昭整我们呢？你知道我们和朱成昭区别在哪里吗？所有学校都有两派打派仗，为什么地院没有？他很感兴趣。我向他介绍了蔡派和朱派的分歧要点，说明了没有拉队伍的原因。戚本禹很感慨，说：我认识你们太晚了，当年，我们支持五大领袖，结果他们都走向了反面，看来，你们想得比他们深。我说：我们也不见得高明，只是因祸得福而已，真要拉起队伍，牢狱之灾难免。

#### \*旁观者

由于被开除出东方红，我们没有参与东方红发起或和其他院校联合挑起的重大事件，如冲击国棉一厂；冲击北大；民族文化宫夺档案；冲【沙家浜】：冲天安门要江青接见；围困中南海建立纠刘火线；抓、斗彭德怀；支持川大 816；参与四川武斗还死了李全华……等等。但是，许多事件我们都在场。不是仅仅出于好奇在旁观，而且是出于怀疑，去看看朱成昭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当时，光明日报有几个记者在地院，我和蔡新平经常和他们接触。冲天安门那次，我和蔡新平正和光明日报记者聊天，突然喇叭里吹起了紧急集合号声，接着广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保卫毛主席，揪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东方红集合后出东门和林学院等院校队伍合并走向天安门。我和蔡新平及那几个光明日报记者怀疑有

黑手，跟着队伍，冲破好几道军队封锁线，到了广场西侧才被挡住。那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广场是无论如何不可突破的。后来蒯大富从广场出来劝住了队伍，朱成昭等头头要求江青接见，江青回避了，周恩来答应接见，朱成昭等头头开始不答应，对周恩来不信任，僵持了一阵，后来同意了。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的表现和讲话让我们真正开了眼界。什么是政治家？这才是。什么萨科奇？什么默克尔？什么奥巴马？和周恩来相比只是小儿科一个。如果六四时有周恩来在场，就可避免向人民开枪了。

### \*大批判联络站和九·四事件

1967年8月，王大宾等地院掌权派热衷于天地派的派仗和四川等地的运动，把地院的斗批改任务搁置一边。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也为了争夺在学校的话语权，地院蔡派和观点接近的群众，互相联络成立了“大批判联络站”。这个松散的机构，除了分头写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外，还准备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

9月4日下午，大批判联络站广播台在研究生楼开始广播了，天黑前，突然来了一大群人，其中有“红色尖兵”，冲上楼把广播台砸了，还围攻大批判联络站的人。天一黑，打人开始了。我在门口台阶上和他们辩论，突然，体育教研室的负责人冯国梁，在背后对我腰部猛击一拳，把我从台阶上一直打到台阶下，紧接着一群人围着我乱拳如雨点般的打来，我只好蹲下来、双手抱着头，忍受，可能因为太近，拳头没有蓄力，我也没觉得痛，只是耳朵嗡嗡响。人群闪开后，发现我的背包没了，背包里有我许多大字报底稿和记分册等。这次武斗是东方红掌权后在校内第一次，挨打最重的是肖体休，我腰上挨的那拳，一年后才完全恢复。从此，掌权的打人，抓人，关人成了家常便饭，我们连还手自卫的可能都不存在。被关、打过的有安静中、莫宣学、孙司权、余久芬、周永璋、我，等等。被打得最重的是孙司权。他被高德成等一群人关在一间屋里，从这头打到那头，再从那头打到这头。后来我们见到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性格都变得有点沉默寡言了。作为他最要好的朋友，我至今都不敢问他挨打的细节，怕触到他的伤心处。这次地大60周年校庆，看到高德成，想把他引见给孙司权，一想，还是免了。在老东方红座谈会上，他们坐在一起，谁也没认出对方，签名时才发现：原来是你！高德成向孙司权赔礼道歉，孙司权也就顺势和他“相逢一笑泯恩仇”还合了影。现

在，许多人在写回忆录，有没有人敢于把自己在文革时整人、打人的事如实写出来呢？聂树人的回忆录有 200 万字，除了一贯正确，掩盖了他全部丑行和罪恶。他在毕业后 1986 年第一次和我遇见时，开口第一句就是赔礼道歉，有什么意义呢？

### \*毕业鉴定会

11622 班属六七届，因文革推迟一年毕业。68 年四五月份搞毕业鉴定，掌权的一派以聂树人（自封北京地派二把手，实际的地院革委会付主任）、张正万（入学时极度颓废、邋遢的另类，忆苦思甜后摇身一变成了最革命的红五类，文革初最顽固的铁杆老保，殷惟侯被开除出东方红后又成了二团死敌，并以张铁生的风格成了批斗高元贵、安静中这些正派党委成员的“刀尖”）、袁长清（11622 班唯一的共产党员，文革初保党委、轰党委，保工作组、反工作组，左右多变，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跟定聂树人成了广播台台长）、沙丁茂（心机最深，从不在第一线，专门在背后出谋划策整人的高手）为核心对我、孙司权、吉让寿等二团成员进行整肃。他们拿我文革前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和其他黑材料来整我，给我罗列了十几大罪状。还记得的有：和右派分子勾勾搭搭喝酒碰杯；和汉奸、反革命亲戚划不清界限；走白专道路，门门功课优秀唯独政治考试不及格；用安静中、马杏垣道路来对抗雷锋道路；批“早春二月”时匿名写的为“早春二月”辩护的文章才是真正话；第一篇大字报“十点异议”证明是最顽固彻底的老保；东方红刚掌权就和老保勾结，阴谋夺权……。我们班 31 人，有近三分之二同学坚定的站在我们一边。除了四个骨干，后来跟着聂树人走的也多是为了毕业分配才违心表态的。我从心里感谢 11622 班那些不畏权势，主持正义的穷哥们。原 11622 团支部书记陈政国说：11622 是地质学院矛盾集中的焦点，地质学院是北京文革的焦点，北京是中国文革的焦点。这话夸张了。但是 11622 班的班史确实值得地质大学载入史册。聂树人的第二本回忆录，大篇幅写了 11622 班，除了在鸡毛蒜皮事情上用“日记的真实”来掩盖自己靠“血统论”整人的丑行，还充分暴露了他一心想入党做官成为人上人的卑污心理，已经激起了公愤。本文把几件文革前相关的事附在后面。

### \*被非法关押

毕业鉴定会后不久，一天，我和余久岁在大马路上看大字报。突然过来一群人把

我们两个架起就走，一直押到南翼楼五楼，分开关在相邻的两间屋里。一间屋三张单人床，看守有时在，（看守中有一个是王璞，后来在地质出版社工作，86年我借调地矿部政策研究室，在部食堂他跟我热情打招呼，我纳闷：他是谁？后来想起是那个看守。）一关就是15天，一日三餐有人送，也没人来审、斗，我就在屋里唱红灯记“狱警传，野狼嚎……”和其他革命歌曲以示抗议。高元贵也关在同一层最西头的屋里，在厕所洗冷水澡见过他。第14天晚上，小偷进来把所有人的衣服都偷了，第15天一早发现衣服全堆在厕所一角，口袋里的值钱东西都没了。小偷之行证明：楼下没人值班。我和余久芗敲窗联络后决定越狱，由余久芗写纸条从窗口抛给每天来楼下溜达看望我们的余久芗同班同学张聪贤。当天夜里2点，我和余久芗抱着外衣悄悄下楼，穿上外衣到楼东侧树林里，按约定，朝几声蛤蟆叫的方向走去，赵国柱、张聪贤各推一辆自行车，我们坐后面直奔北大。40年后我问王大宾：你为什么要关我？王大宾说：什么时候关的你？我不知道啊？

### \*避难北大

避难北大，使我脱离了地院文革，见不到想见的人，做不了想做的事，只有一个信念“毛主席不会任王大宾、聂树人这些人胡作非为下去”，我们耐心地等候，等候。在北大，看到北大两派的武斗：吆喝、冲锋、抛石头，喊口号，简直是顽童嬉闹。清华真刀真枪的武斗终于开始了，蒯大富昏了头，把工宣队当成黑手派来的进行抵抗，这就是当局者迷啊！除了毛，谁有胆背着毛动员几万工人来冒犯蒯司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清华打死工人后，毛主席在大会堂接见五大领袖，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工宣队全面进驻各大学，学校一切开始走上正轨，我们可以安全返校了。

### \*开除团籍是乱弹琴

返校时，大部分同学已经毕业分配离校，我到系办公室去办分配手续才知道：我的团籍在本人不知情，也没有开支部会通过的情况下被开除了。我直接去找工宣队负责人林凯，他一听，说：乱弹琴！不算数，你去办手续。他给系团总支打了一个电话，事情就解决了。聂树人们干的荒唐事多了去了。68年自己发展自己和张正万入党，还大张旗鼓在广播中宣传是革命造反行动，后来，康生教训他：想当假党员吗？才罢手。

### \*应该揭露那些靠整人吃饭的人

毛泽东生怕共产党变质，一心想着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过头了。在历次运动的锤炼下，中国出现了许多专门靠记黑材料、打小报告、准备“秋后算账”整人，从而飞黄腾达的龌龊小人。文化大革命是这些人登台表演、彻底暴露的时期。地质学院有一个赵璧媛，文革前是研究生班党支部书记兼辅导员，从文革开始就暗中收集反党委人士的黑材料，后来又收集反工作队人士的黑材料，蔡派形成后又收集蔡派的黑材料。由于她永远站在掌权的一边，总有一些学生在她的组织下干这些事。她这样的人毫无政治立场，只知依附权贵，掌权的也总是需要她的材料，结果她永远不会受到冲击。这种人厚颜无耻，当面是人，背后捣鬼，如果不能惩治、约束这种人，中国的整人恶习难以收殓。类似赵璧媛的还有牛马骆等等。

### \*因祸得福

由于没有拉队伍，蔡派的人都是自由地人自为战。我们开玩笑说：二团是八个人九条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相互也经常热烈争论，但对外绝对是一条心。特别是我，除了看大字报、写大字报、辩论外就是“旁观者”，没有接触过上层人士，没有组织参与过一次“革命行动”，没有和社会上人士联络过。尽管在校时不断挨整，毕业后，无论是抓 516，清理三种人和其他审干，都没有碰过我一根毫毛。单位有关人士事后告诉我：每次清理你都是第一个，看了材料实在没有把柄嘛。我在地院文革中是写轰动和被大量批阅、传抄的大字报最多的人，地院革委会出过大字报选集，我拿到过的就有 8 本，上面没有一篇是我的，因为我是反革委会的。被打、抄、抓使我失去了全部底稿和文革资料（许多大字报也没底稿，铺一叠纸，拿起笔，十几张纸一挥而就常事），写回忆只能凭记忆了。

### \*11622 班文革前的几件事

#### 复杂的社会关系

我父亲解放前是银行职员（聂树人回忆录说我出生资本家），58 年 1 月 8 日因忧郁症跳楼自杀；大舅抗日时任过 8 个月伪开封市长，光复后定为汉奸，因年岁太大没有坐牢，在我家寄居过；二舅是湖南盐务署的，解放后住在我家，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59 年被我检举后遣返老家和子女团聚；堂兄文革前在台湾任外交部非洲司付司长；表姐夫因右派和历史问题劳改多年。这些情况我从开始填履历就全部交代了。特别是检举二舅，由于是“大义灭亲”还获得上海时代中学

少先队唯一最高荣誉“近卫军之光”。现在看来，这种检举不是什么光彩事，言论应该无罪。但至少说明我这个人对共产党是衷心拥护的。我也没有拿“之光”这个最高荣誉当作资本，初中毕业后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过此事。高中入团时，组织上对我审查极严，社会关系是唯一原因。团支部书记 50 年后告诉我，他们最后到派出所才知道是我检举二舅的，我才过了政审关。聂树人、张正万这些“红五类”，对共产党哪里有过我这样的忠心，他们没资格说我和反动亲戚划不清界限。今天，有些当年的“红五类”受海内外反共宣传毒害，变成了反共分子。而我这个“异己”，却坚决挺身而出维护共产党的理想和正确路线。不知毛、刘、周、邓等元勋如果泉下有知会有什么感想。

### 去孙司权家过春节

63 年春节，经济不宽裕，没能回家的同学很多，班上唯一的北京人孙司权邀请了五、六个同学到他家去玩，其中有我，见到了他的“右派”父亲，除了礼貌招呼没有交谈。

### 孙司权入团问题

孙司权入校后就争取入团，他的表现比大部分团员都好，可是在团支部讨论时，总有那么几个农村来的团员反对。为此，团支部居然形成两派，这是 11622 班矛盾的开始。反对派除了聂树人、袁长清、沙丁茂那几个外还有吉让寿。孟繁华认为是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冲突，我觉得有血统论在作怪，还有妒忌心等等。620 兵团和红色造反兵团联合后，吉让寿向孙司权道过歉。

### 时事测验

入学后我就是地质系学生会课余活动部成员，后来接任了负责人。曾经在班上搞了一次时事测验，只有聂树人一个不及格。他不服，和我争辩，我在他宿舍里摆事实，讲道理开导他，他就是不服，有什么办法？这是我跟他许多辩论的一次。入学后，聂树人一心成名成家，不下功夫读书，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整天琢磨写诗，自己抄、订了好几本小册子，我看后，实在不敢恭维。喜欢写诗不是坏事，成名成家也无可厚非，一辈子只想着自己出人头地：“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聂树人回忆录题名）和殷惟侯的人生观的确格格不入。

### 政治考试不及格

二年级政治课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卷考试题目是“试用阶

级观点和群众观点来说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大家都是抄书，我为了考出真水平，离开书本，写了一篇独立论文。结果政治教研室讨论半个月给了个 2 分，成了全校唯一补考生，也使我全部满分的大学记分册，开了一盏红灯。这篇论文应该是地质学院历史上政治考试最优秀的之一，由于当时环境影响，难免有点左腔，但因为是独立思考，和当时极左的舆论有一定距离，被枪毙了。文革时政治教研室总是犯错误，有一次，我的又一篇轰动学校的大字报（题目忘了）上有人批语道：“政治教研室的老师们，好好看看这一篇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却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大字报，作者正是被你们评为政治考试不及格的人。”王子贤（坚持评我不及格的教研室主任）现在也承认他只是“御用文人”。我这个 2 分值得地质大学和教育部研究研究，中国的教育能不能鼓励独立思考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 评早春二月

64 年课余活动部组织批【早春二月】，应者寥寥，为了深入批判，我用笔名写了一篇为【早春二月】辩护的文章，贴在地质系食堂，引发热烈讨论。最后也是我写了一篇驳斥文章，结束了讨论。聂树人、张正万们硬说我用笔名写的才是我的真实思想，奈何？批判需要对立面，否则永远找不到真理，这是铁律。真正的共产党，信仰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真理的一个阶段的代表，它们是需要完善和不断修正的（“修正主义”实际上是背叛）。共产党如果想长期执政，必须从一言堂解放出来，允许不同政见，并随时准备向真理低头。

### 安静中道路和马杏垣道路

前面讲了我和安静中谈话的内容，把“走马杏垣道路还是安静中道路？”说成是“对抗走雷锋道路”，这是什么逻辑？思考发展方向和学雷锋有矛盾吗？难道都去开汽车才是学雷锋？女儿初中时问我，“真有雷锋这个人吗？”我说：“当然是真的，我就是雷锋的战友。”我从初中二年级（58 年）就开始做好事，而且从来不留名。高中为了帮助同班一个差生，每天步行 15 分钟和他一起回家，一起做作业，帮他答疑，再步行 30 分钟回自己家，坚持了 5 个月。在批准我入团的讨论会上，这个同学把我帮他的事讲了，我才停止每天帮他。当时雷锋还没有出名。我会反对学雷锋？聂树人们挖空心思整人才会用这种逻辑推理问题。

### 七大罪状

65 年，正当我满腔热情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不久，几个农村的同学（后来知道就是那几个人，包括吉让寿）在背后向政治辅导员告了我“七大罪状”，其中包括“走白专道路，政治考试不及格”“和右派分子勾勾搭搭”“对抗走雷锋道路”“和汉奸、反革命亲友划不清界限”……。辅导员刘和林找我谈话，先声明：要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把这些罪状转告我。我从头冷到脚，不知该怎样回应。当天在礼堂开大会，我忘情地站在凳子上指挥唱歌，一个晚上没睡觉，第二天一早绕学校跑了两大圈 6000 米进行发泄。我终于挺过来了，辅导员也没有再提这件事。文革毕业鉴定时，聂树人们变本加厉，故伎重演，我已经是刀枪不入的运动健将了。我可怜那些喜欢整人的人。

### 关于聂树人的回忆录

聂树人第一本回忆录我只看了电子版开头，加上他 20 年前亲口对我胡说和其他同学批的，我写了一页游戏文字讽刺他，第二本回忆录有三成篇幅写了大学时代，第 264 页一段话：“只有入了党，才能‘仕’，才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才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有了向权力之塔上端‘进步’的资格。”是他的信念。他拼命要求入党，对阻碍他“进步”的刘和林耿耿于怀，用今天的右翼眼光来丑化毛泽东时代。在具体事例上，他信口开河，写到哪，编到哪，只为标榜自己，完全不顾历史责任。他哭穷哭过了头，居然编造自己穿着草鞋上大学，中国人讲“穷家富路”，在家穿解放鞋，赴京却穿草鞋？他书中那么多中学、大学照片是不花钱的？他下乡经常遇到饥不果腹的可怜人，每次他都会拿自己的口粮施舍，我们和他一起，怎么从来没遇到？他书中提到我时几乎无不歪曲，虽然，他没有臭我，甚至有点美化我，这只能说明，他当年整我太理亏，见不得人。当初年轻，错了，改了就好，用回忆录来掩盖过失，骗谁？

### \*关于写回忆录

两年前孟繁华、王大宾、蔡新平等就张罗写地院文革回忆录，还在上海开过一次专题会，一再动员我写。此前聂元梓出过书，周泉缨也出过书，韩爱晶、蒯大富都有回忆，陶世龙也写了不少，聂树人写了 200 万字，已出版两本，还有两本待出。我一直没有动笔。一来，我只是一个小小人物，文革那些风云人物我很少接触，我对大事内幕所知太少，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二来，回忆难免有倾向，几十年过

去了，我不想误导后人；三来，许多人积极推动写回忆是因为官方文革史歪曲了他们的经历，要为自己平反，个别人甚至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我没有这样的冲动；第四，写回忆难免为文革辩护，我是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并反对全盘否定文革的，为什么有些反毛，批文革的极端人士要写文革回忆呢？我有疑虑。今年6月，由于高中同学筹备毕业50周年聚会，要出离校后经历专集。许多人写了，我这个最早找到大家的召集人不写说不过去，干脆，连地院文革一起写了近一万字。不幸笔记本电脑在外接电源未开时启动，发现外接没开再打开，一下子烧坏了电脑硬盘，几天的心血泡了汤，一盆冷水浇得我心灰意懒。9月22日高中聚会后，我写了一页短文【一个失败者】给高中同学，反响不错。这次60周年校庆回校，见到那么多老同学，谈话主题离不开文革，记忆的大门开始打开。在孟繁华、朱德瑜的一再追逼下只好答应写，一写就滔滔不绝，让大家见笑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和个人背景真实地写出来，对于后人理解文革各色人等的表现不会毫无意义。由于是回忆，只能是粗线条的，许多地方可能不准确，如帮助越狱的是不是张聪贤，应以余久芗的回忆为准。

2013年1月10日发出

**编者按：**

殷惟侯： 文革研究学者， 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  
(11622班)

# 文革回忆录

林天民

## 夺取地院广播台

1966年5月16日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北京地质学院的革命造反派成立了“东方红公社”，一切权利归革命造反派。但学校的广播台还控制在保皇派的手里，还不停地播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和不利于造反派的言论。

广播台是喉舌，是舆论宣传的必不可少的武器，谁掌握了广播台，谁就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当时“东方红”已严重地意识到广播台的重要性。我刚入学的时候，就被选到广播台报道组工作，邓作禄是总编辑，姜东亚是我们的组长，其他熟人有苏民生、华欣、童隆裴....都是广播台的同事。

那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广播台是全北京高校中最有名的大学广播电台之一。它不管是从音量、音质和播放技术在当年都是国内一流的，连播音员的水平，都绝不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平。因此，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广播台就愈显重要。东方红公社总部决定：要夺取广播台，让这舆论的喉舌掌握在革命造反派的手中。

由于我们71653班的男生宿舍离广播台最近，而我们班已经是革命造反派绝对掌权，因此总部决定由我们班作为“突击队”，准备在抢占广播台的“战斗中”首先采取行动。王大宾指挥了整个行动。那时我是我们班东方红的战斗队长（班长），王大宾指定让我担任“前敌指挥”，并反复告诫：没有命令之前不要行动。我接到命令，告诉全班的战斗队员，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命令不能行动。那天，我们班20多个同学就集中在两间宿舍里，大家屏住呼吸，等待命令。这时一个同学实在忍不住了，想提前行动，夺取广播台。我给制止住了，再次强调：没有命令之前，谁都不能行动，否则会打草惊蛇，前功尽弃。不一会，我们接到指令，开始！我们两间宿舍的大门同时打开，20多人一下子冲进广播台的第一道门。这时在广播台工作的保皇派同学发现了，立刻开始挡住第二道门，不让

我们进来。双方开始形成对峙，紧接着，东方红的“后续部队”就大批大批地拥挤过来。这时保皇派利用手中的武器——播音话筒，广播着严正抗议东方红公社的野蛮行径……气得王大宾赶紧叫我们采取点行动，停止他们的播音。而当时广播台门口双方还在拥挤、对峙，“东方红”还没有“占领”广播台，我们一时束手无策，此时只见王大宾爬上一个装着高音大喇叭的水泥电线杆，亲手拿钳子把广播线剪断，大喇叭一下子就不响了。

双方还在拥挤、对峙，但没有人动武。东方红的战士们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做“策反”工作，告诉广播台的同学，不要当保皇派的喉舌，要当革命造反派的先锋。你别说，还真有点效果，当时有的“保皇派”就放弃抵抗了，但也有坚持对峙的。由于双方近百人拥堵在狭小的走廊里，空气缺氧，有一个女生还突然晕倒了，大家喊：“让开！让开！”，就把那个晕倒的女同学举过头，人海中把她举着传递到走廊外边透气去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造反派终于夺取了广播台。当广播台响起东方红的乐曲，“高旗、无畏”的男女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东方红战士和那些还没有选定站在哪一方的中间群体的同学们都被震撼了！大家欢呼雀跃，群情激昂——革命造反派终于有了自己的喉舌。

后来的“地院东方红广播台”更加有名，对地院乃至北京市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及革命造反派的成长壮大，起到了先声夺人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 北师大“井冈山”是如何成立的？

1966年夏天，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全面开展的时候，在北京市的五十多所高等院校里，各种派别纷纷成立组织，什么“打狗队”、“红旗战斗队”、“卫东彪战斗队”……。

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已经成长壮大了，已经在北京地质学院掌权了。有一天，东方红总部王大宾（也可能是蒋良璞）通知我说：林天民，给你个请柬——明天你代表我们“地院东方红”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队”成立大会，你准备一个讲话稿，代表我们“东方红”祝贺他们造反派日益壮大。也许是总部的头头感觉这个即将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队”不是什么大的造反派组织，无非是想找个像我们“地院东方红”那么响当当的组织作为靠山，

所以他们自己不去，而委派我这个小头头去（我那时担任探工系革委会的委员和我们71653班的战斗队长）我接了请柬，可能有点先入为主吧，我漫不经心地很快起草了一个讲话稿，无非是表示祝贺之类的祝福语。

第二天一早，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映入我眼帘的是处处红旗招展、大字报连天，还有敲锣打鼓庆贺新组织成立以及大喇叭高声播放的革命歌曲。我当然照着最宏伟、最壮丽的场地去找，结果都不是，有的是“捍卫党委战斗队”、“横扫牛鬼蛇神战斗队”……整个一个“白色恐怖”，好像文革还没开展起来似的。我就问带“红卫兵”袖章的同学：“师大井冈山”的成立大会在哪？“不知道！”一连问了五六个学生，都是这么回答。我只好又找、又问，终于一个学生告诉我就在一个旧的小礼堂里，我径直过去，只见在这个破旧的小礼堂，一群少先队员的鼓乐队正在预演进行曲，礼堂的座位上仅有几十个人，我一下子心里就凉了下来。尽管我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这情景跟我想像的也差得太远了。我正在纳闷，突然在门口看见了我的八一学校时的同班同学蔡贤德，他是蔡畅的亲戚，烈士子弟，其父1955年因在去往雅加达亚非会议的飞机失事而遇难。那时蔡贤德正是北师大天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也很吃惊地看见我，问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说明来意并表示这么个小组组织成立让我们堂堂“地质东方红”来祝贺未免太小题大做了。蔡贤德却说：你别小看这个组织，你再看那个正在招呼人的女的，她叫谭厚兰，是“井冈山战斗队”的发起人，我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个子不高，梳两个小辫，还戴着个眼镜……我就更有点狐疑了。蔡贤德接着说，谭厚兰是个调干生，是个很有头脑的学生，也很有才华，很有能力。“保皇派”想整他，想压她，都没有使她屈服，今天她组织成立了“井冈山战斗队”。“井冈山”代表了革命造反派的大方向，别看今天人少，但一定会发展壮大。我问蔡贤德：那你参加“井冈山”了吗？他答道：还没有，但我准备参加，我们系里还没有一个参加的，可能我将成为第一个。蔡贤德的一席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庆祝会开始了，少先队的鼓乐队吹打了庆祝曲和革命歌曲，然后谭厚兰主持“井冈山战斗队”成立大会，宣读了“井冈山战斗队”的宣言和奋斗方向。紧接着她又宣布“地质东方红”的代表祝贺词，我跃上主席台，高声开口，我说道：革命造反派的同学们、“井冈山”的战友们！我刚进校门的时候，甚至都找不到你们这个会场，今天，我看到了你们的勇敢精神，非常感动，我事先准备好的讲稿

不用了！我代表“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我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又说：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别看你们今天的人少，但你们代表了革命造反派发展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能够发展壮大！你们今天就是那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没想到我扔掉讲稿后的即席发言，又赢得一阵更加热烈的掌声…。

几个月后，“北师大井冈山战斗队”，真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以气吞山河之势，横扫千军之力，很快就取得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领导权，而谭厚兰本人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 与周总理“辩论”

1966年末，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开始迎来“大串联”的阶段。通过“革命大串联”，红卫兵可以更多、更广地宣传毛泽东思想，通过徒步长征串联，还可以得到身心的全面锻炼。我们也决心向老红军学习，走长征路，锻炼自己的意志，我们计划从井冈山出发，徒步长征，走红军走过的路，用半年的时间到达延安。考虑到我们大约在冬季开始长征，于是我就带头磨练自己的适应性，甚至在初冬下雪的夜晚把雨布铺在宿舍楼外的土地上，裹着大棉被睡了一夜，初冬的小雪花落了我一被子。当晚把我冻得发抖，但我挺住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信。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出征的时候，11月的一个下午，东方红总部通过黄达晋告知我说，今天晚上在人大会堂召开一个北京各高校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并有中央首长接见，总部让我代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会议，并安排好了接送我的汽车。我当然很高兴，不过我想，东方红总部的主要头头不去开会，而让我这个低年级的去“凑数”，看来这个会议并不重要。

晚上，我被如期送到人大会堂，因为人不多，各高校代表都集中在小礼堂，准备开会。原来说是晚八点开会，一直等到十点多还没有开。这时，我听到小礼堂门口吵吵嚷嚷，我好奇地想走过去看，但被保卫人员拦住了，那时高校的红卫兵个个都“牛”得很，哪管那一套！我就故意说：“怎么啦？我去上厕所不行吗？”“厕所在那边…”，“我知道！我绕一下不行吗？”我边说边走出了门口，我看到…

噢，原来是蒯大富迟到了，卫兵不让进，蒯大富就跟他吵，一个劲儿地强调会议还没开始不能算迟到，卫兵只好让他进来，但检查他的时候发现他携带了手枪，又不让他进了，直到会议组织者说服卫兵才将蒯大富的手枪临时收存，放他进入会场。会议召集人借此告知大家，以后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一律不得携带武器枪支。另外，告知会议还要继续延时，等待中央首长。各高校的代表们可以给各自的学校去个电话，不要影响各校原来的工作安排。大家可以在人民大会堂的电话间打电话，但不许离开人民大会堂。

我快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按计划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开始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延安”的长征了。这么晚了还回不去，明天怎么出发？但想到有中央首长接见，等待也是值得的，只好耐下性子等待。我也给我们班的伙伴们打了电话，告知：你们不要等我了，早一点休息，今天晚上中央首长要接见红卫兵代表，目前还不知道是谁接见。

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大约晚上12点，各高校红卫兵代表们不少人已开始打盹。突然，会议召集人让大家坐好，说首长已到，马上接见红卫兵代表。代表们从困意当中一下子就兴奋起来，紧接着小礼堂的主席台侧门打开，啊！周总理！周总理！原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来了！大家立刻起立，热烈鼓掌。总理走上主席台一排桌前，用他习惯的动作，双臂招呼着让大家请坐下。同学们坐下了，然后总理才坐下，看得出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已经非常疲劳了。坐在总理左边的是周荣鑫（周当时是总理办公室主任），他笔挺地坐在总理旁边，眼镜后边透露出机灵的双眸。周荣鑫宣布：同学们好！现在，请总理讲话。周总理开始讲了：“同学们好！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央文革向同学们问好！向红卫兵代表们致敬！”总理稍稍起了一下身，周荣鑫立刻示意总理坐下。总理说：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文件想征求各高校红卫兵代表的意见——中央准备发一个通知：暂停全国的大串联，明年开春再恢复。总理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但冬季来临，我们已经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一些红卫兵小将走红军走过的路，在过雪山的时候受阻，我们派了空军去营救他们，不少人还得了感冒、发烧。小将们的精神可嘉，但一定要量力而行，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也不要给解放军带来麻烦。希望同学们理解。在此想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

我正着急着呢！因为明天我们的长征队就要出发了，偏偏这个时候要发这么个文件，我绝对想不通。我在过去几年多次见过周总理，他的侄子周炳华还是我八一学校的同班同学，我没有把周总理看成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而是看作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于是我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周荣鑫指了一下我，我站起来开始发言：总理，我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战士，我们已经计划好了明天一早就开始我们的长征。总理问：你们要怎么走啊？我说：我们要走红军走过的路，从井冈山出发到延安。总理笑了，说：你们还挺有魄力啊！我说：我们要学习老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什么都不怕！总理说：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走长征的路要做很多准备呢。我说：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被子、行装、棉衣棉裤、连行军的水壶都在学校领了。总理又笑了，看了看旁边的周荣鑫，说：看来红卫兵小将们准备的还挺充分。周荣鑫也笑了，点点头。紧接着，总理又说：不过，我刚才讲的情况，你考虑考虑，也和你们的同学们商量商量，做做工作，等开春以后再长征不好吗？我说：我们的决心不想改变，但我可以试试说服大家吧，谢谢总理！我的发言引起了全场一片热烈反响，一下子好几个同学举手要求发言。周荣鑫指了一下一个激动万分的、手举得老高老高的同学发言，他站了起来，说：我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我们也想长征，但我们没有水壶……可能是这位老兄如此之近见到周总理而太激动、太紧张，不知说什么才好，弄得语无伦次。“下去！”“别说了！”“笨蛋！”……会场一片哗然，把他轰了下去。周总理却笑了，又看看周荣鑫，说：没有水壶，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一样，跟学校借一下就行了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又有五、六位同学提了些问题。周荣鑫最后做了简短的总结发言，告知大家，中央的文件准备在两周以内下发，你们都是各高校的红卫兵代表，希望同学们听党中央的话，暂停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并做好广大红卫兵小将的工作，来年开春以新的面貌开始新的革命大串联。

会议结束了，已经是凌晨 2 点多了。我回到学校宿舍，同学们有醒来的就问我：怎么样，昨晚是哪个中央首长接见了？我说，是周总理。他们都很高兴，问总理都说了些什么？我说，中央决定要停止串联！哎呦！那咱们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先睡觉吧！”我倒头就睡。凌晨 5 点，我们计划好的出发时间到了。石学明第一个起床来叫我：战斗队长（那时的称呼），咱们该起床了！我勉强睁开眼睛，昨晚会议的一幕又映在眼帘——停止串联，怎么办？我实在困乏无力，扑腾

就又躺倒在床上睡下。几个同学先后起床，都来问我：队长，怎么办？起来呀！我只好起来，洗一把冷水脸，说：大家说，怎么办？走！我们不停步！我们长征去！

终于，我们八个同学（六个男生，两个女生）决定立刻出发，在中央停止串联的文件下发之前，走出去（附：长征队出发前的照片）。后来我们由于种种原因，仅走了从贵州的遵义徒步长征走到重庆，行程 1 0 0 0 华里，长征途中我们得到了锻炼，学到了不少知识。不在话下。



红卫兵长征队出发前在林天民家的合影



地质东方红长征队与当年摆渡红军的老艄公合影



地质东方红长征队与当年摆渡红军的老艄公合影

### “抓捕”彭德怀——忆重庆联络站

1966年11月底，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延安长征队”从贵州省的遵义市出发，用了11天的时间，徒步行程1000华里，北上来到了重庆市。我们计划用两三天的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继续北上徒步长征去延安。

由于我们已经连续步行走了十来天，两三个同学的脚都磨起了泡，特别是一个女生叫余锡兰的，脚上的血泡都磨破了，背包也背不动了，只好让石大个（石学明）帮着背，而石大个背着两个人的行装徒步行走，也快吃不消了，所以更需要好好休息休息。到了重庆后，知道我们地质东方红还有个联络站，在市中心地区的解放碑附近。我们就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负责人叫李云生，是我校大二的学生，也是造反派东方红的战士，我们大家见面后都很高兴。李云生看到我们八个人个个疲劳不堪，就说，你们多呆些日子，除了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也帮助咱们重庆联络站做做工作，因为重庆革命造反派的力量刚开始形成，还不太壮大，而保皇派的势力反扑也厉害，急需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支持和帮助革命造反派。

考虑到我们长征队目前的实际情况，几天后再走也是太勉强了。于是，我们八个人就决定留下来并开始与重庆联络站的同学共同工作了。重庆——这个曾经是中国革命近代历史红色和白色交相掩映的中心，今天又成了革命造反派和保皇

派激烈争辩的新战场。于是，我们在重庆联络站开始印发传单，并深入各高等院校和各机关、企业、工厂，“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宣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北京来的其他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战友们共同推动重庆市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我还应邀参加了多场在重庆大学、重庆医学院、解放军工程学院、以及沙坪坝、朝天门，还有许多记不清的地方的辩论大会。开始，我们经常受到“保皇派”的围攻和谩骂：“北京来的救世主，滚回去！”但是我们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用大量的事实和北京的新消息，鼓舞和支持当地的革命造反派。由于我们北京人的普通话特别标准，所以辩论起来更显得特别铿锵有力，常常博得参加辩论会群众的阵阵的掌声。有时我还学着重庆人的口音说几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增加了亲切感和信任感，更加得到当地造反派和中间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市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后来李云生告诉我，东方红总部决定让我也留在重庆联络站，也作为一个负责人，而我们长征队的其他同学就陆陆续续回北京了。

有一天，李云生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地院东方红总部将有一个重大的行动——“抓捕”彭德怀，说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承担此任务，我们重庆作为后备，一旦需要，我们立刻支援，要注意保密。彭德怀这个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大人物，由于1959年给毛泽东万言书，对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被贬到大西南做“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听说要抓这个叱咤风云的“反党分子”，太令人兴奋了！那几天，我们的神经极其紧张，虽然不是直接参加“战斗”，但也随时随地等候各种消息，生怕出现点纰漏。

过了两三天，李云生告诉我：“抓捕”彭德怀已获得成功！已经安全把彭德怀“抓捕”后护送到了北京。又说，“北航红旗”原来也想“抓捕”彭德怀，并且利用他们的优势条件——飞机来运送彭德怀到北京。可是“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在北京相争的时候，据说中央不同意用飞机，怕中途不安全。所以“地质东方红”闻讯后立刻行动，准确地把彭德怀“抢走”，并安排了一个连的解放军，用火车护送彭德怀到达北京，先安排“关押”在北京地质学院，后来把他交给了中央。

1967年大概3月的一天，李云生和我接到东方红总部的通知，让我们回北京。

李很快回去了，而我有些迟疑不定，因为那时，“二月逆流”已经开始弥漫在四川和重庆的上空，革命造反派又一次遭到保皇派的反扑，我的心情也很不好。于是我决定和同在重庆的勘探系李洪志在回北京的路上再走一走“长征”。

我和李洪志是北京人大附中的校友，又是地质学院的大一学生，我们的父辈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因此我们更想通过艰苦的磨练来锻炼自己。于是我们在河北省的一部分地区开始了徒步长征，去了白洋淀，见到当年雁翎队的队长，看了冉庄地道战旧址，走过了卢沟桥……实实在在地接受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

十几天以后，我们回到北京。刚回学校的第一天，李云生就兴奋地告诉我：前两天周总理接见我们了！我还亲自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肯定了我们“抓捕”彭德怀的行动是正确的。总理召见我们的一开始，就说：听说你们地院东方红抓了不少牛鬼蛇神？弄得同学代表们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回答。总理笑了，说：你们红卫兵做得好！你们给中央帮了很大的忙！你们保护了很多老干部，你们抓了彭德怀，但你们文斗，没有武斗，你们做得对。李云生说当时听了，心里甜滋滋的。当年就看得出总理对老干部是多么的爱护，他支持革命造反派批斗封、资、修，但又要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注意坚持党的一贯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李云生不无遗憾地说：你早回来两天就好了，总理要接见的通知名单里有你的名字，我到处找不着你，真为你可惜。我的确是感到可惜，但几个月前我已经见过总理了，并且还和总理“辩论”了几句，我应该知足了

2011年5月

#### 编者按：

林天民： 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71653班）

# 胡昌铭文革回忆录（节选）

胡昌铭

##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到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到“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倒台，有近十年的时间。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整个社会带来极其巨大的灾难，其后患无穷无尽。

从经济层面来看，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贫困到了最低点。

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动摇了党的基本建党理念，摧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葬送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地位。

对干部队伍来讲，干部曾经有过的光辉、被崇拜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甚至荡然不存，倒是还原了其人性的真实一面，其实在人格、情操、公与私的表现上不比老百姓强多少，与老百姓相比，有的甚至相差甚远。

对社会道德、思想情操来说，搞乱了思想，搞乱了道德规范，搞乱了理论，搞乱了做人的原则，搞乱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搞乱了整个社会。

对毛泽东本人来讲，已经从“神”降到了“人”，其功过甚至到了被“三、七”开或“四、六”开或被“否定”的地步，他曾经有过的耀眼光环，已经无光无彩了，他曾经的崇高威望和地位，连同毛泽东思想已经被人淡忘，从“人人歌唱毛主席，天天读语录”到无人问津的可悲地步，他的像，他的书已经成了“文物”，成为少数人的收藏品了。

今天，人们普遍对政治如此淡薄，对国家政府、政党的公信力如此之低，整个社会信奉的是“钱”，是“权”，几乎没有信仰，没有远大理想，陷入深深了信仰危机之中。过去，只在古今中外书本中见过的种种劣俗和伎俩，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民众也感同身受，领教过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官场如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像走马灯似地“换帅折将，你上我下”，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如此种种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伤痛。就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冤假错案为例，当时那么铁证如山的“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轻而易举的全部推倒了。我们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的逼、供、信，把人置入死地。但是那些揭发出来的“有根有据”的“事实”全部是假的吗？如果是假的，世上还有是非，真假，谬误可言吗？人性太丑陋了，可悲呀！真是应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句古话。经常有人告诉我，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谁胜利了，谁就是真理？！如果有部分事实是真的，那么为何全部推倒呢？！这些明显的是是非非、反反复复的例子何止千千万万，真的把人们的思维、思想搞糊涂了？！既然如此，就全不信了？！诚信是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如今人们信上帝的多了，因为不管你想象上帝有多好，他就有多好，不会欺骗你；如今人们信“钱”，因为“钱”是没有嗅味的，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就能买到一切。

谁能想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会发展成与当时面貌全非的模样呢？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事实。看来“革命”、“改革”、“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没有永远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如此，政治制度，思想理念也是如此。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还死抱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放，那会有今天的局面呢？！

当初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要按“斗、批、改”三个阶段进行。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是把文革中所进行的“批”、“斗”几乎都“改”了过来，这是新意的“斗、批、改”，叫做拨乱反正，似乎是给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如今“五七”干校没有了，干部都回到了机关；知识青年全部返城；“反动”学术权威重新登上了讲台，地位越来越高；青年学生再也不学农，不学工，不学军了，真正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新一代；所谓的“四旧”都成了国宝，价值连城；毛主席的书已经不读了，政治学习也取消了。如果用当年所批判的封、资、修的内容来看，如今封、资、修已全面复辟，不仅回到了原点，还向后退了大大的一步。这是我们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参入者，谁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发展和结局，来反思全过程，会有许许多多的感慨、惊叹和问号，甚至会觉得那个时代，包括自己在内都是那样的幼稚可笑，那样的无知无聊。想用正常的逻辑思维，用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理解、解释这场大革命都是困难的。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大革命的人，就更难理解了，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觉得他们的父辈是那样的天真、愚蠢、幼稚，不能理解？！的确是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太离谱了，太离奇了，太离经叛道了！文化大革命的可悲可笑的，甚至是富有戏剧性的结局是必然的，是无情的公正的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四十年后的今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已经淡忘了许多，就我目前仅有的记忆，把当时我的经历，我的想法和今天的反思，搅合在一起写点东西，以防老年痴呆，忘记了过去，可以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至于能否理出个头绪，明了来龙去脉，看来很难，只想从这个惨痛的历史中吸取点教训，想多少能明白点当时之所以然？！明白尔后何该为，何不该为，何该然，何不该然！

### 横扫一切牛鬼蛇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激起了全社会性的打、砸、抢，掀起了全社会的“破四旧”，掀开了对“地、富、反、坏、右”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对其生命的无人性的摧残。全国上下都处在“红色恐怖”之中。

在北京街头，在许多居民的住所，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着“军装”的中学生神气十足，对被他们认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拳打脚踢，用皮带抽，用鞋底打，这些人几乎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动弹不得。在火车站看到的是一些中学生用皮鞭抽，用手拖，用脚踢，强行把所认为的“地主、富农”拖上火车，遣返原籍。

### 这些人都被剃成阴阳头

社会的“破四旧”也席卷全国，甚至连女青年的长辫子也要剪。那些所谓的“封、资、修”的“四旧”砸的砸，烧得烧，偷得偷，已经毁坏糟蹋的不成样子，与2000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比，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各个中学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听说的很多，但亲眼见的不多，因为当时的大学生几乎都是在校内和高校间闹革命，很少走向社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美国的一个市级图书馆发现了一本（美）杨瑞著，叶安宁译的回忆录“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回忆”，其中有不少章节详细描写了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的活动，现摘录几段，说明文革初期那种至今也很难想象的“红色恐怖”。

先看看当年的红卫兵是怎样认识“造反”的。

“文革在1966年5月爆发，我感到自己活像传说中的孙悟空，被一座大山压了整整500年，现在终于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允许我们造反。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要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她除了教书还管我们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们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我认为林老师就是毛主席所说那种与学生为敌的人。”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的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看看北京市中学生是怎样打老师，打所谓的“阶级敌人”的。

“七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

“此时我看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右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

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再看看红卫兵走向社会是怎样破“四旧”的。

“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六月下旬的清华附中大”……。”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二十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

“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到达饭馆，“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随着破“四旧”的广泛展开，红卫兵的“抄家”造反行动开始了。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账、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

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乒！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乒！乒！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看到这些“抄家”的描述，我自然联想到我们学校举办的“破四旧成果展览”，展品包括金银首饰、金条、美钞、金圆券，还包括国民党党旗，国民党时期的委任状，匕首以及历代的文物……，五花八门，尽是值钱的东西。

我的一个朋友家里也被抄过。我朋友的爷爷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一直担任国民党时期的高官。解放后因董必武介绍，北京市彭真给安排了一个文史馆馆员的位子，写些回忆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因国民党高官的“罪恶”，红卫兵闯进他家抄家，撬开地板，找出了一把匕首。谁也说不清何人何时所为。因为这幢房子也是抗战前从别人手里买来的。这个匕首成为要“变天”，图谋借机阶级报复的罪证。红卫兵要把这位老头带走。迫不得已，他的孙子拿出了珍藏多年董必武介绍这位老先生给彭真的亲笔信，信中还提到这位老先生拯救过被捕的共产党员的命。红卫兵这才拿走这封信和一件值钱的虎皮长袍走了。

还有一件事也十分可笑。我这位朋友的哥哥喜欢在旧货店卖些“古董”等异样的东西，他家里有一个从旧货店“淘”来的大立柜式收音机。竟被邻居揭发为无线电发报机，冠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结果不仅被抄家，还作为特嫌被他所在单位关了起来，强迫交代特务“罪行”。那个时候，哪有法制，听风就是雨，可以随意诬告，随意关禁闭，随意逼供信，刑法伺候，直至致残，打死或被逼自杀。

“几天前，附近的农业大学里一个保姆自杀了，她可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那她又为哪般？

她可以说死于破“四旧”。红卫兵“规定资本家不准雇保姆，……，因为雇了

保姆就意味着你成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来等于说什么家庭都不允许雇用保姆了。”

“大串联”开始了，红卫兵走出了学校，走出了北京。“

“从八日起，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把这场革命推向全国”。

“我们选中了广州”，在途中，“我们决定在车上闹一番革命。

我们的计划是在卧铺车厢调查旅客的出身和阶级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让铺位给坐硬座的工农兵旅客。说干就干，……。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把卧铺车厢清了场，……。原来旅客中几乎一半都有问题，我们勒令他们离开，他们也不争辩，拿上行李走人。”

“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一位老妇人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在文革中，红卫兵打死活人是不偿命。

“那天晚上，两个高三女生突然押回来一个三十来岁、又粗又壮的“俘虏”。……。他们注意到他一直鬼鬼祟祟跟着两个女红卫兵，联想到这儿曾发生过强奸案，于是采取了行动……。一通笞鞭，竹竿如雨点般落下，只一会这人就瘫在地上。棍子悬在半空，……，这人纹丝不动。他没了气。

这下我们面面相觑，慌了神！我们闯了大祸。赶快叫公安来……。“

“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是何许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听到这句话，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原来他们是造反派，刚造了公安局的反，夺得了他们的权，他们说坚决支持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个案子就这么结了，不必再费事调查。他们会叫火葬场的人赶来把尸体运走。”

看到了以上“红卫兵”运动的回忆，心情是很复杂的。真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曾有过如此的疯狂，对人民生命财产如此的破坏和草菅人命。对这些“造反”行动持否定态度，是绝对的。我想即使这些当年的红卫兵，今天也是这样认识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应该看到他（她）们天真、朝气的一面，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我们作为当时的大学生初期参加这个文革也是抱着满腔热情，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投身其中的。可惜的是都被“统帅”领错了方向。他（她）们这些中学生后来在农村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栽跟头，喝苦水，自己教育自己，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国家各个行业，以至国家的栋梁之才。看来，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的越轨行动不可有，但奉献社会，追求真理的心怀不可无。这后一点，正是改革开放的十年后，青年一代所缺乏的，他们太现实了，太物质金钱化了，太想索取，太不愿意奉献社会了！

可以试问一下，一旦中华民族受到象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时，有多少热血青年敢于扛起枪开赴前线，走向战场，为保卫中华民族视死如归，流血捐躯？！

今天，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于参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一代，应予以同情和理解。他（她）们在文革之后，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不可言喻的经历，他（她）们在面对人生不幸的种种遭遇所表现出来的坚持、忍耐、拼搏、奋斗的惊人的力量、意志和毅力，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可贵财富。他（她）们经历过文革，打过了这种“革命”的预防针，具有今天年青人所没有的已溶于血中的免疫力。

我们当年 64 届，65 届的大学生似乎都这样想过，如果“文革”晚一两年开始，那么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将重写，将会有完完全全不同的人生。想到这些，大家不禁庆幸我们多了几岁，逃过了一劫。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苦愁，但与公与私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就破旧立新来说，有一样我觉得改的不错，至今还有生命力，那就是京剧的“样板戏”，仅此一项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还要感谢江青同志。当然京剧改革也不是“破四旧”，而是京剧的继承和发展。

##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

由于”人民日报“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首都校园乱了起来，一些人纷纷把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去安定各院校的局势。地质部派的是以邹家尤付副长带队的由地矿部政治干校的学员组成的工作组。他们都是各基础单位的书记、队长，派到我们英语班的是西安某地质队的书记储平。

我们英文班作为学校基础课委员会唯一的一支学生队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动力和依靠对象，我被选为专案材料组负责人，负责整理大字报和各类揭发材料，当时的系领导，学术权威都是批斗，被整理材料的对象。

工作组提出了“反干扰”的口号，对敢于炮轰党委的学生和老师进行了整肃。我是属于保工作队的一派，对我们班上一些激进的同也只是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没有任何秋后算账。

## 撤离工作组

工作组进校后，对敢于向党委提意见的学生和老师进行了整肃。这引起了一些敢于“造反”师生的强烈不满，掀起了赶工作组出校门的浪潮。围绕着工作组的是非与功过，是赶走工作组还是保住工作组，出现了两派意见，这就是以后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基本雏型。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对派工作组非常不满。7月19号他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中央撤销工作组。为此，66年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有幸作为地质学院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了中央首长的讲话，面对面地见到了当时在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第一次见到了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当时被称为“江青同志”的江青。她当是身着军装，坐在主席台最旁边的位子上，不

断地向师生代表点头、鞠躬，十分谦和。

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的，十分有戏剧性的一幕。当刘少奇讲完发言，刚呼完“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转身走下讲台时，毛主席在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突然出现在讲台旁边，与刘少奇打了一个照面，毛主席似乎没有什么表情，而刘少奇却先是一愣，接着很不自然地点了一下头。这一幕就发生在激动万分的北京市高校师生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从毛泽东在刘少奇刚刚讲完话后的神秘的突然出现到大会结束，口号声一直震撼着人民大会堂，响彻着天安门广场。我的嗓子也喊哑了。毛主席为何对他的亲密战友那样冷淡，我当时心中有些疑惑。

会后，我向基础课委员会的师生传达了中央首长的讲话，大家纷纷与我握手，分享见到毛主席的喜悦！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的迷信，那样地崇敬心中的神——毛泽东！现代的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会感到当时的我们幼稚可笑，甚至肉麻、恶心。

不几天的 8 月 5 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文章发表，我的答案也就有了。毛泽东说：五十多天里，中央少数同志参加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是白色恐怖，镇压革命派，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何其毒也。联系 1964 年的形左实右，岂不发人深省。

### 造反派保守派逍遙派

工作组走了以后，各个学校各种组织纷纷成立，地院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和保守派组织“斗、批、改”。三司是由朱成昭拉起一帮当时各个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在 1966 年 9 月 6 号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少数派。地院“东方红”后来成为北京高校“首都三司”的骨干、首领，“地派”的领头羊，在全国文革初期，风靡一时，登峰造极，不可一世！我参加了保守派“斗、批、改”和“红卫兵”。

在当时的强大压力下，“东方红”表现出了高度团结，威武不屈的顽强斗志。著名的三进地质部的气势，令人佩服，尽管我是“斗、批、改”一员。

随着“红旗”杂志六六年第三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

立刻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三司的支持。

在这种明朗的政治形势下，各高校保守派组织纷纷瓦解，造反派夺取了政权，造反派头头成为了“革委会”主任，学校成为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绝大多数“斗、批、改”成员也纷纷倒戈，参加了“东方红”。我是没有加入“东方红”极少数人之一。之所以不加入“东方红”是因为“不服气”、“看不惯”和“不理解”，感情上也格格不入。当然，“东方红”也可能不会接受我这个顽固的“保守派”。用当时那些造反派头头的话来说：“他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受旧党委，旧教育制度的影响太深！”

到底造反派与保守派有何不同呢？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而言，应该说大方向都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又为什么势不两立，甚至动刀动枪，流血“牺牲”呢？先撇开别有用心的幕后唆使者和一些“头头”的“私心”不谈，两派组织的基本群众在对干部队伍的看法上，在文化大革命的改革和策略上，在斗争方式上有分歧。用简单通俗，容易理解的话来说，保守派比较讲策略，对干部队伍认为要一分为二，斗争方式也比较温和一些。例如在对待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以及老帅的态度上，保守派的态度就是要“保”！随着运动的深入，那些在本单位是保守派的成员，在大串联中，基本上都是支持的造反派。看来这种分歧也只是运动之初。当两派发展成派性，高度的情绪化之后，是非也就可能成为一锅粥了，说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了。当中央一下打倒中央文革的“王、关、戚”，一下打倒军队里的“杨、余、付”，一下揪出一个“变色龙”，一下又抛出一个“小爬虫”，两派中的大部分群众感到困惑，迷茫，失望，焦虑和无奈。面对无是非可言，无道理可讲，无真理可求得现实，只好成为了“逍遥派”。但在感情上可以肯定曾经是保守派群众，对中央文革反感，对他们被打倒拍手称快。而曾经是造反派的群众可能在感情上是受不了的。

在造反派一统天下，一言堂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们成立了“挺进战斗队”，在大马路上刷出了大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关峰、戚本禹算老几！”，“对中央文革有意见为何不能提？！”这两条标语尔后成为了我对中央文革的罪状，由于我现在的太太的极力保护和主动承担责任，才免遭一劫。

文革初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干部队伍的看法问题，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是对干部队伍作理性的分析，承认干部队伍基本还是好的基本事实。这可能是缠绕在广大群众心头的，决定“保”还是“反”的首要问题。对运动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砸、抢”的“革命白色恐怖”，我曾经与当时工作组组长，地矿部副部长邹家尤长谈了三个小时，他说：“肯动脑筋想问题的年轻人是有希望的！”

对每个人来说，最初是参加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关于那些“头头”们，很可能当初受到工作队和本单位领导的批判和整肃，很可能与领导（老师）关系不和，处境不满意有关，也可能个性很强，爱提意见有很强的叛逆精神。这也牵扯到个人的脾气性格了。当然也有一些偶然因素，例如参加了一些活动，看到了一些人的表现，有的人拍手叫好，有的人却看不惯，这种感受也成为参加某种组织的诱因

如果今天发动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某种“革命”，可能广大人民群众都是造反派，因为人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共产党的官员从上到下普遍性、全面性的恶性膨胀的贪污腐败已经忍无可忍了。就所揭发出来的高官，都是大案，要案级别，枪毙十回也不为过，还有多少没有被揭发出来的呢？！

当逍遙派只是不参加那些以革委会的名义组织的那些打、砸、抢的活动，其实并不逍遙。我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种种疑问，通读了“联共（布）党史”，毛泽东解放以来历次谈话文章，和官方推荐的马、恩、列、斯的著作，以求解惑。实际上越读越迷惑，越觉得文革不可思议，对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开始思索起来……。从海瑞罢官的和北京市委彭真的批判，到在武汉发表“借助钟馗打鬼”的信，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离京，又突然回来在工作队上大做文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在他直接指挥下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种种作为等等，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可能就是为了排斥异己，公报私仇，泻私愤，图报服，打倒刘少奇和那些曾经顶撞过，曾经有些不同意见的人。所谓文革中所做的斗、批、改，例如当时全国机关人员大迁移，大专院校的大搬迁，学制课程的大改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似乎今天都又变过来了。当年所批判的“封、资、修”的东西，早已以把国民经济被推到崩溃边缘的大灾难，积重难返的大罪名，给予了“拨乱反正”。

随着复课闹革命，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学校才慢慢有了读书声。可那个时候学什么专业，上什么课程是非政府状态。一个班的领导小组就可以决定改变专业和课程。用“勒令”、“命令”等各种方式，强迫那些还在“牛棚”里的反动学术权威给他们上课。专业课程的改革方向都是向应用方向转化。我们就上了许多与石油有关的石油地质，电法、磁法勘探等课程。我曾被调到英语师资班，也因为是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被我们自动解散了，都回原专业去了。那个时候想学习的学生贪婪的学习，不想学习的天天玩耍，游泳、打球、打毛衣、画画、甚至谈情说爱，生活悠闲，丰富多彩，自取其乐。我除了上课，看点与文革有关的文章外，也是个逍遥派中的一员。

### 造反派的内斗和武斗

在造反派头头和造反派组织领导的学校，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是热衷于造反派内部的派别斗争。这种派别斗争，实际上是运动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继续。地院“东方红”组织分裂出了“蔡派”，清华园从“井冈山”分裂出来对立面“四一四”。他们的根本分歧还是运动初期对待干部问题上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表现在对干部队伍是一分为二，还是信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待所谓“站错队”的群众是一味的批判、打击，还是团结。当时，我除了看本校的大字报外，几乎天天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从当时的辩论会和大字报可以看出，“东方红”、“井冈山”强调的是所谓继续革命，继续斗争，继续造反，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彻底革命精神。而“蔡派”、“四一四”之所以被称为“托派”，是因为他们强调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讲政策，讲策略，不能像运动初期那样一味的冲冲杀杀，只要是“造反”就有理？同时，对于中央文革的态度也明显的不同。实际上，也是中央的所谓“右派”和“左派”在学生中的明显反映。据说，毛主席当时对清华“井冈山”批判“四一四”的文章很欣赏，同意“井冈山”的观点，毛主席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

这场两派的斗争，从口舌之战发展到了真刀真枪的流血战争。尤其以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表现的最为突出，我的许多朋友都从清华到地院来避难。因为那里炮火冲天，已经严重威胁师生的生命安全，听他们说，双方都把与能制造军火有关的专业师生组织起来，研发了不少的土手榴弹、土炮弹、土地雷，甚至

还有土火箭，真是学以致用，把中国顶尖人才用在了“刀刃”上。

为了平息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地武斗，制止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正在发生的武斗，几万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包围了清华大学。在“井冈山”的极力反抗下，造成了流血牺牲。

### 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就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言，“敌我”阵线已经很清楚了，毛主席想打倒的，已经成了落水狗；该重用的，如中央文革已经掌握了全国的党政军大权。可以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的已经达到了。当初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左派”，以幕后的方式，秘密地支持学生乱起来，没想是乱自己了。这种为打倒异己而有意制造的乱摊子是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要收场，要“治”，靠“造反派”，靠高学生是不行的。于是毛主席只好求救于以“8341”部队（中南海警卫部队）为代表的“军宣队”和以首都六个大型厂矿为代表的“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

面对这种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尴尬局面，毛主席不得不出面召见各大学生领袖，对这些死心塌地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打倒异己立下汗马功劳的小将进行安抚，对他们表示理解，同情和关爱。甚至当见到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时，毛主席泪流满面，而且一再交代不要整蒯大富。这些眼泪流出来的是对运动初期小将们冲冲杀杀打垮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感激和动情，流出来的也是对这些扶不起来的小将们，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和同情，流出来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竟然到了这种无法收场的地步的忧心和无奈。

毛主席批评五位造反派领袖，“全身浮肿头脑膨胀”也是出于这些心情。

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误会，当然是亲者痛。那为什么会误会呢？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明明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是毛主席的号令，却在学生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当时最有权威的“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两张王牌抢先造成声势，直逼学生娃娃下台。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把学生赶下这个舞台谈何容易，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军宣队、工宣队一围、一打、一冲、一闹，还有几个工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这种排山倒海的革命气势和毛主席、共产党派出的响当当的王牌军就把学生压垮了。

## 中央文革与造反派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开始，中央文革一直在幕后煽风点火，暗中唆使，面授机宜，直到公开支持造反派，成为了造反派的军师和直接指挥员。

后来才知道，从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康生、陈伯达秘密授意的。

1966年9月6号到16号，中央文革让蒯大富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中央文革接见了造反派头头。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12月18号，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在传达室单独接见蒯大富。张春桥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张春桥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张春桥还煽动性地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

张春桥的谈话，实际上要造反派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蒯大富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证实，张春桥谈话是主席的意思。

从对待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的态度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文革是支持清华“井冈山”的。

可以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把火点起来的，当然其后台只有毛泽东了。

##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

随着军宣队、工宣队的进驻，学生造反派头头及其组织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自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和造反派组织也都退出了舞台。学生退出舞台不需要理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就是最大的理由！

那么要问解放军“三支两军”，进驻所有的机关、学校、厂矿，工人毛泽东宣传队开进学校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和伟大部署吗？看来不是，也只是面对全国大

乱的局面，不得已而为之，只有用这两张王牌才能“震”的住，才能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从此以后，各个单位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手中。各省市，各个单位的所谓革命委员会都是军代表控制下的权力机构。

进驻地院的“军宣队”是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的军人，“工宣队”是北京橡胶总厂的干部和工人。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就是后来林立国“571”工程纪要产生的地方。军代表、工人代表领导学校做了三件事。一是斗，把运动揪出来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分别成立专案组，进行大量的内查外调；二是批，组织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三是组织师生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记得当时毛主席最高指示特别多，只要有最高指示，有“两报一刊”社论就立即召开全院大会，做到宣传、学习、游行不过夜。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个学校变成“红海洋”。

### 军宣队、工宣队大搞“红海洋”

解放军把部队学习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极“左”的经验都带到了学校。他们组织师生大搞“早请示，晚汇报”、大搞“红海洋”，特别是在向“九大”献礼表忠心的活动中，组织师生制作了大量的向毛主席献忠心的各种编织品、图画、标语牌。我记得古生物专业的师生，还用化石、贝壳拼成了巨大的毛主席全身像。为了迎接“九大”，我们学唱了不少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进行了多次庆祝“九大”召开的游行彩排。由于我在这方面的特长，我们古生物师生方阵是由我教唱革命歌曲，统一指挥游行方队和领喊口号。我参加这些活动是自觉的，是积极的，是出于内心的。我想那个时代人们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真心热爱毛主席。我这个人可能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干起来总会有热情，有干劲，也有方法。由于我与军代表，工人代表的积极配合，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姓何的军代表调离工作时，他还专门找我长谈，送给我一枚毛主席纪念章，鼓动我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认真改造思想，不断进步。

在“九大”召开的当天，我们的队伍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唱歌、跳舞、喊口号整整一通宵。

对“早请示，晚汇报”的态度，被军代表提高到是否忠于毛主席的高度。所

谓“早请示”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在操场上排好队，面向东方，先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随着军代表的口令，和着节拍把红语录高高地举过头顶，嘴里虔诚地祈祷着：“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把语录放在胸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整个校园在晨光之中，飘荡着一片对伟大领袖的祈福声，一片“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学校的大喇叭播放的也是“东方红”，也是祝福之音，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清晨的第一句话也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东方红”的歌曲奏响了神州大地。

这种“早请示”还不仅出现在清晨，以后包括每天三餐饭之前都要向毛主席请示。食堂门前都竖有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三五成群的同学们，走到毛主席像前，脱帽、立正，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默默地在心中向毛主席汇报自己一天的表现，请示完毕后，才能到食堂进餐。听说在部队里，面对桌上的饭菜，还要高唱“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以虔诚的感恩的心情来吃这一餐饭。还不仅如此，只要有活动，只要有会议，其中第一个仪式就是向毛主席请示。如果是大会还要跳“忠字舞”。

“早请示”最认真，歌曲最嘹亮的是牛鬼蛇神劳改队。每天清晨，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人，认认真真地排成一个方队，规规矩矩地高举红语录，放声高唱“东方红”。他们的歌声随风飘到我们的宿舍。他们之中有不少昔日我们十分尊敬的老师呀！静静地想一想，心中也不是滋味！

所谓“晚汇报”就是在睡觉前要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斗私批修”的情况，一般都在宿舍进行。因此每个宿舍都是挂着毛主席的像，刚开始大家都还比较认真，恭恭敬敬的站在毛主席像前汇报，时间长了也就流于形式了，甚至厌烦了，许多宿舍都找到了应付军代表和工人代表的阳奉阴违的绝招。军代表和工人代表几乎每晚都要到宿舍检查“晚汇报”的情况。只是那时我们已经不搞“晚汇报”这个形式了。一旦听到军代表和工人代表的脚步声或者听到防控宿舍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我们宿舍也不知在谁的带领下，开始了“晚汇报”，这时的同学有的躺在床上睡觉，有的看小说，有的聊天，可是都心不在焉的喊出了口号。待听到脚步声离去，一切又照旧了。

所谓“红海洋”是要在全校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我们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和最高指示。因此全校到处都是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是最高指示。我记得在宿舍楼道上转弯处，没有见到毛主席像，军代表立即要我们赶忙贴上毛主席像，因为院总部的军代表要来检查“三忠于、四无限”的成果。对于这些活动，我同大多数同学一样，开始是积极参加，即使当时心里觉得是形式主义，后来也不那么严肃了，也用应付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类似宗教的顶礼膜拜！不敢像有些老师和同学敢在会上说这是宗教一样的形式主义。后来，这些人重的都被打成反革命，轻的也接受批判。把伟大领袖与宗教相提并论那还了得！

### 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斗批走

在所谓的“斗、批、改”期间，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为理由，我们青年学生参加了许多社会公益活动。到农村去割麦子，到首钢去参加第二号轧钢厂的建设，到农业大学去收花生，到周口店去“深挖洞”，去打扫猪圈，去挖石煤……。实际上是将我们作为了无价劳动力，同时也想磨去青年学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造反锐气。全国上百万大学生，整天不上课，哪有那些斗、批、改的事情需要做？！

我作为文艺活动的骨干，配合当时的形势教育，参与了组织革命师生文艺宣传队，在田头、车间给广大师生和当地的工人师傅、农民兄弟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后，见到一些工人师

按照96年中央一号文件，林副统帅的第1号令，全体师生都各奔东西，在“斗、批、改”，还没有开始“改”的情况下，都纷纷地走出了北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斗、批、走”。可能这种“走”就是“改”吧，这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吗？！

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使大批机关干部，科研院所都“逃离”北京，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了。我们的老师上了位于江西的地质部“五、七干校”。说“逃离”一点也不错，许多老师卖书、卖家具，准备在干校过一辈子，“逃离”似乎是战争即将来临，行动非常迅速。

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使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不得不背井离家，到千里之外的青海、北大荒和云南雨林……，也是去安家落户。

我们大学生在林副统帅的号令下，仅用几天时间，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似乎战争就在眼前？！事后，林彪倒台以后，又听说这是林副统帅的阴谋。至今也不知道林彪的一号命令是怎么回事，似乎真理总是掌握在胜利者手里。从 1966 年的全国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到 1969 年全国上山下乡，向农村、山区、三线疏散，这种全民大运动，大迁移，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古今中外仅此一例。仅仅这一例就把全国所有父老兄弟、千千万万的家庭折腾得天翻地覆，劳民伤财，耽误甚至摧毁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淹没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摧残着国民经济崩溃到了危险的边缘。

### 安徽 324 地质队

我们古生物专业的两个班和少数领队教师在军代表和工人代表的带领下，去了安徽省地质局 324 地质队。它位于贵池县殷家汇。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抵达了 324 地质队大队部。广播里传来了上海腔的普通话：“热烈欢迎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到地质队接受再教育！”

我们干的活都是地质队劳动强度最大的活，除了少数女同学分配到车间当钳工、车工外，绝大多数同学都当上了钻工、搬运工、山地工。

### 山地工

我被分配到山地组当小组长，山地组顾名思义就是与“山”打交道，具体地说就是打眼、放炮，挖槽探，挖浅井。从地质专业来看，就是把浮土铲出，露出基岩，提供地层资料；通俗地来说就是如同农民伯伯挑堤、筑路、修水库的最苦的差事。

我们用的工具很简单，锄头、铁锹、钢钎、铁锤、簸箕，以及打井用的绞绳和轱辘，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却天天形影不离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索、火柴。光看这些工具和材料就明了我们工作的艰苦和危险。

每天清晨，随着工人师傅和下放锻炼的机关干部，我们一行近十多人，背着、扛着、挑着各种工具和材料，气喘吁吁地赶到高山上的工地。最危险的工作要算是携带雷管。开始我们一接触炸药和雷管心里就发毛，手就会不停地颤抖。后来才知道火药在没有雷管的情况下是安全的。我们宿营野外，自制的床铺就是用炸

药堆结起来的。我们看到工人师傅天天与雷管打交道，胆子也大了起来，不过还是要小心谨慎。师傅们几乎天天都要给我们讲叙，由于违反操作规程，雷管爆炸，造成人身伤亡的惨痛故事。对此，我们常记在心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马糊不得，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

雷管是放在一个小纸盒中，小纸盒是放在一个木箱子里。我们每天轮流背箱子，尽量不要让箱子震动。时间一长，警惕性就少了，天天背着炸药、雷管上山，也不害怕了，还有说有笑，心里的潜台词可能还多少有消极的心理，反正也看不到前途，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

### 同工不同酬

在贵池地区地质队干活，我们已是“超期服役”了，已经到了大学“六年级”。按规定五年毕业，至今还没有毕业的消息。

当时的中国人生活贫困，我们学生就更穷更苦了。在我们无偿地给地质队干活的时候，是靠家里寄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家在农村的孩子，虽然有助学金，农村的家里却是眼巴巴的盼望孩子寄工资回家，以补贴家里的急需。这种白干活不拿工资可能又是世界之最了？！说明白一点，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对有知识人的歧视、不公！

我们仅能从地质队得到的是地质队工人以旧换新的旧工作服、旧鞋子。对我们唯一优惠的是可以到仓库里挑选，因为这些衣服、鞋子都破旧不堪了！当时的地质队工人有每月 15 元的野外津贴，我们没有，我们山地组有点特殊，每月有 6 元钱的井下补贴，可工人师傅却是 12 元。

这些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我们敢怒不敢言，心里愤愤不平。听说知青回家探亲，因为没有钱，就不买车票。我当时也想我们也应该不买车票，因为国家欠我们的。有的班级在深夜里，突然响起了“我们要毕业”的呼声，打破了寂静，军代表、工人代表赶忙来“灭火”。这实际就是学生对当局不满的示威！

后来近一年这之后，中央文件下达，让我们毕业了，毕业后五年多不转正。因为转正要加工资。文化大革命把政府搞穷了，穷的连工资都发不起，只好克扣青年学生？！真是悲哉！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要曾经为文化大革命奉献青春的学

生来承担，公理何在？！

## 有苦也有乐

回忆起来，我们在“324”地质队的点点滴滴，真是有惊有险，有苦有累。

干了一个多月的山地工后，我们学生都成了炮手，我们一次可以点二十门炮。炮口要朝山下，人点完炮后要朝上跑，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计算炮响的次数，如果有哑炮就要设法排除，这是最危险的工作。

一次，有一个炮未响，但始终找不到雷管，当时，师傅叫我和一个同学去仔细查找。我们小心翼翼地扒开浮土，丈量炮眼可能的位置，希望能找到导火索和雷管，正在我专心的查找炮眼时，旁边的同学高声地叫起来“我找到雷管了”。我扭过头向他瞟了一眼，由于槽底高低不平，他在我的上方，双手就在我的太阳穴旁，我隐隐约约看见他正在剥离雷管。我们用的是纸雷管，是用纸一层层缠绕起来的。我的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剥离雷管就意味着爆炸。说时迟，那时快，我下意识的站起身来，突然用双手紧紧抓住雷管，大声叫道“你不要命了！”这时，这个同学才恍然大悟，惊吓出一身冷汗，不过他还向我解释是想看一看雷管的结构。这个同学真是缺窍，雷管还能解剖？！这个同学的确有一个特点，思维方法独特，与众不同。其它事情可以理解，在雷管问题上却不能允许有异样的思维和行动。我马上把雷管拿过来，找了一个安全地方，把雷管引爆了。事后，真是后怕，如果再迟疑一秒钟，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可能是上帝保佑，让我在那个时候向他瞟了一眼，这一瞟，就让我多活了四十年，这是我第二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是在三岁时，掉进了湖里。

还有一次是毕业前夕的最后一次放炮。在大队部工作的同学，没有到过野外，对我们山地组打眼放炮特别有兴趣，刚好有顺便车，接我们回大队部作毕业的准备，我就邀请他（她）们坐顺便的车到我们野外来。为了省事，他（她）们没有上山，就在山下观看，我心想观看地与炮位相距很远，也就大意起来。没想到炮眼也是朝下的，只听见一声声炮响，岩石碎块像雨点般地向我们飞来，只听见石块嗖嗖地在我们身边砸下，大家惊慌地大叫起来，好在我们躲进了一片树林，而且还戴了安全帽。事后，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好不容易熬到快毕业了，要是真出了事可真不得了！这次活动是我出的馊主意，我要负责。事后，我不停地向他（她）

们道歉。他（她）们笑着说，算我们命大，造化大，老天爷保佑我们！

山地工的工作无外乎是出力气，扛着几十斤重的东西上山，虽然汗珠直流，喘气不止，但由于年轻还吃得消。皖南的冬天，虽然不是北方，但潮湿，雨水多，阴冷阴冷的。要说苦，冬天不收队，在雪花飘飘，寒风萧萧，冰碴混着泥土的土地上挖坑，打眼，那才叫苦。这个苦就是冷，就是冻，冷的钻心的疼，湿透了得衣服，特别被冰、水和泥包裹的鞋袜，冻得手脚僵硬，一碰一道血口。老师傅叫我们“生火”，我们捡起周围的一些枯枝，树叶，点起了一堆火。火给全身带来了暖流，身上也有了热气，火也使我们能喝上热水，吃上烧得焦黄的馒头。

还有一个苦就是使用铁锹，铁锤，手上打起了水泡、血泡。当血泡被磨破以后，双手血肉模糊。当时没有创口贴，也没有手套，只好用手绢缠几道，再继续干。当手掌长出茧，又起泡，又磨破，直至厚厚的老茧长出，才能对付这些铁家伙了。

由于我们山地组的艰巨和危险性，我们几次评为先进班组，我和其他同学也三次评为“五好战士”。

我们山地工虽然危险，有过事故隐患，但上帝保佑，没有发生重大伤亡上事故。在别的地质队，就发生了在钻机上工作的同学不幸身亡或受伤，失去胳膊，失去手指的悲剧。

回忆起来，我们在“324”地质队的点点滴滴，有欢有乐也有趣。

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林，野外的地质生活对第一次踏进地质队的我们来说，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吸引人，同时是那样的艰辛。皖南山区，崇山峻岭，青山连绵，植被茂密，郁郁葱葱，溪水潺潺，鱼翔浅底，鸟语花香，特别是挺拔、高耸、婀娜多姿的竹林，给人以诗情画意和无尽的遐想。

清晨，踩着朝霞，迎着朝阳而去；傍晚，伴着日落，踏着晚霞而归。高兴时，诗兴大发，同学们不时来上几句；激情时，放声高歌，“这边唱来，那边合。”特别是那豪迈、雄壮和优美的有着进行曲韵律的“地质队员之歌”，成为我们朝夕相伴的旋律，抒发情感的心声。这使我想起了蒋大为唱的“山里人爱唱歌”的一句歌词：“山里的人，爱唱歌，唱起歌来好快活！”这么美的风光，这么清新的空气，

要是在今日，可是难得的地球上的净土，不知要花费多少钱才能享受到的旅游胜地——人间仙境。可是在那时，我们还不知这里生态环境的宝贵，也没有刻意去享受大自然给我们的慷慨的恩惠。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碰到刮风下雨，雪花飘飘，大雪封山，野营在简易帐篷或工棚中的我们就成为了“落汤鸡”和“冻死鬼”，晴天一身灰，在雨季就是一身泥，夏天晒得脱层皮，冬天就冷得生冻疮，裂开口子手脚鲜血直流，真正体验到了刘少奇 1957 年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师生，被誉为“建设时期游击队员”光荣称号的艰辛和劳苦。

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更没有录音机，I-pod。全组只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是唯一的获得外面信息的媒介。报纸基本见不到，写信也要走上个把月。

单调、重复的重体力劳动，没完没了的接受再教育，看不到自我发展的空间和前途；寂寞、空虚的情绪开始缠绕着我们。深夜同学们的牢骚话是少不了的，对大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遭受到的“待遇”的不满情绪滋生着，蔓延着……，怎么打发在野外那些业余生活时间，我们只有靠自得其乐来度过这些时光，自己找乐。

星期天，我们三、五成群到山林之中的小溪边，高山流水旁去捉鱼虾，洗衣服。有时也成群结伴背上地质包到十几里外的乡村，挨家挨户地去买鸡蛋，买花生，买用竹条编织的篮子，那个时候，物价便宜，尤其是在深山老林里更是如此。鸡蛋一角钱三个，花生四角钱一斤，而且还现卖现炒。我们常常在老乡家边吃刚炒熟的花生，边与老乡聊天，以感受一点“家庭”生活的乐趣。皖南山区，竹林茂密，竹编织成为了老乡的副业。工艺精巧，形状多样的竹篮子，成为我们当时追求的工艺品。我离开 324 队时，随身就带了三个竹篮。

我们经常为组里买木炭，两块钱一担。只要是冒着烟的地方，就有木炭卖。山里的木炭副业也非常发达。我们也亲眼看到了木炭的制作过程，大开眼界。

由于经常在乡村走动，我们结识了来自合肥的知青，这个组有男同学，有女同学，在一个锅里吃饭，分住在两个大的集体宿舍。这些年青的朋友和他（她）们的生活吸引了我们，虽然我们是大学生，但共同接受再教育的处境和能在深山

老林相遇，看来是有缘。有几个星期天，我们在一起联欢，谈生活，谈困难，谈前途，也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唱几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和现代京剧。看来我们比他（她）们幸运，因为我们还有毕业分配，拿工资这个盼头。他（她）们可是要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看到他（她）们其中不少人已成双成对，有了爱情生活，正值青春躁动期的我们，也有许多感慨，我们常年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可都是“光棍一条”，不管是新光棍还是老光棍？！因此在地质队，饭后空闲和雨天不出工时，有些师傅谈话的内容就渗透一些黄色的新闻和故事。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他们还是相当收敛的了。在这方面，我们同学们都是好样的，严守着高尚的情操。不过听说我们有的老师却经不起寂寞，有了出轨行动，尽管学校当局尽量保密，但风风雨雨总能传到我们耳边，这只是后话了，不管好的，不好的，可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啊！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过着半军事化的“游击队”式的生活，别有的趣味，别样的生活还是难忘的。

山地组流动性大，而且是独立作战，十个月就转辗了七、八处，我们不能同成建制的野外分队在一起，所以没有专门的厨师。我们同学就轮流担任做饭，采购，担当起伙夫。同学袁佩新、张家仁会做饭，所以他们当伙夫的次数多一些。我第一次吃狗肉就是在山地组。因为怕狗腥味把炒菜锅污染，就用脸盆当锅，用炭火煮，用辣椒去味，味道还真鲜！我做的比较多的是采购。往往我们的住地离集市有几十里地，完全用两条腿步行，因此天不亮就得去赶集，回来满满的一大挑，足有七八十斤，挑东西就是那时练出来的。买的东西都是新鲜的蔬菜，鱼、肉，还有刚上市的大米。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讨价还价，学会了记账。有时集市离大队部不远，我就绕道到大队部的同学那里去歇过脚，聊聊天。围着红红的炭火，喝上一杯热茶，吃上一口烤红薯，真是神仙的生活。一想到还有几十里的山路要走，还要挑着百十来斤的担子，心情又沉重了起来，这是我的工作，当然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了。

###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快到春节了，我们山地组回大队部修整，野外机台却不收队。我们一些同学接受了军、工宣队要我们到野外井队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慰问演出的任务。我

们和队上的宣传队是一起行动的，还有家属文艺宣传队。他（她）们也请我去帮助编导。这个新年春节期间，我就成了“专业”业余演员加编导了，虽然忙，但很有乐趣。

我们的节目有不少是反映我们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内容。我们山地组的师傅，送给我们每人一个扁担。我就以扁担为题，编了一个对口词。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我们的巡回演出热热闹闹，浩浩荡荡，给地质分队、机台和当地的乡村，城镇带去了活力和欢笑。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鞭炮欢迎，因为正值春节期间。

我记得一九七零年新年，“两报一刊”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刚好我们有一个二号钻机在县城附近施工，我们决定借用县一中的礼堂进行演出。下午一点钟作出决定，在这个钻机上劳动的同学们和我们宣传队立即行动，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发布今晚有演出的消息。结果晚上七点钟，观众坐满了礼堂。我记得我即兴写了一首诗歌“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表演了诗朗诵。那个时候，十几个学生就敢在一个县表演一台节目，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还是要用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思维，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义不容辞。演得不好是水平问题，演不演却是政治问题！就是我们山地组的五、六个同学，听到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我们也敲锣打鼓，在地头田边向贫下中农演出我们现编的节目。

我由于爱好广泛，还作为324地质队主力队员，参加了该地区篮球赛，取得了冠军。大队工会主席非常高兴，要组织我们球队到安庆去比赛。很遗憾的是我由于出发前最后一次练球，把小腿肌肉扭伤，即使老工人师傅用燃烧的酒精摩擦，用膏药敷，也无济于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吗！我只好放弃比赛，回大队养腿病。在一个多月的养伤期间，又使我享受到了真挚的情谊和温暖的生活。

### 真挚的情谊

由于腿脚不便，我住进了大队传达室，与一位曾经受过伤的老工人为伴，他每天代我打饭，打开水，我非常过意不去。由于我曾经帮助过家属宣传队和子弟学校宣传队编排过节目，和他（她）们比较熟，所以得到了他们的特别照顾，至今我还十分感激。

要看病，要走十几里才能到殷家河诊所，小学的同学们就主动搀扶我到医院看病。

需要热水，队上的家属就轮流给我送热水，倒脏水。我经常被她们请去做客，帮我改善生活，有时候也谈谈家常。她们都是有好几个孩子的妈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家属也参加到了群众组织中，同职工一起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各地巡回演出。由于有这个历史原因，这个队的家属革命委员会也是一级组织，在全队很有威信，受大队工会直接领导。我记得家属革委会主任姓马，是一个热心快肠，高度负责的人。她在一个节目中演地主，十分逼真。还有一位我的湖北老乡，叫陈香桃，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也是湖北武汉人，是一个机长。由于老乡的关系，她总是照顾我。我由于腿伤回武汉探亲，她还委托我带上她当时九岁的大女儿随行，带去见她的爷爷奶奶。我受到了近十多个家属大姐的照顾，心中有说不尽得感激。

不仅如此，她们还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她们想方设法寻找我们同学的脏衣服，经常帮我们洗干净，缝补好。每每有脏衣服，我总是藏起来，但又经常被她们找到，很过意不去。有一次，她们竟到百十余里外的野外，帮我们的同学洗被子、蚊帐和脏衣服，还帮我们做了一顿香甜可口的饭菜。我们的同学都说，这是托你的福，你帮她们编排节目的犒劳。是啊！将心比心，她们都是大姐姐辈的。我没有姐姐，在324队体会到了大姐姐的关心、照顾和温暖。

### 毕业分配各奔东西

在我们返回大队部准备毕业分配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还常常成群结队的到离大队部三里地的殷家河去游泳。我记得殷家河上架了一座公路桥，可以走汽车。桥下就是一片天然的露天游泳场，还受不到太阳的暴晒。每天中午和晚饭后，大家都到那里去享受大自然的洗涤。她洗涤了我们将近一年的疲劳，也洗涤了我们日益滋生的消极情绪，注入我们心田的是对毕业以后的期盼！

就在宣布毕业方案的那几天，我们班十分的宝贵的女同学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可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可谓神秘、神速。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女同学独自一人到社会上非常紧张，还不如找一个知根知底的老同学。我不记得我当时是什么学生干部，基本上协助军、工宣队和老师做了不少组织工作。我由于现在的

太太在文革中有所谓议论江青的“罪行”，由于我的关系没有发配到青海甘肃以示惩罚；也因为她的所谓“罪行”，我没有留校或分配到内地。据了解，各单位在那个时候，议论“四人帮”，议论江青的不少人都遭到了批判和整肃。可“四人帮”、江青倒台以后，对这些人不平反昭雪，而是不了了之，这公平吗？我被分配到陕西地质局，后来又被分配到陕西汉中铺镇的第二地质队，在深山老林干了两年。在毕业分配的大会上，我作为典型发言，表示要在西北干一辈子。

当时我们的行李还在北京。军、工代表只选派了五个同学帮我们在北京的行李运到贵池。临行前，我们全体师生在324地质队门前整队，向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家属、学生和朋友告别。当时的眼泪在眼眶中打滚的时候，他（她）们也留下了惜别不舍的眼泪，连小学生们都禁不住哭出声来，我们挥手话别，依依不舍，自1970年8月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她）们了。

在我到陕西工作的一年多里，我还和陈香桃大姐通过几次信，互致问候。

贵池位于长江边，水路方便。当夜我们在贵池住了一宿。我们按照不同的目的地分乘不同航班。我是最后一班船，我目送了所有同学的去，我记得我的同窗室友张家仁登船离去时，向我高高地挥起双手，说了一声：“昌铭再见了，以后扬州再见；”他是分配到扬州“五普”，至今这句告别的的话语还响在耳边，四十年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浩瀚的长江，奔流不息，把我的同学们送到了四面八方，东西南北，在犹如长江般的人生长河的滚滚波涛中，朵朵浪花诉说着我的同学们许许多多曾经有过的喜、乐、哀、愁；奔腾不息的江水，传唱着我的同学们平凡而动人的人生故事；绽放出我们同学的饱经沧桑，艰辛创业，绚丽夺目人生的光彩！

四十年来，我们离多聚甚少，现在大都已退休。大家都盼望着重逢，盼望着重温那些曾经有过的激情岁月。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老了，形象已对不起观众，但至今在我脑海里还是四十年前的我们，英俊潇洒，朝气蓬勃！还是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扣人心弦，激动人心！

**编者按：**胡昌铭，196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古生物专业。

# 何建勋文革回忆录（节选）

何建勋

## 一、为了忘却的纪念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今年是2014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文化大革命给我和同时代的几千万青年学子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精神及肉体的摧残，却像永远驱之不去的梦魇，不堪回首，更难以释怀。剪不断，理还乱。一想起它，就坠得心生痛；一梦到它，就憋得肺欲炸！

在我的大学时期的同班、同系的老同学、或不同班不同系不同年级的老校友、乃至在“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至今尚硕果仅存的“一小撮”难友眼里，我的经历实在具有太传奇、太离谱的政治色彩。

1970年我匆匆与众学友分手后，便神秘地失踪了、人间蒸发了，音讯全无。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有个别老同学断断续续、支零破碎地打听到我的一点情况。1970年底的“批清”运动中，我被以“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恶毒攻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组织煽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叶朱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暗藏的‘五一六’分子”等十恶不赦罪名判处无期徒刑送广西鹿寨大山里劳改，从此隔绝人世。当年轰动全国的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坏头头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后来也只判处十几年不等有期徒刑。就名气地位而言，我乃一介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难望其项背；可就落得下场来看，他们可就小巫见大巫、自愧不如了。

1979年刘少奇平反我平反，我居然神奇般穿越回来，当年结婚娶的对象恰恰是关押看守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女干警。她是一名共产党员，而我只是一个劳改释放犯。在那个年代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执法女干部，敢于不避嫌地下嫁一个“反革命罪犯”，真是冒天下之大不违，令世人瞠目结舌。反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劳改的地方是广西英山监狱。那里的难友都叫它“阴间”。在“阴间”，无助而绝望的我，居然意想不到地结识了十多位良师益友。他们之中有从美国回来的著名科学家，精通数理化，国民党政府选送一批精英到美国留学深造，回国

后蒋介石又授予他们少将中将军衔，其学者地位大致相当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一类国宝级院士。解放后他们成了俘虏，被作为战犯关押在这里劳改，一关就是二十年，连人民币也不会使。释放的日子还渺茫无期。（这些战犯一天兵也没带过，他们其实都是起义将领，他们在云南通电起义文告上签过名。1976年初全国最后一批特赦战犯，政府给他们每人发一身中山装，一百元零花钱，他们之中愿意去美国、回台湾、留下来，听便。）这些良师益友之中还有一些是解放军部队长期培养出来的像李瑛、李季、峻青、流沙河、杨杨、邹荻凡一类著名诗人、作家，在小学、中学语文教材中，我拜读过大师的作品。五八年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他们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给党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言多必失，言者有罪，被划为极右分子押送这里劳改。（毛主席不是说右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么？）古今中外，一个院士、大师级学者所带研究生非常有限，也就区区数人，读硕读博，加起来也就四五年。谁听过十几位世界顶尖院士大师用近十年时间且朝夕相处、胼手胝足、共同带一个“研究生”的奇闻呢？数遍天下，恐怕就我一个，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不幸中的万幸！此等机遇，可遇而不可求。（这帮“战犯”，“牛鬼蛇神”，并不像我和常人想象中的那样青面獠牙，狰狞可怖。他们具有浓厚的学者气质和长者慈恙。虽然他们中许多人袒胸赤足、腰系草绳，和乡下老农并无二致。他们只是对我这种“共产党的小崽子”也来劳改感到困惑好奇。他们肯收我做徒弟，主要是我能一气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可怜林冲”，天不灭曹！天欲降大任于草民乎？痛哉哀哉！

在“阴间”，我刚来，不知深浅，不识黑，年轻气盛口无遮掩，在难友中信口谈起文革中派性武斗、中央文革的丑闻，被狱管视为传谣放毒，把我关进了地牢。地牢是水泥石块砌的，一半在地上一半埋在地下。地牢里没有床，只有木板铺在潮湿水泥地上。大小便桶就在头边。一盏昏灯悬在拱型牢顶，人关进去，不辨黑夜白昼，不知阴晴暑寒。一般人关进去，孤独寂寞加上阴森恐怖便兜头袭来，出不了个把月就会神经失常，疯疯癫癫。我却被关了足足半年！一直没有放过风。我居然没有疯！我拼命背数学公式，默记物理化学定律方程，撕心裂肺地喊诵唐诗宋词，对巴掌大的气窗学鬼叫学狼嚎…白费劲，没有人理会我，送饭的难友也神情麻木不答腔，他们怕，也司空见惯。我今天是奔七十的人了，垂垂老矣，可

我居然没得老年痴呆，脑瓜特好使。我自己敲敲天灵盖，佩服之余，更感谢爹娘赐予我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我相信我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上帝保佑，主与我同在。阿门！

我一气摆了这么多条的传奇，似乎是在拉家常，聊与己不相干的旁人琐事，心静得像一潭长满绿锈的死水，无纹无波。可我自己感觉得到，我的心在流血，撕裂般的痛。这么多年来，我不与老同学联系，校庆同学会从不参加。我就怕触动往事这根最脆弱也最敏感的神经。

我的亲兄弟也都以为我性情孤僻，怕与老同学比自相形秽，抬不起头。其实我怕，怕孤独！可我偏偏用自我封闭的孤独来磨砺自己的斗志。孤独这东西，常裹着许多旧的回忆劈头盖脑地涌来。这旧的回忆并不依照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一幕一幕地依次放映出来；最痛苦的情景常常一齐涌来；然后最快乐的情景也一齐涌来，但是它们总带着浓厚的阴影。在阴影中摸索必然会绊倒、被刺扎。我常绊倒，常有针刺进肉里。于是我便暗中流泪。最大的泪珠滚落在书稿上，它们滴得很响，好像我有一根心弦已经断了似的。今天，我重抚心弦，不是觅知音；而是感到时日不多了，给世人留下一个文革中被愚弄北京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的悲怆绝唱！

### 发配广西

1970年下半年，我被发配到广西地质局。负责分配的高广立老师对我宣布：“在叶朱反革命集团里，你还算不上核心组坏头头。可是在查阅其他人的交待揭发材料中，叶朱集团每次开黑会，都有你在场。你至少也是一个骨干分子、小爬虫吧？军宣队专案组本打算将你留校继续审查，为扩大教育面，现将你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上，你的问题暂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要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你要是表现不好，反革命帽子是可以随时给你戴上的。”

到了广西，我又被下到物探队钻井队，在广西全州县才湾公社。我犯下的“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略部署的罪行”，实际上就为了一首歌曲。才湾公社有许多从桂林、全州下来的知识青年。我来广西前在武汉街头看到一张被群众传抄的大字报，《徘徊在死亡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弟弟写给哥哥的信。信中披露了许多知青下乡后的悲惨遭遇，吐露了知青心中的困惑、迷惘和绝望。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给知青写了一首歌。歌谱是套用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我只把歌词重写了，分三段。

“蓝蓝的天上噢，白云在飞翔哟噢。美丽的扬子江畔哟噢，可爱的武汉古城，我的家乡噢。啊——啊——啊——告别了乡邻告别了爹娘告别了我的姑娘哟，埋葬了青春埋葬了希望，前途渺茫。

天空闪耀着北斗星光哟，北斗北斗哟噢，我们仰望着北斗，向望着自由噢。啊——啊——啊——灿烂的北斗光辉的北斗希望的北斗，问苍茫大地浩瀚的宇宙，谁主沉浮！

漫漫的乌云哟，遮不住太阳哟噢。千年的冰雪哟，锁不住铁窗的仪念锁不住春光噢。啊——啊——啊——砸碎那铁链冲破那牢笼放声把歌唱，听隆隆的春雷要把旧世界，彻底埋葬！”，

这首歌我曾经在列车上给一帮知识青年唱过，他们很感兴趣，学得也挺快。在才湾居然在这里知青中又听到这支歌，足见流传之广。不过歌谱已变调成流行校园曲，唱起来感情更凝重更深沉。歌词也大有改动，改得更贴近知青现实生活和内心情感。分四段。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这支歌名叫《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粉碎四人帮后从媒体上得知词曲的改写者叫任毅，当年是南京知青。这支歌很快引起广大知青的心灵共鸣，传遍全国。后来连香港、台湾、前苏联电台都反复播放。帝修反这么赏识这还得了？任毅立刻被抓，当时南京革委会本打算判处死刑。得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说了句：“唱支歌没有死罪”。任毅捡回条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直觉隐约告诉我，任毅似乎替我背了黑锅。我的原词在当局看来更反动更露骨更恶毒，煽动性更大。尤其是第二段，是根据古埃及奴隶歌改写的。“北斗北斗，我们仰望着北斗，向往着自由。”

我所谓“犯企图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罪”，其实就为了一句口号。我很同情知识青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的大倒退、文明的大倒退，是愚弄抛弃了千万青少年。于是我愤慨地喊出：“知识青年，新时代的农奴！”结果引起当地知青的强烈共鸣，呼啦啦在我周围聚集了一大拨人，不过常常在一起吃喝骂娘而已。

我犯下所谓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为首的人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是我接受了朱成昭集团、北京红卫兵联动的一些政治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大清洗”、是“宗派斗争”、是“林彪革命”、“林彪才是隐藏在中央内部的最大野心家和阴谋家”、“中央文革是御佣文人和打手”、“老干部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不能因为五十天的错误打倒五十年”、“打倒毛林小集团”……

至于我是隐藏的“五一六分子”，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在“批清”运动中，（批判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分子）在广西军代表眼里，我可是大有油水可捞的重点！给我戴上手铐，钉上脚镣，还被单独关押。据说死囚才享受这般待遇。军代表向我交待政策，说这次运动是全国一盘棋，是网大眼小不要存在侥幸。还说在北京、在武汉我的同伙早就坦白交待了，纷纷检举我是五一六集团骨干分子，并且给我念所谓揭发材料。我苦笑分辩：“五一六集团是反周总理的，你们又逼我承认周总理是朱成昭集团的黑后台，这不是矛盾么？”当局急于定案立功，不交代就连番审，几天几夜轰炸。我困得都睁不开眼、手都铐肿了，（苏秦背剑式的，两手一上一下背后反铐着），我只想好好睡一觉，由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我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后台我都认！

一九七一年末，我明显感觉到政治气候有了重大变化：看守我的枪兵（当时在押人员都称哨兵为枪兵）居然敢主动与我答腔了。他们不停向我打听关于林彪、林立果的情况，越详细越具体越好。怎么不称林副统帅了？肯定是林彪父子一伙出大事了！我故意在写交待材料的纸上写血书：“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交给枪兵看了也没引起反感，更没加重罪行。后来他们的指导员干脆直接找我要求我把对林彪的看法和了解的情况统统写下来。想必是部队内部在搞大批判，肃清流毒。好嘛，我一口气写了洋洋洒洒几万字的文章：《林家铺子倒底贩卖的是什么货色！》。像文革前中苏两党大论战那样，仿照中共九评苏共公开信，把

赫鲁晓夫给赶下了台，我也写了九批林彪。后来有枪兵偷偷告诉我：得亏你反林彪，本来你注定是要枪毙的，被打靶的，现在你可能会平反，至少死不了。原来我从阎王殿前走了一遭！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哪！

宣判那天先挂牌全城游街。我脑海里突然呈现“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先烈从容就义的情景，一股胆气豪情油然而生。我看到了满街群众看着我的眼光并没有仇恨，倒是有不少同情。我还听到一句贫下中农喊出的口号：“打倒老何！”我从心底偷偷笑了：“老何”，好亲切。多么纯朴的老百姓呵！我还看见台下有知青向我双手胸前紧握示意，他们是在给我送别呢！“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的话儿说不完。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梭标望君还。”我怎么突然又想起《送别》这首歌呢？被押上审判台了还这么不老实！唉！当权者可以让囚徒在审判台上低头，五花大绑地跪着；可他们能让思想低头，让思想也五花大绑地跪倒吗？

我被判了无期。这个结果没有给我的身心带来太大的震动。倒不是我的意志太坚定，我的承受能力大于旁人。其实我的感情很脆弱，很丰富，特别容易动情流泪。当时我只感到特别无助，哭天天不应，哭地地地不灵。死刑与无期对我来说是一个概念：完了！这辈子完了！今生休矣！索性横下一条心来，大不了就是条命么。我还年轻，时下当权的可多过花甲古稀，我就不信活不过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押送“阴间”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希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我突然又想到革命烈士留下的这首诗。我拼命地想找精神支柱来鼓舞自己。我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形成自己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文化大革命中我只凭一腔书生意气来寻求真理维护正义。我发现自己被骗了。被人利用完后又被朝死里整，然后再被无情地抛弃。昨天还是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红卫兵小将，今天就变成十恶不赦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阶下囚！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不是明文规定不整学生么？有我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有个老校友黄瑞华在诗中吐露愤懑：“无知幼稚何须计，

几寸真诚几寸心。倘使惺惺能识吾，人间正道是常情。”“远看香山红遍遍，近观满树血淋淋。抒情何待寒风起，万里红涛是我心。”记得武汉一位学友曾祥华自我解嘲说：“下次文化大革命，我要当保皇派。为什么？当造反派只是有理；当保皇派是受蒙蔽无罪。老子反戈一击还有功呢！这有功可比有理强多了！”

在被押解途中，我依然是被五花大绑招摇过市。一领破凉席横在背上的行李卷上，如同背上个沉重的十字架。我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将背到哪里是尽头呢？列车上听着车轮与铁轨单调的撞击声“哐当哐当……”，我感到特别凄凉，我哼起了前苏联歌曲《小路》：（自然歌词不由自主改了）“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路上洒满驿人的泪光。我要沿着这条曲折的小路，跟着我的命运去远方。”“失去了自由前途多渺茫，埋葬青春失去了理想。沿着这条充满荆棘的小路，沉重的苦难正在等着我。”……出站时意外见一位知青撞过来：“唷！哥们儿！这是怎么着啦？犯了什么事儿啦？”正宗京腔。我不认识他，但也朗声回答：“二月逆流小爬虫，五一六的黑干将！”他扭头大大咧咧问解差：“可以给他烟抽吗？”解差无言地背过身去。他匆匆给我点上支烟，又偷偷把整盒大前门塞进我兜里，大声说道：“哥们儿，自个儿多保重！”转身匆匆走了。我偷眼瞧见，烟盒里藏着十元钱！我心头一热，哦，这地方并不陌生。

“阴间”对外的称呼叫英山柴油机厂，位于鹿寨县深山老林里。这里层峦迭嶂，汽车开进去得个把小时，在当地号称“四十八弄”，解放前当地人白天是农伯，晚上全成了土匪。这里山势突兀，拔地而起，溶洞环环相套，极似桂林山水，但又比桂林山水险恶得多，范围也大得多。关押在这里的囚徒既便侥幸逃出高墙电网，七转八拐就转迷糊了，根本找不着北。这里的囚犯分别被分配到机工车间、工修车间、油泵车间、装配车间、采矿队、铁厂、副业队劳动改造。这里的囚徒都是重型政治犯。各车间、厂、队的囚徒平时是严禁互相串通的，就连本车间、本队但不是同号子的囚徒稍微接触多点，也会立刻被秘密举报，当晚就会被开批斗会，勒令交待认罪。问题严重的立即会被丢进远离监号大院的地牢里去，一关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半年，或者更长。经常有囚徒直接从地牢里被拉出去打了靶子。就我接触到的狱友（当地一律只准称呼同犯）来说，大体分这么几种类别：一类是所谓国民党战犯，他们中有将官，也有校官甚至有连排级和兵油子之类的小萝卜头战犯；这批战犯从被俘就分到这儿了，交待“盼蒋望美”思想，一交待就

是二十多年，仍然没有交待彻底。另一类是六零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空投、偷渡、潜伏的美蒋特务，交余罪交了上十年也没交待完。还有一类是五八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成极右分子的文人，大多在副业队耙田务农，十多年勤耙苦做也没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他还有一些类别的，但像我这样一个从文化大革命风浪旋涡中冲刷出来的学生出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可算独一份。

我被分配到工修车间，跟着师傅学习车、钳、铣、刨、磨等机加工维修技术。也许是由于我的文化水平基础不错，人又年轻接受能力较强，且正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我是政治犯，政治犯都是分配到车间里成年累月也难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的（像副业队采矿队的囚犯天天出工都是到高墙外劳动的）。工修车间的头是一个上了年纪头发胡子包括眼珠都黄了的黄主任，这么大把年纪还战斗在基层第一线，想必是文革中被“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彻底砸烂公检法”、赶下来接受改造的“走资派”。我的猜测估计没错，第一次被领进车间，我见到他恭恭敬敬鞠躬喊了声“黄爷爷！”（我不知道应该立正“报告干部”，也不是卖灵利乖巧，好像只是出于本能和良知。）他一愣，没有严厉呵叱我，叹了口气说道：“学生气太浓了。”拍拍我的头，叫一位岁数怕有六十多的老囚犯把我领走学习机械生产的理论和技术。后来又有好几位年龄更大的师傅带过我。从言谈中得知，他们都是国民党时期培养的一批科技高级人员，有好些还被送出国深造，专门学习军工制造；回来后又到军队服役，被授予中将少将校官军衔，被俘后又都成了战犯。我的天！小小山弄竟是藏龙卧虎之地，从外表看他们老成持重，温文而雅其貌不扬，一点也不像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杀人魔王。

我的师傅们开始对我比较冷淡，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警觉得很，怕我是共产党派来贴身潜伏的探子。想必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把他们历练成这样。我对师傅可是毕恭毕敬崇拜之极——我竟然能拜与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李四光世界大师比肩的科技专家为师，小子真是三生有幸，这个“阴间”真是来对了，阎王爷没见着倒遇见超度我重获新生的活菩萨。阿弥陀佛！我胸无城府又刻意巴结，给他们背诵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背诸葛亮的《出师表》、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岳飞的《满江红》，竭力表现出我还是“学富五车”李贺、江淹式的“神童”。他们收我为徒不算跌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多少打动了师傅，虽然表演的过于直白拙劣。他们系统地教我机械理论，教我看懂

并学会绘制机械制图，手把手的教我操作各种机加工技术。我手脚麻利眼明手快，多次获得内部机加工比赛的第一名，还发明了以车代磨的先进刀具，光洁度达到“三划九”。有次要在工件上偏离中心加工宽度仅三十个丝的槽，大致相当三根头发粗细吧。这么薄的刀具手工根本磨不出来，即便磨出来了也无法精确安装到刀架上。我灵机一动，把刀具装在车床机头上，用磨刀石细细打磨刀具两边，达到精度后又把工件固定在刀架盘上，慢慢摇动手柄，细致加工，终于拿出合格产品。还有一次用铣床加工工件。工件太大，人根本没法从正面操作。于是师傅想出用光屏指示灯操纵刀具同步加工的办法，人站在铣床背后移动铁笔在光屏上滑动，用指示灯来操纵刀具，如同今天摇动鼠标那样，丝丝入扣严丝合缝，看得我瞠目结舌，大开眼界。七九年我出狱时车工技术还被定为六级，用赵本山的标准：“相当中级职称。”师傅传授的理论知识如公式、方程、定律、数据，大多数只能用脑子记，记到本上很麻烦，因为干部、哨兵经常要来监号抄检，被他们翻看很容易被怀疑是秘密串联的暗号、密码之类的。他们不敢也不可能教我英语，自然也是为了避嫌，不然的话我的英语水平怕考托福也没问题。于是这便练成我超于普通人的记忆力和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这恐怕是我今天年近古稀却居然没得老年痴呆的原因吧？

出工之余(机加工车间实行两班倒)，师傅给我辅导数理化基础理论。说是基础，至今看来也是莫测高深的。例如数学，传授的一道世界难题——幻方的构造及应用课题的探讨。一般说来，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的是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讨论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组合数学，就是从数论中派生出来的一大门庭。幻方，则是属于组合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德国大数学家高斯说：“数论是数学的皇后。”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费尔玛定理问题，都是几个世纪以来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世界难题。门捷列夫从中国最古老的《洛书》中悟出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也是透析《洛书》后发明了相对论。《洛书》正是世界最早的幻方。至今人们对于幻方的研究还很肤浅。诸如各种类型幻方的存在性；幻方的构造方法计数与分类；研究一个已知幻方的性质、结构、潜在应用，等等。幻方研究的应用，目前已在离散结构和关系的分析及计算程序设计等领域。好了，简单介绍完幻方后，转入正题。师傅给我讲数论，非常非常之艰难，又没有教材。我啃了好几年，打下较

稳固的基础。终于在我重获自由后，1984年第2期《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学报》上刊登了我和我大哥合作的论文《奇阶同心幻方的构造方法及其证明》；1991年十月我们的又一篇论文《偶阶同心幻方的简明快速构造方法》收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计算机视觉与智能控制学会第二届学术会议论文集《计算机视觉与智能控制 91》；1992年第4期《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现华中科技大学)再次全文收录《偶阶同心幻方的简明快速构造》全文，包括详细的数学证明全文；之后，我辅导中学生搞幻方课题研究的科普项目，多次获《创新素质实践行》论文一等奖，多次获《中科院武汉分院数学与物理研究所》专家的高度评价，《武汉晨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武汉学生破解世界数学难题》；2010年我辅导的几名中学生论文经原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教授和武汉大学数学院博导程士华教授推荐获得《第一届中学生丘成桐数学国际邀请赛》决赛资格；2010年，由我辅导的一群学生署名的学术著作《幻方探秘》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出版社审核出版了，全书三十余万字……这一切成果的取得，全受益于我师傅的谆谆教诲！书籍上、获奖证书里找不到恩师的名字，我岂敢掠他人之美？愿师傅的在天之灵得知笑慰！

逢年过节，为了调剂在押囚徒漫长单调乏味的生活，狱方也会从各车间、中队抽调一些有点文艺细胞的人集中排练一台自编自导反应罪犯服从管教、安心改造的节目经反复政治审查后搞几天汇演。于是我又有机会合法地与那帮“极右分子”接触，拜师学艺。“老右”见缝插针地给我讲诗词曲赋的艺术特色、写作规则如合辙押韵、平仄对偶、语法特点等等，久而久之，居然也打下较牢固扎实的功底。这些“老右”胆子比那批“战犯”可大的多。“老右”讲授时常含砂射影、夹棒打棍，嘴一出溜就过了“警界线”。如“老右”教我学朗诵，教材选的却是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自然也是背着他时。)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崇高的意向，绝不会那样消亡。厄运的姊妹——希望，即使在阴暗的地底，也会唤起你们的精神和欢乐。大家所期待的时辰不久就会光临，爱情和友谊要穿过阴暗的牢门，达到你们身旁。

就象我自由的歌声会穿过你们劳役的深坑，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阴暗的监狱会覆亡！自由会在门口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的手上！”

我听了这首诗感到特提气，一下子就会背了。“老右”中的死硬派是一个笔名

叫“杨杨”的原解放军某部的诗人、文化干事。杨杨经常偷偷写些“骨子里很反动”的诗，如《火山待发的中国》、《大王花》之类的，明知不可能发表，却偏偏藏到屋檐下、塞进树洞里，真是愚腐到家了。结果经常被举报，加刑至死缓。后来平反后找不到老部队了，七十多岁的老叟四处上访，赴诉无门，靠拉板车捡废品糊口，最终穷困潦倒而死。

## 我的婚姻

八零年下半年我出狱后，被厂里邀请到附中任教，教过初中的数学也教过高中的化学。我很快卷入恋爱的漩涡并立刻谈婚论嫁，按现在时髦的讲法就是“闪恋闪婚”吧？我的对象是狱政干部，她是名共产党员，搞内勤的，专管在押人员的档案。她说在以往的“敌情通报”中经常看到我的名字，想必是我在牢中太不老实太不安分了，经常成为打击的重点。我还是太年轻便太张扬了，没有学得像那帮老油条那样善于隐藏保护自己。

当时的大气候是全国上下都在平反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邓小平又站出来官复原职全面主持工作了、彭德怀的冤案、陶铸的冤案、“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冤案……统统都平反了，一风吹。补开的追悼会，开了一个又一个，沸沸扬扬，整个中华大地，升腾着蒸蒸的王气！我的父亲经熟人介绍跟随陈毅创办的中原大学从河南来到武汉，又到广西参加土改工作队，后来留校工作，根本算不上走资派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中也被整得不轻，发配到五七干校，现在也平反了。我的平反通知书更是被罩上神秘的色彩——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乖乖，看不出这小子来头不小，是个人物。平头百姓还以为我是多大官儿呢！想来我那对象就是被这光环晃花了眼。

即便是如此，我俩的结合在当地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已经获释的人员、准备获释的人员、在押人员中自然是欢欣鼓舞，认为我为他们争了口气。可还是有狱政干部愤愤不平：“全国的好男人都死绝了！找谁不好偏要找个劳改释放犯？真是瞎枯了眼，鬼迷了心窍！”看着那些或欣喜或无奈的面孔，我自己也是飘飘然忘乎所以，以为真是什么得胜班师回朝的大英雄，张狂得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有几斤几两了。回头看看，我连个“弼马温”也没捞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四人帮倒了，我不也像个马戏团的小丑在台上折了几个跟头么？一幕滑稽戏收场了，我连几个铜板也没来得及乞讨！

## 二、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风雨同舟路

有位大学老校友田春林，听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广西的不幸遭遇，感叹万千地对我说：“假如当年你没有分配到广西，而是回到武汉，下场或许不至于那么惨。毕竟你的家在武汉，你的亲朋好友会帮衬你的。”会是这样吗？我陷入沉思。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武汉地区可是小有名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十二家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马上分成“香花派”和“毒草派”。二月十八日，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即《二一八声明》。并派部队上街，连续两天全副武装游行，宣传车、直升机满城撒传单。据北京来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的秘书阎常贵，打电话一连四次要求工总、二司、九一三“请罪”。使造反派头头失去了最后的底气。可无论工总、二司、九一三的头头如何诚恳地向部队请罪，三月七日夜，荷枪实弹的军警还是把385名工总头抓进监牢。二司也被迫在省委礼堂召开认罪检讨大会。我看不惯江青和部队这以势压人的作派，一个人独闯大会主席台，抢过话筒，拍案而起。我朗声庄重宣布：“我代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京地质东方红驻汉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二八声明》大香花！《二一八声明》是大毒草！”瞬间，全场都惊呆了，战士们也震蒙了——搞不清我是啥来头，不敢冒然对我采取行动。接着，掌声雷动，欢声雷动，久久不能平息。我大长了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造反派的志气，也从此获得“地质大香花”的绰号。单这一条，武汉的当权派能饶过我？

我作为“地质大香花”和“五湖四海”的领队人（当年北京高校来汉造反串联的大学生被誉为“五湖四海”），常与学生们打交道。我还专程到十四中、水果湖中学、华师一附中参加座谈。记得有个叫李郑生的同学，好像是十四中的高二学生？后来到湖北剧场当跑片员。因为我们住得近又很投缘，我经常给他们讲些过激的政治观点。什么“林彪才是隐藏在党中央里最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林彪一天到晚念政变经。”“江青是个戏子，是个臭娘子。三十年代她在上海那点破事瞒得了谁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太绝对了吧，再发展就一跟头栽到万丈深渊啦！林彪是想把毛主席捧上天再狠狠摔下地呢。”“文化

大革命说穿了就是党内大清洗，是毛林小集团搞的宗派斗争，是林彪上台革命。毛主席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毛主席早就想搞掉周恩来，试了几次知道搞不动。反周不得人心，反周天下必乱！”“林彪捞了个法定接班人和最亲密战友，朱老总得了个红司令的头衔，陈毅落了个好同志，连彭德怀都称作彭大将军，可周总理革命几十年，连红军总指挥权都拱手给了毛，到了连个好同志也换不來。”……这些观点给李郑生等人以极大影响。想不到我与他分别多年后，他因为散发《革命宣言》的传单八百余份，公开抨击林彪江青，质疑“顶峰论”和文革错误，立刻被打成反革命丢进监狱。据说他被铐上双手、钉上脚镣，仍用舌头翻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九七二年一月，他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至今已四十三年。呜呼！四十三年，望中犹记，风雨同舟路！

我连累的人太多了，有些幸存者我不敢在这篇文字中留下他们的名字，怕又给他们惹上是非。连李郑生都难逃厄运，我这个幕后干将能讨得了好？

### 三、尘封的岁月

尘封的岁月，专指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叶向真、朱成昭集团》的那一段时日。这段时日，特别是叶朱集团的这段，涉及到的人员较多，涉及到的事情也相当重大，许多当事人至今对于这些事都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打算让它们一辈子烂在肚子里。所以我至今没有写，我倒不是怕再担上什么罪名，我只是不愿再牵连那些老校友、老难友。他们之中一些人倘健在，还没有老到耳聋眼花、痴痴呆呆的地步，我很不愿意往他们心灵的伤口上撒盐。再者，我的笔一触及这些往事，总有个感觉怪怪的，好像又回到当年在专案组威逼下写交待材料一样，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现在我把它写出来，也不打算发表，留给自己看；我死了以后，让后人知道，在中国，在文革的某一个角落，曾发生过这种事情。人老了，记忆力也不中用了，在这里我不可能也不准备更没能力按照时间顺序写篇什么《东方红大事记》。我只能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想起什么就写出什么。遗漏的、秩序弄颠倒或者是事情搅混了的，回头又想起来那就再补上。“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

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正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脑海里突然又冒出鲁迅先生这两段名言，行将就木的我，思绪竟又是信马由缰了——这怕不是回光返照的症状吧？我得赶紧，不定那天真的写不动了。

### 东方红公社在风雨中诞生

东方红战斗队是东方红公社的前身。东方红战斗队是唯一一个全院跨系、跨年级的学生造反组织。我班的同学大多数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来自贫脊的农村，对党有着很朴素、很实在的阶级感情。他们深知自己来北京上学不容易，一心想好好学习，为党也为亲友争光。所以他们不大敢越雷池一步，更甭说造反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了。尽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高音喇叭里天天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可他们还是尽可能绕开这根高压线。这使我与班上的同学的关系便有了距离。特别是“六·三反扑”和“六二·〇事件”后，仅有我和李泽继、文正国坚持“六二·〇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写成大字报贴到学生食堂墙外最醒目处，有意与另一张“六二·〇事件是少数坏人闹事”的大字报并排。有天晚上，支持工作组的一派同学在校内高举“邹家尤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横幅喊着口号游行。我们和其他几个不同年级的同学跑到宿舍楼顶平台上，用大排笔在整张旧报纸上(一张纸一个黑体大字)一气写下更大的条幅“焦裕禄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邹家尤算老几？！”，粘在连接起来的床单上，从楼顶直贯楼下，以示对抗。我和李泽继、文正国中我跳得最高，态度最坚决，故我在班上更显得孤立。有天，与我同在院美工队的学姐万慧祥(就是后来被人戏称“东方红祖师娘”的那位风风火火的铁娘子)约我一同参加跨系、跨年级的东方红造反队，我一口就答应了，拉上李泽继一起来了。李泽继原是北京一〇一中学的毕业生，革干子弟集结地。李泽继自然无所顾忌。

记得东方红造反队总部最初设在教四楼西侧的楼道里，拾阶而上，每层拐角处还堆积着叠放的课桌和椅子。简陋而寒酸，却充满生机，使人不由会联想到井冈山的茅草屋和延安的窑洞。后来弄开了二楼一间大教室，周转才宽畅许多。“祖师娘”万慧祥不光是我学姐，还是我半个老乡——我来自武汉武昌的闯马场，她来自武汉汉口的汉正街。仗着这双重关系，她老爱支派我干这干那，像指使小勤务兵似的。还记得东方红成立宣言就是万慧祥抄写的，让我站在她右侧后面给她牵着纸。不料中途她不经意地一甩笔，一串墨汁一点不糟践地全洒在我脸上和刚

买的白衬衣上，搞得我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对了，东方红第一面战旗是用黄色纸先剪下字样再小心拼接粘到红旗上去的，后来黄字太易损坏又改用黄布剪样、拼接、用缝纫针缀上去的——这使人更易联想到红岩中江姐领着女难友绣红旗的场景，透着超级的神圣。还有，“祖师娘”还指派我在大黑板上画一张图案作为总部的衬托，我灵机一动，干脆用鲜红色纸做底，图案全部是白色剪纸——波涛汹涌的海浪烘托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光芒四射，图案左上角是三个遒劲毛体“东方红”大字。我工作时好几位师姐像万慧祥、王北宁、刘梅等过来帮忙剪纸粘贴。似乎许多留影包括中央文革的观察员来视察都留有这庄严、大气、磅礴的背影。我和李泽继都在成立宣言上签名。还有一点特征很是与众不同，东方红标志是一块长方形的臂章，形状与大小都极类似当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所佩戴的臂章，红底黄字，与全国千篇一律的红袖章比较起来确实新颖别致不拘一格。(在那里我们真正结识了朱成昭、蒋良朴、王大宾、柳长风等头头。朱成昭、蒋良朴见李泽谜长得像电影《东进序曲》中反派人物“刘大麻子”，就给他起了绰号“刘大麻子”。朱成昭还怀疑他的名字写错了，应当是李继泽——继承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李泽继？反了，反了，反了天了！)

### 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

东方红公社确有几位铁笔杆子，我印象深的有孟繁华、黄平稳、黄瑞华……他们写出的大批判文章经广播站那几位铁嘴播音员严宽、刘万恩、刘梅等等的铿锵有力、声如宏钟播出，确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头牌播音员的风范。每当东方红大批判文章播放时，相当多的师生都自动搬把椅子坐在广播喇叭下静静的听，如同听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那般虔诚。记得有篇《历史无情地批判着旧事物，历史无情嘲笑着守旧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篇好象是蔡新平写的？听朱成昭私下赞叹不已，所以不大会弄错。许多到地院来串连的人都有这么一种共同感觉：“你们东方红公社的人都是嚼腮帮子的，嘴皮子特溜，谁能辩论过你们呀！”

### 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战斗”这个词是需要打引号的。所谓的战斗无非是当时的破“四旧”、斗“黑帮”、批“走资派”、打派仗……在今天看来，纯粹是瞎胡闹，没有半点革命意义可言。

在我的印象里，地质东方红公社在当时是全北京高校中特别能战斗、战斗力也特别强的队伍，众所周知且都公认的。作为地质东方红中的一员为此特得意、特自豪。当时在东方红内流传一句话就是：“三天不打仗就造总部的反！”每个战士主动进攻意识和战斗力都很强。因此，地质东方红的战果也特别辉煌。例如：率先驱赶工作组、率先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并且全面夺取了地院领导权、炮轰地质部(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地质部静坐请愿，并且一次就是持续好几天，短期内接连搞了四次)、大张旗鼓地声援清华井岗山蒯大富(那时老蒯正在受压制)、首先挑大梁竖起了《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大旗(即首都三司)、成立《首都斗争彭、陆、罗、杨大会联络站》(我就是代表地质东方红出任该联络站的代表)、进驻北京市委市政府、在中南海外成立声势浩大的万人揪刘火线、揪原中宣部秘书长熊复、揪彭德怀……地质东方红都惰落成中央文革打人的棒子和御林军了！当时知情的人都这么说。

**记得有这么几件有趣的事：**

好像是在批斗邹家尤时，查出了他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当了叛徒。这一下激怒了在场的红卫兵：“说！你都向国民党反动派出售了多少党的同志、党的机密？”邹一哆嗦，急忙自我辩解：“我不知道的我都没说”。哦？换句话说就是把知道的全招啦。竹筒倒豆子。瞧，这个叛徒在敌人面前都老实到什么程度。

东方红公社在学院全面夺权以后，我对李泽继提议：“咱们学院的校名是不是也应该改改？”李泽继立刻响应。两人一合计，说干就干。跑到校北门口和东门口，用大红纸把《北京地质学院》的大牌子全部给糊上，再用大排笔刷刷刷，改名为《东方红野战军校》。两个人好不得意，好景不长，几个钟头我俩拐回去一看，全部被人给撕了。咦？这不是个好兆头。东方红公社，八成是一个短命的。哪，北京公社呢？

有一天夜里，我和北航的高建坤、师大的段孔莹带首都大专院校斗争彭、陆、罗、杨联络站的红卫兵去抄原北京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的家。我很惊异，居然受到他全家人的热烈欢迎。至少我看出来他的子女是很真诚的，搞得我反倒很狼狈，手足无措。幸好贾星五因病住进三〇三医院，急忙草草收兵。他的两个读中学女儿还追到门外，向我索取斗争彭陆罗杨大会的门票。我匆匆应允了两句忙跳上车

跑了。唉！黑帮家属在造反派面前竟然这般坦荡气壮，作为红卫兵的我，倒是显得那么卑萎心虚。这世道真是全颠倒了！

有一次，我奉命看守押在物探楼地下室的毛远跃，据说他竟敢冒充毛主席的亲人四处招摇撞骗。当时我见到他应该有四十多岁，白净微胖，长得确实有几分像毛泽东。他坐在席地打的地铺上，很健谈。他说他真的是毛主席的亲侄子，中央文革不准他进中南海找毛主席认亲，还让首都三司红卫兵把他秘密抓起来押在这里，对毛主席封锁消息，这是严重的政治迫害……我听得聚精会神，相信他没说假话，并急忙向总部报告。结果到底怎样？不清楚，我很快就被换人了。二〇〇二年，我意外地发现，毛远跃真的是毛主席的亲侄子，我在武汉大学又见到他正担任《珞珈诗苑》顾问。细想想：我就不信毛主席他有个亲侄子进京寻亲他不知道，谅中央文革敢封锁毛主席的消息。敢情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太伟大了，把一切连同自己的亲人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壮哉！

地质东方红到四川揪回彭德怀，我没参加。后来听胡乐成(绰号狐狸，他可是带队亲自去抓的)告诉我，是中央文革亲自派的活，先是地质东方红王大来带的队，没办成。后来狐狸亲自带人到四川后，硬是从北航红旗手中把彭老总夺了过来。在押回北京的列车上，原先是抓彭总的小将们，被彭总的人格魅力彻底征服了。元帅给他们讲了一路庐山会议的真实情况，把小将们听得如痴如醉。到了北京，就把彭总秘密藏在地院朱成昭住的屋子里。事实完全不像现在媒体报道的彭总受到了地质东方红歹徒的无尽的摧残和折磨。呜呼！彭总的刚正不阿，使他光辉形象可以照耀几个世纪乃至永垂不朽！可怜的地质东方红，作为反面的陪衬，则被钉上了历史耻辱柱，永世不得翻身！到哪说理去？历史给人开了个多么荒唐的玩笑！

### 朱成昭奉中央文革之命闭门思过

六六年八月八日东方红公社成立，朱成昭是一把手。而后便是蒋良朴、王大宾、杨雨忠、田春林、梅建明、伏庆是、张华府等核心组成员。九月六日首都三司成立，朱成昭依旧是一把手。到了六七年二月初，朱成昭突然间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中央文革勒令其闭门思过。个中缘由，我不是核心人物，难述其详。现引用几则资料，可窥一斑。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学。1962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了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了“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狱，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某“帅府千斤”凌子小姐（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隐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了令中央和群众大吃一惊的“绑架”事件。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远郊县某地藏了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某老帅的“千斤”凌子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

据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朱成昭派了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第一批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于12月15日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并同彭德怀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长谈，结果被彭德怀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随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达成都，见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这时，据说朱成昭对彭德怀也比较同情，并把学生们在四川同彭德怀的一份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结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这时，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12月27日，彭德怀被拉到了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据朱成昭当年回忆说，他当时虽然已经同情彭德怀，但并没有同彭德怀“彻夜长谈”，更没有“秘密预审”，他甚至没有和彭德怀说一句话。期间，他只是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德怀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这对朱成昭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1967年2月16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亲见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迟迟不见她父亲回家。之后，这次会见被取消，原因是这天晚上发生了几个老帅同中央文革“刺刀见红”的“京西宾馆”事件，凌子小姐的父亲当场拍断了掌骨，没有回家，朱成昭与他失之交臂。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凌子小姐的父亲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这些对朱成昭的思想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成昭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了当时“联动”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19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放毒”，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了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凌子小姐南下广州玩（又一说去香港），被诬为“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周恩来总理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凌子小姐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凌子小姐因为明显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批准释放，安排到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后当了军医。凌子小姐既是帅府“千斤”，又是才女。文革后，她重操旧业，进入演艺圈，更名“凌子”，执导过电影《原野》，当时颇受好评。

凌子小姐和朱成昭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早已经画上了句号。1972年，凌子小姐被释放后对朱成昭的朋友们说，周总理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据朱成昭的朋友们核实，周总理并没有说过此话。而朱成昭在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凌子小姐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一位帅

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经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恋情，最后因为文革和人为的缘故以悲剧告终，令人感慨不已。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导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传奇经历搬上银幕，那将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绝对有轰动的票房效应。

1980年6月，有关方面给朱成昭平了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等人反对未成。后来，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经商，因多种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溘然辞世，时年57岁。

### 朱成昭决心与中央文革决裂

朱成昭奉命闭门思过之后，东方红公社核心组分裂，留在朱成昭身边的只有蒋良朴、梅建明、伏庆是、张华府。再就是严宽、胡乐成、郑文卿、滑正本、程广治、陈希平、张华清、王北宁，还有我带领的几个地质附中学生岳亿、王白莎、石白河、高威、迟景宏等。人称我们是朱成昭的死党，“啃猪蹄的”。我们这伙人很为“老猪头”打抱不平。当时听到陈伯达条子上说：“听说你们一定要和中央文革干到底？奉劝你们一定不要这样做。不要掉到茅坑里去，不要成为茅坑里的石头。否则，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反中央文革有什么了不起？偏要反！大不了再当一次反革命。朱成昭怀疑是王大宾出卖了他，说王大宾听说要炮轰中央文革，哭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下决心与朱一刀两段，跑到中央文革那里揭发检举了这个大阴谋。中央文革对朱成昭断然采取了严厉措施。

关于“朱成昭的八大观点”，实际上远比他在大会上检讨要严重的多。在朱“闭门思过”的日子里，我们一伙成天泡在一起骂娘，于是便骂出了本意。一：大串连搞乱了全国，学生娃免费乘车坐船，游山逛水，造成运输大动脉的拥堵，干扰了全国各地的生产规划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严重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再来几个五年计划也恢复不了元气。二：整风军训实无必要。眼下整风军训，势必破坏于扰各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三：中央文革不是在搞群众运动而是在运动群众。东方红公社，已经成为了中央文革的御林军、救火队，叫打那打那，叫抓谁抓谁。四：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滥施淫威。谢富治搞了个“公安六条”，居然宣布谁反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

它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北京的“联动”，都是清一色的中学生，干部子弟，就是反了关锋、王力、戚本禹一伙，就被抓了一大批。红卫兵只好六冲公安部。连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五：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老干部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有疲劳，不能拿人家五十天的错误否定人家五十年。六：中央文革大左。中央文革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宗派斗争，搞成了党内大清洗。斯大林当年大清洗搞掉了百分之七十中央委员，文革大清洗把中央委员百分之九十以上全搞掉了。七：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显示出中央文革急不可待要抢班夺权。中央文革有人竭力鼓吹中国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国务院及军委就是旧政府的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新文革，毛林给他们撑腰，是“毛林小集团”。八：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国务院和军委三老四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元帅、叶帅、徐帅、聂帅，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恨之入骨，已经大闹了怀仁堂碰头会。谭震林当场宣布三条：不该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现在不跟了；不该加入共产党，现在不入了；不该活到六十八岁，现在不活了。叶帅在会上拍案怒斥中央文革，手指都拍断了！

回顾我加入地质东方红公社和追随朱成昭的一段历史，有几分真诚，几分狂热，几分荒唐，几分坎坷，几分潦倒，几分荣幸。朱成昭受压时，我投奔了他。朱成昭春风得意时，我沾不上光，够不着边，只被王大宾打发到附中当联络员，领着王白莎、石白河、岳忆、高威、迟景宏、杨钺、吴佩雅、郑晓丹、陈林、何其涛、谢小鱼、管文筭、曹爱武(曹凤琴)、彭克美、孟美琪、程桂芳、李子倫，还有外校的李青纳，石莹、李誓红等一帮中学生到旧北京市委、原育才中学、旧中宣部、上海联络站去打砸抢抄破四旧，大闹了一通。即便是斗彭陆罗杨，我也只是挂个名，打个锣敲个边鼓，揪斗彭真，朱成昭便亲自出手，没我什么事。这样也好，后来又少了个迫害老干部的罪名。朱成昭打了瓦，闭门思过，众叛亲离，我又死心踏地追随他，为他殉葬。这不是犯贱作死么？所以我落到这般田地，也是活该。我似乎是承袭了东方红的某种精神，反而比朱成昭走得更远。闹得风声水响，地震山摇。

#### 四、怀念几位东方红公社的老难友和老校友

在这里我想追忆几位东方红公社的老难友、老校友。

### “婉约词人”黄瑞华

黄瑞华是湖南人，性格内向，由于我俩都比较喜爱文学，所以交情甚笃。黄瑞华喜欢填词，感情细腻缠绵，当属婉约派。他也有少量作品有豪放派的风格。例如东方红公社一轰地质部，上千师生到地质部静坐示威时，黄瑞华激情难抑，口占一组绝句。其中第一首是这样的：

日月星辰随意改，黄河万顷石门开。  
此身合是忘家客，曾自枪林闯阵来。

我曾问他石门在何处？他回答说，他湖南家乡有个地方叫石门，不过这里的石门是虚指。

朱成昭“闭门思过”，黄瑞华对陈伯达批来的条子措词之严厉甚为不解，认为把东方红一棍子打死了。黄瑞华忧愤写道：

无知幼稚何须计，几寸真诚几寸心。  
倘使惺惺能识吾，人间正道是常情。

后来院军代表又把他收进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他的情绪更加悲观低沉。有一次，那个来自空军的长得像吴法宪似的军代表训斥田春林：“反北京市革委会的丁国钰，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田春林争辩说是“小将犯错误”。军代表要大家开会批判，黄瑞华执意不发言。他写《忆江南·西山碧云寺》：

苍松老，花草正匆匆。几代纷荣豪杰气，如今剩却玉堂空。点点笑英雄。

他又写《观香山红叶》：

远看香山红遍遍，近观满树血淋淋。  
抒情何在寒风起，万里红涛是我心。

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临解散时，黄瑞华对未来前途空前绝望，尤其是杨雨忠的跳楼，对他触动很大。他写《水调歌头·读红楼梦》：

月满琼窗下，风洒竹丛间。红炉冉冉熏药，秋水玉台前。银汉迢迢何意，南国家乡万里，无语动心弦。起伏万千绪，只是一情绵。    薄命子，空周折，却无缘。芳魂涕血，灵水难系百花仙。真假那堪寻觅，漫把长歌当泣，渺渺水连天。恩怨既相投，何要命相连？

他这首词有所指。他身体不好，常用电炉熬药，这便是“红炉冉冉熏药”。他要跟女朋友掰了，不想连累人家，所以有“望断秋水，芳魂涕血，何要命相连”。他叹息东方红公社的命运，犹如“薄命子，空周折，却无缘”。从这首词，我深感他动了诀别人世的念头。他果然短命。今天，我唯有用他的词句来缅怀祭奠他：“小铃闲会阁船头，为我奏、竹萱新句。”

### 并不“滑头”的滑正本

我们都叫他“滑头”，其实他做人一点也不滑头。

“滑头”是河南人，我的老家在河南，应该说我俩是老乡。朱成昭落难后，我们这帮“啃猪蹄儿”的日子也不好过，“滑头”还跟着我到武汉，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和我大哥、四弟都很谈得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彬彬有礼，且有透骨的政治敏锐。

记得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由刘春华所作的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经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印刷量高达9亿张之多。这张油画很受中央文革重视与推崇，用来作为打击刘少奇的重要利器。因为当时连小学语文课文都曾记载过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是刘少奇去领导发动的。

“滑头”偏偏从油画中发现存在重大政治问题：这张画的背景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左上角透出一束阳光蓝天，毛主席身后则是层峦叠嶂的苍茫关山。这不是暗合毛主席诗词名句“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寓意吗？再看主体画面，是年轻的毛泽东身着长衫，手里还夹着把红色油纸雨伞——这不是向观众明显暗示毛主席是“雨后送伞”，想掠他人之功吗？作者为了更加突出这一主题，还在画面上年轻的毛泽东脚下点缀几片红叶——谁都知道，红叶象征着革命先烈——毛主席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和遗体，到安源“摘桃子”来了。这真是反动透顶！

我们反复端详那张油画，越看越觉得确实有问题，不由一声惊呼，立马准备站出来揭发这个居心叵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滑头”摇摇头，笑我太幼稚了。说人家刘春华正当红，红得发紫，炙手可热。中央文革需要用他这根金棍子打人。你跳出来横插一杠子，岂不是扫了中央文革的兴？连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

明摆着的大叛徒，毛主席都视而不见，何况一个小小的刘春华？利用就是政治，如同中央文革利用地质东方红一样。以后用不上了，自然一脚踢开。

还有一次，军代表办朱成昭集团骨干分子学习班，临解散时我对“滑头”说，中央文革至今没怎么动我们，是不是手下留情，准备放咱们一马？“滑头”凄然一笑说：“想得倒美！《十六条》中虽说是凡是学生问题，一律不整。这是话里有话。现在不整不等于说将来不整；学生不整——等将来你不是学生的时候再整。还怕你个孙猴子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不成！什么时候你不是学生？把你往底下地质队一分你不就变成工人了？到时候怕整不死你！反正你的问题往档案袋子里一装，那就让你背一辈子，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压死你！”

“滑头”就是这样不堪重压，逃回河南也逃不过重重打击迫害，他终于选择了杨雨忠的道路：跳楼！他从此获得了精神枷锁的解脱。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滑头”，我好留恋我们一起躲在宿舍里，用脸盆架在电炉上清水煮鱼的美好时光！那一顿最后的晚餐，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干杯，“滑头”大哥！

### 郑文卿与胡乐成

郑文卿与胡乐成这两位老兄，在我印象里好像是形影不离，“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郑文卿的绰号叫什么？记不起来了。胡乐成的绰号叫“狐狸”。这个“狐狸”并不狡猾。他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虽说是长得一脸横肉、满身匪气，却也并不可怕，倒是有几分可爱可敬。比较起“狐狸”来，郑文卿要斯文多了。他是南方人（好像是福建的？），个不高，一脸络腮胡子，老显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他俩在地质东方红里以特别能打仗着称，胡乐成曾经当过作战部长和到四川揪彭德怀的钦差大臣。

我与这两位老兄结成患难之交，真有一番患难与共的经历。记得东方红造反队成立不久，我只身高举一张“工作队是三类队”的大字报驱赶工作队，与学院对立面“斗批改”一方发生激烈冲突，立刻陷入重围，双方都有肢体接触。此时，胡乐成与郑文卿杀了进来，像拎小鸡一样，一边一个，架着我冲出重围，躲进了东方红司令部大楼。“狐狸”冲着我直嚷：“你小子不要命了！”

朱成昭“闭门思过”后，我与二位兄长自然而然抱成一团，成了“啃猪蹄儿”的死党。

如今，郑文卿下落不明，“狐狸”自1970年被扣押留校继续接受审查时就被逼疯了。一疯就是四十余年。他也是因祸得福，没有受到更深的迫害。好在今天

的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的领导人校长张锦高、书记李玉和很讲老同学的交情，把“狐狸”包养了下来。

好想去看望“狐狸”大哥，一直没有勇气——怕我们难兄难弟的感情上都承受不了！

（编者注：该文第四部分发表在2016年7月30日《昨天》第73期）

编者按：

何建勋： 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

# 我的 1978 年

陶世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就在北京地质学院被工作队当作“三家村”黑店的伙计打入另册，工作队没达到目的就撤走了，最后由 1968 年进驻学校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成：虽然我和黑店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他们认为我的思想是相通的，都是反对三面红旗和伟大领袖。他们没有别的证据，证据就是我写科普文章，居然说太阳上也有黑子，是影射攻击。虽然荒唐，但谁有异议，也就有对伟大领袖不忠之嫌，即使对我同情，有意维护，也只能心照不宣，直到 1978 年，才从根本上被推翻。

—

1966 年 6 月 20 日，北京地质学院约有两千人游行，并到工作队的驻地请愿，我也参加了。导火线是 6 月 16 日他们突然将院长高元贵停职，而这位院长作风民主，尊重知识，特别关心教学，深得人心，停职的处分使矛盾激化而爆发了。在得到上级将反工作队定性为反党，是旧北京市委的残渣余孽在兴风作浪的指示后。他们将十三名干部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是教务科科长，他们怀疑我起了策动群众特别是教师反工作队的作用。我成为院机关教务和科研部门批斗的重点，但 6 月 20 日那天，本是一次自发的行动，我也不过是和其他参加者一样，出于义愤，跟着走了一圈。所以尽管他们多次动员揭发和逼问参加者，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搞阴谋的证据；动员积极分子出我的大字报，仍不过提出点鸡毛蒜皮的问题，而且寥寥可数。此时院党委中有位常委出来牵头，写了份大字报：《陶世龙——三家村在地院的黑伙计》，主要根据有三点：

- 1、陶世龙是宋硕派到地质学院来的。
- 2、是吴晗的座上客，配合三家村的进攻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 3、经院长高元贵私自批准，去大连参加了于光远召开的黑会。

三件事都有，但都是按当时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的程序公开进行的。

- 1、我于 1952 年 9 月从团市委大学部调出参与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这

个学校工作。当时北京市高校党的工作归市委组织部学校支部工作科（简称学文科）管，宋硕是科长，而团市委是北京市委的组成部分，在工作上我们常得到学文科的指导，有些单项任务还是在宋硕直接领导下进行。我去地质学院宋硕知道，应该也是他同意的，但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是宋硕个人的行为。而且后来由于我转为做教学管理工作，久已与他没有联系。

2、吴晗确实具帖请我去吃过饭，而且是两次，都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但实际是北京出版社请客，他们为了编一套科普读物《自然科学小丛书》，找北京市科协帮助，由吴晗出面邀科学家来商量。第一次十来个人，第二次人多些，坐了三桌。除了我，被邀请者都是著名的科学家，茅以升、严济慈等。我是被认为有科普创作经验而忝列其中的。吴晗是以北京市管文教的副市长身份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续纲和北京出版社社长周游也到场讲了话，但会上谈的全是 如何编科普图书的事，并未涉及政治。

3、1965 年夏天我是去大连开过一个多月的会，确实是于光远出面召集，但他讲完话开了场就走了，实际主持是查汝强先生。具体任务是为编写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拟出提纲，参加者约三十多人，按学科分组进行。被邀请的也主要是著名的科学家，戴文赛、张文佑、贝时璋、吴汝康等，不过年轻人除了我还有几位，每组都有。我是地球史的主编张文佑先生点名要我去，而由于这次会时间长，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派人持公函到学校找到院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对我发的邀请信。根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黑会。

我发表的文章，的确不少，但绝大部分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还有些关于教育与青年问题的文章，则是结合我的工作写出，发在党报团刊或教育部的刊物上，而且这类文章与科普文章不同，一般还经过有关领导审查才能发出。

为表示我是光明磊落的，我将手头剪贴收存的文章几百篇全交给了工作队。教务部门的文革小组将我发表的文章目录抄成大字报贴出，用了十多张大字报纸，贴满了一 扇席棚。这些文章以在人民日报刊出的最多，发在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的也不少。羊城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天津晚报、新观察等报 刊。北京晚报加上北京日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写的文章，除了有关本职工作的使用本名外，科普文章大部是用笔名，有十多个。现在都公

开出来，学院中知道我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想到有那么多。

为了表明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三反”问题，我还把一些文章被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评为好文章而得到红旗奖状交给工作组。

工作队本拟开大会批斗包括我在内的十三名干部，并将这些人送去农场劳改，但突然刹车并悄悄地撤走了。别的被整的干部恢复了自由，参加了群众组织，我则不能，因为我毕竟是和宋硕、吴晗、于光远有过交往，也本是北京市委管辖的团市委机关干部。更因为当时搞派性，抓住对方成员的辫子大做文章是惯常的手段，别人怕沾上边，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工作队撤走后，我对新当权者的一些作为也不赞成，因此反反复复又多次挨整，其间也有个取名“揭竿而起”的战斗队要批我的文章，但经过我和他们辩论，没有搞下去。这些学生终究是学习地质的，我那些文章大多是写地质的小品，也许有的人还有点欣赏，下不了手，而且在他们看来，给我加上“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罪名，打倒我已足够了，不必再花气力去批这些文章。

1968年8月，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校夺了权，原来整我的人纷纷受到审查。按说我的情况应该好转，但是更糟了。因为这些自称最忠于毛泽东主席人，继承了工作队的未竟之业，不过这回他们没有提出我和宋硕及“三家村”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而是认定我那些科普文章是在影射攻击，在思想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他们说地院革委会那些人整我是出于派性，对毛主席并不忠，放过了要害，现在“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罪名可以取消，但该算这笔账了。

1968年10月，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突然宣布我的罪行，将本已在牛棚关了半年多的我，当场抓进用地院医务室病房改成的牢房。那次会上大概抓了十多个人，包括据称有恶毒攻击言论的老右派集团成员和新生的反革命，是又一次清理地院阶级队伍的开端。

监管人员将关进去的人编了号，学习1969年元旦社论时，曾将我和另外三个被囚禁者编在一组学习，彼此不许用姓名来称呼，只能称为某号，我们成了一个一个数字，不是人了，所以这回留下的记忆特别深刻。同在这一组的地院附中教师张海涛先生，后因被怀疑为516分子，1970年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关了七年。他说，卫戍区的生活比关在地院医务室的时候好多了，他最不堪的是这病房改装

的牢房门上留有一小窗口，睡觉不许关灯，不管白天晚上，隔一阵就有一只眼睛出现在那里盯着你。我感到最不可耐的是限量供应食物，仅能作到吃不饱也饿不死，远不如学生关押我时，是和他们吃一样的饭食。

这回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没进来，说明我的规格又提高了，摆在“恶攻”一类。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专案组的一位年轻的军官周旋了两三个月。进驻地院的工军宣队，实际掌权的是军人，他们是从空军学院来的，有一定文化。我的对手还可能是个文学爱好者，更象个知识分子不像军人，现在成为我的忠实读者，他的工作是看了我的文章后，将他认为有影射攻击之处提出来要我承认。譬如我于1959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出的《珊瑚岛》中，有一段：“珊瑚虫的‘公寓’是固定在海底上的，因而珊瑚虫不能随便移动，只能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伸出几根触须来等待自投罗网的食物。这‘守株待兔’的猎食方法，你也许觉得太笨，担心它会挨饿吧！但是不必过虑，因为它们是‘有饭大家吃’”。被认为是在攻击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但我接着说了“在一个珊瑚虫集体中，所有珊瑚虫都被一根管子连结起来，任何一个珊瑚虫捕获了食物消化后，马上通过这根管子与大家同享食物的养料。一个珊瑚虫捕获食物的机会少，成千上万个珊瑚虫的合作保证了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都能生存繁衍下去。”，便又可解释为在赞颂集体主义。通篇看来不仅没有对珊瑚虫不敬之词，而且还有赞叹之意。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寄寓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我对珊瑚虫在那不时受到风浪袭击的条件下，孜孜不息地生长，最后以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体，构建了矗立在大洋中的礁石，十分的感动。我常想，个人是渺小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但人如能象珊瑚虫那样为整个人类的大厦积累那么一点点，也足以告慰自己的一生。这能成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吗？（这篇文章在文革后被北京市科普创作协会选入他们编的《智慧的花朵》）

还有在《名山不在高》在这篇文章中，我引陶渊明赞美青松的诗句：“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用来说明名山之有名，不在高，而在它是奇峰突起。是想增加点文学的情趣，接着用地质学的知识说明，这是因为构成名山的岩石大都很坚固，如花岗岩；而名山周围一带的岩石则容易风化所致。本以为无可指责，殊不知这篇短文竟被看出是为给彭德怀打气之作。花岗岩是伟大领袖比喻顽固不

化的脑袋时使用的，我却有赞美之意，而且 1958 年 9 月 4 日我在人民日报发出的《花岗岩为什么“顽固”》，更是在大讲花岗岩如何有用，还说什么北京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就是一整块花岗岩，而我举出的名山中有庐山，这不是给顽固分子打气是什么。

而《名山不在高》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间是 1959 年 8 月 2 日，这天恰好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上开幕的日子，这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真是无巧不成书！但是我要真是如此与彭老总呼应，必须对庐山开会的情况能及时知晓。我提出，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在批彭德怀。并反问，当时你知道吗。他们无言以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这篇文章也就难以作为为罪证。

开头我还极力辩白，攻防多次。但后来感到实在不可以理喻，到他们抓住几篇涉及太阳黑子的文章，将文中的太阳等同于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导人来解读，硬是说我的文章在反对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了伟大领袖，难以辩白。当时许多歌曲就是把领袖当太阳来歌颂的。

1961 年 8 月 26 日我发表在《工人日报》的《太阳带来的灾害》，按他们的说法，就凭这个标题便可以定罪。

我太阳黑子始于 1959 年写了篇科学小品《地球的冷暖》，发表在 7 月 1 日出版的《新观察》上，说的是在地球历史上，曾比今天冷，也曾比今天更暖。炎凉变易，不止一次。一年中有春夏秋冬，从整个地球史看，也有它的“冬天”和“夏天”。而现今正处在它最近经历过的冬天“第四纪冰期”之后，其发展趋势是变暖。对于为什么有这种变化，我打了个比方，当你烤火时，火炉愈旺你也觉得愈暖和；地面上的热基本上是太阳辐射来的，当太阳辐射能力加强的时候，地球就会变暖。还有其他的原因，如火山爆发，喷出大量碎屑物长期悬浮空中；人类的燃烧，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造山运动形成高山峻岭的影响等等。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太阳的影响。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对比了太阳黑子与地球上火山爆发的关系，发现太阳上黑子增多的年份也是火山活动强烈的年份；而黑子增多是 太阳活动加强的表现，它将影响到地球的大气是必然的，只是此时我所知尚少，没有展开。

随后我读了一些书，主要是如紫金山天文台陈彪研究太阳活动和南京大学杨

幼章介绍日地关系的著作；查了一些资料，包括当时影印国外出版的几百年来太阳黑子活动的记录。而 1959 年又正是太阳活动的高峰年，7 月 10 日和 14 日紫金山天文台两次观测到黑子群中出现了耀斑。而在进入 1960 年后，太阳表面中心出现了一大群黑子，面积和三十八个地球相当，4 月 1 日在 黑子中又两次出现了耀斑。此时我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气候可能继续反常。因为许多例子表明，每当太阳上黑子很多或是出现耀斑的时候（耀斑常在黑子多处出现），地球上气候总要发生点不平常的变化。5 月 1 日出版的《新观察》，发表了我写的《太阳上的风波》，试图将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做一点通俗的介绍。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地球的冷暖》发表后许多读者感到兴趣，也受到从老《观察》过来的《新观察》编务的主持者林元同志的注意，他要我继续写下去。那时我还年轻，胆子大，正好有这些材料，我就写了。由于要使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从标题开始，我使用了拟人化的语言，不称为活动，而称为风波；并说：“太阳上发生了风波，怎能不波及地球，但是在我们的脑子中往往把太阳当作不变的‘长明灯’，似乎天天都发出同样多的光和热，因而虽然气候有了大的变化，还是容易忽略太阳的影响，只从地球本身找原因，这当然得不到圆满的答案，因为太阳上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来没有停止过运动。”当时我和编辑都觉的这样表示比较生动而又不失科学的原意。谁想到这时都成了罪证。

1959 年人民日报八版上发出的一则小常识《太阳上的黑斑》，更成了确定无疑的重要罪证，不足三百字，全文照录如下：

人们常常喜欢用‘太阳上的黑斑’来形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确，这个比喻是最恰当不过了。和太阳比较起来，黑斑是微乎其微的，最多不过占太阳总面积的千分之几，这些黑斑并非真正的黑，仅仅因为温度比周围略低，所以显得有些暗，实际上这里达到温度仍有四千五百度左右。

黑斑的出现表明太阳具有高度的活动性。在太阳中进行的强烈热核反应，是太阳巨大的光和热的来源，不可能设想在如此宏伟的剧烈变化的过程中，运动的发展竟会是完全平衡的，因此，在太阳上发生了“风暴”，使火热的气体卷起了漩涡，漩涡中的温度较低，正是我们看见的黑斑。黑斑是太阳活动的产物，不可能长久存在，通常寿命不到一天。（今明）

“今明”是我的一个笔名，不常用，如果我不主动交出，工作队是想不到，查

不出的。

虽然即使从这些文字所作比喻来看，也没有反三面红旗的意思。当时的领导人常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缺点只相当一个指头，而我说的是千分之几，比一个指头还小得多。要按今天的认识，这是在强调天灾为人祸开脱呢。但他们有权，既已认定，我不承认就过不了关。而且即使我不承认，他们用这些文字来定罪也是做得出来的，因为不仅有邓拓的案例在先，还有陶铸《太阳的光辉》在后。陶铸在这篇 1959 年 5 月写的文章中，也有“我看用太阳的光辉来比喻我们党所领导着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之语，并用“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来比喻，和我的意思一样。

那时我关起来已久，我的妻子在清华大学，是康生点名的要犯，关的更久，我估计短期内出不来。家中两个女儿才十二、三岁，这时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每人每月仅得 12 元 5 角生活费。而拉锯战到最后，对方的底牌已能摸到，只要我承认下来，马上就能放出去，工资就能恢复。于是我认输了。

但这一来得深挖思想来说明，一想，1959 年夏天，北京地质学院师生接受了一批生产任务，我奉命到燕山地区去检查师生所做的地质填图工作，亲历了农村中此时已出现的艰难生活，得上痢疾和肝炎；也看到把含铁多一点的砂岩当铁矿石来开采，一些小高炉只能废弃在那里的现象。我的这些事情是有看法，这时便拿来交代，他们满意了。

最后他们对我作出的结论是：借写太阳黑子攻击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了伟大领袖。说是“进而”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别的证据，只能按文章来作结论。处理意见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暂不戴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

在当时，戴什么帽子，我已感到无所谓，放我回家和将工资恢复到 80 多元，算是得了点实惠。接着又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帽子在群众手中了；最后再降为“拉入人民内部矛盾”，工资也恢复原状。据说这是 8341 部队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创造的经验：有的人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他们说是拉了我一把。这都是在一个多月内完成的，在外人看来够宽大了。但我清楚，“拉入人民”就表示从此不能等同于人民，犹如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所以随着处理完毕即派我为建干校的先遣队去江西时，我把多年来购置的几千册图书，

几乎是全部，都卖给收破烂的了。还有些剪报和卡片资料卖不起钱，便弃置在那里。我当时确实是认为不可能再从事科普创作也不想再写什么文章了。

北京地质学院的干校在江西省峡江县仁和的龙陂，山清水秀，而且没有血吸虫。我本来自山沟，真的想过，如能在这里了此一生也不错。多亏我的妻子尽管处境比我更坏，却比我有远见，替我保全下来，她把那些资料带到鲤鱼洲，清华大学的农场，带去又带回。

太阳上有黑子，在欧洲是伽利略首先于 1609—1610 年间观察到的，也是宗教法庭处罚他的一项罪名，不过不是说伽利略在影射什么，而是按照他们的教义，“一切天体都是无垢的”，所以太阳不能有黑子，历史似乎在重演。但即使在这场人类创造的文明精华几乎全被冻结的浩劫中，也无法压抑人们对知识的追求。1968 年春天，地院革委会将我单独关押，看守我的学生对我并不苛刻，还向我借《十万个为什么》去阅读，因为这部书早已售缺，此时更不好找，而从大字报公布出来我所发表的文章目录可以得知，我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因而想到我一定会有。

1972 年，北京地质学院迁到湖北江宁改名湖北地质学院，我们干校也迁到湖北沙洋，工军宣队都换了人。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权威已动摇，我的处境也有改善，到食堂去当了采购。这年秋天，高元贵院长的秘书，因不肯承认自己是 516 分子而被挂在那里，此时叫他从江宁到干校参加秋收劳动，趁没人时悄悄告诉我，听说上海来了一封信，要重新出版我的书。我得知后就去江宁拿到这封信，已经来了两三个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出版办公室给学校的，说是我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火山和地震》和《地球的画像》，经过工农兵审查，认为可以重新出版，但需要按现在的出版要求修订。我马上去武汉找到已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原副院长周守成，申请回北京去搜集材料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当即批准，而我也就在 1972 年 11 月离开干校。(不久干校撤消了，其他人在以后几个月中也全部离开。)

在北京忙了几个月，将《火山和地震》加了些新材料和穿靴戴帽的语录交出去，接着修订《地球的画像》，因这本书涉及的方面多，需要更多的时间。此时原地质部已缩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下的一个局，原地质出版社变为这个局的书刊编辑室，正好赶上邓小平复出抓整顿，出版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冶金部门出了一

批科普书，大受欢迎，地质书刊编辑室也想编一套。地质出版社原社长现为编辑部主任的边知非同志，还有基础编辑室主任李鄂荣同志，约我去参加。他们当然清楚我在地质学院的遭遇，但不相信有什么影射攻击的问题，对我优礼有加，编辑部的同仁也无人对我见外。那时北京地质学院已不存在，我在迁到江宁的地质学院中也没有岗位，是他们收容了我，一直到 1975 年秋，因上级决定学校再迁武汉，我又被派为先遣队，到武汉去做准备工作，这才离开书刊编辑室。但次年唐山大地震，群众迫切需要地震知识。头年我参加编写的《地震问答》，创记录地发行了一百几十万册。书刊编辑室计划组织几位编著者到唐山考察，然后增订出版。地质总局的核心组同意他们的方案，给武汉地质学院去电要求执行。这样我在 1976 年 9 月又回到北京，继续在地质书刊编辑室客串，一直到 1978 年末。

《火山和地震》于 1974 年 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印了 25 万册，而且很快卖光。《地球的画像》交稿后，估计是因为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又紧张起来，没有及时印出，四人帮垮台后，我又再次修订，1979 年 3 月出版，随即重印，两次共印 60 多万册。那时科普图书品种很少，印出来就多能畅销。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筹办科普刊物《地质》和《地质辞典》的编辑工作，也渐渐有别的单位来找我写文章。1977 年秋，科学出版社为迎接科学大会，计划编一本《现代科学技术简介》，约我写一篇文章介绍地质力学。他们找的作者一般是各学科的权威，我是一个例外，因为将地质力学作出通俗的介绍难度大，需要有从事科普创作的经验，我尽力完成了这项任务，成果就是书中署名为“石工”的《发展中的地质力学》。“石工”是我发表科普文章时常用的一个笔名，使用他是表示我是以科普作者身份写的，也不代表我所在的单位。《现代科学技术简介》本是非卖品，内部发行，主要是送给参加科学大会的代表和有关领导，十六开大字本，印了两万册。出来后反应良好热烈，供不应求，1978 年 9 月公开出书，印了五十五万多册。

此时尽管“四人帮”已垮台，但“两个凡是”仍不可逾越，我自知对我最多也只能有控制地使用，大家都心有余悸，仍是谨言慎行，不过解冻的热流已在地下暗涌。1977 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年的女同志居然找到我在清华园的住所，筒子楼四公寓的一间小屋，送来一份去北京饭店参加方毅同志召开的座谈会的通知，使我终身难忘。因为当时我的妻子陶德坚在清华大学仍戴着迟群当清华大学

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时给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一般人是不会来的。遗憾的是至今我也不知这位女同志是谁，操办此事的中国科协的王麦林和章道义同志也记不清了，因为那时科协机关也是劫后重建，没几个人，是托人设法送到的。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有五十多人，主要是各自然科学学会的负责人、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去的是原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谈了他参加国际地质大会的经过。我列在科普方面的名单中，科普方面还有三位是甄溯南、李元、何祚麻。我在会上没有发言，见到认识的人也没有谈什么。但由此恢复了与中国科协的联系，他们也经过了机构撤消、下放干校，而且人员星散，原来的房子和家当也没有了，比我们地质学院还惨。

这次座谈会在当时最高级的饭店北京饭店召开，主持人的是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而文革中我在北京天文馆外墙上，看到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李元”的大标语；甄溯南先生更是在1957年就戴过帽。现在我们这些人能在这种场合出现，使我感到，世道是在变了，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更大的变化在酝酿，到了1978年，终于显现出来了。

## 二

1978年值得我记下我的第一件事是，1月3日应邀参加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地学组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地学方面的自然辩证法工作。主持讨论是查汝强先生，就是1965年那个“大连黑会”的实际主持人，当时于光远只是开始时来了一下，讲完话就到别处去了。他们整理出来的我的发言是：

武汉地质学院陶世龙同志说：李四光同志在科学上是有建树的，但对他的工作也要有一分为二的态度。李四光同志早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不怀疑，不能见真理。他既然这样对待前人，也一定希望后人这样对待他。但现在有一些后人却不是这样做。对不同于地质力学的其他学派，扣上了许多大帽子。其中有些人并不懂地质力学，而是从哲学概念出发，搞空对空，影响很坏。现在有些宣传与事实不符。例如，有人说陆相生油理论是李四光同志首先提出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李四光认为陆相、海相并不是主要问题。还有些文章说，“地槽”概念是从西北欧那个小天地出来的。其实“地槽”的概念是由北美先搞起来的。李四光同志早期著作多次说明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受了当时或前辈科学家的启发。例如

Suess 就提出过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可以引起海平面变化。李四光是很尊重 Suess 在科学上的贡献的。但是现在宣传中这些事都不提了，只是强调“土生土长”。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东西，片面夸大了，就会变成谬误。在宣传地质力学时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开展百家争鸣。（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简报（二十二），会议简报组编发，1978 年 1 月 10 日）

简报出来后不久，老边把我找去单独谈话，问我是不是我有过这样一个发言？原来是有人写信告到地质总局核心组，上面批下来要他查问，我说那记录是整理的，很简单，与发言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我说的就是那些意思。他要我如实写份材料交上去。我当即写了。

此时原来的北京地质学院已变成留守处，我很少去，不过许多老教师还住在那里，他们常到全国地质图书馆去看书，我也常去，有机会那里见面。一次在那里碰到杨遵义老师，他竟也知道我这个发言的事，临走时压低嗓子对我说，“老陶，可要小心啊！”还有一次是杨起老师，他也很关心，并告诉我：“你知道吗？上面有规定，不用地质力学观点的论文，不许拿去参加国际地质大会。”

随后又有位大概是参与写这封告状信的人对我说：“你是被人当枪使，成为反李四光的带头羊了。”还说，你那发言已上到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的简报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当然不知道，那个简报是只发到部一级的。接着要求我发个声明，说我的话不是那样说的，这样可以把我撇出来再和他们干。此人是北京地质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应该是出于维护我的好意。我说已向核心组写了材料，就是那样，不会发什么声明。并问你们要干什么。和谁干。他没有回答，但我心里清楚，因为这次座谈会有张文佑先生的助手参加准备，而那些挺地质力学的人对张先生的成见很深，他们把座谈会看成是张先生导演的了。

我作这个发言，早有准备，在写《发展中的地质力学》和参与《地质辞典》构造地质学分册的审订过程中，看过许多材料，而且与不少地质界有关人士交换过意见，是有根据才说的。支持百家争鸣是我的一贯立场，当地质力学还不大为人所知，处于弱势地位时，我支持它作为一门课程在北京地质学院开设，并将地质力学介绍给社会，1962 年 10 月《科学大众》发表的《探索大地构造的新途径——介绍地质力学》就是我写的，对李四光先生也一直是由衷的敬佩，非常尊重。但这时我了解到文革中将地质力学压倒其他学派，甚至要用行政命令来推行地质

力学，我大不以为然。而且就我的了解，这类措施也并非地质力学专家们的本意，而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在讨论《地质辞典》时我就已表达过这个观点，这次有了发言的机会，当然要说。

再有，从这期简报把我的发言列为第一部分“在地学领域开展百家争鸣”之首，我倒是认为至少是全国自然辨证法规划会议的组织者有同感，我的发言并不是大逆不道。如果真的上了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的简报，更表明这次大会是准备纠正这类问题了。果然，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所作的重要讲话中，讲了：“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1978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后来再也没人追究我这发言的事。

第二件事是5月23日到6月5日在上海浦江饭店参加了中国科协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并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这次座谈会有从事科普创作、出版的作者、编辑约300人参加，还有一些关心科普事业的科学家和科教出版界的领导人也来了。刘述周、于光远、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王子野、董纯才等还在大会上讲了话。

刘述周同志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文革中被关押，复出后到中国科协工作，这次座谈会就是在他的领导下组织的。他在《繁荣科学普及创作，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的报告中，用事实和数字揭露了文革期间中国科普事业受到的严重破坏，也讲了科普作者、译者和编辑受到的残酷迫害。在印刷出来的报告中，他批判当时“把自然科学分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从而把介绍古今中外科学成就和宣传科学真理，诬蔑为封、资、修，是放毒，是‘影射’什么。攻击什么，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这段话在他在讲的时候举有实例，一个是我，因写太阳有黑子而贾祸；一个是贵州的彭辛岷，写过在雾中看太阳是黄色的，因而定了罪。

刘述周同志在大会上讲的时候没有提我们的姓名，汤寿根同志编简报，把这些事和盘托出，编为一期，让徐克明同志找我核对，我见到里面有批评所在单位迟迟不落实政策的话，提出把我这例子取消，因为面对兼有党政权力的军工宣队作出的结论，而且是“攻击”伟大领袖的问题，没有上面来的红头文件，作为基层领导，一般是不敢去触动的。需要气候合适，我相信时候一到他们会给解决。

现在如在这里批评，反而使我与单位的领导关系不好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有可能增加困难。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

我是有经验的，在外面说说容易，真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本单位。这次我查了一下，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才发出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后，才有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接着是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和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两个凡是”明确否定。在这以前要否定所谓隐射攻击的结论，没有极大的胆识是做不到的。刘述周同志是大大超前了。

我感到这次会议虽是讨论科普创作。其意义实已超越。因此我的发言《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创作水平》固然是谈创作，但着重在批判那时我认识到的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假丑恶政治。尽管认识是很肤浅的，仍有许多是非并未分清，但是我说的真心话，看来也是当时大家想说想听的话，上海科技报的许鲁文同志拿去节编为一篇短文，在一版头条发表。下半年四川省也召开了科普创作座谈会，邀我参加，我又重复讲了一次，至今我还记得，领导这次会议的李力众同志，四川省科委主任，坐在第一排靠近讲台的地方，不时小声鼓励我：“放开讲！，放开讲！”他是在给我“把场”，给我打气了。我也明白，四川比较偏，有些话，在北京可以随便说了，在地方上还不能乱说。所以那天听的人很起劲，我也讲的特别多，从上午讲到下午。

这次四川之行是1978年我应该记下的第三件事。

去上海和去四川，都是地质书刊编辑室提供的支持，而且在四川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支持地质系统的一些作者前去参加，老边同志自己也去了。会后他们又邀请了十多 位科普作家、编辑到峨眉山去旅行，派出王君碧同志来组织。此时，这位在晋察冀边区办报出身的老同志，很想在地质科普上有所作为。不仅是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中国青年报负责《长知识》副刊的编辑赵之同志，他说是来观察的，因为他们的报纸在文革中停了，此时尚在筹备复刊；他告诉我，文革中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而且是被押送去干校。他要我复 刊后一定给他们写点文章。在上海，还结识了多位新朋友，和我同住一室的饶忠华同志，让我了解到文革对上海科普出版事业的摧残和他准备重振科学画报的雄心。总之，从我接触到的旧雨

新交身上，都能感到劫后生机的萌动，大家都在跃跃欲试。我的感觉是，坚冰最先在科学、科普领域打破。这与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给他的分工是管科技分不开，或许当初这种分工有使他不在权力中心的考虑，而对科技界来说，倒是有福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以科普罹难，也由科普更早感受到春天，这就是我的 1978 年。

### 三

1978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知识小品专栏，发出署名为石工的《关于太阳黑子》，篇幅比通常多了一倍，主要是介绍了人类认识到太阳上有黑子的历史过程。据责任编辑叶幼琴同志告诉我，文章发出后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质问人民日报发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文章发出的时间，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讨论。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难怪人家要产生联想。但是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总是要向前发展。1978 年，在我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车轮在加速运转。

去上海开会的通知，是四月份收到的，这次是中国科协把信发到地质总局书刊编辑室，点名要我去，但也征求组织上的同意，那时我已获准借调在书刊室，但那个影射攻击结论尚未取消，这种身份有点使他们为难，不过但还是决定让我去了，路费也是他们出的，只是关照，如要我担任什么职务，不可接受。大概是怕有人告状，牵连到编辑室。他们还希望编辑室也去一位代表参加，中国科协也同意了。他们派出老编辑许冀闽女士一同前往。她是我的师母。一路上对我多有照顾，而这一来，要再成为什么“黑会”，都有个担待了。但到六月初我在会上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后，已无人提出异议。

更使我难忘的是，1966 年进驻地质学院的工作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在也挨了许多整后，1977 年复出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我表示，希望我留在地质系统，在地质科普上发挥作用。因为那时中国科协等几个单位，曾要我去他们那里工作。有的直接和我谈过，有的还派人去了武汉。尽管后来我那里也没有去，但也对我是一种鼓舞和驱策，从只能按号码称呼，失去人格尊严到真正能作为一个人来发挥特长，这个变化也够大了，而决定性变化就发生在 1978 年。

大家都会想到，工军宣队给我做的结论，最后一定被推倒。是的，我已记不清是 1978 年末还是 1979 年初，教务科研部门的党总支书记谢增荣同志通知我，经过复查已取消了原来的结论，并说他参加了讨论我的复查结论的党委常委会，无人有异议，周守成同志还说，当时我就认为不对，所以他申请回北京去修订他的书，我当时就批了。周守成同志说的是真话。而且不止是他，邹家尤同志何尝不是如此。

1978 年，对我来说仍留有一个阴影，我的妻子在清华大学仍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使我感到造成文革疯狂的人文因素，非一日所能消除，但我当时仍是对未来过于乐观，并且以为只要回到文革前就好了。那时的许多认识，在今天看来仍是太天真和幼稚。但是，无论如何，1978 年终究是突破多年思想禁锢，使中国历史出现划时代变化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文革的灾难逼出来的变革。

我以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文革刚结束之时。许多文革未能破坏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文明，在金钱物欲的洪流面前，正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又出现了一种倾向，以为回到过去就有救了，各种历史糟粕沉渣泛起；再就是失去理想，以认为什么理想都是乌托邦，而使自己成为行尸走肉，物欲横流，见利忘义。种种现象都在表明，三十年了，历史需要又一次变革，思想上的禁锢仍然存在，需要又一次突破。能不能突破，如何突破，需要全民的智慧，我在这互联网上，在我的五柳村中期待着。

2008 年 2 月 26 日，于加拿大 Fredericton。

**作者说明：**本文是应向继东先生之约，为《我的 1978 年》一书而写。这本书后改名为《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到 2010 年 1 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本文曾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 10:33:27 发在人过五十网（北京），到此刻（2010-06-04 12:03 获阅读（3134）| 评论（6））因人过五十网后来无法访问，遂又发于在网易的博客，在获得阅读（999）| 评论（2）后，该博客被关闭。

# 【六二〇事件】

## 回忆“六二零事件”

万 天 丰

1966 年的初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身处全国政治中心 - 北京的一所大学 - 北京地质学院，自然会深深地卷入这一政治漩涡。自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央发布“5.16 通知”之后，风云突变，一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变故的政治运动就这样展开了起来。在 6 月 8 日之前，大家只是看看文件、议论一番而已，也有一些大字报，但一切还算比较平静，矛盾并未尖锐化。

### 一、高元贵院长成为地院的头号“靶子”

但是 1966 年 6 月 8 日中午，由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率领的“文化革命工作队”（200 多人，简称“工作队”）开进地质学院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质部党委宣布由工作队代行党委的职权，也即夺了党委的权。起初，广大师生都把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当作可信赖的上级领导，表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不过，不久之后，大家从工作队员严肃、冷冰冰的态度中，感到了问题。工作队一进学院，学校就停止上课，天天学习文件、讨论，并要求大家揭发党委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校园内开始出现随意侮辱所谓的“右派分子”，对于过去有过所谓“右倾”言论的同志进行批判与打压，从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大家对于党委内的刘普伦，聂克、周守成和李武元等同志的批评意见比较多，在他们之中也确有一些小丑闻，而其中的一些同志正好是地质部党委一贯依靠和信任的人。但是，对院长高元贵却没有揭出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高元贵同志是 1958 年秋季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而来地质学院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的。他一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平等待人，积极进行教育改革等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可以说他是从北京地质学院到后来的中国

地质大学的整个办学过程中，深受群众拥护的、最实干的，对学校的主要工作 – 教学工作抓得最好的，自然也是最得人心的好领导。这一点在校庆 40 周年（1992 年）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大会主持人介绍到老院长高元贵时，师生员工和校友们全体起立、高声欢呼，长达 7-8 分多钟之久，那可以说是经久不息的欢呼与掌声。而相比之下，在介绍地矿部、教育部和北京市领导人以及其他前学校负责人时，仅获得象征性的鼓掌。可惜的是，在此之后，学校正在筹划庆祝他八十五岁大寿前夕，他不幸病故了。

1930 年代，他在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1935 年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转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鲁西地委群众工作部的工作（部长是万里）。解放后，他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何长工同志时任部长。据说，当时他曾经因为对上级提过一些意见，而被认为有“抗上”的错误。后来，高院长被调到西安任西北建筑总公司任总经理（上述简历，需要到国土资源部党委进一步核实之），1958 年秋季调入北京地质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为中央 7 级干部（副部长级）。

也许正如何长工副校长（部党组书记）1966 年 6 月 16 日在宣布高元贵的主要罪状时所说的：“他三年不进地质部”，犯了目无领导的错误。其实，据后来所知，党委中的李武元和周守成等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就经常背着高元贵到地矿部去“汇报情况”。所以，何部长早就对高院长不满了。在 1965 年秋季就将王焕调来当学校党委书记，从此高院长只是党委常委，只负责行政工作，这其实就是部领导想整高院长所迈开的第一步。

1966 年 6 月 14 日按照工作队的安排，高院长被迫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检讨。事后，效忠工作队的、政治教研室中一些“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同志就接连猛攻高院长，写了三篇大字报来批判他，说他在做假检查，真抗拒，在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论，

说他在保护右派分子，说他具有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世界观等等。总之，对他是全盘否定，认定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有了一点舆论基础的情况下，在 6 月 16 日工作队就召开全院大会，何长工部长和国务院公交办副主任李人林和工作队负责人邹家尤副部长主持大会，宣布让高元贵院长“停职反省”。这一决定，立刻激起全校绝大多数师生的愤怒与反感！

## 二、群情激奋，反对地质部工作队的倒行逆施

6月16—19日校内不同意见的辩论日趋激烈，经常有人在看大字报的时候发表反对工作队的言论或进行小范围的演讲。工作队及其少数支持者，挥舞大棒，摆出了一副“抓右派”的架势，派人潜入群众中去收集并记录群众批评他们的言论与活动情况，以便“秋后算账”。不过，也多亏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保留那段历史中的不少细节。就这一点而言，尽管他们的动机不好，但具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记录群众反对工作队的言论，抄录大字报上批评工作队的文章，监视有关同志的活动情况等等，也算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当然他们不可能掌握群众反对工作队的一切细节。

绝大多数的师生员工都坚决反对地质部党委及其工作队的做法，认为他们是在滥用职权，在搞宗派斗争，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打击、迫害我们的高院长。正像当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说：“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夥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执行错误路线的地质部及其工作队正好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广大群众冒着会被扣上‘反党’，‘反中央’帽子的情况下，反对工作队的大字报和反对工作队只准批判高元贵的大字报，还是几乎贴满了学校所有的墙壁和走廊，成为舆论的主体，不少人还多次去国务院接待室上访。这一点，恐怕是地质部和工作队领导们当时就根本无法想象到的。

6月20日清晨，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干部、时任教学辅导处处长兼总支书记李贵同志和教学辅导处教导员王煊堂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在那里正好碰到岩石教研室教师李明哲、莫宣学、实验员邵道乾等也去上访，于是他们就一起进接待室向上级反映了地院的实际情况，认为地质部工作队和我校的一些党委成员是采用打击、“抛出”高元贵院长和镇压群众运动的手段，来掩盖他们自己的严重错误。希望中央派工作组来学校纠正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人员表示：可以请国务院公交党委派代表到地质学院了解情况，待了解清楚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李贵和王煊堂等还约好：回来后，要发表演讲，声张正义，向群众扩大宣传。

6月20日上午李贵等同志的上访行动，成为地质学院人们议论与争论的中心。

这表明地质部工作队当时的做法，不仅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而且也引起了正派的革命老干部的不满。少数人的意见认为：“越级上告，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就是对党不满”，当然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等于“反党”、“反革命”。而多数群众则坚决支持李贵等同志的上访，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争论得十分激烈。

几乎与此同时，刚卸任的院团委书记安静中和地质系政治辅导员江祖如等也分别贴出大字报，指出工作队和院党委中一些人的严重问题，认为他们在“继续蒙骗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心中有鬼”，要求“中央和新市委重派工作组来领导我院的文化革命，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这些大字报并未反对批判高元贵，但是斗争的矛头显然都是直指地质部领导、工作队和院党委中另一些当时群众认为错误较多的同志（如聂克、周守成、刘普伦和李武元等）。

### 三、“6.20”的演说、游行与上访

6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王煊堂在学九楼旁发表演讲，他回顾了昨晚到当天凌晨与李贵一起商议、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我院的斗争情况，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要汇报我院文化革命的情况，指出学校近来已经揭出党委中聂克、周守成、刘普伦、李武元、王良和王克昌等同志的许多较严重的错误，但是“为什么工作队突然要求大家只批判高元贵，企图何在？这是不是在给聂克等人开脱吗？”他还指出：工作队的一位负责人曾找李贵谈话，要求他：“关于高元贵的大字报可以贴，聂克等人的问题写成材料交给工作队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在批判聂克的会议上，工作队的高部长出点子，递眼色，帮聂克的忙，这又是为什么？”

他又指出：“1957年时何长工部长曾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地质学院的学生都是‘何家兵’”。他说：“谁是你的兵，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另外，他还说明：“李贵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家的床单补了又补……，我们要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保护好李贵同志……。”他的讲话击中了地质部领导和工作队的要害，得到许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起到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作用。

稍后，李贵同志也在大饭厅前的桌子上发表讲话：“工作队只准我揭发高元贵的问题，不让我揭发周守成、聂克的材料。他们鼓动群众打了不少基层的辅导员。

工作队还说，文化大革命可以随便鬥，随便打”。他还指出：至今没揭发出高元贵有什么大问题，就让高元贵停职检查，让大家专门去批判高元贵，这是为什么？”他还说：“我豁出去这二十多年的党龄，准备好明天就牺牲。”他的讲话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当有人表示反对李贵，支持工作队时，江祖如就出来支持李贵，他特别指出：“我们对任何事物不能盲从，我们不能被‘组织’这个框框给框死了。地质部有问题就可以揭！”

有几位到李贵家访问过的同学，当场就把从李贵家拿来的一条有好多个补钉的床单，站在桌子上向大家展示。许多同学都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位老干部竟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大家都为地质学院有这样的廉洁奉公、敢于坚持真理的工农好干部而深受感动，为他不怕工作队打击报复的英雄行为而深受鼓舞。群情激奋，许多同学都表示应该马上向工作队，向邹家尤反映我们的意见，让他回答我们的疑问。当时正好就到开饭的时间了，大家说好现在先去吃饭，同时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午饭后在西一楼北侧集合，一起去找工作队反映意见。

李贵、王煊堂当时就跟几个教员说：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向工作队提点什么要求？我当时正好与他们在一起磋商，就说到附近西一楼我的房间里商量一下吧。由于1958年李贵是湖南实习大队的大队长，王煊堂和我都是他的部下，所以彼此都较熟识，也互相信任。于是我们几个人，还有几位积极热情的同学和工厂的工友就一起到西一楼321室进行磋商。在讨论前，我拿了饭碗和饭票，请一位热情的工友替我们三人到职工食堂去买饭，同时我们商量着饭后向工作队提那些要求，怎么做。等那位工友把饭打回来的时候，磨片室的傅骥师傅（他曾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连级干部）就说：“让我先来尝一口，小心被下毒”，他先尝了一口觉得没有任何异味，才把饭菜端过来让李贵、王煊堂和我吃（可笑的是，后来工作队在清算620事件时，居然有人揭发：说是因为李贵怕死，一定要让别人先尝，然后他才肯吃饭）。当时有人提出来是否可以借一付锣鼓来壮大队伍的声势。工厂的骆公正师傅立刻说我们那里有，他立刻就回去拿来。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饭后，一看楼下已经聚集了好几十人，有人还扛来一面红旗，锣鼓也已准备好。于是大家就在李贵、王煊堂的带领下，敲锣打鼓，开始了游行。

为了扩大影响，当时决定先到校园西部的家属区，后到中部的学生宿舍区，

然后再到校园南部学 12 楼工作队的驻地。在游行队伍行进中，地质系蔡新平和物探系郭凯等同学几乎同时也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于是两支队伍一汇合，游行的声势很快就越来越壮大了。蔡新平他们高举大字标语“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用大字报的红绿纸，一张大纸上写一个字）。游行的参与者从几十人变成了好几百人的队伍（后来有人回忆说：参加游行队伍的人数达两千人，我估计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参与。但是同情者与支持者肯定是数以千计的，占学校师生的大多数）。群众自动地排列成每横排 4 人，使得队伍显得整齐而有序。队伍沿途除了有响亮的锣鼓声之外，许多同学还自发地高呼：坚决拥护党中央！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等口号（在少数人研究游行计划时，并没有讨论过要呼喊什么口号，由谁来领呼）。

尽管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互不相识，但是人心很齐，随时都有人主动地提出各种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后来，在 620 之后，工作队在整肃这批参与者时，一口咬定：620 反工作队的游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其实所谓的“组织、计划”只有一个简单设想，具体事件的进展完全是处在一种自发的、群策群力的状态。这是由人心向背所决定的。

当游行队伍到达工作队驻地学 12 楼前，群众高呼口号，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出来听取群众意见和回答问题。大家在楼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等了好几分钟之后，一位工作队员出来要求大家派代表进去谈。但是由谁当代表呢？队伍中间绝大多数人都互不相识。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到底派谁进去的，我的印象好像是以自告奋勇、自我推荐为主，其他人附议。事后，我才知道是由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庄一龙和吉让寿等六位同学进去的。大家说好要把邹部长请出来回答问题，大家也好对工作队提出要求。有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队伍的领导李贵和王煊堂 不要先进出，以免队伍没有了领头人。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之后，邹家尤部长终于被很有礼貌地请了出来。有几个同学就从学 12 楼后面的食堂搬来一张方桌，请邹部长登上桌子与大家见面、回答问题。老实说，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文革之前有谁经历过这种直接面对群众质问的局面呢？恐怕谁都没有经历过此种场面。所以，邹部长在登台讲话前和讲话时显得十分紧张，拿着香烟的手在不断地、微微颤抖。

当大家帮邹部长扶到桌子上、站好之后，大家就自由发言，向他提出要求。

主要的内容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坚决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广播他的揭发材料（事后才知道李贵当时还没有写出揭发材料），保证李贵同志的安全；坚决要求中央重派工作队来学校；要求今天就派车让我们的代表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说句实话，邹部长当时确实无法满足大家的上述要求。他只好用婉转的口气，重申“我们部工作队是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地质部党组派来的，是代表党来领导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家有批评意见可以提，我们都欢迎……”。他也明白如果他什么要求都不答应，他是不大好下台的。所以，他最后终于同意立刻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以便化解他当前的困境。

就这样，大家就同意再次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让邹部长下了台。等候了不太长的时间，就来了三辆大卡车（现在卡车是不许载人，白天也不许进城的；可在当时，这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了），师生们就纷纷站到了车上。我当时也没弄清到底去了多少人。倒是工作队的“密探们”帮我们统计了，共有 163 人上了车。

三辆站满人的大卡车直奔西华门大街国务院接待室（在西四东侧的大街，现为国务院参事室）。该接待室只是一座小楼，院子也不太大，一下子去了上百人，再加上原来已经有的人，整个院子就给塞满了。参事室的同志让我们派几个代表进屋去谈，其他同志就站在院子里静静等候。由于当天早晨李贵等同志刚去过，公交党委正在处理地院的事情，现在只是起到了“重申一番”的作用，当然不会有什结果。只是让上级领导知道地质学院的群众对地质部工作队的做法意见很大，今天在校内举行了自发的群众游行，群情激奋等情况。在向接待室的同志汇报完了后，全体同志就有序地登车回校。

620 的群众游行、反对工作队抛出高元贵的错误方针，要求上级领导更换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队，这在 1949 年以后的新中国是破天荒的现象。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和游行的自由，但是以反对上级领导派来的工作队为主旨的游行与集会，通常被认为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这在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心目中都是这么认定的。就这一点而言，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错误领导及其方针政策的活动，其意义的确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运动群众”的结果。

在 620 前后，北京市许多高校（如北大、清华、铁道学院、邮电学院等）也都自发地发生了反对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应该说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

各院校互相串通联络的结果，更没有任何人来统一领导。这与“文化大革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照笔者个人的见解来看，这也仅仅是“刘邓司令部”上当的结果，而是党内一些领导干部长期脱离群众、唯我独尊，任人唯亲，搞宗派主义的必然结果。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既然中央要求揪“黑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先拿跟自己不和睦的、不顺眼的基层领导干部开刀，这样既排除了异己、又完成了任务，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完全不考虑他们想要打倒的同志是否真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四、工作队反攻倒算与群众的坚持斗争

从6月20日到7月18日，这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是工作队进行反攻倒算，企图像1957年打击“右派分子”一样，把所有参与620事件的人员统统镇压下去，以便实现他们预定的打倒以高元贵为代表的“走资派”的目标。他们把这场镇压称之为“反干扰”。

6月21日李人林副主任（国务院公交党委政治部副主任），何长工部长和胥光义副部长亲临学校召开全院大会，还带了一大批地质部机关的工作人员站他们周围或站在会场四周来“保驾”，会上他们宣布620事件是少数人闹事，是“对邹部长的围攻”，宣称地质部工作队是革命的，是代表党中央的。他们还宣布今后的中心任务是要“揪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要进行“反干扰”。另外还宣布将高元贵撤职，命令聂克停职反省。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秉承了刘少奇类似的指示来办的，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与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这就是当时一些负责领导干部的错误指导思想。

为了证明工作队是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会后，工作队还特意组织了一场所谓拥护工作队的游行。由于很难组织广大师生员工来参加，他们只好组织不了解真相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游行的家属、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充数，形成了一支稀稀拉拉的、毫无生气的百人队伍。这与昨天自发举行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大游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全校的人心向背表现得实在太明显了。

尽管工交党委和地质部负责人给大家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是广大有良

知的群众并 没有被压服。李贵 21 日晚上仍旧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继续要求党中央另派工作队来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地质系和探矿工程系等许多群众都曾分别研究继续反击工作队的做法。6 月 21 日下午安静中同志还在李人林召集的座谈会上做了一小时的长篇发言，揭露党委内一些负责人抛出高元贵、保护他们自己的许多内幕；批评工作队很不公正的做法，只准批判高元贵，明显地在保护党委内一些犯错误比较多的人。同时还批评李人林副主任的讲话很不慎重，说他只听了一面之词，就下结论等等。

尽管群众并没有被工作队、部党委和工交党委所压服，但是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 刘少奇主席，许多领导干部的思路和逻辑仍旧和 1957 年反右时和 1965 年以前“四清”时的一样，那就是说“我就是党，反对我派出去的工作队就是反党”。因而，在他们领导下的各级干部都是党的化身，谁也批评不得，更不能反对了，因而他们就必然要挥舞大棒，抵制群众的批评，镇压群众的正义呼声。于是他们就展开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干扰”运动，采用“逼、供、信”的手段，把带头反对工作队的干部、教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召开了许多次批斗大会，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很快工作队就宣布李贵，安静中，王煊堂，江祖如，郑伯让，王大来，沈孝宇，陶世龙，李明哲，付昭仁，王大来，陆炎德，张海涛，刘万翔等 13 名干部和教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反对了工作队。

然而，时代进步了，已经不是 1957 年了。好多次的批斗会，变成了辩论会。他们本想以高压手段把敢于顶撞工作队的同志，都说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黑帮分子”，可是又拿不出什么证据。相反被批判的同志反而据理力争，不断地指出工作队保护一些跟部党委关系较密切的、但是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人，不断指出党内宗派主义的严重问题，批判会反而开成了揭露工作队错误的大会。例如，地质系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江祖如、付昭仁时，就是这种情形，弄得主持会议的工作队成员不好收场，效果适得其反。全校各种级别（院、系、室、班）的批判、斗争会不知开了多少个。工作队本想利用国务院公交党委的权威和大棒，把对他有意见的干部群众统统镇压下去，但是效果甚微。

这一次完全不像 1957 年，中央一声号令，各级党组织就展开斗争，所谓的右派分子马上纷纷检讨自己、就说“自己犯了错误”，几百万个所谓的右派分子一下

子就定了罪。当时，共产党和党员的形象十分高大，谁都不怀疑党组织会犯错误，党员都是真理的化身！但是，现在，1966年，当群众发动了起来，已经揭露出党内存在很多腐败的、见不得人的丑闻时，而且当时正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家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想再重演1957年的好戏，实在就是白日做梦了！很多领导干部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当“反干扰”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还远不能收场的情况下，7月18日傍晚，突然宣布学校要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大会，工作队长邹家尤副部长以总结和动员为名，讲了一些官样文章的话，虽然还说“反干扰”是必要的。但是，突然出来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暗示了工作队犯了点什么错误，实在让大家十分奇怪，并大吃一惊。

其实，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因为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明确地否定了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派工作队到高校镇压群众运动的严重错误，并且对刘少奇说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为此，工作队不得不在表面上做一点自我批评，同时立刻把工作队“反干扰”期间所印发的材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字报选编（第1-6期）》全部收回，把反干扰期间所贴的大字报全部拆除、撕掉，清理干净，以免留下罪证。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死心，7月26日地质部保卫部还向学校政治部和保卫处布置了“内清十二条”的黑文件，要求对革命师生进行审查、排队，以便清洗。同时把即将遭清洗师生的劳改地点选定在宣化和五台等地。

7月27日以水文地质系学生朱成昭为首的“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此大字报虽相当简短，但是直接触痛了工作队的要害。工作队和被他们所迷惑的一些人就立刻发动围剿。据工作队统计共有750张大字报对此进行围攻。其实，事后大家才知道，朱成昭等人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大胆的大字报是因为他与郑文卿在7月25-26日到北京大学听到了万人辩论会的情况，知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已经宣布要撤销北大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队了。当然对于工作队到底算是犯了“右倾”，还是“左倾”的错误，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队一定要撤走！这是问题的要害。聂树人也在当天下午贴出“李贵等十三名教员干部是革命的”长篇大字报，实际上否定了工作队反干扰的“全部战果”。

## 五、撤走工作队，建立与中央的联系

有人说，当时北京市的许多高校在 6 月下旬都发生了“赶走”工作队的事件。其实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而且也不大符合事实。单靠群众的力量是赶不走由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的，稍微有点不同的反对意见，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怎能赶得走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代表呢？

事后大家才知道，真正导致各校工作队撤走的原因是：7 月 29 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由李雪峰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宣布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高校工作队的决定，并撤掉了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务。会上邓小平和周恩来都讲了话，代表中央支持了市委的决定。刘少奇也在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显然，这是毛主席决策的结果。

尽管，上级已经宣布派到各学校的工作队应该撤销，但是工作队一直拖着不走，理由是 他们要“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这样可以为他们巩固“反干扰”的成果，组织、支持他们的“革命委员会”，建成一支“永远不会走的工作队”。事实上，工作队根本就没有搞什么“整训”，或“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他们努力在学校内寻找一批继续执行他们路线的代理人。不过，最后结果当然是一败涂地。

与此同时，广大革命群众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以朱成昭为首，先组建了“东方红战斗 大队”，后来很快就组建一个全院性的群众组织 - “东方红公社”。东方红公社很快就成为全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参与的革命群众组织。该组织一开始就宣布不搞 “唯成分论”。其成员的绝大多数是参与反对工作队、同情和支持高元贵等革命干部的广大师生员工。可以说，620 事件的参与者和同情者就成为“地质东方红”的群众基础。“地质东方红”在文革中是全国著名的“造反派”队伍，但是其实此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群众却是因为保护本院正派的领导干部而逐渐聚集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质东方红”也可以说是从“老保”队伍起家的。在文革中，1967 年初，地质学院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高元贵与李贵就是首先被结合进去的领导干部。

此后不久，毛主席女儿李纳化名肖力，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身份，频繁与东

方红公社学生领袖接触，对地院文革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地质学院文化大革从此纳入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之下，大的行动，如抓彭德怀，大的人事变动，如用王大宾取代朱成昭等等都受中央文革直接指挥。

笔者认为：文革早期“地质东方红”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很快就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公开或暗中的指示与支持；文革后，之所以“被抹黑”，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哪个人不曾上过当、受过骗呢？谁敢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呢？现在回过头来看，革命热情饱满的年轻学生更容易被利用或被误导。在文革早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的确曾一度成为“天之骄子”，少数人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私利，也做过一些“亲着痛，仇者快”的坏事，当然也会跟着上面犯了错误。实际上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更是文革的受害者。不过，在后来更长的时间内，他们却好像成了文革罪责的重要承担者，受到了过多、过重的处罚，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在国内的某些单位，曾有严重歧视“地质东方红”的学生现象，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620 事件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的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独立思考而发起的一场自发性的、正义的革命行动。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快 50 年，许多重要的当事人已经离我们而去（这也是笔者不得不写几句的原因），但是其宝贵的、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和充满正义感的气概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的，这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陶世龙和蔡新平的指正和帮助，特此致谢。

2015 年 7 月 16 日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记忆》第 145 期）

**编者按：**

万天丰：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教师。

## 【九·四事件】

**编者按：**这是一起发生在 1967 年 9 月 4 日晚上的事件。当时王大宾在北京小汤山住院疗养。地院东方红内的“蔡派”以大批判联络站的名义组织了“批判斗争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大会”，同时组建了“东方红公社大批判广播台”，并进行了首次广播。于是引来了地院东方红执政的院革委会副主任聂树人等人的反对，从而发生了砸大批判联络站广播台等武斗事件。这是地院文革中，朱派和蔡派双方派性斗争发展中的又一重大事件。在此，我们将蔡派就此事件散发的传单和聂树人回忆录中就此事的叙述，刊登如下。

### 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 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

#### 最高指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激烈的革命。

亲爱的东方红战友们！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控诉一个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行凶殴打事件！一个发生在“红色政权”下的白色恐怖事件！

经过地院东方红革命战士长期艰苦的斗争，地院保朱势力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一月风暴》等十五个战斗队 8.17 《联合声明》的发表，更是打中了朱成昭之流及其背后阴险的黑手的要害，打中了地院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要害。一小撮朱成昭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小集团《新东方红公社》分子积蓄了八个月之久的反革命复仇心，终于在九月四日夜爆发了。这群法西斯暴徒，挑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对我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坚决反朱的战士下了毒手，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打、砸、抢，一场空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地院的上空。血，坚定的反朱战士的热血，第一次喷洒在北京地质学院的土地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天晚上，我大批判联络站组织了有外校革命战友参加的“批判斗争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大会”。这次大会和我大批判联络站成立以来一系列革命活动，给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及其狐群狗党以致命的打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翻案的阴谋，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愈来愈近了！于是这一小撮反动成性、早就对我们恨之入骨的法西斯暴徒，便以我《东方红公社大批判广播台》成立为借口，对我大批判联络站发动了突然袭击。必须指出，我大批判广播台的成立是完全有理的！因为我院广播台被朱成昭分子所操纵，从一月份以来，一贯站在反革命分子朱成昭的立场上，为朱成昭上台大嚷大叫，播送大批毒草，甚至反革命小集团《新东方红公社》宣言；对坚决反朱的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抓“托派”、“一小撮”。对反朱革命派写的稿件一篇也不播，即使革委会盖了章也不播。使用广播器材也是百般刁难，数次破坏我们所组织的大会和斗争会。对此，我们曾多次提出警告，广播台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的斗争进行到底，大批判广播台成立了！这是完全有理的，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

首先他们捣乱会场，围攻、冲散外校校友。晚上十时许，当我东方红大批判广播台成立公告第二次播送的时候，一小撮事先预谋好了的法西斯暴徒，拉掉电网，灭了点灯，挺了广播，于是学十一楼、学十二楼骚动了，一小撮朱成昭忠实追随者哄叫起来，并且下楼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东方红战士前往砸广播台。他们一、二百人冲进了学十二楼大批判联络站办公室和广播室。不仅砸了家具，抢走了广播器材和有关朱成昭问题的重要材料，而且点名毒打我坚决反朱的东方红战士。有的被堵在屋里毒打，有的被拉到马路上毒打。他们数十人、近百人围住一个坚决反朱的革命派战士，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朝死里打，专击头部、太阳穴、小腹及下身等要害处，踢倒在地以后还不放过，几个暴徒一拥而上狠踩几脚，然后拉起来在猛击头部，一边打一边疯狂地叫嚷“打！打！打死活该！”被王大宾同志派去提审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刚刚回来的万天丰同志，就这样从学十二楼被一小撮暴徒毒打到东一楼，几百公尺的距离，头部、面部、胸部被打了上百拳，腹部、腰部被踢了几十脚，踢倒再打，毒打后再踢倒。直到被打得遍体鳞伤，嘴角、鼻孔流血，面部浮肿，全身瘫痪无力，还有一个暴徒冲上去揪住他的头发猛击头部，真是惨不忍睹！后来，一个暴徒指挥说了一声“走！”这一小撮暴徒才放开万天丰蜂拥而去，再抓别人打。梁定益、吴瑞棠、蔡新平、赵国柱、殷惟侯、孙司权、汪南平等十六个同志都是这样遭受惨无人道的毒打，七人受重伤，有的被打得吐了血，积了内伤；有的耳朵被打聋了；有的鼻梁骨被打歪；有的被打得面部青肿，淤血，头部剧痛。这帮暴徒还在马路上大叫：“周永璋呢？把这小子抓出来，揍死他！”“到宿舍去把他们一个个抓出来揍！”真像一群吃人吃红了眼的野狗！对反革命分子朱成昭那么亲，动一动朱成昭就像挖掉他们的心头肉，而对坚决反朱的革命东方红战士，却是那么狠，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还不清楚吗？

就连周围不多的几个群众（有的是外单位的革命的同志），看到这种践踏“六·六”通令的法西斯暴行，气愤不过，说句“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帮打红了眼的暴

徒也要动手打他们。有一位女同志说了句“你们为什么要武斗？”几个暴徒上去就猛揍她几拳，然后向她腰部猛踢一脚，把她踢倒在地，还恶狠狠地骂她：“装死。耍赖！”这一小撮暴徒还有一点起码的人性吗？

行凶殴打一直延续到深夜一点钟左右。这一小撮暴徒还布置岗哨，封锁要道，巡逻监视，继续搜捕，不准人出校，气氛异常紧张，地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九·四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由以下的事实为证：

1，打手同时集中，以灭灯、停广播为号，打时步调非常一致，有人指挥，一声号令，几十个人围住一个毒打一顿，打个半死放了，再一起扑向另一个。院革委会文攻武卫小组长冯国良就是武斗指挥之一。

2，被打的人都是点了名揪出去的。且都是红色造反团6.20革命造反兵团成员和地质系教师。据了解，他们预定的重点目标是11个人。

3，打得很狡猾，在明处以辩论为幌子扭打。拉到暗处就狠打猛踢，并有人使用了皮鞭、腰带。打人都是往死里打，如果没有坏人操纵，是不会下此毒手的。

4，打人很有规律，从学十二楼打到学九楼前（约300余米）就住了手，不敢往宿舍区人多处扩展。

5，最后并有组织的包围了东三楼，封锁了道路及校门。

联系前几天就有人扬言要揪斗蔡新平、周永璋、梁定益、安静中，以及一伙《新东方红公社》分子几次扬言要揍蔡新平、殷惟侯等同志的情况，就不难看出事件的背景了。

值得提出的是，院革委会委员大部分都出场了，他们目睹这残忍的行凶场面，不加制止，有的系分会负责人甚至赤膊上阵。

革委会副主任李贵同志站在边上不管。赵国柱同志被追得走投无路时，正好撞上他，一把将李贵抱住，李贵仍不管，暴徒猛击赵后背，并把赵拖走。

常委聂树人，当群众出于义愤斗了朱成昭，按了他几下头，聂就指责群众“搞武斗”，碰了朱成昭一点皮毛，简直就像割了他的心头肉。可是昨天，就是他离开大批判联络站所在处学十二楼后不久，打砸抢时间就开始了。他在一旁看着反朱战士遭毒打，得意地狞笑着说：“搞分裂的人，没有好下场！”一个外校同志挨了打，聂说：“到我们学校来搞分裂，就是要挨揍！”

朱成昭死党杨雨忠出场了，院系革委会其他委员及一些总部人员任云堂、侯力平、刘文德、黄占起、李荫增、陆炎德出场了，革委会委员究竟在九·四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难道还不清楚吗？

九·四事件是在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黑手及其内幕即将真相大白的前夕，在革委会的朱成昭的代理人摇摇欲坠的时候发生的，这是地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朱成昭的反革命势力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革命报复事件！是一个资产阶级复辟的事件！是刘邓一小撮残余势力的猖狂反扑！是他们将要对反朱革命派进行更残酷镇压的信号弹！

这一小撮暴徒，充分暴露了他们为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复仇的动机，他们在毒打反朱的革命派战士时咬牙切齿地说：“xxx是打朱成昭、胡乐成的干将！”甚至

第二天一早群众质问他们为什么武斗时，这帮人还说：“他们为什么打朱成昭呢！”打人最甚已认出的有：张世成、高德成、韩勇、焦民、于治国、崔云昊、曾昭贵等，朱成昭的忠实追随者陈广智、刘万恩、刘梅也出了场。一小撮新东方红公社分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为朱成昭报仇，“反朱有罪”长期以来竟成为地院的真理。请问，我院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今日之地院，竟是谁家之天下？

九·四事件，说明了“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的挣扎的。”我们与朱成昭势力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淋淋的敌我斗争，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是什么都做的出来的！朱成昭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积几个月的刻骨阶级仇恨，发动了这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九·四事件说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之所以公然撕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对反朱革命派实行法西斯镇压，正说明了他们狗急跳墙，穷途末路，就要进坟墓了！正说明我们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工作已经击中了朱成昭的反革命小集团的致命要害。我们已经成为朱成昭之流搞反革命复辟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下了毒手！但是，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最后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对没有好下场！

九·四反革命事件，是地院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执行没有朱成昭的朱成昭路线的总暴露，它教育了广大群众，使我们看清了地质学院的政权很大程度上是被朱成昭势力所操纵的，在地院，资本主义正在复辟！

我们呼吁，全体革命的东方红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挽救东方红，勇敢起来战斗，从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的手中，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些领导权！

我们呼吁！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支持我们的斗争，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请求，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代会迅速派出调查组，调查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况，支持地质东方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

我们强烈要求院革命委员会，立即严惩打人凶手及幕后策划者；立即治疗被打伤的同志；赔偿全部损失，如数交回被抢走的一切物资材料；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保障毛主席给予我们的“四大”自由，保障革命派的人身安全；立即公开向全院革命师生作深刻检查。

我们严正警告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及其一小撮死党，你们不要瞎了狗眼，打错了算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决不会允许一小块白色恐怖地区的存在，革命群众早晚要把你们这帮家伙砸个稀巴烂！

我们劝告那些受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蒙蔽而行凶打人的东方红战士，赶快醒悟，反戈一击！受蒙蔽无罪，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充当了朱成昭之流的工具，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对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下这样的毒手，心里不感到羞愧吗？

我们的东方红大批判联络站全体战士，坚信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是光荣和重大的。我们绝不会被朱成昭反动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打倒刘邓陶！

打倒朱成昭！揪出黑后台！

清除朱成昭在革委会中的代理人！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7年9月4日

1975年9月3日

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  
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最高指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激烈的革命。

亲爱的东方红战友们！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控诉一个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行凶殴打事件！  
一个发生在“红色政权”下的白色恐怖事件！

经过地院东方红革命战士长期艰苦的斗争，地院保朱势力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一月风暴》等十五个战斗队 8.17《联合声明》的发表，更是打中了朱成昭之流及其背后阴险的黑手的要害，打中了地院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要害。一小撮朱成昭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小集团《新东方红公社》分子积蓄了八个月之久的反革命复仇心，终于在九月四日夜爆发了。这群法西斯暴徒，挑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对我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坚决反朱的战士下了毒手，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打、砸、抢，一场空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地院的上空。血，坚定的反朱战士的热血，第一次喷洒在北京地质学院的土地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天晚上，我大批判联络站组织了有外校革命战友参加的“批判斗争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大会”。这次大会和我大批判联络站成立以来一系列革命活动，给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及其狐群狗党以致命的打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翻案的阴谋，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愈来愈近了！于是这一小撮反动成性、早就对我们恨之入骨的法西斯暴徒，便以我《东方红公社大批判广播台》成立为借口，对我大批判联络站发动了突然袭击。必须指出，我大批判广播台的成立是完全有理的！因为我院广播台被朱成昭分子所操纵，从一月份以来，一贯站在反革命分子朱成昭的立场上，为朱成昭上台大喊大叫，播送大批毒草，甚至反革命小集团《新东方红公社》宣言；对

-1-

# “9·4事件”：“二团”分裂阴谋的破产

聂树人

## “大批判广播台”开始广播

但是，警告归警告，分裂归分裂。对于铁了心要搞分裂的“二团”，警告是没有用的。但是，警告还是有另外的作用，那就是驳斥谣言，以正视听。

“大批判广播台”覆灭事件，又称“9·4事件”。

1967年9月4日晚上10点多钟，我当时的住地学12楼楼顶突然响起了宏大而清脆的广播喇叭声。楼顶究竟有几个喇叭我不得而知，我虽然住在这座楼上，但是，对楼上的住户们并不了解。

“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现在开始广播！”

“怎么回事？”我感到事态严重。

“为了忠实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彻底批判朱成昭反动观点，把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宣布，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现在正式开始广播……”

我的第一反应是，“二团”，即“蔡派”，已经将“地质东方红”内部的斗争公开化，要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号。他们一直指责革委会不批判或假批判朱成昭，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批判朱成昭，而他们的批判又受到革委会的压制。因此，如同上一年“斗批改兵团”的“斗批改”一样，他们把搞分裂的广播台冠以“大批判”的名目。

“二团”的广播器材显然是外校的，不是北京大学的，就是清华大学的，我判断。因为，要置办一套广播器材，“二团”几个人不会自己掏腰包，他们也不大能掏得起。

我对形势立即进行了估计。

与革委会广播台相对，设立“大批判广播台”，显然是制造分裂，制造事端。

“大批判广播台”的出世意味着，分裂、武斗，更大的分裂、更大规模的武斗……“二团”就可以从内部反对派变为公开的反对派，从而公开打出旗号，成为“地质东方红”对立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钢铁学院等不少院校从一体到分裂，再到严重武斗，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二团”的思想家理论家很可能以为，他们正在把自己发现和创立的理论付诸于实践，而且坚信一定成功。

进一步想，“二团”的谋划者们在私下里对我的性格和脾气肯定研究了一千遍、一万遍。他们认为，我这个一贯主张实行大联合，坚决反对分裂的人，我这

个疾恶如仇而又性格有些火暴的人，很可能会组织学生砸掉他们的“广播台”。在这种情况下，武斗将不可避免。武斗一起，就会引起同情、支持“二团”的人们的愤怒，武斗就会升级，就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武斗，这本身就又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而这一事件的挑起责任将不可避免地会落在我聂树人的头上。

而，如果我对他们的分裂行动置之不理，那么，他们的分裂活动就会合法化，从此，不仅地质学院就会有两个声音对着吵，全院师生将永无宁日，而且，很可能还会招来王大宾的怨恨，以为是在我实际主持工作时，把地质学院搞乱了。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胜算的都是他们，都是他人。而失败者或倒霉蛋，只是我一个人！

这就是结论！

### “走为上计”

由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原恶，人与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难得信任彼此善意的厚厚的雾障。任何人都视其它人为自己的陷阱，任何人都天生地不敢信任其它人。“人对人就像狼一样”（霍布斯语）。在某些场合，甚至连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或丈夫）、兄弟、姐妹都让自己感到陌生，感到恐惧。

当时，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在小汤山住院疗养。他临行前留下话，由我协助李贵，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李贵是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台前工作和校外工作的责任实际上全由我来承担。从种种迹象看，从“发展”前途看，从事实上所起的作用看，不仅“蔡派”，校内外的人也大都将我视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

第二把手难当！

历史一再证明，第二把手的地位和处境是微妙的。他的能力可能低于第一把手，或者各有所长在伯仲之间，或者超过第一把手。他的地位最接近第一把手，是头把交椅的最强有力竞争者。世事使然，这第二把手又往往不能没有，而且，他还必须协助第一把手作好工作。协助得不好，会造成第一把手不高兴；协助得好了，工作做得出色了，就可能显得第一把手无能。因此，尽便是第二把手对第一把手再忠心，也难保不被第一把手警惕。这正是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人们挑拨一二把手矛盾，在一把手耳边大吹、不断吹阴风，制造其间不和的先天社会条件和心量前提。如果第一把手不明就里，耳根子一软，小则引起单位内部的混乱、分裂，大则引起国家的动荡和内乱。最后吃亏的不仅是单位和国家，第一把手还可能丧失江山，或落下历史的骂名。

就地质学院的情况说，在“蔡派”拉拢我失败，转而对我变为打击之后，他们就开始在我和王大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在王大宾耳边吹阴风的人包括王大宾所在的探工系的个别老师，包括文革初期和他一起共过患难的某些有思想的战友，包括“不朱不蔡”而实为“蔡派”的“军师”们。这些人，有的为革委会的巩固和前进出谋划策，有的为第一把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呕心沥血。这其中，不乏监视、警惕聂树人活动、动向的人们。

好在，我一直不存“野心”。由此，我思想行动表现出来的，最多的是安于

现状，最好的是退回到老百姓的地位上去——在权势上从不与人争多论少。因此，他人和“蔡派”对王大宾和我之间的挑拨离间始终无计可施，无机可乘。

这一次，他们的算盘珠子中肯定也有这种算计，而且，更为恶毒——弄好了，王大宾不说啥；弄坏了，我就成了替罪羊！而据他们的算计，十有八九，或者百分之百，他们是会成功的！

“二团”的谋划者们真是机关算尽。

“不行，我得离开学校！”

这是我对自己的第一道命令。当时，我深知，不仅地质学院处在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我本人正处在关键时刻。要冷静，要冷静，冷静冷静再冷静！选择离开，是上策。

离开学校，首先是离开了是非。远离学校，我将静观其变，然后，采取正确的措施。

在这个时候，与李贵商量对策是没有意义的。李贵和我的态度一样，肯定不会允许“大批判广播台”存在。但是，我与他不可能亲自去砸“广播台”，如果组织人去砸，就正好会落入“蔡派”军师们的圈套——他们会置李贵于不顾，而揪住我不放。

我也不想与王大宾商量此事。我相信，王大宾要的是“江山”，而不是好人的名声。如果地质学院有两个大喇叭天天唱着各自的调子，革委会就成了“半壁江山”，他的“平衡”还会有什么意义？而且，半夜里去小汤山找王大宾，也不现实，因为医院有医院的规矩。

至今想来，当时，在我的潜意识里，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地质学院是地质学院人的地质学院，是中国的地质学院，不是哪一个人的地质学院。地质学院向何处去，要顺应历史的潮流，要由地质学院的大多数人来决定。王大宾不在学校，我离开学校，正可以给地质学院多数人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人们不再选择我们而选择了“蔡派”，那正说明了我们的不称职。

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多么希望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次让大多数平民自主选择而不是被某些英雄包办选择发展方向的机会。

我个人当时的选择是，一定要消灭“大批判广播台”，绝不能使他们搞分裂的阴谋得逞！无论我在学校还是离开学校，这一条绝不动摇。

不过，即使我离开学校，我也胜算在握。

当时，在校内外人们的眼里，我是一个重权在握，可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不仅对地质学院有控制力，对校外的许多事情也有影响力。几十年后，我的一些同学在和我谈起当年的情况时说：“那时候你可是大人物，我们都是仰起头看你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估价过自己。我的做人准则是爱憎分明，我只是时刻要求自己，要言而有信，勇于负责！在地质学院，我原本就不是什么“朱派”，而我对“蔡派”的态度是人人皆知的。

在“二团”的眼里，我是他们搞分裂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从拉拢我到打击我，经历了千辛万苦。因此，对我的恨也就更深。而在我的心底里，我一直把他

们视为自己的战友。在“反干扰”的岁月里，我们同是受难者。我相信，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我理解他们本不该有的失落的心情，总觉得他们是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功臣，革委会里却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权力机构中没有他们一个人，心里很不平衡。我曾为此而努力过，希望将他们的代表人物增补进革委会，增补到权力机构中来。但是，没有人赞成我的这一提议。

因此，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问心无愧！

显然，地质学院的绝大多数人瞧不起他们，不原谅他们，不相信他们，抛弃了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这要问“蔡派”他们自己。

分析起来，正是他们自己搞臭了自己。二月“要掌权”失败后，为了搞垮革委会，他们无端制造出“朱成昭代理人”的大棒向革委会打来，不仅将革委会视为仇敌，还将我也视为敌人。他们时刻都想搞垮革委会，制造分裂，不仅我极为气愤，全院绝大多数师生也极为气愤！

“大批判广播台”将引致分裂、武斗，必然搞得全校不得安宁，地质学院的师生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局面的。清华、北大、北京钢铁学院因为两派武斗不断，校内许多人都到地质学院来寻找安宁之地。由人及己，地质学院的广大师生当然恨透了分裂，恨透了武斗，“大批判广播台”必为要联合、要团结、要统一的绝大多数师生所捣毁！

我断定“大批判广播台”是短命的。我没有别的本事，我的最大本事是相信地院师生的大多数，我站在他们的一边，他们也站在我的一边。我相信，对分裂者的打击很快会发生。而对分裂者的打击，并不需要我出面组织，更不会受到我的指责！

这就是我“胜算在握”的根据！

我打电话给车库，说我要到《前进报》社去，请他们派辆车来。

我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用意，车库往外派车有派车的详细记录。我正在阴谋和诡计的陷阱间挪步，我需要人们给我留下当时我不在学校的铁证。

“砸了！砸了！”

《前进报》原名《经济日报》，社址在城南虎坊桥一带。我知道那天晚上《东方红报》出报，有三个编辑人员正报社。我到报社后，立即给《东方红报》值班工作人员（是个40岁左右的女同志，寡居，好象姓刘，她的十多岁的儿子个子很高。她的名字我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打电话：

“学校现在怎么样？”

刘姓女人立即听出了我的声音：

“广播喇叭还在响，他们的‘宣言’已经广播三遍了。马路上聚集了许多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就在报社，有什么事，把电话直接打到报社来。”

随即，我又给李贵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的去向。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不要急，也不要管，革委会常委谁也不要到现场去。我相信，群众会收拾他们的。”

“那就等等看。”李贵说。

在地质学院人的心目中，《东方红报》、广播台的工作人员，是我的“嫡系部队”，都听我的。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我们只是观点相同，利益相同，大家以诚相待而已，根本谈不上嫡不嫡的问题。

到了11点半左右，电话来了：

“砸了！砸了！他们的广播台给砸掉了，喇叭声断了！”刘姓女人声音中洋溢着兴奋。

“是么？”我情不自禁地问道。

“没错！一些人正在往学12楼那边跑。”

我后来听说的情况是，砸“大批判广播台”的带头人主要是物探系的学生。他们的宿舍楼就在学12楼的旁边，距离最近，对广播内容听得最清楚。当“大批判广播台”开始广播的时候，多数人已经睡下，懒得起来。况且，在大家心目中，这时候比不得从前，革委会已经成立，不能无政府主义了，看革委会如何处置这件事。

第一遍广播过后，过了几分钟，第二遍广播又开始了。因为是高音喇叭，声音很大，吵得刚睡下的学生难以入睡。有人说：

“等明天再收拾它！”

第二遍完事后，已经快到夜半了。不几分钟后，第三遍广播又开始了。

“马上收拾掉它！”有人大声说。

于是，以红色尖兵为首的学生们像滚雪球似地，从学11楼（南五楼）、从学13楼中涌了出来，冲进学12楼。

但是，学12楼是个四层楼的学生宿舍，每层的中间是楼道，两边是几十间学生宿舍。文革前，这座楼上住的大部分是研究生，因此，又叫研究生楼。一百多个房间，哪间房子是“大批判广播台”的所在地呢？

因为是深夜，人们看不到楼顶喇叭线，无法从其走向上判断房间。

人们跑上跑下，寻找着。

屋里有人，门都打开了。敲不开的门，大家就抓着门框，往上一跳，透过门上方的小窗往里看。四层楼上，都有人在寻找着。

“有本事敢在地质学院设搞分裂，为什么就没有本事站出来！”有人在叫阵。

“出来！谁敢在地质学院搞分裂，就砸烂谁的狗头！”有人在骂阵。

不久，人们终于在三层（？）楼的一个房间中找到了广播台窝点，门从里面反锁着，里面的五六个人死命地抵在门背后。但是，他们哪里是愤怒的学生们的对手，很快，那间房门就被撞开了。冲进屋子的学生在关掉广播机器的同时，立即对之拆除。其它的人则把“二团”的人揪出屋外，扭着胳膊，想把他们押送到革委会，听候处理。

然而，令押送者意想不到的是，当“二团”的人被押送到楼外时，站在学12

楼外马路上的人就一轰而上，一个令人畏惧的众怒难犯的场面立即出现了，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二团”的人只有尖叫的份儿。他们根本不敢还手，好象被当场抓住的贼在当街遭打，只有抱头鼠窜的份儿。到处都有拳脚打过来，他们真是无路可逃，躲不胜躲，防不胜防。他们立即意识到，他们已经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无路可逃，无处可躲。他们惟一可能保护的就只有自己的头了——用双手保护着头，手和胳膊挨打就顾不上了！惟一能帮助他们的地方只有马路两边柏树墙的根部，于是，他们紧抱着头，向柏树墙的根部钻。可是，那树的墙并不厚，根部紧密排列着，充其量只能容得下人头。情势所迫，只能当鸵鸟，顾头不顾腚。于是，屁股、腿脚就成了人们踢打的对象。

不过，人们并没有刻意去踢打，只是距离近的人顺手而为之。否则，那七八个人早就被打残打死了。

人们在踢打中怒斥：

“叫你们搞分裂！”

“叫你们尝尝搞分裂的味道！”

凌晨，待我回到学校时，校园正处在沉睡中，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文革，在文革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被一些人称为动乱。对动乱的概念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理解虽然与此不同，但是，从传统的观念和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看，文革的确是“乱”了些。人们在高喊着同类口号、说着同套式语言的同时，在“自己解放自己”的有限自由下，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在群众组织内部或单位内部，可以实行民主的程序。没有了工作队的地质学院，才有了“地质东方红”总部的一次次开门整风，才有了领导班子的正常的民主的和平的更替，才有了“蔡派”、“朱派”和“杀猪切菜派”的平等论争，才有了完全植根于民主基础上的“东方红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才有了打着“地质东方红”旗号而又与“地质东方红”总部大唱反调的“二团”的活动自由，才有了以“不偏不倚”的“中间派”自誉的“赤二支”（“赤卫兵二支队”）的活动自由，才有了各种意见可以在地质学院自由发表的局面……

由于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才有人敢在地质学院架设“大批判广播台”。

由于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也才有人不同意在地质学院架设广播台。因为没有正规的表示方式，人们就只能以“你一拳，我一脚”的方式加以表达。

高唱现代中国人民有最大最广泛民主自由的人们，你们在文革之前见到过这种政治局面吗？你们在文革之后见过这种政治局面吗？

肯定没有！

记得“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曾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邓小平当政后，在“秩序！秩序！”的呐喊声中，又被删除！——由此想开去，体现人民（《宪法》条文上写的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就这样被政治家们改来改去，成了政治家手中的玩物，人民还能有什么样的权利？吃政治饭的语言学家们对此也就有了“科学”的注释。

我并不反对修改宪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修改宪法以

至变革政治制度，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问题在于，许多国家修改宪法要通过全民公决；有的国家，比如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包括修改宪法这样的事关公民死活的大事在内的所有事情，从来都是大小伯乐大小救星们代劳的。小民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或共产主义的觉悟，愚昧无知，甘愿忍饥挨饿，甘愿吃糠咽菜，甘愿做牛做马当顺民，如果由他们“公决”，肯定会把国家出卖给美帝苏修或台湾的蒋介石，或者会从坟堆里把秦始皇、慈禧太后拉出来，复辟封建制度！这是万万不行的！对于这样的刁民愚民，不给民主显得伯乐们过于专制，给民主又怕出事，于是，只能“依据法律规定”加以规定（限制），给多少你就用多少，不给你就不能用；昨天给的今天可以收回，总之，国人可以享有多少民主，不能“公决”，而要由大小救星们严加控制。

## 王大宾对“二团”的慰问

9月5日上午，王大宾怒气冲冲地从小汤山回到了学校。何人向他通报了学校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一回到学校，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要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二团”挨了打的人，就可以判断，是“二团”和“蔡派”的人向他告了我的黑状。

我没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就和他一起去了。AAA

他领我去的地方是东三楼安静中家。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的同班殷惟侯，好象还有肖体休（毕业离校后改名为肖景东，据说后来娶了安静中的小姨子为妻）等，但是，没有见到安静中。

我们早就知道，前团委书记安静中是“二团”的高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安静中要站在革委会的对立面，支持“二团”。后来听说，他与他的团委书记的继任者黄振群有矛盾，黄振群作为“红干联”负责人进了革委会，并当了常委，成了学校的领导，他有些不服气，就……可是，就我对安老师的了解，他的心胸不至于这么狭窄。

王大宾对殷惟侯等被打表示慰问，我则一言不发。“二团”的人对我只是怒目而视，但是，没有人敢于指责我，因为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

其实，当时我很想他们能这样做，以便给我以洗涮自己的机会。我估计，在“大批判广播台”遭到覆灭之后，在围打他们的人散去之后，他们肯定分析过情况。至少，我没有在现场出现过。或者，我当即离开学校的情况他们是清楚的——当时他们肯定有人在关注我的动向，以便大做文章。

常委会。王大宾怕学校因此而大乱，加之看到“二团”的人吃了大亏，对“二团”人的话信以为真，以为这事是我直接指挥下干的，原本想在会上对我加以指责。可是，在会议一开始凑情况时，他才知道，当时我根本就不在学校。“二团”人之被打，完全是群众自发之所为，与我无关。而且，到会的常委们和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笑谈广大师生昨晚的壮举，一致谴责“二团”分裂的罪行，使他感到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变一变。

常委，水文系革委会主任任云堂（学生）在会上介绍了他刚才在九楼十字看到的情况：

“赵国柱站在一张方桌上说：我在这里强烈控诉革委会中一小撮暴徒对我们大批判战士的残酷迫害。他们不给我们发言权，砸了我们的‘大批判广播台’，打了我们的人！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向北京的、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战友控诉……桌下有人故意问：‘哎，他们把你们打成什么样了，让我们看看！’赵国柱就把脸转向问他的人说：你们看，他们把我的脸打肿了，一片青紫……‘那一面呢？也让我们看。’赵国柱又转了180度说：这一面打得更厉害，脸肿着，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们猜怎么着？桌下响起了一叫好声：‘打得好！’‘搞分裂的人就该打！’‘这就是搞分裂的人的下场！’‘打得少了！’”

有人说，别看昨天晚上黑，大家一个都没有打错，挨打的都是“二团”那七八个人。

有人说，大家出于义愤，你一拳，我一脚。

谁打的？连“二团”的人也说不清。

当王大宾听到参加常委会的广播台同志说，“二团”所使用的广播器材上用红漆写着“北大广播站”字样后，他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才感到“二团”的后面站着“天派”。于是，他在会上骂聂元梓是臭婆娘。

聂元梓、蒯大富等插手地院，支持“二团”搞分裂，是路人皆知的事情，短命的“大批判广播台”所使用的标有“北大广播站”字样的广播器材，等同于一只被斩断了的贼手，永远留在了地质学院。

当日下午，我又知道了另一个情况，“二团”事先已经编造并印刷好了一份传单，其内容大意是：在我们大批判广播台开始广播后，成百上千的暴徒一拥而上，对我大批判战士恶语相加，拳打脚踢，残暴至极。据统计，我们有好几个战士被严重打伤。这是北京地质学院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在武斗进行过程上，革委会常委聂树人站在一旁冷笑着。这次武斗事件显然是在他的指挥下发生的……

“二团”的谋士们对情况预见的准确性十有八九，惟一没有预见到的是，我在事前离开了学校。这使他们原想公开散发的传单不敢散发了，原先计划好的“控诉”和告状行动不得不夭折。

王大宾可能是听了“一面之词”后，对我气哼哼的。不过，他在知道了真相之后，对“二团”编造谎言，恶意挑拨我与他的关系，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则更为反感。试想，如果不及时端掉那个“大批判广播台”，地质学院就要发生公开分裂，作为革委会主任，王大宾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

“大批判广播台”存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被群众踢翻了，并且抓住了“二团”的幕后支持者。“大批判广播台”的毁灭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派严重分裂和武斗不同，后者是以野蛮的流氓的政治手段和强权（大棒和枪炮）企图使对方臣服，而前者则是失却道义的分裂者在道义的铁拳下，理屈词穷地逃窜和臣服

——他们的“道理”见不得阳光，广播喇叭上“北大广播站”的红漆大字则将他们永远钉死在“理通外奸”的耻辱柱上。

### “聂鲁晓夫”在暗夜里贴出

“9·4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就北京以至全国的形势说，正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以及林杰作为替罪羊被送进秦城监狱的当口。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经过一年多的奋战，终于赢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大胜利。他们希望，王力、关锋的倒台是多米诺骨牌的头一两张牌，由此穷追猛杀，就可以把文革彻底埋葬，就可以把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统统送进秦城监狱，就可以把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霾一扫而清！

毛泽东的司令部也及时地看到了这一点。据《大事记》记载，9月5日，即“9·4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其中讲到：“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历史的转折关头最容易显露出各路英雄的真面目。“天派”的钦定英雄们以为天就要变了，文化大革命就要转向了，他们组织新势力、扩大影响的大好时机到了，于是，迎合着上层倒中央文革的潮流，向“地派”发起了进攻。

“9·4事件”是地质学院“二月整风”及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菜派”与“杀猪切菜派”斗争的继续，是二者间多次冲突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在这个转折关头，“蔡派”的英雄们病笃的私欲恶性膨胀，在钦定英雄们的蛊惑和煽动下，以为中央文革要完蛋了，天下风向要大转向了，革委会要垮台了，他们乱中夺权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为了掌权，先得造乱，于是，从聂元梓那里弄来了广播器材（估计还有其它物质上的资助），“大批判广播台”就开始广播了……

他们对地质学院形势的分析是，孟夫子调走了，聂树人对“蔡派”的态度比王大宾、李贵还要强硬，因此，经过反复分析研究，中立王大宾，打击聂树人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只要搞垮了聂树人，“朱派”的阵脚就会大乱，地质学院就会大乱，就可以从浑水中捞上鱼来。

他们将王大宾列为“中立”对象，可能有如下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以我在文革初期的影响，以我在“三司”和红代会工作时在中央上层和社会上的影响，以我回到学校后在校内工作中的作用，特别是校内“杀猪切菜派”对我的信任，必然对王大宾的作用和地位构成威胁。由此招致王大宾对我的防范心理，就成了他们在王大宾和我之间制造矛盾和隔阂的缝隙和契机。

9月4日前后，王大宾不在学校，这正是一个可以使他保持“中立”的大好时机；将“大批判广播台”安装在聂树人所住楼房的房顶上，以他的性格特点，必定会气得跳起来，必定会立即组织人对之打、砸。聂树人跳得越高越好，“朱派”的人把“二团”的人打得越惨越好，乱子搞得越大越好！这样一来，同情“蔡派”并帮助“蔡派”的人们就会越来越多，两派的武斗就会不断升级……再加上校外聂元梓、蒯大富等“天派”的支持配合，聂树人就会垮台，地质学院革委会就

会完蛋，最后收拾残局的就只能是“蔡派”了！

为此，“二团”在校内外的高参们进行了精心的策划，真是费尽了心机。

谁曾想，这一场经过校内外精英们反复策划和论证的万无一失的行动，却被狡猾而可恶的聂树人轻而易举地戳穿并化解了。更可气的是，革委会的常委一个都没有露面；挨打的就是那么七八个人；这个一拳，那个一脚，举拳伸脚的人都是生面孔或半生不熟的面孔，而烧成了灰都认识的铁杆“朱派”却一个都没有出来！原先就编造和印刷好的传单也因聂树人离开学校，又不见革委会的其他常委，而不敢散发……

王大宾在了解了真相之后，不仅没有保持“中立”，反而彻底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

“蔡派”在“9·4事件”中遭到了惨败。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

反过来说，这也等于在我的脸上贴足了金子！

他们对我更加仇恨。此后几天，除继续挑拨我与王大宾和其它领导成员的关系外，还贴出画有我的头像漫画的大字报，讽刺我“独裁”，想一口吞下地院；夜半，他们偷偷在我住的学12楼楼门口贴出对联，“犒封”我为地质学院的“聂鲁晓夫”。

对他们的大字报和对联，我只是笑看一番，并不公开理会，就让它们贴在那里，让大家欣赏，让校内外的人们对我、对张贴它们的人鉴别真伪！最后，让它自生自灭。

不过，我还是得感谢他们！有了无数敌视的、不敌视的眼睛的监督，有了直面的和这些不直面的偷偷摸摸的批评、提醒和“监督”，使我时时检点自己，鞭策自己，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监督和批评时时提醒我，莫伸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感谢他们的监督和帮助，使我在工作中只能为公，不敢有私，不敢懈怠。在地质学院革委会成立半年后，经历了众多风雨之后对常委班子进行第一次大调整时，好几个同志（黄振群、张海涛、杨雨中、田春林）不再担任常委职务了，而人们却推举我为革委会副主任。

（编者注：该文引自《地质东方红兴亡史》聂树人著，519页-528页）

#### 编者按：

聂树人：文革研究学者，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1622班），文革期间，曾任地院革委会副主任